

编辑说明

政治协商会议系根据《国共会谈纪要》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在全国人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与会代表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和平建国，迎来了一线曙光。但会议闭幕后，在《决议》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当权者阻挠破坏，内战不断扩大，最后导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彻底破裂。

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停战谈判的全部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五个部分：（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二）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破坏；（三）停战谈判；（四）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五）回忆录。

本书根据档案、文献和当年出版的报刊资料，以及有关回忆文章编辑而成。档案部分主要选自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档案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牛军、杨奎松、孙建益、张琦、杨玉文、彭艳、谢春涛、王东、赵刚等翻译，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照片主要由童小鹏同志和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市博物馆提供，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曾经参考过国内已经出版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

本书承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题写书名，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李新作序，全国政协副主席缪云台、全国政协常委梁漱溟题词，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南方局党史资料组副组长童小鹏具体指导；承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刘炼教授大力协助；承重庆出版社，在出书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况下，组织力量，早日成书。对于以上同志和单位，谨致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特别是外文资料中的人名和地名，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的作了校订，但仍会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尚祈专家学者不吝指教，以便今后再版时修订。

编 者

1988年6月

0054 / 8

序 言

四十二年前，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现在，把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文献汇集成《政治协商会议纪实》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四六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国共关系史，它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国民党从此更加失道寡助，丧尽人心，以致它在大陆上的反动政权终于被人民所推翻；而共产党则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打赢了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特别是沦陷区的人民，对国民党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由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了“劫收”，人民对它已经大失所望，普遍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不过，经过八年离乱的人民还是极度忍耐，但求国民党能给他们带来和平生活也就满意了。哪知国民党反动派的心中，根本没有人民，为了坚持一党专政，抗战的炮声还没完全停止，他们又打响了内战的枪声。因此，全国反内战的运动，立即掀起了高潮。正是由于全国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在内战前线遭到“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的重大失败，国民党才被迫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

的《双十协定》的规定，由国民政府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等五个方面的代表，共三十八人。

当时，内战并未止息、缺乏召开政协会议的必要气氛。因此，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深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赞同。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同时，由国、共、美三方组成三人会议。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又共同发表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并在北平建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议》。就这样，政治协商会议遂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政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当权者公开承认了中共和其它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国民党当局尚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明智之举。当时，各界人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欢迎政协会议的召开，期望它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和平、民主和独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全国人民对政协会议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

在政协会上，当时中国社会的三种政治力量，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由于中共代表团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使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也由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实际上确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

政协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开成了各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都平

等参加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意会议，它在决议中实际上承认了联合政府。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距离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还很远，但如照此下去，则一定要朝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为按照政协决议，解放区可以运用地方自治、省宪法等规定来保持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而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取消特务，改组政府，实行以立法院为议会，以行政院为内阁的宪政，实际上是由法西斯主义转向旧民主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周恩来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时说：“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也正因如此，它得到了中共和其它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也赢得了英美及苏联舆论的普遍赞扬。

与人民一心一意的热忱拥护相反，国民党当权者对政协会议采取两面手法：一面主持会议；一面践踏民主。还在会议期间，它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会后，又炮制了“较场口血案”，捣毁北平军调部和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报社，并策动反共大游行。接着，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推翻《政协决议》，进而通过御用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以否定各党派平等协商的政协会议，企图使破坏《政协决议》的反动行径合法化。

政协会后，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坚决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诚意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和视察，与国民党先后达成了《整军方案》、《恢复交通协议》、《东北停战协议》、《停止中原内战协议》等，为贯彻政协路线，维护国共合作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六年夏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于当年十一月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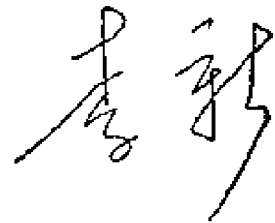
开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彻底破坏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定的一系列协议、决议和方案，单方面关闭了和谈之门，破坏了长达将近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及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当局限令撤离，回到延安。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结成了空前广泛的各党派、各阶层、各兄弟民族都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国共两党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自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中国人民又吃尽了民族分裂、骨肉离散之苦。就国民党而言，“联共则荣，反共则衰，”已是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和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当此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切盼祖国统一、共谋振兴中华之时，认真回顾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分裂的历史，温故知新，痛彻觉悟，从而明确今后应走的道路，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同志们，经过多年的精心搜集和深入研究，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继《重庆谈判纪实》、《国民参政会纪实》之后又编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纪实》，用十分珍贵和确凿的材料，全面系统地重现了政协会议、停战谈判，以及国共合作破裂的历史，记录了围绕这些事件的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中美关系，揭示了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在祝贺《政治协商会议纪实》出版之际，希望重庆市政协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同志们再接再厉，为继续完成全面系统地再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系列纪实丛书，进行不懈的努力，为学术繁荣和祖国统一做出新的贡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徐' (Xu) and '倩' (Qian).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1988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言.....李 新 1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的国共谈判.....周恩来 1

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一)各党、各派、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统一,厉行和平建国

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元旦的广播演说..... 13

迅开政治协商会议.....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22

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25

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39

人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人.....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42

迎政治协商会议.....《群众》周刊社论 45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和答记者问..... 50

叶剑英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54

邓颖超在中国妇女联谊会晚会上的讲话·····	55
中国民主同盟对国事的十项主张·····	57
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	62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	67
全国工业协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76
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79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对于当前国是的意见·····	85
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88
吾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	马寅初91
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	柳亚子93
贡献一个新的建国纲领·····	刘王立明97
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心问题·····	何公敢100
我的答案·····	施复亮105
要真正民主方能解决问题·····	茅盾108
一个心理卫生工作者的意见·····	丁璿110
几点意见的简述·····	伯韩113
为政治协商会议努力·····	令孤玄115
政治协商的前提·····	一群公务员119
(二) 国民政府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和政协会员	
名单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	122
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名单·····	124
附：政治协商会议分组人员名单·····	125

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委员会委员名单	127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各方委员及会外专家名单	128
政协代表访问记	浦熙修129
(三)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中共代表团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	205
冯玉祥、孙科宴请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	208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招待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09
中国青年党分别宴请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民主同盟和社会 贤达代表	211
民主建国会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12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15
陪都文化界七团体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21
陪都妇女界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28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233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举行茶会	236
(四)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礼，在国府礼堂举行。蒋主席 宣布决定实施保证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地位， 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240
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242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	247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在开幕式上致词	250
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在开幕式上致词	253

社会贤达代表都从恩在开幕式上致词	254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	重庆《中央日报》社论258
祝政治协商会议开会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262
勉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大公报》社评265
政治协商会议揭幕	重庆《国民公报》社论268
贯彻四项民主措施	重庆《新民报》社论271
祝政治协商会议	昆明《云南日报》社论273
(五)各团体、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强烈要求政协会“只许成 功，不许失败”	
民主建国会等三团体筹组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275
陪都教育文化界人士成立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276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	277
九三学社筹备会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	289
中国民主促进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七点建议	292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295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于当前农村改革的意见	298
中国妇女联谊会对当前政治意见书	301
昆明文化界人士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306
华中文化界致政治协商会议电	308
晋察冀文化界致政治协商会议电	310
重庆沙坪坝万余学生游行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七项 国是主张	312
上海学生万余人通电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八项要求	314

(六)会议发言热烈，各党派抒发己见，进行交锋。舆论界亦有评论

论界亦有评论

·关于停战商谈的报告·	316
张群报告停战商谈经过	316
周恩来报告停战商谈经验教训	321
周恩来的补充发言	328
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329
·关于国共会谈的报告·	330
邵力子报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	330
周恩来报告国共会谈经过	336
·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与保障人民权利·	344
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	344
王世杰对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的说明	346
董必武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	350
周恩来在讨论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时的发言	353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	354
中国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	356
曾琦关于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的报告	358
郭沫若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发言	359
·关于施政纲领·	360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360
政协第五次会议讨论共同施政纲领问题	366
·关于军队国家化·	376
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林蔚关于整军设施的报告	376
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	382
邵力子关于军队国家化有关问题的发言	388

陆定一关于军队国家化有关问题的发言	389
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	390
梁漱溟对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的说明	392
中国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	394
陈启天对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的说明	398
·关于国民大会·	400
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	400
张厉生对国民大会之意见的说明	401
周恩来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的发言	405
吴玉章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发言	407
邓颖超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发言	409
陈立夫在讨论国民大会有关问题时的发言	413
陆定一就陈立夫所提关于“三三制”等问题的发言	414
·关于宪法草案·	416
孙科对《五五宪草》的说明	416
吴玉章关于宪法原则问题的意见	421
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提出关于宪法问题的四项主张	423
论共同纲领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426
纲领·政府·国大·宪草	重庆《大公报》社评429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432
迅速释放政治犯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440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443
改组政府问题	重庆《新民报》社评448
评改组政府案	重庆《国民公报》社论451
国民大会问题	重庆《新民报》社评454

(七)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政协会议圆满闭幕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案456

蒋介石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的闭幕词458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464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勱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466

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468

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470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471

(八)国内外人士盛赞政协成就，期望切实履行《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重庆《中央日报》社论485

和平建国的起点重庆《新华日报》社论488

中国历史的新方向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重庆《新华日报》社论491

协商会成功了昆明《云南日报》社论494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重庆《大公报》社评496

从协议到实施重庆《新华日报》社论499

各党派长期合作重庆《新华日报》社论501

由纲领到实施重庆《国民公报》社论503

美英舆论普遍赞扬政协会议获得成功506

苏联报刊评论政协成就.....510

延安权威人士评政协会议闭幕511

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513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515

周恩来在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上的演讲	518
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的演说	521
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郭沫若、张君勱、缪嘉铭	
赞扬政治协商会议伟大成就	525
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邵力子，发表演说：	
政协会议成功是民主运动的胜利，要求希望兑现	529
张治中举行联欢晚会，庆贺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延安两万人热烈聚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540
张家口五万群众举行大会，庆祝和平实现，政协成功	543
北平、广州学生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545
成都十八团体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546
马来亚华侨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547
泰京华侨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548
香港侨胞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549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发表告全国	
同胞书	552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余人民团体发起举行庆	
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	555

二、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破坏

(一) 制造“沧白堂事件”

一月十六日夜大批特务捣乱政协代表讲演会场	559
----------------------------	-----

一月十七日夜大批特务再次捣乱会场，侮辱谩骂，叫嚣恐吓	561
一月十八日夜特务又在会场包围殴打两青年	563
一月十九日夜特务又在会场捣乱，乱扔石子伤人	565
(二)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	
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	566
(三)炮制“较场口血案”	
暴徒逞凶，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未能举行，郭沫若、李公朴、 施复亮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	569
较场口暴行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572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告 书	575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将举行庆祝政协和平胜利大会给渝特 区的报告	581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将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给 渝特区的报告	582
军统渝组就市党部紧急会议指示对付庆祝政协胜利大会办法 给渝特区的报告	583
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给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584
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585
军统渝组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情况给渝特区的报告(一)	588
军统渝组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情况给渝特区的报告(二)	589

中央社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报导	590
重庆各报记者四十二人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	593
重庆新闻从业人员二二一人关于保障人权,忠实报导的意见.....	595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张钧陶598
(四)捣毁北平军调部和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	
暴徒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621
罗瑞卿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被暴徒捣乱发表谈话	623
周恩来就暴徒行凶捣毁《新华日报》事发表声明	625
严重的抗议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628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致国民党政协代表 并转蒋介石书	631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暴徒捣毁《民主报》及《新华日报》致 蒋介石书	633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再致国民党政协 代表并转蒋介石书	635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三致国民党政协 代表书	637
(五)公开推翻《政协决议》	
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	638
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宣言	64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坚持政协会议一切决议发表 谈话	645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647
博古答记者问	654

驳蒋介石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655
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演说要点		664

三、回 忆 录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吴玉章	675
重庆谈判与旧政协	李维汉	695
参加旧政协的一些回忆	罗隆基	704 ✓
参加旧政协的经过	梁漱溟	728 ✓
政治协商纪略	王云五	740

目 录

四、停战谈判

(一) 国民党违反《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各界紧急呼吁， 反对内战，停止冲突

- 真和平与假和平延安《解放日报》社论763
-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答外国记者：要求美军不要参加中
国内战767
- 黄炎培先生致函国共会谈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769
- 纪念总理诞辰 呼吁制止内战柳亚子771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内战773
- 中国第三党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776
- 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为国共军事冲突告全国同胞书779
-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六团体紧急呼吁反对内战782
- 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紧急呼吁停止内战784
- 中国妇女联谊会呼吁要求立即撤退在华美军785
-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紧急呼吁反对内战787
- 中国民主实践社紧急呼吁制止内战789
- 《中华论坛》等二十七杂志联合呼吁不要内战791
- 内战不能再打了！

0054/18

——重庆大学生致全国同学的公开信	794
成都各大学二十一个团体发表制止内战宣言	796
昆明三十一所大中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 告全国同胞书	798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801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信	804
附：中共代表团函复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806
周恩来向邵力子表示：中共希望立即停战	807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国共双方请迅即停止内战信	808
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复张澜信	809
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	810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	813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814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820
马歇尔与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会谈记录	825
(二)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达成停战协定	
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	836
政府代表复中共代表团信	838
马歇尔致蒋介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令的备忘录	839
马歇尔提出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草案	841
马歇尔提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办法	843
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协议	844
军事三人小组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备忘录	845
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 命令与声明	847
蒋介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电令	849

中共中央发布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	851
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852
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一号公告及和字第一、第六号命令	855
马歇尔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	859
附：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864
马歇尔与张群会谈记录	877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	885
(三)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达成整军方案和恢复交通的	
协议	
周恩来就政协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966
马歇尔提出军队整编计划草案	
——整编中共部队及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	
.....	969
附：阿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致马歇尔将军电	975
军事调处执行部关于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命令	978
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981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的备忘录	988
政府代表张治中在整军方案签字仪式上致词	990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整军方案签字仪式上致词	992
马歇尔在整军方案签字仪式上致词	994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对执行部工作人员讲话	995
马歇尔关于整军方案谈判的报告	998
附：马歇尔与张治中会谈纪要	1008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1015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	1024
(四)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 达成东北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	1096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东北问题发表谈话·····	1101
东北文化协会发表解决当前东北问题意见·····	1103
周恩来致马歇尔关于中共对东北问题立场的声明书·····	1104
马歇尔致张群、周恩来备忘录·····	1110
马歇尔提出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 指令草案·····	1111
周恩来提出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 令草案·····	1112
美方代表吉伦提出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去 东北的指令草案·····	1114
军事三人小组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 的协定·····	1116
军事调处执行部派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接获的密令 ·····	1117
马歇尔关于在东北执行停战令和军事调处执行部派执行 小组进入东北的报告·····	1119
附: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131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	1140
(五)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 就广东和中原中共部队问题达成 协议	
关于停止中原冲突的罗山停战协议·····	1174
张治中为广东东江等地共军问题给蒋介石的报告(摘要)	

.....	1176
蒋介石为广东东江问题给张发奎电.....	1177
周恩来提出给军事调处执行部和第八执行小组指令草案.....	1178
周恩来提出给军事调处执行部和汉口执行小组指令草案.....	1180
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广东东江中共部队(东江纵队)问题的协议	1182
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1185
附：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四).....	1187
(六) 国民党军挑起东北冲突与六月停战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节选)	1260
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对时局发表重要讲话(节选).....	1265
美方代表吉伦向蒋介石提出停止东北军事冲突方案.....	1269
周恩来为重申中共对各项问题态度复政府代表信.....	1270
马歇尔提出立即停止东北冲突草案.....	1272
蒋介石关于停止东北冲突的建议.....	1273
马歇尔提出关于立即停止东北冲突的修正案.....	1274
周恩来对东北问题发表重要谈话.....	1276
军事三人小组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信.....	1280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对时局意见.....	1282
桂林文化界致马歇尔吁请停止帮助运兵东北信.....	1285
北平各界人士呼吁立即停止内战.....	1287
马歇尔总部发表声明.....	1290

延安人士同情马歇尔总部声明·····	1291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电·····	1292
毛泽东复民盟代表电·····	1293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请蒋介石早日返京电·····	1294
蒋介石致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处执行部电·····	1295
宋美龄致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条件信·····	1297
周恩来复马歇尔有关蒋介石所提停止冲突条件的备忘录·····	1299
马歇尔致蒋介石请令东北国军停止攻击和追击信·····	1301
马歇尔致蒋介石请令东北国军停止前进追击备忘录·····	1303
蒋介石为东北停战致马歇尔信·····	1304
蒋介石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	1306
周恩来关于东北停战的声明·····	1307
国民党提出关于整军及统编中共部队方案补充办法建议草案 ·····	1308
马歇尔关于在东北重新配置中共军队给蒋介石备忘录·····	1311
柯黑致徐永昌周恩来备忘录·····	1314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当前时局发表谈话·····	1316
中共代表团致国民党代表信·····	1322
周恩来就和平谈判有关问题答中外记者·····	1324
中共代表团复马叙伦等人信·····	1328
罗隆基、史良等八十九人告国人书·····	1330
重庆各界人民和平促进会通电呼吁全国人士制止内战·····	1332

上海学生成立争取和平联合会，号召全上海同学联合起来制止内战·····	1334
蒋介石宣布停战延期八天·····	1336
周恩来就东北停战延期八天发表谈话·····	1337
蒋介石向马歇尔提出整军四项原则·····	1338
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修正整军方案之初步协定·····	1339
军事三人小组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	1341
军事三人小组关于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的协议·····	1343
军事三人小组解决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	1346
军事三人小组订正及执行二月二十五日整军方案之初步协议草案·····	1349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的声明·····	1352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时局发表书面谈话·····	1354
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答复有关时局各项问题·····	1356
附：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360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	1369
(七) 国民党军围攻中共中原部队，内战日益扩大	
中共中央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发表宣言·····	1418
李先念为国民党大军“围歼”中原部队发表声明·····	1426
中共代表对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大提出书面抗议·····	1429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的谈话·····	1431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驳斥彭学沛的谈话·····	1433
周恩来在沪招待记者谈三大问题(节选)·····	1437
宋庆龄发表当前时局主张·····	1441
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轰炸延安致蒋介石信·····	1445
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	1447
七月的总结	
——评《马司联合声明》·····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1448
蒋介石八月十三日文告·····	1454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对蒋介石文告发表谈话·····	1462
立即无条件停战 实行政协决议·····《群众》周刊社论	1464
周恩来招待记者说明时局重要问题·····	1473
周恩来招待外国记者答复有关时局问题·····	1477
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	1484
(八) 中国共产党抗议美国助蒋内战	
毛泽东为美国军事援华发表声明·····	1487
周恩来关于美国售让剩余物资致马歇尔电·····	1489
中共中央关于蒋美剩余军火买卖谈判的严正声明·····	1491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	1493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	1495
美国四十万人签名要求撤退驻华美军·····	1499
中共上海发言人为《中美商约》发表谈话·····	1500
(九) 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召开“国民大会”，谈判宣告破裂	
召开三人会议 立即商讨停战·····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1502
马歇尔致周恩来备忘录·····	1505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	1506
马歇尔、司徒雷登致周恩来备忘录·····	1508
周恩来致马歇尔、司徒雷登备忘录·····	1519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	1510
中共代表团致蒋介石信·····	1512
周恩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	1514
马歇尔致蒋介石备忘录·····	1524
蒋介石致马歇尔备忘录·····	1526
政府代表复中共代表团信·····	1528
彭学沛发表政府声明·····	1529
中共有资格人士答记者问·····	1531
中共上海发言人驳国民党政府十月二日声明·····	1533
马歇尔致司徒雷登备忘录·····	1536
中共中央某负责人答记者问·····	1538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发表谈话·····	1539
中共发言人对马歇尔、司徒雷登和宋子文声明及时局的严正 声明·····	1540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	1544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	1549
蒋介石十月十六日声明·····	1551
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声明·····	1553
中共上海发言人发表继续和谈声明·····	1556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	1557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严正谈话·····	1559
第三方面人士的建议·····	1561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	1563
蒋介石十一月八日声明·····	1564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蒋介石的声明发表声明·····	1566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答记者问·····	1568
中共上海发言人说明当前问题·····	1570
中共代表团发表书面谈话·····	1572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	1573
周恩来为揭露“国大”发表书面谈话·····	1574
周恩来答记者问·····	1577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表书面谈话重申当前时局主张，·····	1579
董必武致马歇尔备忘录·····	1582
马歇尔离华声明·····	1583
周恩来评《马歇尔离华声明》 ——在延安纪念会上的演说·····	1588
美方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	1594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声明·····	1595
中共南京发言人为美方宣布退出军调部事发表谈话·····	1600
新华社记者评军调部一年工作总结·····	1601

五、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第二次 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中共中央发言人为京沪渝三地中共人员撤退事发表声明·····	1607
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重庆警备司令，分别致电(函)京、 沪、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员限期全部撤退·····	1609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共驻京沪渝人员被迫撤离·····	1612
司徒大使设宴为南京中共联络处人员饯行·····	1614
周恩来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委托民盟保管京、沪、 渝三地中共遗留全部房屋财产·····	1615
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紧 急声明·····	1616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代表罗隆基为受委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 蓉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	1617
中共代表董必武及京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 全体人员启事·····	1618
董必武离京时发表书面谈话·····	1619

六、回忆录

南京谈判前后·····	李维汉 1623
我所参加的国共会谈·····	梁漱溟 1637
第三方面南京和谈内幕·····	罗隆基 1666
在停战谈判中·····	郭汝瑰 1692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始末·····	余湛邦 1728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国共谈判

周恩来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三个阶段来说：从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宣言、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直到年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政协到六月休战；第三阶段从七月大打到现在。三个阶段有很多区别：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这就是谈判各阶段的特征。现在分开来看：

第一个阶段

抗战八年，赢得了日本的投降，当时的情况是：（一）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二）中共所领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的在我们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三）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这是八年抗战所证明了的。所以这三种要求——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

* 本文摘自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该文为周恩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报告中的一部分，见《周恩来选集》上卷，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编者

全正确的。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这是我党的历史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方针，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要贯串它与实行它。

根据以上方针，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在此纪要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尽管到现在，国民党在各地还捉杀我们的人，我们的党在蒋管区还处在地下，但中共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从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是不同了。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年前西安事变后，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抗战，我们向蒋提出国共共同纲领，他不理，自己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但在日本投降后，因为经过我们八年的努力，解放区有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共产党军队达到了一百四十万万的人数，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因此，蒋也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请毛泽东同志去。毛泽东同志的去重庆是关系着中共在中国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去年这一次去是完全需要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力量的发展是八年的成绩，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就不同了，取得能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所以今年九月蒋在庐山训话中说，中共已不像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

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在这以前，蒋根本不承认各党派

的地位，而此后却承认了，提高了各党派中的地位。历史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张君勱虽参加了“国大”，但在其见记者时，还说希望共产党原谅。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思想。“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

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二十个师。但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

以上三点是双十会谈纪要的收获。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

另一方面，没有达到协议的是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在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到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这对蒋来说，比前面的三个问题重大得多，因为凡是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独裁者的份儿。这对蒋是一个根本的威胁，因此蒋不承认。同时这也是与赫尔利闹翻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

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还有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受降，他要经过美国人，而这样他的军队才由西南到了各大城市，同时又利用日俘、伪军打我们，把内战重新打起来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谈判中，我们有不可磨灭的成绩，同时又有第二类没有承认的问题，还有第三类形式上承认而实际上又被破坏了的的问题，这样使谈判不能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

三个月的内战，证明蒋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主要力量在西南，虽然美国尽一切可能帮他运了5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等，但他的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东北、华北广大地区还被我们解放着，使蒋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国际上有杜鲁门声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马歇尔来华等。因此，使内战暂停，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期应该说有成绩，如一月十日停战令、一月底政协决议、二月整军协议、三月东北停战协议等四个文件的签订。这里有四个问题，需加以说明：

一、战争在全国范围的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事可能停止，这也不能不影响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党

的方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夸大了，那就是幻想了。但中央当时估计和平的可能也确有许多根据。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时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假使蒋不动，他的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不多，的确打不起像过去五六个月来那样的大仗。所以当时我们签了字。但到后来蒋大的调动，使此协议被破坏（大的调动还是在五六月）。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这，一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斗争口号。我们拥护停战协定，并不要因蒋破坏而不去拥护，如果照停战令作下去，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二、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蒋虽不愿承认联合政府这名词，但实际上如翻成英文，还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蒋不敢这样做，所以破坏它。但直到今天蒋还不敢公开否认它，因为政协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的。在一年前的“七大”，我们也还没有预料到这样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党派会议，产生这样一些决议。因此，这个决议还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当时许多问题都协议了，就是国大问题也妥协了，我们还承认国民党圈定的九百五十名代表，因为如依决议去做，国大只是形式，一切问题需经党派会议协商解决。但国民党现在开“国大”，已破坏了政协宪草，国大问题我们就无法妥协。如果将来再谈判，我们决

不承认他过去的“国大”，如谈改组政府，在政府的成份名额条件上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整军方案也是如此，条件是要变更的。将来的整军我们绝不能接受五比一了。所以决议是要变的，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但我们不管他将来谈得好谈不好，政协这一条路线，我们是不变的，不能放弃的。

三、整军方案。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一，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来的，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

四、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成绩，主要就是上述的四项成就，尽管蒋很快就破坏了协定，但这四项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对停战协定，

蒋从二月南京军事会议时便开始破坏它。当时在该会上有两句口号，“为领袖任劳任怨，为国家死里求生。”实质上就是：“破坏政协任劳任怨，反动集团死里求生。”此会后，在重庆为了欺骗，还命令张治中与我们签订了整军方案。三月召开二中全会，又从政治上破坏政协，大骂国民党政协代表，集中到宪草问题向我进攻，经过综合小组提出三点修改：要使国大变无形为有形；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取消省宪法，改为省自治法等。我们当时不慎重，同意作三点修改。但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把自治缩小到县，使省没有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变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国大的权力，使国会无权，其中心就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八个大字。所以从国民党的整军会议后，证明国民党是采取上面谈判下面破坏的方针。这样，五月五日国大就无法开，同时东北三四五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六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二十三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的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所以六月争论的还是根据地问题，这与第一阶段破裂的关键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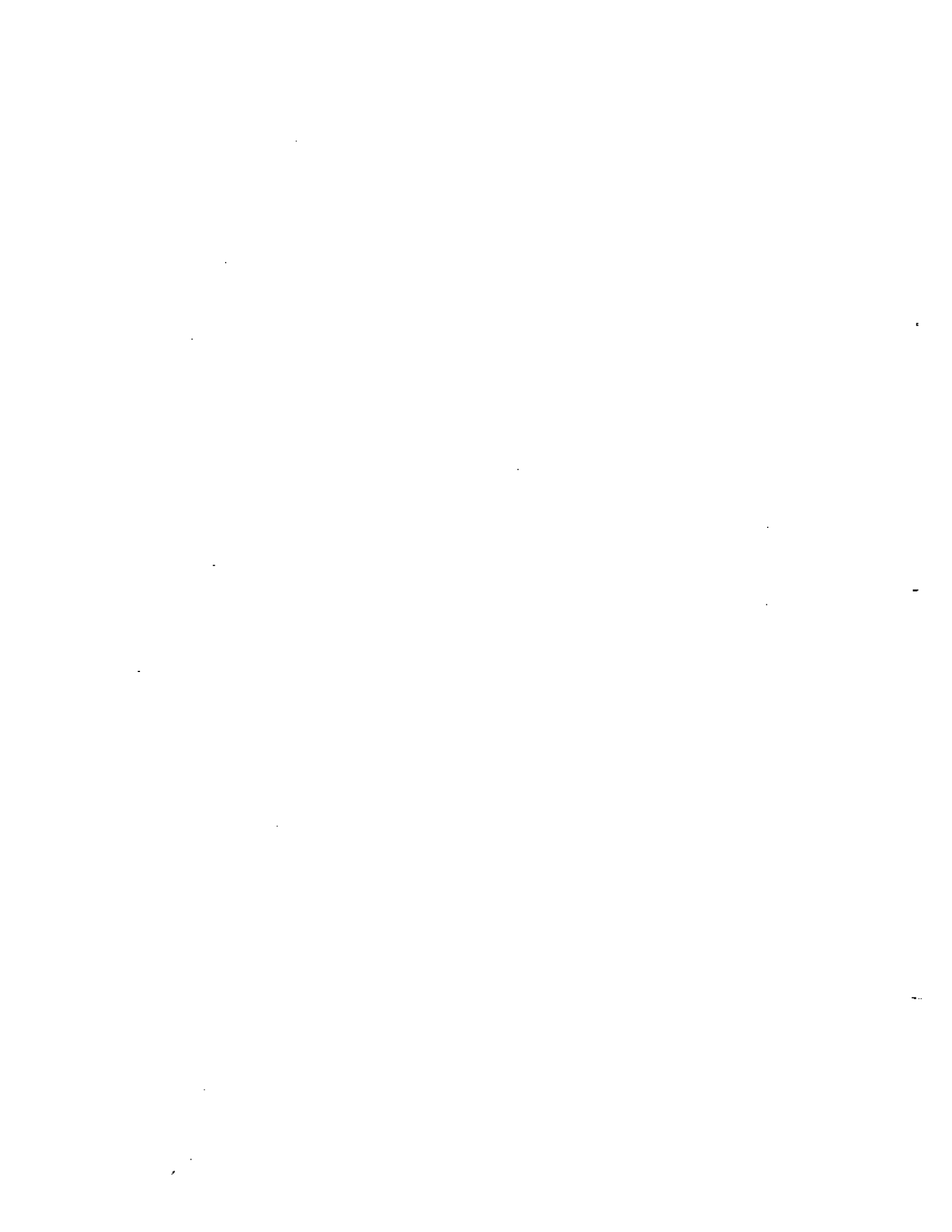
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七月时，马歇尔说各党派谈不好，国共直接谈，我们说也好，于是就开五人会议，但还是那样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又要司徒雷登参加，司徒雷登就上庐山，但蒋的条件更高了，除以前提的条件外，还要我退出山东、山西六月七日后占领的城市。司徒雷登从庐山下来问我们，我们问他看我们能否接受，他不表示意见。我们说，连你都知道困难，我们怎能接受。第三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又说先谈改组政府，我说也好，但要保证停战，但蒋介石、马歇尔、司徒雷登都不能保证停战，所以就无可谈。我们就主动提出恢复三人会议，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马歇尔不召开会议，我就到上海，马歇尔又急了，来找我。这时正打张家口，我们认为，三人会议既不开，又打张家口，这等于国民党造成全面破裂。于是他又来了停攻十天，要我们交国大代表名单，交十八个师的驻地，我们如何能接受，这样谈判又破裂了。最后一幕戏，就是第三方面出来调解，因为他们还没有单独试验过。我们为了使第三方面得到教育，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调解。蒋提八条，我们提两条。第三方面想试试，要我回南京，我们就跟着第三方面之后，一道回南京。第三方面想来个折衷方案。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

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十一月十一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由此看出，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一) 各党、各派、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统一，厉行和平建国

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元旦的广播演说

全国军民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开国纪念日，是我们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我们自从“九·一八”以后这十四年间，都是在黑暗耻辱的环境下来度此令节。“七七”抗战以后八年之间，更是在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度此令节。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日本业已投降，积年国耻已经湔雪，我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应该都可以仰首伸眉，稍纾喘息，来庆祝这一个岁首良辰。我们每一个同胞当然是格外的欢愉，格外的欣奋。但是我们国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攘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

为之降低，而革命抗战期中军民先烈的在天之灵，亦不能得到安慰。兴言及此，对于国家的现状，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国家民族在抗战胜利以后必有光明的前途，而如何开拓这一光明的前途，消除内部存在的殷忧，收获真正胜利的果实，这是政府与人民共同一致无可旁贷的责任。

现在萦回于我脑际的，就是我们国父的遗教如何完成，人民的要求如何实现。我们国父最后的遗教，就是要“和平奋斗救中国”，就是要完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至于今日人民迫切的要求，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安定，求复兴。人民的要求和国父的遗教是一致的。当此战后，满目疮痍，我各地同胞痛苦的待救济，流离的待还乡，失业的待复业，受残破的待修整，被压迫的待解放。但是简单的说，一切复员建设工作的前提，不外乎和平与安定。这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绝对需要，也是世界和平安全的最大关键。因之，我们首先急需的工作，就在于造成整个国家和平安全的环境。惟有国内不再有变乱分裂的现象，而后才有和平建设的可能。也惟有国内不再有扰攘纷争的因素，而后国家的基础才能稳固，人民乃得以安居乐业。我们今日在战胜侵略，痛定思痛之余，一切政治上的过渡期间的设施容有未周，政府无不积极改进，决不因循苟且，贻误国家复兴的时机。但是最重要的，无过于确定整个的国是，使政府与人民皆有共同的轨辙可以遵循。如果国家天天在紊乱扰攘之中，人民日日感受惶惧不安的痛苦，则战后的安宁建设就无从着手。所以我在今天要将当前重要的国是，我们政府的决策和我们人民的责任，乘此岁首更新的时候，简单扼要的提出来，以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因为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所以我要首先提出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与经过，以明示我们今后努力的途径。我们国民

革命的最大目的，在于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就其经过步骤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甲午以后从乙未以迄于辛亥，在此十八年间，其目标在于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时期是由民国二年以迄于十七年的北伐完成，在此十六年间，其目标在于扫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个时期是从民国二十年以迄于去年抗战胜利，在此十四年间，其目标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扫除建国的障碍，完成独立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这三个时期，对象各有不同，而革命建国的目的则是一贯不变的。国父在世之时，亲自领导全国同胞而奋斗。国父逝世以后，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秉承遗志而努力。其间障碍重重，内忧外患错杂相乘，无不为民革的时代伟力所摧毁。我们国父自甲午倡导革命之初，即认为非推翻满清专制，无以挽救中国危亡，实现中国的民主。国父只知有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革命一经成功，就让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二年以后的革命。迄于北伐完成，乃始获得中国的统一。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嫉忌我们国家的统一，自始就勾结军阀，制造割据，欲以分裂中国，达成灭亡中国的目的，始则有“九·一八”的侵略，制造伪满傀儡，继之以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我国民政府深知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天不驱除，则国家就一天不能统一，民主宪政就无法进行，如此不特我国家民族的生存失了保障，而世界整个和平也必受到威胁。我们“七七”抗战，就为了执行这一个神圣伟大的任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因日本侵略而发端了。由此可知，中国如果不能保持统一与独立，即威胁着世界的和平，我们若不能顺利完成建国方略与民主的建设，即不能建立强盛的中国，以

自跻于世界现代国家之林。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已被打倒了。妨碍中国统一与阻挠中国民主的外在障碍是已消除了。而我们中国以薄弱的国力抵抗强敌武力达十四年之久，所遭受的破坏与牺牲，实已无可计数。国家的元气，人民的生机，亦已不绝如缕。我们今天若再不乘此时机，积极复员，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使国家政治进入正轨，则国家就再无复兴的机会了。我们今天正需要把握时机，巩固国家的统一，实现全民的政治，以竟建国的全功。因此我在去年胜利以后，曾经为我同胞们郑重提出复员工作与进行建设的重要；我并且特别说明今后努力的重点。在于“国家统一与政治民主”。全国同胞们果能细心体察我们国家的需要，就知道今天重要的国是所在了。

全国同胞们！我们民国成立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为什么还不能完成建国方略与全民政治？惟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不统一，而推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因，实亦由于我们中国的不统一所致。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打消侵略者分裂中国以灭亡中国的企图。八年余流血牺牲，也就是为了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保障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这几年以来，屡次向国民恳切说明国家统一的必要。我曾说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害，而且必须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乃有坚实的保证。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真正收获胜利的成果。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宪政，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完成建国的大计。也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各种经济的建设，提高我们一般勤劳辛苦同胞的生活水准。更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于战后的新世界中为人类和平福祉而有所贡献。而且就当前事实来说，我们唯有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才能顺利进行我们的复员工

作；否则，如果军令政令不能统一，交通运输节节破坏，地方秩序到处骚扰，则国家的复员工作，必是处处受着阻挠，而人民最基本的安居乐业的要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国家政事，无不可以虚心忍让，无不可以推诚相与，而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凡有爱国良知的人士所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履行的。

明白了这个重要前提以后，我要为我同胞提出我们政府今年急须致力两项任务：

第一、我们要完成复员计划，解除民众痛苦，以确立建设的基础。所以一方面要首先恢复交通，使人民得以还乡，物质得以畅通，而后经济建设的工作得以开展。一方面要收束军事，普遍解除日军的武装，遣送俘虏回归日本，切实整编军队，尽速恢复地方的安宁秩序，禁止茶民恶霸的榨取压迫，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唯有如此，而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复兴建国的事业得以进行，才可以安慰抗战中受苦难流血残废的军民与牺牲殉职先烈的英灵。

第二，我们要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造成全民的政治。关于这一点，我们政府的宣示已不止一次了。我们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全民政治，而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是唯一必经的建国程序。我在去年元旦，曾经宣示国民大会可不待战事结束而提先召集。在去年三月一日，我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正式宣布，定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后来因为尊重参政会与各党派的意见，协议召开国民大会的办法，不幸又遭遇各种的阻碍，以致不得不延展会期。于是国民政府乃明令改期于本年五月五日召

集。这一件重大而且必须的步骤，实在是万万不能再缓了。政府为使抗战后的民意得以普遍表达起见，准备增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额，使社会贤达和各党派人士共同参加于国民大会。现在距离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只有五月，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为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更充实而有力的机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士来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主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如果容许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有一于此，不仅随时可促政府于分崩，更足以促国家于危亡。这是无论为国家统一计，为政治合作计，都是事实上所不容许的。我们今天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都必须披肝沥胆，同德同心，做到精诚的团结，而不是口头上的团结，应该做到彻底的合作，而不是形式的合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决不能使国家陷于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使政府成为不能负责的政府。我们中国在抗战期中，还有国军以外的自主军队，已是国家莫大的耻辱和损失。现在抗战已告胜利，亟须造成和平安定的环境，集中一切力量来开始建国的工作。所以政府对政治必尽量开放，对民主必提前实现，而全国军队必须统辖于国家，听命于政府，实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人士所应该衷心拥护而促其实行的。

上面所说的，乃是我们政府今年努力的方针。我们认为战后人民的困苦，万不可再使加深，国家的基础，万不能稍有动摇，胜

利的果实，万不能稍有破坏；复员建设的工作，万不能再有稽延。所以我们必将不辞任何容忍，以维护国内的和平；必将不惜任何努力，以恢复社会的秩序；必将不避任何障碍艰难，以促成民主宪政的如期实现；必将用一切可能的和平方法，以解决国内任何的纷争。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务望我全体同胞认清是非，明辨利害，痛念我国百年以来国势险危、民族衰弱的痛苦屈辱，省悟我民族千载一时复兴建国的良机不可再得，根据事实，洞察终始，自然不致为流言所煽惑，而动摇其对于国事前途的信心，放弃其对于国家民族的天职。我恳切盼望我全国同胞，一方面要对于复员，对于民主，对于实行三民主义的建设，务必竭尽力量，负责尽职，挺身奋起，以促其成功，同时要拥护政府实行民主统一的政策，监督政府一切军政的措施，检举贪污不法的官吏，清除积弊，涤荡旧污，使国家真正走上和平建设的轨道。中正追随国父致力革命，志在拯救国族，裁抑强权，对内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外求取世界的和平。此身贡献国家，生死成败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抗战胜利，素愿已遂，个人的得失荣辱，更是无所容心。我个人今日已别无所求，只希望全国同胞，对于国是认识前途的艰巨，觉悟责任的重大，人人皆以昨死今生昨非今是的精诚，共同一致，起而负责，使五十余年国民革命的成绩有所继承，十四年军民艰苦的奋斗牺牲不致虚掷。本年五月，即将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达成我们还政于民，实现全民政治的愿望。国民大会以后，国家休戚兴亡与世界安危祸福的重大责任，即将交付于我们全体国民。深望我亲爱的全国同胞及时奋发，积极准备，以承受这一个神圣艰巨的责任。我们今后究竟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全功，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呢？还

是使革命抗战功亏一篑呢？是否能确保国家永远的统一和平呢？还是坐视国家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自陷于分崩离析的绝境呢？是否能建设中国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三民主义的国家呢？还是愿意蒙受百年来次殖民地的耻辱呢？是否真能达成民族的解放呢？还是仍旧不免于危乱相乘、再受痛苦和压迫呢？是否要我们中国成为支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呢？还是任令中国成为国际上唾弃的落伍者呢？这副重大的担子，就要落在全国同胞的肩上。中国国运盛衰荣枯，百世子孙的安危祸福，在实施宪政以后，将不仅由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承当，而是要全国同胞作国家真正的主人翁来决定。现在距离五月，为时不久。所以中正要乘此时机，谆谆嘱咐，总要使我们政府还政于民的志愿，以及国父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全民政治的愿望，能为国家的将来造成永久的福祉。这是我们全体同胞所应该及时踴勉的。全国同胞们！我们经此抗战，国家元气已经凋丧，建国工作已经耽误。我们要环顾今日的世界是怎样突飞猛进的世界，时代是怎样飞跃进步的时代。我们更要自省我们中国百事落后，要想立足于现代世界之林，需要有怎么样迎头赶上的努力。回溯近百年的历史，国家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人民是处于奴隶牛马非人生活之中。经甲午战败之役，庚子拳匪之乱，几乎使国家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幸有我国父起而领导革命，全国同胞一致追随共同努力，到了这次抗战胜利，国家乃因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而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民族也得到了解放与自由，而我盟邦又是竭诚协助我国的复兴。这种机会，真是史无前例。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可说是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万万不可再有蹉跎以自误。我们百废待举，全赖我同胞特别刻苦节约勤劳奋勉，人人明礼义，知廉耻，事事负责任，守纪律，而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建国工作，才能够如计进行，我们收

复区的一切复兴的计划，才能够顺利实施。我们抗战以来，有多少军民先烈，为战争而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已不及亲睹胜利，而我们乃能目击五十年来国耻的滴雪的国运的昭苏，实在是人生的至幸。全体同胞们！我今天以热烈的心情，祝贺你们的幸福。我同时要以“自求多福”与“自助人助”的箴言，作为我个人赠送你们新年的礼物。我深切期望你们以兴奋积极的精神，承受这一个战后建设无比艰巨的工作。全体同胞们！我们要共同欢呼，迎接抗战胜利，完成复员建设，巩固国家统一，实行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原载1946年1月1日要庆《中央日报》）

迅开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氏，因蒋主席一再恳切电邀，于八月二十八日到渝，与政府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至十月十日共获得结果十二项，由双方代表签立会谈纪要发表后，不仅全国同胞共感庆幸，以为内乱之象可望化除，复员建设可望顺利进行，就是友邦人士，也莫不深致赞誉，认为这一商谈所获的结果，将使我们国家迅归统一。

历时四十一日的会谈，虽有若干重要问题未能圆满解决，但双方均同意成立政治协商会议及军事三人小组，以谋解决之方。其中属于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范围者有三：一为和平建国方案，一为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一为所谓解放区之地方政府问题；属于军事三人小组讨论范围者，则为共产军缩编与驻地等问题。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举行，原商定俟双方与被邀参加会议的各方洽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完毕后，应由政府迅速召开；关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之举行，共产党方面代表当时即有决定派叶剑英之说。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确定已久，各方面出席人选闻亦大致拟定，所待者惟在共产党代表之到来。周恩来自上月二十五日飞回延安，至今已半月余，外传周氏偕共产党代表来渝之期，皆未实现。数日前董必武、王若飞致函邵委员，

谓周氏电告以准备政治协商会议提案，及对国大宪法草案意见，尚有若干日的讨论耽搁，来渝日期将延到月中。全国同胞听得这个消息，必然殷望他们的行期，不再延展。因为政治协商会议迟开一日，则一切问题的可能合理解决，就会迟一日，而国家元气就被内乱多斲丧一日。

自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氏回延安后，到现在恰满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各收复区及毗连收复区的地方，受共产军的损害，可说比过去同样时日内所受敌伪的损害，还要大许多倍。两个月中铁路及桥梁的被破坏，价值之巨，现尚无法统计。这些奉朱德命令施行破坏工作的铁路两侧共产军，过去在敌人源源载运军队及供应品，大举进攻湘桂的时候，未见一显身手，今则如是不遗余力，就拿好听些的话来说，也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可鄙行为。太康决堤之水，奔流未息，矿场炸毁之数，有增无已，村镇邱墟之处，随时加多，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之声，共产军闻之当以为乐，不知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闻之作何感想，难道以为这正是“人民的军队”解放人民的德政么？就把共产军破路、决堤、毁矿及烧杀掳掠攻城夺池的种种暴行撇开不说，单说共产军号称拥有“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所谓民兵数在八九百万，兵员从那里来，供应从那里来，只此已足把社会元气斲丧无余了。以今日共产军造成内乱的区域之广泛，国家民族受的损失该是如何严重。

如果要问“打内战”的责任？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心中当已有数了。时间打得最长最激烈的是归绥、包头，绥包的被围攻，是不是应该共产党军负责？自从第十二战区指出共产军在绥境放第一枪的铁证后，造谣大本营的新华社，也只好支吾其词了。襄樊自抗战以来，皆在国军手中，仅今年一度曾被敌人窜进，旋即克复，而共产军进攻失败后，还不甘心，现在又想作第二次的进攻。

这是共产军“打内战”最显明的一大例证，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当亦无词为之辩。还有更显明不过的例证，陕北的三边地处后方，共产军也要去攻占，以新华社之会说谎，也苦于技穷而无法捏造理由替他们脱卸“打内战”的责任。

国家经过八年的战争，元气大伤，给人民一个休养机会，犹恐社会苏生不易，今竟于大劫之后，复临之以新的劫难，只要不是惟恐天下不乱希望在混水里摸鱼的人，没有不痛心的。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解决，蒋主席是具有最大诚意的。这诚意的表现，早见于他在日本投降后邀请毛泽东氏来渝的两次电文中，更见于会谈期间的政府让步中。

（原载1945年12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

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被国民党方面再三延宕的政治协商会议，据说要在本月十日开会了。虽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去年十月就已由国民党政府同意召集，但是直至三个月以后的今天，据说国民党方面对它还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作过什么带建设性的表示。重庆社会早已传出：国民党对于这个为中外各方一致重视的会议，完全抱一种敷衍的态度，简直不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态度，在今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氏的广播演说中，已被完全证实了。

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什么重视政治协商会议呢？一言以蔽之，希望这个会议能为中国今天险恶的政治形势求得一种解决，即能够停止内战，并对造成内战根源的独裁制度加以决定的改革。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早已应该废止了。还在前年秋季，中国和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舆论界就已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主张，接着，中国共产党就根据这个主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正式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并曾获得罗斯福总统的赞助。在这以后，虽然如同罗斯福总统所说，“现在一切似乎已经无望了，因为国民党对延安的修正案提出了一些全然荒谬的反对”（见斯诺：《苏维埃政权的模型》第八章），但是中国一切

民主党派不但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并且进一步要求首先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民主分子的代表会议，以求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得以经过这一会议而具体实现。去年八月底，毛泽东同志应蒋介石氏的邀请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时，又一次提出召集这一会议的问题，虽因自高自大的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愿接受党派会议或政治会议的名称，而力求团结的共产党代表也不愿与国民党在名称上争执不休，所以会议纪要便写做政治协商会议，但它的任务还是规定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里所谓协商国是与讨论国民大会，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而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国民大会”，却是国民党“训政”当局一手伪造的一个反对民主的加强独裁的破坏团结的扩大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所以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中国国是中的这个根本关键，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是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杜鲁门总统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召开全国主要政治分子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而为了解决内争，促成统一，这个代表会议就必须有权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杜鲁门总统说：“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举行全

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杜鲁门总统肯定政治民主化应该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他说：“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自治性军队及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合成一中国的国军。”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重申改组国民政府使之民主化的必要，并用了更明确的词句：“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或译各级）机构中。”十二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贝纳斯的广播也复述同一论点，并明白指出只有和平民主才能达到统一：“要保证在国民政府下的一个统一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并让民主分子广泛地参加整个国民政府”。现在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一切民主分子在整个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之一切机构中都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既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政制度，当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政制度的私生子——一党国民大会，当然不能允许在这个“有效的”民主联合政府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成立的时候（这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国民党当局所布置的在五月五日“移交权力”给那个莫名其妙的没有一个民主分子承认的私生子，使中国更加走上独裁与分裂，而又把这种“移交”美其名曰“宪政”以欺骗国人。全中国与全世界所希望与重视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样一种全权的无条件停止内战与无条件结束一党专政的会议，在这一点上，什么歪曲躲避的余地也不能有。

对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与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国民党当局都宣称完全同意，蒋介石氏更说是“杜鲁门总统之声明与我之声

明完全一样，杜之意见亦即我之意见”。因此，人们对于蒋氏在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日期同时所发表的广播，不能不抱有很高的希望。人们都希望从他的演说中，听到他对于将在十天以后开幕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历史方向的这个会议的意见。非常可惜，蒋氏的长达五千字的演说，虽然涂着很厚的和平民主词令的脂粉，却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不提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的声明。而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实际上是严厉地拒绝了他们关于中国的建议，严厉地拒绝了赋予政治协商会议以任何权力——甚至讨论召开国民大会这样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国民党当局未经任何协商即于去年十一月宣布今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而蒋氏的演说竟也再三地肯定了这一点，虽然他还说这是尊重各党派的意见。蒋氏在他的演说中强烈地但是不指名地责难并污蔑共产党，企图把内战与内战所造成的各种破坏都归罪于共产党，但是这些我们却不愿意多加辩解，因为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和平日报》）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宣传“反内战者即是共产党”，而国民党是“反反内战”的，即此一端，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蒋氏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见解，这是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蒋氏坚称：“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不是和平民主，而是他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不管这些军令政令是否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民的基本权利与普遍意志。他也说内战是可以停止的（他文雅地称之为“收束军事”，因为虽然全世界都已在谈论中国的内战，中国的军事委员长却是至今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内战的），但不是无条件停战，而是“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就是说必须首先恢复他扩大内战的便利条件；国民政府是可以扩大的，但不是先扩大政府后统一军队，而是相反，在政府民主化以前，必须首先把八路军新

四军交给国民党亦即交给他个人，就是说必须首先保证他扩大独裁的便利条件；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由联合政府来实现，而是必须首先在四个月以后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或独裁大会，这是“根本大法不容变更”，也就是独裁大法不容变更。蒋氏的这些见解，显然是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以及杜鲁门总统和三强外长的观点不相容的。如果依照蒋氏的见解，那么政治协商会议就没有召开的任何必要。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人们就不得不首先正视、审查与解决这个根本的分歧：在一方面，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全体人民的要求，是美国、苏联、英国三国人民与政府经过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所声明的愿望，这就是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来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结束独裁，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此而实现中国的统一；在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氏与国民党内的少数军阀党阀财阀的企图，这就是不让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任何问题，继续保持独裁，并以继续内战为继续独裁的后盾。前一种意见是得到全中国与全世界的支持的，直至蒋氏的演说发表以前，也是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口头支持的，但是现在蒋氏已经起而攻击这种见解了，分歧是已经表面化了。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解决这个分歧将是一个严重复杂的斗争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将大大地教育中国人民，使人民有充分的机会来识别究竟谁是谁非，识别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报纸、每一个人物的政治面貌，看他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究竟是拥护人民的，或是反对人民的。

《纽约前锋论坛报》在批评蒋氏的演说时问道：“中国之和平岂

仅赖重弹老调所能获得者乎？”蒋氏演说中的论点虽然确是一些久遭全国人民拒绝的老调之无味的重复，并显然与全中国民主分子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见解相对立，我们现在为了审慎起见，仍然不妨作一番耐心的客观的考察，看看他的论点中是否也包含若干片面的真理？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以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计划，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在外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都实行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但是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并没有达到过什么和平、民主、繁荣等等，他们说是巩固了国防，但结果却是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至于在中国，中国人民对于这种统一的经验尤其丰富。中国有几千年统一的历史，这些统一都经过了专制的方法或“训政”的方法（蒋氏曾经无数次赞美中国专制时代的“民主”，并责备当时人民的“自由太多”），但是“训”了几千年究竟还是不曾“训”出过一个民主来。民国以来，每一个实行军事专政、个人专政的军阀都宣称：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将有和平民主等等，但是三十五年中也没有一个人兑现过。蒋介石氏与他的前辈军阀们有什么不同吗？有的。首先，他比他们多一个全国范围的盖斯塔波式的一党专政，过去的军阀从来没有梦见过这种恐

怖的工具。其次，他的军事专政比他们强得多，因为他有空前庞大的私人化和特务化的军队，其规模也是过去的军阀所没有梦见过的。最后，他的个人集权的程度也远超过过去的任何军阀，他无论在他的党中、军队中或政府中，都是绝对地独断专行，他个人的“手令”可以改变任何政府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决定，因此除了人民的反抗就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约束他的任何活动。蒋氏比这些军阀更多一些“民主”的“理想”吗？决不。蒋氏说他现在不能实行民主，是因为没有统一，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他至少已经“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其时间已经有十八年之久，但是他曾经在那一天那一处小地方实行过那一点民主，改善过那一点民生吗？十八年来在蒋氏的统治区“统一”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民主是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他的特务机关与特务化的军队，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人民的穷困与国家经济的危机是一年比一年加深，因为他的官僚资本集团与贪污恶霸集团的统治，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他的军队与政府的军事预算虽然一年比一年膨胀，但是“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七七”以来的事实证明，蒋氏军队的国防力量却是惊人地下降，因为他的军队是只为打内战，也只会打内战，这种从精神上物质上破坏国防力量的内战是他十八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的。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确是人民赠给他的军事领导的确当的评语。凡是这一切他都想用不统一来辩护，但是事实岂不恰恰相反，这一切岂不都正是他实行独裁“统一”的结果吗？退一步说，他诚然没有“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与他比较起来，格外是没有“统一”全国，蒋氏有中央政权和大部分中国，而共产党只对于小部分中国的地方政权能够发生领导的影响。可是看吧：为什么共产党在它发生领导影响的地区，不论省、县、区、乡都能实行人民的选举，都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呢？共产

党所领导的军队装备和给养都不好，但是却能够八年坚持在最前线抗击大部分敌军与几乎全部伪军，这个事实难道也是由于共产党“统一”了全国，而蒋氏没有“统一”之故吗？蒋氏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国家莫大的耻辱和损失”，但是难道抗击敌伪就叫做莫大的耻辱和损失，而一触即溃，一退千里，观战避战，曲线救国，制造了一百万伪军，而且至今仍与敌伪和平共居，共同反共，反而叫做莫大的光荣和收获吗？蒋氏的演说责备共产党妨碍建设，妨碍人民的安居乐业等等，但是蒋氏何不让人民自由地往来比较，看看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与从事建设的地方，究竟是延安还是重庆，究竟是北平还是张家口呢？共产党在和平的区域努力恢复交通，而蒋氏则不但用内战来逼迫共产党破坏交战区域的军事交通，而且用封锁解放区来破坏非交战区域的和平交通，用运兵来破坏蒋氏统治区的和平交通，用轰炸来破坏解放区的和平交通。那么破坏交通者究竟是谁呢？这一切岂不说明，蒋氏以不“统一”来辩护自己的罪恶，是完全不足置信吗？不但如此，凡是共产党所曾解放而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所侵占的地区，对于蒋氏来说也就是由不“统一”而“统一”的地区，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亦莫不立即在蒋氏的军令政令与其执行者贪官污吏特务恶霸的“统一”之下，归于残酷的毁灭，这个情形也是举世所共知的。这岂不说明凡蒋氏“统一”所及之处，凡奉行蒋氏军令政令的忠实同志足迹所到之处，恰恰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不能存在之处吗？平心而论，蒋氏所“统一”的地区，不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所领导建立的民主自治地区相比较，就是比之他所指的军阀也有逊色。蒋氏说龙云是军阀，用武力把他逐出云南，以实现蒋氏军令政令在云南的“统一”。但是看吧，龙云之在云南，与杜聿明之在云南如何？不是蒋氏也不得不明令撤杜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杜去

而关麟征来，关之在云南又如何？不是蒋氏又不得不明令撤关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但是虽然如此，龙云依然不能复职，而杜聿明离开云南，马上就又向辽宁热河“统一”军令政令去了，关麟征因为闹出了民国以来未有过的军警开入学校杀人的大血案，暂时不免要避一避风头，但是不但没有依法惩治，而且赏了“忠勤勋章”。蒋氏军令政令在所谓收复区“统一”的结果，龙其使得中国人民得了个寒心的教训，就是蒋氏的“统一”在若干方面竟与敌伪的“统一”不相上下，人民的生活比以前甚至还更痛苦，急得以拥护蒋氏“统一”著名的《大公报》也不能不大声疾呼“莫失尽人心”。这岂不说明，依蒋氏现在的作法，则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吗？这是蒋氏“统一”过去与现在的情形。将来又如何呢，就依蒋氏自己在这次演说中所宣布的，将来的结局，也不过是召开一个一党国民大会即独裁大会而已。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无一不出于逼选贿选代选与指定，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国会。这个国民大会所准备通过的《五五宪草》，规定总统有一切权力，而人民权力可以被无限制的剥夺，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独裁的宪法。经过这个独裁大会，通过这个独裁宪法，蒋氏允许我们一个为世界法西斯主义者所标榜，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经典《中国之命运》所抄袭，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全民政治”。这就是蒋氏“统一”完成后的蒋氏“民主”。请问：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这种“统一”，能够接受这种“民主”吗？中国人民与一切外国人民一样，当然是要国家统一的，但是中国人民所要的统一，是一个足以保护国家与人民的统一，是一个民主的统一，这个统一与蒋氏口中的“统一”，能够同日而语吗？

第二个问题，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能否统一中国的问题，其答案也是否定的。无论在国外，在中国，的确都有过一个历史

时期，曾经能够实现这种“统一”，但是这个历史时期是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在中国，如果不说一百年，至少也已有五十年是不能实现这种“统一”了。五十年来，中国的人民为了求自由独立，安定繁荣，始终希望中国的统一——在民主基础上的巩固的统一。但是中国的独裁者们世袭地拒绝这种统一，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独裁始终与人民相分裂，虽然他们反而责备人民破坏“统一”。自从清朝末年的皇帝责备孙中山先生组织“自主的军队”破坏了他们的“军令政令统一”，企图以武力维持自己的“统一”以来，这种分裂的局面就不曾有过根本的改变。蒋介石氏演说中要求人民不要“坐视国家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陷于分崩离析的绝境”。但是民国初年，应负国家分崩离析之责者究竟是谁呢？蒋氏自己也说，这是因为“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国家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二年以来的革命”。换句话说，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得到世界各国承认，坐在中央天天高唱“军令政令统一”的窃国军阀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不说自己是军阀割据，而说当时的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各都督是军阀割据，对付所谓民国二年的革命，袁世凯的唯一法宝就是“统一”。他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之问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但是，今天盖棺论定，孙先生（以及孙先生部下一分子的蒋氏自己）虽然组织“自主的军队”，虽然被责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以至破坏交通等等，还是叫做反军阀，叫做革命，叫做民主，叫做求统一。孙先生晚年北上与另一窃国军阀段祺瑞谈判和平统一，希望段氏实行民主，这就是蒋氏演说中所引用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口号的由来。醉心独裁的段祺瑞拒绝了孙先生的谈判，迫使中国爆发了大革命。中国本来有希望在这个大革命中达到统一，

不意又发生蒋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十六年以来共产党与全国革命人民对于蒋氏极端白色恐怖的武装自卫与民主运动。在蒋氏独裁与内战政策之下，“九·一八”事变起，共产党不念旧恶，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呼吁，直到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才得以开始实现。但是有功于这个和平解决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却至今还没有得到自由，而蒋氏对于共产党从民国二十八年以来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武装攻击。抗战结束以后，共产党仍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建国，但自去年十月，《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蒋氏反而变本加厉，密令全国“剿匪”，在“复员”声中把抗战时期被调到老远后方的二百万大兵统统动员出来，开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去打空前大规模的內战，把全中国投入纷争不安之中。五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地充满这种独裁者所制造的內战的。可是看吧：中国究竟是在这些独裁者的手下“统一”了呢？还是分裂了呢？一切这些分裂，难道不都是独裁者们所谓“统一”政策的结果吗？独裁的“统一”就只能产生分裂，唯有与民主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够真正达到统一。如果段祺瑞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如果蒋介石氏接受了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那么中国的统一早就实现了。蒋氏及其一派说解放区的地方自治妨碍统一，但是人民自己选举政府，这不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的根本规律吗？蒋氏自己也说要还政于民，为什么对于已经还政于民的地方又要实行夺政于民呢？在地方范围内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政令，这有什么政令不统一之可言呢？难道四万万五千万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不能自由活动，才叫做政令统一吗？由于不承认人民有选举地方政府与决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权利，蒋氏及其一派

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分裂。他们幻想用武力统一来解决这个政治分裂，结果不但没有找到什么武力统一，而且找到了一个武力分裂。为什么是一个武力分裂呢？因为五十年来，政治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常常引导到军事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政治上的独裁者总是依靠私人化独裁化的军队去消灭民主分子，迫使政治上的民主派不得不创造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这个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因为合于历史与人民的需要，不但不能被独裁者所消灭，而且愈来愈强大了，其主体在今天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并不利用这个军队来寻求分裂，相反地是利用它来寻求民主的统一。所以抗战爆发，这个军队就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可是坚持军队私人化独裁化的蒋介石氏，不愿意利用这个军队的榜样来使自己的军队国家化人民化，反而在事实上与法律上拒绝承认八路军新四军，诬之为“奸军”“匪军”，用一切力量来加以“围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武力分裂。既然蒋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抱着这种分裂的方针，证明自己的军队是完全党派化私人化独裁化，而不让任何国家化人民化的军队存在，那么，为了保证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人民化，作为中国军事改革核心的八路军新四军，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当然决不应该送给独裁者去消灭；如果那样做了，就不但是冒险，而且是犯罪——对于中国军事改革的犯罪，因而也就是对于中国民主统一的犯罪。中国的人民既然为民主统一坚决奋斗了五十年，既然不曾接受满清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十八年来蒋介石氏的独裁统一，那么，如果蒋氏今天不抛弃他的独裁方针，纵然他用继续内战来威胁，也必然吓不出什么“统一”来。因此，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五十年来的历史都证明了中国的统一只能走民主团结的道

路，而绝对不能走独裁的道路。

如上所述，蒋氏的论点是不能经受任何事实的考验的，是并不包含任何真理的。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相反地，只有按照中国民主党派与世界民主强国的要求，经过全权的政治协商会议，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蒋氏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就既能得到民主，也能得到统一。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对于这一切简单的因果关系，蒋氏难道是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他之所以故意倒果为因，只是为了寻找借口来保存他的独裁罢了。其实中国人民和世界民主强国一样，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就承认国民政府是实现民主统一的便当的机构，就从未打算推翻这个政府而另起炉灶，因此蒋氏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仍然将保持他的一定的地位，虽然决不能再是独裁的地位。蒋氏说他对于“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我们认为，蒋氏如果牺牲个人而服从人民，牺牲独裁而服从民主，将是他对于革命所尽的最伟大的责任。蒋氏在抗战结束以后，仍然坚持独裁与内战政策的结果，如他自己所说，确已“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并遭遇“任令中国成为国际上唾弃的落伍者”的危险。所以贝纳斯十二月三十日的广播，就已经公开声明：“为内战分裂之中国，将不能在盟国中占有其应有之地位，及确当地履行其国际义务”。不幸蒋氏的元旦演说，依然重复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不过历史的趋势是已经确定了，无论蒋氏及其一派如何抵抗，中国的和平民主，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奋斗与民主友邦的同情声援之下，

终将获得决定的胜利。我们是希望团结统一的，因此我们仍然希望蒋氏及其一派能够善审时机，放弃成见，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通力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圆满的收获，从而使中国迅速走上和平建设的光明大道，并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

（原载1946年1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在全国人民一致敦促，由国共两党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协议之下，政治协商会议将于最近召开。这是目前举国骚扰，群情焦灼的状况之下，所出现的一线和平曙光，其成败利钝，直接影响中国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真诚表示欢迎，并真诚希望它能够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推进。

政治协商会议，原是今年九、十月间国共会谈后双方同意召开的。在十月十二日所公布的《国共会谈纪要》中曾经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后因国民党当局蓄意进行与扩大内战，并破坏自己曾签过字的《会谈纪要》，在没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就先自发布了召集国民大会的命令，把政治协商会议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制造舆论，说政治协商会议因中共不愿参加而推迟。事实刚刚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为这是目前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协商国是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且十分重视这个政治协商会议，认为要使这个会议真能有益于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推进，那就必须给予参加会议的各党派与各界人士以必要的准

备时期及条件，诸如内战的停止，政治犯的释放，人民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保障，与提案的研讨等等。最近两月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呼吁和平，要求人民自由权利的实施，以及提案的准备和研讨。我们努力这些事情，主要目的是在使会议能够开得好，开得成功，不要使全国人民失望。

我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是很重大的，这首先是因为目前中国正处在严重的情况中。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八年以上的坚决英勇、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与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即企图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在中美苏英协同抗战的威力之前，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样，就使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崇高志愿，得到实现。但是，由于中国仍然不团结，仍然不民主，仍然存在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抗战中流血流汗与出钱出力最多的人民，仍然被压迫着不能自由表示自己的意志，而独裁者仍然不愿与人民结合，反欲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仍然企图把广大人民踩在脚下，把人民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及他们已经争得的民主权利，加以摧毁，甚至不惜采取内战的方法来摧毁，这就使全国人民所企求的和平民主，不能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立刻实现。正因国民党统治者违反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利用美国某些反动派的支持援助，大规模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及其军队，甚至对反内战争民主的徒手人民，也采取武力屠杀政策，以致演成像昆明血案这样的惨剧，结果就造成了国内局势的严重状态。人民所受痛苦，达于极点。这种现象应该加以变革，而且现在也到了非变不可的时机了。

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召开，其任务之艰巨是很明显的。既然“国是”有待各党派与社会贤达来“协商”，那么现在政

府所执行的政策，必然有“不是”之处，也是无庸置辩的。其中最大的“不是”，就是进行内战与固执独裁。因此，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大使命，也就是要找出一条把“不是”变为“是”，即把内战与独裁变为和平与民主的可行道路。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与失败，就要看到会代表，能否和衷共济与实事求是地找出途径以实现上述要求。我们深知到会代表包括各党各派与社会贤达，各人立场与看问题的方法，都有差别，所以在会议进行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困难，也会发生许多波折。但我们相信，假使到会代表，都能公忠体国，以民族前途与人民利益为重，并能够随时向人民大众请教，则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

孙中山先生临终时曾指示国人要“和平奋斗救中国”，现在把这七个字送给政治协商会议的到会代表，乃是最恰切的祝辞。希望到会代表都能深切领会这七个字的丰富含义，并真正能够达到救中国的目的。

（原载1945年12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人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人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国事应由人民决定，中国的国事应由中国人民决定。长期以来，中国国事并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使中国得救，人民就必须不放弃主人的权利。人民的力量不能轻视，八年前中国之所以能发动抗战，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抗战之所以能长期坚持，得到最后胜利，主要也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现在要走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也必须由全国人民的力量而实现。

和平是目前中国人民的第一个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主张马上全面停止内战，而且要无条件、无保留的停止内战。提出任何借口来作为停止内战的条件，就不是真心求和平。中共愿意实践这个主张。但因为中共是处于被攻击的方面，单方面不能使内战停下来。要使内战马上停止，和平立即实现，就不能不靠全国人民继续呼吁，贯彻主张，用人民的力量来促成发动内战者的觉悟，使他们不得不罢手。

即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是党派会议性质，但人民是寄与很大希望的。对于这个会议，人民并不是抱着旁观的态度，而要自居于主人的地位。固然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会议的性质，其中的代表并不是由于普选而产生，但是这些代表中一部分是由

中国各政党所自行推选出来的，而另一部分无党无派人士也是经过事前协商而后产生的，大体都具有代表社会某一方面的资格。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由十年前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代表”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大会”，决不能冒充代表全国人民的会议。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因此中国人民就要用最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协商会议，要把这一群代表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要使他们根据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来计划和执行当前的国家大事。当前的国家大事是些什么？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就是要制定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办理复员善后问题，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筹备民主的国民大会，和准备实施民主宪法等等。中国人民之所以寄希望于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为了希望这会议能够解决这一切问题，或至少能够找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途径。因此中国人民就要把对于这一切问题的意见反映到政治协商会议中去，使得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而实现。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虽然还没有开幕，但是全国人民却不能不立刻开始考虑这一连串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内战停止？怎样才能使团结实现？不孚众望的一党政府应当如何改组？中国需要怎样的宪法？将来的新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全国人民，无论是男的或女的，穷的或富的，识字的或不识字的，工人农人或专家学者谁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或主张，经过任何方式提供给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区的人民应该提出自己的民主建设的经验，国民党收复区的人民也应该把旧的和新的一切苦痛经验提出来。全国四万万人民，人人都在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份。做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人应该诚意接受各界人民的意见，全国一

切报纸杂志都应该辟出篇幅，尽量刊载人民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政治犯应该立刻释放出来，让他们也能自由表示意见。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人。中国人民一定要使内战停止下来，一定要使政治协商会议好好的开起来，并且开得有成绩，这就要靠中国人民不放弃主人的地位，而且坚持争取主人的权利。

(原载1945年12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迎政治协商会议

《群众》周刊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开幕了。我们欢迎这个会议。

中国需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在日本投降前，为了要争取抗战胜利，需要这些，在日本投降后，为了完成建国任务，也需要这些。而作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前提条件，召开一个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实在是最需要的。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前，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日本投降后，仍坚持着这样的主张。日本一投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于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摆在“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为了完成这任务，主张“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的，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假使国民党当局迅速地接受这主张，则中国早已迈进于和平建设之途了。不幸，国民党当局虽然表面上揭橥着“政治解决”的旗帜，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企图。他们没有诚意，也没有勇气，迅速地接受这个主张。经过四十余天的

国共会谈，好不容易才在双十节所签字的《国共会谈纪要》中，规定着：“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同时，记载着：“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由于国共双方意见没有能够获得一致，“中共方面认为可将该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然而尽管有了这样的规定，有了这样的记载，国民党当局依然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企图，依然对解放区人民进行着军事的进攻。这就使所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变成白纸黑字的文字游戏，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由于全国人民的斗争，由于国际舆论的催促，特别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由支持内战开始转向到促进和平，使得国民党当局不管主观上愿意不愿意，而终于不得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在我们，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的本身，是高举双手，表示欢迎的。

依据《国共会谈纪要》所规定，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前者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像制定共同纲领，改组国民政府，拟定复员，善后办法等都是；后者也包括着国民大会代表改选问题，国民大会会期问题，宪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此外，在今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立刻停止内战？烽火遍地，杀气腾天，全国人民受着死亡的威胁，尝着饥饿的痛苦，过着流亡的生活，真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人，谁忍安坐会议席上，抛开这个迫切问题，而去谈论些别的事情？所谓“和平建国方案”，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固然都是关系整个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但是如果内战不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有什么用处呢？因

此，最好，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前，就立刻无条件无保留地停止内战。如果做不到，那末，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后，列入议程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商讨如何立刻停止内战。有人说，依据《国共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无权讨论停止内战问题，内战停止不停止，和政治协商会议毫不相干，政治协商会议不必去过问，这见解是不对的。像前面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内战不停止，则讨论别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用什么用处的。试拿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为例罢，如果不停止内战，怎样能够召集一个由普选产生的真能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民大会呢？不仅这，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停止内战问题也并不违反《国共会谈纪要》的规定。所谓“和平建国方案”，在内战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便应该包括“停止内战的方案”在内。否则既有内战存在着，进行着，甚至扩大着，怎能叫做“和平”？怎能去“和平建国”？和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讨论停止内战问题同样，在《国共会谈纪要》中，明白规定着，国共双方已经获得协议并应付诸实施的许多项目，像保障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化，废除特务机关，实行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究竟已否实施？实施的状况怎样？政府也应该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报告，由政治协商会议加以讨论。如果还没有实施或实施的程度还不够彻底，政治协商会议并应加以严厉的督促。这些项目本来是应该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前就已彻底实施，不必等待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来督促的。但事实上，既然还没有彻底实施，就不能说《国共会谈纪要》没有把它们明白列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范围之内，便不必提到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综括上面所述，我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除却讨论《国共会谈纪要》所规定的“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外，还应该讨论如何立刻停止内战和如何彻底实施《国共会谈纪要》中所规定的保

障人民自由权利等许多项目这两件事。至于在《国共会谈纪要》中没有获得协议的“受降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当然也可以提到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受降问题”可在讨论停止内战的具体问题中去解决；“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可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可在和政治民主化的关联中去解决。

政治协商会议所应讨论的这一切问题，是不是可能获得一致协议，而得到合理的解决呢？就问题的本身而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的因素。试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原则不是大家所一致拥护的吗？试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这三件事不是大家所一致主张的吗？试问停止内战不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吗？只要大家特别是在朝的国民党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拥护人民的利益，尊重人民的意志，去忠实地、诚恳地考虑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为自己的个别利害打算，把自己的个别利害看得高于一切，则一切纠缠不清的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例如立刻停止内战，看来好像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其实简单得很，只要发动和继续进行内战的国民党当局放弃他们的“武力统一”的企图，下一纸全国停战的命令，不就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吗？办到办不到的关键，不在客观上能不能，而在主观上做不做。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勇气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具体意见而来的；相信如果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代表也抱着同样的诚意、勇气和具体意见，只要在朝的国民党不把政治协商会议当做一个装饰品和御用工具，则政治协商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可能得到解决的。

不过，一直到今天为止，国民党当局在事实上的表现，还不

能使我们相信他们已经放弃“武力统一”的企图，而下“政治解决”的决心。特别是那些反对民主，反对人民，反对共产党及各民主政党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还在为了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活跃，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他们曾竭力阻挠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们必竭力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第一步是阻止政治协商会议获得任何决议；第二步是造成政治协商会议的中途破裂或停顿；第三步是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的效力，具体地说，就是不使国民政府去执行这些决议。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还可能在会议内，会议外，在政治上，在军实上，遇到很多的波折，很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波折和困难，还需要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这些代表所代表的各党派、各阶层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政治协商会议内一切拥护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代表们，应该站在一道，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寻求解决。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个政府咨询机关，它是站在政府之旁，透过政府党去支配政府的机关。它的一切决议，虽然不能在法律上拘束政府，但在实质上是拘束政府的。如果在会议中，由于斗争的结果而获得一些合理的决议，则国民政府没有拒绝或延缓执行的理由。另一方面，在政治协商会议外，一切维护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力量也应该站在一道，和会议内的斗争相呼应，向那些法西斯残余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揭破他们的阴谋，打击他们的活动，使他们不能发生任何破坏作用。这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途，是可以乐观的。

（原载1945年12月25日《群众》周刊第10卷第24期）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和答记者问

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这许多问题是各方所关心的，也是诸位所要知道的，因此我们很愿意把与此有关的情形适时的报告诸位，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这次来渝，抱着很大愿望，要和政府和各方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诸多重要问题。

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目前中国内战之严重，这是大家所深知的，不管用任何方法解释，武装冲突是事实，因之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用全力向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赞成，才能有效。更重要的是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一切问题。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等。我们对于这些都有具体的意见，但仍愿征求各方意见后，再作为正式方案提出。这里所说各方也包括新闻界在内，希望诸位提出对中国以后施政纲领的意见。

其次，我们将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的改选问题，会期问题，宪法和国民

大会的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

最后,我们将提出关于今年《国共会谈纪要》中双方获得协议,并应付诸实施的许多项目,如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废除特务机关,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政府应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对于这个协议的实施,也能加以督促。

实现上述要求,这就是我们来渝代表的共同责任,这样才能达到停止内战,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我们相信我们这种希望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我们也相信在协商会议中参加的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只要能诚心诚意于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富强的中国,都会赞成我们这种意见的。

周恩来在会上答记者问

问:是否要在解决了停止内战问题之后,再开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谈停止内战的问题?

答:停止内战问题,在会前由国共会谈,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否则,在开会时首先要谈。国共会谈与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平行进行。

问:停止内战问题,是否将在三人军事小组会议中解决?

答:不是。停止内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须先要由国共会谈和与其他各方商谈出解决方案后,再由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去讨论实现这个方案的具体问题,因为三人军事小组会只是一个讨论技术性的组织。比如由政治商谈决定了停止内战的具体方案后,三人军事小组会再根据这个方案去讨论实施的详细办法。

问:假使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仍不能停止内战,那么,这是否将造成会议的决裂呢?

答：我们不愿作此预测，我们希望在会议中能解决，而且更希望能到会前解决，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人民与同盟国政府的希望，尤其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的要求停止内战。

问：贵方的建议是硬性还是有收缩性的？政治协商会议中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是否有约束性？

答：凡是建议总要经过各方协商的，因为既是协商，总要经过双方同意，才能得出决议。一切决议对各方面都有约束性的，包括对政府党在内。

问：（一）关于受降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中共是否仍要在会议中提出？（二）是否将改变以前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要求？

答：（一）关于受降问题，是要在停止内战的具体问题中去解决，关于解放区问题，是要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二）在原则上不打算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关于解放区问题，也和受降权问题一样，政府在原则上都曾答应过的，现在是如何讨论实施具体步骤问题。

问：会议中若果仍不能解决，那是否将有责任问题？

答：我们总希望能够解决，万一不能解决，我们主张再谈而求解决，无论如何要用政治解决，而不能用军事解决。至于责任问题，这抽象的说，就要诉之于舆论了，尤其是公正的舆论。这里我们要插一句，就是言论要自由，此刻重庆还没有言论自由。现在政治协商会议要开会了，重庆应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个要求，诸位也定会赞成的。这里我想《新华日报》有权向诸位控诉，它没有得到像别的报纸一样的自由，目前它的发行遭受极大的阻碍，报童被捕被打，读者没有看报的自由，寄往外埠的成万份报被扣，整批报纸被撕毁焚毁。

问：中共对于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程序如何？

答：这个问题有过两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也提有一个方案，共计三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第二个方案是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这是美满的和彻底的办法。我们坚持这主张一年多，政府未赞成，现在我们仍不放弃这个主张。第三个方案是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平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法的政府。这个办法，从毛泽东同志来渝谈判到我上次返延时，仍未得到结果。虽然这个办法在原则上政府已经同意，但在作法上是要求单方面对政府有利，而在另一方面是把解放区军民权利剥夺与消灭。当然我们这次来，在谈和平建国方案问题中，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求得解决。

问：中共对政府接收东北的问题的看法如何？

答：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收东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是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原载1945年12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叶剑英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这次来重庆，主要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进行国共谈判，待国共谈判与协商会议中若干重要问题有了具体决定后，再将参加政府组织的三人军事小组会议，根据决定去讨论实现决定的细则问题。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或和的问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主张和平的，主张商谈解决问题，而不主张用打仗来解决问题。我自己到重庆来商谈，就表示了我们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事实上内战在扩大着，仍不断的在进兵、进攻、进占。目前内战的最主要方向是在华北，从张家口、承德到朝阳，东至于海，这个内战的最主要方向，若不首先停止下来，势必扩大到不可收拾。内战不仅影响及国内生活，而且已经影响到远东与世界和平。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声明，首先希望中国内战的停止。因之目前是决定中国内战与和平的“转舵”时机，但这项“转舵”工作却十分沉重，这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努力，才有实现的希望。

（原载1945年12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邓颖超在中国妇女 联谊会晚会上的讲话

中国妇女联谊会1945年12月28日晚举行新年同乐会，并欢迎政治协商会议女代表邓颖超，到会员一百余人。主席李德全女士致词，对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唯一的女代表邓颖超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和她多交换一些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在热烈鼓掌中，邓颖超同志被邀讲话。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反对内战为和平为民主而奋斗的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姊妹们表示敬意，并希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将来也能推选女代表出席，更好为妇女的利益与民主的实现而奋斗。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她首先解释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经过和这个会议的性质，接着说：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大家都十分重视这问题，因为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建国，不仅是那个党派的要求，而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事，亦是关系世界和平的事。所以我们的盟邦及全世界民主人士也极关心重视。中共方面对这问题，是非常重视，并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双十会谈纪要》所规定的和平建国的诺言，提出无条件的停止内战，用和平的政治的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早日召开，并已于昨天向政府提议明年元旦开会，并希望在开会以前，首先能做到明令停止内战，以造成和谐协商的

气氛。而在目前，内战的形势还是非常严重。在这里她详细的指出国民党当局积极进行内战的地区以及用在内战方面的军队已达六十五个军之多。目前，正向已无敌伪踪迹、完全解放的热河、察哈尔大举进攻的事实。因此她说：如果国民党当局不早停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就不会开得好，边谈边打，就不能真正实现和平，也无法谈得有结果。只有先全面停止了内战，才能有讨论与协商和平建国方案初步前提。

其次，邓颖超同志谈到联合政府问题。她说：联合政府问题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但联合政府的中心关键，必须有一个民主施政纲领，并且要各党派能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彼此要有约束，才能起作用；不然只是把现有的政府扩大一些，请各党派参加而已。关于纲领，中共方面已有准备，现正与各方面交换意见，也希望大家多提供意见。纲领的提出是原则的，但也要扼要而具体，这样在实行上才有保障。我们所拟的纲领中关于妇女权利和有关妇女儿童福利的部分，在人民权利的一部分上不仅准备提出应承认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上和男子的平等地位，而且提出了在就业上的公平待遇，以及对母婴的保护。关于妇女的选举权和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问题，优待抗属遗孤问题，关于复员中人民种种困难问题的协助，也都提到了。但她希望这里的姊妹们，能更多的提供意见，以便提案能更加完备。

邓颖超同志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对延安和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目前边区和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和任务，作一介绍。讲完大家又问到关于边区和解放区妇女参加选举，经济工作，托儿所和一般妇女文化教育等问题，都经她一一解释。

最后大家在欢欣兴奋的气氛中，开始新年同乐会的游艺节目。

(原载1945年12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对国事的十项主张

一、关于政治协商会议

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时所发表的十条纲领中，第二条纲领就主张“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这次国共谈判决定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与同盟一贯的主张正相符合。中国民主同盟对行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为应付。将来协议的结束，倘真有利于国，有益于民，我们当竭诚拥护。倘与这个大原则相背反，我们则愿保留最后批评的权利。但我们对这个会议，同时亦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希望，那就是会议必定要真能面对事实解决问题。议决的事项，必须迅速而有效的见诸事实。同时，会议中解决一切问题，尤应以国家的福利，人民的福利做目标，不应以党派的利害做目标，这样才能从党派的团结，做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二、关于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例如军队国家化的实现，与其采用各项不

★本文摘自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编者

彻底的过渡办法，远不如用举国一致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全盘彻底的编遣计划。我们又认定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与当前党治的法统绝不冲突。在实际政治上，法统这一名词应广泛的解释，灵活的运用，不可拘文牵义，因为一个名词失掉了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机会。因此我们就希望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能够早日成为事实。

三、关于国民大会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国民大会必求其名符其实，必须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倘保持十年前一党专政时期选出的代表，以举行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以产生政府，这必定影响到宪法与政府的尊严。因此，中国民主同盟坚持我们一贯的主张，认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选举法及宪草必须加以修改。国民大会的代表在原则上当然应由人民用普选产生。这个问题，国共既协议交予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我们就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有审慎的考虑，合理的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保证人民享受一切自由权利，政府修正及废止与此项精神相违背的法令，固然重要；而政府用道德的力量，拘束范围自己的行动，使人民在实际上真能享受这些权利，更为重要。举例来说罢。去年八月十日公布的人身保障法，并不能消除人民非法被捕与无端失踪的事实。本年十月一日取消检查制度，并不能彻底消灭事实上对新闻言论的封锁与检查。进一步来说，廿世纪的民主，只在消极方面解除对政治自由权利的束缚，不能在积极方面充实人民在经济上的自由权利，自由依然是空泛的名

词。因此，我们又认定今日人民的自由，应经济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并重。

五、关于释放政治犯与废止特务制度

中国民主同盟主张政府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至于由党派开列名单，而后依照名单开释，绝非妥善办法。因为政治犯中包括许多无党无派而且无辜被陷的青年。对这些青年，党派固不能知道他们详细的姓名，因此，这些青年就无从得到开释的机会。对内的政治特务组织与活动，应立即一律停止，因为这种机构存在一日，就绝对不能免除谎报与诬陷的事实。并且这类特务人员每每凭借政治力量，指挥司法与警察，无端侵犯人民的自由。

六、关于军队

中国民主同盟认为今天对外战争既已结束，政府就应立即有全盘统筹的编遣计划，以缩减国家的军队，以节省人民的负担。这种编遣计划，绝对不得有中央与地方军或党派军队的歧视。军人应绝对遵守忠于国家的原则，军人绝对不得担任党务工作，这样才能奠定军队国家化的基础。现役军人绝对不许兼任行政官吏，这样才能达到军民分治的目的。

七、关于经济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今日复员时期的经济，消极方面的救济应先于积极方面的建设。目前必先做到流离失所的难民，残废退伍的士兵，有业可就，有家可归。其次，政府必竭尽全力救济陷于崩溃破产的工商业，以保全民族资本的根基。其次，接收敌人的

工商业，凡应归国营者，应严防贪污官吏乘机霸占，借故窃取，而造成官僚资本。应归民营者，应充分以此项工商业补助因抗战而受损失之民营企业。但无论国营、民营，必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力量。其次，必实行整理国家的财政金融制度，国家必实行预算制度，必实行财政公开。同时国家必立即整理币制，以平衡物价，安定民生。再其次，国家在促进工业化的开端，必严格取缔官商合一的垄断，以避免财富集中，防止加重社会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八、关于外交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今日中国应有绝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家应努力与世界各民主国家真诚合作，以实现世界和平宪章。经过这次世界大战，远东成了世界和平的重心，中国更应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担任维护远东和平的责任。国家绝不能凭借依赖依靠的手段，图自己一时的苟安，以增加远东国际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一切友邦间，特别对一切与太平洋利益有关各国，应一致亲善推诚合作，以发挥我中华民国传统的亲仁善邻的精神。

九、关于内政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复员时期的内政，应一面肃清贪污，一面提高效率。达到第一项目的，必先做到改善公务员待遇，实行“俸以养廉”的原则。达到第二项目的，必先做到用人“选贤与能”，打破行政上的分赃制度。选举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民意机关的代表及地方自治的官吏，必须实行真正的民选。国家必建立健全良好的选举制度，必铲除党部操纵选举、官吏包办选举的恶弊。

十、关于教育

中国民主同盟认定废除封建的、统制的、党化的教育，实为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民主的教育必先保证学术研究的绝对自由，政府必使因思想而失业的教育工作人员恢复其原有职业。其次，必改善教育工作人员的待遇，使能安心致意从事学术事业。再其次，必救济贫苦失学的青年，使之有入学读书的机会。同时民主的教育，必使青年们有思想与读书的自由。

上面所说是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当前时局所看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同时就是会议中对实际问题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对目前国事的主张，这就是我们对目前国事努力的方向。一切虽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一切都谨守着一个确切不移的大原则，那就是必使国家得到和平、统一、团结，必使国家渐次走上民主的正轨，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竭诚陈述，候教国人。谨此宣言。

(原载1945年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 会议提供初步意见

国家又到了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中国一面对着自由康乐的光明前途，而另一面又临着自寻毁灭的内战深渊。论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向光明的前途疾进，但是，事实上，很不幸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内战已经接踵而起了！在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曾经热望政府和中共的会谈可能转移这一个危局，结果是失望了！现在，仅有的希望就寄托在政治协商会议。除此以外，便很难再有其他方式了。

因此，本会认为我全国同胞不但要密切注意这一个会议，而要用全力促其成功。各位代表更须抱必成的决心，生死以之，以求无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本会于此，愿以人民的立场，对会议提出下列的意见：

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先全部实现。在上述各款当中，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解散特务机构，我们是向国共两党提出的。

倘使内战不先停止，则一面尽谈，一面尽打，岂不近于儿戏国事？岂不等于和第三第四方面的代表们甚至全国人民开玩笑？

那又如何谈得到开诚协商？人民各种基本自由的赋予，政治犯的释放，政党的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是政治走向民主开明的最起码的表现。这些连战败国的日本人民，都已经从麦克阿瑟元帅的手里取得了。我国民八年以来，不恤牺牲，戮力抗战，现在得到胜利，难道还应该比战败国的人民都不如吗？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再呢，这些条件都已经见诸《会谈纪要》。倘若已经谈妥的都不能实行，现在进一步协商，岂不成为徒劳。本会认为第三第四方面的代表们应该以此为出席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须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须组织军事调查团。

专家顾问团应该由四个方面各自组织，每次列席的人数，以不超过代表人数为度，可因议题的不同，随时更换。顾问得依代表的介绍在会场发言，但无表决权。这样就可以使会议不至于碰到过于专门的问题而停顿，而对于专门问题的讨论，也不至有隔靴搔痒的缺憾。军事调查团可由会议决定人选，组织若干组，分赴易于发生冲突的各地点，随时报告真相于会议。万一发生冲突，须可就地查明责任属于何方，制止也就很容易了。

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表示意见。

会议的经过和各代表的发言，必须全部纪录，全部公布，新闻记者必须准许始终在场，政府还要通令全国各地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由国共两党以外的人士参加。国共两党则须通告党员回避，以免对方指为制造民意。这样，在万目睽睽之下，自然就不会有敢于坚持党派利益，藐视国家前途了。同时，我们还希

望两党的机关报休战一下，以免刺激对方的情感，而让中立的报纸多说一些话。

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改组最高国防会议，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这些我们都没有什么成见，但认为此改组或新组的机构，必须为最高政权行使机构，以符合开放政权的本意，同时自治必须切实推行，除建立各级地方议会外，地方官吏也须实行民选。目下中共管辖区内的民选官吏，我们赞同在各方面监视之下重行选举。

一党专政的局面，显然已经破碎支离，而且也为时代潮流所不许了。由于训政的失败，和期间的久已超过，再由于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的迭遭毁弃，法统论亦早已失去了基础。迎合潮流，发挥理智，迁就事实，以开放政权，换取统一，实在是唯一的出路。国民党既然决心还政于民，提早一些时间开放政权，以为过渡，本来是顺理成章的。同时，由于政治腐化，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我们为国家前途计，觉得政局要有重大的改革，应该从速注射进去大量的新血液。

第五、为要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政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原子弹的发明，不但使大量的陆军成为不必要，甚至连大海军、大空军都成为不必要。今后我国的常备兵，至多不应该超过五十万人。为要对国际表示爱好和平的至诚，为要使财政能上轨道，为要免除人民骚扰和士兵的痛苦，大量的裁兵也是必不可少的。伪军尤其应该率先解散，不得以任何名义收编。目下农村人力的消乏，想到将来建设工作的巨大，我们更可以保证使每一个退伍

官兵都能得到更有意义的工作，能够过更好的生活。留下来的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宣誓不再为任何个人或党派打内战，并充分提高其待遇。除了应争取国家财政的全部公开之外，还应指定几种税收为军费来源。万一军队参加无名的内战，人民便可以罢税来对付。把军权交给无政党关系的文人的建议，我们认为不能视为游戏文章，而实在是和我国历史传统以至民主国家的先例都适合的。军事时期过去了，以党治国的时期也应该过去了，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自然应该全部废止。只要给中共以切实的保证，民国十六年的事变以至类似最近屠杀昆明学生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一切的政党并且可以平等自由公开活动，中共自然更没有理由再拥兵自卫了。

第六、为要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行起草，——现行国民大会组织和代表选举法实在太欠缺民主精神，实在太不适合时代。如果不加修改，一定会贻笑友邦。原有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事实上是由国民党主持一切。代表当中固然也不乏真正由人民选出的人物，然而秽闻百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实在也不少。选出的代表，又几乎全数是国民党党员。实情如此，而要说还政于民，似乎太滑稽。代表选出的时间已经有八九年之久了，显然也不能代表这一个时代。为要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重选实在是必要的。《五五宪草》不但缺乏民主精神，立法技术上也有许多缺点，重行起草是必要的。新起草宪法的要点，在于议会制度的确立。

第七、在过渡期间，必须商订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这似乎各方面都已经同意，问题只在内容如何。我们认为除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项目以外，还应该包

括经济民主化的项目，除了必须有很具体的条文以外，更应该有一个进度表，以免再蹈过去临时约法和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具文的覆辙。

第八、会议还应该检讨一下当前的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如交通工具调度的不善，接收敌伪产业拨归国营部分的大大超出第一期经建原则所规定的范围，造成包而不办，办而不良的现象，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党垄断等等，都必须彻底纠正。特别在产业方面，政府过去为了财政收入，曾经用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和统制手段摧残产业，结果的悲惨已经有目共见，现在再为财政收入进一步垄断产业，初步的结果也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当和一般经济上到现在还没有一些决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业和大批破产的局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会议能够解决的。

(原转1946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 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

当今百业凋敝，金融混乱，流亡载道，失业纷呈，举国涸涸，不可终日，自非急图解救之方，实无以为善后之计。最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将联合商讨今后建国大计及目前各种急待解决之政治经济等问题。全国人民于此会议俱抱有莫大之希望，本会同人均服务于各经济事业机关，愿就平日经验研究所得，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如何挽救方策，约略贡献。深望我政治协商会议诸公，一本民主精神，详加考虑，多所采择，实深幸甚！

一、关于财政币制者

(一)公开财政

政府之预决算应即交由民意机关(在民意机关未成立前，可由政治协商会议暂代，以下同)审议通过，正式公布。除正式公布之预决算外，不得再有任何秘密开支。所有税捐之征收，内外债之举借，公用事业之加价，俱须经民意机关之审议通过，并正式公布其用途。不得举办妨碍民族工业发展之任何税捐；已有之一切苛捐杂税应立即取消。亦不得举借不作经济建设用之任何内外债，过去已经举借之各项内外债，应立即详细公布其条件及实际

应用之经过。

(二)平衡国库收支

增加收入方面应：(1)责成敌国政府照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我国一切公私方面因战事所受之损失，并勒令敌国政府尽先归还自我国劫夺之公私物资及金银准备(一切损失之调查，赔偿之分配，应由官民合组之团体负责之)；(2)举办累进制之外币外汇金银财产税及地租所得税(地租所得税可于田赋征收时合并征收之)；(3)向富有阶级劝购公债并征借国外逃避资金(如全国人民揭发已久之三万万美金，即其一例)；(4)没收全部敌产逆产(此事应由各地方人民组织团体监督实行，任何政党与社团不得利用接收敌伪财产机会将敌伪财产据为己有，其已占据者应着令归还，另行公开规定其支配办法)，除一部分敌逆强占之财产须归还原主，一部分应作价赔偿民间损失外，其余可充作财政收入之用。减少支出方面应：(1)减少现占国库支出最大部分之军费开支，将国军减缩至国防需要之最低额度；(2)任何党派用费不得由国库支付，其由国库开支者应立即停止之；(3)各类政费之支出，应规定适当比率，经济建设及教育经济以外之各种开支应力求紧缩，并使其所占比率逐年减低。

(三)着手整理币制

以膨胀通货作为财政收入之政策，应立即放弃，以尽力稳定币值，抗战期间之通货发行状况应即详细公布，停战以来之发行情形，应即由官民合组之委员会，随时加以审查公布，以释民间疑虑。法币与收复区尚流通之伪币敌币比价，应按照各该币之购买力作价，规定公平合理比率，以保障收复区同胞之生活，此项伪币敌币应以法币渐次收回，依其原价，责成日本政府赔偿。

(四)确定地方财政来源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收支系统应明确划分，所有田赋及营业税应全部划归地方财政收入。而现在各地地方当局任意征收之各种税捐杂款，应立即严厉禁止，以苏民困。

(五) 改善内外汇兑办法

外汇汇率必须参照中外币购买力平价适当调整，过去售出之外汇须详细公布其金额及用途，今后出售外汇，必须经民意机关组织之特种委员会审查核准。凡对于生产事业之申请外汇，应特予便利。国内汇兑方面，应立即减低汇率，简化手续，以便利各经济事业之复员。

二、关于工业经济者

(一) 确定方针

应依国家需要，由政府及有关经济事业之团体，订定分区分类分期之推行方针，使轻重工业配合发展，全国各地平衡推进，避免偏颇重复之弊，在此方针范围内，欢迎外人投资。

(二) 鼓励民营改善国营

除一部分有关国防及有独占性或必须长期投资始能获利之工业如铁路、邮电、兵器制造等可由国家经营外，其余各种工业应尽量鼓励民营。应扩大保本保息和津贴之适用范围，以保障正当工业利润；其具有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者，尤应积极予以扶助。所有民营工业，于缴纳税捐上，购买外汇上，分配原料上，借用资金上，应与国营工业受同等待遇。一切国营工业应订定效能标准，随时公布其成绩，同时改善现行之硬性审计制度，以增强其效能减少其阻力。

(三) 挽救工业危机

目前后方及收复区遭受危机之各种大小工业，政府必须用贷

款、定货、收购成品、技术援助以及原料配给等种种方法，尽速施以救济或扶助。农村生产合作社及农村手工业更须力为扶持推进，以确定全国工业化之广泛基础，并使农村半制品之制造，能配合大规模之工业生产，相互发展。

（四）接收敌伪工矿

敌伪工矿之接收工作应迅速进行，以免敌伪之破坏、迁移、隐匿、变卖，接收工作应尽量使民营工业中，素有经验之专家参加，接收并非封闭，非因为害国家民族利益之故，不应停止其生产。接收后除一部分作价赔偿受损之工矿外，其余应尽速以租借代替之方式交由民营。

（五）管制敌国生产

凡盟国规定不许在敌国国内设置之工业，应尽先迁移中国，作为赔偿，凡危害中国工业发展及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工业竞争之敌国工业，亦必须加以管制并限制其生产。

（六）提高工业产品之品质

政府应与有关经济事业之团体制定制造标准，并依物质条件之改进，逐年订定上升之各级标准，以奖励合于标准之产品而扶助其不合标准者之改进。对于工业技术发明人之权益，尤应力予保障，政府主管机关应会同专家组织审核委员会建立公正之审核制度，并限期核发执照，不得拖延，对于研究人员政府应指拨专款，随时协助其发明工作。

三、关于农业经济者

（一）赶办紧急救济

对于收复区及大后方遭受灾害之农民，应迅即举办紧急救济，散发粮食衣被以及种子耕畜农具等，使能及早恢复生产，对于现

尚流离在外之人民尤应拨予交通工具，以资助其返乡。此项救济工作，应普遍施行，不能有政治信仰及社会关系之任何歧视。救济物资之分配尤应随当地农民所遭受灾害之程度，作比例的增减。所有善后救济总署拨给中国之巨额物资应详确公布其用途，并交由各民选组织公开分配，以防贪污及挪用现象之发生。对于价格跌落过甚之农产（目前之陕棉即其一例）政府应随时采取收购津贴政策，以维护农业生产之发展。

（二）减轻田赋田租

应迅即实行田赋累进制，减低田赋起征率，提高田赋起征点。田租租额应厉行不得超过当地主要作物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之法定比率，（《土地法》之正产物一词，应根据过去各地习惯，作为当地主要作物解，不应曲作他解，致减租反成加租。）由地方政府、业主、佃户、及有关农民社团等四方面代表合组团体，切实执行。

（三）停止征兵征工

抗战既早结束，征兵征工自应严格禁止。停止征兵虽已见诸明令，但各地乡镇保长今依然捉拉壮丁，而公家需用人工，尤多出诸强迫，非以自愿雇用方式。此必澈底废除保甲制度，建立真正农民自治组织而后乃能根绝一切鱼肉乡民之情事。

（四）改进农贷办法严禁高利贷

农贷资金必须大量扩充，农贷办法必须澈底改善。农贷对象应限于农民自身及农民之自动组织，农业贷款之额度，必须扩大，限期必须加长，使国家农贷确能为一般贫苦农民所用。农贷利率须限期恢复战前标准。而农村利率应以农贷利率为准。采用充分供给农民低利贷款办法以压低农村利率。

（五）没收敌伪田地农场

敌寇汉奸之一切田地耕畜农具俱应立即没收。其以强力占有者应复还归其原主，其经过购买手续者，应配给退伍士兵及贫苦农民使用。

(六) 提高农民生产技术

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活动之法令，废弃包办强制之农会及乡镇保合作社，听由农民自动组织职业团体，社会团体，以提高其自身之生产热忱及学习精神。同时并资助知识分子下乡，普遍举办各种农村文化事业，使现代农业知识能深入农村。水利工程必须普遍兴办，新式农具以及优良种子，优良肥料必须普遍推广，由政府出资，交由农民自动组织之团体经营管理，而于技术上给予适切指导。于农村生产已被敌伪极端破坏之地区，更应充分利用善后救济总署所拨予中国之优良农具、种子、肥料，发展农民自动组织，以促进新式农业之建立。

四、关于交通贸易者

(一) 确定对外贸易政策

所有洋行买办制度必须澈底消灭，一切进出口贸易必须由国人自由直接经营。所有对外贸易之运输，汇兑、保险等，亦必须尽量辅助国人自己经营，并扩大外汇银行之国际金融网，以免外商银行操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于出口物资除必须制定商品标准经过严格出口检验外，其余应尽量予以便利。对于南洋之商品输出，应采取津贴政策，以资鼓励。对于进口物资，除国内所暂时不能生产之器材及原料等应免税奖励其输入外，其余应尽量限制其输入，以维护国内产业之发展。（最近报载有大量购进美棉之举，此于中国棉花生产实有绝大妨害，望能立即停止进行。）

(二) 采取相对保护关税

我国产业落后，为促进生产发展，应在不妨碍国际合作之原则下，采用差额保护关税政策，订定各级税率，民国23年所公布之进口税则，应予废止。今后订立关税互惠条约时亦须慎重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不可因外债及租借物资关系而过分迁就外国要求，致不能维持关税独立自主之原则。

（三）保障国内贸易自由

国内贸易之一切统制办法，应澈底取消，并严禁一切垄断行为。取消一切地域上之限制，取消内地关卡及一切有关贸易之苛捐杂税，使国内贸易能充分发展。

（四）维护国内交通运输

废止一切管制交通制度，所有交通工具应由人民自由使用。一切军事机关及特权阶级妨碍交通之现象，应迅予制止。所有交通运输之价格调整，应由官民联合组织订定。对于牲口板车木船等应绝对禁止任意征用，其使用价格应由当地各该业业主共同议定。

（五）扶助民营交通事业

所有航运空运，应采取津贴政策、鼓励民营。对于沟通南洋之航运空运，尤应特别予以资助。对于战时受损失之各民营轮船公司，应由政府就没收之敌人船只中照数赔偿。

五、关于保障经济事业从业员工之生活者

（一）保障员工工作权利及人身基本自由

政府应明令规定：所有经济事业从业员工俱得自由组织团体，保障其自身利益；任何民营国营事业机构俱不得无故或借故辞退员工；并在此失业现象到处皆是之时，应严格禁用敌国工人及技师专家（即如本国技术专家有缺乏时亦应聘用盟国人员）。政

府除充分扶助已有之农工生产外，并应举办公用事业，以增加工作机会，减免失业恐慌。

（二）规定工作时间及工资标准

政府应会同员工团体，依工作之繁重轻便以及卫生条件，订定各级工作时间，并限制最高每日不得超过十小时，夜班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月应休假两日。同时应依照当地物价指数，规定最低限度之工资标准。

（三）订定员工福利制度

政府应会同员工团体订定津贴抚恤养老及社会保险办法，并出资举办员工社会保险。应依各种经济事业之范围性质及员工多少，订定举办各级福利事业，如食堂、病院、托儿所、娱乐场、补习班、技术训练班等，责成各工矿分级办理。如已规定者，应即切实执行。凡已订定之保护童工女工之法律，俱应切实施行。

（四）救济失业

凡因抗战胜利而遭致失业者，政府应督促执行社会部所已经公布之遣散办法。如民营机关自己不能负担者，政府应即资助其办理。所有后方及收复区之失业员工及技师专家，政府应会同员工团体从速调查登记。同时对于全国各种经济事业所需要之从业员工，应作通盘计划，各依失业员工之志愿能力，分别予以适当安插。

（五）保障职业妇女

政府应保障妇女就业权。职业妇女在妊孕生育时期内之生活及休养，尤应特别予以保障。

以上所述，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之荦荦大者。然欲求达此目的，必须政治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军事上保持全国各地之普遍和平，方克有济。切望目前国内各地之军事冲突能由政治协商

会议迅即予以制止，并澈底解除其所以发生之症结；国民大会代表能澈底普选，各经济事业从业员工能有充分代表参加；《五五宪草》能澈底修正，其经济部分尤应根据维护民族经济事业发展之原则，充分修订；而民主联合政府能早日成立。庶几建国大业得早观厥成，举国人民得早登康乐之域。是则为我本会同人所朝夕期求者！

（原载1945年12月24、25日重庆《新华日报》）

全国工业协会对 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全国工业协会，昨天(二十四日)下午，在迁川大厦召开会员座谈会，讨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座谈会由李焯尘氏主持，到会的工业界人士提供了如下的意见：

一 会议职权问题

(一) 会议职权，在开会之前，必须确定，会议通过的事项，应对有关方面有约束的力量。

(二) 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治协商会议应继续存在，或扩大之，以便随时决定解决政治纠纷及经济危机的方针，并监督其执行。

(三) 会议讨论的范围，应以当前最迫切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为先，如内战问题，复员问题等，宜从速解决以安人心。

二 军事冲突问题

(一) 在会议时，应由政府及中共军事最高机构发表明令，双方军队各驻原地，停止作战。

(二) 交通须立即恢复，铁路沿线地区的治安，由保安警察负责。

(三) 会议应组织处理收复区军事冲突监察团,由会议选聘公正人士组织,分成若干组,分赴收复区观察实际情形,防止冲突。

三 政治纠纷问题

(一) 敌后成立的地方政权应加以改选。

(二) 中央政府应成立容纳各党派及各界领袖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以解决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

(三) 应决定立即实施大量裁兵,在保留员额尚未确定之前,可先规定一定比例,双方逐步裁减。

(四) 国民大会代表应重行选举。

(五) 在正式宪法未颁布以前,应由政治协商会议议定和平建国纲领,作为现阶段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四 经济危机问题

(一) 当前经济危机与政治纠纷同样严重,会议对此应加以讨论,并决定政府应采取的方针。

(二) 当前经济问题应以稳定为第一,复员与建设均须稳定后始能进行。

(三) 币值应即予稳定,为保护产业计,汇价的确定,应以物价平均指数为根据。

(四) 发行不应一味紧缩,于必要时仍应扩张,在通货发行倍数不超过物价上涨倍数范围以内,增加发行,一方面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加薪工阶级的待遇,以提高购买力,扩大产品市场,于各方面均有利益。

(五) 为挽救当前经济危机,奠定建设前途,自须政府与人民

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应由政府与民间代表共同组织全国生产事业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办理全国工矿的调整、经营及扶助事宜，解决收复区厂矿的经营，后方工业的维持，及工矿贷借外资与洽购器材等问题。

(原载1945年1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重庆出版业致 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日本投降，举国腾欢。八年抗战余生，正望休养生息，孰料庆祝最后胜利之声未歇，弥漫全国之内战即起。为我劫运，何堪重罹水火。

三阅月来，全国人民吁请停止内战，声不绝耳，而内战烽火，则愈张愈炽，全民疑惧，不可终朝。所幸举国观望之政治协商会议，几经蹉跎，终在四万万五千万人喁喁殷望之下，即将召开，凡为国民，莫不称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对于国是揭陈四端，尚乞垂鉴。

政治协商既为朝野公认解决政治问题之最好方式，则任何纠纷，任何困难，均须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解决，断不许边谈边打，且战且商，代表周旋于议席，士兵喋血于疆场。甚望国共双方，立即全面停战。和平团结，拯生民于水火，昭诚信于事实。此其一。

《五五宪章》为一党专政下之产物，如不本民主精神，博采民意，细为修改，则人民权益，无由保障，真正之民主政治，无由确立，而所谓还政于民，亦必徒托空言。故宪章应即修改，庶百代之大法，美备于一举。此其二。

国大代表产生于党治之下，抗战以前。无论衡以民主之原则，

事实之观点，均不足代表真正之民意，应即实行普选，以期人民意愿，得真正表显。旧有代表，果属贤能，在普选中必可重膺议席，而八年来为抗战努力之人士，亦因以获有参与国大之机会。如此精神之兼顾，始为计出周全。此其三。

政治协商会议有所商决，为求真正见诸实行，唯有集合全国各党各派无党派贤达俊彦，拟定一全民服膺之共同施政纲领，且组织临时性之联合政府，以实施此纲领，为结束党治而达真正民主之桥梁。此其四。

以上四端，为出版业对国事之共同意见，兹再就出版业本身问题，略陈五事：

八年抗战，出版业辗转播迁，既牺牲于敌寇之炮火炸弹，复受制于种种苛律之束缚。胜利以来，图书审查制度虽言取消，而变相之检查办法，旋踵继起。出版自由云云，全成空谈。吾人饱尝痛苦，敢就所见，提请讨论。

一、废止出版法

按《出版法》之主要目的，端在箝制言论出版，实施该法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一点，为明真象，照录其文：

“第二十一条，出版品不得为下列各项言论或宣传之记载：

- (一) 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者。
- (二) 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
- (三) 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

第二十二条 出版品不得妨害善良风俗之记载。

第二十三条 出版品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记载之辩论。

第二十四条 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登载。

第二十五条 以广告启事方式登载于出版品者，应受前四条所规定之限制。”

该法除本章上列五条外，皆为因辅助上述五条而束缚著作、编辑、发行、印刷者之种种方法与手续，倘上述五条无存在之必要，则该法应该根本废止。而上述五条经逐一研究，实属绝无存在之必要。其理由：

甲、关于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者”：

(1) 按以文字记载而为“破坏”某人某一团体或某一主义之行为，则无翼为诽谤罪，而为诽谤罪已有《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誉及信用罪”之第三百零九条至三百四十条罪以种种罪罚，绝无另设单行法之必要。

(2) 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政府既认各党各派均有合法平等之地位，本条款专为保护国民党而设，自属不合，更无存在之必要。

(3) 任何党派或主义，其宗旨必为福国利民，否则根本不能成立。若非丧心病狂，绝无加以诽谤之理。若其方法上有所不合，舆论加以指责或批评，自不能认为破坏。此所谓言论自由，岂容加以限制。

(4) 三民主义本主张出版言论自由之民权，今乃因保护主义而设置本法为束缚自由之工具，岂不自相矛盾。

乙、关于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本条款已有《刑法》第一章“内乱罪”第一百条至一百零二条规定种种罪罚，绝无为设单行法之必要。

丙、关于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本条款已有《刑法》第七章“妨害秩序罪”第一百四十九条至一百六十条规定等罪罚，绝无另设单行法之必要。

丁、关于第二十二条“出版品不得为妨害善良风俗之记载”：本条款已有《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风化罪”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种种罪罚，绝无另设单行法之必要。

戊、关于第二十三条“出版业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查本条“禁止”二字，自然指对于禁止该事件之公开发表声明，如登载者不受禁止，自有法律裁判，绝无另设单行法之必要。

己、关于第二十四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登载”：本条意义，乃为禁止泄漏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秘密，无异与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相同，且《刑法》上有“外患罪”第一百另三条至一百另五条之规定种种罪罚，绝无另设单行法之必要。

庚、关于第二十五条“以广告启事方式登载于出版品者应受前四条所规定之限制”：本条规定为前四条之附带限制，前四条既不能成立，自无存在之必要。

综观此法第四章各条之限制，从触犯此限制之行为而言，并不限制于文字之记载。故《刑法》所定各项条例范围甚广，何以其他行为并无特设单行法，而关于出版法加以种种之束缚，除有意限制人民之言论自由，实无可解释。政府现既确认人民此种基本权利（见《国共会议纪要》），出版法自非立即废止不可。

二、取消期刊登记办法

现行期刊出版，按《出版法》第九条之规定，须先呈准登记，

始能发行。而登记手续之繁苛，极尽束缚留难之能事。以言承办机关。表面上经由该管官署转报备案，而实际上一切取决于国民党党部。以言登记核准，动辄经年累月，甚且永无批复。是故欲求出版自由，非即除去此种苛律不可。敢请立即取消期刊登记办法，以后几期刊出版，只须一面声请备案，一面即可发行。一经发行，邮局应立即准许挂号，作为新闻纸类寄递。

三、撤销收复区检查办法

沦陷区内言论出版，久经敌伪箝制蹂躏，摧残迫害，人民对于精神食粮，如饥似渴。一旦光复，政府对此非惟漠不关心，反将大后方已取消之检查办法，复行之于广大收复区。目前上海、北平、广州、武汉诸大城市之出版业，莫不在收复区管制办法下深感束缚重重，奄奄一息。为使收复区数万同胞有书可读，出版书店有业可营，应请立即撤销收复区有关出版各项之检查办法。

四、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

十余年来，不知名之机关，常驻邮局，从事检扣书刊。寄件者查询邮局，例不答复，册页千万，不明下落。而各地党政军警，不论机关，不论个人，皆能任意检扣。书店则受审累累，读者则恐怖重重，如不取消此种非法制度，纵令表面如何自由，亦何自由之有？应请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措施。遇有检扣，受害者得按律控诉。

五、取消寄递限制

胜利以还，书刊寄递，百般阻难，一仍旧贯。应请立即开放全国邮路，恢复及进印刷改品之寄递，以便供应，而利文化。

以上各项为出版业最迫切之要求，亦为促进文化之必要条件。
伏愿采纳各著，促其实现，即出版业幸甚！

大学印书局、文通书局、自强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新地出版社、中外出版社、
世界书局、作家书屋、开明书店、
群益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
正风出版社、东方书社、雅典书屋、
黎明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北门出版社、
建国书店、进修出版社、乐群书店、
文光书店、生活书店、峨嵋出版社、
万光书局、学艺出版社、文聿出版社、
光明星局、国讯书店、新知书店、
联益图书公司、文治出版社、新华书店、
自由中国出版社、复兴书局、图书出版社

（原载1946年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 对于当前国是的意见

我们是东北人。十四年来家乡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略，受尽敌人压榨屠戮之惨痛，我们不甘为亡国之奴隶，流亡内地，无日不希望国家之统一强大，以冀早日收复家乡失地，拯救父老子弟于水深火热之中。八年抗战我们追随全国同胞，贡献我们仅有之人力物力。无非为爱国爱乡之良心所驱使，而尽披发纓冠之义也。孰意日本投降以后，敌寇未离国土，内战遍于各地，民生困苦因之加剧，国家危机从而益深！我们睹此现状，倍感忧惧！虽然我们热望东北问题之早日解决，我们得早返家乡，各复旧业。但整个国家如不能和平建设统一民主，则国家之前途，四强之一其名，殖民地化其实，可断言也。东北纵能勉强收复，亦必为内外纠纷之牺牲品，决无康乐幸福之可期。所以我们除对解决东北问题有具体意见陈述外，对于当前国是亦不能默尔不息。根据我们热诚研讨之结果，归纳为左列二项建议：

一、停止军事冲突

军事冲突之日益扩大，使民生凋敝，国力日疲，将来更无以尽维持世界和平之义务，所以停止军事冲突不但为全国同胞之一致要求，亦为盟邦之所最关切！我们认为国共双方应即诚意接受

全国同胞此一紧急呼吁，立即下令停止全国各地之军事冲突。其具体办法及有关恢复交通，受降解除敌军武装，处置伪军，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可以参酌中共无条件停止军事冲突办法及政府停止冲突方案及其他方面关于停止冲突之建议，作为本月十日开幕之政治协商会议之第一议题。为免蹈过去边谈边打之覆辙起见，至迟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双方即应下令停止全面冲突，以为诚意协商之表示。同时政治协商会议至迟于开会后十日之内，就此问题商得公平合理的办法，并遴选各方面公正人士组织考察团，前往各地监视双方执行决议。

二、实行民主政治

(甲)中国今日纠纷之源泉及今后建国之障碍，为政治之不民主与军队为党所拥有。全国大多数之老百姓，一向居于被治的地位，因之消极的不能监督政府，积极的无法贡献力量，于是行政用人皆以党系利益为指的，庸懦得志、贪污横行，政风遂日下矣。除当权政党外，其余党派无合法竞争之机会。而言论思想集会结社交通等更无自由之可言，即身体安全亦无确切之保障。结果政治斗争遂以武力斗争之形式而出现。我们以为解决今日之纠纷，惟有实行民主政治，使一党政府变为全民政府，然后军队国家化顺利进行，建国工作亦将随之开展矣。实行民主之具体办法，应为从速召开真能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各职业、各民族人民之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全国民意制定新宪法；然后依照新宪法组织政府，重编国防军。这个国民大会，应于一年以内召集之。其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应由政治协商会议重新决定，交由政府重新办理国大代表选举。

(乙)在根据新宪法组织之国民政府未成立以前，应由政治协

商会议决定一临时联合政府组织法及制定一保障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之施政纲领。根据此组织法成立以蒋主席为领导包括各党派代表参加之临时联合政府。依照施政纲领推行政务，且对政治协商会议负责。首先应即释放汉奸以外之政治犯，及因政治问题遭受拘禁及严加管束者，取消与民主原则抵触之法令及机关，保障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并由政治协商会议推选贤能及公正人士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在临时政府指导之下，负责进行军队国家化及整编工作，务期于最短期间，合理缩编各党军队，使其数目减至仅足国防之用，并统一其指挥权于临时联合政府。主持军政首长应由国共两党以外人士充任。同时根据各地方情形，改组地方政府，俾能合于民主原则，容纳各方人士，参加地方政权。

（原载1946年1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陪都文化界人士 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陪都文化界联合了学术、教育、文艺、戏剧电影、音乐、木刻漫画美术、编辑者、出版以及其他从事于文化工作的人士，在一月八日联名发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书。

在这意见书中，他们首先提出“全面无条件停止内战”和实现民主改革二点，认为是“政治协商会议能否成功的前提，我们不再愿意徒听诺言，而要求以兑现的事实以告国人”。关于前一点，他们说：“我们要求全面无条件停止内战，全面恢复交通，全面废止战时措施，全面撤除作战机关，而尤以即日由政府与中共同时下令停战，各守原防，不得进军为先决条件。”

关于后一点，他们说：“在政府方面，已至与民更始的时候了，已至速变成规的时候了，凡过去有背民主生活的法令，妨碍自由权利的各种措施，必需即日废除，以明民主改革的决心，而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尤须心口如一，见诸事实，这是民主团结的试金石，没有这些措施，是要把政治协商会议流为讽刺的图画的。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议题”，他们提出“解决国事问题的关键”三点。

第一、和平建国纲领问题。他们说：“和平建国纲领，就是大

家共同清扫反和平，反民主，反统一的旧有制度底奋斗约法，同时亦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切实保证。我们不希望写些凌空虚玄的条文，我们是要一个确实而具体的民主进步的政纲政策；凡内政、法律、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民族诸方面，不但要有显明的规约，而且更要有保障政纲在实施上有效的合理约束，惟有这样，政府的改组，才有现实价值，而所谓延揽的人才始能尽其才，所有的贪官污吏始能敛其迹。中国要上革新的路程，舍此没有捷径。”

第二、改组政府问题。他们主张，“改组政府，必须是名符其实；若徒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实质，虽名曰‘联合’，亦在反对之列。民主的改革而实事求是，即不名‘联合’亦举手赞成。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一）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党平等的原则，实行改组，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委员会应有最高决策，并执行之实际权责；由该委员会依据民主方式选贤举能，改任各院部会首长；而现行以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最高指导机关的制度，即行废止。（二）在民主的联合的国民政府之下，设立一包括各方之联合整军委员会，而现行以国民党一党支配的军事委员会，即行裁撤，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真正使命。（三）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必须分离，以表明真正成为民主的中央政府，以显示结束训政的决心。（四）依据中山先生遗教，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均权制度，而地方自治在目前情况下，必须首先实行民主的民选原则，并修改现行的省政府组织法，现行的文官任用法规。（五）民国以来，祇政纲有过实际价值，如民初的《临时约法》，如民十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如《抗战建国纲领》，并没有什么法统的约束；但过去的事实证明，为纲领的实现而奋斗者是好的传统，为法统的争执而纠纷者，是坏的遗迹。

因此，关于改组政府的最高精神，我们反对各方争‘统’，而坚决主张以明确的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共信共守的保证，以求贯彻民主的实施。”

第三，国民大会问题。他们说：“为了鉴于民国历史玩法的教训，这一件创造性的伟大事业，必须远瞻近瞩，斟酌民情，既要贯彻中山先生所言超乎欧美代议制民权的理想，又要正视世界潮流的民主趋向，更要审识中国自己的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主张因人制法，颠倒本末，不同意限时立法，依法治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谓下者日本宪法可谓代表，中国的立宪虽不能理想是从，期许过高，然决不能走日本立宪的途径，致貽祸患。因此，我们在原则上主张：依据美国法国的立宪形式，参考战后新兴各国的民主改良内容，贯彻遗教，重视现实，制定我们中国的根本大法。尤应注意者：（一）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必须重订；（二）《五五宪草》必须由各方人士平等参与修正；（三）国民大会筹备机构及其工作，必须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共同组织进行；（四）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必须尊重人民意见，并将先决问题解决之后始能规定；（五）旧代表无效，国民大会代表，必须依全国普选方式产生；（六）地方自治必须正视现实，废止保甲制度，认真实行地方民选。”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吾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

马寅初

自“七七”抗战以来，吾国对内对外关系的改变，最紧要的约有两种：一为经济改变，一为心理的改变。先言经济的改变。在今日的大后方，已设立了大小工厂五千二百二十六家，资本，依登记时的法币计算，有四十八万之多，不可不认为空前的进步。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贫农之多，骇人听闻。工业化是现代强国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不过在中国方在开始，结果如何，尚难预测。资本与技术两感缺乏，在抗战期中无论在大后方与沦陷区，新工业如雨后春笋似的勃然兴起，但基础仍未巩固。如电化厂，皮革厂，制药厂，毛织厂，造纸厂、糖厂，炼油厂，酒精厂，机器厂等等，无论在品质上，成本上，与技术上，皆无法与外货抗衡。一旦国际通商恢复原状，外货如潮涌入，这几种新起的工业均无立足的余地，此仅就经济而言也。

但就心理改变而言，吾敢说已获得了不少的成果。何以言之？当中国闭关时代，国人多称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海禁大开以后，竟称外人为洋鬼子，西洋菜称番菜番席，手杖叫打狗棍。凡此皆为鄙视外人心理之表现。自义和团事变之后，鄙视外人的心理，一变而为崇拜外人。凡关于外人之事物，莫不加以美好之形容词，于是番菜改称大菜，打狗棍改称文明棍，话剧叫做文明戏，新式

结婚叫做文明结婚(旧式结婚就是野蛮结婚)。凡此皆为崇拜外人心理之表现。初则鄙视，继则崇拜。二则均非所宜，盖过与不及，错误一也。抗战以来，英美与我国已为同盟国，并肩作战，对于外国人物之称谓，渐入正轨，于是大菜称西菜，文明杖称手杖，文明戏称话剧，文明结婚称新式结婚。名符其实，不亢不卑，中庸之道此之谓乎！此诚谓我国人对外心理上最重要之转变，亦是八年抗战所收获的良好结果。既不排外，亦不媚外，自尊心理，充满着国人的胸襟。尤其在抗战初期获得胜利的时候，可说已达到了最高峰。

惟自敝本家(按：指马歇尔)从美莅华以后，此种心理又正在大大地变化。举国人民的眼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移转给他。无论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莫不天天注意关于敝本家的言行，而敝本家自入境以来，尚未公开地发表他的意见。一般人以为他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以丧邦。如他以为中国应该要和平，中国就能够和平，如他以为中国要用武力来解决一切纠纷，内战就不能避免。中国之治乱兴替，惟“马”首是瞻。在国内原处领导地位的人物，真是一种极大的损失。长此以往，如不恍然大悟，顿变作风，不特华盛顿做不成，即退百步而想做一个拿破仑，亦不可能。其遇虽可哀，其愚真不可及也。其实中国国内的争执，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何劳他人置喙，吾故对于今日之政治协商会议抱有无穷之希望，握实权者万不可再固执成见，一些不肯放焉，致陷会议于僵局，须知会议的失败，即是自己的失败，亦是中国之大不幸。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

柳亚子

中国八年抗战，流汗流血劳苦功高的是人民大众，所以，胜利的成果，当然应该属于人民大众，而现在建国的计划，也非由人民大众来主持不可。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领袖，他们就是以人民大众代言人的资格而来解决国是的。这样，大家应该先有一个认识，就是现在所谓国是问题，绝对不是国共双方的问题，而应该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领袖和无党无派领袖，都以人民代表的地位，来共同解决问题。国共会谈中已经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政治协商会议应该是怎样的内容呢？现在，把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代表全国人民大众的意见，条列如下：

第一、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关于以下八点：（一）彻底查办勾结敌伪屠杀人民的国贼，把已经落网的汉奸，交付人民公判以后，立刻明正典刑，尚未落网甚至还在屠杀人民的汉奸，则尽量严拿惩办，不许借“曲线救国”等论调，继续作恶；（二）释放汉奸以外的全国政治犯，尤其是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诸人，所有形形色色的各种集中营训练团以及其他类似的机关，一律彻底解散；（三）恢复人民身体、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讲学、通信的绝对自由，取消书报戏剧的检查制度，不论大后方

和收复区，一律实行；（四）彻底取消中统、军统以及其它全国的特务机关；（五）用有效的方法彻底救济全国水旱灾区的灾民，以及急于需要还乡的义民，予以种种便利，严惩趁火打劫的贪污官吏和贪污保甲长；（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彻底执行“二五减租”，严厉制止土豪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七）调查工厂，给工人以水平线上的生活，和普遍的自由，彻底禁止厂家打骂和虐待，尤其是童工女工，救济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八）扶助工商业，废除一切管制工商的不良制度，没收与敌伪有关的工厂和企业，由内迁复员的工商界来经营。

第二、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领袖和无党无派领袖来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为了满足执政党保全法统的要求起见，这联合政府不妨仍旧叫做国民政府，但须修改组织法，并规定各项办法，大致如下：（一）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主席人选仍旧，副主席则以中共的领袖和民主同盟的领袖分任之；（二）设委员七十二人，其人选应由国民党和中共各提出四分之一，还有其余的四分之二，则由民主同盟从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领袖中推定之；（三）由正副主席三人和委员七十二人合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实行委员制的精神，每星期开例会两次，这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最高的统治机关，一切建国大计以及发号施令的事情，都须在这委员会中提议通过，由正副主席签盖，然后交付该管机关执行；（四）这联合政府——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原有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应该立即取消，而执政党的中常会，也不再容许干涉国家政务，以杜绝政府之上复有太上政府的积弊。

第三、由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组织联合统帅部，其名称也不妨仍旧用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但组织法须修改，人选除委员长

以外，也須彻底改组，办法大致如下：（一）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两人，委员长人选仍旧，副委员长也由中共和民主同盟分别担任；（二）设委员三十六人，人选仍由国民党和中共各提四分之一，还有其余的四分之二，则由民主同盟从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领袖中推定之，再由正副委员长和委员三十六人，合组委员会，实行委员制的精神，其一切开会议决执行等，统统依照我上文所说国民政府的方法办理；（三）这联合统帅部——新的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和五院并行，其正副委员长和委员，由政治会议通过后，再由国民政府加以任命。

第四、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改组五院及其隶属的各部会，厘定制度，调整人选，其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名额，也由国民党和中共及民主同盟，分别支配之，人选由三方分别提出后，再由新的国民政府加以任命。

第五、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重行划分省区，先从边区和解放区入手。例如，改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改苏北解放区为江淮省，改海南岛解放区为琼崖省，其他各区都可照样办理。边区和解放区，都已经有了民主自治的基础，应该参照国父孙先生《建国大纲》第九到十六条的办法，实行自下而上的自治选举制度，最后举行省的国民大会，选举省政府主席和委员，再由国民政府加以任命。

第六、政治会议议决并执行，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重行选举，其在十年以前产生而现在早已失去时效的旧代表，和所谓当然代表，都应该一律取消。

以上六个条件，可说是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条件，也是最低条件，倘然执政党还不肯答应下来，那末，事情绝对不是国共斗

争的问题，而是执政党和全国人民大众斗争的问题了。执政党到底要不要有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要不要有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要不要真正从事建国的工作，要不要真正奉行国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遗教，都可以把这次政治会议的成功与否来做一种考验，都可以把这次政治会议内容的充实与否来做一块试金石。倘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那末，除了表示执政党的自绝于人民大众以外，更没有第二种可以解释的理由了。

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并不是中共的党员，这应该是大家所知道的事情；对于执政党，关系太复杂，为了抑止情感起见，现在姑且不谈。我最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目的是为了努力于民主政治的促成。所以，我在今天，我不仅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来讲话，而实实在在是以一个中华民国老百姓的资格，代表全国人民大众来讲话的。我想，人民大众的事情，除了应该由人民大众自己来解决以外，恐怕没有第二种办法了。如果执政党还不想自绝于天下后世，我相信我的话是可以贡献给他们，而让他们来立刻议决并执行的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原载1945年10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

贡献一个新的建国纲领

刘王立明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来临了，在这日月重光的今日，不但八年来惨遭日本残杀、威凌、侮辱的我国人民，感到愉快，“普天同庆”的欢声，正在震撼着整个乾坤。“桃符除旧”，“万象更新”，一年一度新年的新，在人类社会里，应该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成就。人为万物之灵，但同时又脱离不了宇宙，“顺天者存”，是则为着我们的生存，此时此地，我们应该更新，彻底的更新！

我们急需要的是和平，内战只是民族自杀，坚持内战的人，将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公敌。近几月来，各地同胞们呼吁，昆明青年烈士们的牺牲，以及一切的反内战的行动，也就是为了这个共同的认识。

内战，姑且不论它的罪恶怎样，打也是打不完的。北伐以来，国共两党以武力相见，如今已二十年了！论年龄，就是一个孩子也在成年，打的一套，为表示成熟，也必须停止。

政治协商会议是讲理的办法，是成年人的作风，应该早日举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大家来更新一下。全国人民对于他的及早举行及他的成功，均在馨香祷祝；友邦人士，为了同情我国老百姓的遭难及巩固世界和平，也同样的热望着。

这会议将来应该讨论的范围必甚广泛，但我希望他至少能有两个成效：

一、国共双方即将下令无条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先决问题）

二、在不妨害国民党法统之下，产生一个建国最高权力的临时联合性的机构，其人选应由各党派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充任之，但人数不必过多。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将政治协商会议，增加他的权力，变成这个机构。这机构有决定国策，改组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署及任命首长之权，在其拟定之建国纲领内，应包括：

甲、改编所有军队为国防军，将其数目减至五十万至一百万，并改订学生军事训练。

乙、保障人民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取消特务，释放政治犯，解散集中营。

丙、制定国家预算，国家收支，绝对公平。

丁、确定民营、国营工业，平均地权，以求经济均等。

戊、信仰自由，教育彻底改进。

己、选贤与能，所有机关，一律为女子开放。

庚、修改宪法草案，及选举规则，由各党派共同召开国民大会。

辛、本独立自主之精神，促成美、苏、英等国之互信、互助，彻底合作，以巩固世界和平。

辛、治国如治家，本此以循，实在无多大困难，关键就在大家能不能以诚相见，大公无私，认国家利益应超过党派的利益，反应超过个人的成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愿出席政治协商会议诸代表，彻底了解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及呼求，历史的趋向和

友邦的期望，大刀阔斧，在民国三十五年元旦，立一个宏愿，在本年除夕以前，善用时机，为中国开辟一条新路，使他能入一个新的纪元。

（原载1946年1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心问题

何 公 敢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各方提出了许多问题，要使这个会议不至徒劳无功，似乎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心所在，集中精力，求其实行，一个议案能够实行，纵然不能说其他问题便随着迎刃而解，而找出一条道路可能影响其他问题较为容易解决，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政协会议，在表面上固然可分为许多问题，事实上是彼此关连是无法分开的。他的中心问题，抽象地说，只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这样抽象的说法，是没有用的，必须找出具体的方案，使其能够立即逐步兑现。

应该认做中心问题的具体方案，无须他求，已经列在各方所提出的问题里面了。——这便是“地方自治”问题。

地方自治这四个字，在前清末年，已经闹过了。训政期间，也说得满热闹，已经成了烂调，许多人甚至厌闻了。但是，我们把问题仔细地深刻地考虑一下，便可以发现地方自治的兑现，即省、县、乡民主政权的成立，对于当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治本的办法，其最大的意义，反在于含有最丰富的、最微妙的治权的妙用。即可以促进政协会议有关之其他问题的解决。

一、对于停止内战和实现团结的关系。内战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不消说，是有其密切关系的。在各省一律实现省县政权的做

法底下，解放区政权问题，可在公开的民主竞争的方式中，自然解决，正所以消灭内战的根源，实现团结。

二、对于全国人民获得自由权利的关系，在经过政协会议议决，由中央明令各省县，准予自动造成自治政府之环境下，各省县人民至少必须获得以自治为中心之各种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这是当然的结论。同时，还可以使民主运动，从争取县乡政权及竞选县乡长运动，展开为自治和省长竞选的运动，唤起大众，向有实际切身利害的政治途径上去斗争，而一切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的知识份子，自会竞争下乡领导，开展了最广大的民主运动，不断增加民主的力量，以适应国内和国际的民主要求，而促其早日实现。每一乡或每一县，民主政权成立后，各该乡该县人民，自可获得更大的自由权利。否则政协会议代表们，尽管焦唇敝舌，不断会谈，倘不能早日为地方民众取得若干自由权利，则不但不能祛除一部份人们以政治协商会议为“花瓶式”会议，甚至认为“分赃式”会议的疑惑，且无从早日取得更广大更彻底的民众的支持。

三、使政治民主化得着提前逐步进展的步骤。政治会议虽然可以算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开端，但政治协商会议及至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都不外是民主化应有的过程，并非民主化本身，而民主化本身，实在于逐步“还政于民”，举凡各乡政权，还诸于民，算是民主化的一步，各乡政权还诸乡民，又是一步，全国政权还诸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才算是还政告成。政府所要还诸人民的是政权，吾民所要求收还的也是政权，并不是某种会议、某种大会、或是黑字白纸的若干条文。我们所以坚决主张政协会议应以促成省县民主政权的实现为其第一步中心工作，一方面是使民主化的工作，可从“小处下手”，易于“提前”兑现，且可能“逐步”进行。

并可以此为是否“民主化”的测验器；从纵的方面言，可以测验民主化的高度，从横的方面言，可以测验各党派对于民主化的诚意。而国内团结是否能够实现和军事问题是否可以谈判解决，实以此测验器的纵横表现，即以民主化的高度和各方所表现的诚意如何为其解决枢纽，绝不在于口舌的动作和言语的交换。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以形式的民主开端的政治协商会议，极端珍视。但会议所会遇着的问题，为改组政府、国民大会和军事问题等等。比之地方自治，复杂难决得多，我们深恐政协会议陷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反覆变论的漩涡中，反把简单易决的问题即地方自治问题忽略搁置，而民主化的实际工作，反而无从开端。

四、对于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的关系。最能表现全面民意的国民大会，自应以省县民主政权成立后所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国民大会为最合理合法，而真正表现民主的政府，亦以由这样国民大会所选出的为最理想。否则无论如何形成的国民大会，俱不外是过渡性质的国民大会。假定政治形势只能出现这种大会，他的职权，自应以制宪为限，宪法内容当然必须有“省得制宪”的规定。且此对国民大会的进行，应与县乡民主政权的进行同时并进，而以县乡民主政权下所选出的代表，为实行国宪所定省得制宪的代表，再由各省民主政权下所选出的代表，形成国宪所规定的国会，实行选出国宪规定的全国政府。

但在这样正式选出的全国民主政府尚未成立以前，为着由下而上的民主化工作，必须由上而下的民主化工作，互相配合呼应，自有民主的改组政府的必要。其最高限度，为由协商会议，转变为代表政权的最高政府会议，最低限度，为使过渡期间的政府，足以表现堪以促成由下而上之民主化的公正实现，同时使改组政府的工作与实现地方自治的工作，亦应同时进行，不能因此废彼。

又无论如何程度的政府改组，其共同纲领，应以实现地方自治，即首先造成民主的政治机构为其中心任务，不宜妄想许多政劣改革都能藉以推行，反而自陷于泥淖之中。

五、对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无条件停止内战，自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前提，边说边打，自不成话。但更进一步的军事商谈，在政治民主化未能逐步展开，表现各方的诚意以前，在猜嫌未释谁也不肯放下武器以前，与其空言无补，何如专门努力于前提条件的成熟。故就国民的负担能力言，固然极端希望全国军队能随着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而逐渐缩编。但以现况言，反以暂照原额与原有编制，暂留原地，较为适当。真正的整编，势须留待政治民主化之后，方能作公平正确的解决。吾民宁可再忍痛负担一些时期的官兵给养，不忍再观国内同胞在任何理由下自相残杀，与一般人民无端波累不可估计的损失。更从世界科学进步与战争技术言，中国的程度实在相差太远，故从真正国防建军观点言之，则在人才与其他物质条件尚未具备以前，实属无从谈起。所以政治问题解决后，国中军队实在应当尽量缩减乃至可以暂时无有。将来建军，亦应在其他建国工作上了轨道之后。而军队国家化应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一语，无论从最近及较远将来的观点言之，均应正确。所以我们侧重于民主的政治的机构完毕以为一切建设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完成，实为完成民主政治机构的根本基石。

六、实现省、县政权的具体办法。以上所述，为地方自治对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各方面的作用，兹再将可由政治协商会议即行提出的具体办法，略述如次：

(1) 由国府明令全国乡镇，准予人民自动选举乡镇长，实行自治。

(2) 各县中实行自治之乡，达到半数以上时，得由各县选出县长，实行县自治。

(3) 各省中实行自治之县，达到半数以上时，得由各县选代表，组织省宪会议，按照省宪，选举省长，实行省自治。

(4) 各省、县、乡长的选举，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人民直接普选，其候选人，由各政党或民众团体推定之。

(5) 各省县乡选举时，由政治协商会议推定各省县之选举监督，由国民政府任命之。

(6) 为使地方公正人士肯出面担任县乡镇长，并为永远禁绝摊派一新自治面目起见，应规定以田赋及其他可靠之地方税，尽先尽量拨充乡镇及县自治政府，因确保其财政基础，因此而省预算有不足时，由省另筹或国家补助之。

(7) 明白划定省、县、乡自治政府之权限，使其能各就权限范围内，发挥自治能力。

(8) 省县自治，于政治协商会开始时，即行议决实行，并明定期限尽速完成之。

政协会议代表，固由各党派所推定，但其本质，应为代表全国民众，不只是代表某一党派，我们深盼其以全国人民直接有关之地方自治的实现，作为该会议的第一步的中心工作，以慰天下之望。

(原载1946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我的答案

施复亮

一、我以为要使内战停止，必须具备两个根本条件，第一是要任何友邦都不支持中国任何方面来反对别一方面；第二是要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派，特别是全国广大的无组织的人民，立即一致团结起来，表示反对内战的意志和力量。要使团结能够实现，第一必须国共两党一致承认人民的利益高于党派的利益，认识人民的力量大于军队的力量，知道违反民意、不肯团结，结果只有自取灭亡；第二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第三必须所有同情我们的友邦一致明白表示，它所愿意援助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不是任何一党一派及其所组织的非民主的政府。

二、要使人民能够获得各种自由权利，第一必须立即废除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第二必须彻底解散一切特务组织，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第三必须立即结束党治，改组各级政府，从中央起到乡镇保甲为止，一律加以彻底的改组，以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其基本的任务；第四必须所有的民主党派都站在第一线上替人民争取各种自由权利；第五必须立即废止新闻垄断政策，使各报真正享有采访自由和发表自由。

三、第一步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真正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使其代行国会职权。第二步由这个会议决定改组行政院，国民党员至多只应占五分之二，其他党派（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至少也应占五分之三。第三步由新行政院商得政治协商会议同意后，普遍改组各省政府，在国民党占优势的省分，应容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参加，在共产党占优势的省分，也应容许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参加，以保证各项民主改革的彻底施行。第四步由各省新的省政府依据上述同样的原则改组各县政府，并由县政府积极推动彻底的地方自治，根本废除保甲制度，实行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乡村自治，以建立民主政治的优良基础。同时彻底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积极筹备于一年以内召开真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

四、要使现在的军队真正做到国家化，其先决条件是要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中间派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号称国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号称人民的军队，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双方都是党军，即党所控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国民党，等于国民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共产党。这不但是一个有关双方生存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是违反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谓军队国家化，必须国共两党的军队一律同时交给国家，而这个国家，必须变成人民的国家，不是一党或一人的国家。简单说，必须先把我们的国家变成真正的“民国”，不可依旧是“党国”或“君国”。要做到这一层，首先就要改组我们的政府，使它变成多党参加的比较民主的联合政府，再由这样的政府以公平合理的办法来裁减并整编军队，逐渐使党军变成国军——名实相符的国军。在这整编的过程中，第一不许任何党派在军队内复党

团的组织和活动，第二要普遍施行一种新的超党派的保国爱民的民主的政治教育。

五、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应当以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为中心内容；在政治方面，应当特别注意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及人民行使政权的方式（建立各级议会）；在经济方面，应当特别注意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准，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防止官僚资本的垄断，并应迅速以和平合理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

六、国民大会的代表，绝对应当根据无限制无记名的直接普选法产生，并且应当设法使工农及妇女代表有多多当选的机会。十年前所选出的旧代表，即使完全合法合理，真能代表十年前的民意，也决不能代表经过八年抗战的普遍要求民主的今天的民意。十年前的少年，今天已经长大为青年，成为民主政治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去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要决定今天的政治，必须要问今天的民意。谁害怕今天的民意，谁要保持十年前的旧代表，就证明谁不愿意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切要争取真民主实现的人，对于这一点绝无妥协的余地。真民主与假民主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明显。假使这一点不是真的，那么其余一切都会是假的。只要有真正的国民代表，自然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大会的职权，制定人民所愿意遵守的宪法。

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中间派（包括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具有极大的作用。中间派虽然没有武力，但有广大的人民作后盾。我们很殷切地希望中间派的代表们，一致地认识自己地位的重要，坚决地为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原载1946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要真正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他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末，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正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的；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看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且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话，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是假是真，我们卑之无甚高论。

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能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最后，我觉得十二月二十五日报载全国工业协会所提的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他军事政治大量的意见，很合实际，亦是今日人民最低限度之要求。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要求，或者说，真正民主之实施有了初步的保障了。

（原载1946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个心理卫生工作者的意见

丁 瓚

在全国“引领而望”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举行的前夕，承“新华”提出几个有关问题征求意见。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我，对于所谓政治自然是个外行。不过年来从实际工作中时时都感到要是没有一个容许科学发展的民主和平的社会环境，那末所谓科学研究不是个空幌子也就只有被绞杀而已。特别是从事于矫治心理病态的研究和实施预防心理病态的心理卫生工作的我，在门诊，在咨询工作中，不知看到多少我国封建落后的社会病态吞噬了许多善良的同胞心理健康的具体事实了。基于这样的事实和观点，我想对“新华”所提的问题写出个人的认识，怕不会被认为是“出位”之言吧。

政治协商会无疑是实施民主政治的起点。但是关于他的职权，似乎只看到许多讨论而还没有正式的公告，我想民主政治的原则，在现在怕没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的，困难的似乎是在于民主政治原则的确切的具体的实施，使人得着民主国家中所应享受的自由和权利的实惠。关于这一点我想不仅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对于各方应具有约束力，并且应该由它来具体的执行，“扩大政府基础”的工作。它虽然不是由人民普选而产生的，它不能代替民主国家的议会。但是它包括了多么能代表一部分人民意见的国民

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无党派的公正人士，所以在目前谋“结束训政，实施政宪”的时期中，由它来执行“扩大政府基础”的工作，是比较公平而合理的办法。由它经过协商的方式而产生的民主的并且执有统治权力的政治机构，才可以确切的保证民主政治原则的实施，才可以使人民有“没有恐惧的自由”来发扬真正的民意。否则“军队有开枪的自由”，警察有禁止报纸发行的自由，特务有暗中捕人的自由，那末老百姓便只有被逮捕，被幽囚，被威迫，或者被扣以“叛国阴谋”的自由了。那还从那儿去找到真正民意的反映呢？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应该具有“扩大政府基础”而组织临时的民主政府的职权。

内战的真正停止，自然要握有实力的国共两党真诚的重视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吁而经过协议的方式才能实现。但是人民的监督依然是很重要的。目前除由国共双方共同发布停止一切战斗行为的命令，政治协商会议应该立即组织停战督导团，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公正人士出发到各战区切实监督。同时应该调查：（一）某一区被某种军队开入确实日期。（二）军队开入时的军事及政治方面的情况。（三）军队开入时及以前以后的敌伪的情形。（四）军队开入后的人民生活情况。这些情形只要督导团虚心向当地人民打听是不难得其真相的。这种真相的公布，虽不一定要为算旧帐的根据去追究谁是内战发动者，因为“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去追究也无用。但是公布一下，使人民真正知道一点事实真相，也许让人民心中有个是非的准备。特别是敌军缴械，伪军解散的实际情形，人民到现在还没有第三者客观的报告可资参考。盟邦也认为敌人势力在我国的彻底消灭为安定世界特别是远东和平的必要条件，那末这等资料的公布对盟邦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参考。内战停止了，民主的政府成立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获

得保障了，人民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末有普选的地方自治机构才可以根据真正的民意来产生。在这时各党各派的政治集团才可以在无拘无束的竞选运动中作政治竞赛。由地方自治机构中由下而上所产生的国民大会代表，才能开出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来。这样的国民大会才能相当于联邦的议会。在这时全国的军队不分党派关系的完全集中于联合统帅部加以共同的一体的编整。一面由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国家军队的政治教育纲领，切实施行，一面由联合统帅部会同各种军事学术专家共同从事国家军队的编整工作，例如军士军官的编裁，应该应用科学化的各项军事心理测验来定去留，各兵种的士兵的选择应该应用军事心理学中的能力倾向测验来挑选。其他一切军事的训练都应该根据科学方法去实施，这样不但有了国家军队，并且有真正有近代化科学化的国家军队。这种科学在军队中的应用已经不只是理论了，盟邦近代军事科学的应用，已经给我们不少的可贵的参考了。只要我们有谋国的忠诚，国家军队的科学化是不难实现的。

(原载1946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几点意见的简述

伯 韩

承以八个问题征求意见，我仅能从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及国民大会三问题提出几句简单的话。

一、关于政府改组问题。我主张即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代替战时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及战前的政治会议。国府五院及各部会主管人名单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商决。国民参政会毋庸继续设立，如论为其中有些专家应该参与国事的计划，不妨把他们延揽起来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顾问团。至于各省地方政府，应以民选为原则，暂时不能实行民选的，其人选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商定。

二、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以为特别应强调“军队民主化”，这一原则的具体化，除实施公平的整编外，还应包括（一）宣战媾和之权归于国民代表大会，军人只能绝对服务它，对于军事统帅以下指挥人员，只是为执行国民代表大会之决议而服从之，即“相对服从”，如果指挥人员发布违反民意的命令，得拒绝服从之；（二）在目前阶段，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应属于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即由该会议推定军事委员会执行之，此委员会应包括国共双方及第三方面的代表，旧有的国共双方的一党军事委员会都应取消，将其职权移交新的军委会；

(三) 军事人才公平使用，不论出身派系，过去以同乡同学等类关系而形成的派系组织，应该彻底消灭；(四) 军队内不得有党派组织，但军人应有讨论国家政治的自由，任何党派的宣传都得进入军队，任何人不得依一个党派立场而封锁军队对政治宣传的接触；(五) 军中文化教育应按上项民主原则，积极地加以发展，士兵人格应被重视，生活应加改良；(六) 地方自治政府得组织保卫家乡的士兵，其指挥人员得由当地选定；等项。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我以为国大代表应该重新普选，旧有的选举法组织法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加以修改，这都是不可不做到的，否则将失去民主国的面子，以“还政于民”为目标的国民党，信用也将根本破产。不过为了顾及事实问题，我主张各党派于竞选过程中先来个绅士协定，共同保证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保护民选新政府的举国一致性。第二点实行的办法可以仿照共产党在北方所行的“三三制”，商定一个适当的议席比率，不一定三三，或四四，或五五都可以，到了选举揭晓后，得票最多的党派便自动让出席位来，使后补当选者依次选补。这种办法与英美政党政治的精神不合。但为了适合中国目前由内战过渡到和平统一的特殊情况，我以为不能仿效英美国会多数党的一种宪政，只能施行举国一致性的协商宪政。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为政治协商会议努力

令孤玄

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月十号召开了。最近读了各方面反映出来的意见，差不多一致的重视这个会议，一致的要求这个会议能够解决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许多问题，使中国步上和平建设之途。虽然过去有不少经验，都叫人骇怕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又象《国共会议纪要》那回一样，一面在《纪要》上签字，一面又在众人面前不顾信誉，干下违背《纪要》的滔天内战，屠杀人民，进攻解放区。但众人毕竟又一次把信赖给予了国民党当局，惟愿他不再自毁其信于众人之前。这说明了众人为了迫切的要求停止内战，热烈的盼望和平，因而对政治协商会议寄与了很大希望，众人这样纯真的信赖着它，并且赤诚的为它的成功努力，国民党当局倘再施任何一种狡黠同欺骗，都是莫大的罪恶。

但从事实上看来，国民党当局显然没有诚意。中共代表团来渝后，曾于十二月十九日向政府口头提出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主张，二十七日又提书面的提议，政府仅在长文中说“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原为政府之一贯期望”，但实际上明明白白，政府却仍然在布置大军，不断进攻，并在这数日来侵入热河省解放区，占领阜新、朝阳等地，而且还要配合古北口方面的国民党军队，

进占承德；这种言行不一致，说的话不对现的情形，实在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大障碍，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立刻诚意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尤其是目前热河的军事更要迅速制止，不然谁还对国民党当局的诚意，有丝毫信赖。还有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也是国民党诚意最好的试金石，早在《国共会谈纪要》中，就对这个问题的，政府有过诺言，然而紧接着来的，却是昆明学生遭受屠杀，上海学生遭受捣乱和打击，北平学生遭受拘捕，成都学生遭受迫害，《自由导报》遭受无理查禁，“服装不整”的市民遭受拘捕送当壮丁……人民集会、言论、出版、人身等自由，仍然是在国民党一面承认之下，一面受到摧残，这显然也是缺少诚意的表现，也是政治协商会议的障碍，希望国民党当局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诺言，真正兑现。

我们觉得中国这种军事独裁的统治一定要改变。我们也同意全国军队国家化。但有些人在那里只大唱中共要交出兵来，可是要中共把军队交出来给那里呢？交给国民党么？那还是不能国家化，而还是国民党化。所以，我们却坚决的认为，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是政治民主化，要把兵变成一个保卫人民利益的兵，才是道理。这使我们必然触及到废止一党专政的政治问题。

人们常常说，这次会议，不能不是有结果的会议。什么是结果呢？许多问题的原则协议，当然是一种结果，暂时息兵，当然也是一种结果，但最最基本的结果，应该是一个联合政府的成立。毛泽东曾经说：“解放中国的两个步骤：第一个，目前时期，经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协议下，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专政变成了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去除内战最基本的症结，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才能把独裁转到民主，才能做到军队国家化，才能真正实行地方自治，并把一切好的协议，和一般民主的共同纲领，真正见诸实施，往下推移到真正的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正式联合政府。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果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咨议机构，没有权力。

因此，我们说，争取和平和争取联合政府的运动，是现在十分紧要的事体，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许多切身问题，没有那一样不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就不只是寄与希望或存着怀疑，而要自己信赖，和自己努力，政治协商会议正是争取和平，争取联合政府运动在目前的一个中心环节，是我们努力着重之点。

我们广大青年，大都来自群众，紧靠着人民，许多底层人民的意见和心声，以及生活的实况，青年们比较熟悉，当人民还没人直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为他们总结，把他们的意思传达到每一个代表那里去，代表们都是愿意而且迫切须要倾听人民意见的，我们实在是代表们和底层人民之间最好的桥梁。反过来，我们当然也要把代表的看法和会议上的情形，告诉我们所结合的人民，让他们自动起来支持合乎人民自己的利益的正确言行，反对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的言行，在会议内容公开于人民面前的时候，让人民为着自己民族的命运，争取会议向成功的路上走。

这在学生自治会，壁报社，青年报刊，座谈会及其他机构中间，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组织过程。把群众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和对于会议内容的批评，迅速组织起来，发表出来，都需要很大的努力。并且根据昆明“一二·一”惨案和上海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被强奸的教训，这个努力，还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然而不论青年学生，或系青年工人和广大农村青年，谁都感受到自己切身的痛苦是因为内战和一党统治的腐朽政治所造成。这种觉悟正在不断的在扩大和增强，在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中，还要继续增强和扩大，我们相信，它将是争取联合政府运动中的重大力量。

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努力之下，从协商走到联合政府，从内战走到和平，象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往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走上去。我们虽然看着顶高的梯级，但也坚决而乐观的重视即便是这低低的一级。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

(原载1946年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的前提

一群公务员

政治协商会议就要举行了，我们深切期望它能成为和平契机，为民主建国前途铺上一条平坦的路。可是会议先要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离开了现实问题，空谈未来的计划，无论何等美满，仍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觉得政治协商应该有其两大前提，大前提解决了，会议才能有具体的结果。

第一、先停战才能谈和平。本月十八日的《和平日报》说：“若一面打仗，一面谈判，简直是对协商会议的最大讽刺”；其实岂止讽刺而已，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愚弄。我们看得很清楚：今日高呼“共产党停止进攻”的人，不就是昨日高呼“戡乱”的人吗？有人说上次的国共会谈不过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这话相当正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一面会谈，一面调兵遣将布置进攻解放区军事，会谈才结束，“密令”已发出，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解放区，《新华日报》已说过许多，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即连政府的发言人也不敢正面否认没有《剿匪密令》《剿匪手本》这些东西发下去，仅说这是新华社造谣云云，这等于抢人东西，被拿到证据，反硬说人家诬赖他。内战之局既已展开，自然双方互有攻占，而国民党将进攻解放区的大事抹煞不说，反把绥包之战大事渲染。我们说这许多话并非在翻旧帐，我们不过是在指出一点，就是人

民在不久以前已经被愚弄过一次了。有了这次教训，对于这次政治协商，自然不能不分外警惕。假使内战不停，则对于这次协商也就根本失去了信心，一个被人民失去信心的政治协商会议，能开得出什么结果来呢？所以我们主张在会议之前，一切军事行动应立即停止，政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应该立刻停止向解放区进军，双方停留在目前相持的地区，静候协商解决，并应由中外公正人士前往监视，不得互越雷池，更不得以加紧进攻的成果来作政治谈判的资本。

第二，先民主才能谈统一。目前有一批反动论客正在高唱“先统一再民主”的谬论，其用心何在，明眼人不难看出。其实这也并不新鲜，抗战以前所唱的“安内攘外”也不是这一套高调吗？结果呢，“内”未“安”而“外”则“攘”到里面来了。目前的解放区是全国最民主最进步的地区，解放区的军队的的确确是人民的武力，国民党怕人民看得太清楚，所以除了制造一些荒唐离奇的谣言来诬蔑还不算，又层层封锁解放区，不让人们看见；国民党不敢和解放区做和平竞争，所以侈言“统一”侈言“军队国家化”，并且以此造成了发动内战的理由。我们赞成统一，赞成国家化，但是反对把好的“统一于”坏的，把民主的“化于”专制，昆明的两次惨案，不都是在“统一”的大题目之下造成的吗？在“统一”之后到底有几分民主带给人民呢？我们鉴于以往的教训，实在不敢轻易相信政府对于民主的诚意，除非民主实现之后，才有真正统一的可能。再替国民党设想，在一党专政下的政治，“训”了二十年，到抗战结束，可说是集中外古今腐败的大成，连他们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是不民主不进步的“官僚政治”（见《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假设国民党确有谋国者的忠诚，这一局面又何足留恋？现在中共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也没有把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看

作他一党的胜利成果，仅仅为了确保中国民主前途，自然不能违背人民意志，任意出卖给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政府，而须交给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假使国民党确有民主的诚意，就应该勇于正视解放区的民主事实，就应该以它为榜样，放弃一党专政的局面，延揽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统一建立于民主基础上，才是真正的统一。

（原载1945年1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 国民政府公布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办法 和政协会员名单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

一、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二、本会议名额定为三十八人。

三、本会议协商之范围如下：

- (1) 和平建国方案；
- (2) 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

四、本会议开会时，以国民政府主席为主席，主席因事不能出席时，由主席指定会员一人为临时主席。本会议之集会，由主席召集之。

五、本会议为审议案件、草拟计划及工作报告等事项，于必要时，得设分组委员会。前项分组委员会及召集人，由主席临时指定之。

六、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

七、本会议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由本会议主席指派，酌置秘书干事及书记，由秘书长派充之。

（原载1946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名单

一、中国国民党：

孙 科 吴铁城 陈布雷 陈立夫
张厉生 王世杰 邵力子 张 群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三、中国青年党：

曾 琦 陈启天 杨永浚 余家菊 常乃惠

四、中国民主同盟：

张 澜 罗隆基 张君勱 张东荪 沈钧儒
张申府 黄炎培 梁漱溟 章伯钧

五、无党无派：

莫德惠 邵从恩 王云五 傅斯年 胡 霖
郭沫若 钱永铭 缪嘉铭 李烛尘

(原载1946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附：政治协商会议分组人员名单

一、改组政府组：

召集人：王世杰 罗隆基
参加人：王世杰 陈立夫 王若飞 陆定一
曾琦 余家菊 罗隆基 沈钧儒
王云五 傅斯年 (十人)

二、施政纲领组：

召集人：张厉生 董必武
参加人：陈布雷 张厉生 董必武 王若飞
常乃嘉 杨永浚 张申府 黄炎培
李烛尘 郭沫若 傅斯年 (十一人)

三、军事组：

召集人：胡霖 张东荪
参加人：张群 邵力子 周恩来 陆定一
陈启天 杨永浚 张东荪 梁漱溟
缪嘉铭 胡霖 (十人)

四、国民大会组：

召集人：曾琦 邓颖超

参加人：吴铁城 张厉生 董必武 邓颖超
曾琦 余家菊 章伯钧 梁漱溟
邵从恩 钱永铭 (十人)

五、宪法草案组：

召集人：傅斯年 陈启天
参加人：孙科 邵力子 吴玉章 周恩来
陈启天 常乃嘉 罗隆基 章伯钧
傅斯年 郭沫若 (十人)

(原载1946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中国国民党：

王世杰 吴铁城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 董必武

三、中国民主同盟：

章伯钧 张东荪

四、中国青年党：

陈启天 曾琦

五、无党无派：

王云五 傅斯年

(原载1946年1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 各方委员及会外专家名单

政治协商会议曾决议设立宪草审议委员会，以便根据该会议拟定的修改原则，并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讨结果及各方意见，汇综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现悉该会委员人选，现已由各方面推出，并公推会外专家十人，共计三十五人，其名单如下：

政府方面：孙科 王宠惠 王世杰 邵力子 陈布雷
共产党：周恩来 董必武 吴玉章 秦邦宪 何思敬
青年党：曾琦 陈启天 余家菊 杨永浚 常乃嘉
民主同盟：张君勱 黄炎培 沈钧儒 章伯钧 罗隆基
无党派方面：傅斯年 王云五 胡霖 莫德惠 缪嘉铭
会外专家十人：吴尚鹰 林彬 戴修骏 史尚宽 楼桐荪

吴经熊（以上六人为《五五宪草》原起草人，大部分并曾参加宪政实施协进会工作）周览 李中襄
钱端升 周炳琳（以上四人为参政员，曾参加宪政期成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工作）

蒋主席指定孙委员科为该会召集人。此项名单，现已通知各委员，并定十四日下午三时，假国民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

（原载1946年2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协代表访问记

浦熙修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前夕，重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分别访问了全体政协委员，并写了访问记，于1945年11月28日起，在《新民报晚刊》上陆续刊出。现将浦熙修所写访问记36篇（访问38人）辑录如下，以供参考。

——编者

访问傅斯年先生

行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不能不说是当前时局的一线曙光。记者为此分访各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第一个被点上名的，是无党无派的傅斯年先生。

傅先生刚从昆明归来。他实在怕这考试，企图用种种办法“避考”。但在接谈的一个半钟点中，多少也使我摸着点边际。

他说：“在去昆明以前，就和张岳军主席说过要辞去政协会议代表职务，并已另举贤达。不想还是在报纸上看见了名字，所幸政府还未正式发表。”

他实在没有兴趣参加这会议。在谈判之初，他曾建议过，首先要澄清政治。但这既未做到，谈判些现实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那么这会议，可能产生些什么结果呢？”

“我偏不受考”，他微笑着说：“不能说没有希望，希望它有些希望。”记者又试着探问：新闻前辈告诉新闻记者的态度要“扬善隐恶”，但我目前找不到善可扬，也不忍心粉饰太平。他对这一点倒是同意的，说：“我在参政会上的言论也完全是暴露性的。”

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逃避现实？“等明春自平回渝后再告诉你清楚。今天你假若高兴谈历史我愿意说。”他介绍记者阅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李剑农著的《中国近百年史》及《中国三十年政治史》。他真正不打算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完全为着校事而忙碌，去昆明是为着就职，下月十日就准备飞平接收，他处理校

务的原则是：伪生经过甄别试验后方可入学，伪教授绝对一个不留，他满不在乎地说：“汉奸们早知道我这一贯的主张，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来骂我。但我怕什么，他们能够扣留我？或把我杀了？昆明联大共二千五百学生，其中清华居多，因其中多数系工学院者，但将来分校将各依学生之志愿而定。全部迁校将于明年四月开始，北大正副教授六十人，到平后当然又须增聘。”

自学校又谈到了国际，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一二十年后的事情，美国人民不想打仗，苏联也受害太深，需要休息，那么我们中国人又何必要自相争吵？

在这满处都是火药气味的时候，傅斯年先生这种发人深省的见解，给予一些人以慰勉，也给予另外一些人以正告。（熙）

（原载1945年11月2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东荪先生

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是前日和张公权氏同机自平来渝的。他等候了飞机十多天，还是老朋友把他带来。他来渝的目的不仅仅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而且想藉此看看老朋友，并和家人团聚，他的四个儿子都在内地读书。

抗战初年，他曾到过汉口参加国防参议会。后来觉得开不出什么意思，想着还不如回北平燕大教哲学，工作意义要大些。自从那时回平后就一直没出来，第一二届的参政会没有出席过。在平最大的工作，就是遣送学生到后方。以后在一九四二年燕大被迫解散后，就以此为最大的罪名而被捕。判决徒刑一年，缓刑三

年，坐了半年牢才出来。

他说：中央接收人员在收复区未能得到人心，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个头来。在公共场所百分之九十五摸起来没有不感喟的。当然对共产党也不怎样好，因为听说他们破坏了交通，空运部队抵平，学生们曾去机场接了三个星期。日军还有六万人未缴械，把守城门的还都是他们，伪军早就重编为国军系统。中央这次前往接收，都是用的一些小脚色，掉换下层的人，于是大员们空空在上，不能指挥，只能听下面说的去做。引起人心厌恶的，不仅物价高涨，还有“五子登科”之说。最糟糕的是在准备银行不存在后，还发行了五千元一张的伪钞。与法币的比值虽公布为一比五，而实际上仅一比四点三，因为伪钞还可以流到乡间兑换。甄审伪生的办法，一套都办不通，结果只好全部承认他们，教职员也全部发聘书。其实办法甚好，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为什么伪警官学校学生全体录用，而其它的学生就该甄审，教职员也组织联合会响应。

张先生对于国事的意见，认为政府和共产党都应有所修正。今天的政府应真正施行民主。国民党该做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底下的政党。共产党要修正的是军队国家化。但这要双方同时国家化，如一方仅说不在军队中设党都是不行的。中国无需太多的军队，该赶紧缩编，将来的国防是建筑在集体安全之上。

张氏对于东北问题的看法是：认为要同等的注意到对苏联的关系。

他住在上清寺特园鲜家，他愿意朋友多去看他，因为他不认识重庆的道路。（照）

（原载1945年11月2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孙科先生

昨天大雨的清晨，记者踏着泥泞，走上嘉陵新村访问孙院长。他将是政府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之一。

记者首先访问马歇尔将军继任驻华特使，将是美国对华政策之改变抑加强？“这时尚不便加以批评”。他说：“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向是不能算错误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本着故罗斯福总统富强中国，安定世界的大原则而推行的，不过推行的方法值得考虑。例如：日本的投降，是一个大问题，日军有四百万人要运送回国，每月以三千人计，也要两三年才运送得完，美国人如何能对此不办一结束？登陆秦皇岛，打开秦皇岛与唐山之间的运输，以煤炭接济上海等地燃用，这都斥为干预内政是不对的。如一切不要他们干预，这仅仅促成恢复孤立主义。那么善后救济及联合国组织，不是美国参加吗？美国国内反对目前援华政策的，一部分是左翼，右派是属于孤立派啊！”

孙院长说，东北问题已经缓和，东北不能特殊化，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子。第三次大战不该有，发明原子弹后，不能再有战争。科学进步，就该走到世界大同之路。

美国对管制日本问题该对苏让些步。朝鲜问题，还该朝鲜人本身团结努力，美苏的撤兵，仅是时间问题。

接着谈到政治协商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该会议的条例是代表人数三十八人，会议决议案交由国民政府主席办理。孙院长认为大家能开诚布公，“扩大共同，缩小不同”是可以取得协议的。所谓受降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都是鸡虫之争。前者不能

总受降，受降的时间性就要过去的。

对于后者，他认为地方政权不能超过国家，国家也要顾到地方，中央与地方要实行均权制，即交通、国防、外交、币制等属中央，其它一切则归地方。政府应采宽大政策，民主要逐步实现。譬如今日《新华日报》的过分言论自由，不就是民主的初步表现吗？！

孙氏表示解放区的“地方自治”，该取得多方面的承认。当然这里面有个矛盾，谁肯去承认的问题。记者请孙院长不妨去各地视察一下，他笑说：“没有三头六臂之力。”他接着表示国民大会的普选，是要等一切安定后，才能举办，明年“五五”召集的，只能谋救补救之方了。

他最后补充了两点：政治清明，还该从稳定币值，平定物价做起。收复区的接收人员并不是人人都坏，也有忠公体国的。“还都日期，大概在明年三月底”，他预测着。

谈的时间虽不少，但他不象过去似的滔滔不绝，这是记者出来后的感觉。（熙）

（原载1945年11月30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王云五先生

王云五先生也将是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代表之一，他与傅斯年先生早被各方公认为社会贤达中的领袖人物，但他们都不肯轻易发表意见，彼此都说先要谈谈再说。究竟王先生比较坦率，他看到记者雨天中赶到商务印书馆，也就诚恳见示他的一番为国忠

诚。

他自称乐观派，的确他的老当益壮，得自乐观，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召集的太晚了，假若早在半年前举行，政治上先取得协议，那么今日的干戈早化为玉帛，绝不会发生什么受降问题。现在虽然召集嫌晚，但总比不召集好些。

由于他一贯的乐观性，他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是怀着些希望的。他认为对手双方既然谈不拢，那么由多方面参加总是好的，中国人“爱面子”，第三者就利用这“爱面子”的心理，把它弄假成真，以制止战争，当然彼此的互信必须建立。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要同时并进的，就好像修成渝路，为什么不能从成都、重庆两头修起，以速效果。当然政府该做的种种民主措施而未做，已经失掉了太多的机会。共产党挟着武器来谈判，终嫌超过民主政治。他认为军队国家化了，受降问题就可以解决，任何军队都该受降啊。他深爱英国的政治，那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常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他们当君主政治转化为贵族政治又达到平民政治的过程中，都是说三分而做了五分，说五分而做了七分。中国则否，满篇条文，而实际上却落了空，例如《五五宪草》，条文太繁密了，其实只要简简单单几条，能切实做到就够。英国的陆海相，也都是文官当的，下面有军事专家就够。他笑着说着，假若中国有一天实行这种制度，他倒愿意当个陆军部长试试。

王先生也十分注意马歇尔特使来华的意义。他说：这是美国特别注意远东问题的表示。马歇尔之来，可以保证不仅为中国问题，日本、朝鲜、东北，都将有个总解决。这也可以说世界尚需以武力保障和平，要求和平的心愿是彼此相同的，所以他认为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计划，仍继续执行。上海馆已恢复印

书。除印教材书外，重庆版的书将全部再版。上海版的教科书，下季也仅敷供应到汉口为止，所以重庆馆照常印教科书，已准备好白报纸。福建连城馆亦已开始印书，因该地产纸。香港损失最大，一时不易恢复。东北原有分馆，惟久隔音讯，正拟派人与中央接收人员同往一查。

关于国事的意见，王先生再三嘱咐保留，故仅发表一部分原则上的问题如上。（熙）

（原载1945年12月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邵力子先生

几个月来参加国共谈判的邵力子先生，将是政府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八代表之一。他深知此中滋味，听听他对于这全国人心所系的会议的意见，将是最有兴趣的。

记者不避大雨滂沱，昨天在参政会办公室里会到了他。他说他最喜抬杠，对左的人要说得右点，对右的人要说得左点。但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偏偏不肯表示意见，他说他是参加谈判的一份子，对外多发言，徒惹纠纷，于会议前途无益。

“那么对会议究竟抱有什么希望呢？”记者对邵力子先生绝不失望地问着。

“政府中很多人认为没有举行之必要，但我认为举行总比不举行好，能谈总还有政治解决之途径。”邵先生却笑着引出了话头。

“政府已经让无可让，在政治上可以做到共产党参与政府，在

军事上共产党必须服从命令，《会谈纪要》中允许中共缩编为二十个师，为什么叶剑英总不来渝？二十个师的驻扎地区，就可以在军事小组中商量。假若说军事一定要和政权合而为一，那就是割据局面。解放区已经成为历史名称。现在再加上进占区更是于理不合。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英法的联合政权，是先有中心而后成立的。地方联合政府决不能解释为国文的地方自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将一辈子谈不拢去。”记者担心地问。

这还须看周恩来回渝后的态度再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要看“会后谈”、“会前谈”的努力而定。周先生定本月10日来渝，此间8日派飞机去接，10日来后必须有几次商谈。会议中谈的将是比较具体的大问题。所以将来是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谈判及军事小组会谈，三会同时并进。

邵先生使苏后，对于苏联的认识清楚，深为人所敬佩。他告诉记者，国际局势，最能影响国内问题。毛泽东来渝是国际合作形势最好的时候。其后，三外长会议失败，原子弹威胁着国际合作，反共气焰高涨。但还会渐渐冲淡的，因为原子弹不可能保持秘密，这违反人道的东西，也不容许使用。况且苏联更不怕威吓，将倔强到底。只要看看苏联的历史，当四面都是敌人的时候，它也没有害怕过。它仅仅激怒各国家的一部分人为止，但另一部分是表极端的同情。苏联自己决不会发动战争，其余国家的一部分人将牵制另一部分人不许发动战争。如此第三次世界大战绝无可能。世界形势既然会好转，中共问题也就不容许长久僵持。邵氏对于世界的民主、和平、团结抱着极端的信心。因之对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也有信心。从马歇尔将军的要访问英苏看来，不就是要安

定远东，以加强国际的合作吗？（熙）

（原载1945年12月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吴铁城先生

吴秘书长开会甚忙，接见记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昨天例外地上午和交际处接洽，下午四时许就在中央党部见着了，并没有经过请见的手续。吴秘书长的谈话，我认为有相当的诚意。

他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怀有信心，他说：“今日政府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耐心，对中共问题自谋解决。会议的成果，要看中共的诚意如何，过去的会谈，不能算浪费，至少彼此之间意见已经了解，为着受降问题，与接收东北及归绥、包头之战，谁在打？谁发的第一枪？事实甚明，《新华》的过分宣传，是于事无补的。总之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

他认为政治会议就是当初共产党所要求的所谓党派会议。今日政府实系应共产党之要求而召集。现在就等着周恩来，同着他们的代表而来举行。只要能解决问题，召集得也不能算晚，所谓水到渠自成。我们将以法理与事实兼顾并筹。就是说政府未尝不能迁就事实，但中共也要尊重国家法令。最低限度要求得到军令的统一。

“假若中共偏不承认这法统，怎么办？”记者有意探询个究竟。

“问题就多了，但总希望无问题，尤其谈的时候不出问题，纵使不幸，也是一样谈。能够商谈总是好的。”吴秘书长再三申

诉政府要求和平解决的信心。“否则何必要谈呢？”他补充了这一句。

他告诉记者政治民主化不是一蹴可成的，这要有步骤，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是要按步就班来做的。国大的旧代表怎么能说不是民选的呢？联合政府不能产生国会，还政于民，决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政治清明，还该从健全民意机构做起。吴秘书长承认今日政府对于各地的选举工作做得不够，他责问记者为什么不参加重庆市的地方选举呢？连新闻记者对于选举都不感兴趣，遑论一般老百姓。他不承认到收复区的接收人员都坏，只是良莠不齐而已。

记得前两天记者访问孙院长的时候，对于昆明学生的罢课，深怪当地军警的愚蠢与措置不当，而今蔓延愈大，大有“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复燃。但外边紧催吴秘书长去开会，不及细问他对此的意见了。（照）

（原载1945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澜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同盟参加的代表将是九人，记者昨日前往访问了该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他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他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胀，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不愧为政治家风度。

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真能达到怎样理想的结果很难说。该会

议原定只谈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问题，对目前最尖锐的内争问题不愿说。在上月十一日的晚间，同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催促召开会议，认为与其双方面秘密商谈军队、地区等问题，商量到明年还是达不到结果的，不如公开谈，或者可以达到反内争的效果，于是双方都赞成迅速召开。

假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停止战争，这决议案就比各方发表的停止内争的宣言的影响要大，这决议案将为国际国内观感所系，双方都将有所顾忌。

“但究竟能不能停止呢？”记者问。

“要看后台导演者。”一个星期以前同盟曾经给在美的张君勖先生打过电报，催他回来开会，同时要他先去会会马歇尔将军，前天已经来了回电，张先生已经见到了马将军，马歇尔表示：“来华将着重中国团结。”所以我想美国或将修正赫尔利的做法。一方面，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停止内战，同时双方也不愿扩大延长，那么战争就可以停止了。他上个星期还和何应钦将军单独谈过，他认为中国今日不该打，也不能打，说到痛心处，何氏也颌首赞喏。

第三者的力量，当然如众所知，是十分微弱的，但我们能够发动舆论的力量，使双方都有所顾忌。

张老先生又说：“共产党八年血战，解放区遍十二三省，要不给他一两个区域受降是不公平的，政府也该结束训政重新来通盘筹划，惟有在联合政府中，才能缩编军队，民选政府，实施地方自治，但这也非要舆论的进一步的鼓吹，才能达到目的。”

张老先生更认为假若一切实际问题不谈，而专谈《和平建国方案》，条文再多么美丽，是要落空的。假若成立了联合政府，国民大会是可以普选的，但他老先生自己并不准备参加会议，打算

让个位子出来给同盟的其他人士。(熙)

(原载1945年12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陈立夫先生

陈部长高庐的客厅里，不愧为艺术之家，各色的沙发坐垫，配着两壁琳琅的字画，显着静雅恬适，正和主人温和尔雅的风度相衬，使我有这感觉的，也许早知道女主人是位名画家。

陈部长每日下午二时起为见客时间。假若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感，每天那张见客的名单，却正是为矫正这旧习惯而设。假若不先预约，门警或许会说不在家。

在这宁静的会客室里，记者和陈部长会谈约一点钟。他首先说：“对于当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非外交家，不善于办交涉。”但是以陈部长在政府中地位如此重要，他对于国事的意见当然很多而值得被尊重。

“战争完了，理应建设与裁兵，而现在不能缩军反而扩军，不能建设反而继续破坏，连几条蹩脚的铁路交通都不能恢复，这实在是违反潮流的事。其实津浦、平汉两路，真正要用武力打通，未尝不可以做到，但政府本着宽大容忍的原则，期待政治解决。”他那温文的脸庞上总含着微笑。

“政治民主化”，他接着说下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少数挟制多数，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上，今日中国需要和平统一，而和平统一先要从军令统一做起，军令统一了，政令自然会统一的，然后才谈得上建设。这也是多数人民的意志。中共

既称崇尚民主，应该尊重多数人民的意志，不应私拥军队，破坏交通，违反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聪明的。解放区因交通破坏与外间隔绝，早已自成为‘束缚区’了，那里的民选政权，谁看见过？谁又知道怎么制造出来的？”他很赞扬赫尔利在美国议会上的声诉，他说：“这真是民主作风。”

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严格的说（他特别着重“严格”两字）这是不合于国民党的建国程序的。

陈部长认为先开军事小组会议，把缩编、驻地等问题先解决，再开政治协商会议，那么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可是为什么叶剑英总不肯来渝呢？军队驻地与政权所在地如必须合而为一，来造成特殊化，那就是割据的局面了。所以中共问题的了结，还是军队问题，军队必须国家化。

毛泽东来重庆的时候，陈部长曾和他谈过一次，后来又和周恩来、王若飞两位先生谈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彼此实在该为建国前途着想，但要谋得政治解决，必须要讲信用，如果像（民国）二十六年的“四项诺言”，那何必协商！

陈部长刚从收复区视察归来，认为收复区种种的病根是“迟缓”两字，应付非常时期要以简驭繁，不宜以平常的手段来应变，但也有责备当局过分的地方。例如上海的纱锭，日本投降前也不过开百分之二十，接收时当然都停了，而现在已陆续开至百分之二十，有人就责备为什么不全都开呢？可是就没有考虑到，交通不通，燃料与原料两缺。昆明的学潮，他也认为如果当地军警能妥善预防，则存心闹事者也就少机会了，为什么在学校里开政治性会议，而学校外面又有军事性动作呢？

最后他说：以一个代表的资格，当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有所成就的。（熙）

（原载1945年12月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先生将是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方面九代表之一。在参政会上有人说，他在发言中最爱提“吾们的领袖”。昨天的谈话中，记者深感他确有番谋国的忠诚。

民主同盟几位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大家都认为国际关系决定国内问题。黄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是演剧的演员，文班或武打，决定于英美苏的导演者，美国即便有钱也不愿打，苏联正向美国借债，也决不会打，国际合作，将决定国共合作，今日的东北问题，也正是英美苏是否合作的表征，这是说，世界情势的演变，与任何一地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日期，一定会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后举行，马歇尔之来，必定有利于中国的合作的。

他对于目前的大局有三点意见：（一）对于东北，希望造成超党派的民主实验区域，这样可以使苏联放心。使美苏双方都不参加成为国际的缓冲区域，对于中国最有利，同时为国内各党派合作实验区域，希望一定要如此做到。（二）国共问题：先从政治中枢做起，蒋主席已准备中共参加政府，假若由这最高的政治发动机关开始合作，那么军队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并且可以长期合作。（三）地方政权问题，比较复杂，必须要尊重人民公意，人民不要

打战，就该放下枪来，人民要回家就该恢复交通。县以下民选，已经不成问题，省的选举，还要加以研究，要兼顾理论与事实。

“那么政治协商会议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成果？”记者又在追问。

“天晴下雨，谁也不能预测，但或者会气压高，是个晴天。”

黄先生又说政治的清明，却要自己努力，与国际无关。譬如一列火车，在走向光明的总方针之下，一切都会跟随着变好的，假若总往黑暗走，则千疮百孔，将无从补救起，黑暗的尽头将是毁灭。但现在能够掉转头，还不算迟。“怎样掉转头呢？”“要人民站起来。”他坚决地回答。（熙）

（原载1945年12月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的家庭生活是恬静的，昨天星期日的傍晚记者去访问他，正是四个小儿女绕膝嬉戏，爱妻在一旁照拂着。他有点耳背，所以他认为不适于开会商谈，况且他始终也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邀请。但记者希望他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听取他一些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估计，与国事的意见。

“最初对这会议并不存有什么幻想，”他说：“双方已经在打，再多些人参加进去谈又有什么用处？但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有所转变，或者这会议会有些结果。”

“贝尔纳斯不是声明对华政策不变吗？”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强大团结民主的中国，是赫尔利把它

弄错了，因而助长了中国的内争，我们可以从赫尔利在参院外委会的声辩中看出。故罗斯福总统是要中国先民主化，不是先支持一边的军队。现在贝尔纳斯的声明与马歇尔的来华，是要把过去赫尔利的错误纠正过来，使中国走上团结民主的轨道。”

“美国舆论在催促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日要收到几百封来信，要求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回国过圣诞节。马歇尔来华究竟怎样做不知道，但作风一定不同。昨天贝尔纳斯的声明中，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在中国由一个政党主持政务，美国态度转变，军队问题也就解决了。”郭沫若先生又补充着说。

有天蒋秘书长也和郭先生谈过，政治、教育、经济，一切走到了山穷水尽，怎么可以不转变呢？

郭先生又说：“一切积重难返，当然不是一天可以达到的，今天解决中国问题，以联合政府方式最为适合，只有通过联合政府才能执行公正的普选，以达到真正还政于民。联合政府也可以说是为还政于民作准备工作，这是国际国内的要求，必须要走这条路的。

“东北问题，当然由东北人民解决，苏联红军如此迅速地解放东北，必是与当地人民配合起来的。今天从天上飞下去的，与地下长出来的，必须彼此折中才好，不配合就做不通。只要成立联合政府，解放区的问题也就不解自解。今日欧洲的所有解放国家都走这方向，这与三民主义并不违背。

“所以我想政治协商会议，不外商讨停止内战，改组政府，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等问题。但一个前提条件，代表们该争取自由发言之权，不要以为蒋主席为当然主席，大家就唯唯喏喏，只让共产党去说话。”

郭先生将以文化界的代表资格参加，所以他特别提出国家必须要看重文化、学术与学者，御用文化的思想必须纠正过来，建国才能成功。苏联的建国是靠他们的学术与文化，英美又何尝不如是？拿枪杆的武人决不能建国，古人早有“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古谚，何况现代国家。但我们今日，学生要遭屠杀，文人是贫病交迫，这如何能建国呢？他更痛斥今日新闻界的不争气，他从来不看某大报。

最后郭先生认为政治能走上轨道，他将到北平去，因为那里适合于他考古的环境，上海的出版事业虽然发达，北平仍将不失为一个文化中心。（熙）（原载1945年2月10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曾琦先生

左舜生先生为我介绍曾琦先生道：“他或者不大合青年人的胃口，但他的道德文章是值得敬佩的。”果然记者昨天见到这位青年党领袖的时候，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胖胖的，表面十足是旧式人物。他正和该党同人围坐聚谈，他们的第十届代表大会刚举行过不久，关于党章与政纲还要在中央常会中讨论，他们这次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五人。

曾先生谈述他的历史说：自“七七”庐山会议起，在汉口举行的国防参议会，接着一二届的国民参政会，他都被邀参加；嗣后在香港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办《光明报》，香港沦陷后，即潜居于上海法租界，后来去北平养病，外间所传曾到过南京是不确的。贫血与气管炎是他的老病。

他认为目前中国唯有先成立联合政府，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并

且这已为内外大势所趋，已到成熟的时机，不久可望实现。

如前天美国贝尔纳斯所说的，支持中央政府，惟需扩大容纳各个方面，这就是联合政府的方式。陈纳德也说，蒋主席早有成立联合政府之意，的确已到了成熟的时机了，所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可能就产生联合政府。成立了联合政府，则军队国家化问题及解放区政权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他更说明联合政府在宪法颁布以前系临时性的。在中国，联合政府过程，将有相当久的一个阶段，但联合政府的形式，是否如毛泽东之《论联合政府》，则尚待考虑。不过可以断定的，蒋主席当然仍为联合政府的主席。

他又批评共产党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他对于国共双方发表的《会谈纪要》颇不满意。他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能纠正这种错误，大家还是商量联合政府的问题，那么这会议将会有结果的。

对于政治清明的途径，他信赖由民意机构来监督，但怎样健全民意机构，他只说应该按照欧洲的竞选方式，并不愿多谈些根本问题。

他希望这会议不仅是解决国共的纠纷，而能扩大为建国会议，他曾以此建议给蒋主席。对于左舜生与李璜二氏之未被推为代表，他认为无关紧要。李先生过去养病在美，左先生愿意党中的干部多选一个为代表，他们不愿由民主同盟指定曾、左、李三人为代表，他们有自己的代表。左先生并将于本月底前去沪筹办报纸。

青年党同人认为今日的反内战运动，只责备政府是不公道的，

所以他们没有参加，他们更惋惜昆明的学生死得太冤枉了。（熙）

（原载1945年12月1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沈钧儒先生

救国老人沈钧儒先生，个子虽小，精神却矍铄，喜欢随身带把小梳子梳拢几下他那飘然的长髯。他是救国会的领袖，也是民主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九代表之一。他和蔼可亲，但那坚强的意志，却常使他为国事，挺身而出。

记者于昨晚访问他于良庄寓所，他白天致祭昆明死难同学，晚间又为职业妇女募捐而奔忙。会他的人又多，每日总要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能安寝。

他爽爽快快地告诉记者：“政治协商会议参加的代表都是有能力，有经验而热心于政治的人士，会议又系应国内国际之需要而召集，不能不寄予最大的希望。但第一必须要大家开诚布公，希望政府纠正对于党派间的敌视态度，公开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民主政治。敌视态度的存在，就是发生内战的症结所在。譬如党部常常发出注意其他党派活动的密令，治安机关给各同业公会的训令，又如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防止民主同盟前往活动。这些事实，必须予以纠正。第二，既有政治协商会议，其他的一些机关如国民参政会，宪法实施协进会等未免抵触而成为累赘，应暂时停止作用。政府应重视此会而以全副精神附托之，因为会中所讨论的和平建国方针，自停战起以至于建国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等将无所不包，所以其他的机构可以简化了。能做到以上两点，

这会议才会发生力量。

至于开会之始所讨论的，将为停战，给全国人民以自由，及《共同纲领》三点。《共同纲领》将是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共同一致能遵守的纲领。会议性质系协商而目的为建国，故最后的目的在成立联合政府，惟有在联合政府中才能解决中国的政局，使军队国家化，产生合理合法的国民大会。

“但联合政府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要结束一党政治，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权。第二，参加的人士，不是作为谘议的性质，而要有实际的行政权。”

最后他坚决地说，今日政府，要不自行改革，那么人民将要起而代之。他响应郭沫若先生的主张，在会议中代表们切不可唯唯喏喏，他是准备着挺身而出的。（熙）

（原载1945年12月12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董必武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方面七代表之一的董必武先生是特从美国赶回来的，他刚抵渝时，自称镀了金，脸庞红红，西装笔挺。但昨天记者会到他时，又恢复那严肃的老态了。

他说，美国是有舆论的国家，赫尔利之辞职，不能不说是人民的意见反映到了国会。他遍数纽约的几家大报说，《纽约时报》的社论是支持国民政府主张援助中国的，但决未提以武力援助。一些通讯社则比较前进，《先锋论坛报》有六篇社论都反对赫尔利

的错误政策，并主张中苏友好合作。《纽约邮报》则完全同情中国人民方面的。《下午报》最反对美国采取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颇注意中国消息，有一天还出了一次中国问题专刊。《世界电讯报》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栏即载于上，对中国问题特别关心。《芝加哥太阳报》、巴提摩尔《基督教箴言报》也都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纽约市在十一月九日并特为中国问题，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召回在华驻军，参加者约两万人，各工会主张召回在华驻军的传单随时在散发。贝尔纳斯这次声明，希望中国成立民主团结的政府，其明确的程度为过去所无。美国的政策确是在纠正赫尔利的错误，但直到现在魏德迈将军还执行着那错误的政策，用美国军火在进攻解放区。马歇尔特使的作风，还在不可知之列。周恩来来渝后，或者会先和马歇尔将军谈谈。总之国际对于国内有影响，但一半，还要靠中国人民的努力。

他并不赞同孙院长所说撤退在华美驻军，是促成美国孤立主义之复活，他认为两国的关系，不是靠军队维持的，军队撤退后，反而会增进两国的友谊，同时他也声明“在战争时，当然欢迎友邦军队的援助，帮助受降也还说得过去，但现在不是去受降啊！”

他和美国朝野的接触甚多，在朝者如华莱士等不愿对政府有什么批评，在野者如史沫特莱女士正在写《朱德传》，太平洋学会的加特、比生两位现已去日，拉铁摩尔也到了日本，爱金生、爱泼斯坦等都曾会到。

美国的共产党因过去白劳德领导的错误，一度取消组织，现在又恢复名称，由福斯特主持。

美国的工潮自战争停止后，因为工资减少，有五十万人罢工，钢铁工人罢工者且达六十五万人，这当然要危害到社会的安宁，最近杜鲁门总统已决定增加工资来平息工潮，这些工潮还不致造

成经济恐慌。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新意见，他还要等延安方面的代表来渝后才能知道，但一般的说，必须先停止内战，但谁在打谁，只要一看战争的地区便知，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对于青年党所说的中共舍弃联合政府不谈，而专谈军队与地方问题的批评，有所解释：

“中共始终没有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政治协商会议还是由国共谈判产生的，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将拟具一个《共同纲领》，来改组政府，组织联合统帅部，组织临时联合政府，再由此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谈判时是各种问题都谈到的，直到现在政府还是坚持先要解决军队问题，可以推想当时谈判的困难。”

“实际军队问题是整个问题中的一部分，要缩编就该整个缩编，先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国民党有党军，为什么共产党的人民自卫的军队就该被剥夺？其实军队国家化，是中共一向所主张的，但要交与民主的政府，非交与另外的党，所谓法统问题，也该顾虑到事实。”

记者问到联合政府的方式问题，他说这还要等延安方面的代表来后才知道，不过拥护蒋主席是毛先生在渝时早就表示过的。

他最后说：“政治的清明问题，单靠一个人是搞不好的，要确定个民主的总方向，方向不定，永远要乱，就好像齿轮相配，自己就会推动前进，各做各的，一定乱做一团。（熙）

（原载1945年12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某代表

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代表，素性谨慎，记者曾往返三次，最后一次还是等了一下午才见到。他的公事忙碌，每日常常要工作到十六小时，因之更觉其发言之重要而珍贵。这里为尊重他的意见，姑隐其名。

他首先告诉记者，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前，必须双方停止宣传，停止冲突。他认为前者还难于后者。共产党因为武力居于劣势，总喜欢以宣传来居于优势。天天嚷反内战以挑拨感情，遂其达到美国撤军之目的。其实事实未必如此，谁破坏交通，谁打谁，有心人一看自明。过去有新闻检查制度，可用以停止双方之宣传，以免破坏感情。现在宣传战既以如此之热烈，故首先必协议双方停止宣传。然后下令停止双方的军事进攻。假若在会议之前不能停止，那么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停止不了，一面谈，一面打也是个方式。

关于各方所谈联合政府的建议，他认为政府是可以接受的。过去就谈过行政院改组的问题，但中共认为行政院权力不够，不愿接受。其实中国不是一权而是五权的国家，各权不可能集中于行政院。不能说权小了。英美的情形，也不是各权集中于某一机构的。

但政府对于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的，假若中共还有独立的军队，中央不能控制，一旦共产党不同意某点意见，而要退出，那

* 某代表为政协国民党代表王世杰。

么适足以造成分裂而发生内战。所以政府必先做到统一，政令统一，或者可以因地制宜，而军事是必须统一的。然后给共军同等的分配。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政府也并不是说一步就做到，总要找行得通的方向走，譬如人选问题，可以不马上换或者由共产党保荐，但驻地问题就不能一定要求在那里，形成割据的局面。政治民主化问题，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太唱高调，需要逐步实现。今日普选实尚有不可能。而四川的选举及各省参政人员的选举，总比民元民二的时候，进步了很多，正在热烈进行中的省县参议员选举，不能说不是民选、说政府民主做得不够是可以的，但确是在向民主之途迈进，解放区的民选政权，政府也曾考虑过以行政专员区的方式来承认。

今日国共问题，关键不在政府让步多少，而在中共是否相信这解决的办法。譬如政府决定了中央有多少政权多少军队。中共决不能藉此巩固地位，进一步再阴谋破坏鼓动学潮，发生地方冲突事件，以图得寸进尺。好像抗战开始时，原定三万五千人，而抗日战争中竟自发展为十万、二十万……。中共必须在既定的范围内，彼此作政治竞赛，为人民谋权利，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达到和平建设的目的。

“对这会议，抱有多少信心呢？”记者又追一步问。“说开了，会议完全是个形式，中共需要借此转弯，政府也未尝不能转。所以不能说乐观，但也不悲观的。”

假若一定要像傅孟真先生所言，要等政治澄清了，才能谈实际问题，那也未免太说风凉话。平心而论，抗战八年是救命的工作，同时要求社会改革，力有未逮、但这八年中，不能不说政治已比前民主。因为一面抗战，一面又要对付中共的捣乱。八年来已民穷财尽，公务员几乎吃不成饭，如何来维持一个廉洁的政府？

所以现在只求不打仗，不再加印钞票，收支平衡了，物价自然不涨。恢复交通，才能恢复战前的状态。（熙）

（原载1945年12月15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罗隆基先生

罗隆基先生将是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方面九代表之一，他是民盟的宣传主委，所以他的谈话最足以代表同盟的意见。

他说目前的大局，既不容许打下去，而中国又非上轨道的国家，也不可以以选举来解决，那么第三条路只有协商，协商的意义是互让互得，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有没有结果，要看双方先想什么，不是先想得什么。一般的说：政府必须准备先开放政权，假若先谈统一，就不会有结果，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双方都交出来。他认为如某代表所说的，彼此借此转弯是不对的，因为这会议，所商谈的，将是整个问题，包括其他党派及老百姓在内，决非仅是国共问题。国家问题也决非两党所能解决，就是两党答应了，其他的党派，未必就答应。

协商的第一个项目，将是停止军事冲突，要停止冲突，必须停止一切军事动员，政府不运军队，中共也就不会破坏交通，假若说今日的军事行动是为受降，那完全是托辞，日本人的投降早已定规，一排人，一营人也可受降，就是文人前往日本也照样投降，只要命令就行，麦克阿瑟就是在军舰上受降的。至于国军开往东北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徒惹纠纷，晚三两个月绝无关系，必待政治解决之后，再运兵，现在不是什么国防问题。

他认为地方与中央的联合政府可以并行不悖，选举要经由联合政府才能公平，训政时期的选举可以说是国民党包办，同样解放区的民选政权也可称为共产党包办，所以都要经由联合政府重新来执行。

但他和某代表相反的，就是说先要有联合政府，军令、政令才能统一，如何才能保障统一，必须得到各方面的参加，与信任，因为不统一，正是一党专政的结果。

联合政府是要有决定国家政策之权，并有执行政府之行政权，并非如过去政府所谓之行政院改组，或成立一个空头委员会，其方式可以和英国的联合内阁相仿佛。但记者再想知道点具体的方案时，他只说：“这两天同盟天天在开会讨论，并准备和各方面讨论后，提到会议中去，这时还不便发表。”

他对于国民大会问题，认为无论普选与否，但十年前训政时期旧代表必须推翻，否则，与中国宪政无益，放弃这个主张就等于放弃民主，民主就是选举，民主同盟宁愿选不上，也不能放弃选举原则。

“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记者有意挑眼。

“中共谈民主，与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相同，当然就合作，国民党谈民主，民主同盟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民主同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罗先生直率地回答着。

他接着说：目前行政的贪污与无效率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竞选，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熙)

(原载1945年12月1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李烛尘先生

工业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仅李烛尘先生一位，第四方面的人物常常表示对政治不发生兴趣，特别是工业界。但今天在一切停滞的状态中，要想工业建国，不得不先希望政治走上轨道。

李先生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但他不能不认为这是一条转变的道路，尽管华北的久大、永利多么需要他，但他得腾出工夫到重庆来开会，他认为会期不会长，下个月就可以飞回去的。

“工业建国”，他说最好是让民间来办，政府应集中精力于农业的改革，华北、西北、河南等地的水灾、天旱，是可以用人力来胜天的，需要政府大规模地兴办农田水利。他在华北时看见过日人大规模的治理黄河的计划，黄河治好，农民将受益无穷，中国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政府必须替农民改善生活后，工业品才有销路。

“蒋主席虽一再宣示国营民营的划分，但在这次接收敌伪产业中，就未能兑现。譬如过去说过大煤矿、钢铁、水力发电等归国营，其余一切交民营，而偏偏这次在接收中，凡是有利可图者都是国营。”他认为政府切不可让这些敌伪工业为平衡收支的打算，今日中国工业界自力更生的条件还不够，必须待政府的扶持，所以政府必须将接收的敌伪工厂，贱价出售，或赠与后方对抗战有贡献的工业家，反正政府也是白得来的，假如这些敌厂一切现成，民间工业家们就可以以此为号召。社会游资多得很，资

金决不成问题，技术也不会成问题，那么机器就可以转动了。

“后方的工业，恐怕真不能维持了，因为请愿也已到了声嘶力竭的时候。”他不胜感慨地说：“唯一的转机，就是希望政府兴办大工程，如修铁路，为四川各县兴办自来水工厂解决引水问题，及开些小型面粉及碾米厂等，这样可以需要大量的机器，自来水的铁管，也能自制，但此时的政府恐力不及此。”

他在华北考察日本办工业，民间凡提出方案，日政府对于资金、地区、交通等，都予以协助。我们迁川工厂之父林继庸氏，虽然对于后方的民营工业极尽扶助奖励之功，但钱少得可怜，常常得不到财政部的通过，这是经济与政策不能配合之果。

他认为今日共产党的做法，确能为老百姓想一想，而政府却把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本末倒置了，发展资本，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政府有能力，就是资本操纵政府，这也是进步的，总比一个党操纵政治在十年以上好，资本操纵政治最多五年一换，你不好别个来，而一党专政，却有背“天下为公”的宗旨。

国民大会问题，他认为切不可马马虎虎，要是普选时间来不及，晚一点举行也无妨，一个健全的民意机关，才能监督政府，参政会百分之八十为国民党员，况决议案也不照着办，有什么意思呢？

他最后说到，范旭东先生前为永利向美国借的一千六百万美金，政府已批准担保，这笔款子打算用在华北、湖南、四川等地办厂，侯德榜博士自津回渝后，将再到美国去接洽。但目前在这不安定的情形下恢复塘沽两厂，已经不易，人、原料、交通都无法解决，塘沽两厂虽由接收委员交还给永利，但因为日人缺乏机器油，以植物油代替的结果，机器要大加修理，原预备征用日本技工的，而彼辈技术太差，此间的技术人员又都因交通阻

碍，无法前往，幸赖一些老工人在维持着工厂。（熙）

（原载1945年12月17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周恩来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延安代表团的来渝，人们都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带了些什么意见，以测衡今后的大局，中外记者都几次三番跑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探询，但他们太忙了，前天下飞机后就到红岩村休息，昨天上午去拜会了民主同盟负责人，下午又要到参政会去，得到的答复是今日（十八）上午十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但我不甘心，我把周恩来先生盯上了梢，从午餐桌上盯到了吃水果，一番诚意，希望能尽迅速报道之责，当然在宾客乱哄哄中，谈的只是原则，一切细目只好等有时会时再补充。

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他坐下来看见了《大公报》社论的标题《先请停手》。他说，这很好，这就是我们所赞成的，大家必须无条件的停手，才能协商，才能前往考察真象，所以他对目前时局的处理，只有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手，政治解决。”所以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停止内战，其次才是和平建国方案、国大、宪法及复员善后等问题。

“贵代表团的阵容为什么如此之盛呢？”记者望了望在座的李澄之诸位先生说。

“和平建国的方案必须依据于共同纲领，必须切合实际，必

须要征询各方面的意见，要各党派，全体老百姓都能接受，所以军事要有参谋，政治要有秘书，宪法要有专家研究，关于解放区问题，八年来在山东工作的李澄之先生及冀鲁边区工作的齐燕铭先生了解的最清楚。”

“解放区的承认与否，最好由人民来判断，事实胜于雄辩，中外人士可以组织考察团前往考察，假若认为那里不是普选，可以就地重新选举。”他驳斥了一般对于解放区的误解，他对国民大会问题，坚持普选，及修改选举法，组织法，宪法草案等，并主张延期举行。

“联合政府的方案，我们已有准备，但这是要在会议中商谈的，这时还不便发表。一般的说，国民政府要成为一个民主联合的政府，各党派、无党派人士都能参加，这种精神要贯彻在所有中央政治行政机构中，党治政府要改变了，要做到古人所谓的“庶政公之于人民”。他答复了记者的又一个题目，但特别谨慎地，生怕说得太具体。

他接着又说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三个办法：

“第一，军队先交党国，再由党国请客，他认为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第二，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党国变成人民的国家，军队再交还给国家，这最为理想。第三，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同时并进，在会议中协商的将是后一种办法。”他又补充说：“军队该双方都国家化，国民党拥有党军就不算割据吗？”

他对于美国最近的对华政策，杜鲁门的声明是表示欢迎的。他说：“中共不反对整个的美国，美国的进步政策，如帮助中国打日本，如最近声明希望中国团结民主，这当然表示欢迎；但我们一定要批评美国的错误政策，对于执行外交政策的人员，也是好的欢迎，坏的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确在转变中，我们欢迎这

种促进中国民主团结的中美合作精神。”(熙)

(原载1945年12月1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叶剑英先生

十八集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将军，也将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重庆人士久望他了，因为早就传说，他将是军事三人小组延安方面的代表，这次想不到他将以双重资格来商谈。

“那么怎么谈法呢？”记者忽然想到陈部长曾主张先开军事三人小组的谈话。

“国内外都盼望中国产生一个民主的政府，老实说，在民主政府之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政府要还政于民，我们的军队也不能以党还党，所以在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有所成果后，军事是个小问题，不仅军事要有小组，经济等问题也该有小组商讨。”他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回答态度十分诙谐，延安黑呢的中山装，敞开着领扣，邓颖超女士在一旁指出，军人服装不整，叶参谋长确实在表示偃武修文了。

“偃武修文”是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他说：“世界以及中国必须和平，他自己就是参加战争的份子，现在要偃武修文。”所以来到重庆商谈，这也表示中共的诚意。

他认为现在战争主要的方向在华中华北，从张家口、承德、朝阳到东海岸的三角地带。这地带的战争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并且要影响世界。杜鲁门总统也表示了首先要停止内战，所以我们要华洋合力来搬转这千钧之重的舵。我们首先要求美

国停止武力支持内战。因为美国政策虽然在开始转变，而其作风却是另一问题，在胜利之后，美国继续装备军队，继续租借法案，不撤退陆军，这就是助长内战的因素，内战越得支持，就越有决心，规模越大。今日美国既表示了转变的政策，我们就要求他兑现，这当然要在马歇尔特使来华之后。说到偃武修文，他说：“今日中共已决心要停战。譬如绥包之战，实在起因于汉奸王英、李守信的进攻。傅作义的军队又配合着从陕坝打归绥、包头，抵达柴沟堡，想占领张家口。于是中共不得不打回去，包围在绥包之间。今天既然要求停战，所以已经自行撤退了。”

“在整个国家民主化中，当然军事最高机构的民主化也包含在内，如成立联合统帅部。”

“至于军事三人小组中，所讨论的将是些技术问题，如就防、改编、编制、装备、待遇、训练、人事、经费问题。如编制为甲种或乙种，一师的人数若干等问题。中央的军队也有美械师或其他师之别。”

“中央或对人选可迁就，而防地不能自由选择又怎么办？”记者试探着问。

“解放区民选政府的承认，将在地方自治中解决。中共的军队，都是从地方人民中产生，所以就防问题，必须各归原位，才合乎人民的要求。譬如河北人民的部队，就该在河北，河南的就在河南，人民的军队应该与人民连系，战斗力才会强，这段历史的成见，要渐渐才能消灭。当然作战时是可以调动的，我们以云南的部队为例，这种调动，最易引起误解；何况是另有用意呢！”他诚恳地回答，但也在避免太具体。

他最后告诉记者，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还有十三人，在解放区被迫降落的美空军人员两年来一共一百〇三人，最近又有十五人，

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中，每团有美军官二十人。关于东北的军事情形，他避而不谈，只说，要尊重东北地方人士的意见而与之合作。

“延安总部是否准备迁张家口呢？”

“那只是一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延安地方好得很，总部暂时并不准备迁移。”

延安的代表们都好像还有一肚子话没有说出来，这是记者的感觉。（熙）

（原载1945年12月1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邓颖超女士

邓颖超先生，恐怕是政治协商会议中唯一的女代表，她回延安两年多，服装早已男性化，连年害着心脏病的原故，面庞好像胖了许多，其实是虚肿，她说在延安两年中，一半学习一半养病，中间开了一个半月的七全大会，最近参加解放区妇联筹备会的工作，中共有三个女中委，她是其中之一。

解放区妇联筹备会的工作有三：（一）筹开妇联代表大会。（二）总结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及自胜利以后达到和平建国时期妇女工作的新问题。（三）宣传与报导大后方妇女的活动及民主运动中妇女的工作。

她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是谈妇女问题的，在不民主的原则之下，单谈妇女的权利问题是要落空的。”所以她要求今日妇女大众一致起来制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关心这会议，来争取做主

人的权利。当然中共既任命她为代表，她愿意充当妇女界的一名勤务员，希望征求各界妇女的意见，或者写信给她，或者约谈都可，这是她特要记者登报声明的。

“妇女为什么更须反对内战呢？”她解释说：“因为内战对妇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农村妇女盼望丈夫儿子回来，战争继续下去，就回不来，虽然已有停止抽丁征兵的命令，而听说各地征抽如故；在内战之下，职业妇女要求的待遇平等，提高地位，改善生活都谈不到，女学生也无从要求改善教育制度，工厂关门，女工失业的危机因而更形严重。解放区的妇女更对内战愤恨万分，他们明白谁在打谁，在她们既得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解放之后，正希望战后的生活能更进一步。”

延安方面对政治协商会议中所要讨论的共同纲领有关妇女方面的意见，如女工农妇、女学生、女公务员、职业妇女、抗属等问题都有建议，当然这还有待向各界妇女及妇女团体商谈。

国民大会问题，也有主张妇女应该争取名额的，但她认为在没有争得普选，不能选举包括各方面的真正民意代表的时候，妇女争取几个名额有什么用处？所以今日妇女大众还该向基本问题上努力，一致要求重选旧代表，那么才有妇女的份。

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没有女代表无关紧要，妇女界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方面的代表提出，这正可以测验那一个党派最能为妇女大众谋福利。

她最后说，妇女运动不能同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分开来，我们要培养妇女各方面的人才，但对自己的一群是该特别关心，同时妇女工作决不该孤立起来，否则将事倍功半。

总之，争取人权为首要，如贝尔纳斯说各党派要有发言权，

其次是女权。(熙)

(原载1945年12月20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厉生先生

内政部张厉生部长是直爽的北方人，他将是政治协商会议政府方面八代表之一，昨天有机会与记者畅谈了两小时，这里值得一提的，他还患了深重的感冒。

他首先为记者正名。他说：一般所称“共同纲领”，实是“和平建国纲领”之误，联合政府之名是不妥当的，政府不能联合，只有党派的合作，国际公认的国民政府的法统地位，参加政府只是人事上的技术问题，蒋主席早就表示过。遵照建国程序，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根据宪法组织政府，大家都有机会参加的，假若说用联合政府执行普选，哪一个党派又真正代表民意？其实政党政治的流弊甚大，远不如我们的直接民权来得完备。譬如政党政治三年一改选，假若在这三年中做得不好，就无法撤换，而我们的民权政治，以区域代表为例，只要这代表不符合民意，就可以用重新投票的方式撤回。

至于国大的旧代表有效与否的问题。这也要兼顾到事实与法理，假若说时间经过太长，那是因为抗战，除附逆者外，一些代表无论在中央与地方都曾为抗战努力过，一旦说要取消了，那么他们也要结党成派来要求，这将更增加政府的麻烦，所以现在补救的办法，惟有在尚未选出的区域与职业代表二百人中设法网罗各方面的贤达，或用保荐，或用选举的方式都可以，未选的区域

中，有东北、河北、平津等地。

他又说，内乱本来犯有大罪，而现在政府为着顾全事实，采取宽大起见，所以要用协商方式来止乱，希望共产党先无条件的停战，政党是不该有武力的啊！

假若说交出武力，你就失掉了保障，那么你我今天都没有武力，不是一起受国家《民法》、《刑法》的保护，法律保障合法权益，对于犯法者，当然不能受特别的保障。

假若说政府用请客的方式，为什么自己是主人，而偏要退居客位。在野为公民，做官为公仆，国家的名器，决不是随便请客的，政府无时不在延揽人才啊！譬如根据《约法》成立的国民政府，过去一些重要部长，都非党员，在参加政府以后，他们才自愿入党，这绝不能解为一党政府。

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只要中共有诚意与信心是可以收得成果的，首先必须承认这政府，而不是推翻这政府，其中的一些法令、细则，当然是可以修改的，惟选举法与组织法则不能，因为要修改，就是等于推翻旧代表，未定案的宪草当然可以研究。

解放区的政权问题，也要等武力交出后，才能予以承认或重选，第一次大战后，要求民族自决的欧洲国家，也都等各国军队撤出后，才开始选举，假若政党有了武力，还有什么民主？

他又说：参加政府的方式，中国旧话有所谓毛遂自荐者，但现在要求自荐的人太多，所以还是按照宪法通过后，用选举方式为妥当。

目前的政治措施，或有未尽满人意处，但这正是进步的现象，假若满意了，就会停留在静止状态中。譬如现在办理各地选举省市参议员，责难者固然纷至，但他认为办总比不办好，因为选举就是一种教育，政府只领导与指示，决不干涉强制，一切毛病，

切不可大惊小怪，在练习的过程中，自然会减少的，像这次重庆市的选举，忌惮着舆论，就比成都要好。

各县的正式参议会已完成百分之七十，省的在国大开会之前也必正式成立，至于县自治的完成及省长的民选，尚待《宪法》颁布之后。最后张部长要我特别提出的，他不赞成缩小省区。（熙）

（原载1945年12月2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章伯钧先生

在特园的“民主之家”中，记者会到了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他将是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九代表之一。一些民主战士们正聚集着商谈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大家认为民主之路是迂回的，会议当然不能希望它很顺利解决。章伯钧先生说：“我们起码要准备拿半年来拖。”张东荪先生在一旁笑说：“我可拖不起，我想很快回北平去教书，否则我的家里要饿肚子。”代表已经访问很多，记者深感，假若要会议进行顺利，这没有枪杆子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很有用处的，诚如美国的《先锋论坛报》所言：“假若没有这些中间份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

章先生告诉记者：民主同盟是个整体，一切问题要求得同盟的一致，因此第三党对出席代表问题，不愿像其他党派似的有单独的要求，不过我们将提出系统的意见，以供同盟的参考，第三党特别顾全农工的利益。

他对于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信心与希望的。他说：由一党专政过渡到宪政，以欧洲为例，必须用协商的方式方能解决。

“打”决不能解决问题，国与国之间，都不能以战争来消灭，党派之间更不能以战争来决定胜利，所以双方必须无条件停战。国共问题的症结，就是一个民主化的问题，假若华北、东北成立了联合政府，就决无地方之争。政治民主化了，军队国家化也就不成问题，只有成立了民主的政府，政治才能走上轨道。

他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有两点建议，希望产生民主的经济会议与国民会议。

他说，在和平建国方案中，关于经济建设及接收敌伪工矿的处理方面，应该成立一个临时全国经济会议，包括各党派、华侨、农、工及学者各方面人士，以民主的精神，来处理善后复员问题，并可作为经济上立法设计、监督的机构，以确定国家的经济与财政政策。

对于国大问题，他坚持重选，决没有折中的办法，假若保留旧代表，这将是百年大计中最大的污点，民主运动者最大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的原则问题，决不能为后世唾骂。

他提出假若国大问题坚持不下的时候，可以仿照民国十三年国民会议，来解决目前政治上的纠纷，这国民会议也将包含各党派、团体、文化、工、农、商、妇女等代表，由国民会议及临时联合政府来制宪，最后再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来行宪。

他驳斥所谓不能违反建国程序的公式。他说：在世界已演进到原子能、人民的时代，不变通是行不通的。中山先生订建国程序的时候还没有共产党，更没有民主同盟，就是马列主义，也将视国情不同而有别。第二，他认为国民党本身也并未严格遵守建国程序。民国十三年国民会议，后来的国难会议，抗战时的国民参政会都是建国程序上没有的。就是中山先生的遗嘱，迅速召开国民大会，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又何曾马上就做了？我们只要

依照原则去做，实施的程序是可以看实际政治的环境变动的。”

谈到联合政府的方式问题，他认为中国式的民主，是要各阶层合作，很难将其他国家的方式，搬来原盘适用。譬如英美式的两院制，上院是贵族政治的遗留，下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这是与封建主义妥协的方式下产生的。国民大会确要比这两院制进步，但在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之下，那么两院制也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他在原则上是支持国民大会，但这国民大会必须重选；如办不到，他认为可以用国民会议来转变，如上所述。

他希望马歇尔元帅来中国，要做到保证美军不参加内战，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中国人民的痛苦，就是战争与不民主。这时罗隆基先生却在一旁笑说：“马歇尔来重庆的第一件事，将是洗澡与呈递国书。”将严重的政治的气氛冲淡了。（熙）

（原载1945年12月22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梁漱溟先生

从事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先生，也是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九代表之一，他认为政治不安定，无从谈乡村建设，所以这一篇谈话，完全是政治性的。

他首先说：“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颇有分寸，一方面态度分明，一方面声明绝不干涉中国之事。假若说得不明白，就不合乎眼前的需要；假若近于干涉，就不合乎国际相交之道。”

“听说这声明是马歇尔元帅自己写好了要杜鲁门总统声明的，这样马帅心里的打算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必将按照这意思来完成

使命。”

“我们政府当局在南京等候着想先晤为快，必定有些具体的方案，马元帅没有多留，想未及多谈，但也不会做不同意的表示，政府或将根据这方案，要各方面去做，而拒绝其他的要求。”

梁先生推测这方案包括四点：（一）改组行政院，容纳党外人士。（二）改组参政会，加多党外人士，扩大职权。（三）明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四）军队国家化问题，由军事三人小组开始筹备，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实行。这几点都符合对华政策的，表面上看不出破绽，要是不察内情，马歇尔是会满意的。

但梁先生说，国内要求民主的各方面，是不赞成，不接收的。因为中国现行制度的复杂，实际上外国人不了解，就连中国人也不明白。他认为中国现行制度，包括好几种性质：（一）集权国家的一党制。（二）自己独创的五权制。（三）瑞士式的委员制。（四）一再拼凑的参政会仿佛西洋的议会制。但实际所谓一党制，党本身制度就未建立起来，委员制也是空的，经年不开会，五权制的五院等于虚设，参政会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东西（实际上一切大小事，由一人指挥，手令高于一切）。例如在收复区，对舞弊接收人员杀无赦的文告，接收人民控告的信箱，这一切都证明监察司法机关的无用。这是中国政治的真情实况。在这复杂制度之下，最易迷糊而看不出来，在这样情形下，改组行政院，与参政会是毫不相干的。多进去几个人，蒋主席还是可以直接指挥，在行政院大家就是吵一吵影响不了他，参政会更隔得远。假若上述的方案，外国朋友认为满意，但对于中国政治却未增进一步。

有人说，这方案虽然民主人士不能接受，但还是估计的太高了。于是记者问：“那么梁先生的方案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民主

同盟已有草拟，将提出会议上商讨，现在尚不便发表。可以说的是，内容并不高，决不破坏政府的法统，仍就保存五院制，使政府接受时决不致为难，但比较上是有利于政治清明的改善。”

“政治协商会议到底可以有什么结果呢？”

梁先生说：“国共两方是当事人，而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如众所知又是如此之无力。但除了四方面之外，还有另外的两方面，就是国际的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力量，今天周围的情势都是有利于和平团结统一的，必须要透过这次会议，才能表现出好的结果；反过来说，假若周围形势不利，自然更无好结果可言。

“我们再仔细分析国际情势确比之四十日以前好多了，在四十日以前有东北的僵局，有美国赫尔利之要回任，而日前莫斯科三外长会谈，中国问题已列入议程，其重要性仅次于原子弹问题，美苏意见接近，对中国和平统一有利。

“另一方面就需要国内社会民众的督促，对政治协商会施加压力，督促国内与国际配合起来，不能空埋怨第三方面的无力量，一定要广大民众来做后盾，谁对这会议存着不成功的打算，谁就是国民的公敌。”

他最后说：“停战，还该先停止宣传战，释放政治犯，从南到北，限制同盟活动的命令必须取消，我们一定要在会前会外多做点工夫，会议席上才能少争执。

会期大概在元旦之后，据一般的估计，会议会延长到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熙）

（原载1945年12月2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缪云台先生

圣诞之夜，正是灯红酒绿，记者却别寻清趣，拜访了云南的工业巨子缪云台先生，他将是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方面九代表之一。炉边闲谈，本该是倾吐一切的，谁知这位“慎言”先生常要使我发窘到“一问三不知”，无论如何也不肯“应考”，但一个钟点里，记者终于没有让他沉默下来。

他最近回了趟昆明，到重庆才五天，胜利后曾应麦克鲁将军之请，为中国陆军总部及美军司令部的顾问，九月间就到了京沪、汉口、南京、衡阳等地协助受降工作，他说：“收复区的坏现象，初期还没有显露。”

他在云南办有个旧锡矿、纺织厂、水泥厂等四十余单位，占全云南工业的五分之一，锡业公司他有资本五千万，其他的共十一倍于此，他自称不是资本家，是国营企业的一个雇员。他这次回昆明，是想把云南事业合并改组，成立筹备委员会，组织人民企业公司，他强调说：这是达到“经济民主”的先声。省政府、省参议会都同意将全省的事业划归地方所有，至少他参加的四十余单位，当然也有例外的，这所谓全民的企业，是在乡镇中各举股东一人，组成股东大会，利润归民，达到自有自享之旨。他认为三个月就可以办起来，所以他最近或将再回趟昆明去。假若中国的工业都采取这办法，就可以均富，这办法是过去龙主席与卢汉主席都同意的。

龙云院长住在李子坝，一月龙云夫人曾来渝探亲，现在又回去了，只有五公子在身边，龙院长的军事参议院的办公室与住家

合而为一，整日清闲得很，缪先生有时去看他，蒋主席也会到的。

他对工业建国是具有信心的，但他说：在一切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还是少谈工业吧，我们先要求得政治安定，才能谈到币值稳定，交通恢复，资金调剂，工业发展必须的一切条件。胜利后云南的工厂也有关门、失业，如钢铁机器厂等，但那里的厂都是原有的多，内迁的少，或者要比重庆好些。

政治安定之道，他寄托于政治协商会议，他认为这不仅是国共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参加的各方面，只要一秉至诚，是会有好结果的。

但问到一些停战、受降、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工业政策的国营、民营问题，他避而不谈，他只说：和外间接谈不多，材料不充分，这一定要等双方将事实提到大会上，大家才能共同决定办法，总希望多顾虑到一些事实问题。但他特别恭维美国，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对于马歇尔特使他还没有考虑到是否要去看看他。

也不知道他预备谁去访问的，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书面意见来，他一定要记者边读边记，话很空洞，一个主要的意见，就是希望公开，希望会议记录每日能准时发表。他说：国是问题，不是少数人可得而私的，一定要多数人都听见，这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代表们才可以依据商谈。

他最后安慰记者说：“今日容未满意，但开会时，必尽量忠实供给材料，决不保留。”（熙）

（原载1945年12月2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申府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九代表，除张君勱先生还滞留在英伦外，昨天访问的张申府先生，已经是第八位。张先生和沈衡老这次本是救国会的二代表，但他告诉记者，目前救国会已有南北之分，过去上海“七君子”一部分已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在沈衡老领导之下。他自己和一部分同志另恢复“华北救国会”，或将更名为“北方协会”，将包括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所以他也是代表另一部分力量的。他对民主同盟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国共双方除武力外，国民党有国际的承认，政权、国库、交通工具等力量，共产党有主义、理论、成绩、人民的拥护、国际的呼应等力量，而今日第三方面，却真正站在真理方面，最合乎世界民主的潮流，只要大家不迷信武力，人民肯做后盾，将发生最大的力量，因为打总不是个结果。

他是个哲学家，他庆幸这次各方面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有四五位专门哲学家，他相信根据哲学的办法，只要大家有耐心，有毅力，而且能够宽容，无论哪方面都不该抱怨，要打破彼此不放心的心理，应互容与互尊。军队与政权决不是一党所得而专的，如此，受降与解放区等问题方可迎刃而解。他更认为政治与军队是分不开的，有人单提出军事问题，这就不是诚意想解决问题。

记者提出最近《群众》周刊上刊登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篇大文章以询张先生的感想。

他认为民二三年和目前的局势对国内都很有利，当局者安心想做华盛顿是可以办到的，但袁世凯不但不如华盛顿，连拿破仑

都没有做成。目前局势在正反双方比民二三年都进步了很多，大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具有爱人以德的心情，希望一点一滴地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当然更希望当局者的英断，不受左右的包围和蒙蔽，开放政权，宽大为怀，真正做个华盛顿。

他对于联合政府的意见，是希望行政院有权，行政机构简化。对于国大问题，希望快开，但认为且不可草率从事。对于马歇尔特使之来华，认为影响于政府者大，而影响于人民者小，因为假若做得不对，中国人民也一样会反对的，但他也相信，美国必须在国共之间找一条中间的生路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他不否认热心于政治的人有政治欲望，但这欲望的发挥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这样才能谈得到合作。在会议之后，他自己并不想参加什么政府机构，将仍旧干他的学术工作，他将回到北方去，在学校里，或仍是北平图书馆，有系统地介绍些西洋学术著作，出丛书，办杂志，以挽救中国学术界的贫弱。总之，讲学自由，必须与政治上轨道互为因果。他现在编纂有《图书季刊》，与《书评丛刊》两种。（熙）

（原载1945年12月2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邵从恩先生

七十八高龄的邵从恩先生，恐怕是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年龄最长者，将是第四方面九代表之一，他携着他的第三女公子刚从成都来，住在川康兴业公司的楼上，他自称多年学佛，已经长素三十年。“那么为什么有兴趣于政治呢？”他说：“小乘佛法是自了，

大乘佛法是度人的。”他抱着救济众生之旨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在民国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就认为北平不可久留而回川了，十四年曾任过四川善后会议的议长。

昨天中午参政会正副秘书长曾邀宴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方面的全体代表聚餐，邵老先生参加回来告诉我说：“空气确实好转，邵秘书长说，双方决可于会前无条件停止冲突，双方面保护交通，先通民运，还有是商农各界都要求增加名额，但尚在考虑中。”会期未定，第四方面也想找个集中的地方。

“怎样能保障永久和平呢？”记者听见能够停止冲突当然高兴，但想到那打打谈谈的作风，实在不敢过于放心。

“这要在会议中商谈，譬如组织各界考察团，谁不对，在会谈中可以随时报告，这会也不会天天开，在促成真正的国民大会后，才算完成任务。”他旧历年要回成都去过年，他想有个三四十天，问题该解决得差不多，假若真还要拖到南京去开，他就不想奉陪，将来要是能够迁都北平，他想到北平，因为那里有他不少佛学朋友，但暂时只是还都，不会迁都的。

这政治协商会议，本是在参政会的建议；孙中山先生说过国民大会之前，必须举行预备会议，这就等于预备会议，解决一些国大的基础问题，及日期和选举等办法，他既然提议，所以必须来参加。

关于承认国大旧代表与否，他不表示什么意见，他只说：“在这会议中，有些问题可取决于大多数，但有些问题必须用协商的态度，取决于全体，正式会议席上，不过是作形式的解决，凡是勉强的事，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有些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就算了，必须全体一致。”

他更说：“过去他是赞成旧代表不作废的，但现在他要听听各

方代表的意见，他希望双方提出事实，在争辩不决的时候，第三者再来调和折中，所以第三者不能先有成见，先变成争辩的目标。”

他对于联合政府的意见，认为只要能代表全民，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中共和民主同盟可以提出具体的意见，而他不能。他认为美国前来帮助中国统一、团结，是可感谢的，但一些具体的做法，还该中国人自己来。

下面谈到中国问题最难解决的一个纠纷。

他说：无可否认地，当前的政府接近于美国，而中共接近于苏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从国际影响到国内，幸好在三国外长会议中美苏已取得谅解，外在的原因既已减少，内部的纠纷就该容易解决，中国的国民性是喜欢安居乐业的，而老百姓都已到了民穷财尽。我们该怎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防止大资本以发展生产，同时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作强迫的改革，这种形式也许就是三民主义，但是要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他赞成周恩来先生有次在星五聚餐会上讲过的中国目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认为中国一定要走这条路才能普遍改造，否则只有打，或者分成几个；既然政策只有一个，那么国共双方是必能合拢来的。

他又说，政治的腐化，也许因为八年战争的关系，没有成立民意机关，没有人民监督，这才使政府自由自便，这是可以原谅的，成立国民大会后，政府必多所顾忌，但现在这种由上而下的政策必须改变，民主政治是要由下而上，以民为主，我们只要光明磊落，往光明的途径走，顽固派也会随着改变的。

邵老先生白发苍苍，耳聪目明，他说记者热心国事，引出了他一片真心话。我敬仰老者，但同时也为一般比他年轻的顽固派而愧作。（熙）

（原载1945年12月2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胡政之先生

胡政之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方面九代表之一，他告诉记者，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选为代表，也许因为在参政会中与傅斯年、王云五三位同志被认为无党无派而与团结问题有关吧。他向来用脑不用口，所以要他发言是千难万难，他承认李璜先生说他的“一切看穿”，所以消极了呢！他的文章常常写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美国归来》也是篇未完稿。他今年五十七岁，他想再过三年就告老退休，不过最近他的工作极忙，要布置各地分馆的工作，联络各地的通讯员，他真怕政治协商会议耽搁太久，因为大家都是工作的人。过年后，他想再到上海去，上海的机器正在装置中，印刷要受制于人，实在最痛苦不过，现在上海版已自十二万份自动减低为八万份。他感慨：“在上海清一色报纸之下，只有一家民间报纸，寂寞得很呢，甚愿《新民报》前去陪伴。”

记者昨天星期日在浓重的过年气氛中去访问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大公报》的办公室里。

他说：“国共的纠纷，因为事实上没摸清，实难做审判官，必待双方在会议上提出正式文件，第三者才好评判。”但他承认，本着同情弱者的心情，有力量的在朝党是应该多让步的。

“该怎样让步？政府如何才能民主？”记者问。

他说：“除国共两大党外，其他的党派，向未公开，其党纲、人物，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也尚待实际的材料。”

他同时认为今日能够让老百姓喊出“不许打”，已经是进步的现象。政治走上轨道，必须大家都了解政治，形成社会的公是公

非。政府的措施，虽然有些地方太坏，但我们也不该否认其中还有不少无名英雄，把坏的淘汰，这是自然的法则，以后只要社会上各种事业都发达，大家就不致群趋做官一途。譬如过去新闻记者不齿于人，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愿意往这条路上走。从政者，需要将自己事业的经验贡献于国家，读书不是仅为着做官，例如英国供应部大臣，过去就是百货公司的经理。中国也许是人才缺乏之故，很早就要出来做事，外国常常三四十岁才是开始工作之年。

他年来在英美的观感，认为美人活泼，而英人持重，在新闻上的表现，美国消息灵通而描写好，英人论断精而报道正确。

“但美国为什么特别关心中国呢？”

他说：“美国国强财富，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大胃口强，他们是想到中国来一施身手，倒也不是真正了解中国。英美文化科学之发达，确是资本主义之光。但中国人的天性是爱好自由主义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确能兼采苏联之民生，英美民权之所长，我们应该真正走上这条民主之路。

他认为中国的新闻记者还该在文字修养上加工夫，英美的记者专门学新闻的并不多，但他们的本国文字一定够用。所以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在普通大学毕业之后，再加以新闻技术的训练就够；新闻系毕业也不是绝对不可用，但仍需要严格挑选。

“新闻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有种种不进步的现象，当然也不能独责今日新闻记者的能力差，他认为中国报纸太重视政治新闻，这是因为中国是官的世界而不是老百姓的。在外国详细报道水灾的社会新闻就能做为第一条。”他更说：“中国国际新闻之多为任何国所无，马歇尔的新闻这样重视，这适为殖民地的表现。一等国家早就降为三等国家了，将来建国，实在还需要

为抗战出过力的老百姓出来做，新闻也常该从这方面来发掘。”

“那么《大公报》的一贯态度是什么呢？”他指着墙上挂的社训说：“不私不盲。”但他也感喟自由主义者的两方不讨好，批评政府，指责中共，都不是讨好的事，所幸新闻记者本不是要以讨好为能事。

他接着答复记者说：《大公报》和政学系并没有什么关系，当年仅仅是张季鸾办《中华新报》时的一点私人关系。其实政学系不是什么秘密的组织，仅仅是几个私人集合，大家以事务为重，自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反袁参加护法政府，继之张群、陈其美等协助蒋委员长北伐，无形中形成了这一种势力。他个人对政治并不感觉兴趣，他对今日的竞选热潮，认为这是民主的初步试验，就是假的，也不足为怪，终有一天会弄假成真的，虽然他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兴趣去参与。（熙）

（原载1945年12月3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杨叔明、余家菊两先生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青年党的五位代表，除党魁曾琦先生已经访问外，还有杨、余、陈、常四位。左舜生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各人的观点各有不同。

青年党的集中办公地点已择定新运宿舍三〇一号至三〇七号，记者昨天就在那里会到了杨叔明先生，但他与黄炎培先生有约，所以匆匆谈了一半，下半截是由余家菊先生补充的。

杨先生一向在成都教书，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应该早开，到

现在开，实在嫌迟了，以致因内战而牺牲如此之大，现会期既定，那么在会前必须有个预备会议，一切会议程序及讨论要点，必须有个准备，正式的会议才能进行顺利。”他对这次会议的前途是乐观的，因为中共代表团阵容鼎盛，政府方面亦考虑周详，且第三第四方面催促团结确具一番热诚。

“对于元旦，政府发表的停止冲突切实方案有什么意见吗？”记者急于想知道这两天举国期待的停战问题。

“中午和董必武先生在中国农业协进会席上吃饭还谈起过，但这必须要等延安的复文来到才知晓，假若中共赞成，其它方面也无庸反对，要是不赞成，前途还在不可知之列。”但他认为最好国共双方彼此互重，该自己解决，不必由第三者马歇尔将军来帮助，不过要是于事有济，这也未尝不可。

这时我忽然想到左舜生的话，他说，好像国共双方都可以拖似的，今天惟有美国人最着急，因为他们负了远东安全的最大责任。马歇尔也曾说过：“中国问题太复杂，比打德国还难。”左先生说：该能不打了吧？杜鲁门声明，马歇尔来华，加之三外长会议的成功，并且贝尔纳斯已经对记者说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内战而低落了，我们为何不反省？但细察双方方案的内容，却还有些距离，一方面要各驻原防，静候调查；一方面要停止冲突，恢复交通，那么运兵东北与热察的问题，谁又敢保险？马歇尔对双方施用压力到什么程度，那还无从揣测。

余家菊先生后来却又补充说：“恢复交通后，原则上当然不该运兵，但中共既未反对由海道运兵去东北，那么铁路上的运兵又相差几何呢？”

杨叔明先生接着说下去：“政府既然宣布此方案，事先必取得马歇尔的同意，在马歇尔的慎重考虑下，双方或可一致协议的。”

关于组织考察团的人选，他认为地区辽阔，倒不必限于参政会或政治协商会议中人，应当各方面人士都能参加。

停止冲突，将是会前之事。下面是青年党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

左先生说过，青年党是主张治标治本分段进行的，治标就在这次会议中商讨，治本不妨在休会后，将来在南京开会商讨，就譬如请客，有的人喜欢一桌子菜一齐上来，但一个个上是吃得更受用些，所以他反对昨天民主同盟的声明，将国大问题放在一起。

余家菊先生慢慢为记者解释道：改组政府治标的三个办法是：（一）改组国策发动机构。现在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战时机构，不适于平时，国府委员会又为养尊酬庸的位置，他们建议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仍然拥护蒋主席的领导，这会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而蒋主席又为国民党总裁，即对党负责，这样可以顾全国民党的法统。（二）由各党派及各方人士参加政务行政机构即改组行政院，同时监察、立法两院亦改组。（三）加强人民监督机关，即扩大参政会的职权与名额，参政会有八年的历史，不能说没有表现，我们希望旧机关进步，所谓政治作风并不是一脚踢开就完事。

左先生又认为三月间可能在南京再开一次参政会，国大的期限倒不一定在“五五”，有人已经提议“七七”，或“双十”。

余先生又申说国大旧代表的承认问题，无关紧要，所以也不愿表示意见。所谓治本问题，该着重在国大要产生的立国规模的宪法，及如何实施宪政。他有两点意见：（一）成立英美式的议会制，这样才能表达人民的意见。（二）成立责任内阁，总统既六年一任，可以用责任内阁补救任期的太长。

总之，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一种君子协定，没有法律的

责任。这会议里商量一些紧急重大的问题，一切基本的大小问题仍该在参政会商论。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也是他们急切盼望的。（熙）

（原载1946年1月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陆定一先生

中共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延安七代表之一。他到重庆来之后，天天在治牙疾。记者昨天中午见到他的时候，正是延安的覆文到渝，他们代表团午后要开会商讨。记者就趁着午餐的闲隙，与他畅谈了一小时有余。

关于延安的覆文，他要留给王若飞先生谈，昨天所谈的只限于宣传办报的工作。他一直在前线野战政治部，所以自称老粗，自一九四二年才回延安，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三年，去年才被任为中共的宣传部长。

《解放日报》是不熬夜的，上午十时齐稿，下午三时出报，编辑部里分评论、编报、采访、副刊等部门、没有广告，可以说是字数最多的报纸，罔野进主编的半月一次的敌情，公认为全国敌情最详细的材料，采访记者也有十几位，但因为交通不便，外乡辽阔，访一位四十里外的劳动英雄就要一整天，他们绝不能向壁虚造，要强调正确。他说：新闻固然要迅速确实，但不得已时，宁可牺牲迅速的。过去一些城市去的记者，极力在克服着这一点，并求得对于农村的了解。后方城市里儿童入学挤都挤不上，但在乡村里则不同，要他们读书等于去当兵，所以常常要先生就教于

学生，教些合乎需要的东西，如妈妈、爸爸、兄弟、姊妹的名字，记帐、对联等实际需要的东西，这种教育的宣传，也占报纸上重要篇幅。

他说：报纸是该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的办法，可分为一般性及具体性两种，前者如停止内战，一些紧急重要的新闻，延安《解放日报》上毛主席所提出的一些任务等，都是头条新闻；具体性是指一般老百姓的切身问题而言，如春耕、种植棉花、扑灭蝗虫，以及劳动英雄、模范村长、医药、建筑、选举等都可以做为头条新闻，在延安对此做了一个极大的改革。至于说中国太注意政治性的新闻，他认为人脱离不了政治，新闻当然与政治有关，只要看这种新闻是否为民众改善生活，使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譬如政治协商会议是为老百姓的打算而开的，这当然是好新闻。吴满有提倡增加生产，为边区人民改善生活，而巩固边区，使边区和外边对比起来好，这也就是政治新闻。但个人的做官发财，要人的来往，这就无足轻重；当然一个重要位置的变动仍有其特殊意义的。

他认为中国记者的能力不算差，自己有一套办法，在重重压迫下为人民而奋斗，设法透露一点真实消息是不容易的，英美记者未必有。譬如一棵树种在肥沃的土地上笔直生长是容易的，但现在要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的生长大，确是不容易。他愿意新闻记者多谈些民生疾苦上面所谓一般的服务，既然有所控制与顾忌，那么具体的服务如路毙、失业、回不得乡等的消息，还都是老百姓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报纸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官僚资本、独裁者服务，是为农工、知识份子、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作报道，从一些小问题，可以反映整个制度。譬如胡世合惨案，师管区要逮捕衣冠不整的人，这原因是什么呢？

他两个星期来对重庆的观感，仍觉压迫深重，为什么中央社的消息，非登不可？没有选择的自由，不讲自己的话，不用自己的消息。

记者提出新闻上扬善隐恶的原则以为询问。

他说这要看对象，对敌人该用暴露性，对朋友该用友谊的批评。

他又说：中共的宣传政策，向以老实为主，毛主席常常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教育党员，切不可夸大，凡真的才算对，要知道革命不是主观能造出来的。

他和政府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在外交部招待马歇尔茶话上会过面，两个人一般高，年龄也相仿，不过一是江苏，一是湖北，吴部长曾对他提议“双方都应取消宣传部”，他回答：“宣传不可主观。”

他告诉记者：其实反共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反共的材料必须真实，切不可像今日的造谣生事，共产党愿意听听自己的错处才好改正，所谓民主就是要听取反对派的意见。上次中外记者团到延安的时候，问起在延安为什么没有国民党的报纸，我们竭诚欢迎重庆报纸前去设立分馆，竞争才有意义，但他们自己不去办，《新华日报》在重庆还不是自己争取的，自己不办，谁又请你来了。

关于目前时局最紧要的关键，他认为系停战及美国干涉内政的问题，前者已经比以前希望多，因为有杜鲁门声明，三国外长会议及马歇尔来渝，以及高树勋的反正，昆明学生的斗争等，但会前是否能停战，还是要看事实的表现。无疑的有一部分人是想拖，如政府发言人公开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要把热河打下，所以在此战争进行中谈判即使有发展，各方面的努力仍不可松懈。至于后者，美国干涉内政以何者为分野？他说：美国帮助中国消

灭法西斯残余，是要表示欢迎的，但不要超过这个范围，我们该以人民的力量时时起来监督。（熙）

（原载1946年1月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王若飞先生

几个月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先生，也将是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他是于年前和林祖涵先生同来渝的，过去曾任过中共秘书长。记者问他谈判的经验如何？他说这种缺乏诚意的谈判，两面派的作风，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但为着大多数人民作想，所以怀着十分的耐心，幸而政府几位谈判的代表都是主和派，并不是主战的顽固派，但他们想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主和。

“昨天中共的覆文与中央的方案有多少出入”？

他说：“第一项中央仅是停止冲突，恢复交通，而没有具体的办法。中共是要双方立即下令停止，全国范围的停止。恢复交通，也要海陆空邮全面恢复，并该撤消对解放区的封锁线。”

“第二项完全同意马歇尔的三人委员会，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十八年来国共缺乏互信，由马歇尔参加或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马歇尔将军曾向周恩来先生表示过：“这三人委员会只限于商讨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撤消四项。决不干涉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扩大政府、整编军队等问题。只要上述的任务完成，三人委员会就可撤消。假若这些问题中国能够自己解决，那么这组织也可半途而废。如何停战，如何停止进兵，及恢复人民的交通等，都将在这三人委员会中求得具体公

平合理的解决。这会或者先开，或者与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开。前天谈判时，政府也问起中共的代表是谁？我们认为假若政府派张群，中共就是周恩来。

“第三项考查团的人选问题，政府只提驻会参政员五人。中共认为应由政治协商会议指定国共两党以外的公正人士，由国共双方陪同前往全国各冲突地区考察。”

“就算能停战，是否仍会重蹈谈谈打打的故辙？”记者仍在担心地问。

他说：“谁打谁，现在看得清清楚楚，杜聿明在元旦广播说十五日要打下承德。其实热河早就解放，那里并无敌人。冀河辽边区是民国二十七年唐山成立的，由冀东扩展到辽西、洮南而达热河。是萧克部队挺进到热河，而李运昌为边区主席。其实无条件停战各驻原防的提议于中共是不利的。胜利后政府军队进攻平津、冀、热、辽等解放区已拿去五十余县。我们并不要求他们退出，是本着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现在双方既然原则上同意停止冲突，而政府不愿立即下令停止，这很显然地，是希望打下热河、张家口，在军事优越的条件下再来压迫谈判。但这种想法是并不能如意的。今天要求和平的趋势有三种力量在压迫着：（一）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力量；（二）大后方广泛的民主运动；（三）国际上已由劝告而警告。十八年的内战，解决了什么呢？”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些政治问题，他认为主要的要结束训政、改组政府，这政府或仍名为国民政府，仍就拥护蒋主席，但内容上必须是民主联合的。其方式，或由国府委员改组，或由国际最高委员会改组，或成立政治会议，但必须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决定权不能属于一党，政府要依据共同纲领来改组，而这执行共同纲领的人选，决不是为做官而来的。

“国大问题，当然要坚持普选代表，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日期是要等上述的决定之后才能定，而尤该着重之点为《五五宪草》，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是比日本天皇还大。

一些主要问题，如停战、和平建国方案，国大等问题，将在预备会议上先商谈。有人说仍要举行参政会，假若参政会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政治协商会议？（熙）

（原载1946年1月5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岳军先生

张群（岳军）主席来重庆，已成为最忙的人，记者几次相约，未得答复，昨天星期特冒晨雾前往，他又匆匆应蒋主席之电召而去了，他站在车旁说：“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时间有空，怎么约人呢？”好不容易午后腾出了时间和记者畅谈约一小时。

他避免正面谈话，他说：“政府只能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假若政府先有了表示，那怎么协商呢？”不过甚为乐观，坐在堂皇的客厅，舒适地说：“四个月的商谈，总算告了一个段落。政府怎能没有诚意呢？这样的艰辛忍耐为的什么？抗战完成，总希望做起建设性的工作，不再有捣乱的事情，所谓老成持国，也该为久远打算。”他接着感慨地说：“我和委员长只差一岁半，快六十岁的人了，为国奔忙了三十五年，这问题关系国家前途太大，所以不得已出任为谈判的代表。”

张主席身体健壮，精神充沛，只有前面一小块白发，假若他自己不说快六十，谁也想不到。有人说他和周恩来先生真是棋逢

敌手，他却谦虚地回答：“周先生比我会说得多呢。”

“国共谈判，在抗战前和日本川樾大使的谈判，其趣味如何呢？”他既避免正面回答，记者也只好另寻话题了。

“和敌人谈判，受拘束太多。国共谈判，终究是自己家里人，吵吵闹闹，这固然是不得已，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必须求得和平的。”

他为我叙述一套历史：他过去曾和委员长在日本同学，是学炮兵的，民元在沪军都督府继委员长任团长，民二在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之下任副官长，第三次革命浙江独立时，曾任参谋长，他一直在西南活动，仅仅在民五为着想再去日本留学到过一趟北方，他否认与政学会有关。他笑着：刚才招待民主同盟代表午餐时，沈衡老说，他曾任过政学会的主席呢，张东荪也是临国会议员，去问他们会更清楚些。他接着说下去，民八九时回四川办警察，渐渐地由武官转入文职，十八年任上海市长，二十三年为湖北主席，战前任外交部长，后来入川为重庆行营主任，之后接替委员长为四川的兼主席。“你不要以为我穿着一套西装，其实是军人啊，就是现在，我仍是为成都行营主任，当检阅军队时仍穿戎装的。”

“文官武职的趣味，比较起来如何呢？”

“这譬如做文章，要看题目的难易。”

我想着：军事问题，还是要军人解决，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原来三个都是军人呢，周恩来先生，外国记者也一向称他为 General Chou的。

听说马歇尔三人委员会，今天上午十时举行第一次谈话会，记者又试着把谈话提回到正题。

他勉强答复说：“马歇尔将军负着要完成受降、撤侨的任命，当然要牵制到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的问题。”

停止冲突和政治问题，现在分着两件事来谈。他说：他除参加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只要时间不冲突，今天午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前的谈话会也一定参加的。

“那么联合政府的问题呢？”

“联合政府是谈不到的，《会谈纪要》上也早就写着参与政府，至于参与的程度如何，尚须商量。”

记者提出假若国大的旧代表承认与否争执不下的时候，听说政府方面折衷办法是：“五五”召开国民大会，承认旧代表，而仅制宪，将来再举行一个重选的国民大会来行宪，这有可能吗？”

他说：“这不失为办法之一，但还未协商，假若就是承认旧代表，也必须扩充名额，所以组织法、选举法仍可以商讨的。”

“蒋主席对这会议的态度如何？”

“他自己来召集、主持，哪有不热心的，不过在条例上规定主席有事时可委托他人代理之，但并没有指定孙院长，不过孙院长为党国元勋有这可能就是了。”

他最后告诉记者，张治中部长回来，并不是做代表的，新疆之事未了，仍要回去的。王世杰部长已决定留下来参加会议，他想这会议也许到不了廿三日就可以结束，他也许仍要从李子坝搬到曾家岩去住，因为上清寺一带已成为政治中心，会议既在国民政府开，而各代表团又都集中于这一头。（熙）

（原载1946年1月7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忙而多病，素性沉静，公余之暇，最多约几个熟朋友谈谈天，他和邵力子、张岳军、张治中、陈立夫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很少接见外宾，王芸生先生告诉我他每天要吃三片安眠药片才能入睡。昨天记者意外地在美专校的寓所会到了他，“在重庆我还是第一次接见新闻记者呢。”他笑着说。他提出以前他做新闻记者的经验，他说记者不难于求得新闻而贵乎能割爱，如果新闻记者能遵守约诺，把不必发表的不发表，那么被访问者就可以畅所欲言了。记者本着这个原则，原该不发表什么，但为完成代表访问的任务，谨慎重略志如下：

他是浙江慈溪人，今年五十六岁，比蒋主席小三岁，但因多病，也显得苍老，自侍从室取消后他仍旧要为蒋主席料理一些文件和杂务，他说他十几年来只自认为一个私人秘书，他觉得他对于职务是愉快的，可惜的是多病，不能常和外界交际，他现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他颇怀念过去新闻记者的生活。

当记者问他对中国新闻记者的前途时，他说我国新闻确实在进步，只是你们身入其境的没有感觉到，实际上比之十年以前进步得多了，但进步不够，还得更努力，他不喜欢官僚作风，更不作外交辞令，所以一个多钟头的谈话是诚恳的。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他不肯多发表意见，但很强调的说他很乐观，一定能有成就。他说：他拥护蒋主席元旦广播词的意见，就是要统一建国，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要实现民主，并且邀请社会贤达及各党派参加政府，以充实政府的力量，至于结束训政在

国民党总理遗教上是有一定的程序的，现在的训政是受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之委托，根据《约法》代替人民行使职权，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就无法还政于民。至于国民大会的代表最好根据现在情形，增加名额，容纳各方面反抗战期中新出来的人才，旧代表是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而产生的，我们不能剥夺其依法当选的被选权，这一点，他相信可以有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大半还是文盲，这是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所以举行选举是不容易圆满的。譬如四川和重庆的选举，外间就有许多的批评，所以凭良心说，当下实行普选实在是有许多事实上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我们不能灰心，还是要向民主的大道上迈进努力。

关于恢复交通的商谈，停止冲突，他说他不知其详，这要问张岳军先生。假若冲突能停止，由考察团负责去考察执行的情形与事实真象，那么协商会议就更可以在和谐的空气下来进行，而会议的事也简单而容易解决。

他又说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洋有些不同，譬如美国的杂志常常登载军政要人奇形怪状的漫画，这在美国觉得无所谓。而我们中国的大人物，倘若被这样漫画时，他岂不要不高兴。这是传统的习惯不同，要慢慢的改变，久了就无所谓了。其实外国人有些地方真能守纪律法规，而中国人反而有些随随便便。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传统的优良文化，不应该自暴自弃，但一些自私自利的弱点，是要改正的，中国进步的唯一前提，是要由人治进到法治。

最后记者问他能不能代为请求蒋主席在还都以前接见一次中国记者，他说他可以试试。（熙）

（原载1946年1月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钱永铭先生

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一位稳健者，他直等会议前夕，收到了政府发给的粉红色出入证，才肯接见记者，他生怕不是代表，而叫记者误访了。郭沫若先生在某日招待会上说的，无党无派是政治的业务者，他说：说句北平话是玩票的。无党无派代表现在都集中在神仙洞川康兴业公司邵从恩先生处。

“各方对此既企待甚殷，所以必期其有成。”这也许就是他参加会议的态度，他认为国共两方都有错，自己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政府的法统当然要顾到，因我们大家都承认这政府，不想用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政府应开放政权，容纳各方面的人来参加，这也是合理的要求。抗战期中，错误虽多，这是无经验所致，不应为诟病理由，他绝不是为着本身是国大的代表，而坚持旧代表，因为既承认政府也就不该取消政府的法令，况且这些旧代表并不是贿选而来，他过去在上海就没有为此花过一个钱。

他从事于银行业已经三十年以上，交通银行原是官商各半的，而在战时，则官股超过了商股，他是商股的董事，由全体董事推选为董事长，再由政府任命的。他认为目前唯一的一件紧要事就是“恢复交通”，他希望停战命令该可以发布了，他行中派赴各地复员的人员百分之二十都还没有走成，派赴东北的也尚滞留上海，就是已走的人员，家眷都还停留在重庆无法动身，反而要派人照顾与管理，就是要融通，交通不恢复，物价也就不能平衡，后方一切工商业的萎缩也是因为交通的不通。

“银行业其实说来简单，无论国家银行或商业银行，平时都是靠汇兑、利率，及手续费三种来维持开支，当然因为战时的关系，困难殊多，譬如地区小，失掉了通商大埠，汇兑不通。运送钞票都发生困难，开支大，吸收存款却不易。存款多半活期，而放出去了却是长期，再加之战时没有人储蓄，有钱的都放比期去了。”所以他认为银行业只有在政治环境安定之下，才能发展，他又说：“银行业并不娶直接投资于工矿，应当站在扶植的地位。”

“战后的四联总处应该取消了，中央银行为银行之银行，担任发行、国库、调拨三项，交通从事于实业的扶植，中国银行经理国际汇兑，农民银行应深入农村，当然一部分的工矿事业的贷款应当让给商业银行来做。总之银行设立的目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的。

交通总行以后要搬到南京去，各地分行连办事处已达二百单位，他认为银行里的低级职员待遇或者比一般高些，而高级职员则未必，他以董事长的地位，也不过在办公室里搭一个铺，冰冷冷地并没有生火盆，“战时只有这一点点地方啊。”他笑着说。

他认为交易所是应该成立的，可以活泼金融，虽然助长投机，但政府是可以监督的，譬如价高的就拉低些，价低的就抬高些。

“买卖黄金与美钞，是否都赚的是老百姓的钱呢？”

他说：“这是老百姓彼此互赚钱、黄金储蓄是遵从政府法令，这是应当的，而黑市买卖美钞，这是看不起法币，不信任政府的表示，是不应该的。”黄金储蓄扣回百分之四十，他认为这是政府的失策，但对于孔、宋的理财，仍认为是头等人物。

他认为战后的通货不难整理，中国地区如此广大，又收回了东北、台湾，只要国内安定，不打内战，则税收增加，收支是不

难平衡的。

国营、民营，他觉得无须争吵，在收复区，政府就是代为管理过一年、两年，也仅是过渡办法，六中全会上早就划分清楚了，为着扶持民族工业，政府该下笔本钱。

他也是超过六十岁的人了，今年六十二，他说：“待把交行复员整理就绪，就该告老退休。”（照）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吴玉章先生

吴玉章老先生已经六十七岁，自延安来渝后，因劳顿而多病，中共代表团为爱护他起见，对访客常常代为拒绝了。记者昨天特赶着星期，政治协商会议休会时间，做了一个不速之客。他独自在用晚餐，但不是大锅饭，享受着小锅鸡汤与稀饭，这也许是中共对病人的特别营养。

吴先生自己其实是最爱谈话的，只要引一个头，就会滔滔不绝的谈下去。他三十八年前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日本学工业，和吴稚晖、邵从恩等都是同时代的人物，不过邵先生没入党，邵是满清的进士，去日本学法政的。戊戌维新失败后，人民受满清压迫更甚，各国看中国太不像话，生怕垮台，同时又惧怕义和团人民的力量起来，八国联军遂群起而干涉，这样才促成满清废科举、办学校，大量派遣留学生。他未免感慨今日的国际压力，“其情况又有什么两样呢？”他接着说下去：记得那时去日本学陆军的非官费不可，吴稚晖在日本坐在公使馆里过夜，非要求准许自费留学

不可，直到蔡钧公使叫日本警察把他赶出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此大起而攻之，逼得政府把蔡公使撤回，自费留学之目的得以达到，那时这些人都是最进步的，但后来落伍了。

同盟会的组成，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并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为着要答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所以不得不从头说起。

他说在日本，读到了一本本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是一本好书，那时正好俄国的虚无党失败到了日本，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三个团体结合起来，反满情绪高涨，辛亥革命因以成功。但革命成功后，因袁氏的反动，于是又到法国改学政治经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五回到云南，孙中山先生正组织中华革命党，为着严肃纪律，入党者必须打手印，因之入党者不多。这时国事简直混乱到没有办法，北洋军阀当权，张勋又有复辟之举，而另一方面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觉得三民主义似乎有些松懈，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各方面受俄国的影响甚大，那时他在北平为熊克武的四川代表，经他手介绍了不少学生到俄国去留学，褚辅成、沈志远都在平，北平《晨报》瞿秋白先生也帮忙甚多。

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其前身为社会主义青年党，简称S. Y.，那时有青年党曾琦先生自日本回国反对“二十一条”，余家菊先生组织少年中国学会，谭平山在北大，亦且是活动人物。在共产党成立的两年前，他已在成都组织有共产党小组，因与外界隔绝，所以还不晓得有正式组织，但他惋惜的是民十四年再度到北平的时候，没及时和孙中山先生会面，仅仅参加了祭奠大会。

他在延安是文化界的领导人，他一方面告诉记者在延安多年

痛苦摸索中创造的文化与教育，同时对重庆的文化与教育也加了些评论。

他说：四十年的革命经验，终于让他摸到了中国前进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要脚踏实地去做，而不是空谈。毛先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形相结合。就其自整风以后，谈到文化，必须要从人民生活改善做起，所谓衣食足而知礼义。“二五减租”是他在民十六年任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秘书长时定规的，而现在边区真正实行后，确已改善农民生活。蒋主席虽然在胜利后也曾宣布过，但这种政令的实行，还需要建立乡村民主政权来配合，农民更要自己组织起来与地主斗争。否则地主上下其手，农民会连地都耕不到的。

“文化人是要为为人民服务，所以文化人该下乡，和群众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农村，需要男耕女织，文化人就该从这种实际事件上帮助他们。卫生、医药、教孩子们记帐、写姓名、恭教孝顺，总要使他们人财两旺，才会被接受。文化人不是高高在上，生活建筑在劳苦大众的身上。军队要自己生产，工作人员要自己生产，才能减除劳苦大众的负担，这样才谈得上教育。孔子说的：“既庶矣，有何加焉，日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中国的读书人，常常上不能为国，下不能耕地，只想做官，有时连官都做不成，就成为游手好闲的人。

“其实政府的领导，并不是样样事都要做，只要去掉束缚，发展个性。广大人民的知识是无限的，我们该向群众学习，政府的一切救济还在其次。”

他又说：“大后方文化人也曾提出过文化人下乡的口号，但他遇到下乡回来的人，申诉在不民主的情形之下，一切做不通。”他三个星期来对于重庆的感觉是：“人多，可是大家却不安定，物价

高涨，通货膨胀，在不安定的生活之下，能做起什么事？”

他也平心比较，学校里或者科学的设备及工厂等，延安是不如重庆，但社会科学要比重庆高明，因为可以使一个人看清世界，对宇宙观与人民观有彻底的了解。延安竭力想做到学以致用，而这里常常用非所学，思想学术都好像带上了枷锁，学校制度东抄西抄，留学也变成了装饰品。

“停战令下，目前的情况可好转了呢？”他答说：“人民的力量与国际的舆论不容许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但大冲突不会再有。”
(熙)

(原载1946年1月14日《新民报晚刊》)

访问张君勱先生

张君勱先生于本月十六日自国外赶回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这位坚定持重的学者使会议增色不少，十七日上午当雷震秘书长报告他已到会出席时，全体为之鼓掌。过去参政会他曾被选为主席团，他可从来不肯当主席，据说是因为怕读总理遗嘱，更不愿做那套仪式。他是国社党的领袖，这次是以民主同盟的一份子来出席会议的。

他在美国开完旧金山会议后，到了英国，本想去柏林的，但因为国内内战紧急，继而又有协商的局面出现，“这是义务啊！不能不回国了。”他说：“原来真想在国外多读点书呢。”

他告诉记者，以欧洲为中心的时期已经过去，国联大会的地址移到美国，就是见证。英国粮食不足，英镑负债甚大，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以求应付，当杜鲁门总统答应借款时，美国大部议员

与舆论都予以反对，他们不赞成英国工党的国营政策，但杜鲁门说，这是无意义的终于签定了。但英国的社会道德基础稳固，所以复兴是有希望的，定量分配平时比战时还要少。政府征调人力，都以志愿服务队的办法，以节省国家的政费，人民都愿帮忙，大家系紧肚子来还债，因为美国签定借款时是以平衡基金为交换条约的。

他在法国停留过十天，曾和法共的领袖丁隆和杜威勒斯谈过，他们说，法国的军事工业，限期完成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自己保护自己国力外，还要尽世界安全之责，法共已参加政府，他们是可以负责说这种话的。他们现在内部安定，宪法即将完成，在新宪大纲中，所争执的也是一院、两院制，及总统职权的大小问题，一切行政要比中国有效率，国际地位早已提高。

他说：“美国是富足的国家，对中国却是善意的，他们要求享乐，要求驻军早撤，杜鲁门总统所谓比罗斯福总统居中偏右者，系指对内而言，外交政策并没有什么变更；要是有什么变更的话，那是远东问题发生了变化。胜利之前，要共同打倒日本，胜利之后，生怕美苏因中国问题而起分裂，谁也不愿谁多占了地方，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主要在此。他们对于国共之间的纠纷是不愿参与的。

“中国为四强之一，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昂勃克发起的，中国抗战八年之久，一切人力、物资尚未开发，在这中间不知多少国家倒了下去，逃亡海外，而中国始终没有屈服，不管我们的抗战是如何抗的，称为大国，却有资格，绝不是空受恭维，内战一起，国际地位已和朝鲜、保加利亚等国摆在一起。

他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前途是十分乐观的，大家能够公开讲话，各方面就必能合作。他认为政府只能有一层楼，不能有两层

楼，这是各国的通例。政府的责任必须分给各部长，各部长要有决策之权，才能负责，中国的部长不及外国的科长，这如何能讲行政效率？部长之上，有若干坐而空谈的人，如何能做事？他回来曾和王云五说笑，假若在你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上面还有若干空谈的人，你这总经理就无法做得通，部务与决策必须一贯而不可分开，这就是一层楼之谓。

关于国大旧代表问题，他说：“前晚民主同盟曾经商讨过，未选出者重选，已选出者为优先候选人，再重选一次。”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他说：中央与中共都要整编，但民意机关对于军费与人事必有审核之权。”

谈话又涉及国社党的态度问题，他说国社党一贯都是注重国家大事，赞成社会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三项，在抗战中，即以国事为第一。

“有人说，张先生的态度最近才转变得更民主一些。”记者又在挑衅。

“民主同盟前年第一次会议是我邀集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等先生在重庆村三号我家里举行的，民主同盟是我发起的，并不是民主同盟影响了我。”（熙）

（原载1946年1月2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常燕生、陈启天两先生

常燕生、陈启天两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青年党的代表。前者研究历史哲学，后者研究政治。民国十二年成立的青年党，本月

二日在李璜、左舜生两先生邀宴新闻界的盛会中，露面了。

青年党的代表都是诚恳而和蔼的，曾琦先生在招待会上曾说新闻记者偏袒有枪杆的党，而把青年党登载得少而小。这其实是冤枉的，新闻记者是以新闻性为第一，当然和蔼可亲的人物是最爱接近的。

我感谢常、陈两先生为记者侃侃而谈。尤其常先生谈得最富于历史性。他说廿八年的时候曾代表青年党为着民主合作去延安，那是正是榆林事件发生的时候，榆林反共代表何专员也在延安。共产党组织严密，每个人努力的精神是可以钦佩的。那时他们正开始垦荒运动，公务员都在种田。解放区是手工业的经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他曾和毛先生谈过，今后要培养建设人才，以期达到工业建设之目的，因手工业经济反映到政治上的，同样也是人治而非法治。一般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只是消极的破坏而不是积极的建设。例如妇女会只提倡打倒家长制，而没有把新制度建立起来。目前共产党也承认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阶段。五十年后或者可以达到共产社会，但各党各派仍是可以并存的。就好象十九世纪时的自由主义，是可以和平方式得到。现在的苏联也力谋与各国合作，虽其改造世界的理想不变，但也正适用着和平的方式。“为什么加入青年党呢？”记者好奇地插入了一句。

常先生虽然有一只眼睛不灵活，但他的谈话是非常有生趣的。他说，这一方面是由于朋友的关系，当年余家菊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而他们都是师大的同学。一方面青年党主张联省自治，正与我的主张相合。因当时北洋军阀正是中央集权最高潮的时候。青年党是国家主义者，对于国共两党都曾反对。那时蒋先生倡导的中国革命，受第三国际指挥，在广州举行反国家主义周，青年党的党员被捕获者甚多。

他又批评国民党说，一般都说政府是一党专政而反民主。其实还够不上党治。假若是党治，人民虽然不满意而政治却可以上轨道。目前的政府，实在有一些旧社会的封建关系没有脱离。一个党一定要阵容严密，例如苏联的党，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也非常严密的。而国民党最初就采取“拉人方式”，黄克强民初到北方去就把北洋系统的赵秉钧拉入，要组织责任内阁。好面子也是国民党最坏的作风，北伐者有所谓“军队北伐，官僚南征”之议，近几年强迫公务员入党，也是一种拉人的方式，拉了所有投机分子来作官。党内的忠实信徒，对此曾感慨系之。中国的政治要进步就必须要建立政治制度不可，所谓政治组织化，就好象一架机器，齿轮配合好，自然会前进，而手工业式的政治，必须一人从头做到尾。

对于团结问题，常、陈两先生都以过去国共隔阂太深，现在既然能够共聚一堂，总会慢慢地有办法达到和平的，但也不能太奢望，诚意是要逼出来好。

陈启天先生对军队国家化问题，认为除军事三人小组外，还应该设一个整编委员会。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必要保障。二者互为因果。政治民主化对国民党实在是有利无害，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后，一切公之于报章，这正可督促政治的进步。有健全的在野党，在朝党才跟着民意走。那么激烈派也不致于挺而走险。

陈先生对于政治协商会议里的五项问题的看法是：改组政府必须先做到。国府委员会与政务委员会必须全部改组，国府委员名义虽是指派，事实上仍要协商，属于各党派者，由各党派自行推选，属于无党派者共同协商。“指导”改为“决策”恐不成问题。惟中共所提之最高权力机关尚待协商。建议权一点，他主张

改三分之一为七人。公共纲领他主张应该简要，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困难的是军队国家化与国大旧代表问题。但这两项都互有连环性，单独一项是不易解决的。

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常先生说：政府现已答应，必需做到。政府表示，不要逼人太甚，好象没有穿上衣服就要拉着出走，不是朋友之道。某些事要经过立法手续，某些事要经过机关的转递，某些事还要调查。关于张学良、杨虎城的释放他认为军法问题已经消失，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生怕他们出来发生政治纠纷，一定要在政治环境安定中才能释放。国民党就是爱面子，希望释放政治犯，人民自由权利等事自己来做，而不是别人要求这样做。（照）

（原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访问莫德惠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已经访问到最后一位，本来东北问题，是可以做为压台戏的，但刚自长春归来的莫德惠先生以无党无派的立场想做个中间人，许多话不肯说，戏也就唱不出来了。

他十七日离长，二十日经平抵渝，廿一日晚就谒见了蒋主席，报告东北近况，昨天早上又应何总长之约，因而使我的访问不得已也变作匆匆，幸而在青年党的宴会后又看见了他。

记者首先点破：“听说你是中共推荐的代表，所以迟迟不欲来。”

他说：“这真冤枉，哈尔滨怎能不走一趟，不然回来如何报

告实情，你要知道，我是松江省双城县人，曾三过其门而不入，可见宣慰工作的忙碌了。”

莫先生是最善于外交辞令的，很想拿在参政会报告的一套来搪塞记者，什么东北的人民实在感戴中央的德意啊！各地的市民大会又是怎样的欢迎他，几大县的代表，在听到“九·一八”的广播后，就从二千里外来长春等候他，这一切我当然相信，受了敌人十四年奴役的同胞，一旦解放，怀念祖国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但目前问题的核心实不在此，他在参政会上也报告说：东北的治安问题严重，我想知道的是严重到什么程度？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话又说远了，他说：“在北平停留时，曾看见蒋夫人和张 蕙贞等，乘坐着两架飞机带着不少慰问品去东北慰劳苏联盟军，苏军也崇拜英雄，对于蒋夫人是会十分欢迎的，这确能增加邦交的敦睦。”

记者还是不放弃问题的核心，他笑说：“这简直是逼口供。”

他终于感慨地说：“你要知道，停战令是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家乡的同胞继续在流血，实在是最痛心的事。营口，国军与中共曾几得几失，现在国军又派遣第二军、第三军前往，哈尔滨完全在中共军控制之下，沈阳的张学诗也曾几进几出，长春因初期接收工作的顿挫，也曾一度撤退，这还是比较宁静的几个大都市，其他小镇市的情况，十之八九与华北差不多，这就是地方治安严重的情况。地方上的武装力量究竟有多少，没有计算过，不能说，我到沈阳、吉林、哈尔滨都是坐火车去的，当然一半要受着中共军的保护，苏军将于二月二日全部撤退，国军尚未抵达沈阳，这倒不是外交问题，主要的还是运输与装备问题，东北早已雪深数尺。”

“美苏已在三国外长会议上谋得妥协，马歇尔将军也特别关心东北问题，那么怎样的反映在这上面呢？”

“这是外交问题，恕不奉告了。”

“为什么不能用地方武力保护地方呢？”

“一个县有八个镇，行行散散地没有主脑，谁来管？”

“张学良是否可以成为一个领导的中心力量呢？”

“释放张学良问题又是一个难题，当初在溪口我是第一个看见他，我怎样会不关心他？我只能回答每一个东北人回去都有好处的。”

他接着说：“这里可以告诉记者一件新鲜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是“九·一八”的前奏，我这次回去，东北的士绅都要我转达中央来褒扬他。”

他对于东北的行营制，认为是临时的，希望宪法赶快颁布，东北的地方自治，应尽速建立，地方自治建立，就可以普选了。记者猜想这或者就是他认为可以解决东北地方治安的办法之一。

（熙）

（原载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三) 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 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中共代表团举行鸡尾酒会 招待中外各界人士

中共代表团昨天(七日)下午在胜利大厦举行新年鸡尾酒会，招待政府各部院会长官、各国驻渝使节、各党派、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到会中外人士五百余人。外宾方面有马歇尔特使、英大使薛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和夫人、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捷克、墨西哥、挪威、伊朗、比利时、阿根廷等国驻渝使节；美、英、苏武官和使馆人员；美国红十字会，援华会、公谊救护队等处人员；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法国新闻处、塔斯社等处人员；中英科学馆李约瑟博士和夫人，以及外国记者二十多人。政府各部院会长官和各界人士到有：孙科院长、于右任院长、翁文灏副院长、吴鼎昌文官长、邹鲁、冯玉祥和夫人、吴铁城、孔祥熙、王宠惠和夫人、王世杰部长、陈立夫部长、张厉生部长、张群主席、梁寒操和夫人、陈庆云部长、邵力子、雷震、甘乃光、贺耀组和夫人、吴国桢和夫人、张镇、陈铭枢、许德珩、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缪云台、程希孟、沈钧儒、郭沫若和夫人、梁

漱溟、章伯钧、罗隆基、蒋匀田、左舜生、陈启天、孙起孟、胡霖、周鲸文、杜斌丞、鲜特生、邓华民、杨卫玉、董时进、刘立明、刘清扬、史良、章元善、刘仲容、马寅初、邓初民、张西曼、王卓然、施复亮、阎宝航、秦柳方、侯外庐、张肖梅、章乃器、胡光镛、鄧云鹤、余名钰、胡子婴、胡子昂、茅盾、曹靖华、马彦祥、曹禺、胡风、沈浮、洪深、宋之的、宋云彬、阳翰笙、王芸生、萧同兹、胡健中、杨丙初、高允斌、陈铭德等和本市各报记者。

下午四点半钟，参加的人就陆续到来，外宾首先到会的是捷克大使，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等同志，站在门外与来宾一一握手，五点多钟，会场里已经到处都是人了，到处是握手，到处是碰杯，混和着一片谈话声，大家兴奋地在谈停战，在谈政治协商会议，为民主团结，欢乐地举起预祝的酒杯。不时镁光一闪，是记者们在摄影。

五点半钟，马歇尔特使到来，马上成为全场注意的中心，周恩来同志首先与他碰杯，一大群中外记者一拥而上，纷纷请马氏签名，先是许多签名册，后来你也一张名片，我也一张名片，都送到马氏的面前，马氏的一支自来水笔，不到十几分钟墨水就用完了，又用别人的笔签，但人是愈来愈多，马氏最后只好停止不签了。转出包围圈，和彼得罗夫大使碰杯祝贺，与苏大使馆的罗申武官及缪云台先生谈了很久，摄影记者是不会放弃这个镜头的，四围全是镁光灯，带了普通摄影机的记者，也要在借别人的镁光来照，更是紧张万分，马歇尔特使一直停留到六点多钟方才告别而去，在门口又忙坏了几个摄影师。

六点多了，客人还是不断的来，屋里已经挤得转不过身来了，要想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简直不大容易，每个人都显得十分兴奋，

几位工业家和翁副院长在谈话，文化界和戏剧界的人士，谈得更痛快，曹禺、洪深来时，大家赶上去碰杯，每人脸上都喝得红红的，有的连喝了二十杯，还在碰杯不已，大家都在说：“好热闹呀！”邵力子先生被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他拿着酒杯愉快的说：他回想起民国廿七年四中全会时的情形，那一次解决了国内许多重大问题，这次的会议一定也会顺利的。

陈立夫先生在说：“好热闹！”陶行知先生接着就说：“向来政府招待，很少文化人能参加，我们从来也挂不着边！”陈先生赶紧说：“下次政府招待，一定将你的名字写上。”

快七点了，到会的人陆续辞去，但会场情绪并不低降，吴铁城和甘乃光、萧同兹等先生分别和周恩来、吴玉章、王若飞同志碰杯。吴铁城、甘乃光、萧同兹诸先生举起杯子说“停战不停酒”，向主人碰杯。王芸生先生刚巧在旁边，也抢着说：“好，我来当证人。”郭沫若先生穿着长袍马褂，特别高兴，拉着夫人跳起舞来，旁边李公朴先生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舞罢博得热烈的掌声。

新闻记者们留到最后一刻才走，他们在等待时机，向周恩来同志包围，要探听今天三人会谈的消息，当记者的包围圈一展开，周恩来同志说了十四个字：“情况良好，尚无消息发表，明日续答。”一溜烟跑掉了。

这个热闹的局面，一直到七点多钟，宾主才尽欢而散。

（原载1946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冯玉祥、孙科宴请 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

中共代表团昨午应冯玉祥委员长宴，晚间应孙院长宴，并交换意见。

(原载1946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 招待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昨午二时举行茶话会，并招待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到代表张东荪、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六人和盟员百余人。由何公敢主席，各代表相继发表意见。

首由张东荪氏说明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的开端，这是我们争民主的第一阶段，因此我们应予以重视，并表示他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是代表盟员的意见，以盟员的意志为意志的。

梁漱溟先生继起说明：同盟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前能造成和好空气，以利会议进行。目前主要的事情是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取消双方敌对行动，希望当局取消对同盟的敌对行动。说到同盟对解决目前政治问题的主张，梁先生说：关于和平建国纲领，同盟尚未拟就，在这方面同盟将着重于农工商金融财政等弊端，及人身自由和救济复员等方面的除弊。在政治方面，同盟主张改组国民政府，国府委员要能使各党派人士参加，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国防委员会应予取消，五院应改组，容纳各党派人士参加，省级机构也要容纳各党派人士参加，应与中央政府一样是联合的。县级则主张普选，解放区也再来普选一次。军事问题，同盟主张军队国家化，由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

与草拟军队国家化问题办法。这一小组由国共军事人员及非二党的军事专家和各界非军人参加，确实做到两点：第一，使军队脱离党的关系；第二、实行裁军到最低限度的军备。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同盟主张由各党派共同来筹备宪政，由政治协商会议来重订组织法选举法，交由联合政府照办，进行选举；至于宪草，也主张先由政治协商会议先拟定，交国民大会通过。

沈钧儒先生说明：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不敢违背盟员的意见，以盟员的主张为主张。

张申府先生说明：同盟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立场为立场，同盟有九个代表，实际等于一个代表，因为同盟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张先生强调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章伯钧先生说：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运动的开始，各阶层人士应组织起来，加以督促，才能使大会有成效。关于国大问题，章先生表示坚持过去的一贯主张。

罗隆基先生强调联合政府不仅是中央要联合，地方也要联合。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同盟将提出书面要求。罗先生又说：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个重要项目，当然讨论停止内战，此外第二要务，就在保障人身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在内。

代表们纷纷发言之后，盟员们也起立发表许多意见，并有三十七人联名提出的意见书等，到下午五时，宣告散会。

（原载1946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青年党分别宴请 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民主 同盟和社会贤达代表

中国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杨叔明，七日午欢宴(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代表，计到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张厉生、陈布雷诸氏(张群因事未到)，协商会秘书长雷震也被邀参加。青年党方面并有郑振文、刘泗英、张伯伦等作陪。席间双方曾对协商会议提案问题交换意见，餐后两党代表同往出席协商会谈话会。

中国青年党中执会主席曾琦昨午(四日)暨该党中央干部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杨叔明等，欢宴(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同盟代表，计到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诸氏。彼此就政治协商会议议题交换意见。

中国青年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昨日(六日)午刻宴请(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无派代表，计到王云五、胡政之、钱新之、傅斯年、缪云台、李烛尘、郭沫若等先生(邵明叔先生因病未到)，并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

(原载1946年1月8、5、7日重庆《新华日报》)

民主建国会举行茶会 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民主建国会昨(八)日下午二时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各方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招待会由彭一湖、章乃器、胡厥文等主持。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到有：缪云台、李烛尘、张东荪、梁漱溟、胡霖、郭沫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邵力子、王云五、章伯钧、陈启天、张申府、钱永铭等。于院长右任也被邀与会。首由主席彭一湖致词，祝政治协商会议诸代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任务而努力，务期此次会议成功，并说明民主建国会是由工业、教育、文化界若干人士组成，将站在人民与民主立场，对各方保持友谊态度。章乃器宣布该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的意见书，该项意见分八点，其主要之点是该会主张在会前内战先要停止，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结社等基本自由必须迅速获得，并主张组织会内顾问团，以尽协助促成作用；组织军事考察团，以澄清各地军事冲突局面。

于院长和邵力子都有致词，表示政府方面也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有成就。邵力子并希望各方能具有互相忍让的精神。邵氏主张中国将来的宪法可具柔性。关于国大代表问题，邵氏说：也可以从长计议。

张东荪表示会议时进行协商，各方固应有忍让精神，但人民

基本自由不能轻易舍让，政府到应尽先施行保障。

陈启天表示：民元至今，民主未得实现，今日仍为此而协商，各方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与步骤，目的在于使基本要求趋于一致。

褚辅成说：这个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之他要大家发动促成工作。同时会期太短，应先讨论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宪法问题应放在第二部详尽讨论。

董必武同志盛赞民主建国会对当前国是的主张和意见，并誉民主建国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政党。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董必武同志说：目前主要的议题，应该是停止内战的问题，假若在会议之前内战还停不下来，那么就不是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战争，而是战争要来解决会议了。停战的谈判，虽有若干进展，但停战命令仍未颁发，这是此刻最首要的问题。

郭沫若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他主张各方在会议中具有不猜疑、不武断、不恶意的态度。他主张战争结束以后，党国要人和元帅将军们都一律应休息，同时还应裁兵节饷，以国家力量提高学术研究。

梁漱溟主张对未来的宪法的制定，应予慎重，方不致使人民对宪法不重视。

胡霖说：各方对政治的逐渐关心，是中国近二十年的一大进步，民主建国会的产生，就是证明。政治力量的结合，应监视在权者不能滥用权力，使权力者不仅应克制自己，也要克制自己的左右亲信。

缪云台声明他在会议中将持公正立场，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并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民主化三者的首要前提，

仍旧是政治上若干民主措施的及早实现。

章伯钧说：他将在会议中建议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这个会议应包括各党派、各界和华侨，商讨如何拯救工商界的危机，解除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桎梏。

最后由胡厥文氏答词，感谢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对民主建国会的诸多进言，五时散会。

(原载1946年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 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于昨午二时举行茶会招待各党派及无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到代表及来宾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李烛尘、张申府、马寅初、胡厥文以及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诸同志及何思敬同志。宾主挤满了整个西南实业联谊社的餐厅。

在重庆人民团体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这恐怕是第一次，正如茶会主席陶宝航先生所说，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希望都放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身上。他们这些从事经济事业的人已经深深感到，如果内战不停，他们本身的存在与发展都要成为绝望。他们迫切需要民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首先提出了经济与政治的主张，公诸代表们并公诸全国人民之前。

经济内战也要制止

茶会中第一个被邀请讲话的是马寅初先生，他说武装的内战要马上停止，但经济的内战也是很厉害，这是看不见的，也须马上制止。他说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的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

则，及国民党六中全会决议，轻工业应归民营，可是现在棉毛丝麻四种轻工业，几乎全部国营了，虽然堂皇地说二年后人民可以收购民营，而实际上一定是被几家大官僚资本控制。现在上海纱厂没有棉，要向后台老板买一百万包棉，中国工业可以做纱锭，也要向后台老板买一百五十万枚锭子，这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上海电力也在后台老板控制之下，这样把主要工业控制在别人手里，这样下去，将来中国只有官僚资本与外人合资的资本，什么国营民营都谈不到，结果是几个大家庭发财，日本就是十六家大家庭加一位天皇控制全部经济，少数人富了，多数人民穷了，国内生产无销路，结果向外发展市场，要侵略中国，终至亡国，中国要步日本后尘吗？我们要读历史，人家走错了的路，我们不要再蹈覆辙。

官僚资本摧残民族工业， 是工业界的“浩劫”

马先生讲完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三同志临时有他约要退席，经会场大家的要求周、叶两同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周恩来同志赞扬了该会所提政治经济主张，愿意接受他们所提出主张的基本精神，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叶剑英同志强调了中共军队不愿打内战，因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武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遵循着“民主所好好之，民主所恶恶之”的方针。

梁漱溟先生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要靠国际形势与国内广大社会及人民的督促，现国际形势已有进步，特别要人民起来督

促，要大家抱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原则，努力发挥人民督促的力量。

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为和平民主的实现，要坚持奋斗，不惜一切牺牲去努力贯彻。他特别指出来渝后，经多方接触更清楚了，目前在官僚资本压迫下民族工业资本被摧残的事实，说这是工业界的“浩劫”。他强调只有靠大家团结奋斗，才能有力量去争取民主和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才能使中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中共是赞成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对于该会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将反映到政治协商会议上去。

政府有束缚无政策， 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

李烛尘先生指出二点：一是要民主，尤要自主，不做别人尾巴。其次是要和平，就要彻底裁兵。讲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他惋惜政府只有限制束缚而无政策，要看人民有无力量，来决定能否工业化，此外只有靠命运，靠政府的觉悟了。他还说到久大和永利，在范旭东先生领导下，一向是苦干而不问外事，这一作风，现在已走不通了，政治不上轨道，工业化就远得很。

张东荪先生说：他同意该会的政治经济主张，可说是人同此心。但如何使这大纲实现？确不能靠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做代表只能如当哨兵，哨兵打死了，要有军队赶上接替！张先生又说，在敌人占领区住了几年，总以为抗战胜利，民主必然实现，岂知并不如此。但他仍是很乐观的，因为来渝后，已看到不少次争民主的大会。最后他说到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他说成为国共

两方的调停者是一种看法，但另一看法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要本此二原则去争。

真民主与假民主之争， 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展开

胡厥文先生也深感过去研究工业者办工业，研究政治的搞政治，这一分工，现在也走不通。他说，抗战时期，他们遭受多少摧残艰苦，无动于心，但是抗战胜利了，工业也全部完了，不能不出来追寻这原因。胡先生更强调人民是有力量的，现在四万万人民已渐渐走出来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他期望代表们说良心话，说真话，人民来支持真话，这样一定能成功。

罗隆基先生说，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是第一次，想像到会中将起的争执是真民主与假民主之争，因为目前没有人敢于公然反民主，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以免混淆。他更说，政治协商会议或可能失败，但民主不会失败，民主是推进了，政治协商会议可说是民主的起头。他更强调民主同盟将采的态度是：在是非中无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中无中立。

政治协商会议要靠人民来督促

邓颖超同志发言，指出中共自毛泽东同志来渝，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之后，即积极履行自己诺言，撤退八个地区，准备政治协商会议提案，但国民党方面仍进攻不已，并中途袭击八解放区撤

退的军队，所以局势依然严重，以致各位关心，连盟邦都要关心。接着她又说，尽管内战如此严重，我们仍来渝开会，为和平民主奋斗，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中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我们就主张和平，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由于国民党当局仍在动员陆空军，没有和平象征，所以我们希望立即实现和平，使会议能在和谐空气下进行。我们的态度是慎重庄严而负责的态度。政治协商会议，会遇到困难，但只要全国人民能一致为民主奋斗，积极主张，发挥人民力量，督促政治协商会议，为真理奋斗，是可以成功的，中共一定与全国人民一致来奋斗，所以政治协商会议能否有成，就要看人民的奋斗来决定。

中国民主斗争是长期性的

沈钧儒先生希望大家要来研究和发动如何组织内战调查团，以及对政治纲领，国民大会等问题，提出意见交给代表们，同时要督促代表真能代表民意，凡有背于代表民意的代表，人民应起来反对并撤销他的代表资格，这样来努力，才能使政治协商会议有所成就。

张申府先生强调一点，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不要做过高的估计，以免失望，他指出中国民主斗争的长期性，希望大家坚定民主必成的信心作不倦的奋斗。

代表与人民应打成一片

天色已经渐渐变黑，时间不允许再谈下去了，主席做了简单的结束语之后，兴奋的会众就渐渐散去了。主席说得好，他说在一开头我们把全部希望交给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现在代表们又把责任交还给我们了。代表们与人民应打成一片，共同努力。我们人民的责任很重，大家努力为民主中国奋斗。

（原载1945年1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陪都文化界七团体举行茶会 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夕，陪都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出版界、学术工作联谊会、杂志联谊会、中国电影戏剧界人士等七个团体，昨天（一月九日）下午二时假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招待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到会有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沈钧儒、梁漱溟、郭沫若、吴玉章、陆定一、罗隆基、章伯钧、胡霖、邵力子、张申府、李烛尘、陈启天、常燕生、杨叔明、余家菊等；文化界人士到会有冯玉祥、马寅初、茅盾、陶行知、邓初民、王昆仑、何思敬、施复亮、马彦祥、洪深等五百余人。茶话会的主席团为陶行知、茅盾、邓初民、侯外庐、马寅初、曹靖华、洪深、阳翰笙、李公朴、黄洛峰、叶浅予、倪貽德等。临时又推定陶行知先生为茶话会的主持人。他首先说明七个团体合在一起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是因为这七个文化团体的生活与工作，困难和希望都大致相同。他用他自己所写的四句诗，来说明文化界共同遭遇到的命运，这四句诗是这样的：“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样是带小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他说过去文化工作者的手是被绑起来的，眼是闭着的，口是被封着的，就是因为没有民主，使作家不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处处受限制，即使作家被左删右改曲曲折折的写出一些残缺的东西来，作品与老百姓之间

还有一道墙隔着。读者买书看，还要受到恐吓。最后他提出两点对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希望：第一，盼望代表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说话，拨开成见，找出大家可以生活的路来；第二，把人民力量拿出来，做代表的后盾，代表倾听人民的意见，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开得好。

陶行知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冯玉祥将军来了，他往站得密密的人丛中挤，挤到邵力子先生座位后，邵先生故意开玩笑，不让他走过去，得了第三者的帮助，才走过去了，可是已经流了一头的汗。李公朴先生站在主人的地位，歉意的说：“今天人多路太窄，叫我们的贵宾费了很大力气才走进来，希望民主的路不要这样窄！”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与愉快的掌声。

按照茶话会的程序，应该是文化界先说话，可是因为三点钟国民党代表招待民主同盟，就让国民党代表和民主同盟代表先讲。沈钧儒老先生被推为第一个发言。他说，文化界所提的基本要求 and 民主同盟一样，关于法令，限制自由的规定，都应一律取消，民主同盟现在搜集这些法令，认为要废止的已经有二十八种了，还有许多没有搜集，希望文化界多研究，多帮助代表。邵力子先生说话，盛赞文化界的团结一致和对抗战工作的努力，他希望在和平建国时期文化界更团结，更努力。他认为要做到政治上的团结“互让”比“争”要重要，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也在互让。他建议招待会的主人，要监督代表到政治协商会议里去“争”的话，不如监督他们去“让”，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开得成功。

文化界要争的是自由， 大家要监督代表去争

罗隆基也提前讲话，他说：“对邵力子的话有一点感想。邵先生提到文化界对抗战的贡献，我也认为文化界在抗战中尽的力量最大，而生活最苦，所受压迫也最大，今天文化界所要争的也更为重要，有自由，才有伟大的作品产生。邵力子先生说要监督代表去互让，我认为有的要监督去让，有的要监督去争，假如都互让的话，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么？文化界所提出的基本要求还要让的话，那不就成了半自由了吗？人类的进步，不是靠枪杆子，而是靠笔杆，从来就是笔杆子战胜，没有枪杆子战胜的，一支笔抵得十万支毛瑟枪，尽管靠什么原子弹、美国装备都是无用的。一个国家没有唱歌的自由，还成什么国家呢？可是我们能互让到只唱一半歌吗？”他说完之后，大家为罗先生这种一针见血的话，爆发出一阵雷雨似的大笑与热烈的鼓掌。邵力子先生又作了一次解释，说他说的“互让”，不是说要让言论自由，不是要言论自由变成半自由，而是不要滥用自由。

青年党的代表陈启天先生认为要解除文化界的精神与物质的不自由与困难，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文化界侯外庐、曹清华、洪深、邓初民、倪貽德、叶浅予、林声翕、黄洛峰都相继发言，提出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一致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基本要求，

取消一切限制束缚，否则人民必争，因为已经不能再让了。

洪深先生一字一泪 邓老教授泣不成声

对于文化界所受的痛苦，发言中谈得最多，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许多人听了洪深先生和邓初民先生的讲话都流下眼泪来。洪深先生是一个老戏剧工作者，他忍住一腔的悲愤，激动的说：“我们作戏剧工作的人，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我们要争做一个人，以下我讲的都是事实，假如不对的话，我愿负法律上责任，受应有的处罚。抗战初期，武汉失守时期，我们跟着政府跑到大后方来，有的在前方服务，有的在后方努力，可是政府对我们怎样呢？第一，捐税奇重，商业捐税才有百分之四，可是戏剧电影都是百分之十，冬令救济捐了好几年了，一年收多少，收去做什么，戏剧界一点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冬令捐税有三分之一用于冬令救济，其他的都是酬劳弄捐的人。再有看白戏，曾有公安局负责人亲自跑到后台去要票子，而且还要在前排留两个位子，说要检查戏剧。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团体演《黄花岗》，果然有两个巡长四个警察以检查清洁为名，一直站在后台不走。抗战胜利了，上海接收了许多的戏院器材，我们还不能回去之前，果然组织了一个什么中央电影服务处，说制片自由，发行统一，不是党办，不是官办，而是中宣部中央摄影厂里一部分身份不明的特务弄的。这样几个人就可以把戏剧电影都统统的握在手里，一切非经过他们不可。有些人真的是落过水的，给敌人做过事，可是现在也在上海负起戏剧的责任来了。我们千辛万苦的熬过抗战八年，将来还要到汉奸下面去找一碗饭吃！！”

最后洪深先生一字一泪的说：“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电影界！救救中国！”雷鸣似的掌声中，夹着饮泣之声。

接着是满头白发的邓初民老先生说话。他眼里带眼泪，颤声的说：“什么需要争？什么需要让？这要弄清楚。我觉得文化界是没有什么可让的了。洪深先生说的情形已经够苦的了，乡里的老百姓还要苦，再要叫老百姓让的话，只有把命让出去，老百姓不是争别的，而是争生存！今天所有一切都在政府手里，向政府争，并不等于反对政府，相反的是拥护政府；那些说不要争了！表面上是拥护政府，其实是害政府。有人污蔑共产党，说共产党要推翻政府，我敢担保，共产党不会这样做的。政府对于老百姓，动一动就说你是捣乱，说你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外围，究竟谁是共产党的外围呢？就是你们政府。是谁使得老百姓有学问的人、甚至八十岁的老头子，都到共产党那边去，就是你们。你们把他们逼过去的，你们不是共产党外围是什么！？批评政府，向政府争，不是害政府，而是拥护政府，这样下来就是中国没有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政府也不成政府的，老百姓的心都跑光了，政府还是要垮的。老百姓是真心诚意希望政府好的。”说到这里，邓初民老先生声泪俱下，不能一句跟着一句说下去，常常停下来，四座都为这颗炽热的爱国心所慑服，所震动，全场似乎都沸腾起来了，掌声中夹着呼声，好久都不能停止。

黑暗压迫不能解除，中国将变成沙漠

曹靖华先生说：中国政府对文化人的种种黑暗压迫，比俄国

沙皇还要厉害，不但有直接检查，而且有间接的限制、扣留，有些明里不检查，暗里检查，中央不检查，地方检查，外国可以出的书，中国不能出，这样下去，中国只有变成沙漠了。画家倪贻德说：看起来美术界好象受的压迫要少些，其实是美术界触及到政治的少，大半都是些鱼虫鸟兽花卉，看就好看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要真正使美术发展，只有政治民主，取消限制。

中共代表吴玉章接着被邀讲话。他略述对于文化界受的痛苦深受感动之后，他就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否极泰来的时候，不应重复过去四十年中悲欢离合的惨痛历史。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靠全国人民努力，文化界努力，大家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界对国家民族所尽的责任，是极光荣的，文化界过去领导许多伟大的运动，今天文化界的呼声，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

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派代表胡政之先生，对于文化界所受的痛苦也深受感动，他说他自己自从参加报界以来，看到中国人民所受痛苦是太多了，生存与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人民到现在还没得到，真是中国的耻辱。不过中国一定要进步的，不管道路怎样艰难。李烛尘先生在大家说话的时候，他哭了好几次，他说基本自由一定要争取的。郭沫若先生诙谐地说，他要向邵力子先生作揖，谢谢邵先生的指示，他要以性命到政治协商会议里去“让”，因为老百姓没有什么可让，要争的是生存。

冯玉祥先生讲话了，虽然会已开了五个钟头了，但大家的情绪依然很高。冯先生说：“我虽是政府的人，但作为文化界的一个小朋友来说话。现在已经是民国三十五年了，今天人民还得不到基本自由，这是啥事情？”他又说他有一次同于右任先生去参观苏联一个作家的别墅，那里作家的生活象天堂一样，中国呢？爸爸死了，

找他们去做讣告和祭文，吃就没有他的份。一个国家倒霉不倒霉，就看这上面。最后他又讲了一个日本代表挨老百姓打的故事，希望代表不仅为人民说话，而且真的给人民东西。他提议文化界天天集会，等代表回来报告消息。

丁晓先生和刘清扬先生也相继讲话。丁先生希望代表不要当调解人，而是站在人民方面说话，否则就是帮助抢人民自由的人说话。其次他希望报纸上一片和谐声少一点，免得被那些人把老百姓瞒住，以谋得其私愿的成功。

最后，由茅盾先生等提议组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大家一致通过，并推定茶会主席团为筹备人。李公朴最后呼吁陪都新闻界做人民喉舌，不要顾前顾后，要为人民说话。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大会在“枪口对外”的歌声中结束。散会时虽天已黑，而且下着雨，可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兴奋。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陪都妇女界举行茶会 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重庆中国妇女联谊会昨天(一月九日)上午在中苏文协举行茶会，招待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十点钟，代表们——郭沫若、胡霖、沈钧儒、张申府、罗隆基、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邵力子、陈启天、杨叔明等先后来到会。这次聚会，完全改变以往几次其他方面招待这些代表时的作风，这次是主人说的多，而代表们听的多。女主人要求代表们“一定要听完了我们的意见再走。”虽然昨天并不是放假，但是到会的女主人仍然将近百人。在这短短时间内，她们热烈发表自己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对各代表寄以殷切的希望，并表示绝对做各位代表的后盾。纸条子不断的由人丛中递到主席的手里，由主席宣读，都是没有讲话的人的意见。代表中，沈钧儒、董必武等都在详细的记录着，其他的代表或是记录，或是细心倾听，他们在极受感动时，也和大家同时痛快的鼓掌，有时与大家同样的擦擦眼泪，哽咽不成声。这正象主席李德全女士所说的：“有历史以来，妇女在政治上发表政见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今天正是中国妇女们以主人翁的立场，痛快的倾吐自己的意见。

希望政治走上民主正轨

李德全女士说，目前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般人民都是非常关心的。“我在乡间曾遇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佃农，他说起曾在茶馆里听说到‘蒋主席和毛泽东在一起谈话’，他又问：‘不是说不打了吗？怎么又打起来了呢？日本人打完了，我们怎样又去打自家人？’老百姓也许不懂‘政治’两个字，但是他们是懂得今天国家的情形是有点不对了。今天既是和平建国时期，就是不能再打内战了，为使中国文化提高，经济合理化，使政府成为替人民服务的政府，就绝不能打内战了。因此，政治协商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耳朵在听着，嘴在问着，盼望中国政治能走上民主化的正轨，产生一个真正能代表四万万人民的政府，使人民都能享受人民的权利与尽人民的义务，当然妇女也要同样的享受权利与尽义务。”

史良女士在主席致词后，第一个站起来说话。她提出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要有督促停战的决心，而且要具有这种力量。其次，她提出不同意内战调查团代表都由参政会派，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由无党派的人民选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且要求有妇女代表参加。

关于妇女基本权利

曹孟君女士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提出希望“马上还给我们”，

这是在《国共会谈纪要》曾经决定的政府应保证人民的种种自由权利，希望能够马上兑现。因此，第一、要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第二、要取消所有的特务组织，解散集中营。在堂堂的国府所在地的陪都，主张民主的人士都有人跟踪，使人精神上受威胁，这种组织一定要在“名”、“实”上都取消才成。第三，废止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现行法律，如紧急治罪法等等。即所谓“保障人民自由”的法律中，有妨害人民的也应废止。第四，言论出版集会要有确实自由；检查制度要取消，邮电的检查、扣留以及一切变相的检查应一律废止，废止文化自杀政策。关于集会、结社、走路、居住、学术讲演等，这都是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只有法西斯国家才使用种种方法限制这种自由。今天的中国应是民主国家了。关于妇女本身的要求，她希望施政纲领上除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上与男子平等外，并保证其实现。此外，在职业妇女孕期与产期都应有保障，政府应多设产妇科医院，保护儿童，消除弃婴及流浪儿的现象。在农村与工厂，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到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过渡期间，她提出应有过渡期间的民主政府，以保证民主政治的实施。她认为联合政府是民主的统一，并不是政权的被瓜分，而是政权的扩大与巩固，在此过渡期间，也应有妇女参加。关于国大代表，她主张重选。她说：妇女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应当实行普选，但在此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妇女代表名额应有规定。对调查团的人选，她也主张应有妇女代表参加。

邵力子先生因十时半有约，在大家热烈挽留不成后，就请他提早说话。他首先声明因服务于参政会，所以站在参政会立场，对参政会的作用有所解释说明。其次，他告诉大家要相信这次停战是一定可以实现。

邵力子走后，刘清扬女士讲话。她指出民国以来，为宪法斗争了三十多年，现在的政府不是根据宪法产生的，所以根本无“法统”可言，现在希望能由各党派自推代表，组成联合政府，成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省与县实行普选，省如不能普选，人选则由各党派共推。为了永久停止内战，保证人民所要求的民主自由能够实现。她又提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合理的施政纲领，由政治协商会议制订并保证执行，以过渡到国民大会、宪法的产生。

钟复光女士主张国民大会的代表一定要重选，因为那是“十年前国民党包办指定的，同时十年前的儿童现已成年，那时未满法定年龄的青年，现已成了壮年，而且他们在这八年来抗战中贡献很大。这些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不应被剥夺的”，同时也要反对这种剥夺人民权利的国大组织法，对《五五宪草》她也提出应重新制定，她并指出关于人民权利一章中“非依法不得限制”的规定，就是要人民“依法才有自由”，实际就是要限制人民自由。最后她强调要把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力扩大，成为过渡期间力争国大组织法、宪草的修改和代表的重选，同时必先改组政府，目前是一个是否真有诚意实行民主的考验时期。

看到的是贪污腐化

时间已到下午，但是代表们大多还没有发言，主席正想请她们讲话时，一位青年妇女站起来说话了。她说，老百姓是不知道有什么党派的，只知道有政府，我从沦陷区来后方，就是为投奔自己的政府，但是我在一个机关服务，看到的是贪污腐败，又在另一个机关看到，为了招待蒙巴顿夫人就花了八十万元，这种情

形真使人痛心。她回忆这种种情形，便哽咽起来，使她更痛心的是既不能替国家服务，而又有家归不得。她在哭，许多人低下头去，有的人在偷偷的擦眼泪，后来她虽忍住了啜泣，但是却已说不出话来，她只要求给人民服务的机会。

主席又念了递来的两个纸条上的话，

“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交给政府执行，如果政府不执行怎么办？”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不要只向政府要求，而且要积极切实督促政府执行。”

董必武同志被邀讲话，但是他也是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告诉大家，他相信内战是可以停止的，“有了妇女起来，内战是更可以停止”。他说：“我们要求无条件停止内战，现在当局要有条件的停战，但是我们相信男子和妇女们都起来了，内战一定是可以停止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他说：“是有权利建议交政府执行，但如不执行，这不是代表应怎样，而是要问大家应怎样办。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各方面选出来的，主席就是政府的主席，因此在执行决定上，是应有社会力量来监督的。”对大家的提议，他认为都很好，并且都可以包括到各方面的提案中去。

沈钧儒先生说：要积极主张建设民主政治的初步基础，确定永久的民主道路与目前的施政方针，要排除过去与现在对民主建设的一切障碍，而目前要切实做的就是停止内战。在建设性方面，主要的是和平建国方案与国大问题，（一）希望成立联合政府；（二）确定修改《五五宪草》的原则。希望妇女自己去研究宪草和成立独立的内战调查团。

胡霖先生对今天大家所提出的意见表示很钦佩，并愿代表大家的意见。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举行 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昨(四)日下午二时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各方代表，到会招待的东北人士有宁武、刘凤竹、王卓然、宁恩承、周鲸文、阎宝航、金锡如、徐寿轩等。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到有沈钧儒、邵力子、章伯钧、缪云台、周恩来、叶剑英、钱新之、陈启天、张申府、常燕生、余家菊等。

望诚意协商以人民为重

茶会由宁武主席，由刘凤竹报告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组成之宗旨及举行招待会之意义。该会认为目前主要的是停止武装冲突，与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希国共两党及各方均具诚意进行协商，务期以国家与人民之福利为重，使政治协商会议有所成功。该会并发表对于当前国是及东北问题的意见两项正式文件。旋由到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分别致词，邵力子氏说，政治解决的大方针已定，现在广征各方意见，在互相了解互相让步之下，求得共同的意见。

东北问题要和全国问题联系起来看，东北急待和平的局面，全国迫切要求停止内战

周恩来同志说：东北问题要与全国问题联系起来看，现在大家要协商讨论全国问题，东北的问题当然也在内。所有的问题，只要大家能诚心诚意实事求是的做，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此刻大家所关怀和注视的是停战问题。从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公布之后，内战不但未停，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次中共代表抵渝之后，即向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提议，现在政府提出的三条，我们原则上已同意，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消息和开端，重要的是怎样的实现。中共不仅期待停战问题在会议中解决，还希望在会前由双方快点解决，这就是希望前方立即不开枪了。这是目前最迫切的。东北沦陷十四年，人民所受苦难最深，目前东北急待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在东北问题上，东北主权属于中国，尤其属于东北人民，政府代表中国接收东北，这是无人反对的。但在东北的行政管制与行政机构，应决于东北人民，给东北人民以民主，所以我很赞成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同时东北的经济建设，应在民主政治的领导下，使经济建设的发展能用之于和平建设，而不去用之于内战。

东北应该成立地方联合政府

沈钧儒氏提出要发展东北，必须给东北人民以自主权利，依

据地方自治的原则，东北应有地方的联合政府，东北内政问题由东北人民自己解决，才能使东北成为一个自由富强的东北，同时这并不妨碍中国的统一。

章伯钧说：建设一个和平的东北，有待于东北人民自己的争取与努力，有如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不能取决于参加会议的三十八个代表，而取决于各地方各界人民的各种要求来争取，因之希望各界为提出政治上的意见和主张，并要求把政治协商会议公开于人民。叶剑英同志说：东北的形势将影响及东方及世界安全与和平，建设一个和平的东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责任主要是有赖于东北人民自己，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去掌握东北的和平局面。张申府、余家菊两氏也分述东北问题是与全国问题相联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寄望于东北人民自己的努力。

（原载1946年1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举行茶会

全国人士所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由政府决定自本月十日起开会两星期，昨午三时假军委会会议室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茶话会，商谈有关正式会议开幕后应筹备的各项问题。午后三时十分，茶话会正式开始，到国民党方面代表孙科、王世杰、张群、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厉生、吴铁城等八人；中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等七人；民主同盟到梁漱溟、张东荪、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六人，张澜、黄炎培两氏因病请假，张君勱氏尚未归国；青年党方面到曾琦、陈启天、常燕生、杨叔明、余家菊等五人；社会贤达代表到郭沫若、胡霖、邵从恩、缪嘉铭、李烛尘、傅斯年、王云五、钱新之等八人，莫德惠氏因在东北尚未赶到出席，共计到代表三十四人。首由雷震秘书长报告秘书处筹备经过，宣布大会定十日上午十时在国民政府举行，会期二周。即公推孙科先生为茶话会主席，当即开始交换意见。

各方面代表纷纷发言，沈钧儒先生建议正式大会时会场席次不必抽签决定，而让各党派代表能坐在一处，以便交换意见，全体代表都表示赞同。

陆定一同志发言：对于黄炎培先生所提，各党派在宣传上尽

可用友谊的忠告，绝不再有渲染的报导和谩骂的文章一点，表示赞同，并希望中央社能将会议期间各代表的发言和主张，全部广播出去。

接着梁漱溟代表民主同盟提出同盟在会前所希望于政府的几项意见。梁先生在说明同盟意见之先，特别引了一段在旧金山会议时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的演讲，他说：罗慕洛先生曾经说，要使得国际间真能联合，和平并和谐一致，应该彼此有容忍互让互谅的精神，这是必要的基础。罗慕洛又曾说：让这个会场成为最后的战场。这意思是说让大家在会场中来争辩，不要再发生战事。梁先生说明他看到这段消息是在广西乡间，很受感动，因此希望这次大会，也能符合这种精神，以互让互谅容忍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如大家体会这种精神，各方面不光是希望别人对我让步，相反的，倒过来多自责自勉，必能使会议取得良好结果，而使会议也能造成和谐空气。

修改召开政协办法，民主同盟提出意见。 梁漱溟先生希望会前政府能做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党派的合法地位，和释放政治犯，不许特务捕人等

接着梁漱溟先生又说明同盟对修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的几项意见，并着重提出希望在开会前政府能做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党派的合法地位及释放政治犯不许特务捕人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共会谈中发表的，是政府所同意的，如能做到，将一扫国人恐惧会议成为空谈的疑虑，对政治协商会议能增强国人信心，

而取信於天下，并藉此造成会前的和谐空气。

此外梁先生又说明民主同盟对讨论程序问题的意见。计分八项，逐项讨论（一）有关停战事项；（二）有关人民的自由权利事项；（三）有关复员救济事项；（四）共同施政纲领；（五）政府容纳各方人士参加问题；（六）军队国家化及裁兵问题；（七）国民大会问题，包括旧代表及选举法组织法等修改问题；（八）宪法草案问题。这一程序是根据易解决者先讨论，及最急迫者先讨论的原则而建议的。

接着青年党的曾琦先生说明青年党的意见，希望这一会议，抱定决心，不空谈而能解决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盼秘书处印发国共会谈纪要、抗战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国大代表名单等有关参考文件。

这时邵力子先生起立谈话，对梁漱溟先生的发言有所说明，他希望会议能在和谐空气中进行，最好是对过去不愉快的事不提，并声明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是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之意。

章伯钧先生说明，释放政治犯的建议是完全拥护政府，帮助政府的立场提出的，能做到这一点，政府的国际地位与国内威信会大大提高，同盟提出这问题决不在暴露弱点而着眼于帮助政府，希望大家有些共同了解，并希望各党能利用广播。

关于停止内战命令希望三两天内 即能发表周恩来在茶话会发言

周恩来同志说明：（一）关于会期问题，根据国共双方会谈，共认宪政实施前这一阶段相当长，因此无疑的这次二周会议只是第一次会议，今后仍要举行。他同意梁漱溟先生所提下次会期，

由这次会中共同商定，请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关于会议议程问题，双方商谈的包括：停止军事冲突即停止内战，双方相约要向政治协商会议报告。现在三人委员会正在求解决停止冲突问题，他期望三两天内能将停战命令发表，使政治协商会议能在和平空气中开幕。并望政协将来于听取报告后，考虑永久消弭内战危机的办法。（二）关于《国共会谈纪要》，双方曾相约应向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三）和平建国方案，这包括共同纲领问题，政府改组问题，及复员善后救济问题在内。（四）有关国民大会问题，包括组织法、选举法、宪草等，这样共计四项。

此外周恩来同志又说：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决定撤回，将这个问题列入《和平建国方案》中去解决。另外关于秘书处，中共已推荐齐燕铭教授为秘书，希望各方面都有秘书参加秘书处工作，以协调有关政治性事务。关于宣传问题，除各报记者赴会自由采访外，希望中央社真正成为国家机构，使各方意见能广播到全国，能做到这一点，大家都希望。

王世杰先生引黄炎培先生书面意见中建议宣传休战一项，说中共方面已由陆定一先生表示，他对此项也表示赞同，希各方报纸能朝这方向去做。

随后缪嘉铭、傅斯年、陈布雷等先生相继对程序等问题发言，到五时，由孙院长做了简单的结束语，就散会了。因为今天是茶话会，并无具体决定。

（原载1946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四)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礼 在国府礼堂举行 蒋主席宣布决定实施 保证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 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政治协商会议，昨(十日)晨十时正式假国府礼堂开幕。出席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孙科、王世杰、张群、吴铁城、陈立夫、陈布雷、张厉生、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张澜、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邵从恩、胡霖、郭沫若、傅斯年、缪嘉铭、王云五、李烛尘、钱新之等共三十六人，莫德惠、张君勱未及赶到出席。

大会开幕仪式极为简单，蒋主席由礼堂侧门入场，默念国父遗囑后，就开始致词。蒋主席致词前，宣布停止冲突的协商已得结果，停战命令即可发表，掌声四起，会场情绪骤增欢愉气氛。蒋主席致词后，周恩来同志、曾琦、沈钧儒、邵从恩逐一致词，词极恳切，洋溢对国家人民所负的责任感，到十一点半致词完

毕。最后，由秘书长雷震报告上次茶话会所提出和已经决定的几种事情，并宣布第二次会议定今日下午三时举行，随即散会。

昨晨第一次会议，会议虽仪式简单，但因该会任务的重大，为全国人士所密切注意，新闻记者，到会旁听甚为踊跃，会场中七架开麦拉，镁光闪闪，摄录各种镜头，外籍记者因赶往采停战消息，群集马歇尔特使寓所，静候佳音，到停战协议成立消息传出，拍完电报，才赶来参加。

本市消息：蒋主席十日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致开会词，致词之前，首先说：“本人很愉快的向诸位宣布，停止冲突的办法已经商妥，停止冲突的命令即可发布”（鼓掌）。继宣读开会词，词毕，主席继宣称：现在我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改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各位先生：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本席代表国民政府向各位致诚挚之欢迎，同时也愿乘此时机，陈述我个人对会议的期望，至于政府的方针，我在元旦广播词中已经详尽说明，不再重述。

今天到会的各位会员，有半数以上，都曾参加过历届的国民参政会，因此，我在今天很自然的联想到国民参政会的成就。参政会到今天，已是第四届，而民选的成份，逐渐增加，现在由选举产生的参政员，已占总额的三分之二。历届参政会对国家的贡献。不一而足，而最重要的，就是共同一致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尽管参政员中间，在政治上的立场和见解各有不同，而对于国家民族安危存亡所系的根本大计，其主张则是全体一致，始终一贯的。我们所以能持久抗战、获得胜利，这是一种主要的力量。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我们中国对这次世界大战中的任务，正如其他联合国一样，“要赢得胜利，并且要赢得和平”。所谓赢得和平，就一般的说，是要确实保持胜利的成果，建立世界和平的秩序，永绝侵略战乱的根源。而在我们中国来说，尤其要紧接着抗战的胜利，以举国一致的努力，排除万难，以谋国内秩序的安定和建国工作的进行。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

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渡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也就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的问题。我们八年抗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保障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已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该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而强盛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所以我们一方面努力促成国民大会的如期召集，民主宪政的及早实施，同时，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与任务，也就在于此。

我们过去因为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抗战，一切的措置与法令，都着重于适应军事的要求。抗战结束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善后为先，建设第一”，许多战时法令，已经在陆续废止或修改，今后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切的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参加本会议的各位先生对于此点，一定是具有同感的，如有意见，深望尽量陈述，政府无不可以考虑采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国家社会现实的情况，总要使过渡期间不发生困难或纷乱，使国家根本不至于动摇，以期顺利推行宪政，而使建国工作得以圆满进行。

本会议虽然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但各位先生热心国事，关切民生，一定能体察人民真正的愿望，认识人民迫切的要求。国父有言：“国家之基本在于人民”，所以人民的要求与国家的需要，必然是符合的。依本席的观察，今天我们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求安定，求复兴，求国家的统一、进步与繁荣，以增进他们的

生活，最低限度也要求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使他们的自由不受侵害。对于这一点，政府当然要负责尽职，以满足人民的愿望，解除人民的痛苦，保障人民的自由。同时，本会议所要充分商讨的，也就要以这些最迫切的要求为基础，来确定我们当前的国是。我们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宗旨，也是这次艰苦抗战的目的，但在国民大会没有召集、宪政没有实施以前，人民真正的意志，还没有充分表达的途径，我们大家的责任，却是十分的沉重。政府这次召集本会议，只有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绝没有自私和得失之见。政府对于本会议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益于人民的幸福，有助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个人在会议开始的今天，要对各位贡献下面几点意见：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我们这一次会议，当然不是为各党派解决自身问题的会议，而是为共商奠定建国基础的会议。我们各人对于国事的见解和政治上的主张，必不能绝对相同，或许是距离甚大，但是我希望各位在巩固国本的共同认识之下，都能充分坦白的提出主张，不必有所隐讳或保留。我们正可借此热烈讨论的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见解中发现共同的途径，从相互的谅解中，增进我们的合作精神。唯有坦白，才见得真诚。也唯有牺牲成见，择善而从，才能成立合理而有益的决议。应主张的就积极主张，该让步的，应不惜让步。我们要以这一次为民主精神的试验，也要以这一次为养成民主风度的嚆矢。我们希望本会议能始终保持谅解与和谐，不希望发生任何停顿和波折。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我们的谅解与让步，有一个共同的指归，这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先，而党派或个人的得失为后。在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之前，所有党派或个人部分的成

见，应无不可以牺牲，无不可以让步。为了成立有效的决议，有时候撤销我们的提案，比之坚持我们的主张，更有伟大的价值。这样才见得我们谋国的公忠，才能使这次会议有确实的成就。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我们在举行会议的中
间，有三件事，大家要牢记在心；一是抗战期中，军民牺牲的壮烈，二是我们同胞流离痛苦，渴望解救的迫切，三是我们国家过去蒙受忧患的深重，和民族前途安危祸福的不可预知。所以我们这一次会议，是要集中力量，而决不可分散力量。是要造成团结，而决不可破坏团结。是要扶助政府，增强政府，而决不是要削弱政府。是要开辟建国的前途，促使我们国家的进步，而决不可以使国家停滞在百事落后的地位，甚而至于造成国家的退步。只要我们能认识这几个要点，而后我们国家乃可以迈进于民主建设的大道，为世界友邦所尊重。

各位先生，本席对于这一次会议，是具有充分的信心。我深感我们过去国民参政会的精诚合作，已经赢得抗战的胜利。我因此同样深信，这一次会议的成就，必能推进建国的事业，保持胜利的成果，以赢得和平。世界舆论所瞩望，人民殷切的祈求，都集中于我们这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谨以十分的诚意，祷祝本会议的成功。

现在，我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

选。

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在开幕式上致词

主席、各位先生们：

适才蒋主席宣布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我谨代表中共代表团向政治协商会议致词：

政治协商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次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现在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并在此宣布开幕，我们愿致其庆贺之忱。

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照预先商定的会议内容，虽仅有两大项，但在此过渡期中，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宪法问题，却关系中国民族和国家今后的命运至大，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寄以极大的希望。我们中共代表团本此认识，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中国目前现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紧接着不幸的国内战争，使中国人民、世界盟邦的政府和人民，都关心此事，并要求迅速结束内争。中共是当事人的一方面，

此次代表团前来陪都，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经二十多天的呼吁和奔走，经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我们盟邦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最后赖蒋主席的远见和决心，使全中国和全世界所关心的内战，在今天双方下令停止了。（大鼓掌）十八年内战惨痛的经验，人民的痛苦，使我们今天在先烈的昭示之下，在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大鼓掌）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望以此努力，告慰全国人民。

军事冲突停止了，才能很好的谈到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国共双方在《双十会谈纪要》中，已经承认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在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有了和平团结的局面，有了民主统一的基础，中国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普选和民主宪政，也才能有真正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建设。

由于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运动，和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为领导的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到今天，使我们才得看见了新中国的曙光。尤其是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更有了空

前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中国抗战军民又流了血，尽了力，而全世界也正处在为人民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的历史关头，我们遭遇此千载一时的良机，只有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去掉一切落伍陈腐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和办法，信赖人民，依靠人民，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中国的民族和国家，才能在联合国中不愧为五强之一，也才能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国际合作。

我们希望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一定要使这个会议的历史任务达到成功。我们也知道，在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碰到波折，但只要我们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而奋斗，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而且能够克服的。

预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鼓掌）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 张澜在开幕式上致词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这不只是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事，这是全世界人士注意的一件事。这个会议的成功或失败，不止关系国家的命运，的确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前途。我们想我们今天到会的全体会员，必定一致感觉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十分重大，我首先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全体出席会员向会议表示，愿以真诚坦白的态度，至公无私的决心，和衷共济的精神，来与诸位会员共同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

这个会议虽然是以党派的代表占多数，我相信各位代表都承认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具体些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怎样谋取国家自身的和平，以保障远东以及全世界的和平；怎样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以奠定远东及全世界的民主。今日在座全体会员，尽管在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我们的目的，我们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这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在大目的相同之下，仍有见解的不同，所以这个会议才有它的需要与效用。因为只有政治见解的差别，而

* 这篇致词系由沈钧儒代读。

大目的仍旧一致，所以我们又相信这个会议决定有其光明的前途。

这次会议的目的。既然是国家和平与民主，我就愿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出席会员，在这个目标上向会议贡献几点意见。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今天主席在致辞中，首先宣布和平谈判已告成功，这真是举国欢迎的消息。我们相信这不是暂时的和平，而是中国永久的和平。和平是会议成功的先决条件，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请求。至于谈到民主，我们今天没有过高过远的希望，我们认为今天全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只是那些做人的起码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不过老百姓要的不是字面上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他们要的是事实上真实的自由。今天听到主席在致辞后的负责声明，知道最近政府既已有所决定，这是我们要致无限的欢欣的。我们相信今后人民的自由，必可得到切实的保障，以副我们人民的要求。

其次，经过这八年的抗战，老百姓是颠沛流离，是家破人亡，全国大多数的人民，今天是无饭可吃，无衣可穿，无家可归，这些问题不立求解决，我们却从事政争党争，这无论是当权或在野的党派，内心都应感觉罪过。我们认为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比较制宪行宪问题还要迫切，我们愿与会员诸公共同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实行开放政权，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等问题，当然是国家走上民主正轨的许多立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对这些问题有一贯的主张，却没有任何的成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着重这几点，

第一，不能违反人民的普遍愿望，

第二，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

第三，方案实行的时候，必出之以至诚，守之以自信。

关于解决上列问题的详细办法，我们愿本互让的原则，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

总之，今天我们出席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不止应该向全国国民负责，而且应该向八年抗战的死难先烈负责，先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抗战胜利，换来的民族生存，换来的国家独立，我们没有摧毁它、破坏它的权利，今天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对得起全国的人民。今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责任心，追随主席及会员诸公，共同努力，以求会议的成功。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青年党代表 曾琦在开幕式上致词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本会议开幕，本席谨代表青年党同志，简单说几句话。刚才听见蒋主席开幕词，宣布停止军事冲突的决定，以及四种重要政治措施，表示非常欣慰。这次的盛会，集朝野于一堂，为民国以来所罕见，我们对于政府当局之虚怀，和在野各党之热忱，都不胜其敬佩之感。回忆“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政府始则有庐山会议的召集，继则有国防参议会的召集，随后更有国民参政会的召集，这些会议的召集，都是朝野协力的表示，所以我们“抗日统一阵线”坚固如泰山之不可动摇，强寇因此而击退，抗战因此而胜利。可见朝野合作，确有明效大验。现在抗战告终，建设开始，又有政治协商会议之召集，我们希望由此而渡到宪政阶段，构成建国统一阵线，期以三十年完成名实相符的近代国家。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朝野合作，一德一心，同舟共济，以“合作抗战”的精神，来合作建国，尤须彼此相见以诚。古人说：“不诚无物”，这确有至理。我想要把国家纳入正轨，惟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大家实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仅以此贡献于大会诸先生，并祝本会议顺利成功，完全达到民主团结和平建设目的。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

社会贤达代表邵从恩 在开幕式上致词

主席、诸位先生：

今天从恩承无党无派诸位会员委托，来说几句话。刚才听到主席的开幕词，大家很欣慰，又听到周先生、曾先生、沈先生分别致词，大家都很满意。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和办法，刚才主席和诸位先生致词，都已说到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不过，我们八个人感觉到诸位先生的话，是从上面看到下面，我们要说的话，都是从下面看到上面，这是稍微有些不同。今天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在国家不幸事件之中，由于这不幸事件的发生，才有这次会议，虽然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过寥寥数十人，但实际上是全国人民以至盟邦所非常注意的，正是万目睽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异常严重，尤其是四万万无告的同胞，眼巴巴望着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这种情形是值得我们深切的认识。外面有人说，你们这次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失败，使人民失望，盟邦失望，将来如何演变，还堪设想吗？所以非成功不可。但是成功两个字应该怎样解释？所谓成功，是指国家成功、民族成功，不是一党一派或是个人的成功，要是一党一派或个人成功，反转来就是国家不成功；只有国家成功，才能使一党一派或个人都跟着成功，成功的界限应该在这些地方。所以，由于过去的事实的

演变，才有今天的会议。今天大家认定会议非成功不可，而成功要有成功的条件，今天兄弟不能具体来说。在这次会议之中，大家当然要认真协商，不过今天也可以说一个大概，今天要说的是在精神方面。第一点，就是希望国共两方面乃至各党派，我们各个人应该反省，要反省的事情很多，就最近这些事来说，究竟为什么有这一次内战？我们看到《双十会谈纪要》第二条明明写着竭力避免内战，可是墨迹未干，就打起来了。试问：在这次内战中，人民死亡多少？国家财产损失多少？还有对外的名誉信用以及国际地位损失到什么地步？我们反省一下，所得的是个人的，都是虚的，所失的是国家的，都是实在的。从恩今年七十五岁，扶病来此，今天是垂涕而道，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始终误在一个“党”字，并不是党误，而是党之偏而误。古语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党，近来有了党，似乎不入党不行，党是可以有的，而不能偏，偏了就失了党的作用。两党酝酿又酝酿，不能调和就发生内战。参政会同人苦心调停五六年，总想调和大家的意见。去年七月因为政府将要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又另有办法，我们以为召开国民大会是政府要还政于民，却不能因还政于民，反使人民受苦受难，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请政府缓开国民大会，由国共两方面互相商讨，才有先召开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却不料在迟迟商讨之中，又告破裂，我们站在国家立场上来看，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今天好了，前线的战事停止了，双方临崖勒马，就是表示两党的爱国心，本着这种爱国心，即可使国家前途发生一种希望。我们想想过去这种歧途走不通，内而害了老百姓，外而盟邦为我躊躇，我们的敌人看到欢喜，以后大家就要“诚”，要“信”，如果向里是一套，外面是一套，就是“不诚”；说是今天是一套，明天是

一套，就是“不信”。过去人民心里都留有这种遗憾，国家所以不能统一，所以不能团结，便在这里。要是这种心理不打破，这回一切事情仍然不能解决，就是解决了也不能持久，所以，诚和信是解决国是的基本精神。

其次，各党各派要互相谅解。我没有到过外国，但听见人家说，各国的政党乃至有许多政党，其中必有一个保守性的政党，国家没有保守性的政党，国家基础随时会动摇；又听见说，必有一个进步性的政党，国家没有进步性的政党，政治一天天要退化。这两种政党看来相反，而是相成，并且相互为因，有如两个轮子，同一方向，一天天向新的路上前进。人家说的外国政党，有此趋势，反过来看看中国好象也如此。我不敢说国民党是保守，但国民党执政多少年，从艰难辛苦中到了今日，这种经历就会有点保守心理，国民党方面的保守，就是要巩固国基，没有保守，国家基础便要动摇，不可收拾；我不敢说中国共产党是进步，但是一切作风，总是向着进步方面走，假若说国民党可以代表中国的保守党，共产党可以代表中国的进步党，但人家有保守，有进步，是一推一拉，国家便有了进步，我们则不能相成，反而相消，国家的人才有限，象我们这样无谓牺牲，是国家的不幸。

此外还有两党，一是中国青年党，以国家主义之精神，实行民主，这可谓保守性之中而有进步性；一是中国民主同盟，我看了他们的党纲，是以民主为主，而不忘各阶级利益，在进步性中而有保守性。国共两党有如柱石，其他各党就是横梁，但是我们今天柱石和横梁，并没有成为一个很完全的体系；至于无党无派，有在文化界的，有在经济界的，有在政治界的，我并不能代表各位先生，开会时他们当有宝贵的意见发表，从恩从乡间来，就把乡间老百姓的意思贡献主席，贡献诸位先生之前。说的虽是空论，

但大家如能有谅解精神，到正式会议中，就有许多事情容易解决，这个旧的观念不打破，那就不敢说，从恩内本着良心，上看到国家，下看到百姓，本此三者来贡献意见，报效国家。

(原载1946年1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

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今天开幕。这是举世乐闻的好消息。我们今天向读者披露这一个好消息，明天以后更将陆续把这个只可成功不宜失败的会议的经过报告于我们的读者。

政治协商会议是举世瞩目全国重视的会议。这个会议所以为举世瞩目全国重视，并不因为他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举。我们知道国民政府自抗战发动以来有其一贯的政治建设方针，就是要使抗战的胜利与宪政的成功同时实现。所以芦沟桥事件发生的时候，蒋委员长召集全国各党派和社会贤达集会于牯岭，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虽没有正式出席这有名的谈话会，但是他们当时同在牯岭，备蒋委员长的咨询与商量。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这时候商量的结果。到了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国防参议会成立于南京，续会于武汉，参加的人士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和社会贤达。当时的国防参议员在今天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亦不在少数。这一个各党各派社会贤达的会议乃是国民参政会的前身，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更曾经这个会议讨论，才由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决定。国民参政会成立于武汉，续会于重庆，至今四届相承，都有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在内。这个战时民意机关，对于抗战的贡献之大，是无须我们

赘述的。由牯岭谈话会到国民参政会一脉相承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向于民主政治而前进的记录。在这个悠长的记录上，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开创之局。所以我们说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性并不因为他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举。

政治协商会议所以为举世瞩目全国重视，也不因为他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完成。我们知道国民政府所信守的建国大纲，以国民大会为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枢纽。质言之，中国国民党依于训政时期约法而行使的政权，必依国民大会制颁的宪法而递嬗于国民大会。自一方面说，在国民大会开会以前，训政时期约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国民大会开会以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自他方面说，政权之归还于国民，乃以国民大会为唯一的枢纽，而以五权宪法为正常的轨道。因此，召开国民大会才是宪政的成功。至于政治协商会议乃是国民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并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经的步骤。所以我们说，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性也不因为他是民主政治的完成。

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性在那里？他的重要性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育滋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要待他来解决。尤其是在这从抗战结束到和平开始的决定关头，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不但民主政治没有成就，亦且国家社会将沦于破碎没落的深渊。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的一个会议。他在这一点上有其重要性。

民主政治不是以武力割据地方。以武力分裂国家。民主政治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各党派各阶级依于法定的轨道而提出他们的意见，经过讨论，构成政策，交行政机关付诸实施。民主政治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各党派各阶级的争执，诉之于舆论而不诉之于武力，决之于会场上的表决而不决之于人

民的生命财产与国家的公共建设的破毁。政治协商会议虽不是国民选举的代表机关，但是他是中国今日化非法为合法，化分裂为统一的重大枢纽。惟其能化非法为合法，化分裂为统一，民主政治才有完成之望。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政治协商会议虽不能变更国家根本大法，但是他对于制颁国家根本大法的国民大会之召开，有最现实而最具道义力量的助力。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政治协商会议虽不是常设的决定政策的国会式的机关，但是他对于今日以后的和平建国大计，有最现实而最具道义力量的贡献。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政治协商会议如告成功，足以确保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导入民主制度及法治主义的前途。所以这个会议是重要的，是只可成功不宜失败的。

国家的存亡和社会的治乱是关系每一个国民的身家职业的。想回乡的人们关怀交通。受黄灾的人们关怀河工。没有职业的人们关怀工商农矿。而一切的一切都以国家统一社会安宁为前提条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政治协商会议的议题乃是全国每一个国民身家职业的前提条件。我们相信全国每一个国民谁都希望这个会议的成功。这个会议所以具有道义力量，就在这里。我们希望并确信参加会议的诸君，在心目中，只有国家存亡社会治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参加会议，决不是为了一党一派一己之私。这就是会议的道义力量的根源。这一道义力量如能充分表现充分发挥，足以造成今日国内最感缺乏的互信。互信在今日是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基点。我们希望参加会议的诸君有此信念，有此抱负。

八年抗战，牺牲了多少同胞的生命，毁损了多少同胞的身家！当此抗战结束和平肇始之今日，大家都要竭尽所有的力量，使胜利的光荣归于国家，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谁都不会听任国

家应享的胜利光荣减色，人民应享的胜利果实流产。谁都要确保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导入民主法治的前途。我们谨以此普遍而迫切的要求，预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中央日报》）

祝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经过一年以上的民意呼吁，《国共会谈纪要》的确定，以及数月来国内外人士的催促，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今天开幕。这是一个难产的会议，然而却肩负着时局转换的重任，其成败利钝，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的命运，间接关系着世界的持久和平，所以各方都寄与很大的期望。

为了实现民主团结，我们在一年以前，就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立即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跻中国于民主宪政之林。这个主张得到广大的同情拥护，却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到去年九十月间，经过四十多天的国共谈判，总算在《国共会谈纪要》中，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而三月来几经波折，迟到今天才召开。这就是由党派会议演变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发展过程。

《国共会谈纪要》规定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今天中国有什么“国是”需要协商？不言而喻的，就是究竟要采取什么途径，才能有效的以和平代内战，以民主代独裁，以团结代内讧，以统一代分裂。

我们对于这些根本问题，曾经提出许多意见，而最主要的就

是：（一）认定内战必须无条件全面停止；（二）国民党当局在会谈纪要中曾经允诺的保障人民权利，如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汉奸以外一切政治犯之释放，特务权利之废止，必须立即兑现。中共代表团来渝之后，尤其全心全意为此而努力。我们认为这两件大事都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做到。只有在会前做到这两件大事，才能出现和谐气象，进一步来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经过了一切努力，这两件大事终究没有在会前做到，我们对此深表惋惜，全国人民与国际盟友，也必定与我们同感。

面对着这一现实，政治协商会议在万目睽睽之下开幕，其任务之艰巨，是很明显的。我们依然要求，在会前没有做到的事，必须在开会过程中首先求其实现。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问题，已商定的停战命令，必须立即由双方同时发布，使双方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各暂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不能再多所要求，横生枝节，而阻挠和平的实现。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会谈纪要中所曾允诺的保障人民权利，也必须立即兑现。否则，会议的空气既然无法和谐，而关系国家大计的实际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那就会使全国人民失望，使国际盟友益增焦虑。

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当然有待于代表诸先生的努力奋斗，特别有待于召集者（政府）的诚意表现。如果政府顺应大势与人心，把内战立刻无条件停止，把束缚人民自由的锁链解开，那将开始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如果依然因循敷衍，不肯以和平代内战，不肯以民主代独裁，不肯以团结代内讧，也不肯以统一代分裂，那将遭受人民的鄙弃与正义的谴责。为功为罪，成功与失败，中国政治现在真正到了决定的关头。

今天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一天，也是联合国大会开幕的一

天，这虽然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却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联合国大会是为实现世界和平民主而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则为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而召开。世界大势可以影响中国，甚至在某种范围内决定中国命运，而中国问题能否解决或解决适当与否，亦不可避免要影响世界。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在同一天开幕，其意义更加重要。

我们希望全体代表与政府当局自省责任之重大，把握时局转换之枢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人民意志为依归，不要再失时机，不要再贻百世之羞，而要当机立断，以便转祸为福。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勉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大公报》社评

人人翫望甚至全世界都在关切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今天在重庆揭幕了。在重庆开这个会，实在很好。在重庆，曾经指挥抗战，得庆最后胜利；在重庆，更要协商政治，拨乱反治，预庆建国成功。这双重的喜庆，都在重庆收获与开拓，重庆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重庆。

今天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当前中国的第一等大事。我们对之瞩目，开头应该先说两句吉利话，其实我们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毋宁是极其沉重的。我们纵观世界大势，默察国家实况，体会人民心理，中国都非和平安定不可。这个政治协商，是应时代的迫切要求而产生，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一、世界经过几年的大战，现在既把轴心打倒，重见和平，世界的人心都已厌乱思治，耻闻中国的内乱，讨厌中国的内乱。不但在心理感情上厌恶，而在实际利害上也不相容。由于这次大战的结果，已证明是世界一家，和平不可分。中国一国的不和平，就可能影响到世界的不和平；中国一国的战乱，也可能影响起世界的战乱。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的劝告，是美英苏尤其是美苏两大盟邦对中国联合一致的劝告，要中国停止内乱，而走上统一民主之路。这是劝告，也就意味着世界不容许中国有内乱。

二、中国经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更历八年苦战，现在得到胜利，更得了相当高的国际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和平建设，中国真有繁荣强大之望，岂容自我断丧，而漫然断送？中国抗战胜利后所摆在面前的大小许许多多的国内问题，都要解决，却都非政治解决不可。“政治解决”之说，倡自蒋主席，而为共产党所赞同，但迄未解决成功，而自日本投降以来，反倒大举动起手来。真是危险！假使从此兵连祸结下去，请想非但国家胜利的果实被践踏于战乱脚下，国家与人民也都将由此打入十八层地狱。如天之幸！大家似已明白此危险，且也事实证明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尤其不能借此达到政治的意图。事理昭然，非政治解决不可。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为政府与党派的利益计，都非政治解决不可。

三、抗战之后，国家要求治理，人民尤其要求解放。看这次大战之后的胜利国家，谁不在整顿国事以履足人民？今天的中国人民，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在期待，也都在要求，要政治一新，国家进步，民生苏息。假使这期待与要求都无踪影，反而大打内战，更陷人民于痛苦，那怎么可以？语云：“众怒难犯，专欲难成”，重违四万万老百姓之望，更犯了人民的众怒，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四、我们绝不可因为抗战胜利了而对国事掉以轻心，要知道这次抗战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抗战胜利了，仅仅免了亡国之祸，而因八年大战，经过大流血，大破坏，经济已达危险阶段，民生尤其困苦不堪。大家一定要认识这危险，假使掉以轻心，甚至自我断丧，一声经济崩溃，就是大糜烂，那恐怕绝不是“内战”或“内乱”之类的名词所能形容的了。

以上四点大势，都撰得清清楚楚，内外大势，都归结到这次

政治协商会议非解决问题不可，非成功不可。

怎样解决问题？怎样达到成功？我们还准备继续贡献蕝蕝，今天先说两点原则：

第一、我们之所谓解决问题，不是苟且弥缝；非一时停战，乃永久弭战。目前国家的迫切要求，是和平安定。这一步必须做到，国家才可于和平安定中求进步。中国还在革命中，我们非但不能倒退，且必须前进。中国的革命，已不需要暴力，应如西人所倡之“同意革命”(Revolution by Consent)，用和平协商的方式，从事国家大革新。中国在今天，非实行重大改革不可了，这次协商会议非使人一新耳目不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尤其非做到不可。

第二、我们特别警告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无论你代表的是那党那派，都必须一切以国家为重，不得执拗于各自党派的利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国家解决问题的难得机会，是千载一时。当此时机，若是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失败了，其后果恐将是国家大糜烂，那可太严重了！做政治的人，必不可有后悔，而误国家大事。凡属从事政治的人，绝少居心祸国之人，但因一念之私，以致愆事误国者，则比比皆是。这次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家拨乱反治之机，是国家和平进步之阶，务望各位代表珍重！为国家珍重，为人民珍重！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大公报》)

政治协商会议揭幕

重庆《国民公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是去年十月间国共会谈的产物，在会谈纪要的第二项中曾有这样的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计自会谈纪要公布，到今天协商会议揭幕，整整的筹备了两个月。其间一延再拖，可谓难产，今天总算开成，虽说稍觉迟滞，但毕竟是民国进入三十五年头的第一件大好事，大喜事！

好事喜事，由政治协商会议的揭幕开端，此后定会接踵而来。我们昨天在社论（按：指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社论《时局的转机》）中说，政治协商会议开成了，应该誉为国民局面的大转机，我们今天仍然如此瞩目。这会议既名政治协商，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协商政治。政治的范围极宽广，所以会议办法第一条即称是“共商国是”。今日国家如何才“是”？这是会议的唯一议题。我们放眼一看，抗战胜利了，而北方仍是一片烽火，这是国家的“不是”；抗战结束了，而全国的建设仍是无法进行，这是国家的“不是”；民国成立已三十五年了，国宪尚未制定，宪政尚未实施，举国滔滔，仍如乱麻，政治不上轨道如故，这也是国家的“不是”。凡

此不是，都是我们国家今日的羞辱。今天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集三十八位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于一堂，就是要变“不是”为“是”。第一要求全国掩旗息鼓，化干戈为玉帛，就是和平。第二要求集中全国的智慧与识见，推进建设，就是建国。第三要求迅速制颁大法，实行宪治，奠立民治的基础。这三项任务达到了，就是今日政治协商会议的至高成就，我们今当会议揭幕之日，先此预祝。

本会议是国家在宪政实施以前的特种组织，与国民参政会之为在抗战期间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意义相同，而性质各别。国家在今天，抗战结束，胜利到来，已经进入另一个新的局面。今日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一新局面下的产品。协商范围不广，而协商的任务则特别重大，会议的地位虽不具体，而会议商定的事项，却必为国民政府所采择实施。何以故？今日国家的大事，说起来，诚无过于和平建国，与召开国民大会。会议责任重大，自应要而不繁，大原则大前提与大决策，才提出来协商，一切细微末节，简而易行的，都可不谈，我们急需要国家中心问题的解决。切不可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上来大做文章，而于和平建国的根本要图，却轻描淡写，终年成为悬案，我们今天要的不是纸面上的报告，而是实际的方案，具体的办法，再则会议既为协商，自与普通会议有些不同。普通会议可开而不议，或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政治协商会议可不能，开必须议，议并须协议，由全体会员来协商。意见如有参差，应该先求协调，最后求得一条大家可走的路。所以我们希望所商各点，尽可能求得一致的协议，否则也不要差得太远。协议是全体的意思，全体的意思必为全体所信守、所奉行。如此，决议便不会变成具文，变成历史上的资料。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衮衮诸公，你们正担负了中国今日的历史使命。我们从今天起，切望中国现代史能重写一页，国家局面由战乱变为和平，由分裂化为统一，由破坏转为建设，由训政进为宪治。三十八位会员们，你们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四万万同胞的前途幸福，系于此一会议，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也系于此一会议，我们面对着国家今日破碎的局面，和长期的忧患，这实在是最紧急的呼吁。人类究竟是属于感情的动物，大家的政治观点虽有出入，而彼此都是炎黄子孙，岂忍得住不稍念同胞骨肉之情，而自相残杀，貽国族于阽危！我们今天真是到了全面反省、澈底醒悟的时候，彼此由互谅进而互让，由互让进而求得协商，这会必可成功。

最后，今天的国是，正由协商来解决，我们要求全国舆论界协助，收起刺激性的文字，求得感情上的融洽，为会议成功之路打扫清楚。

（原载1946年1月10日重庆《国民公报》）

贯彻四项民主措施

重庆《新民报》社评

关于人民各种基本自由权利之保障，在《国共会谈纪要》四五六七八等项之内，本来已有明确的纪录，这回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日，蒋主席重提保证，表示政府准备实施。因此当前天梁漱溟氏提出“会谈纪要有关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事项”作为议程时，就受到一部分代表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蒋主席已经宣布过，这问题已经解决，可以不必再讨论。究竟政治协商会议应否讨论这些问题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主张政治协商会议重新检讨这些问题的理由极简单，那就是希望政府的决策能够贯彻。我们知道政府是有诚意的，更绝对相信蒋主席的宣布已经确定了这些问题的大原则。但是，也正为了要完成蒋主席所宣布的原则，政治协商会议要考虑人民各种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实施方案。一切问题，单求原则之解决，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办法，研究实际的效果。尤其是这些基本权利，我们曾有过很多次的希望与失望，我们深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所以不得不着重于实际的办法与效果。大家想想看，过去的参政会，中常会，以及政府历次的文告，那一次没有民主的诺言，那一次没有保障人权的郑重宣布，可是到今天依然还是问题，为什么如此？就因为我们中了原则的迷惑。凡事只求原则的解决，而不讲求具体的实际的效果。再请大家想想，假如原则确定，问题就算解决，那么去年双十谈判纪要中的

四五六七八各项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为什么还未见实施？为什么还待蒋主席这次重新宣布一番？这都是眼见的事实，任何人所能了解的。倘以为原则决定，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可以不必再提，这种想法，倘不是太天真，就是有偏见。而在客观上则是阻碍蒋主席对于民主措施的深切期望，使得在上者求治之心无从下达。

说了上面一番话，我们的意思并不在责备政府，也不是算陈帐，我们只在提醒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民间的有心人士，要警惕民主运动的再一次被软化。我们要求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千万不要再教我们人民尝受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滋味，我们今日所要求者，是把握得到的实际自由与权利，而不是原则上可以这样，实际上又是那样的事儿，也不要再让我们永远徘徊于希望失望之间，要给我们以实际利益。我们更要告诉所有热心于民主的朋友，千万不要太乐观，非至政府所宣布的都已见诸事实，自由权利的争取即不能放松。我们信任政府，信仰领袖，但要预防政治的惰性作用，提防执行者的口惠而实不至。只有帮助政府贯彻各项民主措施，才是我们人民拥护政府的最诚意的行动。民主政治的目标，本来就是由民间领导政府，各项民主措施能否贯彻，也就看民间的力量能否督促政府真心实施；怎样督促？（一）要明白指出各种违反民主的事实，要求具体的改善。（二）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要有誓死守护的精神，不作一丝一毫的退让，养成民主的法治精神。（三）要知道离开具体的事实，原则是空虚的，对于以后的民主措施，我们要问问实际，看看办法，作合理的判断，而不受空洞的原则所迷惑。西人有言，“民主有如爱情，须加以不断的克服与不断的发展”，我们的民主途程方在开始，难道就可以满足于原则上的解决吗？未免太早了！

（原载1946年1月13日重庆《新民报》）

祝政治协商会议

昆明《云南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于七日举行茶会，此为正式会议前夕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之首次集会，空气和谐，建议中肯。今天陪都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想见会议地址，车水马龙，有一番热闹气象。我们昆明报人，为国是，为建国，对会议，谨致最诚恳的敬意，并盼望收到成功的结果。

第一、我们重视此会议，因为与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关系民族兴灭维绝。而此次会议正象征着国是的共同研讨，前三天茶会的代表们说，此次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则民族复兴，失败则民族危运来临。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第二、在会议之前，各方造成和谐的气氛。本来政治协商，贵在妥协，尤贵和谐。近些年来，各党各派之间，与其说政纲政策的差别，无宁说是心理及态度相悬太远的原故。常言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我们常想，在朝的国民党，在野的共产党及民主同盟等各党在原则上均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而谋国是，尤在冷静、客观。大家今日，均面临着八年大战后的教训，任何党派及无党无派，均有“国家兴亡，鄙夫有责”的重任，我们国人无中立，因为它关系整个机构、与民族成败，因此会前不妨各人贡献意见，俾使造成良好的气氛。

第三，各党应有诚意。以目前各政党立场及社会地位说，均未至成熟阶段，较之英美政党地位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总之“诚意”二字为先决问题，考诸史乘英国之联合政府，法国之人民阵线，莫不以国家为前题，党派利益次之。此次政治协商，期其必成，只问共产党有无诚意参加建国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政治哲学，以“一党独裁与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最后目的，对于中国现状，似缺民主意义，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重视中国当前民生疾苦，体念蒋主席抗战建国之苦衷，服从多数意志，放弃私党政治意见，以完成中华民国的建国大业。

第四、希望各党派能和衷共济，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须知人民为党派之后盾，党派以国家为依归，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民主团结，人人希望……为百年大计，为建国工作，我们应捐除私见，完成大我。千言万语，并作一语，要国家有办法，党派才能生存，政党健全，政党进步，国家才有前途。

“协商”二字，顾名思义，应该消除矛盾，避免冲突，使一切问题，都可用会议谈判方式解决。据本报重庆电，协商会议幕前交换意见，情形极为良好，马特使与国共两党在怡园之谈话，亦曾造成和谐空气。好音传来，举国庆幸，希望此种空气，继续维持，敬祝会议前途乐观，国家前途乐观。

（原载1946年1月10日昆明《云南日报》）

(五)各团体、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强烈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民主建国会等三团体筹组
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中国人民救国会(前救国会)，昨晚七时假迁川工厂联合会邀集各界代表，商讨筹组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商讨会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等主持。并先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沈钧儒报告两日来政治协商会议进展情形，次即进行讨论，当即通过组织“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并即日开始工作。通过该会采主席团制，内设秘书、新闻等若干专门组。每日举行大会一次，分请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以听取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报告，并藉以表达民意。会议通过定期举行各界庆祝和平大会，其日期由主席团酌定。最后通过主席团名单，计当选为主席团的有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三十五人。

(原载1946年1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

陪都教育文化界人士成立 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昨日下午二时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开成立大会，到有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戏剧界、电影界、漫画界、木刻界、美术界、音乐界、出版界、杂志界代表人士：茅盾、陶行知、邓初民、曹孟君、侯外庐、洪深、张西曼、冯雪峰、阳翰笙、陈白尘、胡风、郑君里、辛汉文、黄洛峰、李公朴、章锡琛、秦柳方、汪刃锋、丁正献等七十余人，由陶行知主席，通过简章并选出侯外庐、邓初民、翦伯赞、陶行知、茅盾、李公朴、冯乃超、陈白尘、阳翰笙、郑君里、司徒慧敏、叶浅予、黄洛峰、曹孟君、倪贻德、王琦、夏白等十七位为理事，胡风、巴金、王寅生、张西曼、章锡琛为候补理事。会中请罗隆基报告政治协商会议最近几天的小组会议商谈的情形，罗先生讲完之后，大家就罗先生所讲的提出了一些意见：第一、关于地方政权的问题；第二、关于否决权，主席用人权，紧急处置权，希望民主同盟无论如何要坚持原来的提案；第三、关于各党派推出参加政府的人，不必要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过，这不仅是手续问题，而是要向国民党负责的问题；第四、无党派参加政府的人选，不能由主席一人指定。第五、不但要坚持改组政府的一些原则问题，对于各种具体的问题也要坚持，不能一再退让，委曲求全，只谋得协商表面上的解决。（原载1946年1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

一 政治协商会议之主要原则

(一) 双方既已下令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即应商定永息内争及军事问题之基本方案，确保决不再有内战之发生，对于目前已开始进行之三人执行部考查团等工作，尤应协助、推进、监督，期其收到良好之效果。

(二) 政府应立即执行《双十纪要》及在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关于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之各项诺言。

(三) 政治犯必须普遍迅速予以释放，特务机关必须澈底取消，并不得再用变相方法名废实存。

(四) 会议必须商定今后施政纲领，俾政府、各党派及全国人民均有共同政治原则，可资遵循，必须即行改组政府，决定关于国民大会之各种问题，及提出修正宪法草案之原则与要点。

(五) 会议之各种决议案，对政府及各党派应有拘束力，参加会议之各方，须负责保证其实施。

(六) 会议之会期，应依照实际需要及与会各方面多数之决定，得延长之。

(七) 会议之决议及讨论情况，应随时公布，开会时应允许各方代表之顾问列席，及人民团体代表旁听。

(八) 人民对会议得推派代表到场陈述意见，及公开自由批评。

二 停止内战及军事问题

(一) 关于目前执行停止内战及复员裁兵整编改编军队种种措施，应根据双方已商定之原则，切实办理，务期达到全面停止冲突，及合理可行之限度，遇有争执，应依据全国及当地人民之意见，由政治协商会议提出解决之方案。

(二) 敌军在华部队，应限期受降、缴械、集中遣回。敌军军官及他种军事人员，应分别逮捕，严惩战犯。不得以任何名义改编。受降缴械之执行，应为就近之军队。所缴之武器，应暂封存，未有合理处置前，任何方面不得动用。受降、缴械、封存武器等工作之进行，应有人民之监督及公开之报告。

(三) 伪军首领重要官佐及汉奸，须澈底搜捕治罪，不得任用。伪军无论改编与否，均应一律解散。

(四) 政治协商会议应请美国限期撤回在华部队，以免被卷入内战漩涡。所有美械，应完全为整军之用，并妥定办法，防止再用于内战。

(五) 政治协商会议应根据国防、地方治安、及各军实际情况，决定全国军队整编及驻军地区划分之原则。

三 联合政府

(一) 为加速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立即结束一党训政，并于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组织临时性的联合政府，作为民主的中央施政机构。

(二) 由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施政纲领，作为联合政府执行

一切政务之最高指导方针。

(三) 以国防最高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之制度，应行撤销，另设全国政治会议，为国民大会召开前之最高政权机关，其组织法及人数比例及人选，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

(四)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应立即召开全国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五) 由全国政治会议推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府委员，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组织法，应参考责任内阁制与联合政府之精神，予以修改，不应使国民政府主席独负重责。

(六) 联合政府国府委员应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由全国政治会议规定人数比例，获得一致之同意推选之。

(七) 在联合政府国府委员会之下的五院，除应即行政改组行政院外，其他各院，亦应请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八) 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之设置，应依据施政实际需要，与事权集中之原则，由全国临时政治会议决定之。

(九) 行政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及各部会首长人选，均应经国府委员会通过后，由主席任命之。

(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即撤销，军事行政部分，应直隶行政院。关于裁兵、整编等善后事宜，可另设立临时整军委员会办理之。

(十一) 现行文官任用条例，应即予修改，以便各方人士参加各级政府中工作。

(十二) 在行政院之下，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延揽各界有代表性人士，以及对经济事业有学识经验之人士组织之，以决定关于全国经济事业之复员、调整、建设计划等之具体方策。

四 省县政权

(一)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关系，应立即切实实行均权制。在省市县人民选举之政府成立以前，由中央依据目前地方实际情况，先行酌照各方面人数比例之原则，分别改任省主席、委员、厅长、秘书长，增设副主席、副秘书长。省级官吏得由地方人民向中央推荐加委，不得以军人充任。省政府之组织法，立即以民主会议制之原则修正之。

(二) 由国府明令全国乡镇，准予人民自动选举乡镇长，实行自治。

(三) 各省地方自治，限定于一年内完成。

(四) 各县中实行自治之乡达到半数以上时，得自动选举县长，实行县自治。各省中实行自治之县，达到半数以上时，得由各县推选代表，组织省民代表会议，制定省宪，按照省宪选举省长，实行省自治。

(五) 各省县乡长之选举，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人民直接普选。

(六) 各省县乡选举时，由全国政治会议推定人员监督之。

(七) 田赋及其他可靠之地方税，应尽先拨充乡镇及县之经费，以确定其财政基础，省预算有不足时，由国家补助之。

(八) 明白划定省县乡自治政府之权限。

(九) 第一项办法及省县自治，于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后，即行开始施行，尽民国三十五年内完成之。

五 国民大会

(一) 国民大会召开之先决条件。

(1) 在全国和平团结而无内战之情况下。

(2) 人民享有各种基本自由，并能保障其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3) 结束一党训政，制定民主性的施政纲领，成立过渡时之联合性的民主政府。

(4) 联合政府负责保证于一年内普遍实行地方自治。

(5) 各党派获得合法平等地位，各党派及各界人民团体代表人士，包括实业团体、文化团体、大学教职员、学生、妇女等，均有参加国民大会之机会。

(6) 联合政府依据现实国情及人民意志，重订国民大会之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

(7) 《五五宪草》经过各党派各界人民团体及其代表人士之研讨，提出修正。

(8) 关于国民大会之筹备机关及筹备工作，应由各党派与各界人民团体之人士，共同组织进行之。

(二) 国民大会之开会日期。

政府原已公布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但在开会前，必须对许多先决问题求得圆满解决，否则决不能勉强召开，反致纠纷，其日期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

(三) 国民大会之职权问题。

(1) 本届国民大会代表既系由人民普选而产生，则其有制宪之职权，当无疑义。至于是否行宪，须视开会时政治环境，人民意志及大会本身情况而定。

(2) 即使本届国民大会不能行宪，对国家大计之各种问题，均应有讨论决定之权，不应限制其职权仅为制宪。

(四) 国民大会代表问题。

代表应由全国人民以无记名单记投票方式普选产生之。旧代

表一律无效。

(五) 国民大会组织法应行重订之各要点。

(1) 本届国民大会应制定宪法及决定国家大计之各种问题，如不兼行宪之权，则应有“决定宪法上所规定之国民大会召集之日期”之规定，而不应止于“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如兼行宪之权，则应有“决定开始实施宪政行使宪法上所赋予之职权”的规定（现行法第一条）

(2) 国民党中央委员不应为当然代表（第三条）。

(3) 国民大会代表如已增多，则原定之主席团三十一人之数，应行增多（第七条）

(4) 会期十日至二十日仅制宪工作，亦嫌太短，何况整个国家各种问题均须详加讨论？应改为三十日至五十日（中间不妨有休会日期）（第十条）。

(5) 仅限于制宪之国民大会会期完毕，当然任务终了，但本届大会，除宪制外尚有决定国家大计各种问题之权，则会闭后，应有一常设机关，负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之责，至宪法所规定之国民大会开会时为止（第十一条）

(六) 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应行重订之各要点。

(1) 凡本法中“当然代表”、“指定代表”、“指定候选人”、“推选候选人”一类之规定，应一律废除，一切代表均不得违反普选之原则。

(2) 区域选举，由乡镇长或坊长联合推选候选人之规定，应删除。（第二章）

(3) 职业选举规定“以本法公布前依法成立之职业团体为限”，应改为自本法修正公布后为限。（第三章）

(4) 职业团体之代表，应由其会员普选，而不应限于以职员

推选候选人。(第三章)

(5) 职业团体之候选人资格，限制其必须从业三年以上，应改为二年以上，因抗战八年，停战不久，人民流动，变更职业者甚多。(第三章)

(6) 辽、吉、黑、热四省，业经收复，省区改划，不应定为特种选举。(第四章第一节)

(7) 对蒙古、新疆、西藏、及杂居各省内回族、及苗夷、徭保等少数民族，应另行规定民族代表之选举办法。(第四章第二节)

(8) 军队在抗战中及战后扩编，改编、整编之变动极多，数额亦大，应不分派系，增加名额，其候选人应由全体官兵伙平等普选(第四章第四节)

(9) 特种选举中，应规定实业团体、文化团体、大学教职员、学生、妇女四部分代表之选举办法，以补职业选举之不足。

(10) 各级选举事务之办理，及各级选举之监督，应由政府与各党派各界人民团体之代表人士，共同组织委员会，以民主方式执行之。

六 对施政纲领之意见

施政纲领为联合政府执行政务之最高指导方针，联合政府为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贤达人士，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所组成之临时性过渡政府。我们针对此点提供意见，以备社会人士暨政治协商会代表研究和采择。

(一) 中国国民党应结束训政，由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贤达人士，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二)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组织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为全国

最高政治机构。联合政府——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对政治会议负责，受政治会议指导。

(三) 关于政治方面的意见。

(1) 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学术、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之基本自由。凡妨害此项基本自由之一切法令、制度、机构等，应立即废止之，并制定妨害基本自由之惩处法规。

(2) 实行普选制度。中华民国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不受财产、教育、信仰、性别、种族等之限制。

(3) 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

(4) 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省行政首长，实行民选。

(5) 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县为自治之单位，县以下各级自治机构，应由人民选举之代表治理。现行之保甲制度，应立即废止。

(6) 全国特务机构，应立即解散。

(7) 凡构成中华民国之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依据民族自决之原则，国内各少数民族，得根据其大多数人民之自由意志成立一民族或数民族联合为一单位的自治组织，或成为独立国家，组成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四) 关于经济方面的意见。

(1) 实施计划经济，完成工业革命，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故应建立工业体制，分国营与民营工业之领域，其基本原则如次：
① 凡事业归私人经营较归国家经营更为有效者，应归私人经营，而由政府制定法律，奖励并保护其发展；
② 凡具有独占性者，应由国家主办，但得由政府斟酌性质委托民营。

(2) 完成工业革命，非在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故于完成革命之际，应逐渐发展国家资本，以避免分配之不均，其步骤如次：①在建设初期，须保护私人资本与国营企业同时并进，②由国家采取适当政策，保障人民生活之公平与满足。

(3) 为完成工业革命，发展我国经济，得利用外资，但必须依照下列原则：①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完整；②应使外资配合我国计划经济之实施，毋令外资支配计划；③外资应运用于基础性与关键性之重工业，及长期性的生产事业，如：农林、渔牧、工矿、交通等项生产事业；④外资利用，应以国家一般信用为证，不应以政府税收或事业收入为抵押，以免破损主权，掠夺资源，与干涉内政之危险。

(4) 建立新税制，力谋税制之完整与协调，革除现行税制之缺点。着重对人税，减轻对物税，尤其消费税，以谋国民财富之平均分配，而使贫富界限，渐归消灭。

(5) 在复员期中，政府应即采取下列之紧急措施：①救助因战事停止而感受压迫之民营工业；②停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防止物价之暴涨暴跌。

(五) 本会对于军事方面，除在停止内战各项的意见外更提出下列的意见。

(1) 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

(2) 按照国防上实际需要，军备实行减缩，军队实行整编，以实现精兵主义。

(3) 实行征兵制，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之义务。

(4) 改善官兵生活，提高官兵文化水准。

(六) 关于外交方面的意见。

(1) 我国外交政策，为实现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外交必须公开，秘密缔约与协定，概作无效。

(2) 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平等的地位，切实合作。

(3) 实践中苏友好盟约，并忠实履行大西洋宪章，莫斯科会议四国宣言，开罗会议决议，及所有民主国家与我国所订立之平等条件及诺言。

(4) 任何国家均不得有在我国领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

(5) 以外交方式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及一切我国固有之领土。

(6) 实行扶助弱小民族政策，对各殖民地人民之独立运动，应予以同情及协助。

(七) 关于扶助农工的意见。

(1) 农民方面：①发展农村合作运动，建立集体农场，以期逐渐达到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之目的。②改善地主与佃农关系，禁止各地一切非法压迫剥削佃户的恶习，制定保障佃农之法令。③防止农村土地兼并。④取消高利贷，铲除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⑤改良农贷，简化其手续，使中小农均得蒙其利，并给予贫农以不需抵押或担保的低利贷款。⑥修改农会法，促进农民的团结。⑦扶助小农，增加生产。⑧提高农民之知识与生活水准。

(2) 工人方面：①切实改善劳工条件，并提高工人待遇，保障工人生活，对失业工人应予救济与安置。②工资津贴，应予按照生活指数调整，并实行不分性别，同工同酬。③取消包工制，严禁雇用十四岁未之童工。④工人有罢工权，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⑤工人有缔结团结协约，参加工厂会议之权。⑥取消员工混

合组织制，工会书记派遣制，并废止管制工人之法令。⑦确认民主集中制为工会组织之最高原则，在纵的系统上，并应逐级组织县市总工会，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在一种企业上，应为产业组织。⑧各级民意机关，应有定额的工人代表参加。代表之产生，一律由工人自选。⑨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或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之工人代表，一律由全国性的工人团体自由选举。

(八) 关于教育文化的意见。

(1) 凡中华民国人民，均有享受教育之机会。

(2) 以民主与科学之精神，普及与提高公民教育，并扫除文盲。

(3) 鼓励思想、学术、文艺之自由，并协助文化活动。凡足以妨碍教育、学术、文化之措施，均应革除。

(4) 保障教育人员，文化工作人员的生活。

(九) 关于保护侨胞的意见。

(1) 实行保护海外各地侨胞之利益与安全，并提高其政治经济地位。各地侨胞文化教育事业应予以帮助。

(2) 各地归侨，应依其志愿，资遣返回各地，并向各居留政府切实交涉，妥谋其安全，归还其财产。如因大战破坏而受损失者，应由政府负责赔偿。

(3) 对归国侨胞，应按照其技能，特别予以参加国内建设事业之一切机会。侨生回国就学，应予以特别便利。

(十) 关于复员意见。

(1) 严厉执行全国复员，恢复平时状态，所有战时机构以及一切战时措施，应立即停止，并迅速实行军事复员，切实执行停战命令。

(2) 抗日官兵依限退伍。

- (3) 青年志愿兵应即复员，并使之复校、复业。
- (4) 退伍官兵的生活与职业，应予以切实保障。
- (5) 优待荣誉军人与其家属及殉国官兵遗族。
- (6) 服务后方公教人员及撤退后方之职工，一律优先复员。
- (7) 各地义民回乡，政府应予以充分的协助。
- (8) 人民抗战期间所受损失，应由政府负责赔偿。
- (9) 国际善后救济总署，在我国设立分署，应由我国人民代表监督，以达到公开公平之原则。

(原载1946年1月26、27日重庆《新华日报》)

九三学社筹备会对 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已历多日。在举世切待和平，全国痛心内战之际，会议之初，即将内部冲突停止，举国欢腾，咸翘首以待其连续圆满之后果，日来正进入于商讨各项重大问题之时，争论未决之事件居多，有时还嫌偏于枝节。与会诸君子为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之士，对当前国事自能以国利民福为依归，不斤斤于一党一派之私，凡有关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诸大问题，当能以和谐互让之精神，公正互尊之态度，求得合理之解决，迅速而诚实的置于实施，以副全国人民之望。盖今日之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成则国家即可入于和平统一富强康乐之途，败则混乱分离，不堪设想。读黄台瓜词，不忍听四摘抱蔓之声，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因此不敢缄默，贡献下列之意见：

一、开放政权问题：各党派一再声言，在蒋主席领导下及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下而努力，则政府自不必固执以往法统之成见，应从速开放中央及地方政权，使全国人才，参加各级政治机关，刷新政治，以新中外人民耳目。

二、关于民主与自由权利问题：本月十日第一次大会政府宣言决定实施事项中有“(一) 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二) 司法与警察以外的机关，不得拘捕、审

讯及处罚人民。(三)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以内公开活动。”现为时已久，应请从速实践。今后关于民主与自由权利问题，在宪法未公布前，自当本此宣言遵守勿渝，实施勿懈。若有与此宣言抵触或不遵守之行为，不论何人皆当依法惩处。

三、切实执行停止军事冲突之命令：停战令下，至今多日，各方仍有军事冲突，现军事调处执行部既已组成，且经开始工作，即应将此种违反命令之行为，报告有关当局，严加制止，并予处罚，同时公诸社会，以求舆论之制裁。

四、关于整军问题：根绝内战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然欲达此目的，端在大量裁兵。查现有军队二百五十三师，三百八十多万人，加上伪军，数在四百五十万人以上。伪军应从速遣散，自不必论，其余二百五十三师，军政部有在半年内缩编为九十师之计划，希望其从速实施，依计划克日完成，并望于一年以内继续编遣至最小限度。因兵多易肇战事，且就现在国家经济力量，实无力供养，同时在国际和平现阶段中，亦无多兵之必要。今日之计，应将占国家预算百分之四十七之军费节出，办理教育实业，以改善民生。盖今日除弊实重于兴利，故裁兵实为要着。我们更主张以政管军，不要以军干政，以达到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五、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问题：政府在本月十日宣布之实施事项中，有“各地积极推动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现在县的基层政治机构为保甲，但是保甲并非由普选产生，更谈不到由下而上，他是封建的不民主的根苗，也是贪污的渊藪。故要推行地方自治，使其民主化，就要废除保甲制度。

六、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以普选为原则召开国民大会，自是人民公意，亦同人等之主张。惟数日来各方意见甚多，有因此一

问题而影响会议进行之危险。仍望顾全事实，求得公正合理之解决，以副民望。

此外尚有急待解决不必多所讨论即可施行者：

七、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

八、从速公审并严惩文武汉奸。

九、严惩贪污，以儆官邪。

十、优待荣军及抗属，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抚辑流亡，安定民生。

以上诸端为急待解决之荦荦大者，望能据实商讨，付诸实施，国家幸甚。

九三学社筹备会

三十五年一月十八日重庆

(原载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促进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七点建议

胜利来临，举国狂欢，人人以为从此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独立自由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谁知道接着就发生内战，甚至蔓延到十一省之多，虽有国共协定，仍以兵戎相见，这种危机，大有可能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状态，凡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没有不痛心疾首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贵会议开幕了。贵会议现已不是国共的协商会议，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全国人民代表的协商会议，所以这个会议，一定要是挽回危机打开僵局的会议，一定要是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掀转整个中华民国历史的革命会议，不独全国人民所瞩目，也是全世界所关切的会议。

在民主的世界里，任何党派和政府，都应以人民利益为前提，这是颠扑不破的铁的真理，因此，本会认为这个协商会议，关系人民的利益太大了，全国人民不独要特别注意，而且要运用一切力量来促其成功，使各种问题的解决，不是苟且敷衍，而是彻底清算。所以贵会议的责任，实很重大，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幸福为前提，而全国人民也必为贵会议之后盾，务必趁此时机，产生一个崭新的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本会以人民的立场，提出当前最迫切的建议如下：

一、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全国人民已一致要求全民政

治的立即实现，而蒋主席也始终主张：“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造成全民的政治。”足见一党专政已成陈迹，还政于民，势所必然。现在政府措施不满民意，责备的声浪，遍于全国，又足见民意的要求，在立即撤销一党专政，为国民党减轻责任计，亦当乘机还政于民，不宜拖延，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应即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组织举国一致的中央民主政府，同时决议地方各级政府的民主化，使地方民主政府成立后办理正式最高权力机关的选举，乃属彻底民主化改革的必要。

二、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正式最高权力机构未成立前，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中央政府应对政治协商会议负责，会议中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名额，至少必须增加达各党各派代表总数的两倍，乃促以健全机构，其人选由会议就各省社会贤达推举之。

三、原有国民大会代表应宣布无效，重行选举。原有国民大会代表，本属一党专政时代，以不民主的选举法选出，而且世界绝无以十年前选出的代表，来代表十年后环境大变时代的民意的事例，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重行选举代表，已为一致的呼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即行决议宣布原有国民大会代表的无效，而审慎修正选举法，务使公平无弊，选出足以代表民意的代表。

四、修改《五五宪草》。《五五宪草》不合民主精神的地方，必须由政治协商会议重行修改。

五、绝对保障人民一切自由。蒋主席已宣布：“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但财产、居住、迁徙、通信秘密等自由应不受限制，实应即日明令宣布，在国内任何区域，均不得借口别种原因作妨害自由的措施，如检查新闻等。

六、各党党费应由各党自行负担。国民党专政二十年中，党费取诸国库，人民负担甚重，蒋主席已宣布各政党在法律前地位平等，而现在政党不止一两个，无论原则上、事实上，都不应再由国库负担党费，应即宣布国库停止支出。

七、发展民主化的经济。胜利以后，经济纷乱的现象，应作一个彻底的检讨。为什么胜利以后，各沦陷区的物价，反而涨无止境，后方民族工业，反而因胜利而破产，官僚资本何以到处膨胀，弄得全国民不聊生，怎样才能铲除官僚资本，使国民经济自由发展，使资本家、地主与工农阶级不独各得其所，而且互相协助，共同建设富强的国家，使失业恐慌不再发生，工农生活有确切的保障，一面尽量利用外资，一面使本国经济的独立发展不受损害，这个全国各方面、各阶层利益都须顾到的经济建设计划，不是一党一派可能办到的，只有而且也必须由政治协商会议来负起这个责任。

以上是本会初步建议的大纲，我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如能将以上提议立即决议，并即付诸事实，那么真正民主已定基石，其他问题，都属枝节，自可迎刃而解，特此建议如上。

此致

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民主促进会

理事 马叙伦 严景跃 郑振铎 高柯灵
周建人 陈巳生 曹梁厦 林汉达
王绍鏊 曹鸿翥 冯少山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原载1946年1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 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重庆市中小工厂联合会，为纠正目前政府在经济上种种有害的措施，特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提出书面申诉。据该意见书说，中小工厂在抗战中历尽艰辛，受尽痛苦，但仍真真实实的替国家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今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希望能凭战时功绩，在合理的经济政策之下，蜕变成为新式工业，谁知“这个希望又破灭了”。政府一则公开叫我们这些“中小落后的工厂该早点关门”，而不予以丝毫救济。二则在“第一期经建原则”之外，竟对轻工业之纺织业，亦划归国营，成立托拉斯化之中纺、中蚕公司，这种官僚独占之经济措施，正在经委会主持之下，积极演进，造成严重的经济内战形势。三则工业贷款，更因当局轻视中小工厂，抹煞其抗战成绩与现在需要，而不贷给。四则接收之敌伪工厂，竟有与“身份不明”之特殊人物勾结，而至今仍不交给后方对抗战有功之工业界——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工厂接办。五则连皮鞋、棉花、纺织机械，也向古巴、美国“买办”，而使制革工厂、广大棉农、机器工厂倒闭失业。他们说：“这种垄断的官僚买办性的经济政策，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这种“忘本的经济观念，及买办性的经济政策，不是树立中国工业自立更生的道路，而是断送民族工业的自杀行为。”

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反对轻工业国营的现行政策，及官僚独占式的各种措施，主张经济民主化。他们的具体要求是：

一、立即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制定民主的经济政策。

二、反对轻工业国营，立即撤销独占的中纺中蚕公司及其类似组织。

三、请求政府贷给中小工厂生产复员费用五百亿元，三年内还清本息，由中小工厂联合承兑。并立即开放四联总处理事会，允许大型工业及中小工厂代表参加。

四、请求政府将没收敌伪之原料，平价供应后方工厂作原料。特别对于军布花布军毯业，首需援照花纱布局批准土布织户购纱之例，先行照价购买二月原料。

五、请求政府将接收敌伪中小型工厂，全部配给后方小工厂承购、承租、委托经营，反对标卖给发国难财者。应先将军政部已没收之敌人纺织厂（杨公桥军政部第一纺织厂，及窍角沱第二纺织厂），按照处理敌产办法交与织布业办理。

六、凡工业所需原料及生产成品，应予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后工业生产税率应特别减低。

七、建国时期，应以生产复员列为第一位，凡工业组织之登记手续，应求简化与便利，并取消对资本增值的限制等。

八、关于购运原料，请政府立即取消一切原料战时管制办法，并给予种种便利，取消运输统制。

九、建立工业金融组织，提高工业信用，允许发行工业公司债券，建立证券市场。

十、在建国期中应提高工业利润，使工业资本得易于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而奠定工业基础。

十一、加强劳工福利组织及实施，以安定职工生活，使劳资协调，合力同心，共同建国。

十二、希望政府修改关税法税则，提高外货进口税率（特别是日用品等），而机器进口则应减低，以促进中国机械化。

十三、订立合理税率以安定市场，而利国内生产。

十四、希望政府以法币发行总额，规定百分之四十用于工业生产。

十五、改善农业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繁荣，提高农村购买力，以奠定工业繁荣之基础。

（原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对于当前农村改革的意见

现在正是要加紧复员时期，政治改革也已开始协商，我们愿意本着平日研究所得，提出下列各项意见，以供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诸公暨社会贤达参考。

甲 农村经济方面

一、救济与复员 现在已是隆冬，对于收复地区遭难的农民，应该立即发放粮食衣被以及种子农具耕畜等，实施紧急救济。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发予中国的巨额物资，必须根据各地受灾程度的轻重，作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些物资不应该在市场抛售，或移作别用；也不应该只在少数大城市发放，而不顾及大多数农民的迫切需要，更不应该有政治信仰以及社会关系的任何歧视；应该允许人民团体的代表参与分配，并随时详细公布其用途及所得者的姓名籍贯。

大后方农村，在长期抗战时期，也遭受极大损害，政府应立即另筹的款，按照各地损害程度，予以适当救济。

流离在各地的农民，应该立即资助其还乡。所有全国军队应

迅速裁撤至国防需要的最低限度，使出征军人能早日返乡，从事生产。还乡而不能获得适当工作的出征军人，应由政府规定切实办法，予以妥善安置。

收复区以及大后方农民所因抗战遭受的一切损失，必须责令敌伪悉数赔偿，由各地农民自动组织团体，调查损失，并分配赔偿所得的物资。

二、没收所有敌伪汉奸和贪官污吏的财产 应迅即通令全国人民公开检举所有明显暗藏的各种汉奸，并将已经捕获的各地汉奸严予惩办，没收其一切财产，连同已没收的敌伪产业，将其可为农民应用的部份，优先分配与出征军人家属和贫苦农民使用。

所有大小贪官污吏也应同时通令全国人民公开检举，分别没收其财产，作与逆产同样的处置。

三、认真实行减租减赋 最近公布的减租命令，与“二五减租”的原有精神不符，是项减租工作，应根据土地法耕地租用条款规定各项切实执行，田租租额不得超过当地主要作物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之法定比率，并严格取缔押租、预租、力租和一切额外需索，由业佃双方和人民团体代表组织减租实施委员会，以处理一切业佃纠纷。

免赋命令应切实执行，凡免赋的区域，应严禁有任何变相的征粮和借款，田赋征收应实行累进制，并提高起征点，减轻起征率。

四、严禁杂款摊派 现在各地杂款摊派所加于农民的负担，已实在比田赋更加繁重和普遍。这非立即健全基层政治，确立自治财政不可。田赋和营业税应迅即恢复战前体制，划作地方收入，同时切实严禁各种杂款的摊派。

五、改进农贷办法 切实扩充农贷资金，改以农民自由组织

的团体为贷款对象，以充分供给低利和长期贷款与贫苦农民，而纠正现在少数机关和豪绅占有农贷的不合理现象。

六、辅助农产贸易 切实取缔妨碍农产贸易的一切独占组织，苛捐杂税以及运输上的种种阻挠，停止购买有碍国内农业生产的外国农产品，迅速规定适于农产输出的外汇率，资助农民合作运销，并采用津贴制度，以奖助国内农产的发展和输出。

七、提高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的提高，必须和农民生活和一般文化水准的提高同时进行，必须资助大批知识青年和农业技术人员下乡，同时并鼓励农民自由组织合作团体，研究和改进农业技术。所有各种农业改进工作可由政府资助此种团体，依据需要，分步进行。

乙 农村政治方面

上述各项农部经济的改革，必须在一般政治和农村政治改善情形之下，才能具体实现。在农村政治改革方面应首先做到下列两项：

一、农民须获得身体、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等基本自由。凡一切妨碍农民自由的法令和机关，必须立即废除，一切强制包办的农会和其他农民组织，也必须立即停止。

二、应迅即废除保甲制度，改组省、县(市)政府，代以省、县(市)各党派社会团体代表暨社会贤达所联合组织的过渡性的政府机构，以限期实行直接普选，建立村乡(镇)、县(市)、省的各级民主政府。 (原载1946年1月21日重庆《国民公报》)

中国妇女联谊会 对当前政治意见书

政治协商会议已举行过九次大会，初步交换意见阶段已告结束。于报端披露之消息，得知会议进行虽极融洽和谐，但对各重要问题，各方意见尚极悬殊。本会已于元月九日招待协商会议代表茶会中，提出各项主张。兹鉴于会议发展中各项问题之解决困难尚多，愿再补充此书面意见如后：

甲 关于停止内战

- 一、停战命令生效之日后，任何部队所进占地区均应撤出。
- 二、已推选出之军事考察团人员应立即出发，并增加代表名额，由各界增选公正人士参加。
- 三、所有伪军应全部缴械遣散。
- 四、立即解除全部日军武装，并马上遣送回国，在暂留中国期间，全部日军官兵应集中看管，不得自由行动。

乙 关于人民基本自由

一、立即实现双十公布之《国共会谈纪要》及蒋主席于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所提四项诺言：

(1) 应保障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所有妨碍人民基本自由之现行法令，应明令废止或修正。

(2) 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并一律平等。

(3) 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集中营。

(4) 解散特务组织，除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

二、制定妨害人权治罪单行法，任何机关与个人有侵犯人民自由行为者，均应依法严惩。

丙 关于改组政府

一、政治协商会议应制定一符合民主原则的共同纲领，为政府改组后之最高施政方针。

二、改组后国府委员会委员名额中，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人士所占比例，应有合理规定，任何党派在数量上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三、国府委员会委员人选的产生，应采用民主的办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商确定。

四、国府委员会应有最高决策权与用人权。

五、国府委员会得设常务委员会，凡重大措置均须经常委会通过，遇有紧急情形，主席得召集临时常委会为权宜之处置。

六、国府下各院部会，亦应彻底改组，使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均得参加。

七、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同时改组，使各级地方政府中均有各党派及各界贤达人士参加。

八、中央与地方采用均权制。

九、省县市区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省长及县市乡长均实行民选。

十、各地已有民选政府应承认其合法。

丁 关于妇女的基本要求

一、应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上与男子一律平等。

二、在职业上应给妇女充分就业之机会，并予以切实保障，不得以性别、已婚或比例数等限制女性。

三、职业妇女、女工产前产后应有两月假期，并照给薪资，生产费亦应由政府津贴。

四、各工厂及其他职业部门，应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五、凡城镇、乡村、机关、工厂均应广设托儿所、幼稚园。

六、在各城市广设妇婴医院，县以下各村镇应普设妇婴卫生站，以增进妇婴福利。

七、凡有子女三人以上之家庭，政府应予以津贴。

八、运用合作组织，动员乡村妇女及城市家庭妇女参加生产

工作，以提高妇女经济地位。

九、各地教育机关，应切实推行扫除妇女文盲工作，并广泛设立职业学校、补习学校，以提高妇女文化水准。

十、抗战军人家属之生活，应予保障，其子女政府应免费教养。

十一、抗战期间各公私教养保育机关收容之儿童，凡无家庭贍养者，应由国家继续教养至其成人为止。

十二、严禁贩卖人口、买卖婚姻、蓄婢、纳妾、收养童养媳等现象。

戊 关于军事问题

一、军队应一律国家化，但与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即撤销，在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下，设立联合整军委员会，选任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人士参加组织。

三、联合军事委员会有统一全国军政军令之权，立即实行军事之复员、裁兵、改编及制定驻防区域。

四、全国军队应大量公平裁减，以减轻人民负担。

己 关于国民大会及宪草

一、关于国民大会：

(1) 国民大会代表应全部重新普选。

(2) 制宪权与行宪权，均应由普选后之国民大会行使。

(3) 在妇女社会地位未达实际平等时，应特设妇女代表名额。

二、关于宪法：

《五五宪草》为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草拟，对总统职权之规定，对人民基本权力之保障，对国民大会职权代表之规定，均不能合乎真正民主的原则，故应由普选后之国民大会重新拟定。

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1946年1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

昆明文化界人士致 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转

各位代表公鉴：

诸先生此次在渝集会，协商国是，诚国家民族兴衰隆替之机，团结民主和平奠基之日。诸先生责重任远，固当捐除成见，为人民立言，为子孙造福，群策群力，必其成功。同人等义切救焚，责无旁贷，愿陈数事，用作准绳，诸希明察是幸。

甲、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前，应切实办到下列各事项：

一、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此项工作由马歇尔将军会同国共双方以外之公正人士监督实行。

二、开放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及其他基本自由，一切报馆及通讯社听任私人或党派自由经营，其曾经政府控制支持者，一律停止其控制及支持。

三、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组织联合政府，在宪法未实施以前，以联合政府为中华民国之最高统制机关，政府人员应由全国贤能领袖公平分担，任何党派所占员额不得超过全数三分之一，军政财政两部并不得操于一党之手。

乙、下列各事项由联合政府办理：

一、缩编全国军队，并提高其品质，以期达到高度现代化之目的，全国军队之数量，平时以五十师为其最高数限度。

二、改编并刷新各地方政府之行政机构，主要人员不得由任何一党包办，并不得由现役军人充任。

三、制定制宪会议之组织及选举法，于联合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办理选举，并召开会议。

张翼若	钱端升	潘光旦	朱自清
李继侗	汤佩松	金岳霖	吴之椿
王赣愚	徐毓枬	袁家骅	林文铮
费孝通	杨业治	闻家驷	卞之琳
向 达	闻一多	吴 晗	陈定民
费 青	周新民	潘大逵	楚图南
尚 铖	陈美觉	姜震中	胡 毅
徐嘉瑞	夏康农	陈遵妣	李广田
袁之方	胡庆钧	俞铭傅	李若明
余培忠	吴 彬	冯素陶	颜锡嘏等一百多人。

（原载1946年1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华中文化界致政治协商会议电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诸先生公鉴：

顷闻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华中文化界除表示拥护外，特贡献对国是意见数项，尚望采纳：

一、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

二、迅速改组政府，容纳各党派及无党派贤达参加各级机构，并须公平合理有职有权。

三、承认各解放区的地方民主政府，实现地方自治。

四、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自由，释放政治犯。

五、取消党化教育，特务教育，保障讲学与求学之自由与安全。

六、保障言论、出版、演剧之自由，彻底废除新闻书报检查制度及限制出版演出之禁令，严格取缔禁售、禁邮，没收书报等一切毁灭文化的措施。

七、改革国家宣传机构，勿再由一党操纵。

八、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重选国大代表。以新闻界为例，上次国大选举，记者“代表”十二人，当时全国四大新闻中心沪津平京竟无一人当选，而《东南日报》即占两人，其弊端可想而知，因此十年前产生之国大代表应立即宣布失效。上述各端，

敬希立即促其实现，以奠民主建国之始基，俾人民得安居乐业。
临电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韦 恂	阿 英	江上峰	范长江
彭 康	李一氓	贝 叶	楼适夷
恽逸群	骆耕漠	孙冶方	艾寒松
白 桃	黄 源	夏征农	殷 扬
赖少其	刘季平	徐雪寒	胡 考
李仲融	陈农菲	何 封	包之静
王淑明	曹 白	芳 信	白 丁
石 灵	董希白	翦斯瞧	史乃展

（原载1946年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晋察冀文化界致政治协商会议电

晋察冀边区文化、艺术团体及知名的文化工作者百余人，代表全边区文化、艺术界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如下数项建议：

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思想、创作、言论、出版的自由，废除一切检查、送审制度，不得有任何威逼、利诱、恐吓、迫害行为。

二、所有收复区，如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的敌伪文化机关，国民党不得独占把持，应由全国文化界组织委员会管理，公平使用。

三、取消党化教育，禁止学校特务活动，在所有全国各级学校中，应灌输民主思想，肃清法西斯毒素，提倡学术自由，反对垄断包办，教育行政应由学术上有成就的民主人士管理。

四、依法惩办卖国的文化汉奸，对他们不得作可耻的包庇纵容。

五、文化界民主人士，应有权参加全国各级民主的联合政府。

晋察冀边区文化界联合会
华北联合大学
华北文艺工作团

延安文艺通讯团
鲁迅艺术学院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
晋察冀日报
晋察冀边区工人报社
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晋察冀分会
晋察冀音协、美协、剧协分会
张家口艺术联合会
张家口剧团联合会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于力	成仿吾	周扬	肖三	肖军	丁玲
王曼硕	吴晓邦	沙可夫	艾青	丁里	邓拓
吕骥	马达	钟敬之	汪洋	张庚	沃渣
蔡若虹	田间	江丰	草明	胡一川	舒强
古元	彦涵	向隅	张停民	王朝闻	林矢甲
马可	唐荣枚	张水华	程维	杨角	张春桥
李元庆	周峰	白晓光	康濯	陈企霞	张望
莫璞	夏风				

(原载1946年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重庆沙坪坝万余学生游行 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 七项国是主张

重庆沙磁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重庆中学、中央工校、四川省教育学院、艺专、育才等大中学校学生一万多人，于二十五日进行大游行，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晨十时出发，进城后迳往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提出严格执行停战命令，永远停止内战；实现蒋主席“四项诺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国大代表必须合理产生；党派一律退出学校，实行讲话自由；政协没有成功前不许闭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党派私见等七项主张。并对屏山机场与白尔丁事件表示抗议。政协代表孙科、周恩来、陈启天、张君勱、邵力子、莫德惠相继讲话，国民党代表孙科认为政协一定会成功。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七项要求，主张大家努力监督，永远根绝内战。接着他说：还必须做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化。最后他高呼：“你们的要求一定要做到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勱说：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无党派人士代表莫德惠，希望停战命令彻底实行。他说到无数人牺牲于内战时，痛哭失声。并说：政协会要是不能成功，他将和同学在一起拼命。演讲时，同学秩序井然。演讲后，

高唱《民主进行曲》、《枪杆放下》等歌曲，高呼“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口号，并散发游行宣言和报导游行情况的油印快报。马寅初等教授也参加游行行列。沿途民众鼓掌欢迎，随着学生高呼口号，咸称此种游行，系七八年来重庆未有的景象，直至下午六时始散。

（原载：1946年1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

上海学生万余人通电政治 协商会议提出八项要求

蒋主席暨政治协商会议诸公勋鉴：

自停战令暨蒋主席四项诺言发表后，全市同学振奋万分，今日（一月十六日）万余学生公祭昆明殉难师生大会，一致通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下列几项要求，祈立即予以实现。

一、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立即实现蒋主席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政协大会期内盼即有事实表现。

三、立即逮捕、公审汉奸，并鼓励人民检举。

四、立即惩办关麟征、李宗黄及青岛屠杀青年学生的凶手。

五、立即明令废止现行束缚学生民主自由的法令与办法：

甲、请立即废止现行处置学潮的高压政策，不得再用屠杀、枪毙、逮捕、开除、恐吓、诬蔑等手段。

乙、立即实现并切实保障学生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之自由。

丙、立即释放北平南京及各地被捕学生。

丁、严惩教育汉奸。

戊、立即废止禁止义卖助学法令，并拨款救济失学青年。

己、立即取消特务、废止思想统制。

庚、立即通令各校当局开放学生活动，严禁阳奉阴违。

六、严办贪官污吏，官吏民选。

七、提高教师职工待遇，救济失业。

八、提高妇女地位。

上海学生誓愿贡献一切力量为建设民主新中国奋斗。

上海市学生谨叩

（原载1946年1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六) 会议发言热烈，各党派抒发己见，进行交锋。舆论界亦有评论

• 关于停战商谈的报告 •

张群报告停战商谈经过

今天，主席指定本席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军事上因何发生冲突，交通上因何发生阻碍，不是本席今天所报告的范围。关于商谈经过，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说：

第一、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谈时期：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政府代表向中共代表提出避免冲突、恢复交通办法以后，经过几个星期的商谈，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停顿，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方面提出三项办法，主张无条件停止冲突后，再讨论一切。三十一日，政府方面提出具体方案，说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原为政府一贯主张，为达此目的，必须彼此在办法上有切实之商定，

否则，停止冲突之商定，难期有效的实施。因此政府提出三项办法，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各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公正人士参加。

这个办法，与过去所提办法比较，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美军在中国协助中国战区办理受降及遣送敌俘的问题，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并作一事，作总的解决。因为冲突不停止，交通不恢复，受降及遣送敌俘的问题，无法去办，其他的耽延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中共代表对上述办法，大体同意，又经过两次商谈，在本月五日，获得一致的协议，作如下之决定。

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办法：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

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以上说明，是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谈的时期。

第二，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将军会商时期，这个商谈，称为三人会议。自本月七日起，至昨天本会议开会之前止，共开会议六次，自然是以五日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所同意的办法为根据。这个会议的成就，可于昨日上午本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会同发表之声明中，见其要点。一共签定了四个文件：

一、停止冲突命令草稿。

二、了解事项(以上两件系三人共同签字的)。

三、军事调处执行部。

四、共同声明(这两件是政府与中共双方代表签字的)。共同声明的内容，包括(一)、(二)、(三)三个文件的要点。这个声明，不仅是本会议各位先生关心，全国同胞关心，就是国际间的友邦没有不关心的。各位先生对于上项记载，必然都已阅过，无待今天本席多说。政府方面，昨日业已发布命令，并照与中共代表所商定的时限，规定在本月十三日晚十二时以前，不分何地，一律实行。关于设置军事调处执行部事，公告中只载其要点，现在补充说明几点如下：

一、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为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实施，和解除敌军武装及遣送敌俘的任务顺利完成而设，它的任务，规定的很明白。

二、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美国方面已指定罗伯逊代办，政府方面指定军令部郑厅长介民，中共方面指定叶参谋长剑英，后天就可以前往北平开始工作。

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事程序：三个委员各有一表决权，一切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对下发布必要的命令，对上报告，由所属执行组，每日缮具，由各委员分送其首长。

四、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工作，由执行组推动之。执行组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督察有关部队，有发布及宣达一切命令、指令之权，必要地点，并得设置分站，或派遣监察或报告小组。

五、军事调处执行部继续存在，执行其工作，至政府或中共方面通知废止之日为止。

以上各点，是公告中未提及的，为了让各位明了全貌起见，特别补充报告。

在三人会议之中，彼此都有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进行一切商谈。政府方面，并提出以下三项不受停止冲突办法的限制，须作为例外的：

第一项是关于整军的，

第二项是关于接收东北各省的，

第三项是关于接收赤峰、多伦的问题。

关于前两项，均商得一致的同意。第三项因中共代表坚决反对，所以在九日午后会议，未能获得最后的决定。政府殷切期待此次会议的成功，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能够宣布停止冲突的命令，遂作最后的让步，将此项提议，并入热察问题，作整个的解决。在此次成立停止冲突协议的时候，不作为例外。当九日开会未得结果时，外间揣测政府有何新的提议，以致发生波折，即因此故。

在三人会议通过全部议案以后，本席曾经建议，依据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前经商定之三人小组，应速成立，进行中共军队的

整编，因为双方军事冲突，是一件不幸的事。现在三人会议中商得停止冲突办法，化戾气为祥和，自属佳事。但停止冲突，还未将问题真正解决，停止冲突命令发表之后，就能迅速成立三人小组，关于中共部队之整编，及其驻地之规定，从速商定具体实施办法，付诸实施，那才算是问题真正的解决。换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说现在所定执行停止冲突命令的机构及办法，不再存在，那才算是真正完成我们停止冲突的使命。当时马歇尔将军表示：认为重要，愿以三人会议之一分子，作迫切的建议，三人小组应从速进行，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亦无异议。今天本席报告，想就以此为结论。因为停止冲突的命令有效的实施期间，中共部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如不迅商解决，无论复员、整军、善后，以及政治、经济的建设，均不能顺利进行，即地方人民的负担与痛苦，也无法解除。

各位先生对于此问题极为关怀，应当详细报告，但一切情形及有关文件，多已发表，今天限于时间，所以只能扼要提出报告，尚请各位先生原谅。

(1946年1月11日)

(原载1946年1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

周恩来报告停战商谈经验教训

主席、各位先生：

关于商谈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一切交通的经过，刚才张岳军先生已有扼要说明。现在停战命令已下，停战问题已获解决，当已不是目前协商之主题，所以他的经过详情，毋须多所解释，假若各位先生有什么问题必要询问，我当再就所知答复。

现在想就谈判中得来的几个经验教训，略为陈说，以供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一切问题的参考。

三 点 经 验

第一个经验，商谈停战应该有条件呢？还是不应该有条件？国内的战争行动，不管其原因何在，起因何处，大家都认为是不幸的。大家公认抗战期间不应有内部冲突，抗战胜利以后，应以和平方法建国。这个，不但国内人民公意如此，即同盟国人民之期望也是如此。所以商谈停战，必须求其成功。欲求其成功，如果要争论条件，一定得不到解决，在初初商谈时候，双方都着重争论停战条件，终至问题拖延不决。有一次民主同盟朋友，约请政府与共产党双方代表谈话时，黄任之先生说：“商谈停止内战，

要无条件的停止”。我们听了很受感动，认为这是商谈这个题目的好途径。得到了这种启示，我回到延安，获得我党中央的同意，后来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即本此方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在三人商谈中，就因此得到了结果，终于发表了停战命令。这里有一附带说明，我在三人会议中间，把原来要提出的，也是应该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保留，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我们认为合理的，无不接受，其可以考虑的，也是尽量让步。停止冲突，当然要无条件。刚才张岳军先生所报告的条件，不是停止冲突的附加，而是关于停止移动的附加，停止冲突应是全面的，没有条件，军队移动，我们认为有理由的，即同意除外，如政府要在扬子江以南一带整军，其因整军有所移动，我们可以同意。政府如派遣军队去东北接收国家主权，我们也是同意。只有第三点，关于赤峰、多伦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些地方，中共领导的军队，已在那里接收了，并已驻扎在那里。最后，政府方面撤回这个要求，我们也很高兴，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经验，就是全国急迫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马上解决，还是拖延解决？我们觉得应该当机立断。例如内战问题，全国反对，世界不满，既然任何方面都承认这是不幸的事，就应该迅速解决。刚才张岳军先生已经说过，战争多延长一天，人民多痛苦一天，昨天邵明叔先生垂涕而道出人民的呼声，要求我们马上解决。这种拖延，不管其原因如何，来自何方，在解决问题上是一个教训，到昨天早上，问题是解决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我们两方面当事人却应该认为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三个经验，就是谈判方法上应该公开，还是秘密？既然一件事情关联到全国人民，关联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关联到国家的命运，甚至于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何必要秘密？

而且这件事情是几百万人流血的问题，何必要秘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不在少数代表中努力，但这件事情应该公之于众。此次停战问题的解决，虽然由参加商谈的两方代表来订办法，最后得到马歇尔将军的赞助促成，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的呼声，社会的舆论督促而成的。因为有了人民的呼声，社会的舆论，引起世界的注意，以至有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三国外长会议的公告。这一切公开的责任，是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所以我们觉得凡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关的事，能够公诸于众，就能得到公意，认识公意，就能得到解决的标准。因此，在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定的办法中，一致赞成列入第三项“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各地考察”。有人以为战已停了，好象军事考察团的作用已失势了。其实正如今天许多报纸上所说的，这只是开端的第一步，要使一切军事冲突真正的停下来，毫无例外，一切交通完全恢复，毫无例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停战命令下了，到十三日一律停战，大的冲突会停下来，小的纠纷在命令没有传到的地方，有许多被封锁的地方，都需要派人去解决。所以监督一切军事冲突的停止、一切交通的恢复，有待于军事考察团诸位去考察、监督，并且能够提出意见。因此，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这样的教训，凡是千万人的事情，人民的事公之于众，是有益的。

以上三点，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得来的经验教训，总括起来说，假如我们都能认识无条件停战，迅速解决和公之于众的三个办法，早些求得解决，人民责备要少些，世界的非难也更少些。这是一种不幸，很希望嗣后一切问题能够顾到这些原则，特别是第二、三两个原则，是要引以为训的。这是我说的第一部分。

停战如何进行

第二部分，是停战如何进行。张岳军先生说得很具体，职权方面、组织方面、范围方面，都已讲了。我要补充的是几个有关问题：停战协定第四项设军事调处执行部，规定有四项任务：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一切冲突。全面的停止冲突，就是南到海南岛，北到内蒙，东到东北，西到绥远，凡是有冲突的地方，都应该停止下来。这个命令下达，不仅需要电报来往，还要派人员去通知。如海南岛被封锁了七八年了，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与政府部队发生军事冲突，广东其他各地中共领导的部队与政府部队亦发生军事冲突，还有别处，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撤走了，政府军队与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发生冲突，还有政府军队开入了中共活动的区域，也有冲突。这些都该停止下来，这些地方都应该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人去监察。执行部要设许多站、许多组，到各地方去，但无论站和组，都是三方面派人，一致行动、一致协商去解决，十三日目前全部冲突停止下来的计划，可以迅速实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代表，定本月十三号赴平，这个月内希望能派出站和组到达一切冲突地点，使一切冲突停止下来。第二、恢复一切交通，首先要恢复铁路交通，这是由于军事冲突停顿的，还有在抗战中被封锁的，不仅是走路，就是邮电被扣留的也很多，所以三人会议要恢复一切水陆空交通，邮电交通的障碍也要撤去。这才是真正恢复交通，真正交通自由。在停战命令第三项里可以看得出来。第三、执行部要执行的第三项任务，是受降问题，现在还有近二十万的敌人没有完全解除武装，地区主要

是华北，中国东部也有一些，在政府部队地区、在中共领导的部队所包围的地区，敌人武装都要解除，这也是执行部要过问的事。第四、如何使解除武装的敌人俘虏送回本国，走那些交通线，也是执行部要过问的。这四项目都与停战有关，也与盟国有关，所以军事调处执行部都要过问。如此做法，不仅一切军事冲突停止了，交通恢复了，就是引起内战主因之一的受降问题，也就会不存在了。

关于执行部工作范围以外而是也有关联的事，如刚才张岳军先生所说的军事移动的除外事项，也要报告执行部，使执行部可以查明，可以免除借口和误会，这点也要补充说明。停战命令，是由政府授权张岳军先生，中共授权本人签字，同时对外宣布，并由蒋委员长和中共毛泽东主席双方颁布命令。昨晚张岳军先生告我说，蒋委员长已经下令通知各军，本人今晨得到延安消息，昨天晚上也已下了命令，根据我们约定时间内，一切冲突停止。

如何消弭内战

第三部分，是关于如何消弭内战。这是此次政治协商会谈主要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愿说明一点意见：因为刚才张岳军先生提到希望在停战以后，迅速开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商谈整编问题，军队应该整编，全中国的军队应该整编，中共军队也应该整编，以求达到国家化的目的，这是已经定了的事。至于如何消弭内战，那不是包括在三人军事小组讨论范围以内，我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我们在这方面有下开几点希望：

一、要消灭内战，要恢复交通，有一个原则，即国内各方意见的冲突、党派意见的冲突，凡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都应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决不可因此而演成军事冲突。国内问题应由政治解决，蒋主席曾经几次声明，现在世界的问题，尚且要运用政治方式解决，何况国内的问题呢？国内一切问题都要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原因。不过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既然目前国内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解决，那么，不同思想与不同意见的分子，除掉刑事犯或违反一般法律可以依法办理外，其他不论什么政治原因，没有方法铲除或消除的。这一个原则必须确立。

二、关于军事考察团，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推选公正人士组织，这点能够做到，一定有许多宝贵意见告诉双方，告诉全国，同时对于决定怎样消灭内战的方案，一定能得到很大的帮助。

三、我们觉得对于敌人在投降以后，仍旧拿着武器残杀中国人民的，应该视为战争罪犯，予以处罚。

四、我们以为对于解散伪军，应该决定具体办法。这是会谈纪要中曾经双方同意的原则，希望政府早定办法，伪军之参加内战，挑拨内战者，应予以严重的处罚。

五、整军计划关系我们的和平建国非常之大，将来可以并入和平建国方案讨论，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整军问题有商量必要，如能得到各政党的同意，然后拟具整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下，中共所领导的部队，定依照计划来整军。同时，中共曾答应整编为二十个师，一定可以在三人小组会议中切实商谈。这样，才能使全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道路。我可以代表中共代表团，也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保证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到。上面这五点，是

目前关于消弭内战的意见，至于根本消弭内战的办法，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范围牵涉甚广，要由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先生从长讨论。

(1946年1月11日)

(原载1946年1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的补充发言

（中国青年党曾琦希望周恩来同志报告一下冲突地区情况）

周恩来同志即作说明：现有十三省区有冲突，较重大的冲突地区是热河省的朝阳到赤峰一线，古北口附近，南口以北，大同以北及以东地区，同蒲线南段，冀南磁县附近，鲁南地区，胶济沿线，苏北，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区，津浦线皖北一段，其它广东的广九线，粤汉线地区，湘鄂交界地区，海南岛，苏浙地区也都有冲突。将来有一个材料可供各位参考，即北平的执行部将决定召集各冲突地区双方代表，并搜集材料，执行部将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一定能够公正。

（1946年1月11日）

（原载1946年1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本会议同人聆取张岳军、周恩来两先生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之报告，具悉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以最大决心，相忍相让，使军事冲突由此终止，和平由此奠基，深感欣慰。尤盼继此协定，对于永久消弭军事冲突之方策，迅速实施，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之热心赞助，谨深致感佩之忱。

(1946年1月12日通过)

(原载1946年1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国共会谈的报告 •

邵力子报告政府与 中共代表会谈经过

主席，各位先生：

报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的经过，本人曾想最好是请王雪艇先生担任，王先生奉命和中共商谈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但因为去年九月间开始商谈不久，王先生就到伦敦去了，不能再参加会议。第二位最适宜作报告的是张文白先生，张先生在会谈中是很重要的一位，尤其是双十节发表会谈纪要之前的两三天，张先生努力很大，但因为张先生有很重要的任务到新疆去，当时不能预定他何时回来，以致政治协商会议也未能请他参加，这报告只好由我来担任了。我们知道，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是义务不是权利，文白先生当然无所介意，但我在报告之前，不能不先特别声明文白先生对于会谈中的努力。

会谈纪要的全文早经公布，我的报告只简要的就社会各方面对于会谈中的疑问，说明几点。

第一、常常有人问起，会谈的双方究竟有没有诚意？我的答复是有诚意的。

第二、常常又有人问起，会谈没有公开，除了发表的以外，

究竟还有什么秘密没有？有没有重要的问题没有发表出来？我的答复是没有。虽有一两点未包含在会谈纪要中也并无不可告人之处，仍可以让社会人士知道的。

第三、有人看到会谈时期那么长，又没有真正能把问题解决下来，便要问是否双方代表有不尽责任之处？甚或有意把时间拖得很长？我的答复没有敢偷懒，更没有敢故意拖延。

第四、更或有人要问，会谈纪要发表以后，问题不能就解决，是否双方有意不肯让步，以致僵持下来？这一点我的答复是在若干点上确有不肯让步的情形，政府如此，中共也如此，这因为：

- 一、是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
- 二、是两方面的立场本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但让步的地方也确实不少。社会各方面要问的不外这四点，以下我就在这个范围以内综合说明：

周恩来先生已说明，从抗战以来中共一向承认实行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第一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这是我们很钦佩的。至于政府方面，更是从抗战那一天起就决定要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承认中共参加抗战的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发生不幸的事情，蒋主席仍是一贯的决定，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曾屡次向全国国民宣告这一个决定，一到抗战结束，更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次也到重庆来了，这些当然都是最有诚意的表现。毛先生来到重庆以后，蒋主席和毛先生有几次谈话，谈得很坦白，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的会谈就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的。从毛先生来重庆到双十节发表会谈纪要止，我们的会谈约可分做四个阶段：

最初四天的连续谈话，是第一阶段。当时中共方面有一个意见，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因为过去不幸

的事情太多，不先有良好的情绪，就谈各种具体问题，解决一定很困难，政府的树意本希望解决愈快愈好。雪艇先生昨天说过，他曾主张在十天之内解决问题，不过另一个看法是怕欲速不达，所以先培养情绪，再谈实际问题，也是很好的办法。在那四天之内，我们充分交换了意见。

九月四日起，谈实际问题，开始就发现有很难解决的情形，也即是会谈纪要中第九、第十两项问题。第十项地方政权问题，是终于未得解决的，第九项军事问题，在会谈纪要中已有决定办法，但经过的困难很多，且也尚得真正解决。从九月四日起，大家见到问题不容易解决，认为培养良好情绪还很重要，不能急急求解决。从四日至二十一日共有八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二阶段。有时每天都谈，有时隔一两天谈，九月十、十一、十二这三日就每天都谈。本来二十一日可以发表公报，因为对地方政权问题，中共坚持主张，没有得到协议，结果未能发表公报。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但是我们不愿意真的搁浅，因为这是关系国民安危甚至世界和平的问题，所以二十七日又开始商谈，到十月五日止，共有四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三阶段。

在这四次商谈中，两方面又充分交换意见，但还有得不到同意的，而毛先生因耽擱的日子已相当长久，有即回延安的必要，蒋主席早曾说过毛先生随时可以回延安，照当时的情形，公报几乎仍旧不能发布。我刚才说过发表会谈纪要，很要感谢张文白先生的最后努力。在会谈纪要公布的前几天，可以说是第四阶段。

各位先生和新闻记者，看了会谈四个阶段的经过，对于参加双方的有无诚意，可以作一个判断。参加会谈的人没有敢偷懒，也可以看出。周先生已说到会谈中的成就，特别是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決定。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问题上，所费会谈的时间并不

算少，在我们会谈的习惯和技术上，要求速效实在不容易，不过大家都有要求问题解决的意思，所以费的时间虽然多，却并非躲懒或有意拖延。

会谈没有公开，只每天发表一个简单的消息，是双方认为有此必要，因为要在会谈中培养良好的情绪，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我们在会谈中是无话不说，有时也争到面红耳赤，甚至筋脉愤张，但不久仍能恢复到和谐的情绪，假若谈话情形公开，也许有人断章取义，骤加指摘，就会影响会谈者的心理，在会谈时有了拘束，不敢尽量发言，所以双方约定，到有结果时候，一定将内容公布于社会，而在会谈中则暂不发表。

会谈的各项问题，可以说全在会谈纪要以内，有未发表之点，亦经双方同意，我今天不妨略加说明，借以消弭某一种的误解。例如会谈纪要发表以后，军事冲突随之发生，并且日益扩大，这是不是会谈时没有考虑到呢？我要说明的，会谈纪要初稿原有十三项，最后一项的原文是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这因为中共最初要求停止进兵，中央即明白答复，中央部队为受降前进，中共不应阻止。最后纪要稿写成上面所说的文字，到会谈纪要快发表的时候，中共主张删去这一项，中央也表同意，当时是不愿引起全国人民心理的不安。原希望纪要发表以后，快快继续商谈，把各种问题都得到解决，军事冲突自然可以没有。后来会谈进行迟缓，军事小组更未举行，当时是没有预想到的。

会谈中间坚持的事项，亦即纪要中的第十项。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就是这一项，我们也承认中共方面有

其立场与让步之点，而中央也并非完全不接受中共的意见。如各级政府民选一点，政府代表曾说过，自县谈到行政督察区可同意，在会谈纪要里也已写明“县级民选加委，中央可以考虑，至省级民选一点，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以后方可实施。”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两方都有让步，同时两方各有其立场，在政府方面是军令政令统一，这一点特别不能放弃。

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责备的。为什么政府方面不自动先提方案呢？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先生的电报，已将政府的希望充分说明，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中共最初提出十一点意见，政府即就所提的各条逐一答复。会谈纪要发表，条目上虽稍有变更，大体是以中共最初提出十一项为根据。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政府始终培养和谐空气，寻求问题解决的诚意。

讲到两方让步之点，有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在讨论实际问题开始时，周恩来先生即说明此次中共准备让步，不坚持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间所提条件，如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等问题。所以在政府答复十一项问题时，凡是政府认为应该同意应该容纳的，都立刻接受，凡是认为要再考虑的，也都坦白的说明其理由。会谈纪要已有解决办法而尚待实施的军事问题，也是双方都有让步的结果，如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双方让步的情形十分明白。中央最初允将中共部队整编为十二个师，因为在三十二年时，中共只要求编十个师至十二个师，三十三年时，中共也只要求编六个军十五个师，这次中共最初要求四十八

个师，最后折衷为二十个师，实在是双方让步的明证。

中央坚决希望做到的，也是国人共认为必要的，就是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问题，只要军令政令统一，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本人始终相信双方都有诚意解决问题，其尚未能让步之点，因各有其不能让步的立场，但决非始终不能互让解决。在这次会谈中间，实已解决了许多问题，即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谈纪要发表时，已商定大体办法。所以十月二十日重行会谈，此问题所费的时间，并不很多。又如国民大会问题，我们听过毛泽东先生的意见，也知道他有让步的精神。当然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还要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最后，本人以政府代表的立场，对赫尔利将军所予双方代表会议的助力，热烈的情绪，表示不能忘怀。尤其是他将离重庆最后两天的努力，更使我们感动。今日乘报告之便，特别提出，借示感佩之意。

(1946年1月12日)

(原载1946年1月13日重庆《中央日报》)

周恩来报告国共会谈经过

主席、各位先生：

国共会谈的历史甚长，中间经过九年之久，九年之中，本人除去极短的一个时期以外，几全部参加。今天抗战已经胜利，和平阶段已经开始，我不想把过去抗战八年中，国共会谈情形在此报告，只想就八年国共会谈中间一些方针的问题说一说。

会谈两个时期

在抗战开始以前，民国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间，中共代表与当时的政府代表曾有会谈，所谈的中心问题，也同今天同样的是和平与民主，所不同的，当时是要停止内战团结抗战，而八年以后的今天所要求的是停止内战，团结建国。抗战以前，彼此希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目的达到了，发动了“七七”抗战。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报告的时候，有着同样的信念，现在一定能达到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目的。九年来，我参与商谈，两度提出同样的要求，都实现了停止内战，虽然一方面是感慨万端，另一方面觉得两度达到目的，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就是个人也觉得获得一点安慰。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国家民族两度经过这样的波折，总

是万分不幸的。

据此，我感觉关于抗战中商谈经过的报告，只须举出一点来说明：最初商谈时的原则，既然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所以在抗战持久以后的商谈，便多限于局部问题的解决：如陕甘宁边区问题，敌后抗日军队的承认与编制问题，同时提出人民自由权利的要求。其时，政府方面也提出一些答复，因为彼此意见距离尚远，所以没有得到解决，而最后一个时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中共方面再提出解决全局问题，即是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参政员祖涵，代表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参政会后，又经过几度商量，在政府方面认为这种主张要动摇政府的法统，没有接受，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纠纷继续，也就伏下抗战胜利以后发生不幸的内战的根源。

抗战胜利以后，新的时机来临，蒋先生三次电邀毛先生，毛先生应邀来渝，就开始抗战以后新的商谈。这一个时期商谈的原则，是从一般的谈到具体的问题。毛先生来渝后，政府方面指定王雪艇先生、张岳军先生、张文白先生、邵力子先生四位为代表，中共方面指定本人与王若飞同志为代表，开始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十一项提要，然后政府代表逐项加以书面的答复，在彼此商谈中，已经得到同意的记录下来，没有得到同意的继续商谈，以后遂有双十节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签定。其中，还有几个主要问题，彼此认为不必发表，因其尚未解决，要留待以后商量的，例如关于进兵问题，政府军队要求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中共方面，则要求有些原来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在那里活动已经解放了的敌占地区，或已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包围的敌占地区，希望在受降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部队都暂驻原地不进。因彼此未能同意，所以会谈纪要没有列入。很清楚的，会谈纪要公布后，继续冲突的扩大，

其根源即在于此。

就已经公布的十二项中，也可以看出，在此时期中，是从一般的方针谈到具体的问题的。而一般方针的解决，我们始终认为是《双十会谈纪要》的主要成功。因为由抗战转入和平，两党方面都认为要确立基本方针，然后和平建国的事业才能有所遵循。所以毛先生向蒋主席陈述这个方针，得到蒋主席的同意和赞许，这个方针在会谈纪要中的第一项已经宣布了，我相信到今天还是不可更易的。也幸赖有此方针，使得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不幸冲突，不能再继续下去，而停止了。也因为有了一般方针的确立，进入具体问题的商谈，才能得到不少协议。如同《会谈纪要》第二项的政治协商会议，便已在此开会。第四、五、六、七、八五项的人民权利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前天又得到蒋主席重复一次的宣布。第九项是关于军队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关于全国军队整编的意见，同时承认中共部队整编之最低限度的数目，和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八个地区撤退，并且准备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商量整军问题。第十项是关于解放区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协议，所以决定两种办法：（一）继续商谈，（二）如商谈不决，则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第十一、十二两项，是关于奸伪和受降问题，原则上已有协议，因与进军问题有连带关系，也就悬而未决。由此可以看出：在纪要中，政治方针是确立了，人民的权利有了规定，军队国家化有了开步走的办法，只是地方政权未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一直继续到去年双十节后的会谈，也依然未得到解决。

四点经验教训

从这两个时期商谈经验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

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来供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诸位的参考，或者比之空论过去较为有益。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位在抗战前半时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国民党朋友张淮南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彼此承认不可敌视。不但两党当事人应该如此，就是两党党员也应该如此。

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举几个主要的说：（一）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所必需，我们承认，我们拥护，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二）我们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过去抗战的八年中，在抗战胜利以后仍然如此，这在民国三十一年中共“七七”纪念宣言中，就提到此点，这句话，相隔四年多，现在证明了。（三）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始终尊重国民党在历史奋斗中得来的地位。（四）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一党统治，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党的政府，但是我们既然合作，所以从民国二十五年底以来，就没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时期想推翻国民政府，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只要看自抗战以来，敌后的民主政府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领导的中心政权，就可以证明。就是去年解放区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只是解放区人民的联合组织。这些承认我们认为很重要，有此承认，可以证明不是敌视，而且是建立政

洽解决的基础。因此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如我们过去所常提到的，中共合法地位问题，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问题，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问题。因为承认则是一事，承认了，并不等于这些部队就不能整编，这些地方政府就不能改选。

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到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的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我们认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希望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有人说：你们只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力，你们中共所领导的地区怎么样呢？我们诚意的回答：凡是我們向政府提出的，保证在我们活动的地区，不仅是同样实行，而且愿首先实行。假如我们实行得不够，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批评，谋更好的改革。假如大家不信，我们愿意欢迎任何人去考察、参观、指教。尤其欢迎因抗战而流亡在外的人士全部回乡，因为他们是那

些地方的主人。

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

以上4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

回答几个问题

附带的回答几个在商议中的问题。在过去不能每次把商谈内容公开，常受各方面询问，乃至舆论上的责难，我们完全谅解。因为我们所商谈的，关系国家人民的利益，各方面应该关心，不知道时应该责难；不过商谈的双方，想把事情办好、谈好才公布，不能随时公布，也是当事双方的苦心。但不能因有苦心，就不谅解各方面乃至舆论上的责难。所以今天就根据这种认识，简单的回答中共方面抗战后的商谈中，常被大家询问的事情：

第一，中共代表在商谈中，是不是只管局部的事，不谈全体的事？根据我上面的报告，可以看出，在抗战中是先从全体谈到局部，再从局部谈到全体，抗战胜利以后，先谈定了方针，然后谈具体，决不敢没有方针，只谈局部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

一点，不仅中共方面如此，政府方面也是如此。

第二，是不是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在会谈纪要十二项中，可以看到政治问题包括最多，军事方面仅有三项，假如不因政治部分之地方自治问题延搁下来，军事问题也许早已解决。

第三，是不是在商谈中，只讲中共自己方面的事，不谈关系人民的事？我可以说不是，因为协议中许多项目，都是与人民利益有关，就是军队整编，也是关系减少人民的负担的一件大事，而地方自治，更是有关万万以上人民的民主问题。

第四，是不是只限于国共两党？或是别的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是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五，是不是中共只向政府要求，不向自己要求？刚才的报告可以证明，凡是向政府要求的，一定要在自己区域实行，而且有许多已经实行，如果不信，愿意请大家去考察指教。

第六，我们所谈的地方自治，是不是地方割据？过去在抗战环境中，在敌后的人民选举范围，或程度上有些不够彻底，但的确是选举的，并且我们承认这种选举，在和平时期更应求其彻底，这是人民的权利，不是说割据，因为地方自治要和军队整编分开为两件事。

第七，是不是中共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是的，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商谈中，为求得有效的解决问题，应有步骤与程序，所以在《双十会谈纪要》中，把如何实行政治改革，留在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并希望在和平建国方案，乃至国民大会、宪草中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八，政治民主化在先？还是军队国家化在先？我们回答：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例如中共说，先要政治民主化，军队才能国家化；或是政府说：先要军队国家化，政治才能民主化，

这样就无法解决。我们意见，认为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我们看会谈纪要第九项，已给军队国家化定了一开端的办法，同时该项又说，政府认为各项问题未能全盘解决，则军队数目可以考虑，证明政府意见也是如此。

以上八个问题，常遇到许多方面质询，今天我在这里，不仅向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先生，同时也向全国人民作这个总的回答。

（1946年1月12日）

（原载1946年1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与保障人民权利 •

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 扩大政府组织方案

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拟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修改要点如下：

- 一、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
- 二、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
-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
- 四、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及议决之事项如下：
 - 甲、立法原则；
 - 乙、施政方针；
 - 丙、军政大计；
 - 丁、财政计划及预算；
 - 戊、主席交议事项；
 - 己、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连署提出之建议事项。

五、国民政府主席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

六、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但应予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

此外，同时修改行政院组织法如下：

行政院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会长官。

提案人：孙 科 吴铁城 陈立夫 陈布雷
张 群 邵力子 张厉生 王世杰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

王世杰对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的说明

王世杰对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的说明

（1946年1月10日）

中国国民党代表同人所提扩大政府组织案，已有书面印发各位，在说明本案之前，先报告我们的几点基本观念。

第一、我们认为政府机关组织应该扩大，俾能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士在政府机关以内。

第二、我们觉得容纳国民党以外人士之机关，应不以政府最高决策机关为限，即执行机关，亦可容纳党外人士，蒋主席元旦广播中亦有宣示。

第三、扩大组织之制度，究竟是一个从现在到宪政实施前的过渡制度，所以不能不法律事实同时兼顾。所谓顾到事实，在使此制度与未来宪政制度更接近。所谓顾到法律，即在此过渡时期不要根本动摇法律的系统。

我们本以上三个原则拟定这个扩大政府组织的方案。

我们扩大国民政府组织的方案共计六项：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现有国民政府委员三十六名，再增加十二名，共为四十八名。

二、“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所谓选任，就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这种手续，国民大会未召集前，不能不保持，否则法律的系统也

就变了。但在人选方面既然今日要容纳国民党以外人士，自须先征各方意见，而后提请选任。

至于名额分配，在法律上无法规定，尤其在现在情形之下，如勉强为明文之规定，以致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反于事无补。分配与人选如何规定，可待办法通过后，政府与各方商量后解决。惟有一点本人必须附带声明，在坐各位都承认国民党是立于领导地位的大党，如果国民党委员的名额仅仅是比较任何他党的名额多，而不具某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便不能履行领导的责任。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这条是一个抽象的规定。这个委员会的实在权力，在下一条内明白的具体的规定了。

四、国民政府委员会职权有六项：

甲、议决立法原则。过去十多年来，这个权从前在中央政治会议，后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个职权的意义，是一切法律案的原则，由国府委员会决定，决定后立法院根据原则制定法律，修改法律时亦同。

乙、议决施政方针。凡是政府大政方针，过去都先经中央政治会议或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决定，即每两周的军事外交报告，报告完后，会中如认为有讨论的必要，亦可讨论议决。

丙、议决“军政大计”。关于军政，现在系由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分管，但国防最高委员会得对于军政为一切的与最后的决定。所谓议决军政大计之权，意即指此。

丁、议决财政计划及预算。政府每年国家预算以及其他财政计划，现在都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这里改为提到国民政府委员会来决定。

戊、主席交议事项。

以上五项是国民政府委员会行使的。

在这里我要向诸位先生说明的，就是本方案没有将用人权，即任用各部会长官之权，列入国民政府委员会职权之内。就政治效能着想，我们不能将这种职权列入。用人的权最高级是选任，选任权向来不由国防最高委员会行使。至于各部会长官以及各省政府人选向来系由行政院决定，将来党外人士如果参加行政院，自亦参加该项用人权之行使。至于各部会长官之任用，就民主国家的例子言，亦多不提请议会通过，英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就中国情形言，如果负责行政的行政院长，每用一个部长，都要先行提交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批准，在院长固难于负责，爱惜声名的人，也许不愿出而担任部会长官。自然，政府中也许因此有不当的人选，但是这一层亦有补救，因为我们的方案尚有(己)的一项即委员可以三分之一以上连署提出任何议案，那末，部会长官如有不称职的情形，自然可以根据(己)项提出罢免，或其他纠正的案。我们觉得不仅在此过渡时间，关于用人权的办法只能如此，就是将来宪法，对于行政院部会长官的任用，在原则上恐也只能如此。

五、国民政府主席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这一款的意义，并未以绝对否决权给予主席。同时国民政府主席也不是一个所谓“统而不治”的主席，有如英国之元首一样。这一款的制度，可以说是采自美国的。

六、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但应于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在目前情形之下，对内对外难免不有紧急情事发生，在紧急情事发生时，主席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

最后一条是行政院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会长官，这一条在使国民党以外人士并得参加执行机关。至于政务委员之名额以及是否兼部会长官，自不宜作硬性规定，可让未来事实的需要来决定，在这方案上，我们没有提到国民参政会。没有提到的原因，是在这一回国民大会任务如何尚待明定。国民大会的任务究竟是制宪还是行宪？尚待确定。如果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而且该会同时制宪行宪，则国民参政会问题或可不必多讨论，否则国民参政会的地位自须郑重考虑。我们准备于国民大会的任务有了决定之时，对国民参政会问题再提出意见。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

董必武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

我本想将改组政府问题与共同纲领的意见，合并报告一下，但现在时间不够，所以这里只先把关于改组政府的意见说一说：改组政府问题是抗战中远在一九四一年时我与周恩来同志曾和王雪艇、张岳军两先生及其他参政员谈过一次，那时只想把政府机构改简单一些，至一九四四年秋，我党代表林祖涵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联合政府。当时敌人进攻，中原湘桂相继沦陷，形势危急，群情激动，都认为军事如此失利，主要由于政治不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策，实有改变之必要，政府机构又叠床架屋，互相推诿，互相牵掣，行政效率总提不高，加以人事官吏贪污，极受社会指责，所以我党有联合政府之提出，但未能实现。那时政府方面是不愿联合政府这个名称的，去年一月周恩来同志与王雪艇先生商谈，王提行政院内设政务委员会，容纳各方人才，我们不同意，我们仍然主张联合政府。现在政府虽然还是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名称，但政府方面所提改组政府的意见，关于改组政府，我首先要说明我们的观点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的。如第一、我们承认蒋主席的领导，这个意见不是自今日始，我党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已有过这样的声明。第二、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第三、对国民政府的各院部会组织机构也不想变动它，只是在这基础上进行改组，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其次关于改组政府，我们也曾想了一些意见，但未形成文字提案，大致有下列几点：

第一、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在纲领的基础上来改组政府，当然这个纲领中也包括着人民自由权利等问题。黄任之先生曾说过纲领有如剧本，政府人员有如演员，空有演员无剧本，只有各唱各的，这话说的很对。

第二、结束训政。国民政府委员会既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如果委员会无权用人，那末政策决定了，仍交一党专政下的官僚去执行，结果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什么都推不动。所以既然是最高决策机关，最好有权决定人选，至少是政府中的重要职员应由委员会选定。

第三、王雪艇先生说国民党要在政府中占多数，我们既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当然也同意可以多一些，至于多到什么程度？根据我们做地方政权工作的经验，最好是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第四、王先生又说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提交国民党中央执会或中常会通过。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国民党中央直接干与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不知由结束训政到实行宪政这一过渡时间与训政时国民党对国家的地位，究竟有何区别？不过我曾听孙先生讲过：他说主席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也还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党内的手续，这似与王先生所说的不同，我们希望这点能照孙先生的解释。

第五、方才国民党方面所提“遇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我们觉得不甚好，老实说我们中国除叠床架屋的政权机构妨碍行政效率外，还有手令制，如果确定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不但不能防止手令制，而且更促进手令制的发展，紧

急处置权并非国家元首必不可少之权，这在罗努生先生讲话中已提到了，我们认为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副署。

第六、国府委员如有四十八人，开会不易运用，难免不灵。可用委员会选定少数人，组织小的会议，如外国所谓小内阁一样，至于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就叫他为国府委员会常委会也好。

第七、行政院政务委员得兼各部会长官，这规定好像政府改组只限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我们认为政府改组，应包括国民政府下各院部会的改组，使各党各派与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有广泛的机会参加政府工作。

第八、政府改组后，党的费用不应再由国库开支，这点应当明白规定出来。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在讨论人民 基本自由权利问题时的发言

政府答应的事做几件，各党派无党派人士都欢迎拥护。如蒋主席演辞提出有关民权的宣言，得到全国赞成。又如取消二个集中营，《新华日报》与别的报纸都一致称赞。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杨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邵先生刚才说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希望快做，以昭大信。其次，我们负有一部分地方政权责任的方面，政府党与全国人民也可以提出向我们要求，我可负责声明，只要各方面有真凭实据来批评，错了的，我们一定认错，应改的一定改。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 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

民主同盟也主张改组政府，这理由很多，并非为想参加政府，第一理由是大家既期望宪政实施，在这过渡时期总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我们很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层，为结束训政完成宪政，总希望走上举国一致的政治，因此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第三，目前政府行政效率低，应该使它提高和现代化。本此三点认为有改组政府之必要。

罗先生进一步指出，依上述三点看法改组政府则必须确定三项要点：

一、既要各党派参加，人就复杂，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西方国家政府由多数党执政，但在选举时必须提出政纲政策来竞选，我们若没有一共同纲领，难免使国务院天天去争原则，今天政府代表未提，民主同盟认为应先有共同纲领，使能共同合作免贻误政务。

二、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

三、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办法也赞成，但要使它能真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能执行，那就违背了我们主张改组政府的原意了。

接着罗隆基先生提出一连串询问，希望国民党代表能作答，

以便考虑何者可同意，他问道：

一、国府委员会议是政权机关抑是治权机关？原来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府委员会是一治权机关，是否要修改？

二、国府委员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参加，但须经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

三、增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抑是只补充？

四、方案中说国府委员会是政治最高指导机关，而说明时则说是决策机关，这“指导”二字似谈不上“决策”。原来的国府组织法，并非指导机关。

五、决策与用人权分离，则部会高级长官，是否向国府委员会负责，决策如何能保证其实施？各国议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权这问题如何解决？

六、照方案所列，三分之一委员联名可建议，三分之二府委赞同有否决权，如采取补充办法，参加府委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

七、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若无限制，则可能使将来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英美的紧急权需提交议会通过，而这方案中所规定只说向国府委员会报告，应请解释。

最后罗先生说他认为改组政府，一定要顾到前提三个原则，使它真能过渡到民主，不然只有过渡而无目的，就无意义。要是没有共同纲领，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事，要二个委员会来解决，这是很危险的，做不好，就对不起老百姓。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青年党代表团提出改革 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

依据目前国内与国际的形势，一般人民的要求，以及战时战后的政治实况，政府之必须有所改组，以一新中外耳目，殆已形成一种无可避免的事实。

吾人期待有一部适合中国建国时期的良好宪法，可以产生，但自今日，以至一个宪法政府的成立，至少尚须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

此所谓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为中国开始走入宪政的准备阶段，其价值实至可宝贵，不仅和平统一的基础能否奠定，以此为关键，即国民大会能否完满召集，对于宪法的意见能否全国协商，也莫不以此为枢纽。

吾人心目中所期待改组的政府，即指此半年乃至一年间的过渡政府而言，这个政府的期间，虽至为短促，但所必须完成的工作，则异常艰巨，因此吾人认此一新政府之组成，必须具备下举的两个条件：

一、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须包括全国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

二、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

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

此一政府为从训政过渡到宪政事实上所必须的政府，因此吾人主张一面须顾到法的立场，一面兼顾到事实的需要，不必过渡的拘文牵义，必求其工作能圆满达成。

吾人主张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属于国策决定机关的：吾人主张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会员须经协商，由政府加以任命，人数无须乎多，但须包括各方面。经会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决定，政府即须付诸执行，惟政府认为绝对难于执行事项，亦得提交复议。

二、属于政务执行机关的：吾人主张改组行政院。其他各院会，以及有关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交通各重要机构，其人选须包括各方面，以适合稳渡目前难关并达到实施宪政为度。

三、属于人民监督机关的：吾人主张加强国民参政会，增加人数至五百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举监督政府之责。政府既属合作性质，参政会所增加之名额，即须注意网罗各方，尤以无党无派的名额，有特别加多的必要，凡参政会所建议，经中央政治会议审核决定者，政府即须付诸执行，是否有当，敬祈公决。

提案人：曾琦 陈启天 余家菊

杨永浚 常乃嘉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

曾琦关于改革政治制度 实行政治民主化案的报告

青年党的主张是：

一、最高决策机关，取消目前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中央政治会议。

二、政务执行机关，由于战后和平建设任务繁重，现政府的政务执行机关，应全盘改组，包括各院部会在内。

三、人民监督机关，在宪政实施前应以国民参政会为民意机关，扩大其职权与名额。他们主张从现有二百九十名扩充至五百名。

曾琦先生解释道：以上三项做到，就能形成民主体系了。至于怎样照顾到国民党的法统问题，他说：蒋先生为国家元首，为国民党总裁及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经过他就能三面联系，并不改变国民党领导地位与蒋先生的领导地位。

曾琦先生特别说明青年党这提案与国民党方案的不同。本于愿民主体系进一步，他们感到国府委员会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来运用，对人民的号召力较差，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郭沫若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发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政府延揽各方人士参加政府，这表现了诚意。这目的是为了实施宪政，研究的结果似乎难以达到这目的。

一、国府委员增三分之一，人选权在主席，即使都增的是党外人士，那也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太臣，参政会即是一例，政府既有决心与诚意，应决心使宪政目的达到。

二、主席权限太大。雪艇先生说主席并非独裁，但是也太辛劳，是否可设辅助办法，如副主席或常委会，以减轻主席之劳瘁与责任。

三、对政务执行机构部分，方案太简单了。

四、最好根据党派平等合法原则，由各党派来另成机构研究国府组织法。

(1946年1月14日)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施政纲领 ·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 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一 总 则

中国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新阶段应即开始，爰特邀集各抗日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兹经一致同意：

(甲) 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

(乙) 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丙) 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 人民权利

(甲) 政府应保障全国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

(乙) 承认男女平等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丙) 现行法令有与上述两项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

(丁) 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所有侵害人民权利的一切特殊机构，应即解散。

(戊) 立即无条件释放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

(己) 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政等检查制度。

(庚) 一切政府机关与军政人员，凡有侵犯上述人民自由之行为者，应予以处罚。

三 中央机构

(甲) 在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过渡期中，必须立即扩大现有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

(乙) 各党派无党派民主分子，应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丙) 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丁) 政府所发布的一切命令，应经由会议通过及主管机关连署。

(戊) 改组后的政府施政方针，应以本纲领为根据。

四 国民大会

(甲)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

选举法进行选举。

(乙) 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合的国民政府。

五 地方自治

(甲) 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

(乙)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

(丙) 全国各地凡已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为合法，并定期实行改选。

(丁) 未能立刻完成民选在省区，省政府应由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地方性的临时的民主联合的省政府。并确定在一年内完成新的选举，成立正式的民选的省政府。

(戊) 收复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应与当地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的省、市、县政府，再筹备经过自由普选产生正式的省、市、县政府。

(己) 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

六 军事改革

(甲) 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以便改革军政，统一军令，实现军队国家化。

(乙) 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均为国军，公平合理的分期整编全

国军队，缩减军额至最低限度，划定军区，厉行平等待遇，确定公正的人事、征补、供给与后勤制度。

(丙) 根据军队属于人民之武力的原则，以民主精神教育军队，并以军民关系为军队奖惩之第一个标准，以彻底纠正军队属于任何个人或派系之现象。

(丁) 裁兵后，地方治安主要应由地方保安队及不脱离生产之人民自卫队维持之。

(戊) 确定今后国家军费预算不得超过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

(己) 一切伪军，无论已否加委，均应拟具妥慎办法，定期解散。

(庚) 在华日军尚未缴械者，应限期缴械，并限期遣送回国。

七 复员善后

(甲) 政府应迅速制定切实有效之善后复员计划，保证退伍官兵得到职业，妥善照顾残废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与遗族之生活。

(乙) 对收复区难民之救济，疫病之扑灭，币价物价之稳定，敌产逆产之合理处置，接收人员侵占贪污之严格制裁，敌寇破坏公私财产损失之调查，附逆汉奸之检举与审判，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之合理分配等，政府应定切实计划，迅谋实施，并依靠广大人民团体之帮助与监督，以促其成。

(丙) 切实帮助义民难民还乡，给予交通上之便利和优待。

(丁) 在交通上应迅速修复铁路公路及车辆船只，全国交通事业通应立即脱离军事管理，完全为和平事业服务。

(戊) 切实执行停止兵役和豁免田赋一年之法令，一切变相

之征兵征赋行为，均应严禁。

八 财政经济改革

(甲) 确定预算决算制度，并平衡收支，取消苛杂，改革税制，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国家支出之最大部分，应保证用于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

(乙) 为促进中国工业化，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吸收对发展经建有关之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决定经建方针，制定计划，废止现行统制政策，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确立国营与民营种类，取消国营工业之特殊待遇，扶助民间工业，给予大量贷款，轻税及购买原料与运销之便利，使中国经济走上公营私营及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反对国内官僚资本，并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挪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

(丙) 实行农业改革，扶助农民组织，推行全国减租，适当的保护佃权，并保证交租。严禁高利盘剥，国家银行应扩大农贷数量，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供给农具、耕牛及种子，发展合作事业，开垦荒地，建设水利。

(丁) 实行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

九 文化教育改革

(甲) 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

(乙) 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

(丙) 普及城乡小学教育，扶助民办学校，推广社会教育，有计划的消灭文盲，提倡卫生，改造中等教育，加强职业训练，扩充师范教育，并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

(丁) 在中央与地方预算中，充分增加文化教育经费，并由国家补助民办学校及一切文化教育团体，奖励科学研究、艺术活动及出版事业。

(戊) 保障教职员及科学工作者生活，并救济贫苦学生与失学青年。

(己) 改组国家宣传机关，使一切国营之报纸、通讯社、广播及戏剧电影事业，为全国人民服务，不为少数人所垄断统治。

十 国际和平及保侨

(甲) 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彻底肃清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残余，并制止未来侵略起见，坚决遵守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及波茨坦四国宣言，努力国际合作，与美苏英法及一切民主国家敦睦邦交，遵守条约信义，务使中国不成为产生或扩大国际冲突的因素。

(乙) 在不妨碍民族独立条件下，努力发展中外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并保护外国人民在华合法利益及生命财产之安全。

(丙) 通过对日管制机构，严惩一切日本战争罪犯，镇压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鼓励日本人民民主运动之发展，以防止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之再起。

(丁) 外交部及驻外使领，应积极保护华侨利益，解除华侨痛苦，给华侨回国以往返之便利。华侨回国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应予以生活上之帮助。

提案人：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协第五次会议 讨论共同施政纲领问题

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于昨日(十五日)上午九时举行，出席会员三十一人，王世杰、邓颖超二代表因病请假。昨日讨论议程为共同纲领问题，由孙科主席，发言者有梁漱溟、黄炎培、张申府、吴铁城、董必武、章伯钧、常燕生、罗隆基、陈布雷、李燭尘、邵从恩及王云五等人，会议于下午一时散会。

会议首先由主席孙科先生说明，各方面尚无有关纲领的书面方案交来，今日请各位发表伟论。接着由梁漱溟先生发言，他认为地方政府问题应在改组政府议程中讨论，因为共同纲领须在政府改组后实行。黄炎培先生发言，希望先由政府方面先提草案，交大家讨论、修正或补充，这样最好。张申府先生从共同纲领之重要性说起，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最中心的一项任务是共同纲领或叫和平建国纲领。产生这一纲领须应有二前提：一是要在协商前有和谐空气，这一点他认为由于停战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人民自由权利之保障，这一点希望政府快做。接着他说共同纲领等于轨道，也可说是一种法，无轨道，无法，就不能行，无所遵。宪政时期国家根本大法当然是宪法，但在这过渡时期，要有一短期的法，共同纲领就成为必要。一党执政要有法，各党参加政府更需要共同遵守的轨道或法，不然意见不一，不能做事。最后他对

纲领的内容与如何产生两点说明了若干原则性的意见。

吴铁城先生说：大家主张要纲领，我也赞成。首先，对于纲领的形式与内容，他提出几点意见，（一）不分门类，过渡时期应做能做的事列为简单条文；（二）可仿照《抗战建国纲领》形式；（三）昨天听有人说：政治协商会议，实际是各党派会议，无法律根据。各党派所订纲领是否能代表人民公意？有人说不要美其名为纲领，还是老老实实称为党派间政治协定好得多，有人说你们不是代表老百姓，是分赃。说到这里吴先生说前二项是他自己的意见，后一项则是听来的报告给大家听听。其次是他提出以建国大纲，国民党六中全会政治纲领，民国三十五年国家施政方针与《抗战建国纲领》为根据。末了他说，各方面既未提出方案，可否对此先作广泛意见交换，而推出人来起草，然后交大会决定，或者是今天广泛讨论后，即将讨论意见，交施政纲领分组审查。

董必武报告纲领意见

董必武同志报告共产党对施政的意见大意谓：关于施政纲领，共产党方面预备拟一草案，但尚未脱稿，现在只能略述概要以供参考。

第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会谈纪要》上本有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在今天的共同纲领上仍然适用，拟稍加补充，内应包括下列数点：（一）各党派长期合作；（二）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第二、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一)我们认为人民应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徙、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免于贫困免于恐怖之自由。凡与此原则有抵触之法令，应予修正或废除。(二)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之机关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这点在国共会议纪要和蒋主席在本会的演说中都提到过，但至今并未实行；(三)所有侵害人民之一切特殊机关应立即解散；(四)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我们这点与政府所说：“除汉奸与危害民国之政治犯可释放”不同。因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有一条是对付“叛徒”的，什么是“叛徒”呢？含义不明确。政府当局所不喜欢的人，都可以“叛徒”或勾结“叛徒”罪之，人民怎么受得了呢？所以我们不同意那样说法。

第三、结束训政，扩大政府的民主基础。(一)必须使现在的国民政府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而是全国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公平而有效参加的政府；(二)举国一致脱离党的直接统治，昨天国民党所提的方案仍然不脱党治，政府委员还是要由国民党决定，我们不同意这样办，我们以为任何党对政府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三)党费不由国库开支；多数党在政府中主要职员的名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第四、筹备国大制定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会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并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定于本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国民政府。

第五，实行地方自治，除废保甲制度。(一)政府现行的地方自治是以保甲制度为基础，甲以户为单位，不是以人为单位，一户只有一人可享有选举权，现代民主要求人人享有民主权利，我想我们也应以人为主，废除保甲制度，使民主普及到全体人民不

仅普及到户。(二)成立省以下各级自治政府，凡已实行民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合法。(三)未能立刻完成的地方民选的省区，省政府应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协商，先成立地方性临时的民主联合省政府。(四)少数民族区，应承认其民族地位，及其自治权，这是符合于中山先生的主张的。(五)解放区问题应由本会解决，梁漱溟先生这点意见很值得尊重。我们对此问题并不是收回，不讨论，而是愿意放到地方自治问题中讨论解决。

第六、改组军事委员会成为各派共同领导之机构，承认抗日军队为国军，分期整编军队，不是整编那一部分，而是全国整编，划定军区，实行平等待遇，以民主精神教育军队，并以军民关系为军队奖惩的第一目标，纠正军队私有现象，大量裁兵，使军费预算不超过国家总预算百分之二十五，一切伪军不论已否加委应一律解散，敌械限期缴清。

第七、制定善后复员计划，保证退伍军官职业，照顾军人遗族生活，救济难民，扑灭疫病，稳定物价币价，合理处理敌产逆产，严厉制裁接收人员的贪污侵占，检举审判汉奸，分配援华物资，资助难民还乡，交通事业脱离军事管理，停止兵役，严禁变相征兵，豁免田赋。

第八、改革财政经济、取缔苛杂，收缩通货，稳定币值，整理伪钞，确定预算决算制度，促进农业，改革工业，政府应召集包括各方面的全国经济会议，照顾中小企业，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确定国营与民营范围，废止经济统制政策，制裁官僚资本，扶助民间工业，防止国营事业官僚化，私人企业独占化，改善劳工生活；救济失业工人，推行二五减租同时保证交租，发放低利农贷，发展农业合作，增加农业生产，引导土地资本投入生产事业。

第九、改革文化教育，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育自由，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干涉。普及小学教育，推广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改造中等教育，加强职业训练，扩充师范教育，根据民主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增加文化教育经费，补助文化教育团体，奖励科学研究，出版事业，保障教职员及科学工作者生活，救济贫苦学生，失学青年，改组国家宣传机构，不为少数人所操纵而为全国人民服务。

第十、维持国际和平，彻底肃清法西斯军国主义，遵守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宣言、及波茨坦四国宣言，努力国际合作，遵守条约信义，使中国不成为产生国际冲突之因素。其次，在不妨害民族独立的原则下，保护外人合法利益。最后，应保护华侨利益，如目前汇款回国之困难，应设法解决。

以上各项有的已包括在《国共会谈纪要》之中，有的是另外补充的。本草案的精神是兴利除弊，但在除弊一方面说得较多，也还只能说是弊去其太甚；在兴利方面没有详细列举许多，只就目前事实上最迫切需要的提供一些意见，单就表面形式上看，好像偏于消极。大家试想，弊不除利如何兴？这样说草案精神实在仍是积极的。

章伯钧主张共同纲领应包括民主 改革及步骤和一般施政纲领两部分

章伯钧先生强调纲领问题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之重要地位，根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所规定以及《国共会谈纪要》所决定，都

说明纲领问题是政治协商会议任务之一。他又说民主同盟未起草纲领。不是因为轻视而是为了多听各方意见，慎重处理。他认为纲领应定为和平建国纲领。内容应包括消极积极二部门。（一）民主改革及实施步骤；（二）一般施政纲要，在第一部门应包括改组政府、地方自治、人民自由权利、善后救济等项。军事调整、党派关系等问题必须解决，同时共同筹备国大，修正宪草等问题，也必须做到。这样民主才能开步走。对第二部门，他说，现在全国人民盼望早日实行宪政，事实能做到否，本人没有把握，要看前面那些事情能否做到，做到了，就有希望。要有一般的施政纲领，分列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文化等门类。章先生并补充了吴铁城先生的意见，他说应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约法》做为订定好纲领的根据。同时也要把中共及其它政党的政纲及各地各界人士的意见都拿来参考。

青年党同意共同纲领

青年党的常燕生先生提出七点意见：（一）青年党认为共同纲领是需要的，因为按常理讲政党是依政见被接受与否作进退的标准的，定名赞成用和平建国纲领。（二）需要有蓝本，他们认为可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去掉有关抗战部分，再加以修改。（三）内容原则上：（甲）简要胜于铺张；（乙）现实胜于理论，要一年半载能做到的列入；（丙）除弊重于兴利，因要顾到过渡时间兴利不易，只要能为宪政作铺路，把宪政障碍除去就好了。（四）内容：（甲）须顾及国家的统一安定；（乙）须顾及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丙）须顾及整个制度的配合运用；（丁）须顾及民主自由的基

本保障。常先生说同意其他代表们所发表的保障自由权利的意见，并且应把它列入；（戊）须顾及人民经济能力的保障与扶持；（己）须顾及文化教育的充分自由发展。（五）起草与讨论方式，常先生说或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若大家认为这纲领不够，或可推五人起草交大会讨论。（六）章目问题，主张：（甲）要列入人民权利保障；（乙）中央政制改革；（丙）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丁）复员救济问题；（戊）财政金融之整理；（己）生产事业之扶持等项。（七）前言以中共的提案作讨论根据，他认为中共提案虽看起来似乎太繁，但很切合需要，可作讨论根据。至于除弊重于兴利原则，他表示赞成，并且补充说，纲领中一定要规定不准特务指挥军警机关。

陈布雷先生赞成刺耳的词句不用。纲领主张用建国纲领四字。张申府先生补充第一次发言，他说谁来实行这纲领，与人民应有监督其实行的机会，这两点应列入。最后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固然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但民意不是不可知，今天要和平，要安乐，不满现状，特别痛恶贪污，要民主，据此来定纲领，则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名义上不代表人民，而实际代表了人民。

李燏尘提出民主经济建设方案

李燏尘先生是第一次在会议上发言，他提出了一民主经济建设方案，作大会参考。他说，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最多，贡献最大，负担最重，痛苦最深，主张政府应负责解除其痛苦，他着重兴水利与土地问题来说，首先应做到“二五减租”。讲到工业建设时，他说第一期经建原则宣布，民营工业家很受欢迎，后来国民

党六全大会决议，把国营工业经营权利，扩大无限，很觉遗憾。人民认为政府经营工业太多，照过去事实政府办理花钱多而无成绩，这对国家不起，人民是要说的。他认为纲领的前言应提到：（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但应加以说明；（二）实施全民政治；（三）保障世界和平；（四）要说明纲领为宪政铺路，为宪政辟一坦途；（五）要说明目前急需兴革事项。

李先生说，要国营企业好，首先须取消补贴政策，还要制定管理国营工业法规，检查标准单位成份。应该有奖惩办法，办事的要真正负责任。李先生力疾为民营工业申诉。以贷款为例，国营事业很便利、民营事业借不到。纳税则国营事业免税，税全由民营事业负担，实在不公平。他主张请党政机关指导人员退出工厂。他呼吁政府应做大事不与人民争小利。他举棉花为例，我国现在纱锭400万锭，需棉1200万担，现在全国只有三、四百万担花，不够得很，中国并不是不能生产足够棉花，完全是被统制减产了。如广西省本来可以产100万担花，现在被统制的结果只产二、三十万担了，政府如不拿出决心花1000多亿来大量贷款，增产是不可能的，像目前要去买美棉，这太可惜！他又举收复区接收为例说，成样的厂都被政府拿去了，不成形的厂则标卖。李先生最后沉痛的说：政府去争小利，使人民太苦了。

罗隆基说能够适应人民 要求就是法的根据

罗隆基先生说，由吴铁城先生的话来说点感想，他首先讲共同纲领法的根据问题。罗先生说，吴先生刚才说外面有些人说本

会不能代表民意是分赃，这牵及到纲领的法的根据问题。他说即是各党派不参加政府，政府仍是一党执政，如大家共同能遵守一个纲领谁都会拥护，所以纲领应同政权分成二事来看。分赃这个词很易引起人误会，望少用。接着他说，英国大宪章产生于1215年首都发生事变时，是由一部分贵族向英王提出要英王签字。英国大宪中有人民不依据法律不能逮捕一条，成为保障人身自由的根据，这并非是从宪法而来，而是从贵族与英王协议而来。依此最古老的宪政国家为例，政治协商会议非人民代表，只要真正适合人民的需要，能订一好的纲领，就应看成是法的根据，而且进一步说，问题要看是否适合人民的需要，不要只说法的根据。

罗先生不赞成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共同纲领的蓝本，他说照常先生意见，既要除弊兴利，但《抗战建国纲领》中就无除弊规定，这就不符。

黄炎培建议成立纲领起草委员会，起草纲领要征求人民意见

黄炎培先生说，纲领名称他赞成用“和平建国纲领”。并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多征求人民意见，同时仍希望政府也起草并首先提出。此外他对纲领问题提醒三点：收复区解放区问题要解决，其次，《约法》是现行大法，对人民自由规定要详，应作订定和平建国纲领的参考，不要与它抵触。最后他希望从今以后在会场再不准用分赃两字，他说赃者盗窃得来之物也。分赃不均都是老公文上常见字眼，怎可说国民政府的政权是赃？我不能承认，全国人民也不会承认。黄先生又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我是上海人，吴

先生做过上海市长，上海人晚上被强盗剥去衣服，称为剥猪猡，有一人衣服被剥，自称剥猪猡，后来一想这不对，因为这岂非自承是猪猡了吗？政府万万不可承认各党派可以分赃，我参加过国防参议会，现在也还是参政员，我不承认国民政府政权是赃。黄先生的笑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吴铁城先生重复说了一遍他的发言之后，因时间已迟，即宣布散会了。

（原载1946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军队国家化 •

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林蔚 关于整军设施的报告

主席、诸位先生：

本席奉命报告整军计划及实施经过，拟分为去年度整军情况及本年度整军计划两个阶段报告。兹分别说明如左：

去年度整军情况

第一、整军之原因

检讨我国军必须整编之原因，溯自二十六年抗战开始之际，部队总数量有四九军一二八师，三〇旅，随后因战局之开展，战场逐年扩大，至卅三年底止，扩张至一二四军三五四师，三一旅，一五营，此种扩张率，大约不过两倍，就战争动员之原则，并揆之各国战例，原属不大，无如部队素质低下，缺额逐渐增加，番号虽增，战力反逊，不得不整编之，此其一。次则由国家财力物力有限，人民所受痛苦已深，实无法再继续负担如此庞大军费，不得不整编者，此其二。总之，整编国军不独为国人一致之要求，

即盟邦人士亦莫不一致希望，此种整军政策关系抗战胜负与国家命脉，中央原早有定策，只以环境关系，迟至去年方得决定实行，本部禀承中央决策，于去年初开始努力执行。

第二、整军之目的

整军之目的，在使现在庞大复杂之军队，调整为必要而充实之国军，换言之，整军并非消极的裁军，而乃积极的充实部队作战力量，在敌人未投降以前，即以之准备反攻，今后则以之巩固国防，并协同盟邦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故本部所定卅四年整军方针，一为配合反攻要求——充实作战力量。二为配合国家预算，——顾及国家财力物力。

第三、整军中心工作

整军中心工作概分为：（一）部队改编与充实。（二）改善官兵生活。（三）调整军事机构。（四）安置编余官兵。

一、部队改编与充实：是乃加强部队力量最重要之工作，本部衡量抗战要求与部队情势，策定三十四年整编实施原则如次：（一）各部队一律裁并三分之一。又为实施整编便利起见，即以每个战区为整编单位，即战区内辖有三个军者，应裁一个军，三师制之军即裁并一个师，两师制之军其整编办法有二：如两个师均保留番号，但各师均自行缩减一个团，所缺乏之一个团，则另由其他部队拨补以充实其建制。如只保留军部及一个师，则须撤销一个师番号，以其士兵拨补军部直属部队与所保留之师，另拨其他已整编完成之一个师，以充实其建制。（二）各部队整编方案，概由本部按原则拟定由战区负责实施，如战区依实际困难有所变动时，只要不违反原则，本部概可核准。（三）整编部队之

编余士兵，一律补充各整编所保留部队之缺额，俾部队中之空番号减少，而实力充实。(四) 凡每一部队遵照整编原则实施整编完毕后，即可开始发给新给与。如未遵照原则整编之部队，则仍发给旧给与，如某部队先整编完毕，即先享受新给与待遇。截至卅四年年底止，部队改编情形如下：(一) 三十三年底原有一二四军，三五四师，三一旅，一一二团，一五营。(二) 裁减三六军，一一一师，二一旅，八三团，一〇营。(三) 已编妥者八七军，二三五师，八旅，三五团，五营。(四) 未经整编者尚有四军，一八师，大部在新疆未易实行之地区。(五) 现有八十九个步兵军，二个骑兵军，二百五十三个师(内有新增青年军三军八师及新改编二师)。关于充实方面：当计划之初，完全根据反攻计划，充实反攻主力部队之战力，衡量国内兵工生产与国外物资援助情形，故首先充实陆军总部所辖部队，即“阿尔发部队”及西南区部队。其充实情形如下：(一) 预定美械装备一二军，三六师。国械装备一〇军三一师。(二) 至三十四年底止，美械完成轻兵器百分之八十，重兵器百分之五十五，国械完成一〇军三一师之装备。其他编整后部队亦须有计划逐渐充实。

二、改善官兵之生活：去年抗战初期，物价高涨特甚，生产运输两俱艰窘，全国官兵生活已陷于极苦状态，本部竭中央财政所及，针对生活之困难，分两大端之改善，即提高待遇与补给实物是也。关于官兵待遇之提高，自三十四年四月至十一月业经三次之调整，计官长薪饷增至六至七倍，士兵约增至三十余倍，只以国家财力物力所限与物价增涨过甚，尚未能做到理想地步。其次补给实物，即定量发给，现宜为增加兵官营养极迫切之需要，本部下最大决心，欲求达到此目的，对副食费虽定有标准，而对各地物价过高者亦酌予增加，实施以来，士兵营养改善已多，惟

各地情形及运输关系尚未能全部彻底实行，良为遗憾。

三、调整军事机构：军事机构与军事学校大小单位计四三〇〇个，经裁去一五〇四个，现有约二七九六个，约裁去百分之四十。原有军事学校九三个，裁去四九个，现共有四三个，约裁去二分之一。以上整编结果，共裁减一一〇万人员。

四、安置编余官兵：部队裁编之后，对编余人员之安置，诚为当务之急，曾定有详细办法，以期编余人员各得其所，对于编余官佐，第一步设立军官总队，以资分区收训，先后计设立军官总队十四个，大队四个，中队四个，共计收训三万七千余人，并规定凡新成立之机构，或其他补用之人员，均应由各军官队尽先调用，第二步则按其性能志愿，再予以专业训练，以便转业，现规定由中央训练团为转业训练之总机构，委托有关各部，设置各种专门之技术训练班实施训练。

本年度整军计划

第一、国军整编纲要

抗战既经结束，本年已是复员阶段，国军兵力之保持，自应依据国防原则，衡量国家经济力量，尽最大可能缩减成最小限度之精锐部队，故策定纲要，确定目标，期于半年以内，缩小为九十师，即等于抗战初期(二十六年)兵力之二分之一，抗战末期兵力(三十三年底)四分之一，分述其要项如次：

一、国军现有步兵八十九军，二百四十师（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在内），骑兵二军，十三师，共约三百八十余万人，拟整编为九十师及骑兵十个旅，连同特种兵及勤务部队共保留官兵约一

百八十万人。

二、整编期限分为二期，每期三个月，第一期整编四十四个军，第二期整编四十五个军，预期于半年内整编完毕。骑兵不分期整编，预定于六月以前，全部完成。

三、各军均先自行缩编三分之一，即原三师九团之军编为三师六团之军，原两师六团之军编为两师四团之军，然后再按编制整编为九十个师，整编后应成立之军部，由各集团军司令部编成之。

四、各独立师旅团均加入军内合并整编。

五、各军师整编后，多余之特种部队，得准保留酌编为独立团，归军委会直辖。

六、伪军及挺进游击等部队，去年未曾编遣完毕者，须于四个月以内，一律编遣完毕。

七、各军师照规定编制编整完毕后，得将官兵待遇提高，希望达到文武待遇一致之目的。

第二、编余官兵之安置

编余官兵之安置，继续上年度计划，拟定具体办法如次：

一、集团转业：预定约一百万人（内官佐约十万人）分配于交通、水利、垦殖、工厂、地方服务队及各种交通警卫。

二、各别转业：二十万人（以军官佐属为限），预定训练后，分配于行政、交通、教育、警察及其他各种国家事业。

三、资遣退伍：预定五十万人，凡年老力弱自愿还乡者，均照规定退伍资遣之。

第三、游击部队及伪军之处理

游击部队与挺进部队地方团队等之编并。

编并原则 (一) 属于地方团队者，应仍归还地方政府妥行分别安置。(二) 游击挺进等部队照国军编整游击部队办法，逐次编并于军师团而撤销之。(三) 所有编余有正式出身之官佐，一律收训，统筹安置。在收训期间，准照新给与八成薪待遇。

编并经过 (一) 原有游击部队计纵队一六〇，支队三八，大队五，共二〇三个单位，官兵七十二万零二七一人，枪支十万四六八〇支。(二) 至三十四年底，除第十二战区之五个纵队尚未整编外，其余已大部拨补正规部队，一部改编为十八个保安团，三十二个补充团，四个监护团，共约十万一千人。

伪军之处理 (一) 处理原则：对伪军之处理，中央决定方针，以全部编遣为基本原则，至于官佐等按甘心附逆，投机两可，被迫胁从，奉派策反等四种分别主从处理之。(二) 处理情形：各地伪军（除东北外）据陆军总部及各战区册报，共有五十一个单位，约六十余万人，自国军进入收复区以来，除长江以南如第三、六、七、九各战区及二、三、四各方面军秩序大体底定，所有伪军已依照计划一律编遣，计二十余万人，至长江以北如第二、五、十、十一、十二等战区约四十万人，除编遣外，因情况尚未能于预期迅速编遣者约有二十万人，本部预定须于四个月内处理完成。

以上所述，为本部自去年初以来关于整军计划与实施经过之大略，本部自加检讨，深知缺点甚多，距离建军目的甚远，此后惟有一面努力研究改进，一面努力执行，以期达成中央所决定政策，完成初步之建军大业，以仰副委员长及全国同胞之期许耳。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中央日报》)

周恩来关于军队 国家化问题的报告

主席、各位先生：

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在讨论政治民主化时，曾注意到一面承认国民政府之领导，一面求得在国民政府基础上之改组，使之成为过渡时期的民主的政府。现在讨论军队国家化，原则也是一样：一面要承认抗战八年中间所有抗日武装的功绩与存在，一面要在此基础上整编为平时的国家军队。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各位先生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认真地切实地督促与协助此件工作之进行，务使其成功，而不致失败，使全国军队真的变为国家化的军队，没有一点敷衍。故我们对此议题，特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是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本人在报告停止军事冲突时，曾说明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不仅要平行前进，以达统一，而且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青年党的提案上说得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但对陈启天先生关于提案的口头解释，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如果

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末，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本会同人对于这一点如有共同认识，便易于解决问题。

第二、是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我们很同意青年党提案的意思，要军队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这点，不但我们绝无争论，而且完全同意。在此认识之下，本人还有一点申说，即军队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而且要成为国民之武力。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但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在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上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这是本会今天要回答的课题，我们愿意提出几点办法：

一、同意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委员会名称如何，没有问题，甚至于可考虑在宪政实施以前，军事委员会仍存在，而加以改组。不管那种委员会，都应该包括各方面人士参加，像民主同盟提案所说之三种成分。这样才能使军队得到公平合理的整编。不但如此，在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之附属机关如军令部军政部等等，都应该改组，都应该参加各方民主分子。因为有武装的人，不少成见很深，界限极严的，如无各方人士参

加，难得公平解决问题。举例说，这几天各地冲突仍未停止，这是非常不幸的。本人与张岳军先生都很焦急，白天晚上，无时不在等候消息，恐怕事态扩大，发生乱子，对不住人民，且无以告慰盟邦。然而另一方就不同了，如军令部报告消息，一定要附说对方是虚构事实，这样解决问题就难得公道，所以把军委会附属机构加以改组，以利整编工作之进行，颇为必要。今天林次长报告军队整编经过，使大家知道国家军队情形，那末，各种军队机关参加各方人士去实际工作，岂不是更为有益？如大家能够通力合作，足使军令军政达到真正的统一与改革。

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但这件事不能单靠纸上数字，必须见到实效。林次长报告政府计划全国军队减缩到九十个师，可是今年的整编会和去年不同，去年减缩以后，所减的兵补充其他单位缺额，余下的只是官佐，今年要从二百五十三个师整编到九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旅，也就是由三百八十八万人减到一百八十八万人，裁去二百万人，问题很大，工作至巨。而且还有游击部队、地方团队要裁减，伪军要解散，被裁散总数当不止二百万。被裁散之士兵，如何给以出路，不是容易解决的。林次长说要他们回到生产界中，固然很好，但必须尽速发展农业生产，以为被裁兵员开一条回乡的生路。讲到发展农业生产，首须实行农业改革，举办农村借贷，这些问题，都有关国家整个施政计划。就这一点看，要没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全国整编委员会，以领导、决定、督促和检查各种计划的实行，整编工作是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很好的安排被裁兵员之生活的。过去之不公，偏于一方，已经成为举国的定论。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改革。

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在此原

则之下，中共部队虽系一党领导，然为人民的武装，参加抗日，著有功绩。会谈纪要中政府答应对我们要求至少编为二十个师一点，在全部问题解决时，可以考虑，而且愿意先交三人小组讨论。这点我们没有异议，三人小组正在磋商进行办法。我们要与全国整编计划配合，整编为二十个师，而同时还要商定驻地，因为初步整编，总要有驻军区域。这个军队驻地，到宪政实施，全国部队整编完成，达到了军队国家化的时候，当然可以随时调动。并且整编日期，也要和其他部队整编日期相配合，因为这不能不有联系的。

四、同意青年党主张，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原应隶属行政院，现在军政部主要属于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是战时机构，又与行政院平行，今后既无战时状态，即应照民主政制，使军政仍属于行政院。我们更赞成在过渡期间，军政主管由国共两党以外的文人来担任，因两方都有军队，如此可以免掉偏袒一方的责备。

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日本德国的军队制度，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国家，这只要参考美国的军队制度即可知道。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唯有军队制度改革了，军队教育方可随之变动。故军队国家化，改变军队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各种军队经过长期的对立，这不仅两党的军队，即中央与地方系统，各个私人系统，也都有对立状态，遂致影响军队教育因人而异，因系而别。今天要统一军队，必须从改革教育着手。讲到军队教育，如果制度是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自然没有争论了。一方面不去教反共的思想，一方面当然也不去教反国民党的思想，

使军队第一个认识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同时改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等等，也是非常重要，应该使他们深切明了，所谓军民关系，现在军队教育对于这点错误甚多。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军人第一”这一个意思，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军人第一”，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在战时，说军事第一是应该的，说“军人第一”，便会使军人与百姓之间发生问题，因为他是第一了，谁都应该听从他，于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便出来了。照理，军民冲突，首先要责备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刚才陈启天先生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也许还可以和他讲几句道理，如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遇到兵，才真是说不清了。所以改善军民关系一点，非常重要。至于军政关系，应该以政治军，不能以军治政。目前的事实不然，故须加以改革。讲到官兵及上下级关系，当然军队首先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并划分等级，但同为国家服务，其义则一。我们看美国军队等级虽是很严，而平常生活则极其平等。这些都是军队教育与制度问题，我们须要大大改革。

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国防部队可以自由调动，地方部队则属于地方，不必调动。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只要不脱离生产，就能自行解决给养，如此既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又可以使人民受到初步的军事教育，免了普遍兵役训练。在农村中，我们如能尽量减少民劳，使之用力于发展生产，总是好的。

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对于军官训练，军队在办，政府

在办，党也在办，中央训练团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

八、我们很同意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军队既要整编，编余或退役军人，很可做政治活动或行政官吏，而现役军人，就不应再兼行政官吏。

九、我们提出在过渡期中一般军费支出，只能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都应用于建设方面。至于复员整编费用，当然列入临时项目，由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计划，送改组后的政府核准。

十、关于伪军，根据林次长的报告，决心遣散伪军，意思很好。但要把六十多万伪军彻底解散，回到民间，总要有切实办法才能做到，否则还是会为害地方的。

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我们要消弭内战，一定要迅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现在既有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很希望它能彻底完成此事。

十二、关于外债问题。复员善后需要很大费用，借外债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借外债必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外债的支出，应该用在建设方面，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

以上是我们关于军事改革方面所提出的十二项建议，同时声明这十二项应包括所有军队在内，没有任何例外。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邵力子关于军队 国家化有关问题的发言

听了周恩来讲到“军人第一”标语有毛病，邵力子先生起来对此标语加以辩护。他说：讲话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军人欺压人民，站在老百姓之上是不对的，但中国人有轻视军人的习惯，军人比老百姓苦，看戏时常见太太小姐看不起军人的事情。那个标语的目的是在唤起社会尊重军人。其次他说大家强调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当然也有人会说，国民党中委里将领很多，这点似未做到。我认为做事情总要慢慢一步步来。而且他们虽有党籍而不做党的活动。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党员都脱党，只是希望在军队中不做党的活动。最后邵先生引最近联合国大会的经验说：这次联合国大会很顺利而和谐，原因是：（一）最棘手的问题不硬性的提出；（二）小问题或限于二国的问题，双方能解决就由双方解决，不必提交大会讨论。他认为这二点精神很可参考，特别提出来。根据这经验，他主张军事方面困难的大问题，可不必提出大会，小点的能解决的，可由军事三人小组讨论。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陆定一关于军队 国家化有关问题的发言

他首先对邵力子先生对“军队第一”的辩护，说了他的意见。主要意思是指出：决不能使军人站在老百姓头上，日本的军部高于一切，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用“军人第一”并不能真正提高军人地位，只有愈爱护人民，才能受人民尊重与爱护。他说到收复区人民对军队的印象不佳，请政府注意，不要迫得人民走投无路。其次，他对张群先生发的言，发表他的意见。他说岳军先生说的三人小组在一个月内决定办法，二个月内完成整编，本意在求其快。快做总是好的，非但这件事要快，全国的整军也要同样的做得快。庞大的军费压在人民头上，真是一天也不能忍耐，应该快解决。至于要办好，就要公平合理。同时，军队国家化应与政治民主化平行进行。这是多数人的共同见解。因此要军队国家化快做到，也要政治民主化快些做出好结果。共产党所以组织军队，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这是因为政治原因。要“逼上梁山”的事不再发生，若又主张把政治民主化放在军队国家化之后，那是很危险的办法。因此，要军队国家化，希望政治快民主化，特别希望蒋主席宣布的四项人民权利，能立即实施。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 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

同人主张：本会议为奠定国家统一，并树立现代国防起见，应通过下列两大原则：

一、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为实现上列第一原则及第二原则大量裁兵之一点，应即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此委员会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包括下列三种人员：

(1) 国共两党之军事人员，

(2) 非两党之军事人员，

(3) 非军事人员。同时并聘请美国军事专家一人至三人，为此委员会之顾问，必要时，得被邀列席会议，或受委托，而协助计划工作，限期一个月内制订以切实可行之具体计划。此计划一面要达成军队统一于国家之目标，一面要裁减常备军额至可能之最少限度，但无妨于两年内分期完成。

上项计划，由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核通过后，经由国民政府执行之。在执行时，仍由该委员会负监督考核之责，直至任务完

成为止。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请大会公决。

提案人： 张 澜、梁漱溟、罗隆基
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
张东荪、张君勱、章伯钧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梁漱溟对实现军队 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的说明

民主同盟的提案与青年党的提案大体上相同，只有详略不同。相同的地方，第一、为求军队统一于国家和主张裁兵，这两个目标两个提案完全相同。其次，军队国家化之定义，即是军队不属于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党派所有，这一点也相同。至于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两个提案也大体意见相同，不过我们提案中说得较少。

梁先生随即说明同盟提案中，主张应通过二大原则：（一）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梁先生说：在这“不是世界和平就是毁灭”的时代，真正要求国防安全不在军队而在努力国际和平合作，不使世界再发生战争。但同时也要估计到战争仍有可能，因此必须与其它爱好和平国家联合起来，准备对破坏和平的国家作战。这一战争，我们的贡献，不在靠常备军，而是靠科学与工业及受了普及军训的人力。总而言之，常备军无须多，多了反影响科学的研究与工业的建设。

以上是他们提案中所主张的二大原则。至于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他们主张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由：（一）国共两党之

军事人员，(二) 非两党之军事人员，(三) 非军事人员参加，同时可聘美国军事专家一人到三人为顾问。限期于一个月内制定可实行的具体计划，要达成如何使军队统一于国家，如何大量裁兵至可能最少限度。并主张该项计划交政治协商会议审核通过后，交改组后的政府执行。该委员会仍任监督考察之责，直到任务完成时为止。

梁漱溟并补充说明：同盟提案中的整军计划委员会应为主体，而军事三人小组只是做初步整编工作，可看为大工作中的一部分。其次，全国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青年党提出停止 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

抗战胜利以后，举世皆庆幸和平，而吾国不幸独苦于内部纠纷不已，甚至引起军事冲突，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此种严重性之内部纠纷，如不从速化除，则不惟足以影响我国之国际地位，并且足以毁灭整个国家之前途，不惟无以保持抗战之胜利成果，亦且无以保证建国之顺利进行。欲从速化除国内纠纷，惟有一面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一面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已为公论所承认，顾国人对此二者，或难免有所偏重，因而使国内纠纷问题尚未能从速解决。以本提案同人之所见言之，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故同人除已另提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外，复提本案，兹将其办法列举如次，敬请公决实行。

甲 停止军事冲突之必要办法

- (一) 政府与中共双方同时分别命令所属军队立即停止冲突。
- (二) 华北各铁道交通之维持，由改组后之政府组织护路队员负责担任，任何军队不得破坏铁道，亦不得干涉交通。

(三) 由全国各方面合组视察团分赴有军事冲突之地区考察真相，公布报章，并报告政治协商会议。

乙 实行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 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现在我国军队约有五百万之多，抗战既经结束，实无常设如此巨额军队之必要。宜由本会议商定一公平标准，交由各方合组之编遣委员会实行编遣。第一步缩编为一百二十师，于三十五年内完成。第二步再缩编为六十师，于三十六年内完成。如此，然后始可渐次建立精练之国防军，堪充对外国防之用。

(二) 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军人干政，不惟足以扰乱政治，而且足以败坏军事。欲免除军人干政之害，第一须限制现役军人不得兼任一切行政官吏；第二须划分军区与行政区，使每一军区小于省行政区，而其驻军亦不得擅自调动；第三须严禁一切军队干涉地方行政与中央政治。

(三) 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此即吾人所谓军与党分立。如军与党不分立，则每一党派争取军队，成为一党一军之现象，而反无名实相符之国军，有随时酿成内战之危险。欲根绝内战，第一，须禁止现役军人参加任何党派，其已有党派关系之现役军人，应一律宣布退党，始可继续担任军职。第二，须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部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派组织及活动。第三，须禁止一切军队实施含有党派性之政治教育，如此，然后始可保持国防军之完整独立，不为各党派所分裂败坏矣。

(四) 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现在全国所有之军队，大抵已服役多年，宜分期退役，另以征兵补充，使军队常

有一种朝气，即将来由征兵编成之军队，亦须定期退伍，庶可渐次根绝军队私有与军队党有之恶习。在实行征兵制度以后，不惟要求士兵无一私兵，而且要求军官无一私官。易言之，即军官之任免，须依规定之标准，不得任意上下其手。任何部队之军官，只须合于规定标准，即可彼此互调。如此，则全国军队皆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党派，而成为军队国家化矣。

(五) 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现在抗日既经结束，所有一切军事上之制度与设施，即应渐由战时状态进入平时状态。军事由战时状态进入平时状态之要务，在先设立一国防部，以统陆一海空军之行政。此新设国防部，仅为行政院之一部，而其部长亦应不限于军人。全国军队均须统一于国防部，又须统一于整个政府之内，而非出于政府之外。如此，然后可以同时保持整个政府之统一，与军事首脑机关之统一，则军事首脑机关（即国防部）以内之各级人员，必须不分派系，选用各方之适当人才充任，使国防部易于实行统一军制与军政。

(六) 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军队可为国家与人民之用与否，须视军纪风纪之良否而定，良则国家与人民并受其福，否则并受其害。欲彻底整饬军纪风纪，除现在军事上所用之办法，如军训军法等外，并须另以民意监督军队。以民意监督军队之必要办法：第一，须由中央民意机关规定军队之定额，不许军人自由增减其人数。第二，须由中央民意机关规定军队待遇之必要标准，一律适用于全国军队。不许军人自由厚薄于其间。第三，须许由人民向各级民意机关陈诉军队或军人之不法事件。第四，须许由各级民意机关随时检举破坏军纪风纪之军队或军人，凡经人民陈述或民意机关检举之不法军人，经调查属实者，则必须由主管机关依法惩处。

总之，欲实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停止军队冲突，则无以实行军队国家化；故须先求停止军事冲突。军事冲突既经停止以后，即须全国一致以最大决心逐渐：

- 一、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强练之国防军。
- 二、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
- 三、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
- 四、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
- 五、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
- 六、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以上六项，如能实行，则军队国家化始能逐渐完成，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提案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惠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陈启天对停止军事冲突 实行军队国家化的说明

陈启天先生代表青年党说明提案理由，略谓：

一、解决国内纠纷，巩固团结，必须军队国家化，民国三十余年，战乱不已，就因军队没有国家化。

二、集中全国人材精力，加速建设，不使尔虞我诈，发生内战，免去小而消耗人材精力，大而摧毁一切事业，必须军队国家化。

三、要形成完整的国防军，也非军队国家化不可。

四、中国军队不论军令、军政、军训，向不统一，以致抗战时期联合乃至统一作战，未能充分发挥效率，由此也必须纠正。

五、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记者按：陈先生这一说明与青年党书面提案，含意有所出入，提案中是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无论偏重于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

以上是他们主张军队国家化之理由。其次是军队国家化实行的办法。陈启天先生说，第一要把维持华北各铁路交通的责任，交给改组后的政府所组织的护路队去负责，任何军队不得破坏和干涉。其次组织调查团或考察团去考察真相。至于进一步的办法，陈先生列举：

一、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国防军。这一项，他们提案中主张成立各方合组的编遣委员会，实行编遣，第一步，今年内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明年内再缩编成六十个师。

二、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主张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认为中国军人控制政治的事实，已证明使军队与政治都没有进步。

三、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主张禁止现役军人参加政党，已参加的则脱离。并禁止军队实施党派性的政治教育。

四、实行征兵制度。

五、设立国防部以统一海陆空军的行政。主张部长不一定限于军人。

六、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1946年1月16日)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国民大会 ·

中国国民党代表团 提出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

-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 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 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除已选出者外，其余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
- 四、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1946年1月17日)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厉生对国民大会之意见的说明

主席、诸位会员先生：

今天的议程是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几位代表所提出的四项意见，文字相当简单，故在若干意义方面，想提出口头报告，借供大会协商之参考。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我们国父倡导以三民主义来建国，而建国程序以“训政时期”一个阶段最为重要，但“训政”是中国国民党根据约法，受了人民付托行使政权，过去若干年中政府以及执政的国民党很想能够将训政时期应做的工作，即地方自治早日完成，然后把政权还给人民，无如在训政的过程中国家多故，经过不少挫折，近八九年来更遭遇了空前国难，以致在二十六年决定召开之国民大会，因此时开始了抗战，全国上下为要争取民族生存，争取抗战胜利，不能不将召开国民大会延缓下来。所幸八年中虽经过很多艰险，终能得到最后胜利，应归功于全国国民与前线武装将士的一致牺牲戮力，若溯其根本致胜之要素，仍赖有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伟大领袖之领导，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成立亦将近二十年了，全国国民对于国父创造的三民主义，已经有了普遍的认识，深刻的信仰，且国家已得到了独立、自由、平等，不过有了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还需要全国国民发奋自强，有保障独立、自由、

平等的力量，才可屹立于世界。政府有鉴于此，要把政权迅速还给人民，将今后建设国家的责任，放在全体人民身上，所以本年五月五日必须召开国民会议。

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这一届国民大会的职权为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我们也有所说明，五权宪法中之国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国民大会代表对中央政治有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这一届国民大会的职权仅是制定宪法，就是说这一届国民大会不是行使宪法上规定之职权，换言之，即不能选举政府官吏，及行使罢免、创制、复决三权，从“训政”到“宪政开始”的阶段，我们觉得应该如此。

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除已选出者外，其余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

除了已选出的代表以外，其余代表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经过八年余之抗战，全国上下，各界人士对于政治经验及今后建设国家之途径，都具有了深切认识，迫切的要求，故这届国民大会应该集思广益，更多的容纳各界有能力有见识对国家有热诚的人士，在这次国民大会里能贡献他们更多的能力。

四、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所谓第二届国民大会，是指在本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和宣布宪法所规定的那个国民大会，希望在六个月内依照宪法的规定选举召集之，这一点须要特别说明，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一种见解，对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有效的问题，有很多意见，有些见解，以为第一届已经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应该重选，这种见解，我们政府以及执政的党，也很重视，也曾经加以考虑，但是

我们考虑的结果，对于过去已经依法选出的代表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原因有二，一是根据法理上来讲，二是根据情理以及现在政治情势来讲，先从第一点来说，我们在法律上找不出根据来，我们看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的国民大会组织法有两条条文，第一条是“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第十一条是“国民大会于会期完毕任务终了”，根据这两条规定，国民大会职权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国民大会代表只有这种任务，没有任期，这种任务政府没有法律根据可以解除他。再从第二点来讲，以现在政治上一般趋势来看，目前国家所希求的是团结统一，从团结统一来求得国家的安定，我们在座诸位先生也是为求团结统一国家安定而来开协商会议，假定说过去已经依法选出的九百几十位代表，政府或任何方面不承认他们的代表资格，从新选举，请问这几百位代表心理上作何感想，作何反应？须知这些代表们是由各地方各职业团体中选举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代表多数人民的意思，如果我们一定要勉强不承认，那么今天我们认为各党派在过去彼此对于政治主张见解，未能完全一致，尚且要苦心孤诣，由政府来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然则这九百几十位的代表资格，或是否认或是取消，他们是不是也要另外组织一个团体？假定例如组织一个国民大会党，同样像其他党派向政府表示他的意见和愿望，再来开一个甚至几个协商会议，政府将何以处置？所以政府对于法律上既无根据，在情理上在今日政治情势上，不能不加以考虑，对于过去选出的代表，无法不承认，而且因为社会上有那种见解，所以在第四项采取一个折衷办法，规定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务完毕之后六个月内，依照将来制定的宪法，召集第二届国民大会，这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无异议的要实行普选，而他的职权，就可以对于中央政

府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以上是我们对于国民大会提出四项意见的简单说明。

至于国民大会代表如何合理增加，如何增加方法，增加多少才是合理，这一点政府方面没有成见，想提出本会议，听取各位先生意见，然后再作协商。此外，我们没有想到的若干问题，很希望诸位先生尽量贡献意见，以利协商。

(1946年1月17日)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

周恩来在讨论国民 大会问题时的发言

我要说的话，是昨天邵力子先生的话引起的。邵先生昨天发言提到了《国共会谈纪要》中的一段话和毛泽东先生与王雪艇先生的谈话。

大家都强调协商会议应该和谐，这个意思很好，但应该有个共同解释和认识。先说，何谓协商？就是因有不同意见。现在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于一堂，隆重开会，把自己意见提出来，给各方了解，供社会人士批评，会内如此，会外亦如此，大家动口不动手。其次，何谓和谐？和谐我们非常赞成，但也要有原则。和谐就是不敌视，不要有恶意，无论怎样争辩也不要分裂。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否则形式上一团和气，但各人仍怀不同意见，不说出来，就不会是真正的和谐。第三、何谓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相互容让，妥协。容让，妥协也要有一定原则，不能在形式上妥协了，而实际上不解决任何问题。比如改组政府问题，我们方面特别重视纲领，因为必须在原则上有了共同点，大家才能根据共同的政策去奋斗，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没有共同点，没有纲领，大家聚在一起，天天争吵，一定会有碍国事。如果这样，我们当然很难参加这个政府。对国家人民有利，而不是仅对那一个方面有利；再则，解决的方案要能奠定国家的民主基础。以上

这两点，大家是应共同的。

邵先生说中共对国大问题不拒绝妥协。抽象的说来，中共不拒绝妥协是对的，协商本来就是为求妥协。邵先生昨天引用了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的谈话，毛先生说，“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邵先生既然如此直率，我也应直率地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末这不是很困难么？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关于政治民主化，在别的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国大旧代表问题上，中共又作妥协，那么，我们将无以对人民。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关于这里所说的“别的问题”，更具体的说来，比如改组政府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于改组政府，不是要几个位置，而是要有确定的共同纲领。我们不轻易参加政府。有了共同的民主纲领，就当然参加，来为人民服务。同样，比如宪法问题，我们也要向人民交代清楚。如果没有民主的纲领和民主的宪法，决不能因政府中增加了一部分人，就能说政治民主化已经解决了。有了明确纲领与宪法，民主才有保障。

（1946年1月18日）

（原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吴玉章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发言

关于国民大会，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个提案。方才张厉生先生已加以说明。我想首先谈一谈：第一届国民大会重要不重要？张先生发言中，说到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任务，不过是制定宪法，而行宪权则属于依宪法来实行普选的第二届国民大会，语气似乎把第一届国民大会看得不重要。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国家百年大计就根据它来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制定宪法的机关，自然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认为把第一届国民大会看得不重要，不慎重从事，是不好的。

第一届国民大会既如此重要，那么它的组织法和选举法也就必须使之能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和代表人民的公意。

第一、九年前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国大组织法和选举法及由此选出的国大代表。当时国内是什么形势呢？那时内战仍在进行，国内不统一，许多地方不曾选举，全国普选根本不可能。但今天国内却有了团结统一的现象，各党各派，共聚一堂，商讨国是，这在民国三十五年来是空前未有的，应该利用此千载一时的机会来实行普选。

第二、九年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现在是有了，不应该剥夺他们的权利。

第三、由选举法和组织法的条文看，它是依据国民党一党专

政的方针制定的，从其中有国民党中委为国大当然代表，政府可以指定国大代表等项的规定，就明显可以看出。再就选举来说，当时各党各派都没有合法地位，无法参加选举。人民也没有获得民主权利，不能自由运用选举权，因此选举的结果，自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如果把组织法、选举法加以修改，使之公平合理，然后进行普选，国民党取得绝对多数，我们也不会反对。不过，如果坚持用旧代表来占取绝对多数，恐怕难于得到人民的信任，亦有害于国家的根本大法。

有人说，国大代表不能重选是由于法统不能改变。我以为法统之说不能强调，因为我们现在要顾到事实。今天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必须以政治解决问题，而不能以法律解决问题，因此法统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1946年1月17日)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邓颖超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发言

一、国民大会组织法，国大代表选举法和代表的选举，是十年前制定和举行的，已经不适合于十年后今天的中国情况，因此，对旧的必须重新考虑，而不是拒绝考虑，对旧的违反民主原则，违反孙中山先生遗教的东西，必须修改，而不应坚持照旧不变。

十年来，中国的国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

（一）日本投降后，民族解放的任务，可说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中国已由要求民族独立生存进入国内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期，所以国民大会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

（二）经过了十年，中国人民在数量与质量上也和以前不同了，当年十余龄的儿童已经长大成人，这批人数目不小，他们也应享到选民的权利，特别是现在人民的觉悟程度与民主要求，大大的提高了，八年中间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大锻炼，现在更积极起来要求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

（三）政治的变化。十年前党派不能合法存在，有的如中共处在地下，但在抗战中各抗日党派著有功绩，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实际重要组成部分。故国大应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筹备并主持进行。

（四）领土的改变。十年前东北为日寇所统治，华北情况特殊，台湾沦亡，现在全国解放，旧的国大选举法已不适用。根据以上

四项，尤其二三两项的情况，故对旧的必须加以修改。何况国大选举法、组织法，本身不仅不适合今天国情，而且亦不合于孙中山先生所说民权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的遗教。

现在让我们看看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大代表选举法，从这两种法看，很显然地看出代表不是完全由人民直接普选的，而是由一党主持的，且有一部分代表是指定的。如选举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由国民政府指定者，二百四十名”。第二十五条“辽吉黑热国大代表之候选人，由国民政府指定之”。除了指定之外，还有当然代表，如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为国民大会当然代表”。这乃是国民党内属于党的选举，如何能当人民的代表？如照国大代表一千余人而言，则国民党六全大会选出之执监委与候补执监委即有四百六十人，所占比例相当大的。此外，推选候选人的方法也是不合理、不民主的，如选举法第十一条“各选举区由该区内各县之乡长镇长联合推选候选人”。第十八条“各省职业团体，由各该团体之机关职员推选候选人。”而不是由会员推选。这都是违反民主精神的。

二、手续繁难，限制多端。

(一)根据选举法第三条的规定，人们要取得选举权一定要经过“公民宣誓”。(宣誓词略)不宣誓就没有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就不能参加选举。据我所知十年前社会贤达以及人民因未能宣誓而未参加选举与未能被选的，颇不乏人；而誓词内容艰深，对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农大众，完全起着一种限制的作用。且有束缚思想信仰自由之嫌。

(二)选举法规定年满二十岁有选举权(第三条)，二十五岁始

有被选举权(第十二条),这样将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的年龄加以不同的规定,实际上也即是对于人民选举权的一种限制。

(三)职业团体的选举,首先,关于候选人在选举法上规定有“从事各该职业满三年以上”一条,以八年来的战争环境,人民流离,迁徙,常遭失业,社会的不安,从事职业必须三年才有选举权,在这限制下又有一大批人不能参加选举。其次,如第十七条“参加选举之职业团体及自由职业团体,以在本法公布前依法成立者为限”。这个选举法是二十六年公布的,那时人民还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政府对人民的组织又统治极严,这是人民共知的事实,而且抗战以后,人民爱国团体纷纷的组织起来,做了许多工作,如依此法则,这些对抗战有贡献的人民,就完全得不到选举权了。

(四)军队代表候选人依规定有“曾在国民革命军服务五年以上著有勋绩或曾在军事教育机关毕业学行俱优者”一条,在这里表现着将官与士兵的不平等,使广大士兵的选举权受到限制。

最后,在选举法第四条规定“不得有选举权”的项目中第一项是“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这显然是十年前对反对党的规定,在今天更为不适合了。

三、从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大代表选举法中,都说明了这种选举,是在极狭隘的基础上进行的选举,广大人民被拒绝于选举以外,从上面的各种限制可以说明:

(一)取得公民资格的是少数人。

(二)广大的工农甚至小资产阶级及中层小职员因被限制难以参加,抗战后的人民的职业团体爱国团体如文化界、艺术工作者团体,妇女的团体更格于法令无参加的希望。

(三)少数民族只对蒙藏有特别规定,此外许多少数民族,如

数目最多的回族及数目最少的苗瑶等族，都在事实上没有选出自己代表的可能。

(四)特别是对于妇女，在条文中虽有规定，但无明确性别的提出。因此在中国社会一般重男轻女的习惯，极易被轻忽而摒于选举之外。所以这一组织法，选举法，必须加以否定，重新根据国情予以修改。与此有关代表亦应当重新选举。

此外尚有其他条文细目，不能一一列举，留转小组会议去讨论。总之，我们的意见正如我们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所提的两条：

(甲)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

(乙)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

最后，我愿引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来结束我的话：“中国是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以真正做到“还政于民”，这是我们今后还须极大的努力的！

(1946年1月17日)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陈立夫在讨论国民大会有关问题时的发言

有几个基本问题必须说明：(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以训政时期代国民大会行使政权的机关，而国民党代表大会是由上届中委与代表组织成功的。故演变至国民大会就有国民党中央列为当然代表一项规定。这种当然代表是义务。当时国民党中央只二六〇名，国大代表有一四四〇名，只占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说“三三制”还要少。(二)邓颖超批评指定代表一点为不民主，而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三)任期问题。任期的解释是任务完成之期，由受任到交卸止，还未受任，就说不上什么任期。

(1946年1月18日)

(原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陆定一就陈立夫所提 关于“三三制”等问题的发言

陆定一同志回答了陈立夫先生所讲的几点意见：

第一、“三三制”问题。是否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所占的比率要比国民党员在国民大会中所占比例要多？陆定一同志说：在解放区实行民选各级政府与民意机关，都一律由人民投票选举。共产党党员当选的数目常常很大，我们党考虑到太多了不好，因为中国政治，须要照顾到很多阶层，故提出“三三制”，凡是当选的中共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则一部分党员自动退让，使党员的数目减到三分之一，假使不足三分之一的，则维护原来的选举结果，并不去争。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的办法。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要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接着他说：陈立夫先生说，国民党是学习苏联的体制。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

此外陆定一同志更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

实行多党政治。陈立夫先生说了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历史，但是十三年的改组，并不是为了树立一党制，恰恰相反，而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感到一党奋斗不够，所以实行国共合作，是二党并非一党，因此才有北伐光辉胜利。在抗战中，也是多党合作，不然抗战也不可能坚持到胜利。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此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至于一党政治，对中国有害无益，我们不愿回述一党政治下十年内战中国家民族所受的痛苦。历史证明，中国只应多党合作。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对讨论各种问题会有帮助。

其次，陆定一同志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中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的，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最后，陈先生说旧国大代表是由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选出，而他们无人说话。这一点希望国民党能多听听党外意见。

(1946年1月18日)

(原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 关于宪法草案 •

孙科对《五五宪草》的说明

《五五宪草》是根据《五权宪法》精神而拟订，本人以国民党代表资格说明其所包含之重要原则。

第一，人民行使政权，政府行使治权，政权归人民行使的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选举罢免两权是对人，创制复决两权是对事，其在地方行使的，是直接民权，选举或罢免地方官吏，创制或复决地方单行法规，其在中央行使的，因中国幅员辽阔，故由人民选举代表，成立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中央政府官吏，创制或复决重要的法律，至治权则归政府行使，照英美的三权制度，有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五院制度将考试权由行政权中独立，将立法监察分立，共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种，此五种权由政府分别行使，谓之治权。

第二，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为什么要政府有能？政府是为人民所产生，官吏是人民之公仆，亦为人民所信任而选出，由此所组织之政府，应该给他相当的权，俾有充分能力执行职务，使政治效能充分表现，这点比议会政治国家常因国会党派不能团结，发生政治纠纷，改组内阁，政治不得安定，确为进步。例如法国，普法战争至上次大战开始时止，其间不过几十年，而内阁改组多

至百余次，平均每年要改组内阁三次，因此政府重要官员大部分时间忙于交卸接事，致有许多政策无暇推行，法国政治之失败，由于政制之不良，实为重大原因，政府常在动摇之中，自然会变无能，不能应付时代需要，故今后我们建立政府，必须使之有能，这点关系非常重要，因此国民大会会期不能太短，以免常因开会选举、改组政府，有害各种政策之进行。

第三，《五五宪草》公布以后，有些人士不明了国民大会性质，以为国民大会既是人民行使政权的组织，那末它的权力还应该补充，例如预算、决算、外交方针、施政方针等职权都应一一列入。但是据我们的看法，就是在宪法内不一一列举，国民大会也是有此权力，依宪草第三十二条规定，国民大会有创制法律、复决法律之权，既能创制法律，当然也能创制政策，既然能复决法律，当然也能复决政府的政策。议会国家的政府要推行一种政策，实施一种办法，必先在议会通过一个法案，政府根据议会通过的法案，才能推行实施，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律案，议会对于某一部的预算不予通过，无异通过裁撤某部，譬如征兵，是根据兵役法而办理的，假如国民大会主张平时不需征兵，它只要否决现行兵役法，政府便必须停止。总之，国民大会有了创制、复决两权，实际上已经包罗万象。另一方面，国民大会既是行使政权的机构，按照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便不宜于经常开会，使政府各部门不能行使其职权，同时在五权政治的理论上说，国民大会闭会期内，其职权由立法院代替施行，假使国民大会经常集会，立法院便无工作可言，所以说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实在是包括国家最高权力，不过为顾到政府在各部分的分工合作，国民大会不宜经常开会，牵制政府的工作，使政府有充分时间能力负担起它应该负担的职务。

第四，外界对于宪草中所规定五权行使的办法，常有一种误会，许多人误会十几年来的国民政府的五院组织，就是将来的五院。现在的五院制是训政时期的五院制，立法院的立法原则由国民党中央决定，交立法院制定法律，现在立法院没有创制法律之权，所有建议亦要由中央核定后方能完成立法程序。行政院亦复如是，其重要政策都要由中央核定，现在的五院除了司法院独立，中央不干涉裁判以外，各院的重要事务都是经中央核定，所以现在的政府是一权制度；国民大会以后的五院与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各院的权力都比现在要充实，将来的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除了国民大会创制法律外，无论什么法案，立法院都可创制，这样的立法院，实无异于英美的议会。

第五，关于国家元首问题，现在宪草所规定的总统有两个资格：一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一是行政首长，将来行政院的院长及各部部长官都对总统负责，总统有直接指挥行政之权，美国的部长都是对总统负责，不是对议会或选民负责，现在宪草规定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等于总统制。有人批评宪草的总统权太大了，不过我们看宪草总统一节，规定着总统职权都须“依法”行使，法律所授予总统的权，总统才有权行使。一般人反对最烈的是宪草四十四条所规定总统发布紧急命令之权，其实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须得行政会议之决议，并须提交立法院追认。所谓总统权力过大，这一点或可加以研究，其他总统的权力，都是有限制的。

第六，宪草中对于省制，当时并没有很好规定，这几年来我们也感到省级的规定需要补充，宪草起草时，中央正注重中央集权，把地方的权逐渐集中，在宪草中没有规定省有甚么权，中央给他做甚么事，就做甚么事，这制度推行至今，连财政权也集中

在中央，省预算成为中央预算的一部分，此在抗战中是有他的理由的，确也收到相当效果，使中央在战时财政负担得了，今后和平建国，我们觉得应该改正。国父遗教中也明白的规定省长民选，但宪草中无此规定。去年宪政实施协进会研究结果，大家都觉得这个制度应该变更，省的地位要从新规定，一方面代表国家执行国家法令，同时省也是一个地方自治体，有其本身的事务，恢复过去理想中国家与地方的均权制度。

此外，尚有两点，第一，宪草中没有提到军事，也没有提到财政，恩来先生说选举制度在宪法内也应有原则规定，立法院起草时，军事财政本有专章，审查时认为这是一种政策，要因时因地来变更，如果宪法硬性规定，兵役国防制度变更时，便须修改宪法，故未列入。第二，一般研究宪法的都说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这一章中规定的人民自由，末了，都有一句“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主张应取消这几个字，规定的自由，在平时原是无条件保障的，但如对外发生战事时，人民自由是受有限制。英国最讲自由，但一九四〇年法国快崩溃时，丘吉尔组织联合政府，向国会提出一个要求，国会通过授权，征调人力征调物资，资本主义国家对财产保障是很重要的，在战时就不能不暂时放弃。许多国家宪法里虽无条件保障，但下戒严令时，可以对宪法某几条暂时停止效力，世界各国既有此例，中国行宪政时，是否也采用，由总统下令停止某几条宪法效力的方式呢？我们认为宪法是根本大法，停止宪法某几条效力，动摇国民对宪法尊严的心理。怎样才能避免停止条文效力，而使政府有权应付事实需要？故必须有法律根据。所谓法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民大会制定，一种是立法院制定，而立法院是对国民大会负责的。

总之，《五五宪草》也许还有许多疑问和缺点，这在国民党方

商并不认为这个草案是天经地义不可修改，所希望的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要根据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推行五权制度，一方面保障人民行使政权，一方面使政府有能执行国家政务，至于国民大会的产生、组织、大总统的职权、五院组织的方式及其运用，那是专门技术问题，可以从长研讨，补充修正。

(1946年1月19日)

(原载1946年1月20日重庆《中央日报》)

吴玉章关于宪法原则问题的意见

民国成立以来，今天是第一次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共聚一堂，商讨宪法，我们都希望能制定良好民主的宪法，奠定中国的百年大计。关于宪法的根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的原则，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适合中国当前的情况以及举国人民的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提出了许多意见，将来应该采入宪法的也须采入。现在我只着重提出几个原则，

一、保障人民权利问题

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权利，这是不妥当的。

二、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问题

我们主张依据中山先生均权主义的原则，凡事务有关于全国性的归中央，有因地制宜性质的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亦不偏于地方分权。中央政府五五宪草中规定了五院制，但由过去历史证明，五院事权分散，实际上都没有权，而大权独落于元首一身，这容易流于个人专制之弊，而且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的权力太大，这些都应予以修改。我们认为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

国会制度，其经验很可采取，再依据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将中央政权机构重新作妥善的规定。

三、地方制度问题

过去对省的地位和制度争论颇多，中国政治能否搞好，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主张省为自治单位，自下而上的普选，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地方性质的事情，交付地方人事办理才办得好。过去中央官吏到地方去，往往对地方无多帮助，甚至有时妨碍地方的发展。这种制度应该改正。

四、确定国策

在宪法上明白规定有关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甲、军事政策应该是民主的，不是军国主义的，以民主主义的精神改造军队，使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一人或一派系服务。乙、文化政策应该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而不是压迫统治摧残文化的政策。丙、经济政策，是民主的，是奖励保护民族资本，使其发展，使国家事业、私人事业、合作事业都同时发展。最重要的要确定扶助农民劳工的政策，这一些都须明白规定在宪法上。以上所举都是原则性的建议，关于具体内容的详细意见，将在审查小组提出讨论。

(1946年1月19日)

(原载1946年1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 提出关于宪法问题的四项主张

关于宪法问题，本席代表中国青年党有几点意见向大会陈述。我们以为讨论这个问题，要分几项研究，

第一，是宪法的构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国国民都要遵守的，因而他有其“尊严性”，换句话说，便是他的构成，必须出于郑重的手续，而且包含有广泛的民意在内，否则，必然不发生效力的。我们中国过去并不是没有宪法，在前清末年曾有所谓《宪法大纲》；北洋系时代，有所谓《天坛宪草》；国民党执政以后，有《五五宪草》的制定；抗战以后，又有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所拟的《宪草修正案》；其后又有宪政实施协进会所拟的“宪草意见”，但都只是一种草案，而非正式宪法，其原因即是由于未经全国正式民意机关通过。所以国民大会的召集，第一个课题便是通过宪法，在国大未召集以前，我们主张由各方面推举代表合组“宪草审议会”，将各种已有的宪草合并研究，期得一折衷的草案，以便提交国民大会通过，这是希望大会予以决定的。

第二，是宪法的性质。世界各国宪法约分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两种，刚性宪法大多一成而不变；柔性宪法则比较容易变更，其区别全在修改程序之难易。我们的宪法，还是需要刚性的好呢？还是需要柔性的好呢？本席以为宪法的制定，还是要柔性比较适

宜，因为刚性难于修改，容易引起纷争。在外国常有因宪法而起战争的，我们中国因为旧约法问题，也曾发生过“护法战争”，我们鉴于以往的失败，所以制宪还是以要柔性为宜。

第三，是宪法的内容。宪法的内容甚多，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讨论，只择其最重要的几项简单申说一下。首先一个问题，便是中国采取总统制呢？还是采取内阁制呢？我们的意见，以为采取总统制有两种危险：（一）是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二）是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因为大权集于一人自然容易引起全国的不满，而总统的地位又不能随时变更，其结果乃易发生革命，甚至动摇国本，这是对于国家最不利的。反之而行内阁制，则有两种好处：（一）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二）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这于巩固国基是很有益的。其次的问题，便是中国应该采一院制呢？还是两院制呢？我们的意见，以为还是两院制比较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地方太辽阔，民情太复杂，采取单纯的一院制是不相宜的，不如采两院制，上院包含各省区和职业团体学术团体的代表，下院包含普选的人民代表，两院的分子，有性质，职业，年龄的不同，因为上院多年龄较高，经验较丰，而有专门学识的分子，下院多年轻力壮，少壮有为的分子，这样才可收互相调剂之效，所以两院比一院好。再其次的问题，便是五院制的利弊，中山先生主张五权宪法，其用意原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大家试一检讨，自从民国十七年成立五院制以来，至今已有十八年的历史，其中如考试院，曾否行使考试权而收大效？监察院曾否行使监察权而收大效？这在政府当局恐亦未能满意，听说考试院所考试及格的人员，在全国公务人员中占极少的数目；监察院所弹劾的多较小的官吏，这并不

是两院院长的不尽职，恐怕还是制度的问题，因为考试、监察两权是从其他三权割裂出来的。在三权分立的国家，监察权一部分属于国会，一部分属于司法，考试权则完全属于行政。中山先生所以主张考试、监察两权独立，是因看见满清御史与主考制度实行有效，这确是一种事实，监察考试两权之独立，在君主专制时代确有其相当的效用，而在民主立宪时代，则未必相宜。因民主立宪最重“法治”，而“法治”最重“系统分明”，“权责分明”。行政院有用人之权，故考试仍应属于行政，上下两院有监督政府之责，故监察权仍应属于国会，而五院制则只可采其精神，不必一成而不变，因为行之十八年而无效，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所修正。

最后，谈到省制问题，究竟应该采取中央集权呢？还是地方分权呢？关于此点中山先生曾经主张均权主义，我们很表同情，详细的理由，另由杨永浚同志说明，本席不再多说。

归结起来，我们的主张是：

第一，应该采内阁制。

第二，应该采两院制。

第三，五院制只可保存其精神，不必拘泥于形式。

第四、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

因为时间所限，不能过于详说，其余的理由，容在小组陈述。

(1946年1月19日)

(原载1946年1月20日重庆《中央日报》)

论共同纲领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昨天上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已进入讨论共同纲领问题。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陈布雷两先生，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诸先生，青年党代表常乃嘉先生，与无党派代表李烛尘先生，都纷纷表示了他们对共同纲领的意见。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也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的十项要点，并已作成提案送交政治协商会议公开发表，借供全体代表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讨论和参考。

现在的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所实行的是党治，而不是民治；是训政，而不是宪政；是专制，而不是共和。虽然是中外所承认的唯一的中央政府，然而却不是经过民选所产生，事后也没有征求人民的同意，所以只是临时政府的性质。

正因为现行政府所实行的是党治、训政和专制，所以处处与人民对立，给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和灾难，而政府自己，则贪污腐败，纪纲扫地。在抗战中，不愿使抗日战争变成人民战争，以致推迟了胜利的赢得；抗战结束后，却又想独占胜利果实，不惜以内战对付人民，甚至危及远东与世界和平。

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内战已正式下令停止，国内和平已有实现希望，这是全国人民与盟国舆论所欢迎的；但要巩固国

内和平，有力领导建设，现政府仍有改组必要。这不仅全国人民所一致主张，国际盟友有所劝告，就是政府当局自己也承认非扩大政府基础，已无法应付当前局面。

要把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成为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使之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那就首先要制定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使目前改组政府以此为基础，今后施政亦以此为根据，才能荡污涤秽与加强国力，引导中国政治向民主大道推进一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纲领，而只在外表上改头换面一下，那就正如有演员而无剧本，有火车而无轨道，结果还是不能达到改组政府的目的。

根据昨天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情形来看，各方面发言的人，都赞成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成为问题的，就是目前中国究竟要一个怎样的共同纲领。

我们以为这个共同纲领必须把握目前中国过渡时期的特征，反映最广大人民的痛苦和要求，规定在这个过渡时期应行而且可行的施政方针和办法，而这一些在昨天董必武同志的发言中，已经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不过我们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全体代表与社会各界人士加以充分考虑和讨论。

过渡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国民党的训政必须立即结束，而宪政还需要相当筹备过程。要缩短这个过渡时期，并保证和平建国开始进行，必须确认各党派实行民主合作，坚决消灭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与党派平等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和平建国纲领必须首先规定的方针。

但是我们有了临时约法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失败经验，证明只有抽象原则，而不规定具体的办法以及保证实行的必需条件和力

量，结果仍有落空的危险。所以在纲领中，对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临时联合政府的产生，普选国民大会的召开，民主宪法的起草，地方自治的积极推行，以及军事改革，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革新，复员善后，国际和平安全与保护华侨等项，都必须要有具体的规定。

自然，当此山河破碎，百端待举之际，以有限之国力，欲求纲举目张，必须先从最紧急的事情着手，以便握住决定的环节来推动全局，所以内容必须相当具体，却不能陷于琐碎。而且既为过渡时期的纲领，所以除弊应重于兴利，因为只有使全国人民在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自动自觉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原载1946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纲领·政府·国大·宪草

重庆《大公报》社评

政治协商会议的议题共有五项，（一）施政纲领，（二）改组政府，（三）军队，（四）国民大会，（五）宪法草案。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曾经发表过意见，现在特就其他四项问题，简要说明我们的意见，以供政治协商会议的参考。

一、施政纲领问题。在政协会中，中共与民主同盟主张要有一个施政纲领，中共并且提出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依我们的了解，当前国家若需要一个施政纲领，应该是临时性的。因为到宪法制成宪政实施之时，一切依宪法施政，自然不需要另有一个施政纲领。宪法何时制成？国民大会若于五五开成，则现距宪法制成不过半年左右。纵使国大容或不克如期召开，无论如何，总应于一年之内召开，所以这个过渡期间最多不过一年。因此，这个施政纲领只是一个一年的施政纲领。看清了这个时间性，则这个施政纲领应该愈简明愈好，朗朗的具体几条就够了，不必多开菜单，不必把不克于短期做到的百年大计都列举上去。整个的协商都可能妥协，则这个纲领问题实是容易谅解规定的。

二、改组政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国民党代表有一提案，主张扩大国民政府的组织，就原有国府委员名额增加三分之一，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以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同时修改行政院

组织法，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得兼任各部会长官。这个案，自然是宪政实施前的过渡办法。我们向来主张要变不要乱，政治必须变，但不可乱。看政协会的协商经过，大家皆有此精神。现在的国民政府，自然是一党训政的政府，蒋主席是训政政府的主席。但是国民政府及蒋主席，曾领导国家抗战获致胜利，为国际所承认，也为人民所拥护。当前所研讨的过渡期间的政治改革，应该不动摇国民政府及蒋主席的领导基础，扩大民主的成分，改组国民政府，尽量使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参加政治指导机构。这问题的解决趋势，国民党代表的提案将为有力的基础。就此，我们愿说明三点意见：第一，前提应该是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改组国民政府，不是就现状请党外一部分人士参加国民政府。第二，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该是政治最高指导机关，而不另受党的控制。据国民党代表的提案说明，党外人士任府委，将由主席提请中常会通过选任。如此，则中常会既可通过选任，当然也可以决定罢免，仍是以党制政。我们以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最好与党隔开，国民党中常会尽可授权与总裁，由国府主席一人对党负责。第三，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国府会议应定例常开，至少每月举行一次，揽用钱用人之权，如决定预算、审任特任官，宜由国府会议决定行之。

三、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提案，主张首次国民大会制宪而不行宪，为单纯制宪会议，在政协会中对此点尚无反对者。国大问题，是政协会中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因为事实上有了九百多个旧代表。国民大会是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大路，必须是民主的。我们一向认为代表应该重选。这问题，现在就坐在这礁石上。在政协会中，除了国民党代表坚持旧代表有效外，另有两个比较有力的调解案，一个是民主同盟提出的，主张采复决法。以

旧代表完全列为候选人，进行重选。另一个是邵从恩氏提出的，主张以三个会议完成宪政。（一）由政协会修订国大组织法、选举法及宪草，（二）以上的法案及宪草交由五五开会的国大决定，（三）五五后六个月内普选国民大会，制宪并行宪。我们总希望大家不可太拘牵于现实，应从远大的民主前途着眼，循政治途径，渡过这一难关。政协会必须渡过这一难关，才能够有圆满的结果。

四、宪草问题。时代走向民主，中国必须民主，我们必须制定一部彻头彻尾的民主宪法。这是根本的国是，绝对不容马虎。《五五宪草》缺点太多，只可作为参考，不可用为蓝本。需要多多听取人民的意见，需要专家们从头研究，这问题绝不是政治协商会议所能匆匆决定的。会中有人主张设立一个宪草研究会，期于三四个月内完成工作，实是一个应有的步骤。

（原载1946年1月21日重庆《大公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 原则与根本方案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已提到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民主同盟代表、青年党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要达到这种结果，就必须先使中华民国名副其实，即中华民国成为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这就是说，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

没有什么抽象的国家，也没有什么抽象的国家化。或者是民主的国家，而军队就化于这民主的国家之中，这是一种军队国家化。拥护这种军队国家化的，就要把军阀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或者是专制的国家。而军队就化于这专制的国家之中，这又是另一种“军队国家化”。拥护这种“军队国

家化”的，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反对的“与民众为敌”的军阀之武力。二者必居其一，中间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掩饰，没有什么可以诡辩的余地。

中国原来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这个专制国家的军队，就是“与民众为敌”的军阀主义的军队。一切专制人物、官僚、党棍、特务之所以能够作威作福，以人民为鱼肉，便是依靠这种军队。而遇到外国侵略，便即弃甲曳兵而走的，也即是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

什么是军阀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与民众为敌”一语，已足以尽之。“与民众为敌”的军队就是军阀主义的军队。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既然是“与民众为敌”，当然军民关系是极端恶劣的，而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是极端恶劣的。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既然不能保护人民，当然也不能有效地保卫祖国，而内战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终身职业。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是中国专制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中心支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本政治构成，是中国长期内战的主要祸根。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可以是北洋式的，又可以是国民党式的。

军阀主义的军队，由中国人民说来，由民主国家说来，这是真正私有的军队，是军阀的私兵。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不是保护民主，不是保护自由，而是相反的，只是保护极少数人反人民的利益，只是保护寡头专政，只是蹂躏自由。但是满清朝廷却称呼这种军阀主义的军队为“国家军队”，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亦称呼之为“国家军队”，而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主武力，却被称为“土匪”，被称为“分裂国家之统一”。民国十六年国民党清党之后，孙中山先生的教训遭受唾弃，原来国共合作的民主主义军队，于是一变而为国民党一党私

有的军队。作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政治的工具，军队中塞满了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军民合作与官兵合作的民主传统竟不幸一变而与“民众为敌”，以致引起长期的内战与空前的外患。军阀制度加上党阀制度，这是清党之后国民党党军的特色。但是反人民的人物又依然只许这种军阀制度加上党阀制度的国民党党军叫做“国家军队”，而为民主主义和保护祖国而奋斗的人民军队又依然被称为“土匪”，被称为“分裂国家之统一”。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所谓“与民众为敌”的军阀主义的军队，如果要说是“国家军队”，那就只是专制国家的军队，而并不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孙中山先生代表人民意志而规定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毫无疑义，我们这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民”字。要称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军队，就必须是“民”的代表，是与“民”相结合，而不是少数人的代表，而不是与民为敌。我们所谓“军队国家化”，毫无疑义，就绝对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这个天经地义来作衡量。这就是保护人民利益而与人民相结合的军队，便是中华民国国家化的军队；反对人民利益而“与民众为敌”的军队，便不能够算是中华民国国家化的军队。这是最合理的看法。离开这种合理的看法，便一定是颠倒的看法。

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答路透社记者问题时所说的：“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在中华民国内，要解决军队国家化，必须先解决国家民主化。所谓国家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真正废止，而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在这样的国家民主化之下，就必须废止军队的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必须使国民党原来在军队内的秘密特务制度永远绝迹。在这样的国家民主化之下，军队就只能保护祖国和保护人

民的利益，军队不能视为一党或个人所垄断的私产，军队不能用作一党或个人“与民众为敌”的内战工具。

问题是很清楚的，军队国家化既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而实际说来，军队国家化又就是军队民主化。这种军队民主化，不但在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而且在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也是民主的。没有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所谓“军队国家化”，不过是军队军阀化、军队党阀化而已。

国家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乃是军队国家化互相关联的两大原则。

问题是很清楚的，国民党当局在军队中的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乃是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又是军队国家化的主要障碍。不废除国民党当局这种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则军队国家化乃是不可能的，而根本地说来，要达到真正国家民主化，当然也必定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很清楚的，要整编全国军队，使得全国军队国家化，这就首先必须整编国民党的极端庞大的党军，化国民党一党及其少数人的私兵为全国人民的公兵，使这种军队不是为国民党一党及其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全国人民服务。这个改变不但是中国军队国家化、军队民主化的根本关键，而且也是中国国家民主化的根本关键。这个改变，显然不能用什么军队中撤销党部之类的表面文章来敷衍了事，而必须彻底改变整个军事领导机关与各种军事制度，使全国军队由民主分子来领导，用民主制度来组织和管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问题，是一切民主分子所必须据理力争，不能丝毫动摇的。

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标记的各解放区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其任务是保护祖国和保护人民利益，其制度是军民合作与

官兵合作。诚然，这种军队是中国人民以自愿为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但是这种军队除了民族与人民的公益外，没有党派的私益。这是没有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人民的民主军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来说，这是中华民国真正国家化的军队。这种人民军队既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当然属于中国民主的政府，属于中国民主的国家。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上早已指出：“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就是说，解放区军队当交给民主的联合政府和民主的联合统帅部，而国民党军队也当同时交给这民主的联合政府和民主的联合统帅部。

这个程序，在杜鲁门总统对中国问题的声明中也得到了明白的支持。杜鲁门总统声明全中国的一切军队应当在一个“广泛代议制政府”成立以后，亦即在一切民主分子在政府一切与各级机构中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以后，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军队。对于人民的军队的任务，则当在于贯彻其保卫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发扬其军民合作与官兵合作的民主制度，而绝对不是相反。

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原则、别的方案，能够使军队国家化呢？我们以为是没有了。

问题是要合理，要平等。就是说，要真民主，要否定任何一党的特权。按照合理和平等，按照真民主，一切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同样。

如果国民党军队得自由保持其一党的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而继续独霸中国军队、独占中国，君临在人民的头上，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

如果解放区军队不是交给民主联合政府，而是“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让它去被国民党一党所吞并、所消灭，或让它由人民民主的公兵去化为国民党一党党阀的私兵，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

如果企图按照这种不合理、不平等（也即违反民主的原则、维持国民党一党的特权）的方法来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那就不能得到“军队国家化”。这不过是走回头路，回到国民党一党专政，回到国民党一党把军队党阀化、私有化，回到军队中的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但是这种回头路是走不通的路，是中国的绝路。如果这样做，中国就将没有和平，也没有民主，没有团结，没有统一，中国必将仍然被引到那内战、专制、分裂、残杀种种循环不绝的灾难中去。民国三十四年来历史的经验，国民党当权十八年来历史的经验，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我们，教训是很够痛苦的了。中国人民必须深刻不忘记这种流血的无限痛苦的教训。

应该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人物中间，有人还是企图按照国民党享有特权和吞并异己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所谓“军队国家化”。他们要人民向他“交出”军队，却拒绝向人民交出他的军队。这显然是极错误而含有极大危险性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显的，绝路不能再走，错误的历史不可再重复。

国民党统治人物对共产党说，而且对别人也说：“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们民主”。对于这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已作了透辟的分析。事实上，这正是取消民主的一种策略。但是，在人民觉悟的前面，这种策略早已失掉了作用。人们都晓得：

有了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就不但有了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而且也就有了人民选举出来的廉洁勤劳的地方政府，有了土地制度及其他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革，有了免于军阀党阀贪污土劣特务恶霸压迫的自由，有了免于恐怖免于贫困的自由。反之，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说，如果没有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今天就不但没有解放区的一切改革，而且在全国也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什么自由，而国民党当局也决不会稍稍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与人谈什么党派平等和政治协商，相反，专制制度与政治腐化只会更加无顾忌，今天中国就会只是一片黑暗。这是真理。甚至怀有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最现实的真理。今天中国民主的曙光，有成为民主国家的希望，基本上是靠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作支柱的。向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交出人民军队，就等于交出民主。

解放区人民军队是中国人民在为民族民主事业中付出无数流血代价所产生的儿子，是全国人民共有的军队。这支人民军队在“军队国家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便足以占卜国家民主化的程度如何，并足以占卜全国人民生死的命运。因此，一些对人民深怀恶意的人，就对于这支人民军队采取了歧视的态度，附和国民党当局的意旨，很想把它“化”到国民党的党军里面去，以便于继续把人民践踏在足底下。当然，也有些对民主斗争缺乏经验的人，陷在矛盾里面：一方面承认解放区人民军队是推动国家进步与民主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对于国民党方面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我给你们民主”的虚伪宣传，抱了绝对错误的幻想。我们诚恳地希望抱有这种幻想的人为了国家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事业，抛弃这种绝对错误的幻想，因为这只是使中国人民（连抱有这种幻想的人自己在内）被黑暗所吞没。

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国民党当局为了国家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事业，抛弃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企图，采取合理平等的方针，来与全国民主分子共同组织民主的国家与民主的军事领导机关，共同整编全国的军队，改造不民主的军事制度而发扬民主的军事制度，使全国的一切军队都变为民主的军队，变为民主国家的军队。

（原载1946年1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迅速释放政治犯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在十四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引起一场论争，其实这是不需争论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事。在双十会谈纪要中，政府已表示释放政治犯一事，“政府准备自动办理”，这是三个月前的政府表示。到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蒋主席又宣布决定释放政治犯。十四日国民党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例会中又决定“政治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这算是有确实的日期了。请全国人民注意，从十四日起的七日内，就是到本月二十一日（下星期一）满期。到了这天，政府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一张全国政治犯的名单，让我们看见一个个政治犯从黑牢里，从集中营里走到自由的天地中来！政府当局虽然曾经给过人民无数次的不兑现的期票，但是到了现在，难道还好意思再骗人么？让我们再给政府以一次信任，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一月二十一日，一定要政府在这一天给我们以完满的事实表现！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有发表政见的自由，有组织政治性的会社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有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自由，因此在民主国家中根本不能有所谓政治犯存在。今日中国，还有无数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被拘禁着，这是极可耻的事。这正是国民党

一党专政下反民主政治所造成的最大污点之一。

抗战初起时，释放的政治犯只是一部分，到了民国三十年后，政治犯的搜捕又变本加厉了。像张杨二将军从抗战前一直关到现在，几及十年；像杜重远先生竟以莫须有之罪名冤死在新疆狱中；像费巩教授自年前“失踪”后至今生死莫卜；像近日又传出了名记者羊枣死于杭州狱中的悲痛消息。此外至今还有千万青年，成年累月地失去自由，忍受着精神上的虐待和身体上的残害，不知多少国家民族的元气白白糟蹋掉，想起来怎样不叫人痛心愤慨？我们诚不愿重提旧帐，但要使人民忘记，就该赶快革旧自新。否则，人民口头纵然不讲，心头的愤恨是永难泯绝的。死者长已矣，但幸而尚未被害死的千万政治犯还不该赶快释放么？我们不要再听不负责任的推诿之词了，我们不要再听牵强附会拟于不伦的遁辞了。人民要看事实！人民要求一月二十一日看见能使大家满意的事实表现。

一切所谓“政治犯”，多半都是经过特务机关秘密地逮捕起来，人不知鬼不晓地送进了什么集中营里。据我们历年所知，有带了两本本报馆合法出版的书，走到海棠溪上车就被逮捕了的；也有因订阅读本报而被监禁起来的；还有在重庆市内公开的座谈会上多说了两句话走出会场就被宪警挟了去的；更有在学校里面因为在集会中、壁报上、私人通讯中发表了些政治意见就失去自由的。诸如此类的事一时也说不尽。这些无辜被捕的人都是在政治犯的名义下做了反民主政治的牺牲品。因此，除了政府自己，谁也开不出一个完全的名单来。政府的行政效率虽低，但七天的时间调查清楚在自己掌握下的无辜者不是难事，何况有些有名的政治犯，不必调查，人人知道。我们希望政府首先把张杨二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等释放出来。同时，一切有子

弟亲友被作为政治犯而拘禁的人，在这时候，都应该公开提出申诉，要求立即释放！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在国共会谈纪要中本是说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都应释放，但现在政府的表示中却又加上一项除外的规定，即“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这项规定，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真正危害民国的人，除了像袁世凯张勋等窃国称帝的大盗以外，就是通敌叛国的汉奸，而这已有除外的规定。关于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所规定的所谓危害民国行为，实际上乃是政府当局对于不同政见之人的一种污蔑。这种手段，完全不合民主原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应该立刻废止。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十多年来，无数政治犯都是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下被罗织成罪的。这种法令如果还让它存在，那一切所谓思想信仰自由权利，就根本没有保障。我们认为这项除外的规定不应存在，以免在这规定下重使许多政治犯冤沉黑狱！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本月十四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结束一党训政改组国民政府问题，会上政府代表团提出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一案，并由王世杰氏加以说明。根据原案及王氏的说明，国民党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可以概括如下：

（一）增加国民政府委员十二名；（二）“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党外人士充任之”，就是要“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才能任命；（三）国府委员会“抽象的”是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实在权力是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以及主席交议和三分之一以上委员建议事项，但无任何用人之权；（四）主席有相对否决权及紧急处置权；（五）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人，得兼各部会长官；（六）国民党不但要占多数，而且要占“特定程度的多数”。这些便是国民党当局对全国人民与国际舆论所坚持要求的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回答。应该明白率直地指出，这个回答对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与盟邦的期望是不相符合的。

全国人民和盟邦所要求于国民党的，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在这一联合政府中，一切民主分子应参加政府的一切与各级机构，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而国民党在这

一提案中所表示的，却只是以设置几个党外人士充任的国民政府委员及国务员的“代价”，来获致国民党继续一党专政的合法化。因为在提案与其说明中，国民党代表坚持所谓“法律的系统”，坚持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依然放在国民党的中执会手中，连国府委员的任命，也仍需要经过国民党中执会的通过。而国民党一党的中执会君临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乃是一党专政在国家组织体制上的最触目表现。一切今天所谓的法律系统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律系统。连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法律系统中的许多法令必须“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所以任何扩大政府的提议，如果不打破所谓法律系统，不彻底取消国民党党部对国家政权的任何法律地位，则无论其形式变化之如何繁多，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是显然不愿意充任这种脂粉的。

其次，国民党代表的这一提案，不是贯彻民主主义，取消个人独裁的提案，而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结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保持国民党中执委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就是保持个人独裁制度，因为根据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中执委不过是总裁的服从者，六全大会以后，国民党的中执委是必须宣誓“服从总裁命令”，才能就职的。国民党的总裁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主席不仅实质上指定全部国民政府委员，而且在政府提案中又特别规定他同国府委员会有提交复决权及紧急处置权。后者，在事实与法理上，都是欠通的。国府主席应向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执行其决议，不应形成两个“最高”指导机关。实质上，也就是形成一个比“最高”更高的指导机关。因为在国府委员由国民党占“特定程度的多数”的情况下，提交复决权，实际上，就是主席一人的否决权，也就是主席的独裁

权。至于紧急处置权，尤无存在之必要。因为照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仅四十八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来得及集会讨论决定，因之，保持紧急处置权，并无任何理由，也只是为了保持主席可不经国府委员会的个人独裁制。

这个提案，不是在党派平等合法的基础上，组织一切主要政治分子有公平和有效代表权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事实上也是显然的。提案中，一切非国民党人士要参加政府，必须经国民党中执会之通过，就完全破坏了党派平等的原则，把其他党派变成国民党的下属；政府代表要求国民党的名额，不仅要比“任何他党的名额多”，而且要“具特定的多数”，就完全破坏了“一切政治分子的代表在国民政府内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原则。国民党一党要占“特定程度的多数”，（译成明白易晓的语言，就是“压倒的大多数”）。这在全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既不公平，又使任何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之参加政府，成为完全无效力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的签署，才能提出议案的规定，使党外人士几乎无法提出任何议案，而国民党则可以依恃其特定的多数，否决任何国民党外人士的议案及主张。

不但如此，而且这个提案所拟议的国府委员会，依王世杰氏的说法：“抽象地”虽是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而实际上尽管国民党占绝大多数，尽管主席有指定权、否决权与紧急处置权，这一委员会却依然是一个连有限权力也极微弱的清谈场所。因为：第一，它的主要任务，只是讨论“原则”、“方针”、“大计”；第二，它没有用人权。没有用人权，这就是说，没有使用一切民主分子到政府一切机关中去之权；这就是说，没有使各党派享有公平有效代表权之权。一个“最高指导机关”尚且无权保障民主，而只能保障独裁，那么，在独裁制度的办事机关之行政院中增加几个政

务委员，当然更加无能为力了。

最后，这个提案对扩大国府组织，仅限于增加国府委员十二名，及行政院设置若干政务委员，得兼各部会长官，而没有一个字涉及地方政府，这也是完全与“广泛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中”的原则违背的。任何改革政府的主张，如仅限于在中央机构中作无关重要的改变，而将地方政权机关仍然置于原封不动的一党独裁之下，对民主改革的事业，是毫无裨益的。真正的民主改革，必须使一党专政制度从上而下，自国民政府直到乡镇保甲加以全部的改变。

把这个提案和国民党代表所坚持须于五月五日召开的那个十年前由国民党一党包办、贿选、逼选、指定、圈定的国民大会联结在一起看，则更可以看清国民党的意图。国民党的意图就是把现在已经动摇的一党专政，经过三个多月的临时的“扩大”的一党专政，最后过渡到完全合法的“宪政”式的一党专政。总之，变来变去，还是一个一党专政。

综上所述，国民党代表所提出的所谓扩大国府之具体办法，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这种办法，非但对解决目前国内严重的政治局面无所裨益，而且更会保持和培植今后更大的国内纷争再起的根源。因为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是在国家制度毫无民主气息，人民毫无自由权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所以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促进经济建设，就必须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这就必须：（一）彻底的从上到下的、从中央到区乡的、

取消国民党对国家形式的与实质的干涉，尤其是国民党一党君临于国家机构之上的丑恶形态，必须完全废除；（二）必须贯彻党派平等合法，在政府内有公平和有效代表权的原则，任何政党在政府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避免任何一党之专政；（三）一切行政机关，必须贯彻民主主义的精神，主席必须服从委员会的决议，以纠正个人独裁与手令制度的积弊；（四）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必须具有完满的权力。一切行政主管人员之任用，必须经最高指导机关之通过；（五）中央机构之改革，必须与省、县、区、乡各级行政机构之民主化同时并进，才能使中央的联合政府有地方的民主政权为基础；（六）临时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迅速的实行无拘束的普选，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更广泛的、正式的中央联合政府。

我们在原则上，赞同扩大国民政府，使成为临时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代表所提的扩大国府的意见，是完全不适合于这个目的及其所应具的上述最起码的条件的。因此是完全不适用的。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我们希望政府代表团依照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中所说的：“有时候，撤销我们的提案，比之坚持我们的主张更有伟大的价值”，因而实行撤销这个提案，以便与会中各民主派别的代表获得圆满的协议，使此次会议有确实的成就。

（原载1946年1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

改组政府问题

重庆《新民报》社评

改组政府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昨天的会议中，各方已开始陈述意见。我们研究各党派所提主张，便可以知道目前未一致的处所，还不在于改组的方案，而在于最高权力的中心问题。我们知道假如是民主宪政国，这最高权力的中心当然存在于代表全国民的国民大会；假如维持一党专政，这最高权力的中心当然是党所付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现在我们所期待的新政府，是从一党训政过渡到宪政的中间性政府，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所未完成的民主措施，实现统一团结，尤其是要产生一个健全的国民大会。在这个目标之下，我们要在现政府的基础上，加入代表各方面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个最高权力的中心应该放在那里呢？现在先看一看各党派的观点：政府和青年党的观点似乎着重在维持旧有的法统，即是：使这个新政府依旧向国民党负责，而加入各方面的人物。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希望新政府本身有最高决定权，换言之，前者倾向于在训政系统之上扩大政府，后者倾向于脱离国民党的单独领导。

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各党派的方案作具体的批评，不过有些意思似乎可以先提一提，我们认为改组政府的意思是加强现有的政府而不在削弱它，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事实上足以代表各方面

的政治势力，足以获得全国各区域的拥戴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我们更希望这个政府能完成各项民主措施，产生健全的国民大会，以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宪政阶段。因此这个新政府的组织一定要比现政府民主些，其力量更要比现政府强大，从这一点来观察，改组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这件事本身就是政治民主化的，可以不谈；至于如何保证其力量的强大，则尤值得费心研究。据我们所知，凡是近乎各党联合的政府，有的固可发挥异常的伟力，有的也不免于互相牵制碌碌无能，其主要关键即在乎最高权力中心与政务机关的联系是紧密的还是脱节的。未来政府是否有力，也将视此点决定，明明是各党派参加的政府，而又要向一个政党负责，这就是权力中心与政务机关的脱节，必定是一个弱体的政府；要保持权力中心与政务机关之合一，首先要斩断各党派共同组织的政府对一个党负责的联系，其次还是直截了当将权力中心也即是最高决定权放在各党派的代表所组织的机构里。这机构或在政府以内，如改组国民政府委员、或在政府以外，如扩大政治协商会议，都没有不可以，主要的一点是，这个机构自己要有代表各党派的资格，且能主宰一切。参加这个机构的各方人数，必须足够发挥其影响力于政治决策，国民党与其过去历史与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应占领导的优势，但不可以在比例上占到决定性的优势，共同负责贵乎名实相符，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如果过少，则徒然负共同之名而无其实权，这样决不会获得各党派的真诚合作。必须让各党派的人数足以代表他们背后的力量，它所决定的始能获得各党派的一致拥护，它可以决定立法原则，也可以指使行政方针，在这机构之下，再来实行行政院与地方政府的改组。这都是扩大政府基础一题内的应有文章。

这样改组，当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府，或者竟免不了多党

训政之讥，不过，多党训政比一党训政总比较好些，至于法统，其实也不成问题，本来这回改组是在现政府认可之下进行的，改组工作，也当在政府同意之下完成，那就不能说是有损法统。还政于民是不一定要取直接的方式的，先让各党派平等参加政府，共同筹备还政大典，其实更合乎国民党还政的目的，一党还政，谁能保证是真是假？让各党派来共同筹备，总比较可信些。至于还政以后，我们自然还要走上议会政治的常轨，即多数党主政的办法，那是无问题的，目前所讨论的只是过渡时期的政府，只求比较公平，能够达到国民党还政于民的目标，它的任务也就圆满成功了。

（原载1946年1月15日重庆《新民报》）

评改组政府案

重庆《国民公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已进入重要阶段，第一个议题就是改组政府案。国民党代表孙会员科等八人提出关于扩大国民政府组织的意见，青年党也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代表虽未正式提有议案，但对于这一议题，在大会上，都发表了具体的意见。

政府应不应扩大，如何扩大，这都可能引起相当的争执。我们在评述本案之前，先来几点说明，俾帮助问题的了解。（一）今日还是国民党所定的训政时期，如果今年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召集成功，宪法制定，则根据宪法产生民选政府，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必定是不出本年内之事。万一大会又将展期，则无论是延至“七七”或“双十”召集，开始宪治，亦不可能拖得太远，最多不应出一年或一年又半之内。这是一个过渡到宪政的时期。在此过渡期间，法规上未规定非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国民政府及所属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工作，而事实上完成宪政，也需要结合全国的力量来推进。蒋主席在过去参政会席上也说明希望全国贤达共同促进训政。（二）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扩大政府组织，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现象，不过细细想来，此次会议的全体会员，多为各党派所推荐，基础原不广泛，今天政府改组实现了，各党派均有人员参加政府

了，在政府组织上说，是扩大了，在党派奋斗上说，是成功了，但是与民何干？全国四万万人民，有党籍者不及五分之一，试问如何算得是民主的实行？我们今天果真要为人民，则应在设法使国民大会开得成功的路上打算，由人民来抉择，而不是党派的分赃。（三）今天是过渡时期，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由召集国民大会入手的民主宪政，在这过渡的期程上，我们为求革命的成功，所以需要顾到法律，同时为求环境的需要，所以也需要顾到事实。协商非“革命”，因此不得不在大原则下求协调。国民党为今日中国的第一大党，三民主义已为“今日之中国所必需”这大原则为各党派认定了，协商必能成功！

我们说明了这些，则以为改组政府，在今日之中国，势在必行。就上述两个改组案而论，国民党所提意见，在实行上，比较易收成效，两者的方式虽有不同，而两者的内容则无何差异，大家无非是取消今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其职权或移于国民政府，或移于中央政治会议，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参加，成为政府的一个决策机关。再改组行政院，负责执行。中央政治会议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担任指导及决定全国政治措施的机构，其委员在过去可说完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兼任，今日似乎不必恢复这个名称，徒增运用上的不便。反之，国民政府原是全体国民的政府，由充实职权来提高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地位，来容纳各方，是比较合理。这一革新不在名称，而在实际，职权充实了，力量也就发生了。我们改组政府的目的，无非是在使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机关，能建筑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不为一党所独有而已。至于改组行政院，乃为继上述变革的当然行动，执行机关有了权力，才能推进，这是无疑问的。行政院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政务委员得兼任部长，我们认为政务委员之设置，如果是为

安插，则大可不必。此种办法，无异仿效省政府的组织，省府委员有兼厅长者，有不兼厅长者。在省府说来，似尚有其必要，在行政院，则改由各部长组织之政院会议，即可解决问题，似无须添设此类空虚职位。且各部会长官之任用，既不限于党籍，凭能力做官，空虚职位以少设为是。为求集思广益，改组立法院与监察院，应该认为是必要的，由此吸收全国人才，则无疑是提高政效促进吏治的途径。行政院改组了，由政院会议解决了省级政府与行政督察区的改组问题，如此再由省府而县府，地方政府的基础也就扩大了。

改组政府，祇是促进宪治的一端。我们希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不应祇为党派利益而争一二职位，过渡时期是极短促的，国家未来的百年大计，才是我们下苦功研讨的主题。

（原载1946年1月16日重庆《国民公报》）

国民大会问题

重庆《新民报》社评

很久以来，国民大会成了一个朝野各党争议的论题，所以引起争执，是因为政府要召开国民大会，借此还政于民，在野各党派则认为政府所拟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不足以代表民意，它的组织法和选举情形既不公正，其代表的资格自属可疑，假如由这个国民大会来继承政权，那就等于国民党“从左手还给右手”。

从事实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反对派的理由是相当强固的。任何人不能相信，十年前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选举能够公平合理，即说政府办理并无私心，可是以十年前所选的代表来，代表十年后的民意，又是谁也不能承认的；就算这一部分的代表可以承认，而这十年中成长的选民约略估计是三千万人，应否没有代表？还有在八年抗战期中出过力量的新人物新人才，难道竟可以没有一个新选为代表的机会？这种种问题，谁能答复？十年了，十年之中，社会变了质，思想文化的流动性尤其不可忽视，要想以不变应万变，将政权交给十年以前的民众代表，那确是民国三十五年的国民所难于承认的。

不承认旧代表，又将怎样呢？困难就在这里。我们竟可根据种种的政治理想，来否认旧代表足以代表今日的民意，但实际上就在今日，也没有一个切实的方案可以产生理想的新代表。我们

攻击旧代表，主要的是因为十年以前，一党专政，各党派既未获公开平等的活动，地方自治亦未完成，那样就不会有公正的选举；但是今天，就在今天，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依然还未完成，理想的普选也未见得可以马上实现。归根到底，旧代表固然不孚人望，产生新代表的可能性也不多。这就是国民大会问题所以争议不决的所在。

依我们的愚见，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两个方法。比较理想一点的，是宁可慢慢地来，将五五的会期再行延迟，旧代表一律无效，先让各党各派参加政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完全实现，人民权利，政党活动，获得保障之后，再来办理民主的普选，产生真正的国民代表，实行还政于民。要这样干，至少得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决不是几个月内所能完成的。因为既否认了旧的，就得来一个像样的新国民大会来替代，倘使新来的未见高明，那不仅旧代表不会服气，就是我们也要觉得失望。而为了产生理想的国民大会，我们宁可等候，不可偷工减料草率从事。

另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方法，那就卑之无甚高论了。那完全是治标的，只求解决问题，暂且不谈理想。依现实的观点，我们可以下面的条件承认一部分旧代表：（一）这个国民大会只制宪而不行宪；（二）取消国民党中为当然代表以及指定代表等等的规定；（三）除了死亡附逆的分子之外，凡是现任官吏军官的代表也得放弃代表资格；（四）然后再经党派协议补充新代表。这样办，虽离理想的国民大会还远，也总可以算是近似民意了。经过这个国民大会，再来认真举行普选，产生一个更健全的国民大会来实施宪政，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最后我们得说清楚，无条件的维持全部旧代表是不行的。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民报》）

(七)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政协会议圆满闭幕通过 《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晚八时举行闭幕式。昨日(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国大问题分组与综合小组举行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国大问题,至下午2时,卒获协议,至此,政协全部五项议程,已先后皆达成协议。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于昨午三时举行会议,加以通过。

下午六时召开政协第十次大会,到代表三十七人,由蒋主席亲任主席,讨论各分组所起草的各议程报告,以起立表决,全部顺利通过。在讨论第二项议程和平建国纲领分组报告时,黄炎培氏发言,强调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为了使纲领中规定的人权有保障,不至流于像过去的成为具文计,希望“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能赶快成立,大家来发起,并推出几个召集人来进行。民主同盟方面拟推沈钧儒先生为召集人之一。张厉生先生继起主张这问题不在会内讨论。随之董必武同志即声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委员会希望能很快成立,中共代表团决定将全体加入为发起人。李烛尘氏则呼吁真正切实做到硝磺统制,以利化学工业之发展。

在讨论第4项议程宪草报告时，召集人莫德惠说明宪草审议委员会委员尚未推出。傅斯年代表认为宪草修改的最大收获是吸收了民主精神，引为极可欣喜，但对省制省宪与省区问题以及立法监察委员选举法等问题，提出意见。黄炎培主张傅斯年的意见记录下来，交将来审议会参考。并主张在宪草报告第十一条第四项文化教育一条中，应加“与民生主义配合”数字。一并交审议会参考。

蒋主席于议程讨论完毕后声明二点，一是宪草分组报告中所列《宪章修正案》提供国大采纳，对这“采纳”二字并非接受，特作解释。第二施政纲领应不分界限党派地区，全国一律实施。随之大会于掌声中结束。闭幕式跟着开始，由蒋主席、周恩来及张君勱、曾琦、莫德惠等代表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发言。致词完毕，大会即正式圆满闭幕。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基已奠，今后全国人民须要更进一步努力奋斗，以求其实现。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在政协会议 闭幕式上的闭幕词

诸位会员：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经过二十余天热烈的讨论，已经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今天宣告闭会了。本人以职务羁身，不能每次都来和诸位交换意见，甚觉抱歉！回顾这二十余天中间，诸位会员无论在分组会商或全体大会，都能开诚布公，大家本着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寻觅各种问题合理的解决，使本会始终在祥和协调空气之中，获得圆满的成就，尤为本会议最可宝贵的收获。本人虔诚希望，这种公忠坦白的精神，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大家不争意气，不重私见，只是一心为着国家，为着人民，而共同努力，则本会议的一切决定，必可顺利执行。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显光明。这是今天闭幕之顷，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应该特别提出来向诸位表示感慰。

原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造成独立自由统一的民主国家，尤其要团结奋斗，来达成和平建国的目的。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对外是在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是在打倒封建割据的势力。以往推翻帝制，扫荡军阀，和此次八年抗战，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惟一的目的，无非是求独立求

统一，先除去民主的障碍，以促成民主制度的实现，到现在扫除革命障碍，奠立民主基础的工作，已经初步成功，我们当前唯一重要的问题，只是如何确保统一，如何建立民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必须有确实的统一，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这样的假民主永远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而且永远要为民主政治的障碍。因此我们为了实现真民主，真统一起见，和平团结两个条件实在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需要，国父临终遗嘱：“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个人和国民党的同志，始终是服膺这个崇高遗训。除了对于割据的军阀和侵略的日本，不得不用武力对抗之外，其他对于国内一切问题，不论遭遇任何严重形势，总是抱定忍让为国的决心，不惜委曲求全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纵使不得已而有军事冲突，也只是被动的防卫，决不采取主动的行动，这因为我们认定，我们的国力，民力，只可从安定中求保养，再禁不起任何战祸的摧残。所以每在危机一发之间，都能化乖戾为祥和，并且任何齟齬的意见，也都能融和一致，恢复到和平团结。从这种经过事例，尤其是抗战以来八年间的现实，国人皆所共知，毋待赘述。这就是我们今日所主张的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精神所在，而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本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而进行。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的说一句：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须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希望我们大家要把这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永远照着这个信条共同遵守，共同努

力，才可安慰为革命抗战而牺牲的军民先烈，才不致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本会议开会之日，政府即颁布全国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并公布了一月五日所协议的办法，同时公布了命令内容的全部与其附属规定的四项条款，以示一致遵行的决心。本会议开会的第二天，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并向会议详细报告，因此本会议就能够专心致志来研究和平建国与促进宪政的各种方案。本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方案，本人虽然不能每次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和研究，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本人认为各案之中，要算《和平建国纲领》为各种方案的基本之中心，因为此案从(甲)总则，(乙)人民权利，(丙)政治，(丁)军事，(戊)外交，(己)经济及财政，(庚)教育及文化，(辛)善后救济，(壬)侨务等九章的各条规定，均属异常完备，确合时代要求，充满了统一性，充满了民主性，实在是渡到宪政时期最适宜的纲领。我们有了这个纲领，由中央以至全国各地方的政府，由各党各派与社会领导人士以至全国各地的同胞，都有了共同遵守的准则，尤其参加本会议的各党各派，对于这个纲领，既是大家共同商讨，共同议定，而且就要参加政府来共同执行。我们对全国同胞必须守信义负责任，自身先从事实际行动方面有切实遵行的表现，并且必须贯彻其全国性，使能普遍的实现。

我以为有两件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和郑重声明：

第一，本纲领既经规定：“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所有现行若干战时法令，于此原则有抵触的，中央当然要修正废止，

同时我相信中共军队驻在地之内，自必同样遵守这个纲领，解除现有的一切限制。至于在教育文化方面，又规定了“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这一条对于我国教育文化的发展与求学青年良好环境的养成，更是十分重要。今后自由的保障，全国无论任何地方，当然只有合于本纲领的一种法令，不应再有任何歧异和特殊的办法。那么今后各个政党的活动，以至对政治的竞争，尽可依照国家统一法令应有的合法权利和手续，公开组织，公开进行，决不应该再有使用武装暴动，或者在各地秘密组织的行为，否则即是丧失政党的本质，破坏了民主的精神，不但违反了本纲领，而且阻挠了宪政进程。我们如果要不愧为民主国家的政党，必须革除自民元以来所有政党过去一切不良现象，才有建立现代国家的希望。

第二，本纲领丁项军事一章，对于军队国家化的宗旨与规定，极为切实。另外还有一个经过军事组协商而更详细的军事方案，我想我们既然迫切需要和平与统一，则纲领的军事部分，实为巩固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政府对于军队整编问题，早经有所决定，已在着手实施，旬前军政部林次长并已向本会议详细报告，将来还要按照纲领与方案的规定继续推进。至于中共方面的军队整编，自然也要依照纲领与方案切实整编。本来军政军令的统一，为立国必需的基本条件，这不仅全国饱经痛苦同胞所一致要求，也是各党派所一再声明，认为不可否认的原则。现在协商会议已有结果，纲领方案均经商定，我们当前最急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全国所有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地区，都能听命于政府，一律受政府的指挥，以达到纲领所定军令军政和军制统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敢确信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决没有例外的。唯有这样确实做到，才能符合建国的要求，才能安慰人民的渴望。

否则不仅大家参加政府没有意义，而且和平团结，也将没有基础，反而增加了国家的危机与政府内部的纠纷。这当然不是国家民族所需求，也决非各位会员和各政党忠诚谋国的本意。上面所说两点，确是本纲领能否全面贯彻的试金石，果能彻底做到，则全国各地秩序立刻可以安定，复员工作亦可以顺利完成，而本纲领其他的各章各条亦无一不可迎刃而解，完满实施。这是本会同人无可推诿的职责。今天我以最恳挚的担忧，特别提起大家的注意；同时我个人誓必忠实信守这个纲领，更必督责我们各级军政人员恪切遵守，即使有时难免无心错误或者督察不周，只要大家说明指出，无论我本人或是我的部属，都无不诚恳接受，切实改正。我常常说：“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不可只顾个人的自由，而侵犯别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不可专责别人守法，而自己则处处置身于法外。”我这几句话，实在是鉴于我国社会对于自由与民主观念的模糊和法治与守法意识的薄弱，认为社会没有安宁，便是国家没有基础，人民不重法治，必使种种罪恶借民主自由之名义而行。因之，我上面几句话，实在是沉痛的呼吁，尤其近年以来，社会上和教育界所表现的这种病态更是深刻而显著，长此不加改进，我们中国将无法自立于现代国家之林，诸位会员想必也有同感。现在我们政治协商会议商订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一个纲领是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和平统一的法治国家为目的。我们大家为求发挥本会议的实效，开创建国的规模，必须先从我们自身负起转移风气的责任，树立守法行法的精神，以作全国人民的楷模，那才可以完成我们对历史对时代的使命。

最后，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的向各位申述，中正个人从幼年

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三十五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分子的天职，略可自慰。今天虽不能说国民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但是铲除革命障碍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凋伤之后，国运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订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责，今后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个重大的责任，要交托给各位同人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使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尽的事功。同时要求各位同人为国家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们在抗战时期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

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在二十二天协商当中，由于全国人民的期望与督促，由于盟邦的期待，由于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的共同努力，由于蒋主席的领导，终于使我们这些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

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在这些协议当中，我们愿意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的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

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我们也懂得建设的开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本着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使中国和平建设真正能够开始，而创造出中国新的历史一页。

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三民主义新中国万岁！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勱 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

本人此次自海外归来，深切知道国际方面期望中国和平统一很切。要知道中国自身负有治国的义务，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一种责任，先要把自身整理好，保持和平与秩序，然后在国际上成为有能力的份子。如自己不能整理好，天天内乱，如何在国际上尽其应尽的义务。此次协商会已走上和平统一之路，以后不至有内乱，不至内战，这是中华民国最光明的一条大道。国家事情的解决方式，不外二种：（一）武力，（二）和平。民主同盟方面，极希望和平。就是希望走第二条路。民主政治的实现，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所以以后大家觉得有一二件事情，一二问题对于民主精神似有出入，这是无妨的。我们相信要走上民主阶段，首先要保持和平，以逐渐改良方法，求得民意的实现。这样办法才会逐渐走上民主之路，千万不要因为一二件事情失败，就认为民主与自由的失败。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我们对民主的信仰要彻底，要全盘的，惟有本政治解决，改良法律，才会使民主政治的基础确定。主席说：民主政治须善良风气，善良风气的养成，第一，使人民衣食丰足。第二，有礼义廉耻，有了礼义廉耻，政争自然走上轨道，如果天天用武力，内乱不止，人民衣食更为困难，衣食不足，礼义廉耻也就无从实现。所以我们要和平，和平之后才

可以统一，才可以民主。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给大家无上安慰，就是有了和平以后，自然可以民主，不用武力，自然能采用法律的解决，或政治解决途径。此次协商会成功，既以和平解决，统一与团结的效果，自随之而来，民意亦随之实现，走上政治的路线，亦自在其中，所以这一次种种协议，我们民主同盟，不论在朝在野自愿竭诚拥护的。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 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本席代表中国青年党致词：本会议自开会到今天，继续有三星期之久，除大会讨论以外，各种问题，并经小组会议详细研讨，现在已经取得一致协议，而得到圆满结论。这都是朝野诸贤互让互助的效果。记得马歇尔将军初抵重庆时，在除夕蒋主席欢宴席上曾说过：“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毁灭，系于我们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间，是否能够合作，所以我们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必须要合作了解与容忍。”这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竟能这样圆满的结果，确是由于朝野各方互相了解与容忍所致。过去在朝党与在野党俨然成为对立的形势，就是各党派间也不无隔阂，那是无可讳言的。经过这次协商，彼此因接触而了解，因了解而和谐，因和谐而合作，共同携手，走向民主建国的大道，这是我们认为可以乐观的第一点。

这一次协商的各种结论，都是有关国家大计，为今后全国的治乱安危所系，从治标问题以至治本问题，大家都能舍小异而就大同，求得共同之点与合理解决。这是我们认为可以乐观的第二点。

由于各党各派的和谐精神，与社会贤达的公正态度而产生的以上两种可乐观的现象，我们确信朝野携手以促进民主立宪，是

绝对有把握的。本席常觉得我们论争有五要：第一要提得出结论，第二要立得起方案，第三要寻得着关键，第四要指得出要点，第五要握得住核心。这一次会议所以能有圆满的结果，本席觉得所有会议同人都能合乎上述条件，这是我们所最感钦佩的。今后国事还有待于朝野各方的协力，因而许多重要问题还要继续协商，希望都能够本着这次会议的和谐精神与坦白态度，共谋全国政治的改进。

本席上次在开幕致词中，曾以“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贡献于大会，经过三星期的协商，可以说前两句已完全实践了。至于后两句，则有待于改组后的政府同心协力，躬行实践，好比做文章一样，只做了一半还不能算完篇，必须一气呵成，做到“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才不辜负全国人民的热望。

关于本会议未完成的工作，如宪法草案的审议，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人民自由的保障，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实现，这些都是本会的未完成的课题，青年党同志愿与朝野诸贤精诚团结，共谋实践，这是我愿意郑重向大家说明的。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 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致词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德惠等九人代表无党无派首先表示庆祝之意。刚才听到主席和各位先生谈到民主政治，我以为民主政治最为人尊崇者，莫过于美国。可是美国怎样得到现在的民主政治？当时它有了八年独立战争，又有华盛顿的领导，并有在野名贤，相与为国，这才建立今天美国民主政治之基础。我们现在也有八年神圣抗战，也有英明领导的蒋主席，我们在座各位同人是否贤达，我想都是不敢自信的，但是这建国的艰难工作，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本着此次会议的精神，一德一心，竭尽智能，使我们中华民国要与美利坚并驾齐驱，不使华盛顿的丰功伟绩，专美于前，这个责任我们同人应当共勉之。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通过)

政府组织案

一、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修改要点如下：

(一) 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内有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二) 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

(三) 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

(四) 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及议决之事项如下：

甲、立法原则；

乙、施政方针；

丙、军政大计；

丁、财政计划及预算；

戊、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用事项；

己、主席交议事项，

庚、委员三人以上连署提出之建议事项。

(五) 国民政府主席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

(六) 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之。

(七) 国民政府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必要时主席得召集临时会。

二、关于行政院方面者

(一) 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得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三人至五人。

(二) 行政院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三、其 他

(一) 在宪法实施前，国民参政会人数应否增加，职权应否提高，由政府斟酌情形定之。

(二) 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之用人，应本惟才惟贤之义，不得有党派之歧视。

附注：

(一) 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各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由各该党派另提人选。

(二) 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如所提人选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则主席须重新考虑,另行选任之。

(三) 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

(四) 行政院现有部会及拟设之不管部会政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席或八席,约请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

(五) 关于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之部会数目,于会后继续磋商。

国民大会案

- (一)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 (二) 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 (三) 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
- (四) 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
- (五) 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及其职业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 (六) 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 (七) 总计国民大会之代表为二千零五十名。
- (八) 依据宪法规定之行宪机关,于宪法颁布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和平建国纲领

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为邀集各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以期迅速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特制定本纲领以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并邀集各党派人士暨社会贤达参加政府，本于国家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协力一心，共图贯彻，纲领如下：

一、总 则

(一) 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 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三) 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四) 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二、人民权利

(一) 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

(二) 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犯者应予惩处。政府已公布之提审法，应迅速明令施行。

(三) 保证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经济上地位之平

等。

三、政 治

(一) 当前国家设施，应顾及全国各地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人民之正当利益，保持其平衡发展。

(二) 增进行政效能，应整饬各级行政机构，统一并划清权责，取消一切骈枝机关，简化行政手续，实行分层负责。

(三) 建设健全之文官制度，保障称职人员，用人不分派别，以能力、资历为标准，禁止兼职及私人援引。

(四) 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充实法院人员，提高其待遇与地位，简化诉讼程序，改良监狱。

(五) 厉行监察制度，严惩贪污，便利人民自由告发。

(六) 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边疆少数民族所在之省、县，应以各该民族人口之比例，确定其实行选举之省县参议员名额。

(七) 自治县政府，对于其辖区内之国家行政，应在中央监督指挥之下执行之。

(八)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

四、军 事

(一) 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确保军队编制之统一与军令之统一。

(二) 军队建制应适合国防需要，依民主政制与国情改革军制，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改进军事教育，充实装备，健全

人事、经理制度，以建设现代化之国军。

(三) 改善征兵制度，公平普遍实施，并保留一部分募兵制度，加以改善，俾符合高度装备军队之需要。

(四) 全国军队应按照整军计划切实缩编。

(五) 筹备编余及退役官兵之复业与就业，保障残废官兵之生活，抚恤阵亡将士之遗族。

(六) 限期遣送投降日军回国，对于伪军之解散，游杂部队之清理，应妥订办法，迅速实施。

五、外交

(一) 遵守大西洋宪章、开罗会议宣言、莫斯科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以确保世界和平。

(二) 根据波茨坦宣言，肃清日本在中国之残余势力，并与同盟国共谋日本问题之解决，防止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之再起，以保障东亚之安全。

(三) 与美、苏、英、法及其他民主国家敦睦邦交，遵守条约信义，并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合作，以共策世界之繁荣与进步。

(四) 本平等互惠之原则，迅速与有关各国订立通商条约，并改善侨胞之地位。

六、经济及财政

(一) 遵照国父实业计划，制定经济建设计划，欢迎国际资本与技术之合作。

(二)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应予彻底实施，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私人资力所不能举办者，划归国营。其他企业一概奖助人民经营之。本此原则，对于现行设施加以检讨与改进。

(三) 为促进中国工业化,由政府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邀集对发展经济建设有关之各方面社会人士,吸收民间意见,以决定政府之措施。

(四) 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并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于投机、垄断、逃税、走私,挪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

(五) 积极筹划增修铁路、公路、建设港湾、兴修水利及其他工程,并资助住宅、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关之建筑。

(六) 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

(七) 厉行荒山造林植草,保持水土,发展畜牧,整顿并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加强农事试验研究工作,利用现代设备及方法,治蝗除虫以扶助人民之生产。

(八) 实行劳动法,改善劳动条件,试行劳工分红制,举办失业工人及残废保险,切实保护童工、女工,并广设工人学校,提高工人文化水准。

(九) 迅速制定工业会法,使经营工业者得有单独之组织,并本劳资协调精神,将有关工厂管理法规,加以检讨与改进。

(十) 财政公开。厉行预算决算制度,紧缩支出,平衡收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并公布内外债之募集及用途,由民意机关监督之。

(十一) 改革税制,根绝苛杂与非法摊派,归并征收机构,简化稽征手续,以资产及收入定累进税则,并厉行国家银行专业办法,扶助工农事业之发展。

(十二) 征用逃避及冻结之资产,以平衡预算。

七、教育及文化

(一) 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

(二) 积极奖进科学研究，鼓励艺术创作，以提高国家文化之水准。

(三) 普及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积极扫除文盲，扩充职业教育，以增进人民之职业能力，充实师范教育，以培养国民教育之师资，并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

(四) 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及文化事业经费之比率，合理提高各级学校教师之待遇及其养老年金，资助贫苦青年就学与升学，设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之奖金。

(五) 奖励私立学校及民间文化事业，并补助其经费。

(六) 奖励儿童保育事业，普及公共卫生设备，并积极提倡国民体育，以增进国民健康。

(七) 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扶助出版、报纸、通讯社、戏剧、电影事业之发展。一切国营新闻机关与文化事业，均确定为全国人民服务。

八、善后救济

(一) 迅速恢复收复区之社会秩序，彻底解除人民在沦陷时期所受之压迫与痛苦，制止收复区物价之高涨，严惩接受人员之贪污行为。

(二) 迅速修复铁路、公路，恢复内河沿海航业，协助因抗战而迁徙之人民还乡，如有必要时，并为其安顿住所与职业。

(三) 妥善运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以赈济战灾。分配医药，以防治疾疫，供给种子、肥料以恢复农耕，由民意机关与人民团

体协同主管机关推进其工作。

(四) 迅速整理收复区之工厂矿场,保障原有产权继续开工,使失业工人恢复工作,并谋敌产逆产之合理处置,使后方对抗战有贡献之厂家参与经营。

(五) 迅速治理黄河,并修筑其他因战事而破坏及失修之水利。

(六) 政府停止兵役及豁免田赋一年之法令,应由各级政府切实执行,严禁变相征发之行为。

九、侨 务

(一) 对海外各地受敌人摧残而失业之侨胞,应协助其复业,并对其居留国内之眷属生活,予以救济。

(二) 协助归侨返回原地,便利其复产复业。

(三) 恢复并协助海外各地侨胞之教育、文化事业并奖助侨胞子女回国就学。

附 记

(一) 凡恢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俟国民政府改组后,依施政纲领政治一项第六、第七、第八三条之规定解决之。

(二) 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代表会同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经费由政府补助之。

(三) 关于公民宣誓及公职候选人之考试,应依民主国家之通例,即予改订。

(四) 行政院所设之最高经济委员会,应参加民间经济专家及有经验之企业家为该会之委员,共策进行。

(五) 建议政府撤销硝磺管制。

(六) 查明在抗战期间由下游迁至后方之工厂，因战事结束停工失业之工人，其遣散费用由政府酌量补助。

(七) 在战时于兵乱中有所贡献各工厂，政府应继续收购其成品，并尽量收购其器材。

(八) 修正出版法，将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登记管制办法，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戏剧电影检查办法，邮电检查办法等，予以废止，并分别减轻电影、戏剧音乐之娱乐捐与印花税。

军事问题案

一、建军原则

(一) 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

(二) 军队建制应依国防需要，并按照国家一般教育及科学与工业之进步，改进其素质与装备。

(三) 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

(四) 改善征兵制度，公平普遍实施，并保留一部分募兵制度，加以改善，俾符合高度装备军队之需要。

(五) 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

二、整军原则

(甲) 实行军党分立：

(一) 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军队内所有个人派系之组织与地方性质之系统，亦一并禁止。

(二) 凡军队中已有党籍之现役军人,于其在职期间,不得参加其驻地之党务活动。

(三)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

(四) 军队内不得有任何特殊组织与活动。

(乙) 实行军民分治:

(一) 凡在军队中任职之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二) 实行划分军区,其区域之范围,应尽量使与行政区不同。

(三) 严禁军队干涉政治。

三、实行以政治军办法

(一) 在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

(二) 国防部长应不以军人为限。

(三) 全国军额及军费应经行政院决议,立法院通过。

(四) 全国军队应受国防部之统一管辖。

(五) 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负建军计划及考核之责。(此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四、实施整编办法

(一) 军事三人小组应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二) 中央军队应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三) 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 军事委员会内应即设置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组织之。

宪法草案案

甲、组织审议委员会

(名称) 宪草审议委员会。

(组织) 委员名额二十五人,由协商会议五方面每方面推五人,另外公推会外专家十人(参考宪政期成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名单)。

(职权) 政协会设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讨结果及各方面所提出之意见,汇综整理,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如有必要时得将修正案提出协商会议协商)。

(时间) 以两个月为限。

乙、宪草修改原则

一、国民大会:

(一) 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

(二) 在未实行总统普选制以前,总统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各级选举机关选举之。

(三) 总统之罢免,以选举总统之同样方法行使之。

(四) 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另以法律规定之。

附注:“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

二、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三、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其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

四、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干组织之，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级法官须超出于党派以外。

五、考试院用委员制，其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其职权着重于公务人员及专业人员之考试，考试院委员超出于党派以外。

六、行政院：

(一)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二)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七、总统：

(一)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以内报告立法院。

(二) 总统召集各院院长会商，不必明文规定。

八、地方制度：

(一) 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

(二) 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

(三) 省长民选。

(四) 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

九、人民之权利义务：

(一) 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受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

障，不受非法之侵犯。

(二) 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

(三) 工役应规定于自治法内，不在宪法内规定。

(四) 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

十、选举应列专章，被选年龄定为二十三岁。

十一、宪草上规定基本国策章，应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各项目。

(一) 国防之目的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全国海陆空军须忠于国家，爱护人民，超出于个人地方及党派关系以外。

(二) 外交原则本独立自主精神，敦睦邦交，履行条约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促进国际合作，确保世界和平。

(三) 国民经济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国家应保障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者有发展之机会，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

(四) 文化教育应以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民主精神与科学智能为基本原则，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自由，致力科学发展。

(注) 以上四项之规定，不宜过于烦琐。

十二、宪法修改权属于立法、监察两院联席会议，修改后之条文应交选举总统之机关复决之。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八）国内外人士盛赞政协成就，期望切实履行《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自本月十日开幕以来，经三周的协商，已于昨日闭幕。会议期间，各方均能直切主张，坦白讨论，尤其是政府容忍让步力求团结的精神，实为此次会议获有结果的主要因素。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队国家化、国民大会及宪草等项，在上列问题均已获得协议，会议乃于协调的空气中宣告结束。就各种协议内容的因素分析，固有或为本方的主张，或为他方意见的容纳，但既以相忍为国的精神达成协议，自当一致协力加以推行，对于协议各项，凡执行之责纯属政府方面者，今后自当以有效的方法付诸实施。惟协议的内容既有关于国家全面的和平与建国，而会议的成败尤归结于统一与民主的能否真正实现，则此协议的彻底实施，更有赖于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一致忠实践履与普遍推行。为谋协议结果的实施，真能贯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民主，下列各点，我们觉得有首加阐明的必要：

一、人民的自由，为此次会议谋求的重大目标之一。此次协议的和平建国纲领中，对于人民权利的规定，首揭“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此次协商会议开幕之际，蒋主席宣布政府实施事项中，第一项即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现在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本月二十八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即通过蒋主席交议的有关人民自由法令的废止与修正一案，对于前因战时需要而设定的有关人民自由的法令，加以彻底的整理与更张。今后在政府法令效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人民自由的保障自无问题。我们希望政府的法令，能够实行于中共军队驻扎的地区以内，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同有基本的自由。

二、国家的统一，为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亦为全国人民属望此次协商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协议的内容决不应使人民有不统一的观感，而协议的执行，首在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惟有确实的统一乃有真正的民主，亦惟有确实的统一乃能展开和平建国的事业。现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已有扩大国府组织与增加国民大会代表等协议，开辟一条各党派可以共循的道路。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和平建国纲领的“军事”一项以及军事问题的协议案中，虽有军队国家化及建国整军等原则的规定，而实际的解决系于中共自主的军队能否改编于国军之内，以及由此自主军队所造成的分立地方政权，能否统属于政府。我们希望由政府与中共代表所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能够依据此次协议关于军事的规定，“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实际，以完成国家军令致令的统一。

三、宪草的问题，会议对于《五五宪草》的修正意见，成立协

议。此种有关宪法草案的协议，将提出于本年五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备采纳，而待国大的决定，协议的内容虽与中国国民党的固有主张有参差之点，惟既经协议，将来自当共同提出于国民大会之前，使此最高民意机关从长考虑与研究，以立国家组织百年之大计。自《五五宪草》公布之后，全国人士多有修正案之发表或提出，经宪政实施协进会汇集整理，准备与原案一并提出国民大会。今日政治协商会议席上，复汇合各方意见，以为观摩之资。中国国民党对于国家根本大法之构成，本于虚怀相与、慎重将事的一贯精神，欣见国民大会多得一珍贵的参考。

总之，此次协商会议，既在政府的重大让步之中与参加各方的开诚讨论之余，获有全面的协议，仅就会议的本身而言，已有其难能可贵的成功。惟会议既在全国人民的属望之中举行，会议的结果尤须足以实现人民的愿望。人民当前的愿望，为和平，为建设，为统一，为民主。在会议举行期间，由于各地军事冲突的逐步停止，与交通的逐渐恢复，已使人民和平建设的愿望获有初步的实现。今后人民的愿望，端在统一与民主名副其实的的实现。我们愿引蒋主席在会议闭幕词中，关于统一与民主的说明，以为本文的结论：“必须有确实的统一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们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害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

和平建国的起点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经过二十二天的努力，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天闭幕。从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看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确实有很大的成就。全体代表的劳心焦思，各界人民的呼号奔走，国际盟友的关怀劝告，以及蒋主席的领导，并不是白费的，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历史性与积极性的初步收获。

会议的收获之一，是和平建国纲领的通过，使政府在宪政实施前得到了施政的准绳。纲领首先指出：“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这正确规定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接着，“本于国家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对于建国原则、人民权利、政治方针、军事改革、外交政策、经济财政改革、教育文化改革、以及善后救济与侨务等九项，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个纲领，经过各党派与无党派代表的一致协议，我们相信它乃是切实可行的。

其次，大会对于宪草修改原则，如国民大会职权、政府组织、地方制度、人民权利义务、及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都提出了合乎时代合乎国情的意见。为使宪草修改工作能够迅速有效的进行，大会并通过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以两个月为限，根据上述原则，参考各方意见，汇综整理，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

其次，大会通过了军事改革方案，规定了建军原则，整军原则，以政治军办法与整编办法。其中规定“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与“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尤有特殊意义。因为军队国家化所以成为问题，除了缺乏民主政治的前提之外，尚有对于军队卫国爱民之天职的不了解，实为不能隐讳之因素。政治协商会议，对症下药，定出的方案，实为导引军队国家化的正确途径。

有了好的纲领和方案，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机构来执行，那依然是白纸墨字，所以改组政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经过多次的争执与协商，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改组政府问题，也终于得到了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一党政治，扩大国民政府基础，使各党派及无党派社会贤达，均有机会参加；并提高国府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决策权与用人权在内，使它成为最高国务机关。行政院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由于上述各类问题，都得到了相当协议，所以最感棘手的国民大会问题，也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从这些困难问题的协议过程中，可以看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确实发挥了和平协商的伟大作用，这是中国历史的创举。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证明中国的团结统一，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之上，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武力决不能达到统一，这是三十五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而和平协商的办法，则证明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即努力以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虽然仅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初步，但是这些决议既然符合于今天中国与人民的需要，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我们愿意和大

家一致，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为其实现而奋斗！

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虽然仅是初步的东西，但要实现它，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阻碍。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争取上述各项决议的彻底实现。和平建国是艰难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各党派的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开步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凡是爱好民主的人，不应对于前途有所怀疑，因而抱着消极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提高信心，积极工作，不怕困难，同困难奋斗，来实现光明的前途。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历史的新方向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的成就，全国人民从昨天报上所发表五项协议的文献和各方代表的致词中，可以显然看到。当政协开始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抱着热切的期望和沉重的心情，注视着这一会议的进行，一致呼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警号。现在会议是圆满地闭幕了，所讨论的各项问题都得到了全体一致的协议。经过二十二天各社会团体在会外的督促，各方代表在会场上的努力，以及蒋主席的领导，这会议果然没有让人民失望，而且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这是我们人民的胜利，值得大家来欢欣，来庆祝！在这会议结束以后，亦许会有人对它表示“遗憾”，也会有人对它怀疑。我们认为，对于这次协商会议的成就，应从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上来认取，应从今日整个世界的发展上来认取，应从中国人民自身力量的壮大上来认取，从这些观点来认识政协的这次成就，就可看到遗憾是没有理由的，怀疑是没有必要的。

数千年来专制政治的传统，使中国人民一直是在过着艰苦恶劣的奴隶生活，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要为摆脱这种奴隶生活，用悲惨的流血来斗争，而始终摆脱不了。即以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来讲，也已经过了多少次的前仆后继，仍然是苦于革命尚未成功。数千年累积起来的专制传统，所加于人民的桎梏，其坚厚难破，真有如铜墙铁壁。要打开这座铜墙铁壁，所需力量之大，又何啻千钧万钧。然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而且学会了适时适地的斗争方法，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正面冲锋，什么时候应该绕道前进，当历史规定要以合法与和平取胜的时候，就不应该死死执着武器的批评。

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全世界都必须走上和平民主的大道，而且过去尚未和平民主的许多国家，也正是在一个个的顺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努力迈进，中国自宜急起直追，全力赶上。今天集合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居然打开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大门，我们欢欣庆祝之不暇，更何遗憾之有呢？

今天的中国已远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八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其觉悟，其力量，其经验，均已足够推动历史，争取三民主义新中国的逐步实现。政协获得成功以后，离开实现新中国的目标虽还有一段并不太短而又曲折艰苦的道路，但如果在这曲折艰苦之前迟疑曲顾，那就不免太菲薄自己。中国人民力量的不可战胜，和其经验的丰富卓越，在今天已经不只是一种潜在的或暗伏的东西，而已是沛然莫御的洪流了。我们深信，尽管前面还有不少困难和障碍，今天既由政协奠下了新方向的基石，打开了新方向的门路，人民的力量和其斗争经验，一定能够把这些困难障碍一一克服，健步迈进。双十协定以后的现象，曾使多少人对这协定的成功发生怀疑，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这协定的成功，终于有如日月经天似的突现在吾人面前。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终究是光明的——我们必须坚定下自己的信心来！

同胞们，我们欢欣，我们庆祝吧！这次政协已“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次政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当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时候，已经隐约地看到新中国的曙光，这就鼓舞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努力，因而得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成就，打开了和平建设的大门，因此，我们也就必须重视这一成就，并努力把所获协议变成现实，使中国历史真正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

（原载1946年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

协商会成功了

昆明《云南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于三十一日晚举行闭幕。蒋主席亲临主持。同日第十次会议，经决议通过分组委员会报告，此项报告为协商会二十天集议检讨协调所获的结晶，最足珍贵。关于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案、施政纲领案，宪法案，这五大国是问题，均获得具体的结果。蒋主席说：“统一民主和平团结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共同遵守，以慰人民期望。这可以说就是此次会议的总收获，总担保。我们欣闻之余，不禁感觉到十二万分的欣慰。全国人士，在春节声中，听到协商会已经成功并未失败的消息，一定格外高兴，格外兴奋愉快。

第一，协商会议的成功，成功在各项国是问题，获得政治解决。蒋主席在抗战前一贯召示国是由政治解决。在抗战期间，亦一再表示，认真执行。前晚在闭幕词中，亦一再强调此点。而此会各小组报告底通过，即政治解决国是的铁的事实。化干戈为玉帛，全国馨香顶拜，国际观感骤改。这真是抗战以还胜利后的一桩大喜事。

第二，第一次会议是互谅互让精神所召的结果。开会以来，空气协调态度真诚，会议决局，在鼓掌声中闭幕。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确有政治能力。我们抗战八年，在国际外交体制上

获得“五强”的地位。但在胜利后复员混乱，治丝愈纷。国际地位逐渐堕落，识者忧之。我民族兴亡继绝之一念，实寄诸于协商会之成败。成则建国有端可寻，败则混沌紊乱，国将不国。今天，会议在协调中是成功了。建国必成，从新树立新信念了！

第三，决议案须要共同遵守。蒋主席恳切说明：“我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果。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氏亦说：“但要保证其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皆当遵从，努力奋斗”。这是很重要的表示，人民眼看着以后由事实上表现出来，以慰人民的期望。

第四，政治要往前看出去。不算旧帐，是此次会议成功的精神所在。往前看出去，中国的政治前途是乐观的，光明的。民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变乱太多，内战太频，国家所以极弱之至，才招来外侮国难的袭来。今天在民族大流血之后，绝对不需要“乱”。因时代精神及客观环境，却需要变。协商是“变”而不是“乱”。国民政府是全国的政治重心，蒋主席领导国民政府，走上宪政之路。由训政到宪政，是“变”不是“乱”。在原子能的新物理世纪里，任何国家都不能“乱”，要迎头赶上去，要加速建国。因此需要“变”。祝协商会“变”得成功！

（原载1946年2月2日昆明《云南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

重庆《大公报》社评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二十二天，到昨晚闭幕。所协商的五项问题都已得到一致的协议，实在难得。大家期待这个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此刻读到各组的报告，这个会确实未曾失败，而且成功了。

一、统观这二十二天会议的经过以及最后的结果，其整个态度，是和平的，是妥协的。积累多年的国家严重问题，大家呼吁和平，蒋主席倡导“政治解决”，现在战停下来了，各种问题都妥协了，这才真正实现了“政治解决”。政治协商会议得以终获成就，各党派态度的妥协，都值得赞美。共产党是第二大党，在会议中，对若干问题能不固执己见，而使各项问题得到妥协，甚为难能。尤其国民党，在各项问题上，几乎大部处于给予的地位，却能着眼时代，着眼国家，使过去的难解之结都一个个解开了，特别值得赞扬。

二、政协会所创作的和平建国纲领，是重要收获之一。虽是一个过渡性的文献，在根本精神上以及一些有时间性的问题上，都充分指出政治民主化的办法。政协会闭幕席上，蒋主席曾特别赞美这个纲领。今天这纲领公布出来，全国人士也必衷心同意。其次是军事问题，因其太现实了，所以解决甚难。现谈军事问题的协

议报告，建军原则，整军原则，以政治军办法，整编办法四项，解决现实，走向理想，皆曾顾到，实为军队国家化的实施步骤。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现在这两项具备，以后施政建军有轨辙可循，其前进之路，则归纳于政府改组，以过渡到宪政实施。

三、国民大会问题，最难解决，现在是政治解决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兹协议为制宪会议。造法的议会，其本身可以是政治性的，而宪法则是神圣的。国大问题，因为有旧代表的问题存在，所以难解决。现在各方妥协了，一律承认旧代表有效，国民党让出其当然代表、指派代表，将代表名额增为二千零五十名，以七百名分配与各党派及社会贤达。现在各党派如此妥协了，假使多数人民不反对，则第一届国大便可如此结成了。至于《五五宪草》，大家一致承认有修正的必要，政协会对此有了协议。其协议修正的各点，尽管有以名词迁就理想之处，而其观点，无疑的已较《五五宪草》为进步。政协会决议组织一个宪草审议委员会，以修订宪草。即望此审议会赶速成立，开始工作，尽两个月内制成草案，提供国大采择。国大既要协议，也望能于五五开会。现在所协议的宪草原则，以及将来审议制成的草案，国大虽不受必予采纳的拘束，但，既属各党派的协议，必比较有力。所以我们希望审议会能够产生一部大家认为满意的宪草，其通过的可能性必多。审时代，查需要，择善而从，旧代表也不可固执己见。

四、政协会既获圆满协议，即将跟着实施的就是国民政府改组。府委的分配以及行政院内席位的分配，应该立即商洽妥贴，莫起争执，以便及早得见政府改组成功。自此协议以迄政府改组，一党训政的局面已告结束，而成为多党参政。以后的国民政府，是以蒋主席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混合政府。这政府是过渡性的政府，到

宪政实施，这政府的任务便结束了。五五国大制宪，宪法颁布六个月后行宪，这个过渡的政府，为时不过一年内外。这个过渡政府，因有多党参加，也许要有人多嘴杂的现象，但大家一定要能忍耐。这样的过渡政府，它会乱嚷嚷的走向民主。

最后，我们应该向国民党道贺。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已大部成功，领导国家抗战，已获完全胜利，现在卸了一肩，减轻了责任，别的党派相对的分了责任。以后国事若搞不好，国人就不能专责国民党了。由今天起，各党派都要痛感责任，忠实于其本身的任务。蒋主席说：“各党各派就要参加政府，共同执行，我们对全国同胞必须守信义，负责任。”这话真是语重心长，值得各党派共同警惕！

（原载1946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

从协议到实施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发表后，各党派和舆论界都表示赞扬。只有极少数评论表示怀疑。足以证明这些协议是合乎中国当前需要，为人民所拥护的。

五项协议，还只是中国要实现和平团结、民主建设的初步基础，还只是新方向的确立。一定要全国努力促成协议的全部实现，才能在实际上把中国推进民主和平的新时期。所以，协议成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各党各派迅速的切实遵行，而全国人民尤需全力促其实现。现在是中国历史转换的大好时机，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就对不住民族。任何阻挠和破坏实现协议的企图，都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坚持真理与言行一致，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与出发点。五项协议既有中共参加决定，既合于国家与人民的需要，我们就一定全心全意促其实现。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这里没有任何条件，任何犹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说到做到的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精神和态度，适用于所有的五项协议。就是对于军队问题，中

国共产党既已同意政协协议，就一定按照协议去做，有计划的做到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有步骤的做到分别整编和统一整编，并且用一切力量使中共领导下军队四分之三的编余官兵参加生产，获得职业，安定生活。这是一项极艰巨的工作，但是中共有决心和信心，也有办法完全做到。

至于国民党和政府方面，蒋主席也已经在闭幕词中说过：“本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方案……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蒋主席更在结束时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这种态度是值得欢迎的。蒋主席和国民党全党，能够本着这种态度去执行政协会五项协议，就能够使这些协议全部实现。我们希望国民党和政府方面，同样能够说到做到。能够这样，不仅解决了国是，也大大的提高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真正爱护国民党和政府的国民党员，也一定都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否则，不但对不住全国人民，也对国民党和政府有害无益。

国共两党的共同忠诚努力是政协协议能否实现的重要关键。然而这还是不够的。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同样有极大的作用。大家都应该以促成政协会的召开和成功的那种努力精神，督促协议的实现。可以说，每个同胞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时候不能够松懈，不能够旁观。我们要大声疾呼：现在已经找到了大家要走的一条大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崎岖。一定要大家更加积极负责，才能除去障碍，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努力吧！把好的协议变成好的实际！前面困难还多，曲折还多，更加需要大家努力！

（原载1946年2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

各党派长期合作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能够获得历史性和积极性的成就，是因为各主要党派和社会贤达都能本着和谐合作的精神，来共商国是，来解决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转捩的关键，也给今后政治问题的和平解决，树了楷模，奠了初基。

蒋主席答复外国记者的问题时说：“现在乃政党合作的问题，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我个人甚愿中国各党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设国家。”这见解把握了中国政治的中心，和少数人诬骂政协会议及各党派合作为“分赃”的谬论，完全相反。从一党政府到民主宪政的举国一致政府，中间自然有个过渡。这个过渡办法，就是政协会议所决定的，把一党政府改组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负责的政府，再经过民主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成立民选政府。而《和平建国纲领》，便是过渡时期中政府的共同施政纲领，是全国所应遵循的民主改革总方向。蒋主席同意这种办法和程序，并且说：国民党“现在将其一部责任分与各党派，实为还政于民愿望的开始。”这里，他明确的答复了少数人的错误见解，以及他们对这个程序的攻击。这些人，曾叫嚣着政协会议是不合法的，还政于民不应该经过党派共同负责的过渡的联合政府等等。他们显然是错了。希望国民党中有持这种见解和进行这

种攻击的人们 赶紧放弃和改正错误，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努力执行政协会议的决议，使“还政于民愿望的开始”，能建立一个好的榜样。

蒋主席愿望中国各党派永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协会议虽已获有协议，这些协议的实现，却还有赖于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密切合作。现在反对和破坏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人还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汉奸、伪军、亲日派、内战挑拨者以及一切反民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利用空隙，进行阴谋活动。民主运动愈发展，民主力量愈壮大，民主合作愈巩固，他们的鬼计便愈凶猛恶毒。他们决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所以我们曾经一再提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是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是曲折，有困难，必须各党派长期合作才行。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党间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争论自不能避免，困难也还不少。然而，只要各政党有长期合作的愿望、诚意和决心，一切争执没有不能以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的。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之初就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合作建国的重要方针。我党八年余来，曾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在政协会议闭幕时，周恩来同志又强调我党愿和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努力，长期合作”。现在，蒋主席在闭幕词中要求大家“同德同心，精诚团结”共负建国重任之后，又明确表示他对“各党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的愿望，我们可以相信，国共两党都将本着这项愿望去努力，并协力纠正和制止一切阻碍和破坏合作的言论和行动，使政协会议五项协议早日实现。

（原载1946年2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由纲领到实施

重庆《国民公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中外人士均集中注意力于决议案的实施了。改组政府案正由各党派交换意见并确定名单中，军事问题亦正在三人小组里商讨，负责审议宪草案的卅五位委员业经分别推出，并定于十四日召开首次会议；国民大会案实际只是所增加代表及未产生代表的区域及职业团体的推选而已。余下的就是一个施政纲领案即所定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问题。

和平建国纲领拟订是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所谓今日是“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而这一纲领就是政府在“宪政实施以前的准绳”。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九项，凡五十二条。包罗万象，国家施政目标是应有尽有。内容条款附合人民的意思，可说是抓住了中国今日政治的病根，完全实行了真是福国利民，国家不知要上进多少步。不过，今天我们想到，这一纲领毕竟不是百年大法，祇是“宪政实施以前的准绳”。政治协商会议各方面同意于今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则宪政的开始，凭理应该是不出今年年底以内之事。如此，和平建国纲领的寿命，最多到今年年底为止，实际上可说只是三十五年度的国家施政纲领。因此在时间上说，极为短促。从纲领到计划，

而核定，而执行，中间至少要搅一个相当时间的圈子，则此一纲领，不知又将到何时方能付诸实施。我们在会议进行中就指出，时间不多，纲领项目不要太繁杂了，祇是注意文字的美丽是难见实效的。现在这长长大大篇，读来已够费时，有些简直非十年八年办不到。如厉行荒山造林，保持水土，发展畜牧，及利用现代设备及方法；积极奖励科学研究，鼓励艺术创作，以提高国家文化之水准；普及国民教育及社会教育，积极扫除文盲，扩充职业教育，以增进人民之职业能力，充实师范教育，以培养国民教育之师资，并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等等。此类条文可说是美极了，但岂又是这“宪政实施前”几个月内可实现之事？纲领非装饰，我们要把握国家施政的中心，估计国家现实的力量，陈义固不必过高，而必须求其切实做到。所谓“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现在纲领既经确定，我们为争取时间，求其实施，应该即速采取下列步骤：

一、《和平建国纲领》是政治协商会议订立的，此一会议是由政府召集的，依召集办法第六项的规定：“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而这一会议的主席，就是国府主席，则此时主席即可按程序完成应有手续，分发各机关作为本年度施政的依据。

二、《和平建国纲领》总计有五十二项，国民政府必须指定若干项为中心项目，于宪政实施前必须切实全部实施，如“人民权利”一章；政治章中之整饬各级行政机构，普遍成立省县民意机关；军事章中之确保军队编制之统一，军令之统一；外交章之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经济章之紧缩支出，平衡收支，根绝苛杂；教育文化章之保障学术自由；善后救济章之迅速恢复收复区之社会秩

序，澈底解除人民在沦陷时期所受之压迫与痛苦，侨务章之对海外各地受敌人摧残而失业之侨胞，应协助其复业等。

三、各机关应参照业经公布之纲领，由各主管长官先令各单位预先准备修正补充年度计划之拟议，一俟正式纲领颁到，即可呈核施行，以节省时间。

我们又对照《和平建国纲领》与本年度国家施政纲领的内容，原则并无冲突，项目则略有增减。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凡施政方针缺如者，应以建国纲领补充，凡建国纲领所未列者，年度计划即不必规定。时间匆促，我们要先求纲领的逐一实施。

（原载1946年2月9日重庆《国民公报》）

美英舆论普遍赞扬 政协会议获得成功

美国一般舆论，对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都很重视。新闻评论家和广播评论家，都极口赞扬，认为上周世界上最大事件之一，就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圆满结束。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纽约先锋论坛报》的评论也说：中国各党各派一致努力结果，已奠定了中国民主宪法的基础。

《星期观察报》今日（3日）刊登其重庆记者报道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最近半月内足以牵累世界的中国不流血革命，已经完成了。这里外交界一致意见认为：国民政府已同意接受组织混合政府和厘订民主新宪法的计划。这样就可化干戈为玉帛了。该报社论今天标题是《中国的和平》，内称：本诸中国素来著名的合理精神，二千六百年来精髓的理性，现已结束十七年来国共的争斗，这种精神已在这次协议中有卓越的表现。蒋主席新年对全国演说所表示的为促成协商所作的让步，值得注意。他和国民党虽领导国家完成抗战，开发中国西部资源，为六百万日人侵袭下的人民觅得工作，及推行教育工作，但都没有能获得国外的公平爱护。协商的结果，已足答复一切的批评。现在只有依赖促使这一协议能够实现。中国所需要的并非空言，而是双方的事实表现。

美国若干报纸刊载社论，着重中国和平与统一的希望。《纽约先锋论坛报》说：蒋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如能实践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所通过的决议，则中国将实现统一与民主；如果有关系各方都尊重该决议，则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中应成为一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二月一日的《旧金山纪事报》说：国共所成就的协定，是走向统一的第一必要步骤。也就是中国人理智精神与马歇尔将军调停有方的胜利。

美国在华新闻记者检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商合组联合政府所获协议，《纽约时报》记者赛尔丁二月一日自重庆发出通讯说：联合政府的协议，及共产党的成就。因他们所持见解，为他们必须积极参加中央政府，才能放弃他们的军队与土地保持独立的情势。赛尔丁指出：共产党对国府委员会人选问题业已让步，放弃他们任何一党都不得超过全部名额三分之一的原来主张。赛氏又指出：新政府的成功，端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态度如何。斯蒂尔的通讯则注重协议的共同政治纲领。斯氏誉之为协商会议的重要文件。他续说：政治协商会议，在共产党眼中，颇为重要。他们目之为指令，凡国共两党，都负信守联合政策的责任。共产党表示，倘政府能遵守议定的政治纲领，而共产党退居少数党地位，实无关宏旨。因纲领中已采纳共产党所提的大部主要改革方案，且向他们保证赋予政治自由权利。斯蒂尔说：在联合政府未生效以前，延安将续为共产党势力中心，而在行政与方法方面都不致大事更动。（美新闻处）

美国多数报纸都一致强调中国和平与团结希望。《纽约先锋论坛报》在本月二日指出：“如果蒋介石将军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以及中国共产党严守着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赞同的值得赞美的决议的精神，那么，中国将会团结而且民主。如果这些决议能为有关

各方所尊重，中国定会逐渐强大，成为在这和平繁荣的亚洲发展中的强大国家”。该报认为“这些决议是完美无缺的，比许多观察家所能相信的还要好一些”。又说：“感到这些决议最主要的是由于参加协商者的信赖，他们计划出这些决议，而且大家一致地赞同。”该报接着指出：“当这些决议付诸实施时，实际的考验就会遇到了，倘若蒋介石将军不以坚强的手腕控制着国民党中的右派，右派分子声称他的让步太多了，那末，这类决议是不可能实行的。”该报结论又说：“政治协商会的会员们已经做过这一件完美的工作，来开辟了政治妥协。他们必须再担任同样完美的工作，使他们的决议实行起来，如果他们都想完成中国人民如此迫切需要的和平与团结。”

《华盛顿邮报》认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宣示过的民主的夙愿，在今天的中国，绝没有消逝，在他死后二十一年，这愿望是在向着实现的道路上迈进了”。该报感到，这些决议“是令人心悦的举动，为了这，全体参加政协工作的人，都应该享有盛大的光荣。虽然如此，还不能说经过这样成就，真正的民主政府就可以兑现了。政治民主是一种以实行来学习的生活方式，学习的过程是缓慢而且痛苦的，但是中国毕竟是在民主团结的方向上向前走了最好的一步了，这是一种伟大的惊人的发展”。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在题为《中国的和平》的社会中说：“正当诸强意见分歧，识者在对西方国家前途表示失望的时候，中国则正以坚忍及合理行动，赢采辉煌的成果，当可稍资慰藉。为达成政治统一所召开的会议现已在完全协调下闭幕。这项协议表示双方具体的让步。蒋主席允许改组其权力所凭依的一党政府，实属贤明，蒋主席无疑必可获得一般的拥护。”该报又说：“关于共党的测验，尚有待他们能否放弃其长期内战中庇护一己实力的自

主军队”一点上见之。惟各方报告，则同意共产党领袖将有适度和诚挚的行为。至于中国的前途，该报以为“尚有困难，因为二十年内战后，组织举国一致政府实非易事，然中国没能统一，则各事将终底于成”。

美国几家主要报纸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普遍反应良好。

《芝加哥太阳报》在二月三日的社论里说，中国的现状是平民争取民主而造成了伟大的压力。“美国的压力和帮助，对于达成结果是有决定性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九日社论说：“中国临时政府的基础是进步的，非常显然，进步的一项理由正可以用美国对华政策来解释。美国的政策是：中国统一的完成，必须经由重庆和延安双方主张的妥协。在马歇尔来华以前，美国采行的政策则常是袒护单方面的。”

《纽约先锋论坛报》评论说：“政协决议案可以等于发展一个民主国家的宪章。作出这些决议案并且在政协闭幕会议上一致同意的人，代表了中国各种政治观点，从极右派到极左派，可是看起来，这些决议案真像是深刻倾心于民主的人所写成的。”

美《外交政策协会公报》称：重庆观察家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设立一过渡性的政府，实为中国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一大胜利，此协议虽系在实现时具有无数阻碍之一文件，虽其纵为言论上的协议，然亦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澈底。因为两党尚系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美国当能对中国最近的趋向保持且发扬其“中庸政策”，并对中国的长期复兴事业作经济援助，而继续协助中国。

（原载1946年2月5、6、7、9日重庆《新华日报》）

苏联报刊评论政协成就

上海苏商所办中文《时代日报》，六日发表阿尔古斯“时评”一文，评论政治协商会议成就，题目叫《请向新中国大道迈进》。该文首先赞扬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已完成了人民对它所希望与期待的责任，各项协定规定了一切中国战后发展的主要途径，并成为根据和平、民主、统一而实行三民主义的起点。”接着分析五项协议的意义，最后并表示热烈的期望说：“目前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实施政协会议决议时的精神与效率而定，如果中国的人民大众得有机会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则中国必能依照政协会议的决议来解决一切战后复兴问题，一个民主的中国必得全世界伟大民主各国衷心的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在结束中国内战上的努力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该文认为政协的决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由旧的、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由黑暗与反动中，走向新的、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与强大的中国的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新时代》杂志评中国政协会议的决定说：“尽管反动派的反对，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国家民主化的极度重要的决定。民主势力的强大，必将克服反动力量的反对。”《新时代》杂志力称：“中国民主势力的强固，造成了最后解决全国团结问题的有利条件。民主的中国，正等待解决一世纪以来的各种问题。”

（原载1946年2月9、23日重庆《新华日报》）

延安权威人士评政协会议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日圆满闭幕。延安权威人士评论称：政协会所获成果，是极其重大的。《和平建国纲领》是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之共同施政纲领，是过渡时期中全国所应遵循的民主改革的总方向。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本原则。整军决议规定了全国一切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完成的条件。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在实行以后，要达到彻底民主化，还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奋斗过程，去克服各种艰难障碍，但是，中国从此无疑的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是与会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努力，特别是各民主党派据理力争、同时又作了重大让步的结果。权威人士指出：良好的决议，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一切决定于如何确切与忠实的实施决议。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将以最忠诚的态度，在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军队中加以贯彻实施。中共全体党员，将在全国致力于和平合法的奋斗，以求国家之彻底民主化，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

共欢迎蒋主席关于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的诺言,希望中国国民党能本此精神,与全国人民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实现。

(原载1946年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

中共主席毛泽东九日单独向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蒋主席曾说，各党各派充分合作，现在还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也深有同感。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以全部信仰寄托于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一部美国史，即其证明。

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综观中国内部及世界大势，各种情形实利于转趋民主的新方面。推动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共产党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而参加。按毛氏上项谈话，是他去年十月在陪都会晤蒋主席归来后的第一次。毛氏曾以辛劳过度，闭门休息，除家属外，外间绝少和他见面，其所处理者，仅是最重要的政务。毛氏原来嗜吸纸烟，几不离口，但近几月来，已将纸烟戒去。接见记者时，是在共产党军司令部普通房间中，且历时不久。他的神色

比较两月前为佳，且时说笑话，足见他的兴致很好。毛氏穿的仍然是那套草绿色的棉袄，和黑布鞋。谈话着力时，常俯身向前，将身体移至坐椅边缘。晚餐后，毛氏在闲谈中，暗示他对于美国情形，非常关切，所闻甚多，足见他对于美国情形，颇多认识。临别时，仍申言对于中国和平及最后完成民主具有信念。

(原载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中共代表团于二月一日下午二时假代表团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三十余人，代表团出席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周恩来同志首先发言：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昨天闭幕时，已经说过了，现在可由各位提出问题，我们回答。各记者纷纷提出问题，由周恩来同志一一作答。

问：这次决议与中共本来主张有何距离？延安接受有无困难？

答：这次协议结果，在若干问题上与我们的主张存在着距离，例如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的提案有距离，其次如政府改组问题上，我们主张多数党在政府中的席位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现在的协议结果并不如此。又如国民大会的代表，我们主张重选，而现在用政治方法妥协解决。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问：军民分治与军党分离，将来如何具体实现？

答：军事决议案中已规定有几项办法，我们方面保证负责实

施。至于更具体的办法，须由改组后的政府和军事三人小组具体规划。

问：军队整编的步骤如何？驻地确定否？

答：全国军队的整编工作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中共将其所领导的军队改编为二十个师，政府将其直接统辖的军队改编为九十师，双方分别进行。各部队驻地由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第二步，依据总的计划将全国军队统一编制为五十师至六十师。这计划是确定的，实行的具体方法则由将来改组后的政府，三人小组及将来的国防部 and 建军委员会计划此事，以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问：第二步统一整编时，中共军队怎样？整编需时多少？

答：那时就无所谓中共军队，因为中共在军队中的组织和活动都取消了，正如同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在军队中也要取消一样。中共军队的整编要通过三个步骤：第一步，中共二中全会可能于二月底三月初召开，讨论并宣布取消军队中党的组织。第二步，实行整编，将军队中党的组织实际取消。第三步，由三人小组及改组后的政府制定全国军队统一的教育计划，普遍实施。以后，国民党自然不能在军队中作反共教育，中共也同样不作反国民党教育。

问：国共军队所受教育训练等颇不相同，混合编制，岂不困难甚多？

答：正因两军所受教育训练等很不相同，所以才须先分别改编、教育，以后再统一整编。

问：中共军队改编后情形怎样？

答：整编后将有四分之三成员退伍，他们将回到生产中去。

问：双方整编如何监督？如不执行如何处理？

答：为监督国共双方整军工作的完成，将组织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包括各方人士参加，它有权赴各地实地考察整编情形。关于考核委员会的职权尚未具体确定，我想它必须具有相当权力，同时它如果发现不执行军事协议的情形，可以配合军事三人小组处理。

问：政治协商是在国共互让的精神下得到结果的，中共方面有何让步？

答：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国共互相让步，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让步，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让步。中共方面如：纲领问题，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问题，尤其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军队不仅有第一步的整编而且要进入第二步整编。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愿与国民党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以后不是武装斗争了。

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改组政府？

答：我们自然希望越快越好，但自然也得和政府党商量。

（原载1946年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在重庆大学 学生爱国运动会上的演讲

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有没有立即产生世界第三次大战的可能？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不管苏联也好，美国也好，都是不愿战争的。苏联在战争中受的损失最大，他们极度的需要和平。美国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人就是宝贝，他们决不肯轻易牺牲。关于英国，他们也知道从战争中是不能找出一条出路来的。其他的国家更谈不到。原子弹也不能就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首先，假如使用原子弹战争，将人类毁灭了大半，只剩下了放原子弹的人，这世界又怎么办呢？美国的市场又在那里呢？以美国的财富来说，她不是希望毁灭，而是希望发达，她才能有市场。其次，科学到了一定水准的国家，都有可能发明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永远秘密的。其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不主张用原子弹毁灭世界，而是应为人类谋幸福，当然就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所以原子弹的发明，不足以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相反的，例可以因为强国的水准差不多，而取得和平，这中间各强国间虽然一直在争吵，但总的方向并没有动摇，大家都还是在责备不民主，不自由等等，中心还是向着和平、民主、繁荣的路上去。在这前提下，多少国家修改了《宪法》，多少国家改组了政府，多少国家进行了普选。世界第二次大战的特点，是各国的人民都要求翻身，不管反法西

斯的国家或被法西斯压迫着的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的。但这种人民要翻身的民主运动，不同于世界第一次大战时两个极端的运动，而是共同的要求民主，不是推翻社会，而是改革社会，大家既然都是要求建设、生存、人类的幸福，而人类又有伟大的力量，可以创造一切，为什么不用这来建设一个繁荣的世界呢？老的殖民地政策也不能解决问题了，要使世界经济危机得到解决，只有通商发达，扩大市场，大家共同发展；要是还采用压迫别的国家，垄断，是行不通的，所以世界只有朝着和平、民主、建设的目标而奋斗。中国也不能违背世界总的方向，因此，才有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百年来中国志士的不断奋斗牺牲，这次才算得到成功了。抗战胜利是奠定了民族独立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才是开始了民主的道路。孙哲生先生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和平革命，我同意这个说法。中国多少年来都受着外国的压迫，现在对外是独立了，过去内部一直是武装斗争，今后要用和平民主方式解决，而不是用武装斗争。正因为是百年的重担，多少年来的对立，今天想一下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思想上无论如何一下转不过来的，今天仅仅只是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一个开始，这个开始的转变，也带来了不同的看法和很多的困难。这是成功带来的，与失败带来的不同，大目标已经确定了，只是还有一些曲折和困难，只要有事先的准备，不迷失方向，终归能克服的。政治协商会议里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不能说谁先谁后，二者好像两条腿，忽而这个在前，忽而那个在前，是平行的，互相配合进行。政治民主化先要有一个过渡的共同纲领，以后要有一个长期的宪法产生，这种宪法是合乎孙总理的中央与地方均权的原则。军队国家化的问题，除了整编以外，要党军分立，军政分立，军队里只教育军人爱民，学文化，掌握技术，建

立现代化的军队，赶上别的先进的国家，要以政治军，事事讲道理，不是用枪杆子(热烈鼓掌)。在两条腿的中间，还有一个正身，也可以说神经中枢，那就是改组政府。改组政府的计划，大家都有让步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为什么要彼此让呢？不让就不能增强彼此的信心，就不能长期合作，对于目前的和平建设，就有极大的危机。剩下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问题，不在代表多少，而在通过民主宪法。我保证中共代表是赞同这一个依据政协商定的原则来修正的民主的宪法的，并希望其他党派也要求这个民主的宪法的通过。把这几部分联系起来看，恰好是一个有腿有头有神经中枢的健全的人，走向民主的康庄大道上去(如雷的掌声)。最后，感谢沙磁区学生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督促与帮助(大鼓掌)。

(原载1946年2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朱德在延安庆祝 和平民主大会上的演说

今天我们开大会，庆祝和平民主。我们中国人民求和平，求民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了，直到这一次，一月十日，才由蒋主席和毛主席下令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月三十一日，才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行政院，通过修改宪草原则，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础。虽然停战以后，各个地方还有一些个别的零星的冲突发生，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行起来还会有更多的波折，但是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上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庆祝和平实现！庆祝全国民主开始！）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的这个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从根本上说来，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年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民主力量二十五年奋斗的结果，是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八年奋斗的结果（全场大鼓掌），也就是说，今天到会的每一个人，对于今天的胜利都有贡献，都有功劳。特别应当指出，多年以来，

我国无数的志士，无数的先烈，为了和平民主的目的，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抛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鲜血，由于他们的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他们的遗志今天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今天可以瞑目了。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要达到今天的和平民主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要开始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家走上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就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直接原因来说，这是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与全国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团结合作，互助互让的结果，这又是美苏英三国政府与人民一致努力，特别是马歇尔将军直接参加国共谈判，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国和平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向国民政府蒋主席致敬！（鼓掌）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致敬！（鼓掌）向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先生，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民主同盟的各位领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致敬！（鼓掌）向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元帅、阿特里首相致敬！向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致敬！（全场鼓掌，并高呼：拥护国共长期合作！拥护各党派长期合作！拥护中美苏英亲密合作！）

现在国内和平已经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化的决议也已经通过，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我们过去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产生这些决议，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些决议。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向全中国全世界作了郑重的诺言，宣布他一定坚决的忠实的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

切决议，坚决的忠实的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我们欢迎蒋主席的这个诺言。我们拥护蒋主席实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实行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大家知道，在世界上不但有美苏英各国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其他阴谋破坏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在中国不但有愿意执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汉奸、伪军、亲日派、内战挑拨者和其他阴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国民党、各党派与无党派的民主分子，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与各党派合作，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国家的民主化。我们不但要实行已经通过的这些决议，因为这些决议的实行还只是全国民主化的开端，我们还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继续努力实现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使全国的政治彻底民主化，全国的军队彻底国家化，使三民主义彻底实现于全中国，使中国成为近代工业化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全场鼓掌，并高呼：拥护蒋主席实行改组国民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军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要做极重要的工作。我们已经彻底执行了停战令。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已经执行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根据这个标准来重行检查一次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看我们已经实行的是否还不完善，还有缺点，如果还有，就要毫不迟疑的加以克服。那些还没有实现的，我们应当绝对忠实的去贯彻实行。我们解放区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不要钱，不怕死，全心全

意服务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军队，除此以外，我们的军队不知道任何个人的党派的私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经过种种艰难困苦，创造了、发展了一支国家的人民的军队，这就是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纵队，现在国家民主化已开始实现，我们的目的已开始达到，这些军队即将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的最忠实的服从者与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将一如中国国民党一样即将停止在军队中党的组织的活动。我们无论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在军队国家化方面，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都要力求成为全国的模范。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加倍努力，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参加全国范围内的民主事业与建设事业，推动其迅速前进，把全中国都建设好，我们的责任是双重的。是的，解放区的工作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解放区本来是全国经济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又受了战争的最严重的摧残，但是只要我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我们就有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有信心完成我们的双重任务，像过去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做过的一样。解放区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全中国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鼓掌。会场高呼：加强解放区民主建设，推动全国民主化！）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建设新中国！

国共合作万岁！各党派合作万岁！

中美苏英亲密合作万岁！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万岁！万万岁！（全场高呼，长久不息）

（原载1946年2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 郭沫若、张君勱、缪嘉铭 赞扬政治协商会议伟大成就

政治协商会议已圆满闭幕，国人兴奋。记者昨日(一日)分访各参加政协代表，叩询对会议感想。兹将已访的几位先生的意见，略志如下：

黄炎培对政协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黄炎培先生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并指出所以能够得到这样良好的结果，应该归功于各方的容让，国民党的让步也很大，黄先生对于未来新中国的美景抱有无限的热望。但是他举造屋为例说，政协所得各种协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

沈钧儒认为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能经过协商得到这样好的结果，是历史上所没有

沈钧儒先生认为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能经过政治协商得到这样好的结果，是历史上所没有，将来各方参加的举国一致政府，更是空前伟大的局面。但沈先生非常重视地方政府，他说，地方政权是国家组织的基础，中山先生主张中央与地方均权，省长民选，省有省宪是很合理的。沈先生举了一个很饶趣味的例子，他说，过去许多人强调中央集权来谈民权主义，由上而下等于仙女散花，而高度的地方自治却是由下而上，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生根的。最后，沈先生对宪草组的成就深表欣慰，并盼望未来的国民大会能通过由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宪草组决定的诸原则拟成的宪草。

梁漱溟说：政协得到这样好的结果并不容易，大家必须珍重、爱惜

梁漱溟先生说：政治协商会议得到这样好的结果，并不是容易的。各党派的意见距离相当远，经过许多困难曲折，才达到妥协，因此大家必须珍重它，爱惜它。但是各党派内部，可能有些人，由于狭隘的偏见而觉得自己让步太大，虽然妥协了，心里却总有些不平，这种想法，可能影响到已经形成的妥协局面，因此

接着来的，将是一个严重考验的阶段。尚须各方面都能本着顾全大局互相容让的精神，多接触，多反省，再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才能渡过这个难关。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新中国的康庄大道了。

郭沫若认为政协成就很大，但要 使之实现，尚须作出更大努力

郭沫若先生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很大，所获各项协议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很好的开端，虽然要使之一一实现，尚须作更大的努力和清除许多障碍，但前途无论如何是光明的。对于文化工作者，郭先生希望保持以往艰苦时期的奋斗精神，万万不能松懈，在今后较好的环境中，尤其要发扬民主作风和集体主义，郭先生确定的说，集体努力一定要比个别苦干的成就大得多。

张君勱说：能和平了，就是一个很大成就

张君勱先生说：能和平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就会受到国际上的尊重；其次只有和平，才能谈到生产和全国建设；第三，有了和平，才能谈一切法治和民主。张先生认为中国必须要有十年、八年时间休养生息，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太苦了。现在其他国家都在研究如何吃得好，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牛奶、肉类和水果，

面饭都是次等的食品，而我们却连吃饭都还不能吃饱，因此我们是需要和平，要在和平中建设。

缪嘉铭说：政协会议成就很大，
能以政治方式解决这许多问
题，感到莫大欣慰

缪嘉铭先生很兴奋的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能以政治方式解决这许多问题，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谈到和平问题，他说：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就宣布了停战的命令，在开会期中虽仍有些零星冲突但也停了下来。尤其使人感奋的是当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时，内战之声全都没有了。有了和平，这就实现了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第一步。其次谈到团结，他说：在开会期间，虽有一些困难，一些争论，但都能本着团结精神而获得解决，整个会议的气氛是团结和谐的。尤其使人感动的是闭会以前的一次会议，由于彼此的推诚相见，使一些困难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使各种协议能因此迅速获得一致，现在只有希望一切协议能早日实现。缪先生最后说：我很乐观，我认为本着会议期间的彼此之间的热挚和谐团结的气氛，一切协议是可以早日实现的。

(原载1946年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

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 邵力子发表演说：政协会议成功是民主运动的胜利，要求希望兑现

章伯钧说：政协圆满闭幕，但前途困难仍多

昨日(三日)下午二时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应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之请，在重大礼堂作公开讲演，题目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出席听讲的同学有九百余人，马寅初教授也在听。章伯钧先生说：沙磁区同学爱国游行对政协所提出的口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现在政协是已经圆满闭幕了。接着章先生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运动一直说到政协，他说过去辛亥革命和北伐都没有完全成功，原因是那时国际国内的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好。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环境变了，新生了许多民主力量，民主的力量更强大，更巩固，更发展了。其次是中国国内民主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国今后民主的前途是乐观的。章先生又提醒大家说：虽然如此，但具体的困难还是很多的，要改一样东西不是一下就可以改得了的，必须要经过曲折的道路，要一点一点的来做，而且仅仅靠各党各派代表是不够的，要全国人民共同负起责

任来。他说首先要民族资本家组织起来，其次是职工运动，再其次是学生，以后深入到各个农村去，说到这里章先生甚赞解放区农民工作做得好。最后章先生说中国民主政府形成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工作要大大的发展，他希望在政治上中国与其创立了许多新的党不如把旧的党派巩固发展起来，他更希望青年学生有一全国性的组织，以推进民主运动。

罗隆基说：政协会议 成功是民主运动的胜利

昨日(四日)下午六时民主同盟罗隆基先生在重大礼堂作公开讲演，听讲的人极为踊跃，楼上、窗外、门口，到处是听讲的，大约有两千多人。罗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民主运动》。罗先生认为有人以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闭幕是那一党失败了，或者是那一党胜利了，这都是不对的，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互让的结果。也不是那一党的胜利，而是民主运动的胜利。他又说：有人以为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对国民党有害，真正说起来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党各派承认国民党蒋主席不但领导抗战，而且还要领导建国。其次这次政协也使久于执政而脱离人民的国民党，增加了一些新的血液，跟人民再发生关系。再次，和人民发生关系，可以使一个党进步。罗先生说现在社会上一般人怀疑政协的决议是否能兑现，他说现在不是兑不兑现，而是怎样兑现，兑现多少的问题。因为现在兑现不是那一党那一派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各党各派共同的责任。不过真正的澈底的兑现，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要靠各党派负责，也要靠人

民自己起来争取。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中国各党派必须长期的合作团结，才能使政协的决议不落空，而见诸实行。最后罗先生提到中国民主形式问题，罗先生认为中国民主不会像英美式的，也不像苏联式的。由于中国国情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民主道路可能是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同时并进。

张东荪说：现在对政协 的要求就是希望兑现

民主同盟张东荪先生，昨日(六日)下午二时应中大民主团结促进会之请，前往沙坪坝中央大学大礼堂作公开讲话，题目是：《哲学与民主》，听众有二千多人。张先生开头说明，人要是说不想管政治是不行的，事实上是逼到了墙角落里，不得不反过来挣扎。张先生继而幽默的说：他自己弄政治是逼上梁山，只要政治修明了，自然会下山来的。其次，张先生说到中国有一部分的传统思想是妨碍中国民主发展的，欧美各国的民主的发达是有他传统的基础，主要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信仰、判断等等，这样也就容易形成一种负责的观念，中国却缺乏这种精神，中国的儒家学说等虽然对于自我修养还能发生作用，可是用来对待政治，却没有用，这些思想必须打破。最后张先生说现在对于政协的要求就是希望兑现的问题。

邵力子说：政协会议是以政治方式解决党争，求得不流血的和平

五日下午三时，邵力子先生应中华大学《群力周报》等十二团体主办的学生时事座谈会之请，前往演讲，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形》。邵先生说本人是站在党与政府方面讲话，他谈到召开政协的意义是在以政治方式去解决党争，去求得不流血的和平。这次会议的结果是非常圆满的，许多人都以为国民党要倒霉了，其实这次会议是国民党胜利了，政府成功了。因为（一）首先盼望此次会议一定可以成功；（二）各党派一致承认了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原则，和一致承认了五权宪法；各党派一致承认了实业计划及建国大纲为经济建设之基础。最后他说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很少个人发言，均以团体为重，事先准备充足，意志集中，解决问题迅速，实开我国会议之纪录。邵先生讲完后又解答了同学们提出来的几个问题。

问：改组政府何时开始？

答：三月中旬开始，须经过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亦有所准备。

问：整军时国共部队是否混合编制，其干部及将领应如何安插？

答：整军是统一整编的，至于其干部及将领的安插，双方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的。

问：政治协商会议是否继续存在？

答：法令上是存在的，事实上须在解决重要问题时才再召

开。

问：国府委员除政府党二十席外，其余党派应如何分配？

答：分配问题已交其他党派自己去办，我想应该是中共占第二位。

问：请政府取消学校的党团活动。

答：党是不成问题的应该退出学校。致于团是属于国家的，是一种辅助教育，今天大家既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定是大家对党团在学校里活动的印象太坏的原故，故我希望党团同志今后特别慎重振作。

（原载1946年2月4、5、7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治中举行联欢晚会，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昨天(八日)下午五点钟，纯阳洞中电制片厂大礼堂内，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军委会政治部主办了一个联欢会，主人张治中部长夫妇，殷勤地站在门口招待来宾的光临。来宾陆续来到，有各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有政府官吏，最大多数是文化新闻界的人士，还有不少从延安新来重庆的同志，一共二百多人济济一堂，围着U字形摆满食品的长桌，新朋旧友，见面就是握手谈笑，显得非常热闹。

张治中祝贺政协会议成功

六点钟，张文白先生首先站在台上致欢迎词，并说明举行联欢晚会的意义，他兴奋的说：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晚本人代表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全体同志，举行这个联欢会，承蒙各位女士、先生，朋友们惠临参加，觉得十分荣幸，特愿简单地表达我们举行这个联欢晚会的意义。

首先，我愿意和到会的朋友们共同庆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

成功。由于政府和平建国国策的确定，由于全国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对和平建国信心的坚强，由于蒋主席对和平建国的伟大领导，与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的一致拥护，我们为统一、民主、和平、团结而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这真是一个空前的伟大成就。我们相信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将因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而日益长成壮大。让我们大家借今天的晚会，来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并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参加今天晚会的嘉宾中，我们特别要提到舒舍予（老舍）和万家宝（曹禺）两先生，因为他们已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聘约，行将出国讲学。舒先生在小说和一般文艺方面的成就，万先生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无疑地将是 中国文艺界乃至世界文艺界的光辉。这次舒万两先生出国讲学，我们相信他们两位必能为沟通中美文化而有重大的贡献。我们谨藉今天的晚会，欢送这两位文化使节，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本人还要特别表示欢迎的，是今天参加晚会的许多延安方面的朋友，尤其是新近来渝的朋友以及其他许多朋友们。前次本人奉命邀请毛先生来渝协商国是，曾先后两度赴延安，蒙延安方面各位朋友的殷勤款待，高谊盛情，迄未敢忘！谨藉这个机会表达衷心的谢忱。

最后，本人还要特别致意的，今晚在座的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可以说都是为革命建国而奋斗的先进。中国国民党五十年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就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现在对日抗战已经获得了胜利，和平统一已经奠定了基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有无限的远大与光明，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全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过去所已努力的，是已经获得了建国成功的保证！我们对历史，就是对我们列祖列宗及子孙万代，算是有了交代。我们愿藉今天机会，热烈地表示我们共同的欣慰和共同的祝贺！

今晚还是在旧历的新年中，我们欢聚一堂，喜气重重，真有不尽的愉快和兴奋，谨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快乐健康！

孙科、周恩来指出政协意义重大， 舒舍予、冯玉祥、莫德惠等表示欢欣鼓舞

张文白先生面堆笑容说完了举行这次联欢晚会的意旨之后，随即宣布进餐，主人忙着与来宾碰杯，台上台下，到处周旋，吃得满面通红。这时整个礼堂内洋溢着愉快的气氛，九盏水银灯光射在人们的脸上照出每个人欢欣的脸色。每个人心头，真是如张治中所述：“旧历新年喜事重重，说不尽的愉快欢欣。”三十五年来中华民国的纷争，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成功，已划了一条红线，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已经莫立了基础。今天这朝野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欢叙一堂，象征着新中国的诞生，这真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喜事，这个晚会实在不平凡。由于话剧《红尘白璧》的上演尚有一段时间，张文白先生利用了这段空隙，临时组织一个民主的晚会，节目由来宾自由提名。首先被请的是行将赴美的舒舍予先生。老舍先生还是不脱他幽默的老作风。他说将去美国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到美国去展览一下，说得来宾哄堂大笑，他郑重地说，这次能够有机会去美国，应该感谢“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在抗战八年中文艺界努力，未被政府与社会

重视，今天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中国已现光明，今后国家建设，文化建设应该与其它建设同样重视，不要再让作家们因贫病而死去。同时他又以无党无派的人民的身份向各政党要求尊重人民爱国的忠诚。最后他希望将来回国时，中国自由到想要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不管在南京或延安，都能够自由发表。

这时大家要求冯玉祥先生讲话，冯先生说，今天看到许多好友联欢，快乐很使他流下眼泪。政治协商会议有如此圆满结果，已使国家民族产生最好的希望。谢冰心女士被邀说话，也是为政协的成功高兴，她说，由于政协的成功，使她对任何人说话都感到踌躇满志。

孙哲生先生也是兴奋的被邀登台说话，他说：“政协的成功使大家欢乐，但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共的成功，或是说只是民主同盟、青年党乃至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成功，而是国民党的失败。”他说“事实不是如此，这正是国民党的大成功。有人或许以数目字来计算成败，会说国府委员要让出一半岂非国民党的损失？其实让出一半给国民党外人士是换得了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建设回来，这是国民党几十年奋斗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在五十年来各方面大失败中求得的。今天起才算是成功，是胜利。这种成功和胜利，不但是党派的成功，而是全国人民的成功，大家的胜利。”接着他又说：“今天做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靠大家努力，来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接着莫德惠先生讲了一段故事，叙述一个十四岁的东北孩子对祖国的忠诚，民族意识的坚强，与内地同胞毫无二致。

郭沫若先生被人提名讲话，他说他是一个文化小兵，今后检查制度取消，责任更重大了，因为过去写不出好文章，还有检查制度存在可作藉口，现在是不存在了。郭先生转而说到：各党派

也应有此责任重大的感觉，过去建国建不好有藉口可说，外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内而或可指责封建割据，或指责一党专政，所以建国不成，现在经八年抗战，胜利成功，不平等条约已取消，日本已打倒，对外藉口已生，政协成功，国内借口亦失去了。现在大家庆祝政协成功还应多想想自己的责任。

邵力子先生则特别赞扬主人张文白先生的坦白胸怀和公忠体国的精神。邵先生历举在去年秋间国共商谈中张先生的努力及“一·二八”纪念日陈铭枢与张文白两先生的互谦互尊精神为例，加以说明。同时邵先生又说到今天张先生不因自己未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而仍如此诚恳愉快来庆祝政治协商的成功，尤其值得感佩。最后并赞扬文白先生过去三个月所负重大任务的圆满完成。

邵先生讲完了，站在台上的张文白先生说：我还是拍手好？还是不拍手好？逗起来宾中一阵笑声。

周恩来同志这时被邀讲话，他郑重说明这次政协的成功是中华民国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其它各方面的成功，也是蒋先生继承中山先生领导的成功。今天大家企求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政协已给了我们。我们各党派间虽然在看法上，在方法上，在距离上有差别，但今天大家目标相同，就得互让合作。所以政协圆满结束，可肯定说这是全国人民，是国民党各党派是三民主义的成功。其次，他说，写在字面上的文字要去做，这就要有求其在我的精神，一定要自己坚决去做，去执行，去遵守诺言。今天不应只看着别人去责备别人或挑人之错，而是要自己努力去实践。我们一定本此精神去做，不折不扣的去实行，而且要超过它。他并且希望大家多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意见，来逐步实行政协的决定。最后他也称赞了张文白先生为奔走和平团结的努力。

最后讲话的曾琦先生也强调了政协的成功和各方互让精神。时间已经到了七点半，话剧要上场。这一愉快兴奋的晚会就到此结束，来宾们怀着欣喜转到抗建堂欣赏剧专公演的《红尘白璧》。

(原载1946年2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延安两万人热烈聚会，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昨日(三日)延安二万余人在空前热烈欢欣的情绪中,举行了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上午十时,各界人民涌向南关外,会场在一方里的广场上。中、美、苏、英四国国旗迎风招展。在人山人海十中十余秧歌队分头表演,村妇女的装束也引起了中外摄影记者的注意。他们打破了传统的习惯,在旧历元旦的后一天,就联合参加盛会。在秧歌活动了三小时以后,庆祝大会即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宣布开始,选出主席团后,即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总司令说: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朱总司令愉快地步至播音器前,他首先称赞国共停战以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使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奋斗的结果。(会场热烈鼓掌)总司令继续阐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的决议已经通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澈底实现。总司令并号召解放区的人民与军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要做极重要的工作。

林伯渠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实现 政协决议，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

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六十一岁的林伯渠主席，继朱总司令之盾登台讲演，他首先说：“中国无数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了一百年，和平民主的婴儿到现在诞生了，我是多么高兴，但想到许多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又增加了无限的感慨。”林主席回转身望一望孙中山的遗容，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他即追述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崎岖曲折的路程。他说：“在一九〇五年我和中山先生共同奔走革命，努力的团结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林老继沉痛地说：“（原文漏八、九字）辛亥革命夭折，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团结了一切革命势力。由于这种团结，方能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随即又因团结破裂，而使和平民主的婴儿又遭流产。”林老继说：“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为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经过了若干内战的时间，又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在边区及解放区（原文漏数字）政治……全国同胞赢得胜利，赢得民主的信心，同时我们要感谢美、苏、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援助，它们像催生婆似地，促使中国和平民主的婴儿早日诞生。”林老继说：“今后全国人民要加倍努力，保护这个经过千难万苦诞生的婴儿，使他不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好好长成起来，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政协决议，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我们边区在财政、经济政策上要更加减轻人民负担，更加发展人民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加强民主建设。给全国做出更好的榜样。

林老最后领导高呼：

拥护蒋主席实行改组国民政府。

实行和平建设纲领！

贯彻政协会议一切决议！

拥护各党派长期合作！

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万岁！（全场大鼓掌）

老教育家黄齐生说：共产党人愿意采取 和平斗争方式，为全国人民谋更多的利益

六十七岁的贵州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是长期为中国民主团结事业奋斗的老前辈。他穿着灰色的长袍，拂着银色的长须，在讲话中首先叙述自“五四”以来他与中国共产党接近的许多动人的事实。他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一个主持公道的人，同时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爱护者，因为共产党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黄老又说：我愿意对全国人士毫不夸张地说：我对共产党人的观感，在我与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主席及其他中共党员的接近中，我认识了共产党待人仁厚宽大，诚心诚意地愿与一切民主人士合作。共产党人愿意采和平斗争的方式，为全国人民谋更多的利益。共产党人从上到下，大都具有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许多工农干部努力学文化，尤令人感佩。”至此，黄老更加激动起来，他的两手也挥舞得更有力。他高声地说：“我认识了共产党，我就觉得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说光明的，我要向全国人民宣传这一个真理。”（全场大鼓掌）

（原载1946年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家口五万群众举行大会， 庆祝和平实现，政协成功

张家口市五万余群众于本月四日齐集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是日早晨，雄壮的子弟兵行列，整齐的群众队伍，和七十多个秧歌队，潮水似的从各方面向会场汇合，每一个人都流露着迎接和平民主降临的无限欢乐和坚强自信。上午十时许，十数响礼炮冲过塞外的寒空，大会即在五万人狂热欢呼声中庄严开幕。由参议会王力副议长主持，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致庆祝词称：“解放区军民为和平民主事业所作的长期努力已获得重要成果，晋察冀全体子弟兵竭诚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并愿努力使其澈底实现。边区政府宋劭文主席宣布在今年开端的伟大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中，边区即将举办四十万万巨额贷款，全力扶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全场群众立时鼓掌如雷，以欢迎民主政府这一贤明措施。邀请张家口执行小组的政府、中共与美方三代表登台，他们并肩立于扩音机前，由司仪一一向到会群众介绍。郝礼士上校代表该组致词称：“我们三人在一起和谐的工作，每一决议都由三方面共同参加一致遵行，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民这样欢欣鼓舞的情绪，我谨代表美国向兄弟的民主国家——中国致崇高的敬礼。”拥军模范何老妈身着崭新的黑棉袍登台，无限欢欣地说：“今后要紧跟着毛主席做

和平民主的大事，努力生产，努力识字，做国家的主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致电拥护蒋主席领导改组各级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并驰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散会后，四十余个秧歌队，鼓乐喧天，直到夜幕已降落，市民仍狂欢不已。

(原载1946年2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北平、广州学生 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此间学生二千人，今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大礼堂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人数拥挤，堂内座无空位，后来的人就地板窗口而坐。发表演说者有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张申府二人。闻此项庆祝大会直到上午十一时半始开成，缘事前之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要“借用”该校礼堂，礼堂内外并贴有彩色标语，问民主同盟“是否政党”及“对民主有何贡献”。昨日并有恐吓信出现。后来开会时有伪兵约五十人驻守该校大门，但因演说者措词温和，听众亦多守秩序，集会历三小时，并未发生事故。（联合社。北平17日电）

中山大学、国民大学、法商学院等大中学生二千余人，今晨十时在中大平山堂举行欢迎孙院长莅粤暨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发表宣言；谓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表现在（一）和平建国纲领。（二）组织民主政府。（三）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召开国民大会。（五）宪法草案问题五个大决议案上面。这些决议案的成功，是全国人民最宝贵的收获。下午二时复列队赴市迎宾馆谒孙院长请训。孙院长当即发表演说，评述协商会议情形，末谓学生负有建设时代之重责，宜奋勉学业，俾学成为国效劳。（中央社。广州19日电）

（原载1946年2月20、21日重庆《新华日报》）

成都十八团体集会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成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华西、燕大、金大等十八团体昨日(16日)午后一时许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请张澜等先生讲话，事前曾请治安当局维持秩序。

(原载1946年2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马来亚华侨集会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马来亚大霹雳安顺埠华侨二月七日举行庆祝祖国和平民主统一大会。大会发出通电，对国内和平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表示极大欢迎与拥护，并致电周恩来将军表示慰劳。又南洋霹雳人民委员会红毛丹分会李生、刘燦亦有慰劳电致周将军。

(原载1946年3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泰京华侨集会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旅泰华侨团体侨青会，职业公会等十余团体，假泰京新世界戏院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及中暹友好条约签定庆祝大会，中国代表团李团长铁铮派孙秉乾先生代表参加，孙先生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外参加者有泰国各党派代表，中泰新闻记者及侨领庄明华等先生，泰京侨胞到会者尤多，情况热烈，为泰京空前的中华人士集会。大会一致认为只有政协决议澈底实行，中国才有民主与和平，海外侨胞才有保障。

（原载1946年4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香港侨胞集会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人人欢喜。港九工团筹备庆祝大会，经一个多月，昨天(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中央戏院隆重召开了。参加的团体有三十余个单位：海员公会、电话公司、海员协进会、洋务公司、海军船坞、电灯公司华员、木匠总工会、电车公司华人存爱会、摩托车研究总工会、沙模新社、油漆总工会、邮政咏闲社、九龙船坞职工游乐会、印工业余憩庐、英美烟草公司、声韵社、古玩傢俬杂架工商总会、船艺工社、市政卫生职工及春秋业联谊社、筲箕湾渔民共进社青年部、学余联谊社、中华海员公会厦门分会、东方船厂、香岛中学、虹虹歌咏团、中原、建国剧艺社、惠阳青年会等，包括港九主要市政交通各重要部门的职工会。

主席致词：上午九时半开会，大会主席团由上述列举的最先的十一工团担任，总主席是电车职工华人存爱会欧阳少峰。他在致开会词中，首先申说这次大会召开，外间破坏分子散布许多有意中伤和毁谤的澜言，实在不值一驳。他说那些阴谋家不欢喜工人庆祝自己祖国走向和平民主，就用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来障碍大会的进行。但是，我们今天开成了大会。接着扼要的叙述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原因，并强调和平建国纲领上第六项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决定。

最后他说：“今天中国工人是觉醒过来了，我们认为对的，会一致去拥护，认为不对的，会一致去反对。”他号召各工友和全体侨胞，起来督促政协决定，要百分之百的实行，不许修改。

来宾演说，秩序单上预定邀请的国民党各驻港机关，司仪依次点呼邀请时，都告缺席。

民主同盟的几位负责先生也都讲了话：

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代表狄超白认为庆祝大会召开，充分表现港九工团爱护祖国、爱护和平。特别指出：“任何一党不能单独修改政协决议，政协决议如果不能实现，民盟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我们将不参加改组的政府和‘五五’召开的国民大会”。

民盟港九支部代表曾伟先生说：“民主同盟港九支部盟员愿意和港九各界人民团结一起，争取政协决议实现和忠实执行决议，并提出具体意见，强调工人团结一致争取民主实现的重要。”

在工人中德高望重的彭泽民老先生，叙述总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议之三大政策，当时也遭了許多人怀疑和反对。今天政协所作决议是破坏不得的。

胡守愚先生说：“独裁政治如果会成功，经过十九年独裁应该成功了，但不，这证明独裁政治一定失败。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主持之政协会议能够召开，就是独裁政治失败的明证。”

接着是工人自己发言，有女工代表、海员工友、咏新社工友，洋务工会工友。还有侨商马文辉先生演讲。

最后由主席团朱敬文致闭幕词，他说：“撞到死”不肯放的国民党死硬派，要破坏政协决议，但他敌不过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是要决议百分之百的实现的。

大会还通过了：（一）致蒋主席、毛泽东先生、张澜先生及政

协各代表电。(二)致中国劳动协会及全国工友电。(三)告全国同胞书。吁请各党各派全国工友、全国人民为保卫政协决议促使早日实现而奋斗，并请蒋主席迅速制止广东内战。最后由从内地刚抵此间的建国剧艺社和中原剧艺社表演歌咏节目助兴。至正午十二时三十分始散会。

(原载1946年4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 各界协进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 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举世关切的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了，协商的结果，尽管和我们的要求还有些距离，我们仍然要为这伟大辉煌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无疑的，正如中外各报所评论：这是一个不流血的革命。首先，足以亡国的内战的停止，就使我们免得再为毫无意义的冲突而流血；其次，蒋主席的四项诺言——保障人民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承认政党合法地位和推行普选，进行清算将近二十年的政争血账，刷新了挂了三十多年的民国招牌，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关于改组政府，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家化，改组国民大会和重订宪草等《五项协议》，开辟了国家建设的坦途和程序；在我国历史当中，实在是空前未见的杰作！

对于这辉煌伟大的成就，我们自然应该感谢主持会议的蒋主席，感谢为国辛劳的诸位代表，感谢国共两党及其他各党派社会贤达的推诚互让，感谢马歇尔特使的协助有方，然而同时也不能忘记基本的力量，还靠我们人民自己。本来历史上任何的革命，流血的也好，不流血的也好，都是由人民的呼声和努力而来的。一切政党的行动，都不过是执行人民的要求，任何友邦的协助，

也必须以人民的要求为根据，才能有效。不流血的革命然固是幸运的，然而也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检讨一下协商的成就，便会发现出来，那当中包含着多少已往的惨痛的呼声和血泪。掌握政权者，在此时代，也正不必以接受人民要求处于被动为遗憾，实际上一个民主的政权，本来是应该以能接受人民要求为无上光荣的。

我们更应该觉悟，今后由实行协议步入和平建国的坦途，依然需要人民的努力，而且需要更大的努力。我们一面希望各党派能以“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的精神，化除成见，改变作风，长期团结，同为和平建国而努力；一面更希望我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广泛团结，作为党派团结的基石，共同争取协议的澈底实现！

凡是中国人，只要良心未泯，决没有不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的。这些协议，不但为国家觅得光明的出路；而且也为全国每一个善良的人民觅得光明的出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荣誉军人、自由职业者、和教育文化工作者，固然都需要民主自由，和平建设；大部分的军官和士兵也需要妥善的退伍，重返家园做太平的百姓；大部分的公务人员也觉得人民比上司容易伺候，而需要民主。甚至大部分的特务工作人员也需要民主，从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做安居乐业的老百姓。看到《五项协议》而发抖而怀恨的只有少数逍遥法外的汉奸，贪污起家的官僚，鱼肉乡民的土劣，以至一些执迷不悟的法西斯残余。

“光天化日之下，不容魍魉现形”。时代是光明了，国际上反动的主力已经溃败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还能造反吗？我全国同胞在这时候，应该赶快团结起来，为保证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的澈底实现与和平建国的成功而奋斗。我们赢得了战

争，必然还可以赢得和平，赢得民主，赢得繁荣。

最后让我们一致高呼：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

向主持政协会议的蒋主席致崇高的敬意！

慰劳全体政协代表并致热烈的敬意！

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

迅速改组政府！

立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

切实执行和平建国纲领！

拥护政协会修改宪草原则，迅即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

迅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

立即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立即释放政治犯！

拥护蒋主席领导和平建国切实执行五项协议！

拥护各党各派长期合作！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澈底实施五项协议！

民主团结和平统一的新中国万岁！

（原载1946年2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 协进会等二十余人民团体发起举行 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圆满结束后，陪都各界人士莫不万分欢欣。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东北文化协会、重庆青年会等二十余团体联合发起，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如遇小雨照常举行，如遇大雨则顺延一周）。闻已柬请政协全体代表莅会指导，并请孙哲生、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勱、曾琦、胡政之、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代表演讲，现已分函各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原载1946年2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

国民党对 《政协决议》的破坏

(一) 制造“沧白堂事件”

一月十六日夜大批特务 捣乱政协代表讲演会场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第六天，也是蒋主席在开幕词中宣布了人民四项自由的第六天，而国民党居然驱使大批特务去捣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讲演的会场，并作出公然侮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行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讲演会，每晚除请代表讲演外，并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见。数日以来，情形极为良好，不料昨晚因国民党特务咆哮会场，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协进会拟将昨晚会场情形，函达政治协商会议及各代表，使各代表知道，截止昨晚人民还没有得到自由，昨晚的讲演就是一个例子，这证明人民没有集会的自由，没有听讲自由，连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也没有向群众作讲演的自由。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昨晚(一月十六日)第四次夜会改在沧白纪念堂举行，到会群众有一千多人(在坐的国民党的特务打手约一百多人不在此数内)。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介绍张东荪、郭沫若两先生讲政治协商会议昨日开会情形，在张郭

两氏说话之先，坐中就有特务发出吁吁之声，听众纷纷要求把“耗子”赶出去。

张东荪先生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兵，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张先生话还未完，台下忽然跳出了十几条壮汉，指着张先先说：“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几十条壮汉对着张先生同声齐喊，他们以打手姿态出现的这种行为，惹怒了张先生，张先生声色俱厉的说：“是党军，是国民党的党军。”除特务外，群众同声说：“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在群情激怒之下，特务这才不作声了。

接着是郭沫若先生讲话，郭先生的话使大家哄堂大笑了好几次。郭先生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郭先生在笑着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股杀气腾腾的样子。”郭先生续述及民盟、青年党及中共关于军事问题方案。

当郭先生讲到“今后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像现在这样鱼肉人民……”的时候，特务又在台下吁吁作声，郭先生稍停了一下，他向群众问了一声，是否愿意他讲下去，群众同声说：“请郭先生讲下去……。”然后郭先生摸了摸他的眼镜，对着他面前的那几条特务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

因为国民党特务的挑衅和有计划的捣乱破坏，讲演会就告结束了。

（原载1946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月十七日夜大批特务再次 捣乱会场、侮辱谩骂、叫嚣恐吓

大批特务昨（十七日）晚又捣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讲演会场，在会场狂呼乱骂，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口号，捣乱后成群结队呼啸而去。其情形比前日晚更为恶劣。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请政协代表讲演会，昨晚是第四次，仍在沧白纪念堂举行，由冯夫人李德全女士主席。原请曾琦、邵力子两氏讲演，因政治协商会议昨天散会较迟，曾琦请李璜代他与会讲演，李氏不久以前才由美回国，他报告美国人民对政治都极热心，一般美人对中国问题都极关怀。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的自由。他并报告了青年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各项提案的主要内容。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有极大的成功，使中国从此获得和平民主团结。李氏讲完话刚刚离去后。坐中特务，群起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挂羊头卖狗肉，民主你妈个屁，跟老子抬洋包袱的东西……”这时主席冯夫人即说：请大家守秩序，有意见到台上来发表。特务们便对冯夫人出以种种侮辱谩骂词句，并恐吓说：“再开会，老子要打死你狗彘的！”……随后即高呼：“散会，散会！”蜂拥呼啸而去。其时邵力子适趋车而至，协进会同人即到办公处将昨晚会场情形面告邵氏，声明根据前昨两天晚上的情形，证明完全是有组织的进行捣乱，并对在陪都所在地，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

期间，在人民团体请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讲演的会上，竟有这种妨害人民集会自由的事情，是使人深感痛心的。邵氏断然否认那些捣乱会场的是国民党特务。并说：他们喊口号也是申述“民意”呀。他劝协进会同人不要再开会了，他说：联合国大会也没有看见有“联合国大会协进会”呀！你们还是休息几天好。

最后，协进会同人仍向邵氏作许多解释，并请邵氏今日仍能蒞会讲演。

（原载1946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月十八日夜特务 又在会场包围殴打两青年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昨（十八日）晚在沧白纪念馆举行第五次夜会，请政协代表邵力子、王若飞两氏讲演。主席李公朴宣布开会后，即请邵氏讲演，邵氏声明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是政府及国民党的代表，因之他对目前社会上对国民党的几种认识，作了少许解释，他希望社会不抹煞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进行北伐，对日抗战的作用。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容共政策，并承认中共在参与北伐及抗战中的作用。他希望国是在和谐中获得解决，并坚信政治协商会议定能获有成果。

继即由主席介绍王若飞同志讲演，若飞同志说：政治协商会议为各方所重视，证明了大家对当前存在的国是问题的关心，我们也热烈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满足大家这种希望，而且我们也正为此努力。他说由于各方面的努力与人民的期望，内战总算停下来了，一切问题可以用政治协商来谋解决，同时蒋主席也宣布实现人民四项自由。内战的停止，人民基本自由的获得，将是保障中国走向和平建国的重要条件。这样的希望，正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接着报告今天政治协商会议进展情形后，若飞同志特别提及在国是问题协商中，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将是取得和谐团结及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协商中若能永具此精神，则问题将不难

求得解决。邵王两氏词毕后，听众相继提出问题多端，由邵王两氏分别予以答复。至十时半主席宣告散会。

昨晚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讲演会后，沧白纪念堂门前，仍一度发生扰乱甚至殴打事情，其时一位在会场发言的青年，刚走出沧白纪念堂门前，即被特务包围殴打，借口说他是扒手，该青年当时被打倒卧地，腹部受重伤，另一听众上前去扶持受伤青年时，不料也被包围乱打一通，头部也被打伤，其时适经邵力子氏折回拦阻，殴打才停止。

（原载1946年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月十九日夜特务 又在会场捣乱，乱扔石子伤人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六次晚会昨（十九日）晚仍在沧白堂举行，到会群众比往日还多。原请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三人演讲、张群、吴铁城二氏因事未到。大会主席章乃器先生宣布开会后，即由梁漱溟先生报告整军方案。梁氏在报告国共两方意见之后，提出民主同盟的主张是：军队应不属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并主张在三人小组之外，另成立一委员会，以整编全国军队，期能缩编国军到最低额，并妥筹退伍官兵的就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直到全国部队整编完成，并由文人真正管军的时候为止。在梁氏讲演中间，曾有五次被捣乱分子掷石子捣乱。记者亲在广场，见左石阶旁第一棵柏树下，由一身着西装大衣挂有证章的青年，先掷一石头作信号，石雨即狂击会场和房屋，致群众纷奔而出。但因群众关心政治情切，随即退回会场，报告照常举行。接着就有自称“提幼稚问题”者数人发问，都经梁氏作答。惟不久狂石又起，并有爆竹声夹杂其间，并狂呼各种乱七八糟口号而去。当狂石纷飞时，一闻姓青年的左眼受伤。又该会因政协大会休会，也暂行休会，今后并拟妥筹维持会场秩序办法后，再举行大会。（政协会议协进会新闻处）（原载1946年1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 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

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 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

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黄炎培、张申府二氏居室，于一月二十六日中午，无故被军警及便衣人员骚扰。政治协商会议犹未闭幕，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政协代表居室公然被扰，一般人民基本自由又安有保障？兹将事件经过及处理情形略志于次：

事 件 经 过

昨日(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突来宪兵一人，穿着灰色军服者一人，佩带枪枝之便衣一人，由户籍警察一人率领，并未通知办事人员，迨至菁园黄先生寓所，声称据报黄某藏有枪械，特来搜查。第一句话即说：“黄先生的枪在那里？”当即守住电话，禁止在菁园值工之练习生李国全与外界通话，一面翻箱倒匣，除将案

头之上海杜月笙来电抄录外，毫无所获。并留言声称：候黄某返寓时，再来搜查云云而去。当其搜查时，并剥开练习生李国全衣服，露出胸口，以枪口对准其胸，迫令招出“枪在何处”。李国全答以“黄先生没有枪”，该便衣人员更声称要将其抓去。宪警特务等自黄宅出来，闻黄在国府路三百号同盟代表团，即去该处寻找，在门口盘旋很久才去。事后，黄炎培氏即请内政部长张厉生氏同往菁园查明真相，途中因闻中共代表团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张氏即离去。张申府代表之居室，未被搜查，但亦有同上四人前来盘问。

同 盟 态 度

事件发生后，同盟主席张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当决定严重交涉，黄炎培代表并致书蒋主席请予查究。二十六日下午，本为综合小组开会，黄炎培、章伯钧等赶往参加，说明经过，并提出三点意见：

- (一) 此事关系虽大，但不愿妨碍大局。
- (二) 要求政府应予所有政协委员以安全保障。
- (三) 政府应立即颁布“人权保障法”，彻底保障人权。

当时孙科以主席资格表示道歉，并愤慨地说，这种行为是污蔑国民党，破坏国府信用，破坏蒋主席领导。政协综合组各代表均甚愤慨。

民主同盟对于此事件之态度，认为此不仅为黄张两代表之个人问题，亦非民主同盟问题，而系全国人民基本自由问题。张澜主席并谓：在全国人民基本自由不能获得前，一切协议均属悬

空。民主同盟一向特别重视人民基本自由，而今竟有如此事件之发生，诚为不可想象之事。

（原载1946年1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

(三) 炮制“较场口血案”

暴徒逞凶，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未能举行，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

为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昨天（十日）上午九时许，在较场口的大广场上，就站满了近万的群众。来得稍缓的队伍，站在较后的地方，从他们整齐的行列和鲜明的旗帜上，看出是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陪都青年联谊会、新华日报、国立艺专、育才学校、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等等民众团体，也有许多没有排队伍的市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站在那里，静候开会。在主席台上则坐着政协代表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曾琦、陈启天，还有马寅初先生。其他政协代表邵力子、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勱等也曾先后到达会场。主席团还有王葆真、章乃器、阎宝航、李公朴、施复亮、李德全、刘清扬、史良、曹孟君等人。当还未到开会时间，主席台的四周一些人就大声吵闹起来，要求迅速开会，同时台上也突然挤满了不知来意也不明来历的人，这些人

为首的自称是重庆市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随身带来了乐队、宣言和大会口号，一面夺占了播音器，一面就占据了主席台，就此宣布奏乐开会。为首的几个人还从口袋中掏出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自行挂在胸前，并把一位自称代表着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名叫刘野樵的推出致词，他的讲话引起台下人群一片表示不欢迎的声音。当原来大会筹备会决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及主席团章乃器先生和施复亮先生向前交涉，并提出大家应好好协商，不应妨碍原定的大会程序的进行时，突有人高呼：“他们扰乱秩序”，于是台上台下喊打声就相应而起。早在台上站着的十几个特务暴徒就包围起李公朴先生，一面打，一面拖下台去，李先生当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先生和原来主席团的一些人去拦阻，也都被打，郭先生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上，胸部亦被踢。施复亮先生更被多数特务暴徒拖打，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先生也被打了，准备下午为人证婚穿的马褂及长衫也为特务暴徒抢去。沈钧儒老先生亦被一群暴徒包围，因有不少青年护送，始免被殴。主席台上这些人的殴打，引起台下的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此时留在台上的还有数十个特务暴徒，一部分就一跃而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留在台上的暴徒，则把台上的许多长条木凳举起向人群中乱掷。据记者所见，掷木凳的一个暴徒穿的黑大衣上并缀有银色小证章。打完就跳下主席台，装着没事混入人群。这批特务身藏铁器及小石头，用以乱打手无寸铁的人民，当时情况惨毒残忍之至。有几位新闻记者，在台上目击惨状，想去劝阻，也被殴伤。由于这些特务暴徒在台下继续到处扩大行凶，冲向各团体原来排得很整齐的行列，劳动协会的一位职员和三位工友被打重伤。这时邵力子先生刚刚来到，他听到会场被破坏及发生血案情形，亦表示没有办法，旋

即离去。莫德惠先生也是迟到，看了这情景很难过，对人说：“难道庆祝政协的成功也要反对吗？”这时主席台上为首指挥行凶的几个人反而含血喷人地宣布“‘中国劳动协会’和‘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打人，破坏秩序”！一面又说还要继续开会。台下的群众目睹特务逞凶，蛮横暴戾，都悲愤不已，有的更是叹息不止！说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得了。随即大部散去，只剩下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和二三百特务暴徒。这个变了质的大会在刚打完了人的一群特务暴徒的稀稀落落的掌声中，又开了下去，没有人演讲，从台下拉上一个人来讲，说了很长的话，要点是在于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反对修改宪草。散会时，又盗窃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散会后，又在百龄餐厅招待记者，报告“大会被李公朴指使的‘特务’及育才学校和中国劳动协会破坏扰乱”的经过。随即在该处大排宴席午餐。

主席台上活动的人中，有做主席的刘野樵，是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此外还有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和李森荣、李克愚，还有国民党市党部的宣传科长庞仪山等人。

（原载1946年2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较场口暴行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昨天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被有指使的有组织的暴徒捣乱，大打出手，致主席团李公朴受重伤，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及劳动协会会员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受伤，《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及《大公报》记者高学遼被殴，其他不知姓名之被殴者尚有多人。结果，会被打散，暴徒霸占主席台，为所欲为。这样的事情，出在陪都所在，出在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令人悲愤无已！

《双十会谈纪要》公布后，我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提高，随后内战扩大，我国的国际地位立即降低了，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各国一致好评，曾几何时，又演出昨天这样破坏民主的暴行。只要是中国人，除非丧心病狂，谁不为之痛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痛心得很。推己及人，我们想国民党人会比我们感觉更加痛心。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考验。它考验了人民，也考验了政府。它考验了保证人民自由权利的价值，也考验了政治协商会议结果的价值。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日，作了四项诺言，其中一项，是保障人民自由。政治协商会议，在纲领中，在宪法修正原则中，都把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规定进去了。然而，从昨天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些有指使有组织的暴徒竟敢利用特殊势力，

在万目睽睽之下，公开破坏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应享受之自由权利，大打出手，这置政府之诺言于何地？！且置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于何地？！

我们于此事不能不加以分析。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会有一部分人感觉不快意，而且是反对的。但反对者要讲道理，凡讲道理反对的意见，应该倾听，不应拒绝，这是民主的真谛之一。不快意的事，也只能用理智来衡量，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因为不快意，因为反对，就要用特殊权威，大打出手，欺凌其所反对者，这还是专横独霸，有何民主可言？且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捣乱暴行，扬之中外，是为自己的团体增光吗？还是丢丑？是增强政府的威信吗？还是破坏政府威信？是拥护蒋主席吗？还是反对蒋主席？这不待智者自明，但为什么这一部分人的组织者竟敢如此这般做了？其根源在于这一部分人不是存心破坏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便是求快意于一时。属于后者，尚易促其觉醒，属于前者，则非单单解释和教育所能济事的了。因此，我们首先希望政府当局，对于这件事，为了自己的威信，也就是国家的威信，要认真查办主凶。这样，才能把整个政府整个党与少数破坏分子分别开来，把附从者与主使者分别开来，把可以挽救的人挽救过来。这样来解决问题，才是认真的，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相信政府诺言之价值，相信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协议的价值，相信国民党实行民主建国的能力，关系中外的视听，关系民主政治的前途，万万不应等闲视之。我们坚决请求当局，注意此点。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向各界同胞说几句话。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双十会谈纪要》以后内战扩大，这是一个曲折。政治协商会议后发生此次暴举，又是一个曲折。不能因为有这种曲折，就怀疑光明的前途，这样就会失掉

信心，就会消极起来。如果怀疑，如果消极，如果因此人民的民主力量不能增长起来，那是极少数破坏分子所喜欢的。现在，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不论那一个阶层，实在痛苦极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我们的出路既然如此明白，除了团结更多更多的人，唤起更多更多的人，齐心协力，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为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决议而奋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想头呢？李公朴先生说得好，“为了民主，不但愿意受伤，而且死亦甘心。”民主的战士李公朴先生，他的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为民主而奋斗的各党各派与无党派一切人们所共有的精神。

从昨天的事件看来，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一一实现，谈何容易，没有坚决的不懈奋斗，人民所受的痛苦就要延长下去。“提高信心，准备曲折，联合起来，努力奋斗。”敬以此十六字，作为一切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奋斗的人们的座右铭。让我们从苦斗中把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建设起来罢！

（原载1946年2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筹备委员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告书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参加各团体：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进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杂志联谊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华北政治经济协会、陪都青年联谊会、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中国木刻协会、中国职业青年社、育才学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社会大学、星海合唱团等二十三单位，顷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内容大要如下：

血案发生以前

首先叙述血案发生以前筹备的情形：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三团体，为表示人民对于政协五项协议的拥护，表示对于主持会议的蒋主席的崇敬，和对政协各位代表的慰劳，发起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我们为着要使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曾经举行三次扩大筹

备会。对于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均曾发给通知，且随时在报端披露筹备消息，但该团体等，始终未派人出席。大会决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会场系向警察局洽借。至九日夜间十时，突有市农会理事刘野樵，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四人，携带市农会领衔的并无团体公章的所谓八团体“公函”，至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申请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章氏当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致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自然也都会赞成的”。彼等表示：“通知仅有三个团体接到”。但再问以既接通知，何以始终未派人出席，则又支吾其辞。章氏当晚即商诸其他筹备委员，次晨临时多预备主席团标志，以便彼等参加。而中央社报道竟谓在迁川大厦公推刘野樵等为主席团，实属造謠，该社其他报道及对本会招待记者之经过亦多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淆惑视听，诚属令人痛心！”

血案的经过

接着，叙述血案的经过：

“十日晨八时许，会场内主席台上及周围，已有数百人占领，刘野樵及市党部委员兼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到场甚早；中医师公会李森普，市总工会李克愚，市妇女会理事长傅伯群等，亦随即赶到，陆续索取主席团标志，均一一发给。是时，尚未到开会时间，国民党政协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均未到，原经推定的主席团和参加团体亦未到齐，但刘野樵等即要求开会。同时布置在主席台上和周围的打手，也

鼓噪起来，要求立即开会。主席团同人章乃器婉言劝止，首先被打。旋而刘野樵、吴人初、李森普、李克愚、周德侯、庞仪山等即霸占播音机，宣告开会，刘野樵则自称总主席。本会主席因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表示，开会的时间和程序，须照筹备会决定办法，否则亦须协商决定，不能任意扰乱，即被打手围殴；李公朴被推至台下，拳足交加，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政协代表郭沫若劝请他们不要殴人，也随即被殴，台下打手同时即向劳动协会队伍进攻，台上打手并将条凳向该会等队伍抛掷，计被殴重伤的有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四人，《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劝令不必动武，也被殴打。还有一位姓赵的，为着掩护李公朴，也被殴伤，此外负伤和失踪的至少还有数十人，正在调查中。

劳动协会来的人相当多，因为接受了被打不许还手的命令，所以被殴重伤四人，但结果依然包围扭住了一个钻到队伍里的打手，名陈云鹏（第一次法院讯问时名叫陈云鹏，第二次改口自称系谢海南）身边带有卫戍总部稽查处信封，外注附五千元字样，内装盗用名义油印的口号多张，此人当由该会扭送法院。

至此，筹委会原推的主席团和政协代表曾琦、梁漱溟、罗隆基、陈启天、章伯钧、沈钧儒等亦相率被迫退出；邵力子、周恩来、莫德惠、张君勱、李烛尘等赶到，见此情形也纷纷折回。场内参加的筹备团体群众先后率队离去。刘野樵等领导打手数百人依然扮演开会！演说时，公然反对重订宪草的协议。他们预先准备好的盗用本会名义的告市民书和口号，继续在场散发（早先已曾在场散发），一幕文武配合的丑剧，即匆匆结束。临去时，还将张在会场上的红白布和桌凳，也一齐抢走。刘野樵自始至终均在会场。事后竟谎报受伤，实在是极下流无耻之能事！是日在场的，

除了中国新闻记者之外，还有许多外国新闻记者，捣乱情形，闻有一部分已摄入镜头。

当天下午，在《新蜀夜报》上发现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市渔会、市妇女会的广告，诬指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大汉”捣乱会场，殴打会众，该报还有一篇社评：“要求严惩捣乱会场的特务”，而且说刘野樵代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李公朴不应该阻止他当总主席！十一日的《新蜀报》上复发现该团体等的广告，竟把并未编列队伍，更未携带标帜的民主建国会会员也列入打手了！天哪！天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魑魅现形！”

血案的关键

并且，指出血案的关键，说明其为一种预谋：

“依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案关键的所在：

一、事前通知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派员参加筹备，报上也早已发布新闻，但均未见派人出席。直至开会前夜十时，突然要求参加，显系出我不意，使本会无法准备应付他们的阴谋捣乱。

二、以要求参加为辞，骗取主席团标志，进一步抢主席。

三、未至开会时间要求开会，显系恐怕参加本会筹备的各团体遵时而至，会众增多，会使他们的捣乱阴谋难以贯彻。

四、文角武角姿态不同，但同时要求提前开会，同时要求重推主席，同时软硬兼施，对付劝阻他们破坏秩序的人们。

五、被殴伤的均系本会事先推定的主席团同人及参加筹备团

体的职员和当时协同维持会场秩序的政协委员，事实昭然。

六、预先印就盗用本会名义的《告市民书》和口号。

七、以参加庆贺政协成功为名，发布反对政协协议的言论。

八、事后捏造事实，登报反咬他人，万目睽睽，欲盖弥彰。”

向全国同胞控诉

然后，向全国同胞提出控诉：

“我们向全国同胞控诉，要赶快一致起来，为着国家，为着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坚决要求这一个血案的迅速昭雪！”

几 项 要 求

最后，提出七项要求：

一、严惩主犯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谭泽森、李克愚、李森普，并彻底查究幕后的主使者及其他凶犯。

二、已经扭送法院的凶犯陈云鹏为本案重要线索，必须严究，并彻底追究卫戍总部稽查处所发给的五千元系何来源，做何用途。

三、严格查办维持治安不力的负责当局。

四、立即切实解散一切特务机构。

五、赔偿受伤者的一切损失及会场损失。

六、从速颁行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

七、国民党大多数贤良党员立刻起来肃清少数把持党务毁坏党誉的反民主的败类！”

(原载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 将举行庆祝政协和平胜利 大会给渝特区的报告

共产党及民主同盟等已定于本月十日在临江路迁川大厦举行庆祝政协和平胜利大会。届时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弱点，将大肆攻击及加以宣传。现渝市市党部对此事正向吴秘书长铁城请示对付办法中。

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特档）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 将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胜 利大会给渝特区的报告

查中共及民主同盟召开之庆祝政协胜利大会，原拟假临江路迁川工厂大厦于十日上午九时举行，现已改教(较)场口广场举行。闻本党同志届时准备以老百姓听众身份登台讲演，以宣传对宣传，予共产党以打击。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特档)

军统渝组就市党部紧急 会议指示对付庆祝政协成功 大会办法给渝特区的报告

续报中共及民主同盟筹备之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详情：

查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等筹备之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前报为“胜利”，请更正）大会，已决定于明（十日）晨九时在较场口举行。现重庆市党部已于今（九日）晨九时由方治主任委员召集各区书记紧急会议，指示对付办法，计为：每区发动平均约一千人，其中为党员及团员、团员组、社会服务队、党员组、宣传队，互相密取联络并规定暗号（明晨宣布）由市党部徐鸣亚、骆继常及中统局党团科王科长等三人联合指挥。宣传队专门反驳中共及民主同盟代表之讲演。至于服务队及宣传队行动，并由军警宪出动保护。又市党部领导之教育、渔会、医生（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妇女协会等十余人民团体亦均受市党部指示参加大会主席团，以便以人民身份代表本党发言，并以刘野樵为主动人。其参加之党员、团员，规定明晨八时到达会场。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特档）

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 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给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谨查本会于本年二月八日，因鉴于共党外围团体以陪都各界名义筹备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定期于二月十日在较场口举行。特召集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邀集地方若干忠实同志参加，共商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并谨将上项会议记录抄呈鉴核备查。

谨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组织部

重庆市党部第20次临时执行委员会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八日

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 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时间：三十五年二月八日上午九时

出席者：方治、汪观之、骆继常、王思诚、徐鸣亚、张兆、龙文治、陈介生^①。

列席者：刘野樵、樊元彰、朱其瑞、唐毅(东方白代)、李森荣、陈铁夫、谭泽森、李森普^②。

主席：方主任委员治。

记录：曹盛培。

开会如仪。

主席报告：

一、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日前闭幕，会议经过及成立之各项协议已志各报，兹不赘述。对此次会议结果，本党同志应强调宣传之如下：

^①方治，市党部主任委员。汪观之，市党部执行委员、民政局局长、市参议员。骆继常，市党部执行委员、市党部宣传处处长。王思诚，市党部执行委员、中统局二处处长。徐鸣亚，市党部监察委员。张兆，市党部监察委员。龙文治，市党部执行委员、社会局局长。陈介生，市党部执行委员、三青团重庆支团干事长。

^②刘野樵，重庆事农会常务理事。樊元彰，国民党重庆第二区党部常务委员。朱其瑞，中统渝调处科员。唐毅，重庆市警察局局长。东方白，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处处长。李森荣，重庆市木作业公会理事长。陈铁夫，重庆市参议员、市总工会书记长。谭泽森，重庆市总工会理事长。李森普，重庆市中医师公会理事。

——编者

(一)三民主义为各党派承认至高之建国原则；

(二)本党派深受各党派之推崇，誉为全国第一大党，并愿受本党之领导共赴建国大业；

(三)本党总裁已受各党派之拥护，承认为全国之领袖。惟协议中关于修改宪草一项与遗教所示相去甚远，本党同志应坚持三民主义之宪法不容修改。

二、本席曾建议中央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以宣传本党忍让为国之苦心及上述各点，未蒙照准。现共党外围组织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已筹备以陪都各界名义定于本月十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或会间将有反动言论及会后将有游行示威，要挟当局立即改组政府等行动。

讨论事项：

为共党外围团体以陪都各界名义筹备召开庆祝成功大会，定于本月十日上午九时在较场口举行。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战邪乱，请讨论案。

决议：

一、转变会议内容：

(一)参加大会主席团并争取总主席。由本市农、工、商、渔、教育、妇女及自由团体负责人持函向大会负责筹备人交涉请市各界人民团体参加主席团，并设法于大会开始时于与会群众中选出农会理事刘野樵同志为大会总主席。

(二)由本党擅长辩论之同志参加讲演。

1. 发言内容：

(1) 三民主义为举国公认之至高建国原则；

(2) 本党为全国第一大党，并被公认之领导党；

(3) 蒋主席为全国一致拥戴之领袖；

(4) 三民主义之宪法不容修改。

2. 发言技术：于发现反动言论之后即紧接发言予以驳斥。

3. 发言同志(略)

二、把握会场情绪：

发动党团员及服务队队员共六百名参加大会，遇有本党同志发言时鼓掌欢迎，并否定大会一切反动之提议；

党员二百名由陈干事长介生负责发动；

社会服务队队员二百名由徐委员明亚负责发动。

三、会场秩序之维持：

请东方白督察长派警到场维持秩序，遇有捣乱秩序事，迅予逮捕人犯。

四、其他：

(一) 遴选干练沉毅之同志担任大会司仪；

(二) 控制扩音器；

(三) 参加党团员及服务队队员应于十日上午八时前到达会场，并环立主席台前，俾于发生意外时保护主席团之安全。

散会

方治批示：

密陈中央，不必油印。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市党部档)

军统渝组就庆祝 政协成功大会情况 给渝特区的报告(一)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原定于今(十)日晨九时在本市较场口举行。该大会因事先由市党部暗中布置，并策动教育、渔会、医生(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妇女协会等十余人民团体将大会会场加以控制，并拟将农会理事会刘野樵推出担任主席；同时共产党、民主同盟方面则欲以陶行知担任主席，争取主动权。相互坚持不让，以致不能在预定之上午九时举行。延至十时，由党部布置之呼仪式人员宣布开会。行礼如仪后，刘野樵及陶行知均争相报告，陶行知被多人挡住，无法出面，刘野樵正开口报告时，即被育才学校学生首先哄闹，《新华日报》及社会部劳动协会从中协助，会场秩序顿形紊乱，呼打之声不绝于耳。《新华日报》人员当被哄散，该报工人二名被打伤由警察带走，劳动协会之会旗亦被撕毁，各党派分子遂不敢公开继续留在会场。其后由市党部布置之台下人员上台代表参加民众讲演，并通过《宣言》呼口号，勉强将大会完成。会中邵力子曾赶来参加会，结果亦被多人所包围，未能上台演讲。至11时许，即行散会。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特档)

军统渝组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情况给渝特区的报告(二)

由中共及民盟主持之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今晨九时举行。到会有中共及民盟分子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茅盾、胡风、陶行知、陶宝航、史良、李德全、曹蕙珍、周恩来等。新华日报、育才小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经济研究会均有大批群众出席。本党由市党部主持，由吴人初、刘野樵、李森普等6人参加该会主席团。中统局及市党部均派党团员组织社会服务队及宣传队出席对抗。吴人初、刘野樵力争主席团主席之主动地位，并由本党人宣布开会作司仪，刘野樵作主席。中共分子见主权已失，乃由李公朴宣布不开会退出会场，遂秩序大乱。首由(有)李公朴被本党台上党员驱逐下台，郭沫若(头部受轻伤)等亦即逃走，而本党同志仍继续开会。台下中共分子则大肆捣乱，秩序不佳，育才学生公然向主席台冲涌而来，主席台本党人员见势不佳，遂以凳子向下掷去，育才学生等即退下台。至此章乃器仍向群众演讲，亦被殴打，劳动协会亦与本党服务队同志有冲突。片刻，中共分子均已离去，会场空气即告平息。主席刘野樵已退走。本党吴人初为负责人，亦不敢露面，后由司仪以民主方式，希望听众上台自动演讲。时邵力子到会即被中共分子包围。嗣由沈钧儒报告会场情形，乃同伊他去。至十一时许散会。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渝特档)

中央社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报导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昨晨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各界民众三千余人。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领导开会如仪后，会场即发生纷扰。刘野樵、李公朴等受伤。施复亮继续开会，通过《宣言》，至十一时许散会。兹将详情分志如下：

该会筹备已久，实际负责筹备者为章乃器、李公朴等。至前晚在迁川大厦章乃器处，商定大会主席团人选，为市农会代表刘野樵、市总工会代表谭泽森、市商会代表周德侯、教育界代表吴人初、妇女界代表傅伯群，及各界代表阎宝航、章乃器、古铎、李公朴、张冕、李德全、李森普、史良、施复亮、黄次咸等。并邀请郭沫若、邵力子、周恩来、李烛尘、沈钧儒等参加。

昨晨九时许，参加大会民众即陆续到达。计劳动协会约四百人，育才学校约八百人，《新华日报》百余人，市农会总工会市商会等团体约二千余人。

九时半开会，主席团章乃器提议由李德全为总主席，而周德侯则以扩大器向会场报告谓：“我国农民较多，提议以农民代表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鼓掌表示赞成。刘氏立即宣布开会，领导行礼如仪。在致开会词时，李公朴以刘氏不应充任总主席，阻止刘氏发言，并夺去刘氏手中之播音器。一时台下哗然。民众纷纷拥

上主席台，秩序大乱，互相殴打。刘野樵、李公朴均头部受伤。朱其瑞手部、施复亮腿部、郭沫若左额亦略受微伤。是时宪警赶至排解；并保护沈钧儒、郭沫若等出场。李公朴就医市民医院。刘野樵亦因伤退席，由周德侯代理主席，继续开会。市民数人致词后，通过《宣言》，高呼口号散会。

会后，刘野樵即假百龄餐厅招待记者，报告被殴情形。略谓：“本市农工商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前晚被推为主席团。昨晨开会时，不料劳动协会会员，育才学生参加殴打，致主席团李公朴先生及本人等均被殴伤，诚为不幸。过去沧白纪念堂选被捣乱，证以今日之纠纷，即可知事实的真相。”并谓“市民黄建辉目睹秦虎、谢雅南被劳动协会会员逮捕，是谁蹂躏人权，亦可明瞭”云云。记者旋赴市民医院探视李公朴、李氏头部裹扎纱布，已步出医院大门。是时罗隆基、周恩来等一行亦赶至医院，见李氏出门，罗等复挽李入院。记者就询该医院医生石连生大夫，彼特签证明如下：“患者李公朴，住院号：“八一八四”，江苏籍，男性，四十六岁。查系患有头皮裂伤一起，长约二公分，此证。“又据该院事务主任尹恭震称：“郭沫若、施复亮及劳动协会受伤者四人亦曾到医院检查并透视，因受伤轻微经诊治后皆即离院。下午三时该会在中苏文协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李德全主持。首称：“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经本市二十余团体之筹备，支出费用四五十万元，不图今日在较场口开会时竟遭暴徒捣乱，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诸先生。大会筹备委员会曾推出章乃器先生为总主席，乃今日开会时，刘野樵自任主席。关于大会经过情形，现请本会干事及章乃器先生分别报告。”章乃器于报告大会经过后继称：“本人对李德全先生报告大会筹备委员会曾推出本人为总主席一点，加以更正；本人并非总主席，不过为主席团中被推

首先发言之一人 本会事前曾柬邀陪都各界参加。乃前日夜十时许，市农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数团体代表，来敝寓持公函一件，请求加入大会。本人以此次即系陪都各界共同庆祝，则凡属陪都人民均可参加。不料今晨开会时，突来暴徒多人，步上主席台，占领播音器，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李公朴先生以主席系由筹备会推出，临时何能再举主席，遂上前拦阻，乃被击伤，致成一场纷扰。”章氏词毕，一致主张迅即向本日受伤者慰劳。

又：昨会场失踪之秦虎，至夜未明下落。

本报讯：昨日傍晚记者赴重庆地方法院，见头部受伤之李公朴，额部受伤之刘野樵，眼角受伤之陈培志（中国劳动协会教育干事），及伤势较重之谢雅南（朝天门码头运输工会干事）等八人均在验伤。六时半，李由史良律师陪同出院；谢则因被诉听候交保。渠于待保之前，以微弱呻吟之声语记称：渠乃于上午十一时被中国劳动协会参加大会之行列中人抓至大梁子美工堂，先拘于楼下，经多人拷打，并加搜查，后即上楼由该会附设诊所包扎，旋送法院，前后被拘时间为四小时。此种非法行为，本人日后拟自诉控告该会，以使人权获有保障。（中央社）

（原载1946年2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

重庆各报记者四十二人 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

径启者：关于二月十日重庆较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发生不幸事件，我等目睹暴行，同业且有数人横遭殴打，际此蒋主席宣布“四项诺言”及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不久之时，陪都竟发生如此摧残人权，侵害人民自由事件，群情愤慨，我等也感痛心。

顷阅贵社对此事件之报导，颇有失实之处，如：

一、肇事原因起于主席团上争议。缘大会总主席问题正由主席团洽商推举之际，刘野樵即擅行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拟上前与之洽商时，即遭暴徒毒打，惨剧因此而生。贵社所云：“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与事实显有出入。

(二)此次不幸之事件发生，系暴徒事先早有计划有组织之布置。彼等事先已准备《大会宣言》，“口号”，身怀铁器碎石，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宪警无力阻止。贵社云“民众互相殴打”，亦与事实不符。

贵社为全国性新闻发布机关，影响所及，谅非浅鲜，本新闻纪事应求真实原则，同人等爱护贵社，敢竭愚忱，略尽数言，幸垂亮察。

此致

中央通讯社

重庆各报记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菲北	王涌洋	王少彦	石西民	何乃迪	成文辉
汪琦	李亚群	李康	吴茂陵	姚江屏	邵嘉陵
周亚君	胡星原	胡作霖	梁柯平	高汾	高集
高学逵	徐克立	程光锐	浦熙修	陆慧年	郭明远
曾敏之	乔章棣	陈荷夫	张孟恢	廖毓泉	潘世征
邓蜀生	温田丰	钦本立	曹锡珍	韩辛茹	毕群
刘火子	刘迪明	黄克夫	阚岳南	林松	孙问章

二月十一日

(原载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重庆新闻从业员二二一人 关于保障人权，忠实报导的意见

我们同为重庆从业员，抗战军兴以还，坚守宣传岗位，为抗战国策竭尽绵力，爱护国家，爱护政府。胜利之后，河山光复，尤以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蒋主席四项诺言宣布，国家和平统一民主团结已奠立始基，宪政民主之实现即在眼前，国内国际同声赞扬，我们尤感兴奋。詎料在此团结和谐之空气中，竟在陪都层出反民主反和平之怪现象，沧白堂被捣于前，较场口惨剧踵起于后，人民集会自由顿失依据，尤以较场口事件最为严重。暴徒有计划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于光天化日之下，殴伤大会主席团李公朴、施复亮等，并殴辱被邀参与大会之政协代表郭沫若及与会名流群众马寅初等十数人之多，逼使大会流产。当时铁石横飞，军警袖手，此种暴行，重庆大公、新民、世界、民主、新华、商务、国民、南京诸报均有忠实报道，无庸赘述。日来社会愤慨无已，对惩凶缉凶，保障人民权利等等，迄今尚无有效处理办法。沧白堂被捣事件迄今，时逾一月，暴徒肆意横行不已，若不立即制止，政府威信国际地位俱受影响。而中国民主宪政之前途，诚不胜忧戚。我们本诸爱国忠诚向政府呼吁，从速查明真相究办主凶，确实保障人权，务使蒋主席四项诺言不蒙尘污，以昭大信于国人，中国和平民主之前途实所依赖。

其次，较场口惨剧，受伤受辱者，皆为中国民主宪政而奋斗之人士，新闻记者中亦有大公报高学遂，新民报邓蜀生、姚江屏，商务日报梁柯平无辜被殴，我等敬表恳挚之慰问与敬意。

复次，自朝野倡导民主宪政以来，各地不幸事件接踵而起，先有昆明成都学生运动之惨剧，与重庆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同遭特权摧残。事件发生之后，最令痛心疾首者，莫过于新闻记载之混乱纷歧，少数新闻机关与人士，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以报导国人，此等现象出诸新闻界中，我等深感羞痛。即以较场口事件而论，虽万目睽睽，指暴为善，黑白颠倒之报导，公然出现，我等诚不明用心何在。夫新闻记事，不问个人立场观点如何，惟报道真实乃新闻记者之天职，亦为新闻记者应有之道德，妄自执言，是非颠倒，于记者为失去记者身份，于个人亦失个人人格，诚为智者所不取。我等愿本一贯之精神，以忠实报道新闻自勉，而对报道失真之同业，除表惋惜外，亦期善纳忠谏。甚望重视个人立言，对国家对人民所负责任之重大，勿囿于个人局部利益为幸。此外，政府既宣布新闻自由，应确实尊重，宣传指导机关直接间接对新闻自由之干涉，亦望立即停止。

更有进者，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为政府与人民一致之愿望，亦为国际潮流所趋，无可阻止。暴徒反民主之行为，决无前途。人人皆知，为暴徒张目之报道，除鼓励暴徒制造惨案，直接增加人民之愤懑、间接损政府威信之外，有何结果可言？为人民自由权利与夫政府威信计，对此种作风，我等诚不能不加以谴责。

我等热望和平民主之实现，目睹当前纷扰，不敢缄默。上述数项，皆出诸衷心，以供邦人君子之参考。倘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宪政常轨之建立，则幸甚矣。

重庆新闻从业人员：

王国华、王孚庆、王志俊、石西民、甘泉、田伯萍、成文辉、何鸿钧、李康、李亚群、姚江屏、胡乃琨、梁柯平、汪琦、俞和荪、周亚君、胡星原、胡绳、高汾、孙问章、邵嘉陵、林岚、胡作霖、范剑涯、钦本立、章汉夫、陆慧年、乔木、陈理源、温田丰、张孟恢、徐克立、浦熙修、毕群、陈翰伯、乔章棣、张子英、潘梓年、廖毓泉、熊瑾玎等二二一人。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张 钧 陶

一九四六年初，在旧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重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革命激流中，发生的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重庆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的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这次会议，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以期实现各党各派和平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尽管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为基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训政”，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会谈纪要》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后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召开了，蒋介石并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各政党在法律

• 本文根据文献档案、报刊资料和有关回忆文章综合整理而成，由张钧陶执笔。
——编者

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的四项诺言，还在当天发布了停止内战的命令，而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在会议的酝酿筹备期间，就玩弄两面手法，妄图破坏会议。

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重庆各界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蒋介石对此极力干扰破坏，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就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政协会议刚一闭幕，又制造了举世震惊的“较场口事件”，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就开始了。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成立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是在旧政协开幕之次日，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成立的。这天晚上，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三个团体邀集各界代表，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政协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关于政协会议进展情形的报告，商讨成立了协进会，响亮地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选出了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三十五人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联络、新闻三处，秘书处由胡子婴、章乃器负责；联络处由罗叔章、曹孟君、李公朴负责；新闻处由田钟灵、温仲六负责。协进会决定：(一)在政协

议进行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二）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协进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活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从一月十二日到二十七日，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到会群众十分踊跃，由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三千多人，包括各行各业，相当广泛。“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是为了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促其彻底实施，于一月二十日下午召开的，参加大会的有两千余人。由李德全、刘清扬、史良、钟复光、茅盾、杜斌丞、王葆真、章乃器、阎宝航、施复亮、李公朴等十一人组成主席团。李德全致词后，冯玉祥、陈铭枢、王若飞、郭沫若、谭平山、邓初民、刘清扬、罗隆基等相继发表演说。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要求得和平就是要停止内战，但停止内战，仅使国内和平得到初步的保障，一定要有长期的和平，全国才能进行建设。要争取长期和平，永久不发生内战，首先要实现蒋介石口许的四项诺言，同时，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促其兑现。大会还通过了王葆真和许多听众提出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的提案。

协进会开展的这些民主活动声势很大，充分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切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成功的意愿。对开好政治协商会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民党对沧白堂民众大会的破坏

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时期，国民党政府军统局已成立“特别工作组”，专门搜集那个时期的政治情报。协进会成立后，

陈立夫当即密令重庆市党部，密切注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给法币四百万元，以每人每晚两千元的代价，雇用一批特务打手对各界民众大会进行捣乱破坏。这一破坏活动，由中统局二处处长王思诚负责指挥，中统陪都实验区情报科长罗锦棠、行动科长朱翔之等现场闹事。

各界民众大会总共开了八次，前三次是在江家巷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因场地较小，听众很多，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接纳更多的听众，从第四次起就改在沧白堂举行。沧白堂全称是“杨沧白纪念馆”，座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巴县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各界民众大会改在沧白堂举行以后，参加群众更为踊跃，每次总在千人以上，特务的捣乱和破坏，也就愈益加剧。

在合作会堂召开的第一次各界民众大会，是一月十二日晚举行的，由章伯钧作报告。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尚在协商议程阶段，章伯钧作了简要介绍，并讲了他对和平民主的一些看法。听众对政协会议提了许多意见，希望政府改变经济自杀政策，取缔特务机关，废除党化教育。保障人身自由。第二次大会于十四日晚举行（十三日是星期天，政协休会，民众大会也没有举行）。当天是政协开始讨论具体问题的第一天，民盟代表罗隆基在民众大会上报告了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六项办法，和他对那些办法的意见。许多听众纷纷要求开放政权，立即释放政治犯，取消中统、军统，审判汉奸，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第三次大会于十五日晚举行，民主同盟代表张申府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作报告。张申府申述了制定《和平建国纲领》的重要性，李烛尘报告了将向政协提出“国农民工”的经济方案。参加大会的许多职业青年提出：以各界民众大会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取消限制斯诺、爱金生等六名外

籍记者来华的决定；致电蒋介石立即实现四项诺言，撤销各级三青团，撤销学校内部的国民党党部，废除新县制和保甲制，谴责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纵容日寇、谄媚敌伪的可耻行径。这几次大会虽然都有特务流氓混在会场，发嘘声，掷烟头，进行骚扰，但由于群众情绪十分高昂，并未能阻挡大会的热烈进行。

各界民众大会从第四次起于十六日晚改在沧白堂举行以后听众越来越多。由阎宝航主席，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当报告人讲到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就跳出十几个特务打手，狂叫“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听众十分气愤，同声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把邪气压了下去。郭沫若对着在场的特务说：“今天上午政协是讨论军事问题，会场倒是一堂和气，并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但当他继续报告时，特务又狂呼乱叫。郭沫若愤怒地呵斥面前的几个特务：“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为啥要这样？”说得特务哑口无言。但报告终被打断，大会未能终场。

第五次大会于十七日晚举行，由李德全主席，原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作报告，因当天政协散会较晚，曾琦托李璜（青年党负责人之一，不是政协代表）代讲。李璜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成功。特务就狂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之类的口号。报告人讲话后，特务更谩骂“民主你妈的屁！”等等。邵力子在李璜讲话之后才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经很乱。大会主持人向他说明特务捣乱情况之后，他劝协进会不要再开会了。这次大会又被特务捣乱而中断。

破坏特别严重的是第六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于十八日晚举行，李公朴主席，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

告。邵力子在报告中要大家不要抹煞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进行北伐和对日抗战中的作用，希望国事在和谐中解决。中共代表王若飞提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地解决。王若飞在会上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实质，就是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这时，中统专员刘俊山等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打去，会场秩序大乱。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奔向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奋不顾身，把王若飞护送上轿车，直送到沧白堂大门之外，让汽车安全驶去。不少群众因此被石头打伤，一个在会场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即被围殴，腹部受伤，另一群众前去扶助，也遭殴打，头部受伤。特务无法无天，广大人民群众无比愤怒。

第七次民众大会于十九日晚举行。由章乃器主席，邀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到会作报告。张群、吴铁城因故未到。梁漱溟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应该不属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梁在讲话中，特务打手五次甩石块、放爆竹，致使一个青年左眼受伤。鉴于特务破坏有增无已，加之政协会议即将进入分组讨论，协进会决定在谋得维持会场秩序的妥善办法后，再定期举行。

一月二十七日，政协分组讨论已有眉目，协进会举行第八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于下午二时在沧白堂召开，到会军民计达三千余人。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仍未到会，首由中共代表王若飞讲话。他说：经过这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草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基本一致，这是一大成功。而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住宅却受到非法搜查，说明四项诺言的

执行，仍甚缓慢。王若飞讲完后，由郭沫若作报告。郭沫若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虽已拟定，执行还待大家努力。大会通过了两个提案：（一）以大会名义致函黄炎培及其他同样遭受无理搜查的政协委员，表示慰问。（二）向前来保护会场的宪兵、警察致以慰劳之意。在大会进行中，仍有特务喧哗、谩骂。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几十个特务打手破口大骂，不准再讲。会毕，郭沫若走出大门即被特务打手包围辱骂，尾追至迁川大厦（即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郭入内休息，特务仍围而不散，郭沫若离开迁川大厦，前去参加张君劭寿辰茶会，走到路上，特务又甩石子打他。李公朴从沧白堂到迁川大厦，一路上也挨了特务甩掷的石块。

在协进会举行民众大会的同时，民主建国会举办了三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第一次是一月十三日在迁川大厦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黄炎培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主讲。第二次是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在迁川大厦举行，由社会贤达代表缪云台和左舜生、何永信主讲。第三次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沧白堂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劭报告宪草协议。这些讲座，也同样受到特务流氓的骚扰。

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捣乱会场，还非法抓捕和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协进会新闻处成立后，曾于一月十四日下午在迁川大厦，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主持，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交换有关新闻报导等方面的意见。新闻处逐日报导了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的捣乱行径，载诸报端，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一月二十四日晚，新闻处负责人田钟灵夫妇与新闻处记者李学民工作完毕，到青年路北平爱仑餐厅吃了晚饭出来，走到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适逢停电，跟踪的特务十一二个，

蜂拥而上，将他们一起包围，妄称：“奉令逮捕，请值价点！”李等严词峻拒，暴徒遂行凶殴打，李学民受伤十余处。群众闻声而至，特务才狼狈逃走。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毒打李学民事件，激起了山城人民公愤。协进会于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假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李德全、田钟灵夫妇和沧白纪念堂管理人分别报告了连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揭露和控诉特务妄图非法捕人和毒打伤害他的罪行。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等相继发言，对“沧白堂事件”严正抗议。各报记者甚表愤慨，都在报上详加披露和谴责。各界人士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田钟灵、徐守贞等陆续前往医院，对李学民亲切慰问，表示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一阵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更加激起了社会各方人士的愤怒谴责，要求实现四项诺言的呼声越来越高，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斗争愈益蓬勃发展。一月二十四日，陪都教育界、文化界人士茅盾、陶行知、邓初民、曹孟君、侯外庐、洪深、冯雪峰、郑君里、黄洛峰、李公朴等七十余人集会，由政协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报告了分组会议情形，一致通过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选出侯外庐、邓初民、葛伯赞、陶行知、茅盾、李公朴、冯乃超、郑君里、司徒慧敏、叶浅予、黄洛峰、曹孟君、倪貽德等十七人为理事，巴金等四人为候补理事。一月二十五日，沙磁区中央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校、中大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彻底执行停战命令，彻底实行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反对官僚资本，严惩汉奸，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现国内团结统一和平民主。受到正在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和

邵力子、莫德惠、陈启天、张君勱、孙科的接见。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绕城一周。扩大了影响。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期间的斗争

旧政治协商会议经历二十一天的反复斗争，终于就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协议，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

为了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贯彻实施，二月二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十九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劳动协会等有关团体的赞同，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进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杂志联谊会、出版事业联合总处，华北政治经济协会、陪都青年联谊会、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中国木刻协会、中国职业青年社、育才学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东北文化协会、中国学生导报社、星海合唱团、中国劳动协会、音乐艺术社、社会大学等二十三个团体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

筹备会成立后，公开发布消息，发出通知，希望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筹备庆祝大会。五日下午五时，筹备会负责人章乃器约同黄墨涵亲自去市商会理事长仇秀敷家中，递交了给市商会的通知，并要仇秀敷转邀市农会、市工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等派人参加筹备。六日、筹备会举行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九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

市商会等八个团体都未派人出席。参加筹备会的各个团体经过反复协商，一致决定庆祝大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举行。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徐崇林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柬请全体政协委员莅会指导，并请政协委员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勱、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到会讲话。筹备会印制了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告全国同胞书》，以备散发。并向市警察局洽定以较场口广场做大会会场，拨出经费四五十万元，连夜赶筑大会讲演台，布置会场。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防止破坏捣乱，除函请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外，还由社会大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中小工业联合会等团体，分别发动所属成员到场协助。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发布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密谋策划。这场破坏“为CC方面所为”^①，是“中统局所主使”^②。先由陈果夫、陈立夫驰赴林园，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陈果夫素稔蒋对这类事情，若不否定，便是默许。陈立夫便亲自出马，约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中统局付局长叶秀峰等面授密谋。二月六日，陈立夫发出指示，要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来破坏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二月八日，方治召开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委会，专门研究对付庆祝大会，作出四项决定：（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讲演。（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六百人参加大会，党员二百名由市党

^①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军统局渝特区对情报的签批》。原件重庆市档案馆藏。

^②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军统渝组就较场口事件的处理给渝特区的情报》。原件重庆市档案馆藏。

部组织科负责发动，团员二百名由陈介生干事长负责发动；社会服务队队员二百名由徐鸣亚委员负责发动。（三）请警察局派警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十日上午八时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台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①。接下来，就由市党部执委吴人初拼凑出九人“主席团”；由市党部宣传处长骆继常、社会服务总队宣传组长吴熙祖复活久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市党部和中统局共同领导的社会服务总队负责行动任务，由总队长龚曼华、行动组长郑蕴侠负责调配人员、检查武器，作好行动准备。二月九日，庆祝大会的头一天，军统局付局长戴笠电话通知市警察局局长唐毅、督察处长东方白：中共发动的庆祝大会，对我不利，市党部要去破坏。那天晚上，重庆卫戍司令王缙绪也向军警宪负责人作了类似的交代；为破坏大会胜利召开作了“暗中布置”。^②

国民党反动派部署停当后，便向筹备会发起挑衅。如前所述，国民党控制、御用的市农会等八个团体，事先决不参加大会的筹备会议，及至大会召开前夕，九日深夜十时，中统特务刘野樵、谭泽森、古铎等，携带由市农会领衔而未盖公章的“八团体公函”，来到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声称“要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章即表示：“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函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刘野樵等诡称“没有接到通知”。章乃器当即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同时答应向筹备会转告他们的来意。当晚，章即商诸其他筹备委员，决定多预

^①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十次临时执委会会议记录》，原件重庆市档案馆藏。

^②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军统渝组就庆祝大会情形给渝特区的情报（一）》。原件重庆市档案馆藏。

备几张“主席团”标志，以便第二天接纳彼辈参加。但是，弊端既启，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大破坏。

较场口血案的真象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订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全市欢腾，人心振奋。远至一、二百里以外的学生，许多住在乡下的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头一天就赶到了城内。郭沫若偕同夫人、保姆一家六人前来参加。有位画家，一大早就携带画具，来到会场，选定合适的位置，准备描绘动人的画面。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群众队伍，按时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有一万余人。政协委员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勱、曾琦、陈启天、莫德惠、邵力子、李烛尘等十多位均将应邀莅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是当时罕有的。

大会规定九点半开始，八点刚过，政协委员和筹备会推定的主席团尚未到达。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理事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公会理事古铎，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理事李克愚，市律师公会理事张冕，国民党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七八百人，抢先进入会场。以二十多人为一组，分三十多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到主席台上。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人跑上主席台，气势汹汹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霸占讲台。

当筹备会推定的总指挥李公朴一到，甫经介绍认识，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答待主席团到齐后共同商量。刘急不可耐，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同章纠缠。正谈话间，刘身旁窜出几个打手，对章破口大骂，向章劈胸一拳。这时，他们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同声吆喝，喊叫：“开会！开会！”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等出面劝解，同时与刘磋商总主席的人选。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推定的是李德全；刘野樵提出吴人初，吴人初提出刘野樵。尚未商定，周德侯即在扩音器上对台下吼叫：“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接着就悍然宣布开会、奏乐、唱党歌、读总理遗嘱，叫刘野樵讲话。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严辞抗议，正站在台口的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李刚走到台前，即被特务打手包围，拳脚交加。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流氓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主席台下，胡子被扯掉许多，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如注。郭沫若以身护李，大喊：“请勿打人”，也遭毒打，眼镜都被打落。幸由中国妇女联谊会负责人朱宝粹拾起，日后才送还给他。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准备去吃喜酒穿的马褂也被剥去，文稿也被抢走。施复亮被追打到会场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还不丢手，适逢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到达，才用车把他接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亦受暴徒追逐，赖有十多个青年、记者护卫，走到油市街（今中华路）国民参政会门前，幸遇来参加大会的朱学范驱车经过，才将沈老送了回家。当时在李公朴、陶行知身侧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途，《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必动武，均遭到毒打。与此同时，台下的特务打手对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的队伍也不放过，见人

就打；该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恩、顾佐衡等身受重伤。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打手特务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家伙蓄意制造事端，事先就准备了铁条、砖头，恣意逞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六十多人。他们制造了一场破坏《政协决议》，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大血案。

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已经打起来了，目睹惨状，他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育才学校留在校中的学生，闻讯赶来，才把几十名伤员护送去金汤街市民医院救治。在这样的形势下，筹备会原推定的主席团和邀请到会的政协委员曾琦、梁漱溟、罗隆基、陈启天、章伯钧等只好纷纷退出会场；当时尚未进入会场的政协委员莫德惠、张君勱、李烛尘被阻留在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没有办法，自行离去。参加大会的广大群众，对此莫不气愤万分。中国劳动协会许多工人弟兄义愤填膺，几次要冲上去，经过领队的再三劝阻，才同其他团体一道，率队离开会场。

至此，会场上只剩下二三百特务暴徒，刘野樵伪装受伤，周德侯盗用大会名义，冒充代理主席，由即将赴任的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党部组织科长，中统特务朱其瑞冒充民众代表，凭着重庆市党部宣传处预拟的讲稿，照本宣科，大肆诬蔑攻击《政协决议》，攻击共产党。然后通过所谓“宣言”，一直闹到十一点半钟才草草收场。又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最后窜到大梁子（今新华路）百龄餐厅，由刘野樵拉了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记者串演了一出所谓的记者招待会，反说他被“特务”打伤。然后满酒块肉犒赏一顿。

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的举国瞩目政协会议通过的各

项决议，并一手制造的“较场口大血案”，便轰动全国，震惊中外。

革命怒潮汹涌澎湃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即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等物，赶赴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在较场口血案中，许多中国劳动协会会员同特务打手作了坚决斗争，为了防止特务谋害，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该会负责人朱学范当晚经护送离开重庆。晚上八时，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同到会的政协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钧、沈钧儒、张君勱、梁漱溟、张申府、罗隆基、陈启天、李烛尘共十一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接受大家委托，决定与张君勱、陈启天、李烛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而蒋却在第二天就借故飞离重庆。这批特务打手进而施展讹诈手法，竟以“冠英”的化名，于十二日写恫吓信给周恩来，内附一粒手枪子弹，送到中山四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在信中狂叫：“恩来，你若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不能再忍。请你看看谁的手段高强吧。”周恩来大义凛然，立即将原信交付《新华日报》公布，并函送市警察局查办。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便同张君勱、梁漱溟、陈启天、李烛尘等人往访国民党政协代表吴铁城，要吴电告蒋介石，由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党部推出代表（或由蒋指定人员）共同调查血案真相，提出解决办法。义正辞严，吴铁城无话可辩，不得不表示接受。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为抗议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社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较场口事

件”、“沧白堂事件”的严重罪行。远在延安的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刘少白、钱来苏、刘道衡、李木庵、柯仲平、艾思奇、柳湜等各方面负责人，也发出通电，严正抗议，并公推老教育家黄齐生专程飞来重庆慰问在较场口血案中流血、受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战士，带来了解放区人民的热情声援，更加鼓舞了山城人民的战斗意志。

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对这次事件的经过，作了翔实的报导，并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反动派炮制的一系列暴行严加抨击。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民主的血腥暴行的高压下，革命人民怒不可遏。一个以声援较场口事件为中心的民主运动高潮席卷全国。事件发生的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的几十个工人，在现场捉住冲入他们队伍中来的打手谢雅南。他是社会服务队第二区队长，专门指挥殴打劳协工人。在他身上查出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密信，内装盗用大会名义的油印反动口号一叠，并附赏金五千元。人赃俱获，押交重庆地方法院。十日下午三时，筹备会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外记者四十多人到会，旁听的更多。由李德全主席，黄洛峰报告了庆祝大会筹备经过，章乃器说明了市农会等八个团体同他接洽的情形，钟复光宣读了她笔录的施复亮抗议书，阎宝航转述了李公朴的控诉，郭沫若带伤到会讲话，还有劳协代表发言，一致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揭露了“较场口事件”的真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要求。同日下午六时，陪都各界青年团体：中华论坛之友社、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国职业青年社、社会太学自治会、星海合唱团、陪都青年联谊会、民主自由公社、中国民主实践社、民主教育社、民主合唱团、星期研究会等十一个单位，举行紧急

座谈会，组成陪都青年“二·一〇”血案后援会。十二日，重庆民生机器厂、中华书局印刷厂、申新纱厂、中南橡胶厂等四十七厂的工人也筹组了“二·一〇”血案后援会，北碚一万多工人旋即成立了后援分会。十四日，陪都《科学时报》、《民主与科学》等二十五家杂志公开发函，誓对暴徒口诛笔伐，以期血案有合理公正之解决。二十六日，陪都文化界人士茅盾、巴金、力扬、艾蕪、洪深、史良、胡绳、杜国庠、徐迟、冯雪峰、冯乃超、郑君里、何其芳、侯外庐、邓初民、翦伯赞、欧阳山尊等一百五十二人签名发表《告国人书》，一致要求惩办祸首，取消特务机关，赔偿医药费和损失费，释放无辜被捕人员。几天中，《新华日报》代收转致的慰劳捐款达三十多万元。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的，有罗隆基、章伯钧、邵力子等政协代表，邓发、谭平山、邓初民、翦伯赞、王葆真、陈铭枢、徐崇林等各界人士，以及工人、青年、妇女、记者、教师等各界群众数百人。被特务打手抓走的几个中国劳动协会会员，由中共地下党员彭友今、田鍾灵和朱宝粹等人设法营救出来。成都、昆明等地都举行了万人大游行。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和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和各个解放区的广大军民，都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发表慰问函电。旧金山致公党会长谭护、青年党中委谢澄平联名从美国发来电报，抗议特务暴行，支持民主斗争。

新闻舆论界对特务暴行群起口诛笔伐。事件发生，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时事新报》，乃至《世界日报》等八家日报在次日，新民、大公、南京三家晚报在当晚，都详细报导了事件真象，《民主报》在十日还发了号外。《世界知识》、《中学生》、《经济周报》、《新文化》等二十种杂志专门编印了《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在重庆的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都

向国外发了消息。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各报刊载了重庆特务捣乱群众大会的报导，指责重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挡这种暴行。莫斯科电台也作了新闻广播。

血案发生的当天，冯玉祥将军就以愤怒的心情，赋诗叙事。

胡豆花开紫薇薇，红梅开过开绿梅。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有的破口骂，有的砖头飞。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有些挨打者，打伤两条臂。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拳打和脚踢，施君伤为最。这种坏方法，用者段芝贵。还有雇些人，议员打破嘴，那是徐树铮，要害段祺瑞。革命政府地，这种行为太不对，定是被人哄，自己不是罪。任意打伤人，外人皆落泪。人家不讥笑，国家名誉毁。如何站得住，四强之一位，不被人开除，也被人挤退。有意毁主席，自己还觉对。放眼看各国，哪有这作为？丢脸太丢脸，自抹一鼻灰。气坏有记者，志士落血泪。治安负责者，应快去认罪。军警管何事，难免无法推。良民之脂膏，不能装着睡。真理是真理，是非是是非，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主席一震怒，有人倒大霉。我们先赔礼，并送医药费。还望从今后，人人大觉悔。法西斯日义，从根被摧毁，再去仿效它，实在自找罪。东西法西斯，无处可逃避。快醒快醒醒，做“人”最可贵。

这首诗，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像冯玉祥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阴谋败露，罪责难逃

国民党反动派色厉内荏，十分虚弱。在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怒潮面前，群小股栗，原形毕露。

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接到周恩来等的严辞抗议，为回避当面责问，于二月十一日上午，匆匆召见唐毅询问惨案经过之后，即悄悄飞去上海。重庆中央社说是因有“要公”，上海中央社则说是“胜利后首次巡视”，露出了蒋介石有意躲避的马脚。

国民党中央社施展造谣故伎，妄图推卸罪责。十一日发布消息，竟把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政治大血案，说成是民众互殴，竭力为刘野樵抢当总主席，抢夺扩音器的破坏行为开脱，并反诬李公朴争夺总主席引起互相殴打，以致双方受伤。《中央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短评《较场口事件》，沉湎一气，也说较场口血案是什么“民众团体互相殴打”，冀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随声附和的只有《和平日报》、《民主日报》、《益世报》和早已被特务武力抢占的《新蜀报》、《新蜀夜报》等几家报纸。谎言出笼，立即遭到大家的痛斥。十一日下午二时，《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等报社的外勤记者，即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会议，参加的人占全市外勤记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当即由到会的曾敏之、李康草拟，石西民、李亚群、高集、高学逵、浦熙修、姚江屏、钦本立等四十二人签名发出《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指责其“对此事件之报导，颇有失实之处”。接着，重庆新闻从业人员熊瑾玎、陈翰伯、石西民等二百二十一人，发表了《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意见书，成都四十二

个记者亦致函中央社，指责“报导诸多失实”。十二日，筹备会发表《驳中央社报导》，列举事实，戳穿谎言。《新华日报》专门发表《恳切的忠告》社论，严肃指出：“前天较场口丑剧演出时，民众到者万余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亲临其境者十余人，谁打人，谁被打，谁是主席，谁抢主席做，谁受伤，谁没受伤，大家看得清楚。然而，中央社的报导、《中央日报》的编者，居然写得出‘公推刘野樵为主席’，‘刘野樵受伤’，居然写得出‘民众纷纷拥上主席台，秩序大乱，互相殴打’等等。看了中央社这种报导，请问还能是真实的吗？”中央社居然致函《新华日报》社，提出什么“严正声明”，要《新华日报》“平心检讨，翻然改正”。十三日，新华日报社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复信，指出其来信所云，“强认己所言为真实，其不同者为造谣”，实为其“夫子自道”。把中央社造谣惑众的报道，揭露无遗。

国民党反动派造谣破产，特务打手的鬼蜮伎俩更站不住脚。事件发生后，刘野樵一伙妄图倒打一耙，疯狂反噬，盗用市农会、市总工会、市商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等八团体名义，于二月十二日在《和平日报》、《新蜀报》登出所谓《陪都各界农工商教育妇女自由职业等人民团体警告中国劳动协会、民主建国会、育才学校启事》，混淆是非，声称举行大会时，“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旗帜下有壮汉十余人跳上主席台，当将主席刘野樵、李公朴及讲演人朱其瑞殴打”。《启事》登出，民主建国会、育才学校、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立即指出纯属捏造，严加批驳。重庆律师公会理事兼书记长崔国翰特别为此发表谈话，声明律师公会列名刊登的这个《启事》，他事前并不知悉，律师公会近日亦未召开会议，此种列名，绝未于事先征得本会各常务理事一致同意。在十二日下午召开的第三

次民主教育座谈会上，若干教育会理监事也表示教育公会列名《启事》，事前毫无所闻，对滥用名义所为，不予承认。把戏被戳破，《启事》只登了两天就无影无踪了。

所谓八团体《启事》出笼之前，刘野樵等即玩弄花招，于二月十一日午后三时，由古铎出面，在市参议会礼堂，召集所谓陪都农、工、商、会计、妇女等团体，号称五十多个，拼凑了一个所谓“伸张正义联合会”，又是订会章，又是发宣言，又是招待记者，又是致函《和平日报》“驳斥”民主建国会的紧急启事，又在《中央日报》刊出什么《周寒梅律师代表陪都各界伸张正义联合会为驳正所谓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紧要启事》等等等等，好像煞有介事，其实所谓“联合会”云云，不过是个空名。二月十七日，筹备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章乃器在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为题发表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说，那不过是“在蹂躏民主之后，又来污辱正义”！

国民党反动派山穷水尽，又妄图以重庆市长张笃伦作调人，从中“斡旋”。张笃伦以较场口惨案纯属地方事件，不宜扩大，便抓住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分别约集双方当事人征询意见，进行商谈。拟于二月十五日在市府举行茶会招待市农会等团体代表，十六日在大溪别墅约集筹备会各方代表茶叙，寻求迅速合理解决之途径。十五日，报上发表了这个消息，并放出空气，声称市长、议长正在“斡旋”，筹备会接受调解。当天，筹备会发言人即公开发表谈话，着重指出，“本案性质，绝非一种单纯法律问题，亦就地方问题，而为政治上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且为政协决议能否实现之重大考验，事关国家前途，决非私人争执之能付调解。”明确表示：“市长、议长之诚意邀约，既已为祸首所曲解利用，只得辞谢，以免混淆视听。”二十日，军统渝组就此给渝特区的愤报，也

不得不慨叹：“此事迄今仍搁浅，毫无结果。”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只好使出最后一着，对簿公堂。血案发生的当天，李公朴、施复亮等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要求惩凶，而法院迟迟不提起公诉。三月初，李公朴等又提起自诉，法院不能不理。这时，地方法院院长李学灯、首席检察官李懋萱得到上级指示，邀请了市党部执委郑蕴侠、吴熙祖等磋商，搞“双方控告”，“一并受理”。于是，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一伙特务，以周寒梅为律师，也提起自诉，反诬李公朴、朱学范、章乃器、施复亮、陶行知“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法院遂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于三月十五日开庭。消息传出，旁听席上人山人海。

上午十时，庭长龚尊一宣布开庭，传问两造。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和陈培杰、梁永思等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义正辞严，控诉了刘野樵一伙特务的血腥罪行。而刘野樵在确凿证据面前，大耍流氓无赖，按照郑蕴侠事先在凯歌归餐厅为他们“演习”过的出庭“答辩”，胡诌什么“李公朴脱掉短大衣，连跳过四条凳子，一把把我抓住，施复亮就在台上连声喊打，朱学范在台下右角把帽子一扬，陶行知这时就指挥育才学生上台就打。”信口雌黄，引得旁听席上哄堂大笑。当问到谢雅南为什么告朱学范时，谢说什么“朱学范在台上左角乐队旁指挥打人。”朱学范当天根本没有进入会场，更没有上主席台。刘野樵说他在台下右角指挥，谢雅南则说他在台上左角指挥。言不符实，互相矛盾，随后，传讯证人中央社记者颜瑞生。庭长向他交代了作证的法律责任后，颜瑞生心虚，不敢具结。对庆祝大会开会时间、与会人数的估计，也迟迟不作回答。庭长问他：新闻记者不带手表吗？平时新闻记者不估计会场人数吗？问得他哑口无言。是非本来已经清楚，但法院毕

竟是反动政权的法院，庭长也不会有什么秉公断决，最后只得宣布：政协综合小组和宪法协商小组前晚会议已经决定排解本案，故先交付排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一场官司，虽然没有下落，但这批特务打手的丑恶嘴脸，已原形毕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至此，反动派阴谋彻底败露，人民群众更加斗志昂扬。为了纪念较场口“二·一〇”血案，四月十一日，李公朴、施复亮、王葆真、曹孟君、史良、黄洛峰等五十余人发起成立了“二·一〇社”；四月二十八日，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的二十几个团体，联合组织“民主运动联盟”，在青年大厦交谊厅举行成立大会，选出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等九单位为理事，公开发表宣言，更加坚定地推进民主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专制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革命洪流席卷神州，蒋介石被赶出大陆；刘野樵等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当年从“沧白堂事件”到“较场口事件”的那一场民主与反民主斗争，长留史册，垂戒后世。

(四) 捣毁北平军调部和重庆 《新华日报》、《民主报》

暴徒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继陪都特务捣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之后，古都北平今日上午十一时许，又突有所谓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徒众千余人，在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并散发荒谬传单。午后二时，该批徒众即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军事调处执行部（协和医院旧址）“示威”、“请愿”。事前该部大门门口已布满宪警，但当暴徒夺门而入时，宪兵警察不但未加拦阻，反而纵容进入办公处内部。他们蜂拥入门后，即高呼反共口号，并要中共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当时叶委员正与美方委员罗伯逊商谈工作，闻讯当即安详步出门外与为首代表王者清、张鎰、左更生、李玉衡、李连池、汪振葵、杜和甫、刘子衡、赵介民、李鄴庚等十余人见面，并希望他们将要求解决的问题一一提出，以便交由十八集团军驻平办事处合理解决。奈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委员的解释，反而强行冲入执行部中共办公室，其中并有市政府职员和《建国日报》（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部机关报)记者杨文昌等参加。他们对中共方面之办公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并猛撞叶委员办公室门。执行部美方委员罗伯逊先生、中共叶委员及政府方面郑委员派员力加劝阻无效，他们在办公厅走廊内辱骂斗殴执行部办事人员，最后竟追进中共办公室，直到被打者从窗口跳出方才罢休。暴徒中，并时时有为首人员高呼“不要打自己的人”。这批暴徒一直捣乱到天黑，才由为首的暴徒吹哨子集合退出，临去时，还口口声声说：“今天叶委员没有满意答复我们，明天还要来。”按此事发生之前，早有若干征象，半月以来，平津各报早已作反共的叫嚣，特别是《建国日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机关报《华北日报》，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挑拨之能事，《建国日报》且已重新写出“共匪”字眼，而今天暴徒所散发的一篇传单“匪区人民是这样惨死的”，全文早已在十二月十七日的《建国日报》刊载过。今天以前，已有好几批自称难民的代表向执行部请愿，当问其究竟是那里人是何人代表时，他们有瞠目不能置答者，而今天参加“还乡请愿”的，竟有几个是广东人。现闻执行部三委员拟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主席从严惩处为首者。

(原载1946年2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

罗瑞卿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被暴徒捣乱发表谈话

本日午后二时，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冲入执行总部，中共办公室被捣乱，影响工作，记者特走访中共方面罗瑞卿参谋长，询问此事，承发表谈话如下：

本日难民请愿事，事先即略有所闻，除难民请愿团事件发生外，闻尚有饥寒请愿团亦将有所发动，更闻将在北平发起一反共浪潮，最近平津报纸已起而响应。证诸本日之事，高呼反共口号，不无蛛丝马迹可寻。不管请愿内幕如何，人民应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此乃中共一贯之主张，但本日之事与一般请愿游行不同，不仅闯入执行总部，而且冲进中共办公室，扰乱秩序，致使本部整个工作遭受阻碍。我方工作人员极为愤慨。此外我方通讯员往来受威胁，十九日晚在北池子大街曾遭人无理搜查，幸及时脱开，未受侵犯。政协结束不久，许多议案，全国人民正待政府实施，而特务竟敢如是横行，实属令人费解。执行总部设在北平，重庆曾有协议，安全问题由政府方面负责，从本日之事看来，足见北平地方当局对执行总部工作和安全保障未能尽责。如此种情行不即时改善，致使执行总部无法进行工作，对中国人民实为一大损失。中共代表团，为了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俘之共同任务而来北平，绝不因外来阻力而停顿工作，定用一

切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以实现全国人民之愿望。今晨我方召集所属工作人员，一再说服，嘱忍耐继续工作，静待处理，今日仍去执行总部继续进行工作。

(原载1946年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周恩来就暴徒行凶捣毁 《新华日报》事发表声明

中共代表团于昨天(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半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四十余人，首由石西民同志报告本报被捣毁经过，继由周恩来同志对此次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希望今后政治问题的解决，应当动口不动手，现在陪都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城市来，这是很遗憾的事。中国停止了内战就是为了求得和平民主建设，政协的一切协议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本此精神，虽然中午发生不幸事件，今天下午我们还去出席军事三人会议，用政治方法去解决军队问题，这证明中共在国家的问题上丝毫不动感情，但这些挑衅的反动分子却企图在军事协商就要完成时来加以破坏。中共始终坚决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也许在这过程中，民主人士还要流血，但中共决不受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或因此而退却，这也许会使挑拨者失望的。

事情发展到今天，应指出这次事件的真实内容。

第一，应该把爱国与排外分开。对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到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在有些情况还未弄清时，应该弄清，把爱国运动引到相反的方向上去

是与全国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举例来说：这次马歇尔将军就参加了中国停战的谈判和军事三人小组，如仅仅形式上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实际上，这样做显然是有助于中国和平民主问题的解决，而且符合于国际合作的原则。可见爱国不能与排外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欢迎马歇尔将军参加停战与整编军队的商谈。

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甚至特工人员中许多都是无辜被逼的，这些人值得怜悯，因此，应该把他们与阴谋头子分开。

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种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一方面想制造事件来破坏政府和蒋主席的威信，另一方面想挑起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的忿怒，好造成更大的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尤其在这几天，蒋主席不在这里，较场口事件还没有结束，军事小组快到成功结束的阶段时，故意来制造这种事件。但是这种企图，只能使问题发生波折和顿挫，而不能取消中国的民主事业。我可断言，这种事件今后还可能发生。只要这种阴谋分子不受到舆论的批评，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事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还会制造更大的阴谋。但不管怎样，也许还要流民主分子的血，但中国还是要和世界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走民主与团结的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懂得怎样不受欺骗和挑拨，我们懂得怎样为国家民族努力，我们懂得怎样绕过暗礁。

但最后要说明，政府对这事件事前未能防止，临时又未采取

有效的办法加以制止，因而自沧白堂事件以来，这类事情有日渐扩大之势，这使政府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失，同时使民主事业也遭受到很大的困难。打《新华日报》和较场口事件，沧白堂的捣乱都是一个来源。这点政府不是不知道的，而是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负责的处置。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在这件事上是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不然大家怎能共聚一堂讲道理，而不仗势欺人！？现在也是考验国民党和政府是否有控制国民党内反动派和政府内阴谋分子的能力。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是尽量容忍，并且丝毫未松懈对国家民族的努力，以达到军事小组的成功。在政府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表示自己的态度，负责处理此事，这就是我要向诸位朋友的声明，一切都凭诸位秉公判断，我们只是把此事诉诸公正的舆论。

(1946年2月22日)

(原载1946年2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

严重的抗议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昨日中午本报营业部在陪都森严之地，化日光天之下，蒋主席信誓旦旦，再三保证四项自由之后，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墨迹未干之际，竟被国民党内一部分反动阴谋分子所组织与指挥的特务暴徒捣毁了！特务百余人，历时两小时，将本报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破书碎纸，累积盈尺，且更掷出窗外，铺满了马路。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亦同时被捣毁门招。这是政治协商会议以来陪都又一次的特务大暴行！

关于这一暴行，应该明白清楚的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以来，国民党内一部分排外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就不择手段的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来破坏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的一切决议，因而先有较场口喊使特务分子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继则用排外主义的口号，利用政府尚未宣布对苏交涉真相的时机，煽惑一部分东北同乡进行反苏游行，终则在昨日学生游行之后，指使特务乘机捣毁人民喉舌之本报及《民主报》，以遂其摧残民主舆论，保持独裁专制之目的，并图混水摸鱼，将暴行责任转嫁于纯洁之青

年学生，其计至巧，其意至毒。而且所有上述这些事件，还只是这些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的开端，如果政府不采取最严厉的办法来制裁这些阴谋分子，如果人民不起来击破这些阴谋，那么，他们将会做出更加无法无天的罪行，必致毁灭民主危害民族。

这些反动阴谋分子，对内是专制主义者，力图依仗“格杀打扑”式的特务来维持其统治；对外是排外主义者，企图用武断的民族煽惑来破坏中美苏英的四强合作，玩弄挑拨世界战争的火焰。尤其值得注意者，是这些反动分子与日寇汉奸的瓜葛。重庆市上日内发现日本臭味正浓的“大东亚党激进青年会”张贴的标语，竟与这些反动分子煽动的口号，毫无二致。如果让这些反动分子得遂其阴谋，那末，势必使日本法西斯死灰复燃，中国与各大盟邦团结破裂，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与政府中虽然有许多反对这类排外主义阴谋主义的反动分子的正义人士，但是政府当局至今对这类反动分子优容姑息，甚至政府中一部分人还在放纵指使，使阴谋分子有恃无恐，特别是政府对苏外交之暧昧态度，对沧白堂、较场口特务罪行之不加制裁，以致阴谋分子及其领导下之特务暴徒，横行无忌，愈演愈烈，驯至有今日之空前惨剧。政府如不当机立断，严惩不法暴徒，则其结果，暴徒益将毁法乱纪，肆无忌惮，必至危害民族，破坏国家而后已。因之，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当局：

（一）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制裁排外的反动阴谋分子，解散特务组织。

（二）严惩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之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

（三）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陪都治安，保证此类事件之不再发生。

只有实现了这些最低的要求，才能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之实施，才能保证国际的亲密合作和国内的民主团结。

至本报同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虽遭辱骂殴打，牺牲流血，但为祖国强盛，为民族独立与国际合作，为人民的民主福利与政治民主之奋斗，将沉着坚定，不折不挠地继续进行，以求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实现！

(原载1946年2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 《新华日报》营业部致 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书

哲生 铁城 力子 立夫
厉生 布雷 雪艇 岳军 先生公鉴：

并转

蒋主席钧鉴：敬启者，今日沙磁区学生游行，经过《新华日报》营业部约二十分钟之后，时在午前十一时半左右，另有暴徒百余人将该营业部捣毁一空，并殴伤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及徐君曼、管佑民等，重伤三人，轻伤一人，书报什物，门窗，全部毁尽。直至午后一时四十分，尚有暴徒在馆盘踞，同时闻民主同盟《民主报》社，亦有暴徒捣乱情事。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较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盟国合作，造成国内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长此以往，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与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障，民主政治谓何？盟国团结谓何？堕国家之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恩来等，为国家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计，不得不郑重提出严重之抗议，

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敌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害，实行道歉与赔偿，并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临颖不胜急切待命之至，专此敬颂

勋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秦邦宪

八月二十二日

(原载1946年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 为暴徒捣毁《民主报》及 《新华日报》致蒋介石书

介公主席钧鉴：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始而发生特务在沧白纪念堂连日捣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会场事件，继而发生特务宪兵警察联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各方已认为遗憾，不意政协会议议决五大方案方公布于国人，重庆忽又发生特务人员在较场口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血案，李公朴、施复亮以及政协代表郭沫若诸人，俱遭毒打。此案发生，尚在我公赴京之前一日，其经过情形，谅有所闻。嗣经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勱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无党派代表李烛尘诸先生，亲访吴秘书长铁城，请求政府惩办祸首，迄今仍无结果。詎料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重庆学生爱国游行大队已过民生路二十余分钟，突来特务暴徒多人，利用学生游行机会，先将《新华日报》营业部全部捣毁，并殴伤职员数人，复将中国民主同盟所办之《民主报》营业部捣毁。自我公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初，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首为保障人民之自由，全国人民无不额手欢慰，乃反动阴谋分子竟在鞞毂之下，制造不幸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

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专此上陈，敬祈钧察。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谨上

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1946年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 《新华日报》营业部再致国民 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书

哲生、铁城、力子、立夫、厉生、布雷、雪艇、岳军先生公鉴：
并转

蒋主席钧鉴：敬启者，自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及《民主报》社被暴徒捣毁事发生后，恩来等曾于当日有函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敌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害，实行道歉与赔偿，并保证此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迄今将近半月，延未解决。而二十四日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又续遭暴徒捣毁，职员李干晓身负重伤。三月一日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亦发生暴徒聚众捣毁事件。一月以来，《新华日报》向外邮寄、航寄报纸，复遭多方留难，不能顺利寄出，似此情形，使恩来等生命自由日在特务威胁之中，一切民主团结工作均困难进行，不能不再向诸先生及蒋主席重申抗议，务请速赐回答，不胜切盼之至。专此，敬颂

勋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
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秦邦宪

三月七日

（原载1946年3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为暴徒捣毁 《新华日报》营业部三 致国民党政协代表书

力子、房生先生勋鉴：

新华日报馆营业部前于二月二十二日遭暴徒捣毁，敝方两次抗议，迄今匝月，未见合理解决，昨见《新蜀报》载法院开审消息，竟有“爱国民众打击《新华日报》”云云，阅后深为愤慨。查此事本系贵党一部分反民主分子有组织有计划之阴谋，绝非拘执三五被驱使之暴徒，泛泛审讯，所能塞责。此事至今未能解决，而竟尚有报纸继续歪曲事实，任其诬蔑，此种情形，只有更加刺激感情，妨碍团结。用特再行提出严重抗议，并劳转达蒋主席，请速对敝方前此所提各项要求，迅予圆满答复，至所企盼，并望示复。专此，抵候

勋祺！

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秦邦宪

（原载1946年3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五）公开推翻《政协决议》

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

二中全会十六日上午十八次大会，修正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草案，原文如次：

（甲）抗战胜利以后，和平建国为举国一致之薪要，尤为本党继承总理遗志实现三民主义应完成之历史使命。爰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冀以政治方式消除一切纠纷，保障和平统一，完成建国之大业。故在协商进程中，凡属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本党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为多方之退让，委曲求全，俾底于成。其所协议诸端，本党秉为国为民之夙愿，自当竭诚信守，努力实践。惟是体察当前之情势，与立国永久之大计，关于下列各点，特致殷切恳挚之愿望：（一）国民政府既须改组，容纳各党派分子参加，各党派均应一本忠诚为国家之和平统一民主建设而共同努力。尤属望中国共产党切实依照协议，在其所占区域内，首须停止一切暴行，实行民主，容许人民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及各党派公开活动，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

(二) 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此次军事小组所订之“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国共产党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俾全国秩序得以恢复，人民痛苦得以苏解，“军队国家化”之障碍得以首先扫除。(三) 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早为全国所遵奉，已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共认。而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权能分职五权分立，尤为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本党五十年来领导革命，悉为实现此最进步之政治制度，以建立国家而奋斗，决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庶宪政之良规得以永久奠定。总之，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以和平建国为目的，则于各项协议之实施进程中，凡有足为和平建国之阻碍者，胥必力为排除，乃能措国家于磐石之安，而跻人民于康乐之境。本党矢以贞恒，勉尽职责，并愿各党各派共体时艰，相与开诚，协力以赴之。

(乙) 对于此次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言论主张，所应根据之原则，以期齐一意志增强力量案，经通过由全会授权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原文如次：本案应请大会为下列各项之决议，交中央常会通令全党同志遵照：(一) 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 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予增加。(三) 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 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 省无须制定省宪。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原载1946年3月17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宣言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得到了，这使我们踏进了和平建国的新阶段。本会议举行于这个重要的时期，要首先指出和平建国，我们全党和全国努力的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本是实行总理建国方略的时机，可是在帝制遗毒和割据军阀手里错过了。现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经过了八年血战，排除了日本侵略的障碍，得到了千载一时的建国良机。我们断不能再行错过。我们为保持胜利的战果，必须把握住这个历史的关键。本会为求得举国一致的协力，特列举下列各点，以告我同胞：

第一、要安定社会，恢复秩序，完成复员计划，以开始和平建国的工作。要建国必须安定，要安定必须和平，这是互相关联的。我们面对着八载抗战后的疮痍满目，经历了半年来复员工作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和困难，目睹各地同胞痛苦的待救济，流离的待还乡，失业的待复业，被压迫的待解放，确认我们国内不应该再有扰攘纷争的现象。惟有符合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不违本党努力奋斗的目的。政府半年来多方忍让，以求复员工作的进行。本会议认为是正确的措施。政府所以委曲求全，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邀集国内各党派和社会人士共同协商，也就在获得安定和平的环境，以利建国工作的进行。这对于本党所定的建国程

序，容有变更，但本党努力的精神，当为全国同胞所共知。我们要贯彻这种精神，不辞任何牺牲，以求复员计划的完成。

第二、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为我们实施宪政的素愿。本党领导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政治，实为本党革命奋斗的主要目标。远在五十年前，兴中会已经明白宣示，本党的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创造民主的历史，如果没有暴日的侵略和国内的军事阻碍，宪政早已按期实行。本党屡次的决议，和本党总裁历年来的宣示，无不表示我们早日实现宪政的决心。政府虽然在军事紧张的时期，也未忽视对于实施宪政的准备。我们迫切的期望在还政于民。召开国民大会，是还政于民必经的途径。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政府已明令宣布，我们必须如期举行。

第三、要说明我们对于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诚意，与坚持五权宪法的决心。我们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经过了详密而郑重的检讨，我们鉴于国内和平安定与精诚团结的必要，以及同胞痛苦必须解除，国家必须安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都愿以最大的诚意与各党派及社会人士精诚相与，协力一致，以促其实行。但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就是宪法草案的修正，必须符合于五权宪法的遗教。这因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不可分的。放弃了五权宪法，则三民主义便不能完全实现。总理在政治制度上这一个伟大精深的发明，是借鉴于欧美的宪法，斟酌我们的国情，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今后我们国家政治组织的健全与巩固，需要一部完善可行的宪法，如果宪法内容违背了五权宪法，在实际行使的时候，扞格难通，必致陷国家于不利，所以本党对于五权宪法，必当遵照保持，终始无间。这实在是为着国家久远的利益，希望各党派和社会人士明了我们的立场，了解我们的主张。

第四、要求贯彻军队国家化，以立和平统一的基础。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条件。惟有军队国家化，军令政令才能够贯彻。国家获得了名实相符的统一，才可以真正实现民主。武力割据是反民主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如果军令政令不能统一，地方秩序到处扰乱，人民最基本的安居乐业尚无保障，更无从实施建设，政府所颁布的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以及最近军事三人小组所议定的整军和统编方案，必须全国一律遵守，全部贯彻，才不负我们为国忍让以求和平团结的苦心，才可使饱经痛苦的同胞，获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本会议检讨当前的事实，惟有坚决要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和妨碍统一的行动，使和平建国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实行民主，才不致徒托空言。

第五、我们要实行六次代表大会，着重民生主义的方针。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在现阶段要推进民生主义，本会议认为有治标治本两方面。在治标方面首先要安定秩序，解除民困，而后可以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要为在饥饿线上，或是半饥饿线上的农工大众、公教人员及捍卫国家的官兵解除痛苦。他们的生活必须设法改善，这就要先从稳定物价和维持币值着手。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方法使其实现。当然我们更需恢复生产，来增加国内物资，运购粮食，以备灾荒的救济；厉行节约，以减少无谓的消费。建立国际经济合作，使国外物资，尤其是生产工具，得以大量输入。但是目前还有一件最迫切的工作，实莫过于恢复交通，像现在这样四处交通遭受破坏，人民不能自由来往，货物不能畅通，其他一切，更无从说起，所以破坏交通，不但妨害民生，而且无异置人民于死地。本会议不能不坦白指出，希望军事调处执行部，要切实制止一切妨害修路工作，与破坏交

通行政管理的行动。在治本方面，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本党必须实现的基本原则。救济农村，抵制目前土地兼并之风，扶植自耕农，同为当前急务。实现战后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尤赖国际上经济和技术援助，本党六中全会所定有关经济建设各纲领是最正确的方案。九个月来，因为战争和复员的关系，还不能切实执行，实为憾事。今后必须督促政府主管部门，加紧执行上面所说的各项措施，使人民得能安居乐业，进而获得生活水准的提高。

第六、要贯彻我们抗战的初志，以保持国家主权而巩固世界和平。我国对外的根本政策，在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信守国际条约，以巩固世界永久的和平。我们过去拒绝日本防共协定的威胁，以及八年的抗战，最主要的目标，也就在此。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为了战后的建设，我们不但需要国内安定，同样也需要国际和平。我们不希望国际间再有任何矛盾或隔阂的存在，使已经战败的侵略主义者，存侥幸再起之心。我们以至诚拥护联合国宪章，我们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处处苦心，设法增进我们各大盟邦的合作，就是我们政策的最具体表现。为建立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根除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机会，这就需要我们与各盟邦之间有充分的了解，与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和我们边界相接最长的苏联。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增进彼此互相的友谊，我们并且坚信，双方严格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增进彼此相互信任和友谊的首要条件。同时我们为完成经济建设，在不违背中国法律，不抵触与中国所参加之国际协定的范围内，欢迎任何盟邦资本与技术之合作。惟有一独立民主统一强盛的中国，才能根绝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才能保持太平洋上乃至世界永久的和平。我们深信现在东北问题，必可本此认识，求得合理合法解决的途径，决不以一时的现象，而丧失我们的信心，怠忽我们的努力。

最后要唤起我们全党同志，爱护革命历史，确立信心，认识自身的责任。在这训政行将结束、革命事业进入建国的时期，本党同志要知道本党为中国最大的革命政党，过去领导革命救国，今后领导建国，乃是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历史任务，我们决不诿卸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记得：中华民国，是我们总理和本党先烈所创造的。扫荡军阀，完成统一，是本党领导完成的。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是本党领导解除的。八年的抗战，为国家民族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又是本党领导成功的。本党既能完成这四个现代历史上伟大的使命，我们更确信本党在总裁领导之下，必能提携全国同胞，完成和平建国这一个更伟大的使命。

以往训政时期，在政治和党务上，都有种种的缺陷，其中有许多固然是客观条件使然，但是我们自己也责无旁贷。我们革命的目的，正如总理所说：“救出斯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现在国家处境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我们实在非常痛心。我们革命党人要勇于负责，勇于改进，我们必需深刻的不断的自我检讨。本会议认为我们要负起今后艰巨的责任，必须集中意志，自反自强，以革新我们党的工作。必须刻苦努力，为民服务，以贯彻我们革命的初衷。更必须以推诚置信的精神，与全国同胞和各党派人士一致努力，以促建国工作的成功。在以往本党得到全国同胞的协力，使我们能不断的达成历次伟大的使命。到现在我们就应该把光荣胜利的中华民国建设成为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我们要一致高举三民主义的大纛，进入和平建国的大道。

(1946年3月17日)

(原载1946年3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 坚持政协会议一切决议发表谈话

国民党中许多有力人士现正试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此举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协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凡所决定都切合国家的需要与人民的期望，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尤得国内外舆论一致赞美，认为非此决不足以奠定国家民主化的基础。在政协会议中，国民党代表团人数最多，并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任会议主席，蒋氏曾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致词中郑重声明，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各种方案，本人虽然不能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现在距该会闭幕之日仅一个半月，国民党方面忽然对于宪法原则等项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实使人们不胜惊异。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诺言，素极重视，对于信守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更认为是各政党政治信誉与国家百年大计所关，因此中国共产党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

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

(1946年3月18日)

(原载1946年3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 会上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诸位先生：

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一、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

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较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报馆、捣乱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这许多事件至今没有一件得到解决。如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名义上虽已废止，但实际上仍限制重重，并且采用了极不平等的限制办法。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别的新出版的报纸在上海则得到许可。又如释放著名的政治犯，除叶挺、廖承志外，不论中共或其他党派及无党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学生，至今仍

毫无消息。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这些违反保障人权的事件，国民党负有责任，但二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一字未提，所有决议案中，没有一字谴责这些妨害人权的罪恶行为。

二、关于改组政府问题

改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结束训政走向宪政，在此过渡期间成立举国一致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无明确态度。它不仅避开结束训政不谈，反而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央常会去选任，这是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二中全会后将要“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很可能“恢复”到从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去。果如此，国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常会选任，中政会又要指导国民政府，这说明政府仍是一党的政府，决不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与政协会议，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

三、更重要的是关于宪草问题

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中央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既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则是与孙先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至于根据这些原则如何规定政府组

织，那就要因时间与条件而定，过去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现在政府并没照这程序做，可见政府的组织程序是可以变动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与国民党协商。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个协议，但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二中全会对于宪草通过了五点修正原则，所增加之两点半关系至大，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不受政协拘束。另外，吴稚晖先生又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为决议。他主张《五五宪草》，政协协议事项，二中全会决议……一并提交国大参考，这是与政协决议完全相反的。按政协决定，只能将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修正案提交国大，并无其他，国大代表个人虽自由，但各党派要负责约束其自己的党员，使这个民主的宪草得以通过，这样，包括十年前一党包办的旧代表的国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要保证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在国大问题上，各党派曾向国民党作了极大的让步。但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国大问题

国大代表中地区代表还未最后确定，国大组织法也还没有修改，根据政协决议，国大的职权只限于制宪，而宪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才能通过，但国大组织法如再迟迟不改或改而不当，就

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来做更多其他不利于民主的事情。这样，将来的国民大会就会更便于做一党专政的保镖。

五、整军问题

在政协会议中，军政部次长林蔚氏报告。政府军队现有三百八十万，要减到一百八十万，编为九十个师。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人的报告则说政府军队及机关学校现有四百九十万，将来只减到三百四十七万，仍编九十个师，这和在政协报告中的数目比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万。即去掉机关学校，仍然会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谓兵工总队。成为正规军的后备队或补充队。这是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中复员计划的，因这既不能减少国库开支，且将保持额外的一部分队伍，完全与复员精神相反。

六、停战问题

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军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除武装，因为阎锡山氏还在利用他们攻打中共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其他地方，继续进攻和蚕食中共地区的村镇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关于东北的情形，马歇尔将军在两个月前曾提议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当时我们立即赞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可是又发生了执行小组的任务问题。我们曾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无条件派遣执行小组去，立刻停止一切

军事冲突，并调查当地实际情况，把问题带回来提供三人会议解决。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先在重庆谈判关于军事、政治问题解决的一般原则，然后再派遣执行小组根据已经谈好的原则去具体执行。这两个办法，都还没商得结果。我们向来主张东北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应分开解决：外交问题，过去一直是政府负责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内政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意见，这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和东北人民的意见。

以上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国民党内顽固派有意识地破坏政协整个决议，并不奇怪。但是，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虽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是容许了上述反政协的决议存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又着重于反共，说中共如何如何。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愿意朋友们善意地（而不是恶意地）来督促我们。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问国民党朋友，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骗什么呢？就是想模糊过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党派参加了政府，国大开成，宪法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中国不就是“民主”了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没有完全和平对人民说成有了完全和平，还没有民主说成有了民主，还没有稳定说成已经稳定。

我们同意马歇尔将军说的，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不能像某些国内外舆论那样的乐观。但情势不是不能更改，还需要全国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帮助，特别是政协各方代表要努力来维护政协决议。

此外，亦如马歇尔将军在华府招待记者席上所说：国民党当权一派，不愿把大部分权力交出来。其实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权利，如各党派在政府中能有充分代表性。现在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国大中，仍占第一大党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点点民主，顽固派还是不愿意让人民享有，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而且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及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所指的内容来看，也可见政协决议还没达到那样的民主要求。现在军队整编统编方案是有了，但是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连政协决定的这样一点点民主，国民党还不愿实行，还要由国民党中常会来选任国府委员。

因此，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下来，和平也无保障。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

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特别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团结的

朋友，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来纠正和推翻党内这种反政协的企图。且这种企图现在已成为决议，快要实行了。我们应提醒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国民党对今天的政治是负有最大的责任的。由于这一缘故，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来做这一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愿蒙蔽舆论，而愿诉诸舆论。

(1946年3月18日)

(原载1946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博古答记者问

周恩来同志说完以后，随即由秦博古同志回答记者询问。

问：中共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关于政协部分，是否准备向国民党提一备忘录，申明保留权利？

答：中共代表团今午已约国民党代表于明日（十九日）下午商谈上述有关诸问题。

问：中共参政员出席此次参政会否？^①

答：正在考虑中。

（1946年3月18日）

（原载1946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二日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

——编者

驳 蒋 介 石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四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所包办的、为中共所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作了一个长篇的政治报告。四月三、四两日，中央社发表了这个报告的长约六千字的“要点”。根据中央社发表的材料，蒋介石报告的真正“要点”是两个：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从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內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从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关于第一点，即东北停战问题，蒋介石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又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蒋介石在这里一连撕毁了两项诺言：第一，蒋介石军在东北联合敌伪，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屠杀东北人民，这不叫军事冲突，而叫“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执行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的诺言；第二，蒋介石党用武力推翻东北人民的地方自治政府，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这叫做“没有内政问题可言”，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的诺言。蒋介石在这里完

全显出了他的一副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而使他所说的“顾念地方的疾苦，希望军事调处执行部慎选执行小组派赴东北，停止当地的军事冲突”云云，成为令人作呕的伪善。本来全世界都知道：坚持要求军事调处执行部停止东北的军事冲突的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及其一群，是竭力反对东北停战，并一再声明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以内的。二月二十日，蒋介石的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明白答复记者的问题：“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务范围，是否包括东北？答：否，东北并不包括在内。”这是中央社重庆二月二十日电讯所正式公布，而为任何谎言所不能涂改的。仅仅由于中共根据停战协议中全国一切军事冲突均须一律停止的明文，再三敦促蒋介石承认停战，蒋介石才在三月二十七日完全虚伪的接受了东北停战的协议，而在仅仅五天以后的四月一日讲演中，他就连忙公开撕毁了它。蒋介石对他在东北用外国火箭炮与坦克所进行的残杀同胞的凶恶内战，取名为“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当然丝毫也不能博得东北人民的宽恕，因为刽子手任何美妙的口号，都不能帮助东北人民从外国火箭炮与坦克下面免于惨死。何况中国人民特别记得：蒋介石在任何地方的内战中都是宣称是为了“接收主权”，为了“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蒋介石对于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恢复国家主权而建立的任何地方政府，都曾宣称是“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在他看来，中华民国的主权并不属于全国人民，而只属于他个人及其一群，因此，只有他的独裁政权，才能接收主权，而人民与一切民主党派是绝对不能过问的，一过问就叫做“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好像远东与世界也都是他的私产，远东与世界的友邦也都是他私人的侍从一般。中国人民又特别记得：在日本侵占东北与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土地的时候，蒋介石从来不忙于从日本手中保护国家主

权。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直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间的工作，一句话说完，就是从黑龙江退到贵州省。在那些危难的岁月，他所指挥的军队好像指南针一样，总是向南跑的。他跑得这样远，以至直到今天他还在把大量的军队从越南、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向东北开，而埋怨坚持东北华北抗战的共产党为什么站在他的前面。蒋介石特别可耻的是，他竟如此不顾名誉，捏造了一篇所谓国民党一贯坚持东北抗战的可笑“历史”。蒋介石假装健忘，好像他并没有在九一八以来一贯坚持不抵抗主义与中日亲善，直到至今还未释放的张学良采取了一个步骤不许他再这样做为止。为了恢复他的记忆力，我们不能不劝他把自己过去的作品全部温习一遍，并且在这里姑且少许作一些味如嚼粪的征引。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江西的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他说：“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这段话载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七十五页至七十七页。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他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就在这时候竭尽全力来准备国防，拚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呢？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

是不够。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这段讲演有单行本，民国二十七年曾遍载全国各国民党报纸，并收入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见该书第一册四三一至四三二页。民国二十四年九月，蒋介石在日本的杂志《经济往来》上发表一篇《中日关系的转回》。他说：“中日两国，无论自那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力，以图亚细亚的繁荣。今日虽在严重的困难之中，我们顾念中日关系在过去的悠久历史，确信今日所发生的纠纷，结局必能依两国国民的诚意与努力而获解决，实现我们所不断理想的中日间的真正提携亲善”。这段话载在上海国泰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全集》第三编第六十九至七十页。在抗战以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这段话，载在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册第十六页。仅仅这些零碎的材料，就已经足够证明蒋介石及其党羽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铁案。当然，蒋介石将来对于他自己的这类杰作，不免有焚毁篡改之一日，以便使全国幼稚园的儿童都能相信他在今年四月一日讲演中的童话，都能相信他在“九·一八”以后并没有下过不抵抗与中日亲善的命令，并没有签订过《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中满通车通邮协定》、《何梅协定》等等，在抗战后并没有进行过出卖东北以求投降妥协的外交活动，在日本投降后也没有委派东北的伪军，并勾结日本法西斯残余“接收东北主权”。但是，不幸今天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一

切。蒋介石造谣说：日本投降以前，东北没有中共的军队。这只能证明蒋介石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因为任何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就决不忍心抹煞全世界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多年的英勇历史，也就决不忍心抹煞全世界闻名的冀热辽边区八年的英勇历史，也就决不忍心抹煞八路军之一部李运昌、吕正操、万毅、张学诗等部在日本投降以前的八月十一日，就奉命首先进入东北，增援抗日联军与冀热辽边区，协助苏联红军，以消灭东北敌伪，解放东北人民，恢复国家主权的英勇历史。蒋介石为了一党一派一人的私心，不惜以国民政府主席资格，任意厚颜造谣，实使中国人民为之羞愧无地。

关于蒋介石演说的另一个目的，即维持独裁的目的，蒋介石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大家知道，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按国共会谈纪要所规定，是为了“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按杜鲁门声明是“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试问，如果政治协商会议还不是为了或还不能结束一党专政的所谓训政，以及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与国民政府组织法，那么，这个会议还有什么必要？还有什么意义呢？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乃是民国二十年五月蒋介石的傀儡会议“国民会议”的产物。蒋介石在这个傀儡会议的开幕词中，曾经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而反对民主主义。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像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

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名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也。……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这就是说：中国应该明定法西斯主义为过渡之阶段，其与法西斯主义理论有别者，则因为中国是由法西斯主义的蒋介石训政过渡到一种蒋介石宪政。这种宪政至少不是“迟钝”而“最可痛心”的“英美民治”，即“议会政治”。在这种法西斯主义指导下产生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一方面“依法律”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约法第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七各条）。另一方面宣布“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制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约法第三十条），赤裸裸的确定了一党专政。根据这个约法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只是

一个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因此，他的所谓“国家根本大法”，就是这样：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要做蒋介石独裁的第四级奴隶！蒋介石在四月一日讲演中，就是要全国人民继续承认他的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训政时期约法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要各民主党派这样来参加他的国民政府，以便经过“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训政的“过渡阶段”，“过渡”到他的法西斯主义宪政，否则他的政府就“决不能承认”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在他看来，离开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就要陷于无政府状态”！蒋介石之所以坚持现在必须维持法西斯独裁，当然不是争五五以前仅仅一个月的什么法统，而是为了在长远的将来一直继续保持这种独裁。这个阴谋，明白表现在他关于宪法问题的论点中。蒋介石及其一群，坚持要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的决议，把它描写成为对于在政协会上一致起立通过其决议的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没有丝毫约束力量的“参考”文件。蒋介石及其一群，违反政协决议而坚持宪法应以什么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坚持反对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坚持国会（立法院）对于内阁（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坚持监察院也不应有同意权，坚持省无须如孙中山所主张的制定省宪，但是他却说这就是对于政协决议“竭诚信守努力实践的决心”，与“容忍退让委曲求全一贯的苦心”！蒋介石所用的字典，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蒋介石所坚持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五条原则，显然都是为了反对“最可痛心”的议会政

治，以便他经过行政院的无限集权与国民大会的无聊装饰，不受立法院监察院与各省的任何牵制，永远保持他所谓“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的法西斯独裁。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意义。

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一开始就反对停战协定，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整军方案。而这些成就，也无一不是战胜法西斯反动派的抵抗而获得的，所以法西斯反动派，在事后力图推翻这些协定，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过去一个时期，在表面上曾经表示支持这些协定，而现在却亲自站到法西斯反动派的立场上，来攻击和撕毁这些协定了。法西斯反动派觉得，这种反动可以得到某种国际的援助，因而在东北则大量增兵，放肆的扩大战争，在全国其它地方，例如冀中、苏北、山西、豫北等地，也正在进行着重大的挑战。不但不恢复交通，而且公然增修碉堡，不但不解散伪军，而且公然继续收编伪军，在山西还继续使用武装的敌军，不但不进行任何复员，而且公然宣称所谓“复员就是动员的开始”，宣称几个月以后就要进行全国的内战，完全不把北平执行部和三人委员会放在眼里。在政治上，则放肆的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继续在全国各地实行恐怖，阴谋秘密处死重要的政治犯，公开表扬万恶的特务机关的“丰功伟业”，特别是公开要求在国民大会通过独裁的宪法，使中国的局面恢复到今年一月以前的状态。这个局面，不能不唤起全国人民的重大警觉。中国人民不能不在此严重时机警告蒋介石与法西斯反动派，你们过去被迫接受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整军方案，以为主要的是由于国际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暂时的减轻了，你们就又可以故态复萌。你们这种想法是错了！不但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认识国际的大势，而且因为你们没有足够估计人民的力量。

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它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的百分之百实现，为坚持民主的宪法即坚持国会全权制，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的同意权与省得制定与国宪不相抵触而中央法律不得予以变更的省宪，为坚持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缩编与彻底国家化，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凡此一切都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关，人民绝对不能让步。中国的和平与民主，根本上是中国人民奋斗得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中国人或任何外国人所恩赐的，而奋斗得来的东西，只有经过也一定能够经过继续的奋斗，来加以保持和巩固。如果法西斯反动派非要反动到底决不甘心，那么，中国人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应付的了。

（原载1946年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演说要点

四月一日上午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之国民参政会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四月三、四两日渝中央社发表这一报告之“要点”。兹将该“要点”摘录如下：

“日本投降，抗战结束，至今已逾半年。政府在半年之中，争取国际与国内和平的措施，可分为下列的六项。

“（一）为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与各友邦共同签署联合国宪章，促成联合国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以期重建国际正义与法律的秩序。（二）为求国家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与有关各国共谋边疆悬案的解决，尤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使边疆毗连的两大国家，获到和平合作之道。（三）为求国内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对于省区以外各民族具备自治的能力与独立的意志，而在经济上政治上达到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扶助其独立自治。对于省区以内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经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四）为求国内社会秩序的安定，党派纷争的止息，并提早训政的结束与宪政的实施，本于‘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的一贯方针，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召开国民大会的方法，研讨宪法草案的原则，并决定在宪政实施之前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要求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更拟订和平建国纲领，以为此过渡时期施政的准绳。（五）为停止国内军事冲突，颁布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并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贯彻

停战命令。(六) 为实施军事复员计划，并统编中共独立军队使其加入国军，以确保军队编制与军令之统一，由军事小组会议订定整编及统编方案。政府对于方案信守不渝，而其中有关国军的部分，已依其所定的步骤切实实施。

“上述各项都是为寻求和平统一的道路而努力。和平统一的方针如能贯彻，建国的大业就可以顺利的进行。和平统一的努力如遭挫折，国家民族的危机也就日甚一日。各位对于这关系国家存亡的问题，自必予以深切的关怀。外交方面已由王部长向大会报告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已由邵秘书长报告各位，本席现在要就东北问题最近的发展、新疆的伊宁事变的经过以及其解决的办法和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商讨的经过简单说明。我们知道东北与新疆问题对于国家的和平统一皆有重大的影响，而宪法是国家组织的根本大法，这三个问题是今日中国外交政治最重要的问题，本席认为有向贵会剖切陈述的必要。”

蒋介石继即谈及“东北问题最近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就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他说：

“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问题的焦点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及附件的规定，接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东北主权接收的经过，已由外交部王部长另作报告，此刻无须重述。本席要特为补充的，就是最近中苏两国政府交换的文件。苏联大使于本月(编者按：应为上月，想因此稿原系三月间准备，至四月一日演讲时忘记改正)二十二日照会外交部，‘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军依照政府的决定本年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外交部已于本月(编者按：亦应为上月)二十七日照复：‘中国政府为谋便利苏方起见，对于苏军于本年底自满洲撤退完毕，可予同意。请苏方将苏军自各地点撤退之日期通知

我方。并于撤退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对中国政府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外交部王部长并于同日面告苏联大使：‘现在距离苏军撤完日期尚一月有余，且东北铁路纵横，交通便利，纵中国政府军队足能于苏军撤退以前到达，苏军所要撤退的各地区，请苏联政府电知东北苏军司令，迅与我军事代表团董彦平中将商订交接各地防务的办法，以便我军能于接防时获得苏方之协助’。这就是中苏关于东北接收主权问题最近交涉的经过。

“本席深信各位同人，听见了这个报告以后，对于东北情势的澄清，一定怀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始终认定中苏两国和平合作不独是两国共同的需要，并且是远东和平、世界安全的基本条件。本席更确信苏联之需要和平，以利建设，正与我们中国相同，我们中国必能获得苏联的和平合作。至于一地一事的波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中苏两国和平合作的根据，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我们唯有遵守条约及其附件的精神，并期望苏联共同践履条约及其附件的精神，这是中苏两国和平合作的基础，也就是我们两国对于远东和平、世界安全宝贵的贡献。

“其次说到东北内政问题。我们可以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作对中央交涉的条件，在这时候必要妨碍我们主权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难，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如果在这样外交形势之下，而国内党派之中，还有借着外交这样困难的局势，来要求政府必要承认他非法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利，求得其私人或党派的利益，而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这种害国殃民的工作，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并且是国家民族的要求。东北人民在

日本侵略军队和伪满统治之下，离开了祖国至十四年之久，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华民国的主权行政能够在东北九省完全行使，让他们重新受本国法律的保障，做中华民国自由的公民。东北人民在国家主权恢复、行政完整的时候，自能依国家的法令当然享受地方自治之权。但是现在东北真正爱国的同胞谁都不愿在这个时候借地方自治的名义，来阻碍政府的接收主权，分裂东北的领土。这是出于他们爱国至诚的愿望，我们万不能辜负他们的。”

蒋介石凭空捏造国民党在东北“艰苦奋斗的成绩”，他说：

“十四年来东北军民在中国国民党党员领导之下，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和压迫，因而牺牲者，自“九·一八”至日本投降之日止，这十四年之间死亡与被囚的人数，除了十余万军队官兵不计外，而中国国民党所牺牲的干部张涛、韦仲达、于中和、肖达山等乃达一千四百三十二人之多。当时日本和伪满的控制是一天一天的加强，民众武装活动和同志们地下工作，也一天一天的困难。但是到了日本投降的时候，吉林、长春、哈尔滨的日伪监狱出狱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还有二千七百人，试问共产党籍的党员究有几人。东北人民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信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在东北艰苦奋斗的成绩，这些数目字就是最确切的证明。”

蒋介石无耻地抹煞中共与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的光荣历史，厚颜地污蔑中共与东北民主联军，他说：

“在日本占领控制东北的时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武装力量。自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才有中共部队的发现。从热河方面开进东北的中共部队，乃持有少数武器，而从烟台渡海的中共部队，那都是徒手进去的。这几种部队合起来，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联军’。……要知道阻碍国家主权的接收，就是妨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

实行，也就是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我们国民政府为了国家主权，为了国际和平，对于共产党所谓“民主联军”阻碍接收主权的行动和他所谓‘民主政府’的非法组织，我们政府和人民是不能承认的。

“本年一月十日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马歇尔将军协助之下，会同声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办法，规定‘停止冲突命令第九节，对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个条款，就是根据上述的认识而成立，至今仍然有效。然而东北的中共部队，现在在东北各地，阻碍政府接收主权的行动，层出不穷，引起武装冲突，破坏地方的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我们非常痛心的事情。国民政府顾念地方的疾苦，希望军事调处执行部慎选执行小组派赴东北，停止当地的军事冲突。自上月十一日马歇尔将军，向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提议开始至上月二十七日止，经过多次会议乃成立协议，在下列条件之下，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慎选执行小组前往东北：（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之地区。（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各方另同意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蒋介石在东北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的代名词，就是“接收主权”，“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他说：

“我在此要加说明的，就是中共代表在最后几次会议之中，并特别提出其要记录事项的，‘政府应保证依照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方式与中共商谈有关东北政治事项，过渡时期之办法，政府承认目前民选之地方政府，不加干涉或阻碍，以待政治问题之解

决。’据此就可明了中共代表之意见，显然要以他东北共党部队所谓‘民主联军’及其非法制造的所谓‘民选政府’的名义，来阻碍政府接收主权的企图，取得他合法的根据。政府代表自不能予以同意。且已予以断然的拒绝。这是会议经过重要之点，故有向大会申述的必要。其次就是政府对东北问题所取的方针，政府对于东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至于违背东北人民意志，妨碍东北主权行政的一切非法政权，更不是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所能承认。”

蒋介石复谈及“政治协商会议及宪法原则的商讨”，其内容是撕毁政协决定，维持一党专政，他说：

“在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案中，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一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宪法的最后决定权当然在国民大会，但在宪法没有制定以前，全国人民无论何人如有良好的意见，都可提出来作为决定宪草的参考。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小组既已汇合出席各方代表的意见，更决定组织宪草审议会，其开会时间定为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是‘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改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讨结果及各方面所提出之意见，汇综整理，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对于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予以周详矜慎的审查。

“上月十六日二中全会决定授权中央常会负责处理，审查意见为下列五项：（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的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的次数应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权。

(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

“二中全会对政治协商会的协议案所成立的决议，明白宣示了中国国民党竭诚信守努力实践的决心，而全会根据国父遗教对于宪法原则，提出意见，态度是极为谨慎，事先既由本党代表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与综合小组得到协议，事后复授权中央常会处理，以期获致各方的谅解。凡此都足表现其容忍退让委曲求全一贯的苦心，不料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指责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这究竟是什么人造成混淆情形，究竟什么人造作这混淆是非的宣传，明眼人自然了解，不容多言。但是我们政府仍本忍让为国的方针，和他们继续虚心研讨，静候解决。不料中共代表前几天在综合小组上，突然又提一议案，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主张‘由训政到宪政过渡时期，训政时期约法应即废止。由各党派依平等合法原则共同参加的国民政府，其组织法应依照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制订。’本席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有略予说明的必要。”

蒋介石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案不能代替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约法”，他说：

“训政时期约法是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制定的国家组织法。这一部约法只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才能够代替。在宪法尚未颁行之时，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要知道国家不可一日没有政府，政府不能一日没有法律，尤其是国家与政府所依据的根本大法——约法，我们国民政府就是根据训政时期约法而成立的，而且根据训政时期的约法而行使其职权。倘若宪法尚未颁行，而约法先行废止，中国就没有合法的政府，国家就要陷于无政府状态。”

“我们政府以及二中全会，都尊重政治协商会议，持有最大

的决心，要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案。但是我们要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结束训政的步骤，只有召集国民大会，若要代替约法，而为宪政时期国家组织所依据的根本大法，那只有国民大会所制定的宪法。所以国民政府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再三宣示此次扩充政府的组织，是在国民政府现有的基础之上，要求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来扩大政府的范围，而决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个政府。这个道理，几乎是中外皆知的。因之可以明了，我们此次扩大政府组织的目的，乃在使政府于此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时期，汇合全国的意见，集中全国的力量，赢得和平的胜利，共商建国的方策，准备国民大会的召集，树立宪政实施的基础，而其中还有一种委曲求全的苦心，就是要把现在国内许多非法的事实，导入合法的轨辙。倘若宪法尚未颁行，即废止约法，则政府竭六个月之力，所得到的结果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不是人人可以共循的合法轨辙，而是人人可以造乱的非法祸胎，这与我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旨，是完全违反了。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否则，中国国民党五十年革命努力的结果，对于全国国民应得的政权，没有一个交代，而我全国同胞八年抗战的牺牲，亦没有一点意义了。这不仅是政府所不能接受，也是全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许的。”

蒋介石演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撕毁政协决议，但是他仍然要人家相信他和他的政府“有最大的诚意和决心，使其一一见诸实施”，他在结语中说：

“各位先生，上面所说是国民政府六个月来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的经过。国民政府对外则遵守国际公法，崇尚条约信义，对内则采取忍让为国的方针，凡有利于和平建国的措施，必委曲迁就期其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军事冲突调处的办法，整编国军及统编中共部队的方案，都是政府忍让为国的精神所产生的。政府持有最大的诚意和决心，使其一一见诸实施。现在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协商会议所议决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正在期待各党派提出名单，使国民政府扩大范围，集中各方意见和力量的愿望，及早实现。”

（原载1946年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三

回忆录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吴玉章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六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十三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要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一月十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

* 吴玉章，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本文原载《中国青年》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期，收入本书时文字有删节。

——编者

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份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也可以说是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钩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的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

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他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接着，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们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三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议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三月下旬至四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三月二十七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

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他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他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五月四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

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维舟同志即四处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五月十九日，冯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由于这副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道，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笃伦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等地。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们办事处的门前屋后，这时也是军警林立，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们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们。我们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

对张笃伦说：“请你们注意，我们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们（指特务）如果要搞我们，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讨论，有人主张搞我们，张笃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说道：“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们暂时地渡过了这场风险。

为了便于应付更为困难的环境，经过审慎的研究，我们决定王维舟同志撤走，同时还疏散一大部分同志。王维舟同志在重庆，他们害怕；王维舟同志要走，他们又故意为难，不给飞机票；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的毫无道理。为此，我去找张群，张群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的首脑之一，为人极其圆滑。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应第二天送来飞机票。张群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王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紧。”张群在无意中说出了真心话。啊！原来反动派害怕的就是武装斗争。

到六月间，时局更加恶化了。美帝国主义在这时提出了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则向我们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强迫我们屈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竟提议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我党表示坚决的拒绝。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美、蒋看到它们的威胁手段和欺诈伎俩都无从得售，于是蒋介石摘下面具，于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而马歇尔也宣告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来打我们，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原形。七

月十二日，国民党军五十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我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中国内政和蒋介石的扩大内战，全国人民异常愤慨。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万余人对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等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人行抵下关车站时，遭到了特务暴徒们的毆辱，以致多人受伤，造成了“下关惨案”。这时，我们在重庆也发动了一个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极其广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内，参加签名者达三千余人。实业界、银行界的签名也很踊跃。宗教界也卷入了运动，佛教会为此做了三天道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祷。

于是，蒋介石加紧了他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愤。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他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经过邓初民、史良和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借此捞点政治资本，便同意了领衔发起并作大会主席。这样，参加的人就多了。二十八日，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人们看见有张群、

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主席，顿时自由了一些。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乎，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讲演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二十五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我们又开了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提高了。

由于我军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我军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还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例如头三个月他即损失了二十五个旅的兵力），暂时换得侵占我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却使蒋介石的头脑发昏，他竟不顾我党的严重警告，于十月初猛力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十一日，我军自张家口撤出，疯狂达于极点的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即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其实，侵占张家口已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顶点，这一“胜利”正是它失败的开始，从此以后，它的攻势即逐渐下降，而且我军很快即将它的所谓全面进攻粉碎了。

为了召开伪国大，国民党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于是，那些醉心于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一个个都脱下了“中间”的伪装，现出了反动的原形。而且也确实有一些中间人士，在国民党的利诱特别是在它的威胁之下发生过动摇。青年党就不用说了，那批逐臭的“狮子狗”^①为了争着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委员，真是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民社党这时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买办

^① 青年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机关刊物叫《醒狮》，所以人们把它的党徒称为“狮子狗”。

的本性，张君勱彻底地自我出卖了，被人呼为“张君卖”。而有些所谓社会贤达也跳入了国民党的火坑。至于，胡适等则早已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①。这时，也还有一些人大肆喧嚷，说什么中间派必须对双方都骂，不宜左袒。有的人成天在张澜那里挑拨我党和民盟的关系。但是，由于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伪国大，把它视同猪仔国会，因此，民主同盟和绝大多数怀有正义的中间人士，都接受了我党的劝告，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绝了去出席伪国大。民盟主席张澜是我的旧友，他自八月十八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分子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十月初，他来到重庆，住在特园“民主之家”。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伪国大开会前夕，无党派人士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他对我说，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伪国大，而是要“说服”蒋介石恢复谈判。我劝他别去，他正犹豫，张澜故意说：“要去我们同路。”就这样，我们把他留住了。

十一月十五日，在举世咒骂声中，蒋介石悍然宣布伪国大开幕。通过了一部遗臭万年的伪宪法。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党郑重地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同时，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都先后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于是，国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来的伪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嘲笑，而它所装模作样地通过的伪宪法，在全国人民眼里也一文不值。蒋介石本来想利用伪国大来孤立我们，但现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① 胡适为了表明自己的反动决心，曾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蒋介石一面加紧反对人民，一面又加紧进行卖国。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竟称：“按照《中美商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根据《中美商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协定，美帝国主义已经从蒋介石手中把中国的许多根本主权席卷而去。美帝国主义既然这样毫无忌憚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主权，那末，它的伪善面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个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定要兴起的。果然，到十二月下旬，圣诞节前夕，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终于引起了从北平开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蒋介石不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无比的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战线，而且在他的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强大战线，蒋介石已逐渐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中国人民强大的反美运动，美帝国主义感到它的一切阴谋诡计已再难得逞，于是，马歇尔在政协会议周年前夕，即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七日，灰溜溜地回了美国。他虽然在离华之前，还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的声明，但已经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欺骗的了。一年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在重庆搞得特别激烈。当北平美军暴行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学生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满怀愤怒，立即行动起来。这时正值国民党的党徒们在庆祝伪宪的颁布，他们沉浸在狂欢中。因此，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我们顺利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一万五千余人的游行示威。由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实行镇压，所以运动延续的时间

很长，一直到旧历元宵节，还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周。在宣传活动中，学生们巧妙地利用了“车车灯”这种民间形式，把美蒋勾结表演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老百姓看了都感到非常痛快，而特务们则感到非常窘迫。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在二月五日和八日，派出了大批军警，公然袭击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队，以致造成两次严重的血案。

反动派的镇压，不但不能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学生们以及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无数工人、店员、教师和农民络绎不绝地来慰问受伤学生，并发动募捐来援助学生的“抗暴运动”。广大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十一日，重庆学生又发动总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罪行。此后他们的运动仍继续发展，从未终止。

当“抗暴运动”正在高潮的时候，国民党的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跑来找我。他的口气表示他知道运动是我们鼓动起来的，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去制止学生运动。我说：“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严正地指出：“特务打人，实在无理，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第二天，张笃伦又来了，他一见我就说，学生们逼得他受不住了。他还说我们报馆有人参加到学生里面，并指责我们的报纸登载鼓动学生的消息和言论太多了。他最后并威胁着说：“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的。”我严肃地回答了他，把他打发了回去。这时我已感到，对我们的严重的迫害即将到来。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估计他们的迫害很可能首先针对着学生运动和《新华日报》。

当时的学生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头

疼，眼看二月二十二日就要来到，估计到他们会利用“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周年纪念来搞我们，于是我们有意把反美运动扩大和延长，以抵制他们卑劣的行径。这样就使他们终于未敢在二月二十二日作反革命的发动。

至于《新华日报》，更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无时不想把它搞掉。还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转载了《驳蒋介石》一文的时候，他们就曾经企图下手，但终因整个形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未能如愿。为此，他们后来还捏造了一些团体，到柳州法院去告我们，说我们侮辱了“国家元首”，想借此来打击我们和封闭我们的报馆。柳州法院把这一案件转到了重庆，我们法律界的朋友们即来帮忙，他们充分利用了合法斗争的条件，结果使重庆法院这样批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诽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样到重庆来和我们打官司呢？反动派的诡计于此又完全落空。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蒋介石由于军事、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失败，已经和我们撕破了脸皮，不再有所顾忌了，看来他是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的，我们必须沉着地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这时，全国的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遭到严重的失败，特别是山东失败得更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我军一举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灭他五万二千余人，并活捉其整编师长马励武和周毓英。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进攻，蒋介石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我们要求允许他派张治中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新的骗术立即为我党彻底揭穿。接着，一月底至二月中，我军又打败了陈诚在徐州亲自指挥的所谓鲁南之役，歼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二师全部，并生擒郝鹏举。至二月十九日—二十三日，我军又在鲁中莱芜地区获得

辉煌胜利，将敌军七个整旅六万余人一举歼灭，其“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濬皆被我生俘。至此，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着要改变他的军事进攻方针，把他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将其两个进攻的矛头指向山东和陕北，既然进攻陕北，势必要最后关闭和谈之门。因此他决定驱逐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机关和人员。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还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看到环境一天天的险恶，就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为此，我特地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把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向大家讲述。这些讲演，也曾有一些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举行。当我讲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而我自己的情绪也特别激昂，有时不禁声泪俱下。那时我和大家的精神简直已融成一体，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从人们坚毅的精神里得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则，临危不惧，我们的同志也一定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的头几天，重庆有些民主人士从司徒雷登发表的声明中，知道了国民党要我们撤退的消息。他们有点恐慌，跑来问我们是否撤退。我说：“我们是国民党政府请来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们撤退，和我党中央来了命令，我们是绝不会走的。司徒雷登是外国人，他管不了我们国内的事，更无权过问我们党内的事。”过了两天，《大公报》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南京有我

们撤退的消息，我同样地回答了他。因此，《大公报》登的不是我们要撤退的消息，而是我的不撤退的谈话。这时，恰好传来了莱芜大捷的消息，我们的报纸特地用大字把它登出来。人们看了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我于是对民主人士说：“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了的，它即使把我们逼走，对它也无济于事。”

由于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所以国民党来包围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突然。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联络处——曾家岩二十三号（就是以前恩来、董老两同志住的五十号办事处）。一阵猛烈的打门声，把我们的同志从睡梦中惊醒。一时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冲进了我们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形同盗匪。把我们的同志都强迫集中于楼下客厅之后，他们又蜂拥上楼，闯入我的卧室，我穿衣急起，质问何事？他们声称：“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我问他们有无公事？他们的一位杨处长说有。我接过一看，知是孙元良来函要我们于三月五日前撤退。我当即声明：“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能撤退。”旁边一便衣特务插嘴说：“你们破坏和谈，逞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不能安定……。”我一听十分气愤，严厉地反问他：“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于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他见我声色俱厉，就表现十分狼狈。于是那位杨处长上前来说：“请先生把公文看完，如果油印的不清楚，这里还有一份笔写的，上面还有司令愿备车

并派人护送回延安等事，请先生不要着急！”我这时最担心的是他们危害我们的同志，因此特地对他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已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肖参谋长、张市长谈谈，一切谈后再说。”这时他们才对我说明，同志们已经集中在楼下客厅里。我于是赶紧下楼去和同志们见面，大家一见我就指着那批军警，控诉他们乱抢金钱、手表和衣物等等的暴行，一时人声沸腾，群情激愤。我见同志们毫无惧色，便对大家说道：“孙元良司令有公事来，要我们撤退。但是，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就去打电话。”但是，电话早被他们切断了，打不通。他们见我很生气，便来说道：“吴先生年老了，请上楼休息吧！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我说：“你们如果让我的同志们都回房休息，我就上楼去休息，否则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在一起。”他们说：“他们在此地也可以休息，还是请老先生休息去吧！”这时同志们都来劝我，我估计同志们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才回到楼上房里去。这时，我们的联络处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数十名军警和许多便衣特务来来去去，四处梭巡。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的肩上又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必须想出正确的对策，以维护党的荣誉和保障同志们的安全。我反复地考虑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眼前的具体情况，想到：既然我军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国的民主运动又日益高涨，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国民党会不会像在皖南事变时对待叶挺同志和新四军那样来对待我们？一般地说它现在还不致那样，但也不是绝对地不可能。它会不会把我们

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它绝不情愿，但要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最大的可能是：表面上说把我们送回，而又尽可能地来分化瓦解我们。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斗争！至于我自己的安全，由于年纪大，又是政协委员，条件要比同志们好得多，我必须挺身而出，领导同志们一起战斗。有没有危险呢？当然也会有的。但早年参加革命，即已不顾一切，现在偌大年纪，尚有何可惜……想着、想着，有时眼前忽然浮现出邹容烈士的形象，有时又出现杨闇公同志的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一刹那就逝去了，但是我的斗争决心却更加坚定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便到了天亮。

第二天(二十八日)十时左右，孙元良来了。他毫无表情地把他的公文重述了一遍。我也把我们的态度告诉了他，并且严正地向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我越说越激昂，他虽毫不感兴趣，但也只好听着。我要他撤退监视的军警，他说：“为慎重‘保护’起见，不得不如此。”我要求去见行营参谋长肖毅肃和重庆市长张笃伦，他说他可以去和他们商量。我又问他《新华日报》报馆的情形，他说情形“很好”，请我放心。是的，对于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我是放心的，但是，在这般豺狼横行的地方，对同志们安全，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于是提出要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熊复和于刚同志见面。孙元良无法，回答说可以转告。孙走后，我即拟电致

张群(他仍是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当时在南京),抗议二十八日的军警暴行,说明我们的坚决态度,并要他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立即撤退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营业。此后,我即利用时间,向同志们讲革命故事,以激励大家的斗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讲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不仅我们的同志都凝神谛听,有感奋而泣下者;连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围拢来听,有的人也似乎颇受感动。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兴奋,并且没有休息,我身体有些不适。他们想给我找医生看病,我拒绝了,但要求我们自己找医生。我觉得这样靠得住些。三月一日下午,平常即很同情我们的薛映晖大夫来了。他看完病之后,故意大声地说:“血压高,要绝对的安静!安静!”我便趁此把监视我的人赶出了我的房门。午后六时许,肖毅肃和张笃伦来了一趟,肖对军警的无礼行为,竟佯装不知。接着,到晚上,重庆美国副领事布德持董老来电说:“美国飞机将于五日及六日各来一架,各载五十人飞回延安。”我说:“两架飞机怎么能载得下?必须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决不走!”我最担心他们采取“分割”我们的办法,以便在途中尤其是在西安谋害我们的同志,因此坚决要求肖毅肃代电张群,必须多准备四架飞机,他答应了。那些监视我的军警特务,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见美国人来表面上对我都很客气,因此以后对我们也客气多了,实在令人可笑而又可恼。

和联络处一样,二月二十七日晚,我们在乡下的新华日报馆和在城内的营业部、宿舍,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包围和搜查。这三处的同志们都被他们拘禁在乡下的报馆里。但是,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雄壮的歌声响彻

云霄，使周围的群众听了也感到激愤。三月二日，熊复和于刚同志在宪兵和特务的监视下来向我汇报情况。于刚同志刚说话，一个特务即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我立刻火起，严厉地问他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要趁我还没有死，把话讲完。”那个特务就此不敢作声了。他们两人报告完毕以后，我对他们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那时，除重庆外，成都、昆明尚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三百八十人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我越讲越兴奋，特务们想来制止，我于是更加上劲，讲个不停。同志们怕我又累了，劝我不必讲了。临别时，我又要他们两位回去告诉报馆的同志们，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于刚同志大声地回答：“我们一定不怕！”态度异常悲愤。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很激动。

从此以后，我又有意识地向那些监视我们的军警，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做些工作。我继续给他们谈话、讲故事，并送些书给他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们的一个连长也曾来要求我题字，我便顺手给他写了一句“为革命而奋斗”，谁知他见此作何感想？

三月八日，孙元良和一位什么连长同我坐在一辆小汽车里，一左一右，把我“护送”到了飞机场。但到机场一看，却只有两架飞机。我非常生气，坚决不走。这时孙元良很着急，反复保证第二天一定还来三架飞机。经了解：那三架飞机没来，确系临时气候原因，次日一定可到。而同志们经分析后，也觉得情况属实，劝我不必担心，可以先走一天。这样，我才上了飞机。要回延安，

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但对重庆，却有些恋恋不舍。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怎能任它老被反动统治者去蹂躏践踏呢？重庆，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而且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你的面目一定要焕然一新。

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与我们的撤退差不多同时，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机关和人员也都撤退了。

接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后果，令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宣称要作战到底，把和谈之门彻底关闭。十九日，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吞下了一颗致命的炸弹。果然，不久之后，我军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并即转入进攻，终于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推翻。

重庆谈判与旧政协*

李维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党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矛盾得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矛盾，突出为主要矛盾。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丧失了大片国土，龟缩在西南、西北。在其统制下的大后方，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建立了许多敌后解放区和根据地。日本投降时，解放区共有一亿人口，一百万八路军、新四军，二百万民兵。

抗战结束，蒋介石为了抢夺应该属于人民的胜利果实，“下山摘桃”。他一面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急于抢占东北、华北；一面勾结敌伪，命其继续抗拒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经历了八年抗战流离困苦的广大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

* 本文摘自李维汉《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原文原载《回忆与研究》。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

希望和平建设，重整家园。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国际舆论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的美国，虽然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反对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一致立场，但鉴于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怕打下去国民党会垮台，失去美国在华利益，并使美国在国际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便以调解为幌子，插手中国内政。它企图以政治手法，即促使蒋介石实行吸收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政府的政策，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力量如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德全、柳亚子、谭平山、王昆仑以及主和人士如于右任、张治中、邵力子等，赞成同我党实行和平谈判。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运兵部署需要时间，这些因素使得蒋介石采取了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手法。

至于我党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即指出：在打败日本以后，中国仍有两个命运、两个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第一个前途。”抗战胜利后，我党又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是早有高度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曾及时指出：“虽然我党坚持反对内战，但必须清醒的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重 庆 谈 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想通过谈判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欺骗人民；二是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三是签定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文，套住我们。他还开动宣传机器，造谣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民主，澄清蒋介石对我们的谣言诽谤，揭露他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中估计，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的承认我们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争取好的，准备坏的，这是毛泽东历来的思想。我们的谈判方针是：“在谈判中准备作出某些不损害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陷于被动，我们就有理由反击。”通知中并告诫全党，绝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我当时也担心他的安全。但是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主张毛泽东去，因为这样可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成果，并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宣传我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打破蒋介石的谰言。关于安全问题，周恩来估计了在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和美方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不敢随便动手，同时

也作了必要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他一直伴随在毛泽东身边，亲自掌握保卫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张治中、赫尔利（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然而，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编纂的《剿匪手本》。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亲自密令送发《手本》，要他的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其迟滞贻误者必当执法以罪。”谈判期间，双方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九月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纠集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进攻晋东南解放区，但在十月间被我英勇的军民击退了。

在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签定了。在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的主张。我党也主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协定中还规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按：我党原来提出的是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是根据国民党王世杰的拟议商定的。）

没有达成协议的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重选问题，双方军队整编问题。前二者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同意组织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三人小组解决。

《双十协定》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它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为遵守协定，我驻江南新四军，

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开始撤往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和平诚意，仍然加紧内战部署，向我进攻。战火日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频频呼吁，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国。国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十二月二十七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声明，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指出：“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战问题”，“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声明。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保持双方在一月十三日以前的军事位置。同时成立了国共及美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在毛泽东签署的停战令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我党明确提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经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旧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旧政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的同一天开幕。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的代表，

一、中国国民党(名为政府代表)：

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三、中国民主同盟：

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四、中国青年党：

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

五、社会贤达：

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五个小组：(一)改组政府；(二)施政纲领组；(三)军事组；(四)国民大会组；(五)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我党主张是：(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二)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四)实行地方自治；(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

国纲领》。“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交给它，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一月十日到三十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即（一）政府组织案；（二）国民大会案；（三）和平建国纲领案；（四）军事问题案；（五）宪法草案案，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我方是作了很大的让步。比如在改组后的四十名国府委员中国民党占一半即二十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三分之一的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我党并说服民盟、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台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数的四分之一，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我方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我方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撕毁，这当然是件坏事，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理了，广大群众就看清了它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其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们则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第三方面的表现

旧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他们当中少数人是左派，多数人代表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中间派，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独裁、反内战，在这个重要方面同我们是一致的，是主流。至于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一部分和民社党（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则是倾向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是右派。

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开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五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来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五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罗隆基在他关于旧政协回忆文章中就专门谈到他同王若飞在政治小组中的合作情况，他对此是很感动的。后来在王若飞的追悼会上，他又表示了为争取一部民主的宪法决不让步的

决心。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斗争中对美国一直抱有幻想，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壮大第三方面的力量，但总的说表现是好的。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一九四一年起成为我党对外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会见的场所之一）碰头，相互交换情况和意见。即使对青年党，我党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它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它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真实面目为止。这是我们对青年党以及同青年党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们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

还有几个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当时未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们都很关心会议的召开，在会外积极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如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积极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参加旧政协的一些回忆

罗 隆 基

旧政协成员的构成

一九四六年一月间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四十三天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而召开的。共产党主张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训政，承认中国各民主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通过各党派和平合作的途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协商的时候，最初拟议组成旧政协的成员是这四方面的代表：（一）国民党代表九人；（二）共产党代表九人；（三）民主同盟代表九人；（四）社会贤达代表九人。到了旧政协快要开幕的时候，蒋介石又唆使青年党同民主同盟闹分裂，于是旧政协的组成人员，由四个方面的代表变成五个方面的代表，而全体代表的人数亦由三十六人增加成三十八人。

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和平发展新阶段中的一个比较重要党派，

• 罗隆基，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本文摘自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该文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标题和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编者

它的前身是民主政团同盟，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三党三派联合组成。当时的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是它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党员人数较多。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青年党党员参加民盟的人数也多，在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十三个执行委员中，青年党占了九名。青年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担任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民盟初期因没有设立行政工作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就由青年党总部的干部代办，这样，青年党实际上操纵把持了整个盟务。

青年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坚决反共的，是蒋介石豢养的一个政党。早在一九四四年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时，盟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党派和盟内全体无党派盟员，对于青年党操纵把持民盟的局面就很反对，要决心打破这个局面。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民盟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十月初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追认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时，日本已经投降，全国人民正在呼吁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民盟的极大多数盟员反蒋反内战的情绪更高涨，对于蒋介石用金钱豢养的青年党的反感更加强烈。于是昆明、重庆和成都的无党派盟员代表，同救国会、第三党以及国社党、职教派、乡建派的入盟盟员的代表联合起来，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采取联合行动，完全控制了整个大会的形势，压倒了在盟内的青年党党员。在增选民盟三十三个新的执行委员时，预定计划，本来要使青年党党员一个人都当选不上。后来经张澜的疏通调解，才使青年党的两个盟员当选了新的中委。左舜生虽然保存秘书长职务，但实际行政工作，由章伯钧（组织部长），罗隆基（宣传部长）共同负责。经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党已经认识清楚了，它没有继续操纵把持民主同盟的可能了。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它

决心同民盟公开分裂，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

旧政协的召开和人员组成，本来在《双十协定》中，就已经初步商定民主同盟为九人。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也看清楚了，利用青年党来操纵把持民盟，事实上已不可能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代表时，原来考虑给青年党一个代表(左舜生)还是两个代表(左舜生、李璜)。就在这个关头，某一天(日期忘了)国民党方面由吴铁城、张群等出面，邀约民盟一部分常委，用商谈旧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在参政会一个小会议室里举行谈话会。我是被邀人之一。此外还有沈钧儒、左舜生、李璜、章伯钧等。起始由张群说了些蒋介石政府准备怎样举行旧政协的话，并征询大家的意见。后来谈话就转到了关于民盟九个代表名额在盟内各党派如何分配的问题。当时我内心正在诧异，认为这是民盟内部的问题，何劳国民党越俎代庖来过问呢，突然，青年党左舜生开腔了。他用十分肯定的态度说：“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它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民盟九个代表的名额，青年党要占五席。”左舜生这一段话当然使民盟其他在座的人大为惊异。九个代表名额青年党占去五个，剩下的四个名额不仅要在民盟其余的两党三派中来分配，而且还要包括盟员占极大多数的无党派这一方面，这怎样分配得过来呢？我就没有料想到这本来是国民党同青年党事先策划好了的一个拆散民盟的阴谋。我就批评左舜生不应该在这个场合中，提出民盟代表名额分配的问题来，关于这类问题，最好回到盟内去协商。我亦指出以民盟盟员的人数来说，无党派关系的盟员人数不知超过入盟的青年党员多少倍，青年党凭什么理由开口就要五个代表席位呢？我这几句话当然激怒了左舜生，于是左舜生就把他的一贯固执的性格暴露出来了。

他提高了嗓门，以右手拍拍胸膛，表示十分坚决的态度说：“青年党一定要五席，决不能少，这不是要价还价的问题。假使民盟不同意这种分配办法，青年党就要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青年党同时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民盟在政协有几个代表，青年党要求同样的数目，不多要，亦不能少要。”问题当然就僵住了，谁也不好说话了。统共只有九个代表，难道民盟同青年党平均分配。每方面四个半吗？民盟其他几位在座的常委当然也先后发言，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原则。张群这个政学系老政客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是善于玩弄圆滑手段的，一方面他既要照预定计划，支持青年党来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要做得面面光而不过分地得罪民盟其他的在座人。于是他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问题上真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倒是办法之一。这不就减少了民盟内部的纠纷吗？至于这两方面每方面几个代表，是否两方面代表的数目一定要相等，这总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民盟主席表老（指张澜）今天不在座，这件事总要去同表老谈谈再决定吧！”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后来关于这个问题，张群、左舜生、李璜都先后分别同张澜主席谈过。张澜主席对这个问题亦同民盟的常委几度商量过。民盟的常委当然一致拒绝青年党这种毫无理由的要求。这个问题最后就由国民党同共产党去协商了。

国民党同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协商的详细经过，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最初共产党坚决不承认青年党这个独立的单位，同时坚持民盟九个代表的席位绝对不许减少，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青年党应有五个代表。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代表等曾一再到特园来向民盟的负责人表示态度，他们说共产党对民盟应有九个代表席位这一点，必不让步，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并

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今后更应加强团结，准备在政协会中，共同斗争。后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的结果，民盟仍然保持九个代表席位，青年党亦可以另成单位有五个代表来参加政协。这样一来，各方面代表总数就超过了旧政协三十六个代表总名额的既定数目了。共产党于是提出，为了保持民盟九个代表名额，由共产党同国民党让出名额来解决问题。两党让出名额的比例是二对一，即共产党让两个名额，国民党只要让一个。国民党当然无话可说了。协商的结果是：（一）国民党八人；（二）共产党七人；（三）民主同盟九人；（四）青年党五人；（五）社会贤达九人。总数由三十六人增成三十八人，这就是后来旧政协的代表名额总数。民主同盟九个代表的分配最后是这样安排的：（一）无党派两人，张澜、罗隆基；（二）救国会两人，沈钧儒、张申府；（三）国社党两人，张君勱、张东荪；（四）第三党一人，章伯钧；（五）职教派一人，黄炎培；（六）乡建派一人，梁漱溟。民主同盟的代表把青年党的代表除外，民主同盟倒更团结了。不过问题还不能算是完全解决了。

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突然发生了。青年党的代表团由曾琦领导，五个代表中却没有左舜生、李璜两人。青年党内部一贯有“曾、左、李”三巨头鼎足而立之势。青年党亦一贯以此“曾、左、李”三杰自豪，他们认为这是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杰”并称的佳话。这次青年党的代表团中怎么把左、李排除在外呢？当然外间流传的说法不一。这件事却在民盟亦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左舜生从来就是民盟的秘书长，李璜亦是民盟常委中比较活动人物之一。这两个人是一贯包围张澜而在民盟内部起相当作用的。左舜生、李璜这两个人不参加政协，在张澜主席看来，似不太妥当。于是张澜主席就多次向盟内提议，要把他自己的代表席

位让给左舜生或者李璜。张澜一再说明，他自己年老，精力已衰，不能参加政协。他认为左、李两人中任何一个人参加，都比他自己参加，作用较大。对张澜主席这种意见，民盟常委的极大多数都是不同意的，都认为张澜是民盟的主席，是首席代表，怎能不参加呢？张澜主席当时亦有他自己言之成理的答复。他认为国民党的蒋介石不参加政协，共产党的毛泽东也不会来参加，何以民盟的主席就非参加不可呢？我自己当时是坚决反对张澜主席把代表席位让给青年党的。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中已有了五个代表，再加上一个席位，这同青年党当时在中国社会上的实力和影响太不相称了。于是我当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只有把青年党在盟内的党员开除出盟，这就使张澜让代表席位给青年党的打算，无词可借了。并且开除青年党的盟员出盟，是青年党首先自绝于民盟，是它首先破坏民盟的纪律，这是它咎由自取的。把青年党的盟员开除出盟，在当时却引起了盟内一个争论。首先张澜主席是不同意的。另外有些有党派关系的常委亦不同意，他们还愿意保持盟内三党三派的原有联系。但教国会的盟员以及无党派的盟员是一致赞成把青年党开除的。史良同我当时是坚持开除青年党党员出盟的。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盟内相持不下，引起了一些风波。最后大家看到青年党同民盟的分歧愈来愈大，民盟常委会决定以后召开的一切会议即不再通知青年党的盟员参加，实际上就等于把青年党开除出盟了。

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两人始终没有机会参加旧政协，此中内幕又另有一种传说。这又是蒋介石操纵和玩弄在野党派的一段故事。在蒋介石召集第三届参政会的时候，他看见国社党的张君勱和青年党的左舜生两人，都是在野党派的领导人，而同时又都在民主同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于是在第三届参政会中就推举两

人为副主席，以便拉拢青年党和国社党来操纵民盟。但蒋介石把左舜生抬高到参政会的副主席地位，这却使青年党的党魁曾琦大失所望。曾琦就一怒而奔到昆明，再进一步就跑到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南京、上海去了。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从北平把曾琦用飞机接回来，支持他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企图再用曾琦领导的青年党来挽救青年党操纵民盟的颓势，民盟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曾琦还亲自到大会来讲过话。曾琦是个到处都摆出党魁架子来的人，他那次讲话倒更引起了民盟大会代表对曾琦本人和对青年党的反感，青年党在盟内的影响，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更加削弱了。曾琦就认为这是左舜生、李璜在民盟工作没有做好的结果。再加以曾琦恢复领导后青年党内部的宗派斗争，于是青年党参加政协的代表团就由曾琦亲自领导，而把左舜生、李璜两人都排挤在外了。

蒋介石虽然把青年党从民盟中拉了出去，实现了拆散民盟阴谋的第一步，但并没有能使民盟瓦解。他是不甘心就此罢手的，他还要进一步来搞别的花样。利用青年党来拆散民盟的阴谋没有全部成功，就转而进行分别对民盟代表个人的拉拢和收买。后面我就要谈一两件我自己身经其事的故事。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的时候，我的一位安福小同乡和幼年时候的小同学、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突然约我到他家去吃年夜饭。当时旧政协快要开会了，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会转到这个问题上来。请我吃饭的主人就以小同乡和小同学的关系，殷切地劝我说：“抗战胜利了，国家建设处处需要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最好到政府中来担负一些实际责任，做些实际工作，你何必费时间老搞民主同盟这类没有政治前途的党派活动呢！”话来得很突然。我就说：“政治协商会议快开了，会议开过后，不是要组织联

合政府吗？到那时举国团结，党派和平合作，大家都应该各尽所能出来担任些工作。”他冷笑了一笑后接着又说：“你以为共产党真肯同国民党和平团结合作吗？尽管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呀，你还没有像我真正认识共产党呢。”在这段话以后，我们有一段相当长的争论。我坦白地告诉他，我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过我亲眼看到，在八年抗战期间，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抗日的，而国民党的总裁却保存实力，进行内战，对不起中国人民，亦对不起共产党。于是彭学沛就以沉重的声音对我说：“我晓得你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才约你来好好地谈谈，为老兄打算，最好不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你何必夹在两大党之间去吵呢？结果是两面不讨好的。共产党只是利用你，不会信任你的，真要到政府上来做点实际工作，负些实际责任，最好不参加这次左右做人难的会议。保全你的身分，才好做工作。”他还借箸代筹地为民盟九个代表的安排设计了一番。他认为青年党五席，国社党三席，第三党一席、是很合理的，至于职教派的黄炎培，乡建派的梁漱溟，在他看来他们倒是真正的社会贤达，社会贤达的九个名额中当然可以安置。我马上问他这是不是国民党的计划，他连忙回答说：“不是，不是，我在党内并不负这些责任，不过问这些事。不过别人知道我同你是小同乡小同学，要我来同你谈谈你个人的前途。”由于他在话中漏出了“别人”两字，我就紧紧地追问这“别人”是谁。他总是笑而不答。直到吃过饭临别的时候，他又郑重其事地说：“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只要你决定不参加政协，自然会有下文，将来你自然会知道谁要我来同你谈的。”这是一段故事的经过。

过了几天，国民党的范予遂又来约我谈话。范在当时同我的交往是很少的。他约我谈话的时候，就事先声明是奉张群的使命

来的。他问我是否已经决定代表民盟去参加政协，我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参加。他一再问我还有考虑的余地没有，我肯定地答复说没有了。他于是吞吞吐吐地劝我在会中最好少发言。他到了第二次再约我谈话的时候，才把来意和盘托出。他说：“岳军先生（张群的号）劝你在会上最好少说话，最要紧是不要说于共产党有利，于国民党不利的話。”我告诉他，我是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只代表民盟说民盟要说而且应该说的话。至于那句话于国民党不利，于共产党有利，那我自己就无法考虑了。谈到这里，范予遂就困穷而匕首见了。他说：“岳军先生同你私人是有交谊的。他为你打算，在政协结束以后，像你这样的人最好到外国去做个大使，这是能发挥你的长处的。你的同学和朋友目前在国外做公使或大使的，总在十个以上。他们有的人学历和才气还不如你呢！岳军先生好几次想推荐你，只因你过去写文章和说话太多，他总怕党内有人反对，所以要我来把这个意见向你转告，这完全是好意。”我听了这些话，当时内心的确有些动摇，“到外国去做个大使”对我未始没有引诱力。范见话已打中要害了，于是就接着说：“假使你同意的話，在政协开幕的那天，你同岳军先生在会场上‘握手为定’。”坦白地说，我当时虽未答应，却亦未拒绝。对于范予遂的几次谈话，我的确思索考虑过。最后我认为，政协开过后，迟早是要成立联合政府的，今天又何必急于牺牲我一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而去做这个“握手为定”的买卖呢！为着要避免在开幕那天同张群作“握手为定”的拍卖，我那天就有意到会迟些，并且有意地不同任何人握手。恰巧，那天会场上缪云台走过来要同我谈话并且握手，我有意地把手反到背后，又笑着说：“天天见面的朋友，还握什么手。”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我在旧政协会议中，不但没有少说话，并且特别多说了话，尽量说了我良心上当时认

为应该说的话。

从这个时候起，参政会秘书长雷震对我的招待亦特别殷勤周到了。经常约我到他的家里吃饭打牌。偶然中当然亦要聊聊政治。毫无疑问，他是有使命并且有目的来殷勤招待我的，彼此亦都心照不宣。

据我所知，国民党反动派当日不仅对我耍了这套把戏。他对民盟其它代表亦派定了专人，分别进行拉拢和联络的工作。举例来说，在政协进行期间，国社党的张君勱、张东荪居然成了宾客满门，应接不暇的红人，国民党除经常派人个别地同他们保持个别接触外，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勱、张东荪。一月二十二日张群、吴铁城又设宴款待国社党的两个巨头张君勱、张东荪。据当时报纸报道，在这两次宴会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张君勱、张东荪两人在此以前并不是政治上的红人，特别是张君勱、在抗战前在上海的时候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绑过票的。到了现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主席的身份，居然躬亲其事地盛宴招待他，这岂是毫无目的的寻常应酬吗？在这几次宴会中，他们到底谈过些什么，当然只有当事人明白。

蒋介石把青年党从民盟内部拉了出去，使它成为参加旧政协的一个独立单位，在旧政协会议中做国民党的帮手，并且使它今后可以奉命承旨，参加伪国大和联合政府，这个阴谋总算成功了。蒋介石的第二步阴谋便是把国社党从民盟中拉出去。国社党是民盟有关联的三党三派中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党，张君勱当时在盟内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常委。张澜曾经有过几次想把民盟的主席让给他，这就说明张君勱在盟内的重要性。张东荪是国社党创始人之一，是张君勱几十年的挚友。他们两人实际上是国社党的领导人。这两个人当然是蒋介石拉拢国社党以拆散民盟的阴谋所不能

轻易放过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蒋介石这个阴谋计划，并不是枉费心机。十个月后，到了十一月十五日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以后进一步组织政府的时候，民社党（即国社党改组后的名称）是参加了伪国大和政府替蒋介石做了欺骗人民的工具的。

总之，蒋介石当时决心要破坏和拆散民主同盟，要阻止民盟在旧政协中同共产党的合作，那是处心积虑，用尽了鬼蜮伎俩的，不过蒋介石心劳日拙，在完全拆散和瓦解民盟这一点上，他最后还是完全失败了。

骗人的把戏

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的。在会议开幕前，会场上已经传遍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消息，说国民党同共产党就在今天已经签定了一个《停战协定》。内战可以从此停止了。国家从此可以有和平了。在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中国，这是一个多么可庆可贺、鼓舞人心的消息。这又为旧政协准备了多么良好的气氛！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在此时此地要开幕了。倘使这次会议开得好，今后全中国人民就真能在和平、团结和合作中，共同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我对旧政协能够躬与其事，当时自己真不知道有多么的欢喜，多大的荣幸，心真跳得天高。

瞬息间蒋主席驾到了。会议主席宣布开会了。蒋介石装着满面春风的样子，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开幕词，说什么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第二，“要大公无我，顾全国家利

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对这三个“要”字，有谁能说半个“不”字吗？他在讲完开幕词后，还接着又补充了所谓的“政府决定要实施的事项”的四大诺言，那就是：（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二）“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四）“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这就是后来人民一再要求兑现的四项空头诺言，这四项诺言，当时又有谁能说不是民主的一些重要内容吗！

蒋介石唱的这场开幕戏，真使得到场听众，满意而归。那一天，许多中外记者都得到了入场券，都到场看了蒋介石演的这场戏。散会的时候，还有同我相识的中外记者，向我握手道贺，认为中国今后有和平了，有民主了，有自由了，中华民国今后真有光明的前途了。我亦欣喜若狂，会散后立刻向朋友奔走相告。

原来这是蒋介石假和平戏法表演的开端。从那时起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号伪国民大会开幕的时候为止，他的戏法就一场接着一场上演。

在旧政协那二十一天中原来要谈的问题很多，目的是要做到各党派的和平合作。各党派的和平合作，特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这是两个阶级本质不同的政党的合作，这不只是笑脸相逢，握手言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这必须有双方都能够接受共同纲领做合作的基础。《和平建国纲领》是这次会议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案。尽管这只是宪法未制定前一个过渡时期的纲领，但这却是一个争论最多的问题。此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政府组织、军事善后都是要在会议中协商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内幕斗

争的经过，现在只能谈个大概。

旧政协会议头几天听了政府代表关于几个大问题的报告后，全体代表就分成五个小组讨论问题，那就是：（一）政治组；（二）军事组；（三）和平建国纲领组；（四）国民大会组；（五）宪法草案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题。各代表单位都各自推定一个或两个代表分别参加小组。我是代表民主同盟参加第一小组，即政治组。这个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改组政府。参加这个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共产党代表是王若飞。其它几方面都有代表参加

在这里，我先谈谈我参加的第一组的斗争情况。从一九三七年发动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全国人民和各在野党派都要求国民党取消党治，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就始终顽强地拒绝了这个要求。现在抗战结束了，蒋介石看大势所趋，知道全国人民又要逼着他非把十年前他所作的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这两句诺言兑现不可了。从现在到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总还有个短的过渡时期。在这个短的过渡时期中，非成立一个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共同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不可。当前怎样来改组政府，改组成什么样的一个政府，这就是政治小组讨论的主题。

蒋介石自己知道，所谓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这比较是个远期的事，他自己亦容易推延，并且他早已选出了代表，草定了宪稿，这事比较容易应付。至于改组政府，旧政协决定了就得办，并且政府是领导全国行政的最高机关，这是他自己个人专制独裁的存亡问题，这就牵连到他眼前的切身利益了。蒋介石自己的打算，最好是：既有改组政府的空名，又能保持个人独裁的实质。王世杰就秉承了这个方针来对付第一小组。在这个小组的工作中，就有了民主同专制独裁的一系列的斗争。

共产党王若飞代表同我就事先好好地研究了对策。我们首先分析了王世杰提出来的方案。王世杰提出来的方案，叫什么《扩大政府组织法》。他用“扩大”两字，避免用“改组”两字，而他所谓的扩大的机构是指当时蒋政府中原有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说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谁也知道，那是“党国元老”的一个养尊处优的敬老院。大家都知道那是“有薪可领，无事可做”的闲散机关。王世杰在提案中首先就标上这样一条“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的指导机关”。蒋介石就企图把在野党派的人骗到这样一个所谓的“指导机关”里去，这就算是成立了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蒋介石专政独裁十年的历史，已经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谓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能够指导谁呢，谁又肯听它的指导呢？

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是指领导行政的内阁说的，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制中应该是各部会组成的行政院。但在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这两句话里，行政院是个“能”的机关，不是“权”的机关，而蒋介石又进一步地歪曲解释了孙中山先生这两句话，以便利他的个人专制独裁。当日的行政院就成了既无权，又无能，只是一个执行总裁命令和字条的事务机关了。王若飞同我经过研讨之后，认为假使我们把改组政府的重点放在改组当日的行政院，亦会陷入蒋介石的圈套之中。王世杰的提案中亦轻描淡写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行政院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政务委员得兼任部会长官。”而王世杰在讨论中亦口头表示，将来行政院可以让出几个政务委员来，请在野党派的人来担任，却不说要提高行政院的职权。王若飞同我当时就认定这不是关键问题。

王若飞当时向我一再强调，今天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来改变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我当时是

在大学中教《宪法》和《比较政府》的人。王世杰又自命是中国宪法的专家。王若飞代表就一再鼓励我，对这个政制的斗争要好好地计划和准备一下，来进行这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经过王若飞代表同我事先几次的讨论，我们两人就共同商定，我们可以接受王世杰提出的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建议，但我们要坚持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用委员制的集体政府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总统制。在实施宪政以前，国家既没有主权机关的议会，而蒋介石早已选出的国民大会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召集，同时我们亦不能让那样一个庞大的御用机关来行使国家主权。因此我们就决定且先把国民政府委员会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行政院的委员，包括各部会长官应由这个委员会来任免，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同意，国家的预算决算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通过，立法原则，施政方案，军政大计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必须这样，我们在野党派参加这样一个政府机关才有意义。我们两人就依据这些原则在小组中来同王世杰进行斗争。

我们这个小组的进展是比较慢的。为着委员会是“指导机关”还是“最高国务机关”这个问题就争了好几天。其它许多条文是逐字逐句地都有过相持不下的争论的。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既然打起“要树立民主楷模”的假旗帜，我们就常常引用蒋介石这句话，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来击败王世杰。王世杰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学者，他对我们所坚持的这类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是无法拒绝的。我们在政府组织法中总算得到了一些比较民主的协议了。

我当时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他守的时候真是坚

强。我当时颇为诧异，他对我们日常所教的那些资产阶级《宪法学》和《比较政府》中某些名词，亦搞得烂熟。当他依据原则坚持条文中某句话或某几个字的时候，上午是这样，下午还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寸步不移，寸土不让。在每次开会前，他总要把对当天会议的战略战术向我分析一番。他每次谈完话后，总要向我叮咛几句：“你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我总笑着说：“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他是个身肥体壮，乐观好笑，和蔼可亲的人。等到我答完他那几句话后，他总在我肩上拍几下，笑着同我一块进小组会议室。共同开了二十几天的会，我们两人合作得很好，私人亦成了相当好的朋友。我回忆到那年四月八日王若飞代表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而中途飞机失事遇难的往事，他在临行前还给我通过一次告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最后又笑着说：“你不要轻易让步，随便退却哟！”我当时在电话中亦照样笑着回答他说：“王司令官，你安心回去吧，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不幸，我这几句话却成了我同王若飞代表一别永别的诀别语。后来四月十九日在重庆举行王若飞先生等追悼会的时候，我代表民主同盟在会上致悼词，我以手恭指着王若飞先生的遗像，用严肃、坚决而沉痛的语音，再一次地说了这样几句话：“王若飞先生，你安心去罢；对争和平，争民主，我是永远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当时到会的许多人听到了王若飞先生生前对我叮嘱的这几句话的时候，在肃穆静寂的追悼会中，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予以长时间的掌声。我今天回忆往事，追念故友，犹有余恻。

关于政府委员会职权的斗争告一段落后，讨论就转到委员名额的问题上来了。原有的国府委员名额是三十六人，王世杰原提案只是增加十二名，增加原有数目的三分之一，合为四十八人。

换句话说，国民党原封不动，保留总数四分之三，而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进四分之一，这就是他所说的扩大政府组织的实际内容。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欺骗。我们告诉王世杰，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政府重新改组，而不是他所谓的“扩大”。在改组政府的原则下，委员名额应重新再定，减少或增多都可以。几经争执，名额定为四十名。接着名额分配的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当时的谅解是政协会议开过后，政府马上就要改组的。那末，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四十人中，国民党占几席，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几席呢？结果我们让国民党占名额的半数，占二十名，关于这一点，王若飞代表在小组会上一再声明，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大党，所以占国府委员名额的半数，这是很大的一个让步，不过希望政府改组的事，一定要立即实现。至于其余二十名委员名额的分配在小组中不能立即确定，所以亦就没有讨论。关于席位分配均未记入正式条文，只在附注中注明一条：“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各党派及其它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后来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延不改组政府，就利用“其余半数，其分配另行商定”这个尾巴，来抵赖自己已经承认过的商定的数目，以推延改组政府。直到那年七八月间美国马歇尔九上庐山的时候，报纸上还常有所谓国府委员名额十二名、十三名、十四名之争的问题，弄得社会上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是后话，此处暂不详谈。

这里却应该特别地说明一点，这个小组的协议是准备在旧政协结束后就马上见诸实施的，换句话说，旧政协结束后，国民党就应该立即进行改组政府。在改组政府的程序中，应该是国民政府委员会同行政院同时进行的。其余几个小组协议的实施，要在新的政府成立后来执行实施。关于行政院改组，这个小组亦已确

定应有七席或六席政务委员归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关于国府委员其余半数名额以及行政委员的几个名额的分配，在会议中和会议结束后不久的协商中，都已经大体上有了确定数目的谅解。由于蒋介石要进行内战，于是对已经分配的名额用抵赖的方式来推延改组政府。

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既然占了二十席，加上它可以驱使利用的青年党和它豢养的所谓的社会贤达，那末，蒋介石就可以稳占多数，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限制独裁专制的权力，于是王若飞同我在表决法中又争得了这样一个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始得通过。”因为有了这个条文，所以共产党同民盟就要在国府委员中掌握三分之一以上的否决权。这亦是后来一个很大的争端。

关于国民大会的代表问题，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极为注意的一个争论。国民党坚持要把将近十年前选好的一千二百名代表来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这批代表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因为在选举时国民党正厉行它的“党外无党”的法西斯政策，其它党派是非法的，是不许竞选的。这种维持十年前选出的代表的办法，当然在法理上和人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举国人民一致所反对的。民盟盟员是一致反对的。就是国民党所操纵指使的青年党亦是反对的，因为当年他们亦没有参加竞选的合法权利，共产党代表当然根据全国人民的一致意见，坚决反对。这个问题使旧政协几乎成了僵局。最后还是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亲来同民盟的代表团一再商谈，认为为着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的大前提，我们姑且向国民党做这次让步。我们承认国民党原已选出的一千二百名代表，但增加“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并增加台湾和东北几省的代表一百五十名，总共代表二千零五十名。我

们坚持“宪法的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并且我们坚持共产党同民主同盟两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应占代表总数四分之一强，以防止蒋介石把国大做成他的表决机器，任意通过一部个人专制独裁的宪法。这个问题，由于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退让精神，才在上面这些条件下得到了协议。

关于宪草问题，当时倒有些颇饶趣味的争论，这里可以简单谈谈。国民党不止早已选好了一千余名国大代表，并且早已搞好了一部《五五宪草》。这部宪草在旧政协的时候，戴上了一顶“总理遗教”的大帽子，是不容许改动的。这部宪草是孙科主持搞的，是否真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那另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人来说，那是一部不三不四的东西。当时民盟代表张君勱对宪法问题是极感兴趣的。他同我一样，是幻想把英国的内阁制搬到中国来，而对所谓的《五五宪草》是不满意的。

孙中山先生对政制的确有过这样两句话：“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孙科就机械地搬运这两句话到宪草中来，于是所谓的《五五宪草》就设置了一个庞大的国民大会来行使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这4个直接民权。国家既没有了行使主权的议会，政府实际亦不向议会负责。这样的制度是最适宜于个人独裁的。在我同张君勱的眼光中，这部《五五宪草》是“人民无权，总统万能。”我们就千方百计地总想把这个制度改掉，但在语句上又不要明显地推翻总理遗教，废除行使四权的国民大会。张君勱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了，叫什么“无形国大”那就是不取消《五五宪草》中国民大会的名词，但把国大改成这样一个条文：“全国选民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议、复决），名之曰国民大会。”这真是一个偷天换日的骗人的把戏。国民大会在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却没有了具体的机构，亦不选

举代表，举行会议。至于“无形国大”怎样行使四权，亦只注上“另以法律定之”几个字了事。这个建议在宪法小组中是通过了的。

关于宪草，当时宪法小组决定：政协设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各方面意见，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根据这项决议，政协又成立了十个二十五人的宪法审议委员会。除各代表团推定代表参加外，并共同协议公推会外十个宪法专家参加，张君勛同我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政协的宪法小组还通过了宪草修正原则十二条，上面所说的“无形国大”就是十二条原则之一。不止如此，另有一条还说：“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得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另有一条又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各民主国之议会。”假使这些修正原则，将来经过宪法审议委员会的工作，都把它们列入宪法草案中，那末，英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不就整套搬到中国来了吗？

这整套宪草修改原则，的确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方面拿出来的。当时共产党的代表团亦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考虑到，倘使国家真有和平，党派真能合作，共产党是准备今后在议会中从事合法的斗争，用和平斗争的方法，以求达到中国的革命目的。因此，关于宪法修改原则问题，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的晚间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就是共同讨论的结果。关于宪法的讨论，在旧政协闭幕后，共产党代表团同民盟代表团还共同进行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又证明共产党同民盟在当日的确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旧政协这件事。这一切事实都说明，共产党同民盟不止做了认真实现政协决议的一切准备。并且做了实行宪法，实施宪政，在宪政中做合法斗争的准备

后来在三月间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的时候，蒋介石为着要撕毁《政协决议》，就唆使他那班喽啰们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借着宪草修正原则推翻了“总理遗教”的大题目，大闹特闹起来了。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中，竟公开地说，政协代表不是人民推选出来的，政协会的协议是没有法律的效力的。蒋介石决心撕毁《政协决议》，决心进行内战的真面目，已全部暴露出来了。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被骂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就分头跑到共产党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来请求让步。后来在三月二十号举行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上，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建议，征得民盟代表张君勱的同意，就把关于“无形国大”，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并得解散立法院，以及省得制定省宪等三个重要条文修改了。这是共产党同民盟根据和平团结的大原则，向蒋介石国民党所作的又一个让步。

上面我只简略地谈了政协中政治、国民大会、宪法三个小组中取得协议的一些经过。至于和平建国纲领和军事问题这两个小组，当时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讨论的问题就更为重要，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关于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党同共产党两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详细方案，两个方案的内容都是相当的详尽的。在两个方案中取得协议，当然经过了一些争论。不过当我看到共产党的方案后，我就向民盟某些代表们说过，共产党的方案的确是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真心诚意提出来的，因为在共产党提案的总则中就说明了“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且在条文中亦没有取消私有制的话。在当时以这样大公无我，实事求是的让步精神提出来的建国纲领，蒋介石还有什么刁难挑剔的

借口呢？在取得协议的《和平建国纲领》中，总则第一条就是“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第二条是“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事实上共产党对国民党尽管有这样多的让步，蒋介石毕竟还是要撕毁《政协决议》。

军事问题小组只根据“军队国家化”这个大原则取得了几项协议。至于当时具体的实际问题，是由国民党同共产党在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整编方案》解决的。根据《整编方案》，十八个月后，国家将有二十个军，共六十个师，其中国民党占五十个师，共产党只有十个师。这当然又是共产党很大的让步。事实尽管是如此，蒋介石还是借口共产党军队的驻军地点等等细微问题故生枝节，延不实施，一直吵到十一月间南京和平谈判破裂为止。

与马歇尔一席谈

旧政协是一月三十一日闭幕的。过了几天，美国的马歇尔就约我去谈旧政协的结果和我个人的估价。我当时的确料想不到整个会议是蒋介石的欺骗把戏，也料想不到蒋介石会彻底撕毁全部决议。当时我向马歇尔说过这样三句话：“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他问我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把共产党在旧政协中许多重大让步的地方，重新叙述了一遍，例如在建国纲领中没有取消私有制、生产工具公有的条文，例如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指导原则，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承认国民大会原选的一千零五十个代表等等。当然在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这些理论，亦不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等等。我只就事论事，赞扬

了当时共产党让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马歇尔问我，是不是民主同盟去劝共产党让步的。我告诉他，恰恰相反，有些问题还是共产党来说服民盟让步的。我就告诉马歇尔关于国民代表大会已选定一千二百个代表的问题，民盟当时坚持不肯让步，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就劝民盟代表团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我亦把王若飞代表关于这个问题向我说的几句话，告诉马歇尔。王若飞代表向我说，“民盟坚持反对旧选代表，这个原则是对的。我们是一致的。不过将来的国民代表大会几年就选举一次，你劝劝民盟的盟员，这次没有竞选代表机会，过几年不一样的可以竞选，一样的可以做国大代表吗？这次我们双方还可以共提几百名代表，假使你们民盟真有困难，你把你们要提的名单分一部分给我们好了，我们帮你们想法提出来。”听了这些话后，马歇尔还对周恩来、王若飞两位代表称赞了一番，认为他们两人眼光的确很远，对这次政协会议的成功，他们两位是有很大的贡献的。至于马歇尔当时对我说这样一段话，目的何在，我当时亦的确不明白。

关于蒋介石的苦恼大，我就说明蒋介石做法西斯独裁者已经十几年了，今后要遵守《政协决议》，实行民主，这当然是一个独裁成性的人最苦恼的事，并且一党专政已经十几年，今后开放党治，一切党派都合法了，不少国民党党老爷的官职要让给其它党派的人，这是国民党党内的苦恼，亦就是蒋介石的苦恼。马歇尔认为我这个看法是对的，不过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说“民盟的前途好”。我说我们这批中间派的人，极大多数是向往英美的民主的，特别我自己是赞成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内阁制的。于是我又把政协协议的关于修改宪草的十二条原则，重复说了一遍，特别强调立法院委员今后是直接民选，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长可以

解散立法院(这几条原则当时尚未取消),这不就是内阁制吗?谈到这里,马歇尔还满口夸赞他美国的总统制,和美国制约与平衡的三权分立是高过英国的制度的。我们还争论了一番。最后,他还预祝民盟的成功,亦鼓励我努力自己的政治前途。

马歇尔一再问我,为什么共产党在这次政协中肯这样地让步,又说有人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重点是放在土地改革方面,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同苏联的共产党有所分别,关于这类问题,我当时亦的确说了些荒谬的话。我知道马歇尔是反苏反共的。他希望中国的共产党同苏联的共产党是有些分别的。我的确表示同感。

这次谈话是在旧政协闭幕后两三天内进行的。那时候我的情绪是乐观的。我的确没有料想到蒋介石会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我当时亦的确没有认识到马歇尔到中国来,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马歇尔对中国的和平统一,亦颇有居功自喜之意,我还向这位所谓的美国调人表示了感谢之意。

对马歇尔这次谈话,可算是我在旧政协刚闭幕后对旧政协的估价。我在当时何曾知道,这一切就证明我正陷在蒋介石假和平戏法的骗局中呢。这可能是看见旧政协改组政府的一切条文中,可以实行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英国的内阁制,我就心切于求,而且眩于视了吧!

参加旧政协的经过

梁 漱 溟

抗战胜利后，我最初以为抗战的事情完了，对外问题结束了，而国内呢？胜利之后，毛主席就到重庆，国共两党谈合作，谈和平建设。那时（一九四五年八月）我还住在广西贺县八步，不了解真实情况，原想去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的政治活动了。直到从八步经梧州到广州，到广州才知道国事不容乐观。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来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民盟同仁正在积极奔走和谈，大家既不让我走，我也认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又卷入到现实政治里来，参加了旧政协。

旧政协的召开

旧政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的。早晨国共两党举行停

* 梁漱溟，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本文摘自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该文原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标题和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编者

战协订签字，政协大会延到上午十点方才开成。

旧政协的目标与任务，主要问题是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抗战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立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一）宪草；（二）国民大会；（三）政府组织；（四）施政纲领；（五）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

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会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一月三十一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二月二十五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三月二十七日签定）。

政协五项决议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由于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

关于宪草问题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那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了。政协于一月十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就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七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这样就于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解决的。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对各项

问题取得最后协议。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是在重庆国府路三百号，政协会场就在三百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三百号之西，相距都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章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对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主席，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决议就算全体通过。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须要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型式或蓝本：（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象民社党、青年党等等）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

2.5
1.2
7.5
3.5
4.2
30.1
12.6

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衷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张君勱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勱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美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勱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国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投不信任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勱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很不稳呀！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勱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也佩服之至。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了好些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作法。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勱的计划（孙科著

意自己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宪草小组会不过开会四次，这篇巧妙文章便得庆成功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件事不热心，我根本不去参加宪草小组，我认为不论五权宪法或英美式宪政在中国统统行不通，统统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野各方面正在兴高采烈，庆祝成功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二月四日，我被邀请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子打人，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二月十日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那天国民党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宪草。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感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方面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纪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纪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励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空偶像（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

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窘，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三月十五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十六日

中央社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法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三月二十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提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二十一日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来人要我回延安，一同谈这件事情。当时同座的有八九个人，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

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勱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决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议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去争，承认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口实。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勱拉到一边商量。君勱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寰，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勱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

当时让步共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但非“省自治法规”，二十日召开的宪草审议会上才弄清楚，二十一日中央社再发消息更正），具体内容再行研究。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二十五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接到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具体方案。先谈国民大会问题，居然搞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总是谈不拢，只有暂时搁下；着手谈省自治法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回头又谈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蒋介石要行政院对总统负责，而当时大家都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搞了好些方案，蒋都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东北战事爆发，大家也就无心再谈它了。

关于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问题，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

队国家化。政协五个小组，别的小组我都不参加，我只参加军事小组。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我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早在新四军事事件时期，我就曾跟国共双方谈过这个问题。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成员，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我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社会贤达是谁就不记得了。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一月二十一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作不到的。”我拍桌子说：“作不到也得作。”想不到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竟推翻了。二十一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有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要我们的军人脱党是作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后来，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整编，然后统编。在整编时，国共两军分别进行，国军整编成九十八个师，共军整编成十八个师，全国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第二步就实行统编，把国共两军

混合起来，一师三旅，一旅三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有分别，国军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编缩为十个师，全国共编为六十个师，以期作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抵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则，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不论驻扎在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但蒋介石却不如此理解，而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常常盘问，很重视这个问题。从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处处敌视共产党了。

关于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

政协所谈的五个问题中，宪法和军事两个问题已如上述，剩下的三个问题中，施政纲领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

现在先谈国民大会问题。

前边已经讲过，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以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如湖北和山东等省）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未办完，而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政协开会时，在野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而且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行举办公开大选。蒋介石执意不肯，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取消我好了。”蒋既然如此坚持，在野各方面虽认为蒋没有道理，但为

了大局，只有委屈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有效，选举未完的省份办理补选，只外再加上各方面提出的代表（如国民党的中委和在野各党派提出的代表），拼凑成一个国民代表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磋商的要点是增加代表人数。在野各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必拘泥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有太多的修改。这就需要规定国民大会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有重大的修改，更不致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进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在此。

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所在，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也就是说：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过去，虽设有所谓国民政府委员会，但从来不开会，徒拥虚名，当时起作用的只是行政院而已。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方案，是我提出来而大家都同意的，大致是原有的五院不动，把国民政府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决策机关，仍交由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四十人，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再由国民党提名十五个委员，国民党共有二十个委员。其余二十个委员归各党派，包括社会贤达。这二十席各党派怎样分配，政协开会时，没有说清楚，只说“另定之”。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各党派协

商来决定。这给蒋介石留下个空子，用来讨价还价，提出中共、民盟占国府委员十三名的话。我在当时曾公开发表谈话来批评此事，见于各报纸。那时，国民党老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要配合中共在国民政府委员会里取得否决权，并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为例，说否决权要不得。我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和十月四日），说明民盟的态度。我们认为两党操有武力是造成中国内战的根源。现在应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事实上，是民盟要拉着中共走这条路，并非民盟跟着中共而是中共跟着民盟走。国民大会中彼此配合，就可保证宪法的不致于大翻案；试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否决权也是为此，为了保证施政纲领不至于轻予变更，也需要民盟配合中共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办法。这至少要有十四名委员才行，十三名是起不了保证作用的。更不好的是不应该把社会贤达分开到两方面，在国内两党对抗的局面下，一定要有中间缓和的力量，才能取得和平。青年党跟随国民党，民盟跟随共产党，已经不好，现在再把社会贤达也分属两边，那就更不好。而且亦就完全没有尊重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独立意志，等于是对他们的侮辱了。这个问题后来经过反复协商才勉强达到了后来通过的《政协决议案》中的《政府决议案》，但后来国民党一意孤行，撕毁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案，单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内战全面爆发，中国政局从此经过了一段极端黑暗的时期之后，又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政治协商纪略

王云五

政治协商会议，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揭幕，一月三十一日闭幕；其间二十一日会议之结果，影响于我国最近一二十年之政治者殊大。余得参与会议并继续参与会后之协商最久，不可不有所记述。惟以文献散佚殆尽，记忆自难周详。四十六年赴美，于国会图书馆藏书中，得将其各种决议案抄录，藉此正式文件为线索，以加深回忆之印象，勉为追记，至少不致失诸主观或空泛。

第一次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实为国民参政会所发动，而为其后迭次的国共会谈所促成。在三十三年九月召开之一次参政大会，我于会前一天写信给主席团，请求转请政府把和中共商谈的经过与结果向大会报告。主席团和政府都接受了我的请求，择定九月十五日在大会中，政府方面由张治中报告，中共方面由林祖涵报告。

这次参政会中既将中共问题公开报告，虽未能即由参政会负起寻觅解决途径的责任，然参政员同仁对此问题益形重视，政府

* 王云五，政治协商会议社会贤达代表，本文摘自王云五《峡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本书时为了避免重复，对所引文件资料作了删节。

——编者

亦颇寄期望于参政会。初时曾有以参政会为基础，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开诚讨论此问题之拟议；后来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卒形成所谓政治协商会议。

拟议中之参政会特别委员会所以转变为政治协商会议，实为其后国共会谈之结果，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之会谈。

政治协商会议原定的召开办法，主要者有左列各点：（一）国民政府在宪政实施以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本会议会员名额定为三十八人；（三）本会议开会时以国民政府主席为主席；（四）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其中会员之分配情形计为第一方面国民党八人，第二方面中国共产党七人，第三方面民主同盟九人，第四方面青年党五人，第五方面社会贤达九人。第一至第四方面之会员由各该党派自行推定，第五方面会员则由第一至第四方面共同推定，均由国民政府主席聘任。

兹将各方面人选名单列后：

第一方面 孙 科、张 群、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张厉生、陈布雷、邵力子。

第二方面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叶剑英、邓颖超、王若飞。

第三方面 张 澜、沈钧儒、张君勱、张东荪、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罗隆基、梁漱溟。

第四方面 曾 琦、陈启天、余家菊、常乃惠、杨永浚。

第五方面 邵从恩、莫德惠、王云五、傅斯年、钱永铭、缪嘉铭、胡 霖、郭沫若、李烛尘。

以上三十八人中，原为参政员者有左列各人：王世杰、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张君勱、张东荪、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罗隆基、梁漱溟、曾 琦、陈启天、余家菊、常乃

嘉、邵从恩、莫德惠、王云五、傅斯年、钱永铭、胡霖。

由此观之，政治协商会议会员三十八人中，参政员占二十二人，超过半数，纵非参政会之特别委员会，然参政会在其中所占的势力不可谓不重要矣。

关于该会议的讨论范围，事前煞费商量，仅规定为两项：一是和平建设方案；二是国民大会召集事项。但开会时又把这个范围分析为下开五个题目，即：（一）政府组织；（二）施政纲领；（三）国民大会；（四）宪法草案；（五）军事问题。

会议前应有之准备已经就绪，于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上午十时，第一次会议便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蒋主席及全体会员皆出席。事前并由政府派定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为本会议秘书长。

开会后，首由本会议主席蒋先生宣布停止军事冲突办法已经商妥，停止冲突命令即可发布。继宣布协商会议目的在集思广益，共商和平建国之基本方案与促进宪政实施。当蒋先生先后作上述之宣布时，在座各会员无不热烈鼓掌。

接着，蒋先生又宣布政府准备实施各事项：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及修正。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犯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蒋主席致词后，各方面推举代表一人致词，以见彼时各方面之主张。

随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周恩来，青年党党员代表曾琦，民主同盟会员代表沈钧儒，无党派会员代表邵从恩相继发言，大致皆强调和平统一之必要。

大会综述

自第一次大会以后，大会会议与各组协商参错进行，而尤侧重于后者。大会会议，或为报告，或为大体讨论，于是实际上的决定，便为各组所主持。在各党的会员，因各组均有其代表参加，彼此尚可沟通消息，而表示一贯的主张；然在无党派方面，则人自为主，并无一定的主张，纵然各组均分配有此一方面的会员，彼此却难呼应。以个人经验而言，因余所参加者为政府组织组，对于宪草组所进行者毫无所知。一旦以其决议提向大会报告，限于时间，亦无能作细密的研究。

协商会议原定于一月二十二日闭幕，经一再延展，直至一月三十一日始告结束。其间共开大会九次。政府组织组八次，施政纲领组七次，军事组四次，宪草组四次，国大组六次。

兹将历次大会日期及会议事项开列于后：

第一次 一月十日，揭幕。主席宣布重要事项。各方面致词。

第二次 一月十日，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授权秘书长排定会议议程，议决推选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

第三次 一月十二日，周恩来、邵力子分别报告会谈经过。通过何基鸿、林可玘、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伍观淇八人为军事考察团代表；冷遹、林虎、张翼若、任鸿隽为候补。

第四次 一月十四日，商定议程，分政治、军事、国大、宪

章四类，开始讨论。扩大国府组织问题、政府提出具体意见，各会员广泛交换意见。

第五次 一月十五日，讨论施政纲领问题。

第六次 一月十六日，讨论军队国家化问题。成立军事三人小组。

第七次 一月十七日，讨论国民大会问题。

第八次 一月十八日，继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

第九次 一月十九日，讨论宪草问题。

国民大会问题

在大会讨论问题之时，我对于国民大会有特殊的主张，初时颇为许多人所反对，后来在国大组的协商中，卒采取我的主张。这就是关于国民大会旧代表的有效问题。在第七次大会中，中共与民盟都力主国民大会代表应重新选举。我独持异议，谓“原有代表固然选出了多年，中共、民盟各会员多认为不能代表新的民意。但是国民大会之不能如期召集，其责任不在各代表，因处此抗战之非常时期，甚至如英国之重视选举，其现有国会议员亦因战事而特别延长任期。查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明定，各代表之职责应于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后解除。国大一日不召集，则其职责一日不能解除。国大之主要职权在制定宪法。制宪为法治之基，倘以政治方式变更制宪代表的法律地位，不仅此例不可开，且原有代表倘以护法之名自行集会，岂不是徒滋纷扰。至谓多年前所选举的代表不能代表新的民意，纵系事实。但我也有一折衷办法可以解决此困难，而仍能维持原有代表。查国民大会代表组织法规定有由政府遴选之代表二百四十名，又规定国民党中委均为国大代表，而中委共有四百六十名，两者合计为七百名，皆无需

选举，可由政府与国民党支配。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目的，系因国民党愿还政于民，并容纳各党与社会贤达参加政府。推此美意，尽可将政府与国民党所能支配之代表名额700名，公平分配于各方面。加以各地方尚未选出之代表与原有代表身故或附逆者亦有若干名，与上述之七百名合计当有九百余名，与现有之旧代表为数大致相等。依此办法，分别遴选选举，则代表新的民意者在国民大会中至少亦可占半数。”

我此项主张，自问对于法理与事实尚能兼顾。但当我提出之初，中共与民盟的代表固然立即发言反对，即国民党人士在维持旧代表的大原则下，对于我的主张固然相同，然对于我所提的解决办法，特别是把国民党中委所占的国大名额另行分配，闻也有些人不很赞同。可是经过了国民大会组多日的讨论，竟然脱不了我的建议，除各方面已接受我的建议为协同的基础外，原来主张全部国大代表改选最烈的中共代表只好退让一步，表示一切问题倘均获公允的解决，则对于承认原有代表一问题将不坚持。最后协商的结果，遂将上述的七百名遴选代表名额分配为国民党占二百三十名，中共二百名，民盟及青年党各占一百名，社会贤达占七十名。

扩大政府组织问题

首先述政府组织。该组召集人为王世杰及罗隆基。余为参加该组之一人，讨论经过知之较详。对于协商结果亦尚满意。所不满者，未能如打铁趁热，延长一二日会期，将留待将来解决之一问题，并予解决耳。

按政府组织小组所讨论者，系关于行宪前联合政府的组织方案，参加该组之会员对于这个过渡时期的政府应采取委员制是没

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各方面所占国民政府委员的人数，和少数党的否决权，却为中共所极重视。民盟对于中共的主张如出一辙；国民党则倾向于维持国民政府主席的相当权力，对各方面委员人数的分配，自有它的主张。青年党和第五方面参加该组的会员，为谋会议之妥协，大致以调停双方意见为主旨。但青年党除调停双方意见外，对于民盟也有一种特殊的意见，就是认为青年党以其党员人数及成立先后而言，应视为第三大党，民盟虽由若干党派联合而成，但其实有党员人数及成立年龄均逊于青年党，因此极力主张该党在未来的国民政府中所占委员名额应多于民盟，至少也当与民盟同数。反之，民盟所持的意见却与青年党适相反，认为民盟所占人数，无论如何，必须超过青年党。后来经过了正面和侧面不少的协商，总算决定了两个原则。其一、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四十人，国民党以第一大党占其半数，即二十名，其余四方面合占二十名。其二、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对通常事项仍以过半数表决，但涉及变更协商会议所通过之施政纲领，则须有三分之二委员赞同，始得通过。换句话说，对于此类重要事项之决议，少数党派得联合三分之一的委员行使其否决权。讨论至此，已迫近闭会时期，各会员亦皆精疲力竭，对于四方面合占国府委员二十名之如何分配，咸主张于闭会后再由四方面自行协商。我独认为正如俗语所谓打铁趁热，不宜稍缓，盖恐一经搁置，问题转多。后来中共推翻其参加联合政府之诺言，此一问题亦为其藉口之一。因为中共后来对于四方面合占之二十名国府委员中，坚持中共与民盟必须合占十四名，俾足全额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行使否决权；民盟当然也与中共同一主张。由于此项争持，协商决定之政府组织遂不克照原议实现，迟至三十六年四月改组的国民政府成立，也就因中共与民盟之拒绝参加，而不得不

斟酌事实，对于构成分子也就不得不稍有变通。

我常常想象一下，假使当时该组能依我的主张不于一月二十八日结束，却仿照国大组之例，在二十九与三十两日专对四方所分配之国府委员名额继续协商，在彼时中共的实力还未充分，和平团结的空气一时还很浓厚之际，对于国大旧代表之有效问题卒予让步，则其对于府委名额之分配是否一定不肯让步，谁也不敢肯定。假使中共彼时能如对国大问题一般，不坚持其成见，因而达成协议，则联合政府在协商会议闭会后，短期即可组成。不过此一过程当然需要相当时期，而在联合政府中，除青年党人士与社会贤达当能与国民党合作外，民盟的构成分子甚为复杂，除一部分倾向于中共外，其能与国民党合作者亦不乏其人。中共在其实力未充之时，在大多数压力之下，表面似不能不敷衍，则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定然与后来有所不同，国民党与其友党及友善之社会贤达切实合作，争取时间，稳渡复员期内之危机，实际的局势，当然迥不相同，美国彼时对我的态度亦必不同。整个局面，是否会与现在不同，谁也不敢断言。

又假使政府组织组能采取我的建议，继续专对四方面所占国府委员名额协商，我在当时也有一个自认为相当公允之方案。那就是先将国府委员名额之半数，即二十名，由四方面平均分配，则每方面五人，然后由其他三方面各以一名转让于中共，如此则中共实占八名，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各占四名。中共与民盟合计，则占十二名，虽未足三分之一之否决数，然《和平建国纲领》既为五方面一致通过，如有变更之必要，则三分之二委员赞同，固不成问题。设无此必要，仅因国民党一方面之意见，则其他四方面为维持自己一致通过之纲领，共同拥护，责无旁贷，又何必专赖中共、民盟两方面之共同行使其否决权，深信青年党与无党派人

士必能与之共鸣。即或不然，否决权所差之二票，由于无党派人士既非政党，并无一致之主张，其四席委员见仁见智，彼此不同，其中一部分委员定可以举足轻重。此一番主张，后来当各方面对府委名额争持不下之时，我曾提出。但打铁趁热之时期已过，蹉跎复蹉跎，国共分裂之形迹，由于协商会议闭会后一连串发生之事故，而日益恶化，其不能达成协议，亦固其然。所谓时机不可失者，此举实一重大关键。

施政纲领

次述施政纲领组。该组召集人为张厉生及董必武。协商结果，成立所谓《和平建国纲领》。计分九章，除第八章“善后救济”完全针对一时现实外，其他八章内容含有两类性质。其一为一时性的，如总则第四条“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系针对政治协商会议前之情势而言。其二为永久性的，则后来制宪会议中多被采入《中华民国宪法》各有关章内，例如总则章第一条“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挥原则”，在《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则开宗明义，明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纲领第二章人民权利第一条所列举之各种自由，则《中华民国宪法》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所规定者远较为详备。又纲领同章第四条保证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经济上地位之平等；而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则明定“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涵义尤为广泛。

纲领第三章政治第一条系指施政上一时之准则，自无需订入宪法之内；第三、第四、第五三条所列之原则，则《中华民国宪法》有关司法一章已有更详明之规定；第六、第八两条所列之原

则，则《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各条均有具体而适当之规定。

至于纲领第四章军事，第五章外交，第六章经济财政，第七章教育文化与第九章侨务等，其中各条所列举之原则与办法，大都已纳入于《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各节之内。

以军事言，纲领第四章除第四条系针对一时的现实而规定外，其具有恒久性之第一条，则宪法基本国策第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三十九各条分别订明国防目的及军队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大旨亦正相同。

以外交言，则纲领第五章一、三、四各条，除属于一时性者外，其余皆为宪法基本国策中第一百四十一条所括入，且较详尽广泛。查该条文为“中华民国之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敦睦邦交，尊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以保护侨民权益，促进国际合作，提倡国际正义，确保世界和平”。以此一条概括彼四条实有过之，无不及也。

以经济财政言，则纲领第六章中较有恒久性者，多为宪法基本国策第三节所采纳。

以教育文化言，则纲领第七章第三条所期望之“普及国民教育……积极扫除文盲”，在宪法基本国策第一百六十条已明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实更具体。又纲领同章第四条之主张“增加教育及文化事业经费比率”，在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则明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六……”，尤为肯定而具体。

以侨务言，纲领第九章第一二两条对侨胞生计与经济之注

意，在宪法基本国策第一百五十一条则明定“国家对于侨居国外之国民，应扶助并保护其经济事业之发展”，彼此原无二致。

总之，所谓《和平建国纲领》实括有三类之条文：第一类为恒久不变之政治原则；第二类为增进效能与切中时弊之行政改革；行三类则为解决国共纠纷的临时办法。合此三者，构成一种混合的文件。其中第一类可为宪法所尽量采纳，允如上述。第二类在行政上加以采纳，或有补于效能，或足以消除积弊。第三类或为获致妥协之方法，或为弭息争执的条件。若就其名称《和平建国纲领》分析之，第三类在获致和平，第一类为建国之大经，第二类则为建国之手段而已。

军事问题

复次，当述军事问题。该组召集人为胡霖、张东荪。协商结果，提出《军事问题报告》。

在军队整编及统编方案，处处均将政府军队与中共军队并列，并规定某军以中央军官或中共军官为军长，距离军队国家化之原则固然尚远，但如能切实执行，俟联合政府成立，一切均由政府主持，或者尚可期望其进一步的国家化。

可是不幸得很，中共方面在达成停火协议，并签定整编方案之后，在战场上的共军，不顾一切，移向若干点，而攫取更适于战略的阵地。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玉田与丰润；在河南省占据了孟县与考城；在山西省占据了侯马、浮山、苛岚等地；在绥远省占据了集宁；在苏北则破坏了陇海路若干若干段；在山东省夺取了栖霞等地。民国三十五年之初，中共控制之地区已从三十四年秋间日本投降时所占据的八十一县，扩张至三百县。

共军在停战期内集中于迅速夺取东北。首先占据外蒙边界之

赤峰、陶林两县。此两地之重要性，因其横互于共党在察哈尔热河省之据点与东北共军之交通线间，如为国军所掌握，将可堵塞共党之人力物资对于关外林彪所部之供应。因此，共党在停战的时期内，不断输送其武力于东北，自山西省移入者四万六千人，自山东省移入者四万人，自河北省移入者一万人；另有八万人从山东海运，利用俄人占据之港口而入东北。马歇尔将军误信共党能遵守协定，遂于是年三月返国。于是林彪所部先后开入长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同时红军又夺取四平街，控制上开各地迤南的咽喉，以阻塞政府军之由陆地输入东北。

其后政府与共军冲突的发展情形，政府虽控制了东北的据点，共军则散在于广大的面。

凡此种种，虽是以以后的事；然协商会议对于停火之决定与对于军队整编统编之签定，则已成为具文。

国民大会组织权之修正

复次，当一述国民大会组。该组召集人为余家菊、邓颖超，其所提出之报告为：

-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 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 三、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为之。
- 四、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
- 五、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职业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 六、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 七、总计国民大会之代表为二千零五十名。

八、依据宪法规定之行宪机关于宪法颁布后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按上开报告中，争执最烈者为第四第六两条。第四条在名额上并不发生问题，问题在其中业已选出之部分约九百名应否承认。在大会中讨论时，国民党各会员当然主张维持有效，惟中共方面力加反对，谓业已选出多年，不能代表战后之民意，必须另行选举；民盟方面则主张将旧选之代表作为候选人，进行重选。其他方面无何表示。余独主张承认旧代表有效，并谓政府无权取消其资格，或强使作为候选人，举行重选。惟余为应付中共民盟认为足以代表战后民意之人太少之意见，遂提议将国民党中委为当然国大代表之四百六十名，加上原由政府遴选之二百四十名，合共七百名，对于各党与无党派方面，作合理之分配。初时中共民盟固反对余之主张，即国民党方面，因余主张将原为该党中委所占之四百六十名分配于各方面，闻亦不甚赞同。嗣经多次协商，认为无法解开症结，国民党固首先接受余之建议，而其他方面亦以争持不下，不能不打开僵局，于是态度倾向于余之主张。甚至中共方面亦表示如各项协商问题均能解决，则彼等对于国大问题不坚持其重选代表之主张。因而最后结果，孙科等国民党方面之原案，加入了“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之第六条，是已接受余所主张，而公认旧选之代表为有效矣。

至此七百名代表如何分配，亦经初步协商为国民党占二百三十名，即等于原定中委四百六十名全部为当然代表之半数，此外中共占二百名，民盟及青年党各占一百名，而以剩余之七十名，分配于无党无派一方面。但是到了一月三十日国大组须与综合组联席会议之时，民盟方面对其与青年党方面同占一百名表示不满，谓该方面为许多政团所构成，至少要比青年党方面多占若干名额。青年党则夙以第三大党自命，谓其成立时期较民盟为早，

党员人数亦较多，无论如何，不应较民盟为少。查综合组为每方面各推二人所构成，余为第五方面推出两人之一，故是日亦参加综合组，亲聆民盟与青年党两方面之争持不下，迄于十二时左右。其时任综合组主席者为孙会员科，因须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之会议，正式报告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乃先行退席，推余代任主席。继续协商此一争持而难决之问题，将及一时，尚无结果。余乃提议暂行休会，作不正式之商谈。一面准备午餐，以便餐后继续会议，务期获得完满解决。因今日预定程序，为十二时国民党中常会会议通过协商各项结论，下午三时国民政府委员会亦开会，获得通过。明日上午始能正式举行闭幕式也。

在休会间，中共方面殆因讨好民盟，而又不愿直接激起青年党之反感，乃与国民党方面密商，在表面上仍维持民盟与青年党之平等地位，各占一百名，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各就其所分配之名额让出十名，加入民盟方面所占之名额。国民党方面为解决僵局，当然同意。于是复行会议，由中共提出此项办法，国民党表示赞同，至此民盟与青年党两方遂不复争持，而实际上之分配名额，则改为国民党二百二十名，中共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青年党一百名，无党派七十名。

宪草修正原则及会后宪草之审议协商

最后，当述宪草组。该组召集人为莫德惠、陈启天。经举行五次会议以后，即提出报告。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首先实现的一项决议，便是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系以每方面各推委员五人构成。由于仍保持继续协商之途径，协商会议原设之综合组也就继续存在。第五方面参加综合组的是傅斯年和我二人。至于宪草审议委员会每方

面的五人，毫无例外的均以原参加综合组的二人占其中二席，此外三人则另行推定。记得第五方面加推的三人为莫德惠、胡霖和郭沫若。在举行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时，国民党方面之审议委员称，宪草修正原则将国民大会改为无形之国大，殊属不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二次全体会议，曾作详尽之讨论，特提出异议，请求审议委员会加以考虑，仍改为有形之国大。此外尚有数点提请协商修改。其中一项，即对行政院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修正原则，拟请取消。余对于恢复有形之国大固极赞同；然对于解散立法院之权，则认为系对立法院不信任行政院一项权力的制衡，既有后者，不能不有前者。然国民党代表，则认为不信任权与解散权均非国父遗教所主张，最好能将二者一并删除。经数度协商，卒于三月十五日之宪草审议会与政协综合组联席会议就下开三项获致协议，即：（一）国民大会仍为有形之国民大会。（二）宪草修改原则第六条二项“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院长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院长不得再提解散立法院”，予以取消。（三）省宪改为省自治法。

除上述三项协议外，宪草修正原则之其他各项，连同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修改案》，宪政实施协进会《对五五宪草之意见》等，自应一并审议。

有关修正《五五宪草》之各种方案和意见，依照政协宪草组之决议，应由宪草审议委员会研讨协商。而宪草审议委员会，则委托一个五人小组担任研讨，俟有结果，再提审议会与政协综合组决定。所谓五人小组由五方面各推一人构成。中共方面并不反对五人小组；惟谓人选不必固定，各由每方面临时推出一人组成。第一、第三、第四各方面均不反对，独第五方面既无党派，各人自

不能有一致主张，不若各政党纵因代表变更，仍可不变其主张者。于是各方面咸赞同除第五方面得推固定代表一人外，各政党可临时指定代表一人出席。于是我便被第五方面推定为参加小组之固定代表。至于第一方面虽亦赞同得随时易人出席，惟自始至终，均由王亮畴先生出席，并担任主席。因小组会议均在重庆美专校街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而王亮老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又为法学权威，国民党使之专任出席实最适宜也。

其他三方面，因出席小组之代表，可以随时更动，间有易人出席之事实。但如非必要，亦多专由一人出席，以资熟手。某日讨论某一问题，四方面同一主张，独中共方面持异议，最后中共迫于众意，其出席代表周恩来不能不表示让步，但托词为时已晚，原则虽无问题，文字可能需要斟酌，可否改于明日作最后决定。当时任何人均认为可以达成协议。想不到次日续会，周恩来托故不出席，改以秦邦宪为代表，而秦邦宪则托词周恩来并无交代之言，仅以电话嘱其出席，于是一切倏为不知，重新开始讨论，耗费了三四小时的唇舌，毫无结果。于是各方面始恍然于中共所提随时可以易人出席之议，竟怀有此种深意。其后又开会一次，拟对本问题继续讨论，周恩来仍避不出席，由秦邦宪参加，仍无协议。

由于中共方面之倔强，民盟方面分子复杂，虽间有持正者，然多数均与中共一气，于是除余与王亮老大都主张相同外，青年党代表亦多能持正，往往发生举足轻重之作用，尤以陈启天为然。因之，中共深有恨焉。某日讨论某问题，秦邦宪竟对陈启天破口痛骂，启天愤而退席，并声言今后青年党不另派代表出席。后来经其他三方面，极力调处，中共迫于众议，微露歉意，启天始复出席。局势如此，迄于是年五月间各人复纷纷复员东下，宪

章之再度协商，所能获致协议者殊鲜。就余记忆所及。对于协商会议原决议修正宪草各原则，经再度协商略有改变者为下列各项：

一、国民大会恢复为有形之国民大会后，其职权规定为（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上开（三）（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此项再修正，后来制宪时，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

二、将协商会议修正宪草原则“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院长不得再请解散立法院”，删除；一面修正为“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决议，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此项再修正后来制宪时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第五十七条二三两款）

三、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列举未尽之事项，明定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换言之，即以所谓剩余权归属于中央，以别于联邦国家，剩余权属于各邦者。（中华民国宪法一百十一条所定）

四、将宪草修正原则“省得制定省宪”，再修正为“省得依据

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并规定省自治法制定后，须即送司法院，司法院如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如中华民国宪法一百十二条及一百十四条所定）

五、将宪草修改原则所定修改宪法由立监两院联席会议发动，而由国民大会复决者，再修正为办法两项，即：（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若干成分之提议，若干成分之出席，与出席代表若干成分之决议修改之。（二）由立法委员若干成分之提议，若干成分之出席，及出席人数若干成分之决议拟定宪法修正案，拟请国民大会复决之。

政府扩大组织之实现

协商会议闭幕后，不断继续协商者，其中之一便是扩大政府组织问题，此问题之症结，最先是在各党派及无党派所占国府委员二十名之如何分配。由于中共与民盟坚持须合占十四席，俾得共同行使总额四十名三分之一否决权，于是问题便从四方面之如何分配，转移至否决权之把握，解决益形困难。盖某一方多一席或少一席，尚可期望某一方面让步；特别是第五方面，本来没有什么组织，其参加政府全靠各个人之声望与能力，而无取乎多占席位自行分配。因此，我最初虽提议以八席归中共占有，其他三方面各占四席，后来我曾代第五方面表示让出一席，归民盟占有，使中共与民盟合得十三席，距其所要求，仅差一席，惟重大关键，在未能构成行使否决权所需之总额三分之一。假使中共民盟仅争席次，当不难依此解决；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控制否决权，则不仅国民党未能赞同，无党派与青年党亦均不愿意，遂造成不可解开的僵局。

是年四五月间，宪草审议委员会及政协综合组各人皆急于复员东下，于是相约今后改在南京继续协商。余亦于五月上旬东下，抵上海甫留旬日，即往南京，拟继续为政协未了工作而努力。惟以国共关系益趋恶化，中共方面对于继续协商不很热心，民盟和之，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亦无能为力。政协秘书长雷震坦率语余，在南京续作协商殆无可能。

蒋主席自邀余参加政府，以为之倡后，仍不断致力于扩大政府基础，三十六年二月十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通过（一）新增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参政员额，各党派分配比率，定为国民党与无党派合占二分之一，青年党与民社党合占二分之一；（二）宪政实施促进会驻会委员会之分配比率，为国民党与无党派占四分之三，民青两党占四分之一；（三）各党派人选，民青两党采提名方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

民青两党于决定参加上开四机构后，旋又与无党派人士共同接受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在四月十八日前遂由四方面代表五人共同签字，计开签字者国民党为蒋主席中正，民社党为张君勱，青年党为曾琦，无党派方面则为莫德惠、王云五二人。

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令，于四月十八日与施政纲领同时发表。国府当即明令选任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伍宪子、胡海门、耿翼翹、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为国民政府委员。特选张群、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长，至于国府副主席亦经明令选任孙科担任。

国府改组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即撤消，仍恢复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新国府委员会于四月二十三日首次举行会议，当决定行政院改组后之各部会首长名单如下：

院长张群(国民党)、副院长王云五(社会贤达)、政务委员张厉生、王世杰、白崇禧、俞鸿钧、朱家骅、谷正纲、谷正伦、薛笃弼、谢冠生、李敬斋、翁文灏、许世英、刘维熾、彭学沛、雷震(以上国民党)，李璜、左舜生、常乃惠、杨永浚(以上青年党)，李大明、蒋匀田(以上民社党)，俞大维、周诒春、缪嘉铭(以上社会贤达)至于各部首长则明令任命如下：

内政部长张厉生、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长白崇禧、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李璜、教育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长俞大维、农林部长左舜生、社会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长谷正伦、水利部长薛笃弼、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地政部长李敬斋、卫生部长周诒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熾、新闻局局长董显光。

政府改组完成后，经济部长李璜因病坚辞，府委伍宪子，政委李大明迟迟未就职。当由青年党提名，改任陈启天为经济部长，常乃惠为府委，郑振文为政委。民社党后加选徐傅霖，并改推汤住心以代伍宪子，杨浚明以代李大明。稍后国府复增选黄绍竑、丁维汾、颜惠庆为国府委员。宋子文改任广东省主席，其国府委员免职。

